社会与公益

SHE HUI YU GONG YI

聚焦社会建设·助力公益事业

2026

8月（下）

总第204期

ISSN 1674-9758

CN 11-5944/C

新时代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融合路径探析

张　静

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的路径研究

黄　滟

复杂适应系统视域下老年公益教育供给的适应性研究

杨礼芳　李　慧　潘美意

社会工作与数字化转型的融合研究

张皓炎

高职学生社区志愿服务中“思政引领－社工赋能”双向融合模式构建研究

周　玟

全域全龄社区教育视域下混合型社区治理实践探索

王　琼

多次入选 BIBF“精品期刊” | 荣获 CASS“最受欢迎期刊” | 荣获“2024 数字阅读影响力期刊 TOP100”

Competent Unit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ganizer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
China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2026 年 8 月下
总第 204 期
邮发代号：82-579
出刊日期：2026 年 8 月 28 日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邮编 100010）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邮编 100037）

联系电话：
010-6830 0355/0356
6830 0357/0358
6830 0359/0360
6830 0361（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8398 8206/8208

网址：
www.swchina.org
www.spw.org.cn

投稿邮箱：
shegongren@163.com

Director of the Academic Committeeof the CASW 中社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魏礼群 WEI Liqun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主任
陈存根 CHEN Cungen

Deputy Director of Editorial Board 编委会副主任
周惠 ZHOU Hui / 康鹏 KANG Peng / 王谦 WANG Qian
赵蓬奇 ZHAO Pengqi / 胡坚 HU Jian / 金莉 JIN Li

President 社长
崔强 CUI Qiang

Editor- in- chief / Chief Editor 总编辑 / 主编
刘正刚 LIU Zhenggang

Deputy Editor- in- chief 副总编辑
孙亚桥 SUN Yaqiao / 田哞 TIAN Mou / 蒋鑫富 JIANG Xinfu

Vice President 副社长
王丽 / 魏三军

Associate Editor 副主编
田文旗 / 姜淑云 / 刘玉霞

President's Assistant 社长助理
刘斌 / 马明月

Council Vice Secretary-general 理事会副秘书长
林平光 / 殷鸿飞 / 尚宝荣

Editorial Office 编辑部
屈思源 / 白润红 / 史策 / 高云天 / 刘倡 / 平萍 / 黄桂华 / 李振鑫
彭一超 / 翟海艳 / 李雪良 / 梁晶晶 / 张力 / 田宇晗 / 胡刚

Council Secretariat 《社会与公益》理事会秘书处
刁琼兰 / 马强 / 马贵荣 / 万沣毅 / 王红 / 王保峰 / 王德立 / 王守红 / 王国权 / 王坚松 / 王政 / 王哲
王德兵 / 白浩扬 / 布朋印 / 冯军伟 / 田瑞建 / 卢莎 / 邓富友 / 布宏雷 / 石恒平 / 田野 / 闫新勇
刘玉平 / 刘汉良 / 刘建军 / 刘长鹏 / 刘漩 / 孙明 / 朱红艳 / 任璐 / 辛福 / 吴春华 / 吴雪燕 / 何书一
何宗尉 / 李卫华 / 李永华 / 李梓英 / 李迪 / 李建华 / 李斌 / 李军 / 肖玲 / 苏芬芬 / 陈炎松 / 陈勇 / 陈承
谷学亮 / 杨航 / 杨会民 / 杨同喜 / 杨雨 / 杨高磊 / 杨扬 / 杨威 / 邵佳 / 张兴亮 / 张鼎 / 张燕蕊 / 张冬
张汉英 / 张金霞 / 林莹 / 金亮 / 屈玉芬 / 范娱艳 / 侯军旺 / 侯俊勇 / 赵燕成 / 赵建苹 / 赵容榴
徐志昌 / 高蕾 / 高云辉 / 郭保生 / 郭晓利 / 耿庆山 / 柴宏 / 秦一杰 / 黄玉海 / 黄洪松 / 曹耀文
鲁兵库 / 裴凯峰 / 联凡 / 惠熙玲 / 蒋红超 / 雷秋枫 / 雷彦敏 / 裴旭峰 / 臧忠燕 / 廖俊军

Advertisement 广告
《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北京仕风文化发展中心

Designer 设计
王熙元 / 武建和

Printing 印刷
北京启航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发行单位：《社会与公益》杂志社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广告发布登记：京朝字监广登字 20180004 号
定价：40.00 元

声明：本刊严禁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直接生成论文研究框架、主体内容与核心观点等，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知网 AIGC 检测等）比例超过 20% 的论文作退稿处理。对已刊发论文，一经查实存在违反使用规范的情况，文责自负，本刊概不负责。
本刊转载部分文章的稿酬已按法律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 120 号 1 号楼太丰惠中大厦 1027-1039，邮编：100050
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 wenzhuxie@126.com

本刊数字版合作说明：社工中国网、中国知网、龙源期刊网、博看网。本刊同时进行数字发行，作者如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授权我刊及我刊合作网站信息网络传播授权。

法律顾问：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 刘百军律师

创刊时间：2010 年

社会与公益
SOCIETY & PUBLIC WELFARE

CONTENTS

2026 年 8 月 下
总 第 204 期

基层党建

党建引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机制构建与效能评估…… 李　鹏 01
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的三维路径探析…… 谢鹃霞 0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广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维路径研究…… 潘宜烜 07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现实成就、优化路径与前景展望——基于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与国家治理理论的视角…… 尉端煦 10
新时代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融合路径探析…… 张　静 13
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区治理模式构建研究——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多元路径与实践创新……
…… 常　荣　邓思濛　李　丽　刘任凤 16
新时代电力建设企业党建品牌建设的价值转化研究…… 徐　浩　郝瑾阳 19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 吴琦薇 22
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曹瑜虹 25
“百年对话”数字口述史工程：新时代青年与老党员的跨时空对话平台建设研究……
…… 吴思语　罗艳红　王桐语　徐晨光 * 28

公益慈善

复杂适应系统视域下老年公益教育供给的适应性研究…… 杨礼芳　李　慧　潘美意 31
高职学生社区志愿服务中“思政引领—社工赋能”双向融合模式构建研究…… 周　玟 34
佛山市社区教育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中的作用研究…… 王保生 38
基于“一站式”服务平台的高校学生突发困难应急资助敏捷响应模式构建与应用…… 马红娟 41
青年志愿服务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育人研究…… 姜景惠　刘雪杰　王浩然 44
高职困难生“心理疏导 + 社会支持”双轨帮扶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 林　婷 47
技工院校资助育人视角下受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李洁琛　韦任嫣 50
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究…… 田意颖　朱蓝溪 53

案例分享

基于协同理论的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改革实践探索——以 G 校毕业实习为例 …… 刘百秀　蔡晓潼 56
“医—护—防—养—管”五维六线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例……
…… 岑指昊　石　龙 * 59

“新‘枫桥经验’”引领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新路径的研究——以 G 省 G 市城中村为例 …… 秦总根 * 陈珊琪 廖昕怡 黄 圣 王韵淇 63
大学生“就业内卷”现象的研究分析——以东营市为例…… 郑钧文 厉明杰 杜丕隆 韩鹏羽 66
希望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就业焦虑的生成逻辑与干预路径——以大别山精神教育为例…… 刘远泽 70
非遗蓝染赋能视角下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探索与实践——以扬州职业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为例…… 王 锴 73
赋权视角下农村困境儿童自驱力培育的路径与效果评估——以淮安农村地区学校社工项目为例…… 金雨洁 陈雨彤 李金晏 * 76
党建引领生态价值转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层实践——以白山市“六域党建”推动“两山”实践创新为例…… 王 智 79
高职院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场域构建与实践研究——以浙江省高职院校为例…… 胡 蝶 82
红色文化赋能高职育人的实践路径研究——以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葛维莉 85
基于生成式 AI 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以“电商视觉营销设计”为例 …… 李 岚 88
以文化人 以文聚力——长沙血液中心党建引领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谢 菁 91

百家争鸣

推进“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的探索…… 喻晓洁 吴秋霞 94
短视频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多维影响及预防机制研究…… 李 阁 袁 珍 李颜君 赵国臣 * 98
校园守望：基于浙江省“校警驿站”建设的高校安全协同治理研究……朱意炜 孙亚娜 101
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的路径研究……黄 滟 10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赋能青年社会价值认同的影响研究 ……何诗语 107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建构与价值重塑研究……乔 松 110
主理人思维赋能团青工作路径探索与实践创新……彭 睿 113
包容型治理赋能在地化高校“一站式”社区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探索……周烁烁 116
心理弹性视角下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影响因素及保护机制研究……杜俊鹏 蘇清朗 蒋 梦 119
乡村空间正义实现中的廉洁约束机制研究……陶胤中 闫昱澍 122
社会工作与数字化转型的融合研究……张皓炎 126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个案工作介入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社会融入的路径探究……王诗琦 129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协同治理策略……任渝婉 132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体育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索……张 珂 135

全域全龄社区教育视域下混合型社区治理实践探索……王　琼 138
老龄化社会下居家老年人群 AI 护理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西安市 G 社区的调查 ……唐佳璇 141

教学研究

气象学课程思政融入路径与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姚　平 *　王　妍　李娅琼 144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机制研究……杨　结 147
民办高校“思政大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的模式与路径研究……肖欣怡 150
城市文化助力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赵　霞　涂晓洁 153
从“有”到“优”，向“夜”而生——余姚市民夜校课堂品质优化的实践探索……陈逸安 156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逻辑与路径研究……杨巨慧 159
产教融合视域下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专业建设与实践探究……冯卫宏　叶晓明 162
高等职业教育机械 CAD/CAM/CAE 教学改革与数字化设计融合策略 ……南丽霞　慈瑞梅　郝欣妮　吕　宁 165
AIGC 技术支持下高职心理第二课堂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模式构建 ……唐奕佳　花燕锋 168
“大思政课”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实施路径探究……曹　卓　罗义欣 171
新时代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的实践探索……王力加 174
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学情分析：价值意蕴、赋能逻辑与提升路径……张静超 177
数智化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践探索……章　雅 180
高职院校美育浸润体系的三维建构：价值 • 现实 • 路径…… 赵新来 *　嵇　怡　杨红进 183
数字生态下红色文化与高校辅导员工作融合的路径研究……彭焕卜 186
“大思政课”视域下非遗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实践教学的创新路径研究……王湘臻　郭亚茹　高红敏　黄亚薇 189

思政论坛

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基于 N 市调研数据分析 ……梁丹丹 192
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张越君　李晓晨　冯潇潇 195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分析……李天宁 198
整体思维视域下大中小学思政教育的全过程一体化育人路径研究……伯　洁 201
“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陈　杨 204
社会工作方法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索……马　静　高红敏 207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路径研究……江美娜 210
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价值优势、实践挑战与优化路径研究……吴沂珊 213
融媒体 AI 时代高校附属医院开展医学生思政工作的路径研究 …… 傅　强　朱冠宇 * 216
新媒体背景下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策略研究……王晓倩 219
高校运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挑战及路径探析……周　杰　姬咏华 222
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瓶颈及对策研究……李明运 225
高校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路径研究……刘　超　马梦婷 228
心理健康教育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探析……李幼琳 231
高职辅导员融入学生日常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刘慧慧　郑欣敏 234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研究……张　咪 237
老干部工作中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穆琳宁 240

学海探骊

新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路径的实践架构……南田玉 243
数字赋能视角下高校辅导员角色转型对大学生思想引领效能提升研究……路　遥 246
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的机制与路径研究……白　雪 249
社会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网络舆情的辅导员引导优化方案……蔡菲菲　郭真真 252
“新双高”背景下企业科教工作站驱动的校企协同创新模式研究……田云龙　张　蓓 255
基于立德树人背景下中职学生厌学的消极心理矫正路径……张利轩 258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的探索……伍　静　胡　琳　孙海荣　吴雯雯 261
轻量级数智赋能：高校心理工作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探索……马　静 264
就业优先战略下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提升实践路径探析……袁瑶瑶　　陈　勇 267
情感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图景、风险与路径……崔京旭 270
新时代高校退役大学生示范作用发挥的路径研究……瞿志杰 273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现象探析及对策研究……郭　翔 276
基于“五项修炼”模型的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路径探析……王婷婷　付　阳 279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刘瑾明 282

党建引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机制构建与效能评估

李　鹏

摘要：在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纵深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主体，肩负着推进科技自立自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使命。本文以党建赋能科创深度融合为主线，立足国有企业政治属性与市场属性双重特质，从组织嵌入、决策协同、激励导向与评估反馈四个方面搭建创新机制，并配套效能评估体系。研究在目标、路径与评价三个维度加以统筹，强调以制度化嵌入为主、体系化协同与流程化执行为辅，推动国企独特政治优势向创新动能转化。研究结论明确了国企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治理优化重点与落地实施逻辑，为新时代国有企业科创治理升级、党建科创深度融合提供了可参照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党建引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机制构建；效能评估

一、引言

科技创新是国有企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因，也是国家经济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支点。现实情境中，国有企业需要在落实国家战略任务、参与市场竞争与推进自主研发之间统筹资源与节奏，形成有序衔接的治理安排。以党建凝聚共识、完善创新生态与强化制度保障，已成为创新驱动中的关键议题。党建作为政治要求与企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组织力与政治功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方向约束、组织支撑与价值导向[1]。本文提出以党建引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机制构建路径与效能评估体系，力求在理论逻辑、制度设计与执行程序之间建立一致性，为完善企业创新治理提供具有操作性的参考。

二、党建引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理论基础

党建引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理论基础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原理，并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治理理论相衔接。党的领导在国有企业中的根本地位，决定科技创新同时具备经济属性、政治属性与社会价值[2]。党建以政治核心与思想引领为抓手，明确创新方向、组织资源要素、凝聚协同行动。在制度层面，党建工作以组织化嵌入为主，规范化与制度化配合推进，使创新活动在程序规则与权责边界内运行；党组织参与战略决策，确保技术路线与产业定位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于文化层面，党建塑造以使命感为核心的价值结构，以责任意识与团队协作为支撑，提升科研群体的目标认同与合作稳定性。于机制层面，党建通过组织嵌入与制度协同，使创新目标与政治目标同向推进，构成“政治引领为主、制度支撑与创新驱动协同”的内在逻辑链条。与此同时，党建引导创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与价值导向的再塑造：党组织在科技项目立项、团队建设与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提供政治保障，使科研活动保持方向性与公共责任取向；党建完善内部治理秩序与风险防控体系，促使创新实践在规范化与制度化轨道上运作。依托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的耦合，国有企业能够在复杂市场环境中保持战略定力与创新持续性，为后续的机制构建与效能评估奠定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

三、国有企业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一）强化党建融合协同，提升技术攻关组织能力

在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实践中，党建引领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对创新方向、组织动员与协同行动的整体统筹。通过统一思想认识与组织意志，党建能够将国家战略导向、产业布局要求与企业创新任务更紧密衔接，使创新议题在企业治理体系中形成相对明确的工作主线与推进重点[3]。同时，党组织以制度化参与方式进入科研组织与项目治理的关键环节，在跨部门、跨专业协作中发挥凝聚共识、整合资源与推动协同的平台功能，推动需求归集、方案论证、过程推进与节点验

收等环节实现较为有序的衔接。在“卡脖子”技术攻关、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等关键场景中，党建的组织动员优势能够快速聚拢各方科研力量、整合各类创新资源，有效打破部门、专业、层级之间的壁垒，构建起上下同心、左右联动、协同发力的攻坚格局，切实破解传统创新模式下“各自为战、资源内耗、合力不足”的突出难题。基于此，党建的组织动员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转化为联合攻关的协作优势，为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工程化落地提供相对稳定的组织支撑。

（二）强化人才激励协同，提升科创队伍培育能力

科技创新以人才为关键要素，党建引领的作用亦体现在对价值导向、队伍建设与激励保障的综合协调。党组织通过思想引领与文化涵育，强化科研群体的使命认同与团队协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创新投入的持续性与研究力量的稳定性；通过组织建设与岗位体系设计，推动科研骨干、青年人才与关键岗位形成梯队化配置，使人才培养与任务布局之间形成更为协调的对应关系。国有企业科研人才队伍本身兼具扎实专业素养与坚定政治觉悟，党建工作通过把政治引领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深度渗透，能够有效引导科研人员树立起“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坚定价值追求，推动其将个人职业成长与企业发展、国家战略需求深度绑定，进而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心底的内生创新动力。同时，将政治激励、职业发展与绩效激励相互贯通，有助于把先锋示范、荣誉表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原创成果积累、平台能力建设等要求相联结，形成导向相对清晰、牵引性更强的激励机制。由此，党建能够在“价值认同—能力成长—组织凝聚”的链条中提升人才队伍对重大任务的支撑水平。

（三）强化治理决策协同，提升科创项目统筹能力

国有企业科技创新通常面向重大工程与战略性任务，党建引领的关键在于将政治优势嵌入治理过程，在创新活动全周期提供相对稳定的组织保障与制度支撑[4]。一方面，党组织通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与重要方向把关，推动技术路线选择、资源投入结构与产业定位与国家战略及企业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另一方面，通过促进党委决策、专家论证与项目管理之间的协同衔接，使政治把关、专业论证与执行推进在同一治理链条中形成连贯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决策的前置研判与执行的一致性。党建引领下的创新决策，有别于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传统模式，其核心优势在于能精准把握短期效益与长远发展、市场诉求与国家战略导向的平衡，有效扭转企业科技创新中普遍存在的“重短期轻长期、重盈利轻攻关”的认知偏差，确保科技创新始终紧扣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稳步迈进。项目实施过程中，运用过程督导、节点复盘与风险预警等方式强化过程管理，有助于使质量控制、安全合规与成果转化在推进节奏上更为顺畅。由此，党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创新项目的统筹协调能力与持续推进能力。

（四）强化评估反馈协同，提升科创效能迭代能力

效能评估是将党建引领落到治理能力上的关键环节，其作用在于为创新活动提供可衡量、可比较、可迭代的评价框架，并为制度改进提供依据。在组织层面，对责任落实、制度执行、参与决策与过程治理等要素进行结构化刻画，有助于提升组织运行的透明度与规范性。在创新层面，统筹成果质量、转化成效、投入产出与过程管理等指标，可以更完整地呈现创新贡献与能力建设状况。在社会价值层面，将节能降耗、行业带动与公共服务等指标纳入考量，有助于体现国有企业创新活动的综合效益与责任要求。党建引领下的科技创新效能评估，与传统科技创新绩效评价的核心差异，在于将党建引领成效纳入评价核心维度，实现党建与科技创新融合效果的量化考量，破解党建工作“软指标难考核”的痛点，推动党建工作从“虚功虚做”向“实功实做”转变。进一步将评估结果与资源配置、干部考核、人才激励及预算优化相衔接，可形成“评价—应用—改进”的运行链条，推动党建引领与科技创新在反馈机制中实现持续调整与迭代优化。

四、党建引领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机制构建与效能评估

（一）组织嵌入机制：构建党建引领的创新治理体系

在科技创新治理体系中嵌入党的组织力量，是将政治优势与创新优势转化为同向合力的基础环节。应以党组织为核心，围绕权责配置、流程衔接与信息共享优化企业创新治理结构，将党建工作以制度化方式嵌入科研组织、技术委员会与项目管理等关键节点，形成“党委领导、分级负责、协同推进”的组织格局。对重大科研项目实行“双审制”，即党委政治审查与技术可行性审查并行，确保战略方向与技术路径在目标、步骤与边界条件上保持一致[5]。通过设立科技创新党委专门委员会，强化战略统筹与资源配置协调，使科研部门、管理部门与党组织在任务分解、时序推进与数据报送上实现责任共担与信息互通。同步建立科研项目“党建责任清单”和“一项目一台账”，明确职责边界、监督路径与追责方式，推动政治任务与技术任务同步落实。推行“项目党支部+课题攻关组”双元组织模式，贯通需求归集、方案论证、过程督办与节点验收等环节，形成全链条嵌入。将党建工作纳入创新考核指标体系，设置嵌入率、参与度与落实度等硬约束，通过季度述职、专项巡察与绩效通报形成动态调整与闭环管理机制，提升党建工作在创新体系中的覆盖深度、执行强度与治理效度。

（二）决策协同机制：强化党建在创新决策与执

行环节的引导作用

科技创新决策涉及战略判断、资源配置与风险管理等多个维度，需要在党委政治引领下实现方向与科学的统一。建立党委与科研决策机构联席会议制度，是推进决策协同的关键路径。落实“党委定方向、专家定方案、部门抓落实”，将关键创新议题纳入党委议事日程，形成政治把关与技术论证的双重保障。前期由党委对立项方向、预算结构与风险边界进行政治审议，明确优先级与约束条件；中期以党员干部示范带动为抓手，嵌入阶段评估、偏差预警与里程碑复盘，确保计划与执行一致；后期在成果转化环节统筹技术应用、社会责任与品牌影响，协调内部效益与外部影响，提升综合效应。建设“党建—科研—管理”一体化平台，统一数据口径、流程权限与文档版本，推动信息流与决策流互联互通。完善“重大事项请示报告 + 技术风险预警”联动程序，对路线变更、预算调整与节点延误设置黄红线阈值并启动专审通道。推行“书记—总工”联合会商与外部专家复评并轨，形成会后任务清单、责任到岗到人机制，建立“周清单、月复盘、季评估”的治理节奏，以政治与专业协同、程序与结果并重的方式提升决策的前瞻性、科学性与制度刚性。

（三）激励导向机制：构建科研人员党建型激励与保障体系

科研人员是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建立以党建为导向的激励与保障机制，有助于形成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坚持政治激励为主、绩效与精神激励协同，构建“三维并行”的长效体系：设置党员先锋岗、创新示范团队与党员攻关项目，把政治荣誉与关键技术突破、平台建设成效相挂钩，突出在难点任务中的牵引作用；完善绩效分配机制，对原创性成果、“卡脖子”问题攻关与高风险探索实施“基础绩点保底 + 节点加权”的复合激励，在贡献确认、周期匹配与成果认定上提高透明度；在岗位晋升、职称评审与人才引进中提高党建表现与团队贡献权重，使政治表现成为衡量科研价值的重要维度。建立容错纠错与激励性保护制度，对因创新失败但过程规范的科研干部给予再支持与复盘学习机会，降低前沿研究的不确定性顾虑。推行“党员导师—青年骨干”结对培养与跨部门轮岗计划，强化思想引领、能力协同与组织黏性。党组织应围绕科研人员身心健康、职业成长与家庭支持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思想关怀—制度激励—文化凝聚”的多维支撑格局，使团队在组织温度与制度信任中提升稳定性与创造力。

（四）评估反馈机制：建立党建引领的科技创新效能评估体系

科学评估是实现党建引领科技创新闭环管理的关键环节。应构建“党建引领—创新绩效—社会价值”三位一体的综合评估框架，从组织效能、创新效能与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开展系统测度。在组织效能维度，考察党建覆盖率、责任落实率、制度执行度与党组织参与科研决策比例，关注组织嵌入的深度与持续性；在创新效能维度，跟踪成果转化率、原创突破数量、专利质量与研发投入产出比，并补充过程性指标如协同度、风险应对能力与项目完成质量，体现能力建设与过程质量；在社会效益维度，结合节能降耗、行业带动与社会服务等指标，呈现科技创新的公共价值与社会影响。将评估结果与干部考核、资源配置、人才激励及预算调整相联动，形成“以评促改、以改提效”的正向循环。建立“年度评估 + 季度复盘 + 专项督导”三层体系，对重大偏差设置整改台账与跟踪审查，加强问题闭环与成效验证。依托信息化平台沉淀指标数据，形成横向可比较、纵向可追踪的动态数据库，完善标准化与透明化的评估生态，使党建效能与科技创新成果在制度闭环中持续提升与迭代优化。

五、结语

党建引领既体现国有企业的政治优势，也为优化创新体系提供了路径。本文围绕理论基础、现实问题与机制构建展开，提出组织嵌入、决策协同、激励导向、评估反馈四项机制，旨在推动党建与创新深度融合。研究表明，党建通过政治引领校准战略方向，通过组织协同提升创新运行效率，通过制度安排促进科技创新的常态化与规范化。面向当前发展阶段，国有企业应把党组织作用贯穿科研组织与项目管理全过程，推进政治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化；同时完善动态评估与成果反馈，形成“党建引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格局。通过机制化与制度化实施，党建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竞争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可复制的治理经验。

参考文献

[1] 杜诗画 . 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党建引领赋能科技创新的实践探索 [J]. 中外企业文化 ,2025(07):21-23.

[2] 丁令威 . 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16):41-43.

[3] 夏周祺 , 冯鼎元 , 马文博 , 等 . 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科技创新融合的实践研究 [J]. 中外企业文化 ,2025(04):138-140.

[4] 惠荷欣 . 以融入式党建引领推动国有科技型企业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以中国舰船研究设计中心某党总支为例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4(13):98-100.

[5] 吴长江 .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职责担当 [J]. 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2,24(01):25-29.

（作者系山东华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政工师）

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的三维路径探析

谢鹃霞

摘要：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离不开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力，二者协同发展既是强化青年学生价值引领、夯实理想信念根基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善高校育人体系、提升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关键举措。构建价值同向引领型协同模式、资源联动整合型协同模式和实践闭环赋能型协同模式，本文提出从学校、院系、班级三个层级构建协同发展三维路径，通过统筹顶层部署、整合育人资源、细化任务清单、强化过程督查、健全反馈机制等方式，推动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在目标、内容、载体、队伍上实现深度耦合，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保障，助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高校党团工作；思政教育；协同发展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高校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阵地，党团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的核心抓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并非相互割裂的独立模块，目标同向、功能互补、载体互通，构成有机整体，其协同发展直接关系育人质量与人才培养成效。部分高校在运行过程中，存在层级衔接断层、工作内容脱节、实践形式单一等问题，制约协同育人效能释放。立足高校育人实际，构建科学可行的三维协同路径，摆脱现实运行困境，推动二者从分散推进转向系统融合、从形式开展转向实效落地，对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水平、筑牢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根基意义重大。

一、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的重要性

（一）强化学生理想信念引领

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是强化青年学生理想信念引领、筑牢思想根基的核心路径。青年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塑造与信仰确立的关键阶段，单一理论灌输或零散的党团活动无法实现持久有效的价值引导。党的理论方针、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精神可融入党团建设全过程，系统化、常态化育人模式能将思政教育理论内涵转化为党团实践行动指引，帮助学生明晰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自觉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伟业，解决青年学生价值迷茫、信念弱化等问题，实现理想信念教育入脑入心与知行合一。

（二）提升党团组织凝聚力

党团组织是高校联系青年、服务青年、引领青年的重要载体，协同发展能有效提升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思政教育为党团组织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与价值导向，明确组织建设的政治方向与育人目标；党团活动则为思政教育提供实践载体，增强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二者推进可打破组织建设与思想教育的壁垒，通过规范化组织生活、针对性思想引导、多样化实践活动，能增强团员青年对党组织、团组织的政治认同与情感归属，激发学生参与党团工作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让党团组织真正成为凝聚青年、团结青年、引领青年的坚强堡垒，提升组织运行效能与育人影响力。需要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群体的思想引导作用，加强共青团组织的标准化管理，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实现这些方面的有机整合，推动党和团之间的协同合作，以此应对挑战并培养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新一代人才，全方位支持青年学子健康成长[2]。

（三）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育人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的根本任务和中心环节，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要围绕学生、

关照学生、服务学生，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立德”是教育方法和过程，“树人”是教育目的和效果[3]。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力，是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校园育人氛围的重要保障。校园文化是隐性育人的关键载体，正向育人氛围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思政教育理念融入党团文化建设、校园活动开展、学风校风塑造全过程，以党团组织为纽带传播主流价值观念，弘扬优良校风学风与时代精神，抵制不良思潮与文化的侵蚀，构建具有政治引领性、文化浸润性、实践导向性的校园生态。协同育人模式能凝聚全校育人力量，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良好格局，让正能量充盈校园空间，为学生成长成才提供优质环境支撑。

二、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模式

（一）价值同向引领型协同模式

价值同向引领型协同模式的核心是政治理念契合、育人目标统一，聚焦青年学生理想信念塑造的需求，构建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目标同源、内容同构、导向同质的耦合体系。立足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破党团建设侧重组织管理、思政教育侧重理论灌输的职能壁垒，把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精神等思政核心内容，嵌入党团组织生活、团员发展培养、党员教育管理全流程。思政课程教学内容与党团理论学习计划对接，构建“思政课堂主渠道 + 党团活动主阵地”的双轮驱动格局，避免价值引导碎片化、浅表化；党团组织的政治属性强化思政教育的意识形态引领力，规范“三会一课”、主题团日等制度，把抽象价值理念转化为具象思想引领实践。

（二）资源联动整合型协同模式

资源联动整合型协同模式，关键在于打破条块分割、优化资源配置，针对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资源分散、重复建设、利用低效的现实痛点，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资源共建共享共用机制。摒弃传统“党团管组织、思政管教学”的割裂式运行逻辑，推动育人主体、育人载体、育人内容三类核心资源融合。统筹思政课教师、党团干部、辅导员、专业骨干教师组建协同育人共同体，明确各方职责分工，建立常态化教研会商机制，破解育人力量分散、责任推诿难题；整合校史馆、红色研学基地、志愿服务平台、校园新媒体矩阵等阵地，将思政教育场景从课堂延伸至党团活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全场景。

（三）实践闭环赋能型协同模式

实践闭环赋能型协同模式，核心导向是知行合一、实效落地，紧扣青年学生认知规律与成长需求，构建“实践设计—过程实施—成效反馈—优化迭代”的党团思政协同实践体系，破解实践活动形式化、内容同质化、育人实效弱化等问题。坚持理论武装与实践锻炼相融合，将思政教育理论内涵转化为党团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引，以党团实践的沉浸式体验深化思政教育认知成效。立足专业特色与时代主题，设计红色研学、专业实践调研、社区志愿服务、基层挂职锻炼等活动，推动党团实践与专业教育、社会需求对接；强化党团组织对实践活动的全程主导，发挥党员团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感悟责任、锤炼品格。

三、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的三维路径

（一）学校层面

1. 统筹党团与思政具体活动安排

学校立足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统筹规划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活动体系，打破部门壁垒，实现活动安排统一部署与有序衔接。将思政教育核心内容纳入党团年度工作规划与活动计划，明确不同阶段协同育人主题与活动重点，避免内容重复或方向偏离。结合重要时间节点与重大主题教育，统筹设计理论学习、主题党日团日、实践研学、志愿服务等活动，推动党团活动与思政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有机融合，形成上下贯通、主题统一、载体互补的活动格局，确保育人工作围绕思政教育核心目标有序推进。

2. 整合校内思政相关资源

高校整合校内思政教育资源，构建党团与思政协同育人资源共享体系，打破资源分散、利用低效的现状。统筹整合思政理论课教师、党团干部、辅导员、专业教师等育人队伍，建立跨部门协同育人团队；整合校史馆、红色教育基地、志愿服务平台、新媒体宣传矩阵等育人载体，提供多元实践场景；整合理论学习资料、红色文化素材、典型案例等教育资源，搭建统一资源共享平台，实现资源互通共用。资源整合可降低协同育人成本，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二者深度融合提供坚实保障。

（二）院系层面

1. 结合专业特点设计党团思政小活动

院系立足自身专业特色与人才培养定位，设计贴合学生实际的小型化、特色化党团思政活动，避免活动同质化、形式化。将专业教育、职业素养培育与思政教育、党团建设相结合，围绕行业精神、工匠精神、家国情怀设计主题活动，如专业实践调研、红色主题科研实践、行业先进人物学习等，让思政教育融入专业学习全过程。依托专业优势开展志愿服务与社会实践活动，使党团活动兼具思想性、专业性与实践性，增强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实现专业育人与思想引领的有机统一。

2. 精准对接学生思想实际需求

院系建立常态化学生思想动态调研机制，精准把握不同年级、不同群体学生的思想困惑、价值需求与现实问题，提升协同工作针对性。通过谈心谈话、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方式，可及时掌握学生在理想信念、学业就业、心理健康、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问题，将思

想引导融入党团活动设计与思政教育内容。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专题学习与讨论交流，用贴近学生的语言与方式解疑释惑，让思想政治工作更具温度与实效，切实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与实际困难。

（三）班级层面

1. 开展小型党团思政学习分享活动

班级常态化开展轻量化、互动式党团思政学习分享活动，摒弃形式化集中念读模式，提升学习实效性。时政热点、红色故事、先进典型、理论要点等内容，可通过开展小组讨论、读书分享、主题演讲、心得交流等活动进行学习和讨论，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自主思考、积极表达。结合班级实际制订灵活学习计划，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小型学习活动，让思政学习融入日常，增强理论学习的吸引力与感染力，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深化思想认知，提升政治素养。

2. 发挥党员团员先锋示范作用

班级健全党员团员先锋示范机制，让优秀党员团员成为思想引领与行为示范的标杆。设立党员示范岗、团员责任区，引导党员团员在学风建设、志愿服务、日常管理中主动担当作为；组织党员团员与普通学生结对帮扶，在学习生活、思想成长上提供帮助；选树班级内先进典型，宣传优秀学生的事迹，以身边榜样带动全体学生向上向善，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4]。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能让党团引领转化为看得见的行动，增强思政教育的说服力与影响力。

四、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的策略

（一）学校层面细化协同工作具体任务清单

学校结合协同发展目标与三维路径要求，细化制定协同工作任务清单，实现工作内容项目化、推进步骤清晰化。任务清单明确各部门、各层级的具体工作事项、完成时限、责任主体与质量标准，涵盖资源整合、活动统筹、队伍建设、考核评价等全流程内容[5]。将宏观育人目标分解为可执行、可检查的具体任务，避免工作推进的随意性与模糊性，同时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动态调整优化任务内容，确保任务清单贴合工作实际，为协同工作精准落地提供清晰指引。

（二）院系层面加强党团思政工作日常督查

院系建立党团思政工作日常督查机制，强化过程管理与实效监督，杜绝工作流于形式。通过定期检查、随机抽查、工作汇报等方式，督查班级党团活动开展、思政内容融入、思想引领实效等情况，及时发现并整改工作中的问题；建立督查反馈台账，对落实不到位、成效不明显的环节督促限期整改；将督查结果与班级评优、干部考核挂钩，强化督查约束力。常态化督查能倒逼基层工作提质增效，保障各项协同举措落到实处。

（三）班级层面建立党团与思政工作沟通反馈渠道

班级搭建完整的党团与思政工作沟通反馈渠道，形成“执行—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固定每周开展 1 次小型沟通座谈会，党团小组长、班委牵头面向全体学生征集党团学习、思政教育的真实感受与改进方向，推动意见收集常态化、即时化。线上借助班级微信群、QQ 群和钉钉群开设“思政建言”专栏，支持学生匿名反馈学习困惑、活动形式短板、内容适配度等问题，党团骨干每日完成整理汇总，保障学生诉求及时收录、不出现积压。反馈问题专项台账同步建立，收集的意见按学习形式、活动内容、思想引导、服务需求完成分类梳理，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与完成时限逐一明确，实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每月面向班级学生公示反馈处理结果与整改成效，主动接受全体学生监督；每季度向上级院系递交书面反馈报告，同步报送学生思想动态、意见整改落实情况。

五、结语

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重要路径。当前高校协同推进中仍面临顶层落地不足、中间衔接不畅、基层执行虚化等困境，需立足学校、院系、班级三维层级，构建统筹有力、衔接顺畅、落地有效的协同体系。细化任务、强化督查、健全反馈机制，推动二者在目标、内容、载体、队伍上深度融合，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未来高校应持续深化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凝聚全员育人合力，以高质量党团工作与思政教育协同发展，助力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品德修为，培养更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 李博文，常笑笑，王业林，等. 大思政格局下高校“党团班一体化”协同工作机制研究——基于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调研与实践 [J]. 社会与公益，2025(16):80-82.

[2] 张二军，姜大为 . 新时代高校党团建设工作的创新意涵与路径优化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5,41(09):16-18.

[3] 许莉 . 高校“党团班”协同育人工作机制研究 [J]. 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2(06):71-76.

[4] 沈杰，张乃元 . “大思政”背景下高校学生党支部与团支部共建长效机制研究 [J]. 办公室业务，2022(20):30-33.

[5] 刘敏畅，王甲成 . 协同育人视角下高校党建工作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 [J].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9(01):105-11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专项课题“高校党团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的路径研究”（2023ZJY273）。

（作者单位：桂林学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广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维路径研究

潘宜烜

摘要：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唯一兼具沿海、沿边属性的自治区，承担着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稳边固疆、开放发展的特殊使命，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是新时代广西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调研法与案例分析法，系统阐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梳理广西党建赋能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的实践成效，剖析当前基层治理存在的党组织功能弱化、区域发展不均、群众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立足广西边疆民族地区区位特征与发展实际，构建“政治统领—产业驱动—文化浸润—社会协同”四维协同治理优化路径，为边疆多民族地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广西民族地区；治理创新

新时代背景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广西集“老、少、边、山、海”于一体，是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建设的核心示范区，也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阵地，兼具边疆治理、民族治理、乡村治理、开放治理多重属性，基层治理质量直接关系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创新路径，破解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痛点难点，对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理论基础与内在逻辑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内涵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时代国情、世情、民族情，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形成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深刻揭示了我国各民族长期交融共生、休戚与共的命运联结，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民族工作核心导向，核心要义聚焦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从本体维度看，该理论立足“多元一体”格局，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性、地域特色与发展特质，更强调各民族差异统一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大局；从价值维度看，以共同富裕、共同安全、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核心目标，凝聚各民族发展共识，汇聚民族复兴磅礴力量；从实践维度看，构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四维工作体系，精准化解民族领域矛盾问题，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与认同优势，为多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根本思想指引与价值遵循。

（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内在必然性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其理论基础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基层治理工作的开展，直接关系到国家各项政策的落地实施是否有效、社会矛盾是否成功协调、有限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分配等问题，因而必须持续推动基层治理方式与体制的创新，以此来确保基层治理可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对广西而言，党建引领是回应区域特殊矛盾的必然选择，广西集“老、少、边、山、海”于一体，地域特征鲜明，发展条件复杂，传统科层制治理模式往往难以穿透基层社会的细枝末节，难以有效回应各族群众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组织、群众基础优势，把分散的乡村、社区、边寨等紧紧网络起来，构建纵横贯通的治理网络，切实筑牢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组织根基。

（三）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助力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基层治理必须坚持

以民族团结进步为导向，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目的。对广西而言，这一理论具有尤为深刻的现实阐释力和实践指导意义。一方面，区内十二个世居民族交错而居、边境与内地梯度发展差异显著，“多元”文化在特定条件下极易受地缘、宗教、市场等因素影响而趋于复杂；另一方面，沿海又沿边的区位优势使得广西成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民族问题有外溢为国际议题的潜在风险。因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广西不仅是团结稳边、文化润边、凝聚人心的“软件工程”，更是统筹发展与安全、联通国内与国际的“战略支点”。在此背景下，必须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先进党员的带头作用，以党建为轴心，有效整合资源、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二、广西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成效

（一）思想铸魂：深化理论武装，夯实民族团结治理根基

广西深耕红色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将红色教育、民族文化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深度融合。依托百色起义、湘江战役、昆仑关战役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地方资源，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开展纪念与学习活动，不仅加深了各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贡献的认同，也强化了大家对国家历史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同时，积极推动“壮族三月三”“刘三姐”等特色民族文化创新性发展，通过节庆活动、文艺创作等形式，使思想引领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既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又在更大范围内提升了广西民族文化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此外，还通过组织编纂《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广西卷》，进一步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

（二）强基固本：优化组织体系，筑牢基层治理战斗堡垒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为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广西持续开展“五基三化”专项行动，着力推动基层党建，实现“五大提升”。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流动党员信息动态数据库和党员教育服务系统，对所有流动党员有效联系、精准管理，同时为其提供在线学习、参与组织生活会、反馈意见等渠道，切实破解流动党员教育管理难问题。同时，重点加强“两支队伍”建设，围绕乡镇书记、社区书记业务能力提升，持续开展交流会、定期举办培训班。此外，通过组建党员先锋队、党员攻坚队，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承诺制等，引导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履责，帮助各族群众解决生活难题，架好党心民心“连心桥”。

（三）作风提质：深化清廉建设，涵养风清气正治理生态

广西以“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社会清朗”为目标，定期开展作风整顿，倒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营造风清气正、崇廉拒腐的政治生态，大力助推“清廉广西”建设深化发展。同时，通过“担当作为好干部”评选、宣传广西勤廉榜样、“我为群众办实事”等活动，激励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倾听民意，了解群众所需所盼所急，着力解决办事难、办事慢等问题，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提升政府公信力。此外，将“清廉广西”纳入绩效考核，动态管理，定期通报，“能上能下”，持续优化干部队伍，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注入新动能。

（四）数字赋能：创新治理模式，构建智慧治理新格局

以数字化推动基层党建工作现代化，通过“线上+线下”群众自治模式，为群众参与治理、表达意见建议提供方便快捷的渠道，形成“群众参与、群众管理、群众受益”的治理新格局，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比如贵港市创新“党建+网格化+数字化”模式，同步开发“荷城红云”数字平台，整合17个部门数据，形成“居民吹哨、网格响应、部门报到”闭环，群众安全感排至广西前列。同时，建构数智云平台，实现村民“云自治”，开设“随手拍”功能，群众将问题随手拍，平台将问题分类，部门将问题及时解决，并以“随手拍”获取积分、兑换物品，有效激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

（五）从严监督：健全监管体系，筑牢基层廉洁防线

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多民族地区，加强纪律建设，强化基层监督尤为重要。通过廉情驿站、廉情监督员，加强对扶贫项目资金、惠民资金等重点领域的管理、巡查和监督，确保每一分钱、每一项政策都能实实在在惠及民生。此外，聚焦党员干部“八小时外”无人监督“自由地带”，建立“家庭助廉”机制，引导家属当好“八小时外”廉洁监督员。同时，还将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开设监督举报专线，对涉及党员干部作风和廉洁问题的信访举报件实行归口管理，有效筑牢党员干部“八小时外”廉洁自律“防火墙”，从根本上降低“被围猎”风险。

三、铸牢共同体意识的基层治理优化多维路径

（一）政治统领：建强党组织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核心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2]。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保障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基层得以落实。首先，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强化党委在同级组织中的核心作用，确保党的领导全面覆

盖。其次，加强党组织建设。一是注重干部队伍建设，“把懂不懂民族工作、会不会搞民族团结作为考察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3]，要始终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二是做好人才激励与关怀工作，对长期扎根基层、奋战在条件较为艰苦地区的一线干部，给予殷切关怀和必要、适当的生活补贴。三是必须狠抓思想建设，深入开展“四史”教育，并组织开展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专项培训，不断提高其理论素养，使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最后，还应持续探索党建新模式。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推进党员管理工作智能化与精细化，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产业驱动：深耕特色产业，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

在广西多民族地区，提升基层治理必定要优化经济环境，统筹各区、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因地制宜，加快产业振兴，实施兴边富民行动，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首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导作用，依托地方资源禀赋，扶持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科学规划并培育区域性优势产业集群，建立“党支部＋合作社＋企业＋农户”模式，稳步提升群众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持续改善民生，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此外，“培训是少数民族走出民族地区、走进城市的先决条件，而职业技能培训可以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到更高技术和能力含量的劳动力市场竞聘中”[4]，应重视人才培养与技能提升，为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基层党组织联合人社部门、企业、职业院校，根据产业发展所需技能和群众就业意愿，开展“订单式”“定岗式”职业技能培训，对少数民族劳动力、留守妇女等群体特别关注，有效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同时，在经济活动中有意识地为各民族群众创造共劳、共管、共营的环境与机会，通过经济互动，自然促进习俗互鉴、情感互信，使共同体意识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生根发芽。

（三）文化浸润：创新宣教机制，共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将其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搞好社会宣传教育。”[5] 加强宣传教育，一方面应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将中华民族时代精神、主流价值观与墙体彩绘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相融合；另一方面，应该创新宣传教育的形式与载体。借助互联网及新媒体技术，构建“线上＋线下”联动教育机制。线上可开发专门网站、App 和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有关民族团结进步的图文、音频、视频等学习资源，线下可组织“民族团结”专题宣讲、“双语党课”、手工艺比赛、诗歌朗诵等活动，向公众普及党的政策方针和民族理论知识，增进“五个认同”。此外，应完善宣传教育领导机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新工作格局[6]。同时，持续推进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民族工作的最新要义入课堂、入生活、入脑入心，不断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四）社会协同：凝聚多元力量，构建民族互嵌治理格局

广西作为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前沿，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价值引领、统筹整合中的核心作用，激发各类治理主体的主人翁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让其从被动的管理对象转变为积极的治理参与者、共同体建设者，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中不断深化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社会治理基础。首先，推动基层党组织、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以及各族代表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治理，定期协商公共事务、调解矛盾纠纷、策划交融活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治理新格局。此外，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使民族互动更广泛、更便捷、更持续。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集政策宣传、事务办理、文化交流、民意收集于一体的智慧治理平台，如开设“民族团结之家”“智慧民族社区”等虚拟社区，鼓励各族群众进行在线互动与合作。同时，在社区规划与改造中，有意识打破民族聚居的物理隔阂，推行混居模式，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广场等，常态化开展“邻里互助节”“多语言兴趣班”等活动，使各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互助合作、交往交融。

四、结论

广西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立足沿海沿边、多民族聚居的独特区位，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形成了思想铸魂、强基固本、数字赋能、清廉提质的治理体系，有效推动了民族团结、基层稳定、民生改善与区域发展。实践证明，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以党建引领多维治理创新，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难题、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有效路径。通过政治统领把方向、产业驱动固根基、文化浸润聚人心、社会协同聚合力，能够有效地将“边缘劣势”转化为“前沿优势”，把文化多样性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未来，广西应在干部专业化、政务数字化、治理协同化等方面不断创新，推动各民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参考文献

[1] 张瑞兰 . 呼和浩特市多民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研究 [D]. 西宁 : 青海师范大学 ,2024.

[2] 习近平在广西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下转 10 页）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现实成就、优化路径与前景展望

——基于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与国家治理理论的视角

尉端煦

摘要：党的二十大以来，党组织对基层工作的统领作用得到高度重视，党委领导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模式正逐步完善。各地在上级党委领导下探索符合实情的治理路径，强化党支部在社区建设中的引领功能。本文融合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和国家治理理论，结合基层党组织的实践，探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现实成效。截至目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已呈现出引领作用发挥日益充分、主体协同日趋紧密、工作机制逐步完善等效能。针对上述优势，本文进一步提出优化路径：一是完善党支部的组织建设；二是着力提升服务效能；三是健全党建引领的组织架构；四是稳固长效治理机制。

关键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基层治理

近年来，党组织对基层工作的统领作用得到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置于突出位置，从根本上确立了党建引领多元共治的战略方向[2]。2025 年 9 月 23 日，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座谈会在天津召开，强调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部署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助力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3]。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各地纷纷探索符合国情的社区治理模式，逐步完善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形态。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街道党组织通过打造“15 分钟养老服务圈”，强化党建引领机制，引入资源扩充养老联盟；天津滨海新区党组织发挥核心引领作用，联合政府部门、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企业、居民志愿者等多种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等。[4]先进地区的经验对其他地区开展实践具有启发意义，推动社区治理朝着多元化、协同性的方向发展。

一、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现实成就及其成因探究

当前社区治理应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确保各项工作锚定中央指示精神，激发社会发展的内在活力。各类治理困境与阻碍得以破解，既取得了党组织自身建设深化、角色定位日趋清晰等显著成就，也彰显了社区居民及各类组织参与积极性持续增强的突出优势。

（一）党建引领作用发挥日益充分

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明确指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以提升组织力为核心”，注重通过制度设计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发展。目前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内实现了广泛的组织覆盖，多数情况下党组织已经开展有效的治理实践，其工作重心不仅在传统的党

（上接 09 页）

西篇章 [EB/OL].(2023-12-15)[2026-01-30].https://www.cac.gov.cn/2023-12/15/c_1704305103922693.htm.

[3] 习近平 .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09-28(02).

[4] 江曼琦 , 翁羽 . 散杂居城市少数民族就业竞争力与对策研究 [J]. 城市发展研究 ,2009,16(02):41-45.

[5]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1-08-29(01).

[6] 刘玉倩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党建引领广西基层治理创新研究 [D]. 南宁 : 广西民族大学 ,202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2025 年度梧州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部长点题”立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党建引领广西基层治理创新研究”(WZTZKT202561)。

（作者单位：梧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务工作，而且探索党建工作融入业务工作的有效机制，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有效契合。部分社区积极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党建工作对业务工作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同时党组织与其他主体的目标与行动逐渐消弭分歧，有效克服了基层工作进程的阻碍，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在凝聚人心、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等方面的价值。

（二）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得到加强

马克思主义强调，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肩负着引领无产阶级开展实践的重任。党组织是基层社会的战斗堡垒，其人才队伍的建设直接关系到政策在基层能否落实。当前基层党组织逐步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反映了党的组织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关键地位，影响党的政策在基层的执行力和落实效果。党员队伍普遍存在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知识结构多元化等优势，熟悉信息技术的专业人才逐步涌入队伍，现有人员的技能水平日益适应现实需要，推动党支部的信息化建设，为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面向党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持续强化，其内容设计更具前瞻性与创新性，为高效破解复杂治理难题筑牢根基。

（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逐渐紧密

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务必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领导机制，加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目前党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以及引导社会组织协同发力等方面有所提升。一方面，完善规章制度，界定基层党组织与其他组织的职责、权利和义务，明确各主体在治理中的合作方式和运行流程。同时，基层党组织加大在政策解读、资金支持、能力建设等方面对社会组织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和社会组织主要目标一致，应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保障彼此之间的有效沟通，克服资源分散等行动瓶颈。同时，民主参与渠道趋于多样化，推动党的决策方案和群众的真实诉求精准对接。持续增强党组织对群众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逐步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稳步提升群众自治意识和自治能力，实现组织达到预期治理效果。

（四）党建引领工作机制得到健全

列宁在《怎么办？》中指出，党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策略，不能固守陈旧观念。毛泽东也强调，党要“实事求是”，在治理过程中要充分发动群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明确要求治理理念、方法和手段的持续创新。目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涉及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参与主体的多样性、服务能力和制度机制等多个方面，多元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部分单位开始突破以传统的政府主导式为主的治理方式，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一是强化资源整合的理念。党组织认识到社区内外部资源的潜在价值，全面挖掘并盘活社区内部资源，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等外部资源。同时，提高有效的协调技巧和资源调配能力，善于运用市场机制、社会力量等多种手段打破资源分散的局面。二是基层党组织在信息化建设等新兴领域逐步完善。尽管社区建设的资金紧张，投入信息化建设的预算有所增加，得以购买现代信息设备、专业开发软件、信息维护系统等先进资源，提高了基层党建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与优化路径

通过对党建引领社区治理问题的深入剖析，借鉴先进地区的典型经验，融合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和国家治理理论，结合本辖区的实际情况和重点工作，为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可行性建议。

（一）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表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通过集中统一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也强调，基层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其建设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务必在实际工作中持续赋能基层党组织建设。

一是明确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制定社区党组织的职责清单，以法律法规和党内规章为依据，界定党组织在社区重大事项决策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规范与社区其他组织的行动模式。基层单位定期向党组织汇报工作的进展情况，涉及百姓利益的重要事项须经党组织征求意见，涉及社区的重大建设项目、资金使用等重要事务须由党组织依程序作出决策，保证党组织始终掌握对社区事务的领导权。

二是创新党组织的活动形式。结合社区的实际情况和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党组织设计、组织并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以期提升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的质效。在理论学习方面，采用互动式、讨论式的授课方式，从特色主题党日活动中汲取精神力量，激发党员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党组织的党性修养和坚韧品质。在实践行动方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持续提高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发挥党员干部在社区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鼓励更多周边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营造“党群连心促发展”的浓厚氛围，增强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二）提高基层党组织服务效能

毛泽东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强调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在社区治理中需充分发动群众，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

首先，提升党员的素质能力。一是加强党组织的人才队伍建设。吸纳各类优秀人才加入党的组织，壮大基层党员队伍力量。挑选责任心强、踏实肯干的党

员干部担任关键岗位，发挥“头雁”作用，带动其他党员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党支部的组织效能。二是加大对党员的教育培训力度。定期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业务知识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服务意识和治理意识。增强党性教育和服务意识，引领治理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其次，推动资源的整合共享。一是充分利用社区的内部资源。整合社区内的人、物、财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资源。开发社区内部的闲置资源，提高资源与居民需求的匹配度，为居民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便利，推动驻区单位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共驻共建、互联互动，构建共建共享的党建工作格局。深入挖掘社区资源，合理调配使用，建立涵盖闲置房屋、居民特长等社区资源台账。二是积极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慈善机构等沟通合作，通过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应用，精准配置治理资源，建立社区需求数据库，确保公共服务质量和供需匹配效率。

（三）健全党建引领的组织架构

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理论强调国家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也重视社会力量的参与。党组织在社会协同治理的框架下，始终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确保基层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共赢，以更好地整合社会资源，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

加强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协同治理体系，推进区域化网格党建，延伸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链条，实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全覆盖，提供互联互通的组织保障。明确各主体在基层治理的不同职责，党组织负责统筹协调、把握方向，居委会和业委会承担日常服务执行，为社会组织提供专业服务等。同时，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商讨社区重大事项，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构建“党建 + 社会组织”“党建 + 志愿服务”“党建 + 网格化管理”等多元化模式，强化横向联动和多元主体参与，推进社区与驻区单位党组织联结。

增强民众参与的主动意识。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提高党员干部对群众工作的认知和理解，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坚持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巩固和充实基层治理力量。完善民主协商议事制度和居民议事平台，健全居民议事会等自治组织，组织开展民意调查、座谈会等活动，实现“民事民议民决”的工作模式，激发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及时掌握群众的需求和关切，确保社区治理的各项措施都能惠及人民群众。

（四）完善党建工作的治理机制

列宁指出，党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创新理论和工作方法。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理论也强调，国家能力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而国家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治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健全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服务能力。

巩固党建引领的制度保障。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完善基层党支部的资源匹配制度，确保能够更好地履行服务和管理职能，增强基层单位的治理力量。探索建立社区事项准入制度，健全为基层减负的长效机制，合理分配和精简各部门的行政任务，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服务群众和社区治理中，提高服务效率和工作实效。

推进党建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在党建管理层面，依托在线学习平台，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新媒体手段开展线上党课、微视频学习、网络知识竞赛等活动，定期推送党的理论知识、时事热点等内容，提高理论学习的便捷性和灵活性。借助先进技术举办“数字党建”主题活动，为党员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打造沉浸式的党建体验。在社区治理层面，完善社区治理的信息系统，整合社区人口、房屋、环境、治安等各类信息，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和动态更新，打造一体化社区治理信息平台，实现党务、居务、财务公开[5]。

三、总结

基层是党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党建引领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驱动力，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统领作用，确保基层单位遵循正确方向统筹治理。各地逐步健全党的组织体系，确保党的主张传达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党的政策惠及每一位群众。

未来，我国将深入推进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基层党支部持续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统筹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密切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利用数据驱动科学决策，实现社区服务向精准化、精细化发展，着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提升社区治理的质量和效能。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 [J]. 党的建设 ,2022(11):46-49.

[2] 高翔 . 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J]. 求是 ,2025(24):1-9.

[3] 中社部信息宣传中心 .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座谈会在天津召开 [EB/OL].(2025-09-23)[2026-01-13].https://www.zyshgzb.gov.cn/n1/2025/0923/c459504-40570358.html.

[4] 王浦劬 , 杨茂荣 . 构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社区治理共同体研究 : 基于天津滨海新区社区治理的实践 [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5] 吴传毅 . 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 [J]. 新湘评论 ,2024(10):15-16.

（作者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新时代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融合路径探析

张　静

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的深度融合，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探讨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融合的重要意义；其次阐述融合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政治引领与服务群众相统一、组织嵌入与机制创新相结合、因地制宜与整体推进相协调；最后系统提出推进融合的具体路径，包括健全组织体系以夯实融合基础、完善工作机制以畅通融合渠道、推动资源下沉以强化融合支撑、培育治理文化以涵养融合生态等，以期为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基层工作；融合路径；治理现代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其功能日益多元、任务日趋繁重，面对居民需求的多样化、利益诉求的复杂化以及治理资源的碎片化等现实问题，传统社区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1]。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党中央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突出了以党建为统领的基层治理，促进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新时代，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的深度结合，是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需要，也是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和回应群众期盼的重要途径。

一、新时代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融合的意义

（一）强化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

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表现，把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嵌入到社区治理系统中，可以保证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

社区党组织在统筹协调各方力量、整合治理资源、制定公共事务决策中发挥核心作用，有效防止治理碎片化和方向偏移，这种融合巩固了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根基，也使党的领导更加具体化、制度化、常态化。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下，只有借助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政治引领，才能确保基层治理不偏离党的宗旨和国家治理目标，真正实现党领导一切在基层落地见效。

（二）提升社区治理的整体效能

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的融合可以打破条块分割、资源分散、职责不清等治理壁垒，推动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治理机制，党组织可以借助统筹调度、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能够增强社区在公共服务、矛盾化解、应急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通过党建引领，实现了治理主体间的信息互通和行动的协同，提高了反应的速率和执行的效率。这一以党组织为核心、多方参与的治理架构，增强了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促使治理模式由被动反应转向主动服务，由粗放管理转向精细治理，使社区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程度得到充分提高。

（三）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认同感

把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相结合，从根本上讲，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一种实践方式，党组织通过深入群众、服务群众、组织群众，把党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转变为解决民生问题、回应群众诉求的具体行动，从而让基层治理更接近居民的真实需要，有效地提高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和满意度[2]。

在社区事务的参与中，群众会有被尊重、被倾听、被支持的感觉，这让他们对基层党组织的信赖和对社区的归属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长远来看，这样一种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治理实践，使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了提高，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的感情和

价值认同。

二、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融合的原则

（一）坚持政治引领与服务群众相统一

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融合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基层治理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开展，党组织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根本任务，同时，融合工作不能脱离群众实际需求，必须将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治引领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要借助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来体现党的宗旨。

只有把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有机统一起来，既讲政治原则又重民生实效，才能避免“重形式轻内容”“重部署轻落实”的问题，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使党的领导在基层既有高度又有温度。

（二）坚持组织嵌入与机制创新相结合

推动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深度融合，不能仅满足于组织形式上的覆盖，更要注重功能发挥和制度保障，党组织应当在社区治理体系中实现有效嵌入，不只要建组织、挂牌子，更要赋权赋能、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必须同步推进机制创新，建立健全议事决策、资源统筹、协同联动、考核评价等制度安排，使党组织能够实质性参与并主导社区治理全过程。

组织嵌入是基础，机制创新是保障，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借助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才能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的问题，确保党组织在资源整合、矛盾调处、项目推进等关键环节中真正成为主心骨和推动力量，实现从物理叠加到化学融合的转变[3]。

（三）坚持因地制宜与整体推进相协调

由于城乡社区在人口结构、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要求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融合的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基层的实际情况，避免简单套用统一模式，在遵守中央统一部署的基础上，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融合方式，充分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

融合过程中，要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推进，防止各自为政、碎片化发展，上级党委要强化统筹领导，制定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政策框架，推动经验互鉴、标准衔接和资源共享。

只有在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的基础上，才能激发地方的活力，维护制度的统一，体现区域的特色，形成整体的合力，最终建立起结构合理、运行高效、可持续发展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格局。

三、新时代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融合路径

（一）健全组织体系，夯实融合基础

健全组织体系是实现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深度融合的根本前提和组织保障，各级党委应当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着力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覆盖全面的社区组织网络，确保党的组织体系延伸到基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4]。

社区党组织要切实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统筹协调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驻区单位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形成以党组织为轴心、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在此基础上，推动党组织向小区、楼栋、商圈、新业态群体等治理末梢有效覆盖，消除组织盲区，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社区党组织要按照社区的人口规模、治理任务和发展需要，对党组织的设置进行科学优化，对基层党组织的结构进行适当调整，提高党组织的适应性、灵活性和战斗力，对社区“两委”班子进行优选和配备，突出政治素质高、群众基础好、治理能力强的干部，使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同时，也要强化区域化党建机制的建设，通过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共建共治平台等手段，将辖区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整合，促进组织共建、活动共联、资源共享。在组织体系的构建上，不仅要注意形式上的全面覆盖，更要重视功能的真正发挥，避免“有组织却没有作用”“有结构却没有运行”的空转。

唯有不断织密建强基层组织体系，才能为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的深度融合提供坚强组织支撑，让党的领导在基层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而促进社区治理体系更加高效、有序、稳固地运行。

（二）完善工作机制，畅通融合渠道

完善工作机制是推动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融合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治理资源高效整合、治理责任有效落实的关键，各级党组织要结合社区治理的具体情况，构建一套权责清晰、运行规范、协同高效的制度，确保党建工作与社区事务在机制上无缝衔接，在流程上顺畅运行。

各级党组织要完善以党建为导向的议事协商机制，明确社区党组织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中的领导作用，畅通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制度化渠道，让群众的诉求能够有序地表达。各级党组织要健全部门之间的联动和资源下沉机制，推动职能部门、执法力量、服务项目向社区集中，构建“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党员响应”的快速响应机制，形成上下贯通的工作格局[5]。

各级党组织应强化任务统筹与责任闭环机制，把党建工作与社区民生服务、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安全防控等重点工作一体部署、同步推进、联合考核，避免党建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各级党组织还应

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与反馈机制，依托信息化的手段打通数据之间的壁垒，实现党组织、居委会、物业、居民等多方主体之间的信息互通与行动协同。

在机制构建的过程中，要注意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防止机制空转、流于形式，也要防止过分行政化，弱化群众自治的活力。通过对制度设计的不断优化，对运行规则进行细化，加强执行监督，把党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不断地转化为基层治理的效能。

（三）推动资源下沉，强化融合支撑

推进资源下沉，是推进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深度结合的关键，同时也是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将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治理资源进行整合，有计划、有重点地向社区一线倾斜，为基层党组织更好地开展工作提供坚实的保障。

在人力资源上，应健全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服务机制，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在此过程中，要强化社区工作者的队伍建设，通过培训、激励和畅通职业发展通道等手段，提高他们的专业化和综合服务能力；在财政资源上，要增加对社区党建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保证基层有钱办事，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在物质资源上，要推进阵地资源的整合，完善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便民服务站点等功能布局，打造一个集党建、治理、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各级党委和政府还应该鼓励驻区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共建中，通过结对帮扶、项目认领、志愿服务等手段，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科技资源的下沉和赋能，推进智慧党建和智慧社区的互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高信息收集、需求响应和精准服务的能力。

只有构建起上下联动、多元协同、持续稳定的资源保障体系，才能为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的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有能力、有资源、有手段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凝聚群众，从而夯实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根基。

（四）培育治理文化，涵养融合生态

培育积极健康的基层治理文化，是推动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深度融合的内在要求和长远支撑，党组织应当主动发挥价值引领和精神凝聚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文化感召力和治理软实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社区生态。

党组织要强化思想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区日常宣传和居民教育之中，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社会观和治理观，增强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应注重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群众路线，倡导“党员带头、人人参与”的治理理念，激发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公共责任感，推动形成守望相助、邻里和睦、文明有序的社区风尚。

党组织要注重营造开放包容、平等协商的议事文化，让居民在党组织的指导下，理性地表达诉求，主动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把民主协商、依法办事、规则意识作为社区管理的根本标准。加强社区工作者和党员骨干的能力和作风的锻炼，提高他们的沟通协调、情感疏导和组织动员的能力，让他们在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展现出良好的形象，传递组织的温度，以此来提高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感。

只有在社区内部形成以党建为纽带、以信任为基础、以合作为常态的文化生态，才能为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提供深厚土壤和持久动力，真正实现治理有效、社会和谐、民心凝聚的基层善治目标。

四、结语

新时代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的深度融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这一融合关乎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牢固，也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刻认识党建引领与社区基层工作深度融合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基本原则，系统构建实践路径，才能真正实现党建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今后，应持续在组织建设、机制创新、资源保障和文化培育等方面发力，推动党建引领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不断开创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根基。

参考文献

[1] 李敏，陆兵，倪羌莉，等. 新时代党建引领提升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水平路径研究 [J]. 安徽农业科学，2023,51(10):211-213.

[2] 杨柳林 .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路径探析 [J]. 现代商贸工业，2024,45(02):23-25.

[3] 陈菊红 .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优化路径研究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文摘版）社会科学，2024(12):60-63.

[4] 刘东文 . 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深圳下沙社区下沙模式为例 [D]. 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23.

[5] 蔡莹 . 新时代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及其实践路径研究 [J]. 社会与公益，2025(14):29-31.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南山湖社区）

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区治理模式构建研究
——基于“三全育人”理念的多元路径与实践创新

常　荣　邓思濛　李　丽　刘任凤

摘要：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大学生社区作为新时代高校立德树人、浸润育人的核心场域，是落实三全育人体系、推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以党建为核心引领，能够有效统筹校内校外育人资源，理顺治理权责、补齐基层育人短板、提升学生社区综合治理效能，全方位赋能大学生成长成才。本文立足高校治理现代化视角，系统梳理高校党建与大学生社区治理的内在关联、现实困境与融合逻辑，构建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区治理的理论框架，创新适配“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要求的多元治理模式与实践路径，并建立闭环式治理成效评估体系。研究表明，深度推进党建赋能学生社区治理，能够有效破解育人碎片化、管理粗放化、服务被动化难题，加速推进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与高质量育人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三全育人；治理模式；实践创新

一、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与社区治理的融合逻辑

（一）时代诉求下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社区治理转型

在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社区作为“三全育人”的重要载体，其治理效能直接影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1]。当前，随着“00后”成为大学生主体，社区治理面临价值引领弱化、服务供给碎片化、数字治理滞后等新挑战。《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教育部〔2020〕5号）明确提出要“推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了政策遵循[2]。本研究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背景，其理论价值在于：①突破传统物业管理范式，构建“政治—教育—服务”三维治理模型[3]；②拓展“枫桥经验”在高校场域的应用场景。在实践层面，通过解构“高校+社区+社工”联动机制[4]，可为破解民办高校治理困境[5]、提升学生主体性[6]提供可操作的路径方案。

（二）党建引领下社区治理的国内外范式比较研究

国外研究呈现重技术、重主体、轻党建的特征：在技术应用方面，新加坡MyHome平台的智慧治理模式证实数字化可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在主体参与方面，美国ACPA提出的“学习型社区”理论强调学生自治组织作用。但这些研究普遍忽视政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与我国党管高校原则存在本质差异。国内虽已形成三大研究脉络——以三社联动为代表的协同共治、以政治功能强化为特征的党建嵌入、以“三自”教育为内核的主体培育，但仍存在明显短板：①政策执行层面，“一站式”社区建设存在重硬件轻软件倾向；②理论建构层面，集中于公办院校，对民办高校“党建+治理”特殊性的探讨不充分；③方法论层面，现有研究多采用单案例研究，缺乏对比研究设计。这种研究现状迫切需要在党建引领下，构建兼具政策适配性和院校差异性的治理理论框架。

二、党建引领与大学生社区治理的理论耦合机制

（一）党建引领在社区治理中的定向导航作用

党建引领是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引领、组织凝聚、统筹协调的核心功能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基层治理提供方向指引、组织保障与动力支撑的治理逻辑。在大学生社区治理体系中，党建引领发挥着定向导航、凝心聚力、固本强基的关键作用，能够牢牢把握社区育人的正确政治方向，统筹整合校内育人资源、校外社会资源，破解治理碎片化、权责模糊化、育人形式化问题，推动学生社区治理朝着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育人化方向有序推进。

（二）大学生社区治理的特殊性与时代需求

大学生社区具有人员高度密集、思想活跃、需求多样化等特点。大学生在社区中不仅需要基础的生活保障，还需要思想引导、文化熏陶、心理辅导等多元化服务。新时代大学生社区治理不再局限于传统后勤管理与秩序维护，而是要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学生成长成才为核心，构建全方位覆盖、多层次联动、

精准化供给、常态化育人的综合服务治理体系。

（三）党建引领与大学生社区治理的契合点

党建引领与大学生社区治理在目标、价值取向和功能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二者皆以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成才为目标，均着重强调以人为本、服务优先、育人为本。党建引领可为社区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和思想动力，而社区治理则为党建工作的开展搭建了实践平台。

三、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区治理的理论框架构建

构建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是推进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立足新时代高校治理现代化需求，从目标定位、遵循原则和内容要素三个维度，探索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多方协同的社区治理理论体系，旨在为高校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和育人目标达成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一）价值目标

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的目标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多方参与且协同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与水平，推动学生全面发展、成长成才，营造安全、稳定、和谐、文明的社区环境。

（二）遵循原则

构建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的理论框架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区治理的正确方向；二是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学生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三是坚持协同共治，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四是坚持创新发展，不断探索适合高校特点的社区治理模式和方法。

（三）理论框架内容

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的理论框架包括党建引领、组织保障、服务供给、文化育人、协同育人等要素（见图 1）。党建引领是核心，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领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组织保障是基础，建立健全社区治理的组织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分工，为社区治理提供组织保障。服务供给是关键，以满足学生需求为导向，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服务。文化育人是灵魂，通过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发挥文化的育人功能。协同育人是途径，整合学校、社会、家庭等各方资源，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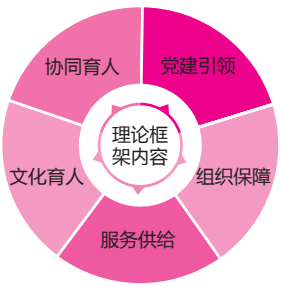


图 1 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的理论框架图

可见，理论框架突出政治引领、强化系统思维、注重育人实效，对推动高校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四、党建引领下的大学生社区治理模式探索

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整合服务资源、强化组织协同、深化文化浸润，构建“一站式”服务、协同化治理、文化型育人的复合型治理体系，能够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实现服务供给精准化、治理过程民主化、育人效果长效化的目标，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保障。

（一）“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模式

借鉴国外高校的专业化服务模式，并结合国内高校实际情况，构建“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模式。以“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为契机，整合学生事务管理、生活服务、文化活动等功能，为学生提供便捷且高效的服务。例如，设立学生社区服务中心，集中办理学生的各类事务；建立学生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

（二）党建引领的协同治理模式

强化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治理协同机制，加强学校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形成工作合力。例如，建立社区治理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社区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开展党组织与社区组织的共建活动，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三）文化育人导向的社区治理模式

挖掘高校文化资源，将文化育人融入社区治理。打造具有高校特色的社区文化品牌，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例如，举办文化讲座、艺术展览、读书分享会等活动，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加强社区环境文化建设，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的社区环境。

党建引领下的大学生社区治理模式创新，需要坚持服务导向、协同共治、文化浸润三大原则。通过构建多元融合的治理体系，实现组织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打造兼具服务温度、管理力度和文化厚度的现代化学生社区，最终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良好格局，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

五、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构建科学有效的实践路径是推进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的关键环节，从组织建设、制度建设、活动开展和资源整合四个维度，系统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旨在通过强化组织保障、完善制度规范、丰富活动载体和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和育人质量。

（一）强化党建引领，夯实基层组织根基

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社区党组织负责

人，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工作制度，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社区党员队伍建设，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党员在社区治理中亮身份、作表率。建立党员联系学生宿舍制度，实施党员积分管理，将党员参与社区服务情况纳入党员考核评价体系，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二）完善制度体系，健全闭环治理机制

完善三大制度支柱，一是完善基础管理制度体系，制定涵盖安全管理、文化建设、公共服务等全方位的社区治理规范；二是建立动态评价机制，建立包含学生满意度测评、第三方评估、绩效考核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三是闭环改进机制，通过定期召开学生议事会、建立线上反馈平台等方式，确保学生诉求及时响应、服务持续优化。同时强化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把考核结果与资源配置挂钩，切实提升制度执行的实效性。

（三）创新活动载体，激发社区育人活力

构建“三维一体”的社区活动体系，在思想引领维度，开展“智启灯塔”“榜样人物大讲堂”“讲好天府故事”等品牌活动，融入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浸润维度，打造“天府科技文化节”“非遗＋科技”等特色项目，培育积极向上的社区文化，让学生沉浸式体验文化；在实践赋能维度，实施“迷彩青春”“智学工坊”等辅导员工作室项目，提供学生全面发展平台，精准对接活动内容与学生成长需求，提升社区活动的参与度和育人实效。

（四）聚合多元资源，构建协同育人格局

统筹整合学校、社会、家庭等各方资源，为社区治理提供支持。一是加强与教务、学工、后勤等多部门联席议事制度，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服务联动。二是积极引入社会资源，如企业、社会组织等共建产学研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职业发展、创新创业等优质资源。三是强化家校联动，创新“家长开放日”“云端家访”等沟通形式，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家校协同育人平台。通过多维度的协同推进，构建起党组织领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为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六、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的效果评估

科学有效地评估是检验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工作成效的重要手段，从指标体系构建、评估方法选择、结果应用三个维度，系统探讨如何建立全过程、多维度的评估机制，为持续优化社区治理提供科学依据，确保党建引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一）多维构建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是客观衡量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效果的关键，具体包含五个核心维度的评估框架：（1）组织建设维度，重点考察党组织覆盖率（%）、党员参与度（人次/月）、党建活动开展频率（次/学期）等量化指标；（2）服务供给维度，设置服务项目多样性指数、服务需求匹配度、应急响应时效性等质量指标；（3）文化育人维度，引入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度等测评指标；（4）协同育人维度，涵盖家校互动频率、社会资源引入量等合作指标；（5）主体反馈维度，通过满意度问卷（1—5级量表）、投诉处理及时率等反映治理成效。各维度指标设置具体观测点和量化标准，便于客观评估结果。

（二）综合应用多元评估方法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估方法，全面、客观地评估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的效果。在定性评估方面，采用分层抽样访谈学生代表、参与式观察社区活动、文本分析学生提案等多维方法获取深度数据；在定量评估方面，通过建立社区治理数据库平台采集服务响应时效、设施使用频率等关键指标，并运用Likert 5点量表测量服务满意度等主观评价。

（三）强化评估结果转化应用

建立“评估—反馈—整改—提升”的闭环优化机制，切实发挥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优作用。一是融合量化数据与质性研判结果，形成包含优势总结、短板剖析、整改建议的专项诊断报告；二是建立双向反馈渠道，及时向治理主体、育人部门、师生群体同步评估结果；三是实施差异化精准提升策略，对治理成效突出的阵地予以典型推广、资源倾斜，对存在短板的领域开展靶向整改、精准帮扶；四是将评估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评优评先、经费分配等核心依据，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治理优化机制。

七、结语

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治理是践行“三全育人”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党建引领大学生社区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能够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与育人引领作用，有效整合多方育人资源、优化治理结构、补齐育人短板、激活育人活力，实现社区管理、精准服务、文化浸润、思想引领、实践育人的深度融合。通过搭建系统化理论框架、创新多元治理模式、完善实操实践路径、建立闭环评估机制，可有效破解传统社区治理育人弱化、协同不足、效能不高的难题，持续打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沉浸式育人阵地，为新时代高校高质量人才培养、高等教育综合治理改革、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参考文献

[1]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EB/OL].(2017-12-05)[2026-02-09].http://www.moe.edu.cn/srcsite/A12/s7060/201712/t20171206_320698.html.

[2] 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构 （下转19页）

新时代电力建设企业党建品牌建设的价值转化研究

徐　浩　郝瑾阳

摘要：党建品牌建设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载体，具备清晰的实践价值属性。本文首先阐释电力建设企业党建品牌建设包含的生产经营赋能、企业文化引领两类核心价值内涵，其次识别主体协同、场景适配、传导路径三类制约价值转化效率的核心影响要素，最后从强化主体协同、拓展场景覆盖、完善闭环管理三个维度提出具体的价值转化落地路径。以期为电力建设企业梳理党建品牌建设的完整逻辑，为破解党建业务脱节难题、释放党建品牌实践价值提供可参照的实操框架。

关键词：电力建设企业；党建品牌；价值转化；党建业务融合

“十五五”时期，是电力行业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时期，需要抓党建、抓党建品牌建设[1]。《“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2]。电力建设行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性产业，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到全社会用电保障的稳定程度。本文对党建品牌的价值内涵、转化影响要素、落地路径展开系统性研究，旨在为电力建设企业梳理党建品牌建设的完整逻辑框架，破解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现实堵点，为行业同类工作的开展提供清晰的思路参照。

一、新时代电力建设企业党建品牌建设的价值内涵阐释

（一）生产经营赋能价值

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党建品牌创建已经成为强化党的领导、优化企业治理的重要抓手[3]。党建品牌建设能够匹配电力建设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诉求，为各核心生产环节的有序运转提供相应支撑。第一，党建品牌可引导一线建设人员主动落实岗位职责，跟进各施工环节的进度要求，涉及跨部门协同的事项也能得到更快响应，及时协调解决不同工序衔接时出现的矛盾问题，减少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卡点，保障项目按约定节点顺利交付。第二，党建品牌可带动全员树立节约意识，在材料采购、设备使用、废料处理等环节主动践行降本要求，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损耗，帮助企业合理控制生产运营的整体成本。第三，党建品牌可强化一线人员的安全作业意识，主动遵守各项安全管理规范，常态化排查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维护生产环节的平稳运行。

（二）企业文化引领价值

党建品牌是电力建设企业精神文化的具象表达，能够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清晰的价值导向。第一，党

（上接 18 页）

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EB/OL].(2020-04-28)[2026-02-09].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07/s253/202005/t20200511_452697.html.

[3] 叶圣华 . 党建引领学生社区治理：现状、逻辑及路径 [J]. 现代交际 ,2021(14):143-146.

[4] 黄超 . 社区治理视域下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研究——以“高校 + 社区 + 社工”项目为例 [J].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 ,2021,23(04):61-65.

[5] 何亭 . 应用型本科院校参与社会治理问题分析——以大连理工大学城市学院为例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1,20(18):269-270.

[6] 林晓燕 , 蔡汇民 .“三自”社区治理模式下大学生主体性培育探究 [J]. 中国成人教育 ,2017(20):43-4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四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项目“党建引领下大学生社区治理模式构建研究”（CSZ25090）。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建品牌可搭建统一的价值认知框架，让不同岗位的员工获得一致的身份认同，在日常工作中形成更强的情感联结，主动融入企业的整体发展进程，也能更主动地践行企业共有的行为准则与文化理念。第二，党建品牌可推动企业文化与社会责任要求相融合，引导企业主动参与乡村电网改造、受灾地区电力抢修、困难群体用电保障等公共服务类项目。第三，党建品牌可成为电力建设企业对外形象传播的核心标识，在各类公开活动与项目合作中传递企业的正向价值取向，逐步在全行业形成可借鉴的文化示范效应，也能为电力建设行业整体文化氛围的优化提供有效支撑。

二、新时代电力建设企业党建品牌建设价值转化的影响要素识别

（一）主体协同要素

主体协同是党建品牌价值从理念层落到实践层的基础前提，不同参与主体的权责划分与配合状态会直接作用于价值转化的实际效率。党建部门作为党建品牌建设的主导方，主要承担品牌内涵梳理、建设方案制定、落地进度统筹的职责，若党建部门在制定方案时未对接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就容易出现品牌建设与业务推进脱节的问题，难以为业务端提供实际支撑。业务部门作为党建品牌价值落地的重要承接方，主要负责将品牌建设要求嵌入日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若业务部门对党建品牌的认知仅停留在完成党务任务层面，就会主动缩减相关工作的资源投入，使得品牌建设的各项要求难以落地到实际业务流程中。一线班组是党建品牌价值转化的最终执行端，主要负责在施工一线落实品牌建设的各项具体要求，若一线班组未接收到清晰的行动指引，就容易出现对品牌建设要求理解偏差的情况，甚至会将相关工作视为额外负担，削弱执行的主动性。

（二）场景适配要素

场景适配是党建品牌价值落地的重要载体，不同业务场景的运行逻辑差异会对党建品牌价值的传导效率产生直接影响。针对项目建设场景，要贴合施工周期紧凑、多工序交叉作业的特点，匹配责任落实、效率提升类的品牌价值导向，引导一线人员在各施工环节主动落实品牌要求，减少流程卡点和资源浪费，保障项目按既定节奏推进。面向运维服务场景，要适配高频次上门、服务对象分散的特征，匹配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类的品牌价值导向，引导运维人员主动响应各类用电需求，提升服务的响应速度和完成质量，提升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聚焦公益行动场景，要契合公共服务属性突出、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特点，匹配责任担当、价值传递类的品牌价值导向，引导参与人员主动展现企业的正向作风，扩大党建品牌的社会辐射范围，强化企业对外的正面形象。

（三）传导路径要素

传导路径是党建品牌价值从意识形态层转向生产效能、文化效能层的核心通道，路径的通畅程度会对价值转化的最终效果产生直接影响。第一是价值解码节点，党建部门将抽象的党建品牌内涵拆解为不同业务条线可参照执行的行为准则，内容贴合各条线的实际工作属性，对应安全生产、效率提升、服务优化等不同业务的核心诉求，让各层级人员都能准确把握品牌建设的核心方向，避免对品牌内涵出现理解偏差。第二是过程传导节点，业务部门将拆解后的品牌建设要求嵌入现有日常经营管理流程当中，针对项目建设、运维服务、公益行动等不同场景匹配对应的落地要求，契合现有工作的推进节奏，减轻一线人员的执行负担，保障品牌要求能切实落实到实际工作的各个环节，不会出现要求悬浮空转的问题。

三、新时代电力建设企业党建品牌建设的价值转化落地路径

（一）锚定核心需求，强化价值转化主体协同

电力企业是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和支撑，其党建工作不仅是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更是保障国家新时期能源安全和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4]。破解党建与业务融合的现实堵点，需要从主体协同的底层逻辑出发，理顺各参与方的对接关系，为党建品牌价值传导搭建稳定的主体支撑框架。

第一，明确不同主体的协同对接规则。党建部门牵头收集各业务条线的实际运行需求，划清党建部门、业务部门、一线班组三类主体在党建品牌建设中的权责范围，避免出现工作交叉或者责任空白的问题。各主体按照既定规则开展对接工作，不需要额外搭建复杂的跨部门沟通机制，减少不必要的沟通成本，使各主体的工作推进方向与品牌建设的整体目标保持一致。

第二，梳理党建品牌嵌入业务环节的具体操作要求。党建部门结合各业务环节的运行特征，将抽象的品牌价值内涵拆解为可落地的工作要求，对应到生产建设、运维服务、公益行动等不同工作板块的具体流程中。相关要求与现有业务规则高度契合，不会打乱原有业务的推进节奏，降低品牌要求与实际业务脱节的可能性，也能避免给一线工作人员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第三，形成可落地的协同对接清单。党建部门匹配不同业务场景的适配需求，明确各环节的对接流程与核验标准。清单内容会根据业务运行的实际情况定期调整，保持内容的适配性，让各层级人员都能清晰地知晓自身的工作内容与对接方向，清单的具体内容可参见表 1。

（二）聚焦施工场景，拓展价值转化覆盖维度

施工场景是电力建设企业生产效能输出的核心阵地，党建品牌的价值转化需要紧扣不同细分施工场景的运行特征拓展覆盖边界，匹配对应可量化的考核标尺。

其一，安全管控场景下，党建部门结合高空作业、带电作业等高危施工环节的运行特点，将党建品牌中的责任意识导向转化为具体的作业行为指引，引导一

线施工人员主动遵守作业规范，排查现场安全隐患。相关要求会直接纳入日常作业的常规提醒范畴，不需要额外增设复杂的检查流程，也不会给一线人员增加多余的工作负担，能在不打乱原有施工节奏的前提下，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

表 1　党建品牌嵌入生产业务场景适配清单

参与主体	对应业务场景	品牌落地要求	对接核验标准
党建部门	全业务场景统筹	梳理品牌核心内涵，制定整体建设方案，统筹各环节落地进度	建设方案贴合业务实际需求，跨部门对接响应及时
业务部门	经营管理全流程	将品牌建设要求嵌入日常业务规则，调配对应落地资源	品牌要求覆盖各核心业务环节，资源投入匹配建设需求
一线班组	施工、运维、公益等执行场景	对照品牌要求落实各项具体工作，及时反馈落地过程中的问题	岗位工作符合品牌导向，问题反馈真实准确

其二，质量提升场景维度，党建部门将党建品牌的标准意识融入各施工工序的验收环节，引导作业人员对照工艺要求完成各环节操作，减少返工整改的频次，压缩项目整体建设周期。相关要求会与现有施工质量管理规则深度契合，不会出现要求与实际操作脱节的问题，也能引导一线人员逐步形成标准化作业的行为习惯，提升项目整体建设质量。

其三，配套公益服务场景，党建部门将党建品牌的服务意识嵌入项目周边的便民服务环节，引导作业人员主动为沿线群众解决与用电相关的实际问题，拉近企业与服务对象的距离。相关服务内容会结合项目施工的空余时间开展，不会占用核心施工环节的时间资源，也能扩大党建品牌的社会辐射范围，传递企业的正向价值取向。

（三）完善闭环管理，保障价值转化成效落地

近年来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以及公众对能源安全、绿色低碳的需求日益提升，电力企业亟须以党建为引领，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品牌建设与文化创新的动力[5]。党建品牌价值转化的成效不是静态的一次性结果，需要持续的动态维护才能避免落地效果随时间推移而衰减。

其一，党建部门要建立常态化的成效跟踪机制，围绕生产经营赋能、企业文化引领两类核心价值方向，对应不同业务场景的落地要求设置常规核验节点。相关核验工作直接嵌入现有业务巡检、工作复盘的流程中开展，不需要额外增设独立的考核任务，能完整掌握品牌价值在各业务环节的实际转化状态，且不会干扰正常业务的推进节奏。依托核验数据开展动态复盘优化，对照生产经营指标校准落地偏差，形成“部署—执行—核验—改进”的完整闭环，持续推动党建品牌价值向安全生产、经营效益、服务质效深度转化。

其二，党建部门要搭建多渠道的诉求反馈通道，面向党建部门、业务部门、一线班组三类参与主体收集落地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收集过程不设置标准化的应答限制，各层级人员可以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提出真实的调整建议，相关内容由专人统一整理分类，不会出现反馈信息遗漏或者层层筛选失真的问题。建立问题分级响应与清单销号机制，立足共性诉求优化顶层制度设计，针对个性问题开展点对点协调督办，夯实价值转化的群众基础与实践根基。

其三，党建部门要对收集到的问题和建议逐项研判，对应调整品牌落地的要求和传导的路径，调整后的内容会第一时间同步到所有参与主体，不会出现新旧要求混杂导致的执行偏差。闭环管理的各个环节权责要对应到具体的工作人员，不会出现无人跟进的问题，各环节的推进节奏要贴合业务运行的实际周期，不用设置过于频繁的核验和调整频率，避免给工作人员增加额外的工作负担。闭环运行的相关内容也会定期面向所有参与人员公开，保障整个管理过程的公开透明，提升各层级人员对党建品牌建设的认同度，也能让党建品牌的价值转化始终贴合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形成长期稳定的赋能效应。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党建品牌建设不是孤立的党务工作，而是贯穿电力建设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的系统性工程，其价值转化成效直接关系到党建引领作用的落地质量。电力建设企业推进党建品牌建设，需准确把握其生产经营赋能与文化引领的双重价值内涵，聚焦主体、场景、路径三类核心影响要素，结合自身业务运行特征搭建适配的落地框架。相关建设工作不可追求短期效应，要以动态化的闭环管理适配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避免品牌建设出现悬浮空转的问题，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既为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也为全行业党建工作水平的提升提供示范支撑。

参考文献

[1] 胡海燕 . 企业党建品牌总结提炼与展示传播的思考 [J]. 当代电力文化 ,2025(12):22-2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的通知 [EB/OL].(2026-01-29)[2026-06-30].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23/content_5680759.htm.

[3] 文聪 . 以党建品牌创建推动引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35):110-112.

[4] 王国良 . 新时代电力企业党建工作的特色与创新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28):130-132.

[5] 杨植雅 . 电力企业党建引领品牌建设与文化创新研究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23):25-27.

（作者系青海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政工师）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研究

吴琦薇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肩负着稳经济、促发展、担使命的重要战略任务。党建工作是国有企业的独特政治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是国企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部分国有企业仍存在党建与业务相互割裂、融合举措流于形式、长效机制建设滞后等突出问题，制约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与战略落地。立足国企发展实际，本文阐释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时代价值，厘清融合推进必须坚守的核心原则，从思想引领、制度构建、载体创新、人才培育四个维度探索可落地、可推广的实践路径。通过推进融合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实效化，充分释放党建引领赋能效能，破除党建与生产经营“两张皮”现象，助力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步入攻坚期，市场竞争日趋复杂激烈，产业转型升级压力持续加大。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制市场主体的核心优势。长期以来，部分国有企业党务工作与生产经营分头推进，党建工作脱离业务场景、经营发展缺少党建引领，造成党建价值难以转化、生产经营发展缺少坚实政治保障。顺应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要求，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融合，能够持续将企业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市场竞争优势。

一、新时代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重大意义

（一）筑牢国企发展政治根基，坚守改革发展正确方向

国有企业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政治属性。在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各类经营风险交织叠加的当下，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能够把党的政治引领贯穿企业战略规划、生产运营、改革创新以及风险防控的全过程。企业各项生产经营决策不再单纯聚焦经济效益，而是始终对标国家政策导向与社会发展需求，确保企业发展路线不偏移、改革方向不偏离。常态化的党建引领能够强化企业全员的政治站位，让管理层和一线员工深刻把握国企的政治使命，将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企业具体的经营策略和工作举措，从根本上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治根基，保障国有企业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二）激活内生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市场核心竞争能力

市场竞争的核心是人才与凝聚力的竞争，党建工作在凝聚人心、锻造队伍、激发活力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能够打破党务工作与业务工作的壁垒，将党组织的组织力、战斗力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竞争力。企业通过党组织引领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等载体，聚焦生产瓶颈、技术难题、市场拓展等核心经营任务，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全体员工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另外党建工作培育的担当精神、实干作风、奉献理念，能够有效破除企业内部懒散的不良风气，激发员工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三）压实国企社会责任，助力国家战略落地实施

国有企业兼具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不仅需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需要主动承担服务国家战略、保障民生稳定、推动产业升级的社会责任。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能够让企业将社会责任、战略使命融入日常生产经营体系，避免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

益、忽视社会价值的发展误区。在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攻关、应急保障服务等国家重点领域，党组织能够主动引领企业精准对接战略需求，统筹调配企业资源，主动承接重点任务。企业在党建引领下，能够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在稳就业、保民生、促产业、防风险等方面主动作为，切实彰显国有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助力区域经济稳定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地见效。

二、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核心原则

（一）坚持党建引领、治理统一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国有企业发展的根本原则，也是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的核心前提，契合“两个一以贯之”的核心要求，该原则的核心是实现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统一，将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嵌入生产经营全链条，明确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中的法定地位，充分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在企业战略制定、重大决策、改革发展、项目建设等核心工作中，始终以党的政治方向、政策导向为根本遵循，统筹党建工作布局与企业治理架构，杜绝党建工作脱离企业治理体系、经营工作偏离政治方向的问题，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推进，实现党建引领治理、治理赋能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坚持服务中心、实效导向原则

服务生产经营、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国企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核心准则，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始终围绕企业生产经营中心任务开展，坚决摒弃脱离业务、流于形式的党建工作模式，杜绝党建工作自我循环、自弹自唱[1]。始终以提高企业效益、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融合工作的根本目标，聚焦企业生产攻坚、技术创新、提质增效以及安全管控和市场拓展等核心经营工作，谋划党建举措并搭建党建载体、开展党建活动，以企业改革发展、经营提质与难题破解的实际成效检验党建工作成果，让党建工作贴合业务、服务业务以及赋能业务，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战优势。

（三）坚持党管人才、双向赋能原则

人才是国企发展的第一资源，也是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核心支撑，党管干部、党管人才是国企党建的重要原则，更是实现党建与经营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关键保障，该原则要求企业将党建育人和党建管人与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经营队伍培育深度结合，依托党建工作锤炼高素质党务队伍、锻造专业化经营队伍、培育复合型骨干人才[2]。通过党建引领人才思想建设、作风建设、能力建设，提升全员政治素养和职业素养，同时依托生产经营实战场景锻炼人才、检验人才并成就人才，实现党建育人赋能经营发展与经营实践锤炼党建队伍的双向赋能，为企业持续发展储备优质人才资源，夯实融合发展的人才根基。

（四）坚持固本强基、常态长效原则

基层党组织是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落地的最小单元，筑牢基层党建根基、健全长效机制是融合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推进的重要保障，该原则聚焦抓基层、打基础、固长效，立足国企基层党支部、一线岗位、项目现场等基层单元，搭建贴合一线、贴合业务的融合工作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下沉基层、融入岗位、落地实操。同时坚持制度先行、闭环管控，通过完善制度机制、规范工作流程、健全考核监督，构建党建与生产经营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常态化工作格局，杜绝短期化与阶段性或形式化的融合工作模式，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让深度融合成为企业常态化工作、长效化发展优势。

三、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一）深化思想认知引领，构建双向融合理念共识

思想认知的统一是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前提，国有企业需要从管理层到基层全员转变思维认知，彻底破除党建与经营相互割裂的固化思维，树立党建引领经营、经营检验党建的双向融合发展理念。企业管理层要率先转变发展理念，深刻把握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的核心定位，摒弃党建工作务虚化、形式化的错误认知，将党建工作纳入企业核心发展战略，与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科技创新、风险防控等重点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此外，管理层在制定企业年度发展规划、重大经营决策、改革创新方案时，要主动融入党建政治要求，依托党组织政治把关作用，保障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合规性以及前瞻性，企业要常态化开展全员思想教育工作，结合行业发展形势、企业发展实际以及岗位工作需求，开展针对性的思政宣讲、案例教学和专题研讨，让全体员工清晰认识到党建对企业发展、岗位工作的赋能价值。此外，基层员工能够主动立足岗位对接党建工作要求，把党员标准、党性修养融入日常生产以及业务实操全过程，形成全员参与融合、全员助力发展的良好氛围，从思想根源上杜绝“两张皮”现象。

（二）健全制度机制体系，打造常态化融合运行框架

常态化的制度机制能够为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提供刚性支撑，国有企业需要立足自身经营管理架构和党建工作体系，搭建全方位、闭环式的融合制度体系，实现两项工作的有机衔接、一体推进。企业首先要优化顶层制度设计，修订完善党建工作管理制度、

经营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打通两套制度体系的衔接壁垒，将党建工作目标细化量化，嵌入企业年度经营目标、部门工作指标以及员工岗位职责之中，让党建工作任务与生产经营任务深度绑定。企业建立一体化工作部署机制，每年同步制定党建工作要点和经营发展方案，明确年度融合工作重点、责任分工、推进时限，针对生产攻坚、项目建设、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重点经营任务，配套制定专项党建引领方案[3]。同时，企业完善融合考核评价机制，构建量化、可落地的考核体系，改变以往重台账、轻实效的党建考核模式，将生产经营成效、业务难题破解情况、提质增效成果作为党建工作考核的核心指标，考核结果直接与部门评优、员工薪酬、晋升提拔挂钩，倒逼各部门、各岗位主动落实融合工作。此外，企业建立常态化监督复盘机制，定期梳理融合工作推进情况，排查制度落实漏洞、工作衔接短板，及时优化调整工作举措，形成部署、推进、考核、复盘以及优化的闭环管理体系，保障融合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实效化推进。

（三）创新融合载体抓手，提升经营发展实战效能

贴合企业经营实际的特色载体是推动党建融合落地见效的关键，国有企业需要摒弃形式化、同质化的传统党建模式，围绕生产经营核心痛点、重点任务创新融合载体，让党建工作直面业务难题、赋能经营发展。企业要立足生产一线、项目现场、研发团队、市场部门等不同业务场景，打造精准化的党建融合载体[4]。针对生产攻坚、提质增效工作，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攻坚突击队，聚焦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优化、生产成本管控以及安全生产保障等核心工作，组织党员带头攻克生产瓶颈和排查安全隐患、优化生产流程，另外针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工作，依托党支部组建技术攻关小组，围绕企业核心技术研发、老旧设备升级、工艺优化等难题开展党建攻坚行动，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突破，提升企业产品核心竞争力。此外，针对市场拓展、客户服务、品牌建设工作，开展党建赋能市场攻坚行动，组织党员骨干带头深耕市场、优化服务、拓展渠道，助力企业市场份额稳步提升，企业结合行业特性和发展阶段，打造特色党建品牌，将品牌建设与企业文化建设、经营发展目标深度结合，通过品牌化运营凝聚发展合力，并弱化形式化的党建活动，杜绝脱离业务的无效活动，让每一项党建工作、每一个党建载体都聚焦经营实效，切实把党建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提质增效、创新发展的实战能力。

（四）建强复合型队伍，夯实融合发展人才支撑

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是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核心保障，国有企业需要聚焦融合履职能力提升，优化党务工作队伍配置，推行党务人员专职化、专业化建设，选拔政治素养高、责任心强、熟悉业务工作的骨干员工充实党务岗位，杜绝随意兼职、随意调配的情况。另外，企业建立常态化分层分类培训机制，针对党务工作者开展经营管理、业务流程、行业政策等专项培训，让党务人员精准掌握企业经营痛点和发展需求，提升围绕经营抓党建的履职能力，针对业务管理人员、一线骨干员工，开展党建基础知识、政治理论、党性修养等培训，培育全员党建思维，提升业务工作融入党建引领的能力[5]。同时，为企业搭建双向交流锻炼平台，推动党务干部与经营管理干部、一线业务骨干双向轮岗、交叉任职，让党务人员深入业务一线历练，让业务骨干参与党建管理工作，双向提升综合履职能力。此外，企业完善人才激励与培养机制，重点培育融合型骨干人才，对在党建经营融合工作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团队予以表彰激励，优先提供晋升、深造、历练机会，持续优化队伍结构，打造一支适配新时代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全方位夯实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人才根基。

四、结语

综上所述，坚守科学发展原则、持续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践行初心使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国企发挥独特制度优势、激活发展动能、彰显责任担当的核心举措。推进二者深度融合，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实效导向、人才赋能、常态长效四项核心原则，立足企业经营实际持续深化思想共识、完善制度机制、创新载体平台、建强人才队伍。通过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双向融合，持续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与市场竞争优势，推动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创新突破、稳健运营，持续夯实国民经济发展根基，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实施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1] 慈蕊 . 新时代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路径探索与实践 [J]. 中外企业文化 ,2026(01):166-168.

[2] 秦政 . 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路径探究 [J]. 中外企业文化 ,2025(08):172-174.

[3] 王翔 , 邱兵 , 王凯 .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与探索 [J]. 中国煤炭工业 ,2025(08):32-34.

[4] 王铎睿 . 党建引领新时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D]. 西安 : 西安理工大学 ,2025.

[5] 孙楠 . 新时代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理论与路径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4(24):119-121.

（作者系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九水厂政工师）

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曹瑜虹

摘要：本文以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为研究核心，系统阐释该项工作在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增强基层党组织组织功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内在价值。当前部分高校基层党组织在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实践中，存在服务理念与政治功能融合不充分、运行机制存在堵点断点、党务队伍履职能力与资源保障不足、效能评估闭环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难题。立足高校党建工作实际，提出要持续强化服务宗旨意识与政治引领、优化组织架构与协同运行机制、建强党务队伍并深化数字赋能、健全诉求反馈与综合考评体系，打通服务师生的组织“末梢循环”，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关键词：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磅礴力量。”[1]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等学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密切联系师生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服务师生是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和重要功能，其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到高校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关乎新时代高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最后一公里”在高校党组织公共服务语境下，特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校的决策部署、党组织的关怀温暖以及具体服务资源，从校级、院级党组织向基层党支部，再到每一位师生个体精准传递和有效落实的最终阶段。随着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深入推进和师生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个性化，高校基层党组织如何有效克服服务传递中的“末梢梗阻”，切实打通、走好、走实服务师生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的价值意蕴

打通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绝非简单的技术性或事务性工作，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逻辑、实践要求和时代价值，是高校党组织站稳人民立场、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在高校执政根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根本宗旨，是马克思群众观与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诠释。高校师生是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最需要党组织关心与服务的群体。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的畅通与否，直接体现了党的宗旨是否在高校基层得到忠实践行。毛泽东指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2] 只有将服务工作做细、做实、做到师生心坎上，切实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师生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夯实党在高校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强化组织功能，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战斗力

组织力是组织生命力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3] 打通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的过程，正是党组织动员、整合、协调各方资源，回应师生诉求，凝聚师生力量的过程。通过精准有效的服务，党组织能将师生更紧密地团结在周围，提升号召力与凝聚力，通过解决实际问题，能彰显党组织的作为与担当，提

升威信与战斗力，通过密切联系师生，能够及时掌握思想动态与实际困难，增强工作的预见性与针对性，从而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

（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营造优良育人生态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优良的育人环境除教学科研条件外，也包括充满人文关怀、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学习工作生活氛围。基层党组织身处育人一线，其服务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师生的工作学习状态、心理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念形成。畅通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的“最后一公里”，能够及时帮助师生排忧解难，营造安心从教、潜心向学的环境。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通过关爱帮扶、心理疏导等，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温度和实效，从而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四）推进高校治理现代化，完善校内治理体系

现代大学治理强调多元共治、重心下移、精细服务。高校基层党组织作为治理体系中重要一环，其服务效能直接影响学校整体治理水平。打通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意味着治理触角向基层末梢的有效延伸，治理资源向师生需求的精准投放，治理反馈向决策层面的及时传导。这有助于弥补科层制管理可能存在的“缝隙”与“盲区”，推动治理模式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提升治理的响应速度、精准度和师生满意度，是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

二、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的现实困境

高校基层党组织在服务师生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完善。在推进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工作中，一些高校党组织仍面临一些值得关注的挑战，需进一步凝聚共识、优化机制、提升能力、健全评价，以实现更高质量的服务成效。

（一）理念认知层面：服务意识与政治功能融合不足

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对“服务”内涵的理解存在偏差。一是将服务较多视为事务工作或者日常关怀，对其所蕴含的政治引领与思想教育功能把握不够充分，服务工作的思想性、教育性有待进一步凸显。二是服务活动存在侧重于形式与惯例的现象，如常采用定期慰问、集中帮扶等做法，对师生多样化、持续性的需求关注与响应机制还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三是打通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在凝聚人心、巩固群众基础方面的重要性，需持续提升认识，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与系统性。“一些基层党组织存在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服务群众能力不强、办法不多”[4]，这类现象在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中亦值得警惕与反思。

（二）机制运行层面：服务链条存在断点、协同不畅

一是组织架构的末端效能需强化。校、院级党组织机构相对健全，但党支部、党小组等最贴近师生的末端组织，在服务功能定位、资源支持与能力建设方面尚有提升空间，可能影响服务链条的完整性与响应效率。二是信息传递的精准性与时效性需提升。师生诉求通过传统渠道逐级上报时，易出现信息流转效率不足的问题，需优化传递路径以保障服务的精准度与及时性。三是跨部门协同联动需打破壁垒。服务师生工作涉及教学、科研、学工、后勤、保卫等多个部门，基层党组织在协调跨部门资源时，需进一步优化流程、强化统筹，突破权限与程序层面的制约，形成高效协同的服务合力。

（三）能力支撑层面：队伍能力不足，资源供给不均衡

一是党务干部队伍的服务能力有待提升。部分党务干部，特别是教师党支部书记，多为业务骨干“双肩挑”，投入党务工作和服务师生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且缺乏系统性的服务理念与方法培训。二是服务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均衡性。基层党组织可支配的服务资源（如经费、场地、项目等）相对有限，且在不同学院、不同类型支部间分布不均，制约了服务活动的开展广度与深度。三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服务的能力不足。尽管多数高校已搭建线上服务平台，但基层党组织对平台的有效运用、数据挖掘及线上线下融合衔接的能力存在差异，需着力缩小应用差距，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服务效率。

（四）效能评估层面：反馈闭环与激励机制不完善

一是服务效果评价体系需优化升级。现有考评多侧重活动次数、参与人数等“投入”指标，而对师生实际获得感、满意度等“产出”和“效果”指标关注不够，缺乏科学可量化、常态化的评估体系。二是师生反馈渠道需提质增效。虽设置了意见箱、座谈会等反馈渠道，但部分渠道的实用性仍需强化，需进一步打消师生反馈顾虑，确保真实诉求能够全面、及时地被收集。三是激励约束机制需强化导向。对于在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中表现突出、成效显著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需健全表彰奖励与晋升激励机制；对服务工作需改进的主体，需完善督促整改机制，通过鲜明导向激发全员主动服务、优化服务的内生动力。

三、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的推进路径

高校基层党组织要注重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在实践探索与总结提升中打通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保障[5]。要从理念、机制、能力、评价等多维度系统施策，持续发力，切实打通服务师生的“末梢循环”。

（一）筑牢思想根基，推动服务功能与政治功能深度融合

一是要深化理论武装与宗旨教育。持续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师生至上”的服务理念，深刻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服务师生作为践行党的宗旨、履行政治责任的具体行动。二是推动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深度融合。将政治引领贯穿服务全过程，在解决师生实际问题的同时，注重宣传党的政策、传播主流价值引导思想动向。通过设立党员示范岗、责任区，开展“我为师生办实事”等主题实践活动，使服务过程成为凝聚人心、巩固阵地、彰显先进性的过程。三是要大力培育服务文化。要在基层党组织中大力倡导“主动服务、精准服务、暖心服务”的文化，营造人人关心服务、参与服务、改进服务的良好氛围，将服务意识内化为党员的价值追求和行动自觉。

（二）优化组织网络，构建上下贯通、多方协同运行机制

一是要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末端。通过优化党支部、党小组设置，通过“科创团队党支部”“学生‘一站式’社区党支部”等临时党支部、创新党支部等形式，确保基层党组织覆盖到教学科研团队、班级宿舍等师生学习生活单元。明确党支部在服务师生中的具体职责，赋予其一定的资源调配建议权和协调权，增强其“前哨”和“探头”功能。二是要构建扁平化、网格化服务体系。高校要推动管理重心和服务资源下移，建立“学校党委—院系党组织—师生党支部—党员”四级联动、直通到底的服务网格。推广党员联系师生制度，确保每名党员都有联系对象，每个师生都能找到联系人，实现服务全覆盖、无死角。三是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由学校党委牵头，建立定期会商的“一站式”服务工作协调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探索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枢纽，整合行政、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力量的服务共同体，形成“党组织牵头、多方参与、资源整合、齐抓共管”的服务格局。

（三）强化能力支撑，推进队伍专业化与服务数字化赋能

一是要加强党务干部服务能力培训。将服务理念、沟通技巧、心理疏导、危机干预、项目管理等纳入党务干部培训体系，提升其专业化服务水平。二是加大资源保障与精准投放力度。学校层面应设立基层党组织服务专项经费，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探索资源“按需分配”和“项目化”运作模式，探索根据师生需求申报服务项目，提高资源使用效益。三是深入推进“智慧党建”与数字赋能。依托学校信息化平台，开发或整合集政策咨询、事务办理、诉求反馈、互动交流、数据分析于一体的党建服务综合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师生需求热点和变化趋势，实现服务的精准推送和前瞻性介入。加强线上线下融合，线上快速响应、分流，线下跟进解决、反馈，提升服务响应速度和便捷度。

（四）完善闭环管理，健全反馈机制与考评激励体系

一是要建立多元畅通的反馈渠道。高校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移动端应用等，搭建便捷安全的实时反馈系统。定期开展师生满意度调查和第三方评估，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二是要完善以师生满意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通过改革基层党组织考核评价办法，大幅提升服务成效、师生满意度在考核中的权重。引入服务对象评价、交叉评价等方式，注重考核服务的实际效果和长效机制建设，并将考评结果与评优评先、干部任用、资源配置等直接挂钩。三是强化服务的激励约束与整改落实。对服务成效显著、师生口碑好的党组织和党员予以大力表彰和宣传，树立典型。建立服务问题“收集—分析—处置—反馈—评估”的闭环管理流程，确保师生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推动服务工作在持续改进中螺旋式上升。

四、结语

打通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的“最后一公里”，是新时代高校夯实党建根基、践行育人使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充分释放高校党组织独特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凝聚师生奋进力量的重要抓手。推进服务落地见效，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引领、师生为本、常态长效、协同联动的基本方向，持续凝聚思想共识、理顺运行机制、强化队伍保障、完善评价闭环。通过全方位、深层次推动资源下沉、服务下沉、力量下沉，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育人效能与治理效能，持续增强师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参考文献

[1]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全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5-10-24(01).

[2] 毛泽东 .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节选）[J]. 湘潮 ,2021(10):21.

[3] 基层党建工作手册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9:19.

[4] 习近平 .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4:16.

[5] 赵长禄 . 构建高水平、全方位党建工作体系打通基层党建“最后一公里”[J]. 北京教育（高教),2020(07):16-1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湖南省高校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资助项目“党建与专业双向赋能视域下的高校师生支部结对协同机制创新研究”（25E21）；2025 年度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党建研究课题“高校基层党组织服务师生‘最后一公里’机制研究”（202503）；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第一批党建工作标杆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部”。

（作者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百年对话”数字口述史工程：新时代青年与老党员的跨时空对话平台建设研究

吴思语　罗艳红　王桐语　徐晨光 *

摘要：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砥砺沉淀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涵养青年理想信念、引领青年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精神支柱。数字化时代下，红色教育传播场景、育人载体与青年认知范式发生深刻变革，为更有效地传承红色基因，亟须探索契合数字时代需求的创新方式。本文创新性提出构建“百年对话”数字口述史跨时空对话平台。以老党员口述史料抢救、整理、数字化活化为核心，依托人工智能、知识图谱、AR 沉浸式交互等数字技术，搭建集资源存储、思政教学、互动对话、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化育人载体，构建“史料采集—数字赋能—代际对话—价值内化”的红色基因传承闭环。研究立足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剖析平台建设的时代必要性、整体架构、技术路径与实践价值，为新时代红色文化活态传承、大思政教育创新、青年思想引领提质增效提供新的理论思路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红色基因；数字口述史；跨时空对话；青年思政教育；文化活态传承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岁月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鞭策新时代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挑民族复兴重责的重要精神动力[1]。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处于数字化迅猛发展的新时代，红色文化的传承迎来了数字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对创新传播手段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紧密贴合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需求，追随数字技术发展的潮流，探究“百年对话”平台的构建路径与实践意义，为红色基因的数字化传承提供理论支撑与可行途径。

一、数字时代红色基因传承革新的必要性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关系着广大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也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新时代意味着新要求，在新时代背景下，红色基因的传承与传播模式在新时代迎来了革新与深化的广阔空间。具体表现为以下三大方面。

（一）数字时代红色教育的发展机遇

数字化浪潮涌动的新纪元，红色基因传承遇上了创新的历史契机。传统红色教育把课堂讲授、理论学习等当作主要途径，为青年准确把握红色基因提供了必要的知识依托[2]。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为红色教育赋予了新的活力，让其更能和青年一代的认知与情感特点相匹配。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新时代青年在数字环境中长大，其认知构建和数字空间紧密相连。积极借助数字技术创新红色教育的呈现载体，开辟互动探究式的学习渠道，是让红色教育真正触动内心、唤起价值认同，从而造就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关键要点。

（二）数字化传承红色记忆的时代价值

老党员是百年党史的“活档案”，他们的亲身经历都可以转变为一份份生动的教学案例[3]。在数字化进程加速的今天，系统采集并动态运用这些宝贵记忆，既有利于保存历史的真实点滴，也可为红色文化传承增添长期动力。通过网络发放调查问卷对红色基因传承现状进行调查。本次调查共采集了 310 份有效问卷，结合调查结果分析得出，人们对以数字化方式保存和传播红色记忆表现出强烈的期待与需求。运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对老党员的讲述予以系统记录，不光能留存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证言内容，还能深度挖掘在基层岗位默默付出的普通党员的亲身事迹，由此汇聚成更真实完整的红色记忆体系。

（三）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的必然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巴巴的。”在信息技术飞速前进的今天，新媒体因其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覆盖面广等特点，成为思想文化传播的核心途径。在思政课上运用好信息技术，是增强思政课针对性的重要途径[4]。通过数

字技术，红色文化可突破传统的呈现形式，以短视频为载体，从而有效渗透进青年群体，增加传播的共鸣强度，这既有利于红色文化在多元网络空间巩固话语权，又能更好地发挥其价值引领、凝聚共识的社会职能，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传播中更具可感知性、亲近氛围和可接触性。

二、“百年对话”数字口述史平台的整体架构与建设路径

（一）平台总体构建思路

“百年对话”数字平台搭建的总体思路为：第一步，依靠规范访谈与数字化处理途径，搭建真实又完整的红色记忆资源库，处理“内容的源头”问题。第二步，依靠此资源库，创建青年愿意上手、喜爱运用的数字平台，构建对话体系，解决“内容怎样高效传达”的问题。第三步，研讨运用智能检索、知识图谱等技术，提升资源组织及呈现的效能，解决“怎样实现更深层次学习、更强烈触动”的问题，构造从资源收集、对话生成再至价值内化的红色基因数字化传承闭环。

（二）平台基础资源建设方法

平台核心规划围绕老党员的口述史料展开，先按系统流程采集老党员口述史料，然后对口述内容实施数字化处理，最后搭建起真实立体的红色记忆资源库，为党史研究提供丰富生动的一手凭证。

口述史资料采集环节，项目核心对准两类老党员群体：一类是亲身见证重大历史事件的人，采用当面交流、电话访谈之类的形式，把他们的口述内容完整地记录好；另一类是在基层扎根的普通党员，如乡村教师、社区工作者等群体，探寻他们于普通岗位上坚守奉献的点滴故事，借助录音笔、摄像机等数字化设备全程记录，既把语言的内容保存下来，也捕捉讲述者的神情模样，保证每份口述史料完整且真实。接着，采用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处理口述史料，首先把音频变成文本，开展标点标注、说话人标记等细小操作，选用语音转写工具，快速制成文字初稿，通过智能校对功能提升文字精确性，同时保留老党员生动形象的初始语言形式[5]，并邀请老党员本人对口述资料内容加以核对，并对存疑的内容进行补充校正。

（三）数字平台规划的具体设想

1. 内容架构与界面设计

“百年对话”平台拟构建设计面对青年群体的平台界面，以满足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激发青年的学习兴趣，让青年更加认同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第一，规划在数字平台内对已有资源进行分类，设置“红色资料库”“红色短视频”“思政课程”“教育材料包”“对话交流”等板块。这些板块的设置能够系统整合老党员的口述历史资源，红色资料库提供原始的口述史料查询，红色短视频能够适应青年观看习惯，思政课程和教育材料包可以服务于课堂教学，对话交流板块以促进青年之间、青年与老党员之间的互动，从而构建完整的红色文化传播体系。第二，设置基本浏览、普通检索和高级检索等功能。设计面向青年用户的平台界面，同时满足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需要，让青年在浏览平台、查找红色资源的过程中增强对党史的认同。

2. 双向沉浸式代际互动机制

规划采用青年提问与老党员回应的双轨对话模式，构建起一个平等交流的创新互动平台。

首先是多媒体问答系统。支持青年通过电子书信、视频等多种方式向老党员提出问题，老党员可相应地选择文字、语音或视频形式对提问进行回应，从而帮助实现跨时空的直观对话。其次，设置主题互动论坛。围绕重要历史事件、红色精神主题开展讨论，鼓励青年将学习所获得的所思、所悟创作成文章、短视频等在平台展示，促进青年之间的思想交流，同时将青年的学习感悟可视化，提升红色文化的传播效力。

3. 数智融合技术赋能体系

就技术应用而言，平台着重引进人工智能技术以增进服务效能，构建智能检索体系，对音频、视频等原始口述史料实施关键词自动标注，并实现相关词汇的语义关联，让用户可迅速精准地查找口述史素材。

采用知识图谱技术，系统可自主识别口述内容中的人物、事件、地点等要素并构建关联，搭建起可视化的知识网络框架，呈现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内在关联[6]，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平台可凭借智能手段分类口述资料内容，萃取关键要点，为资源的规范管理、高效应用和检索提供技术依托，采用数字智能手段改进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播效果，提升青年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此外，部分青年在调查中提及党史学习教育历史素材形式单一、互动不足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一现象，“百年对话”平台规划引入增强现实（AR）等技术手段，利用虚拟场景使历史重现眼前，让青年学习红色文化的沉浸感得到提升[7]，在保证历史事实真实性的基础上，使红色记忆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让红色基因传承更能展现时代感染力。

三、“百年对话”数字口述史平台的现实意义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重要内涵，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展开深入研究，可以看出“百年对话”数字平台对推动思政教育创新、红色基因传承、促进社会共识的重要性。

（一）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构建数字化育人新范式

“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近年来，随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全面推进，思政教育工作面临着创新传统的教学方法、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任务。盐城射阳县临海镇新老党员做“结

对帮”工作，经过交流沟通和结对支援，实现老党员政治经验和青年党员创新思维优势的彼此补充；安图县“新老党员话初心”实践进行成长经历分享，使红色基因在言传身教中传承。实践探索表明，代际之间的对话能够有效增进情感认同[8]。“百年对话”数字平台借鉴此类成功经验，凭借数字化手段整合分布零散的红色记忆，让老党员的口述经历成为理论教学的鲜活例证，用青年所喜爱的模式呈现历史故事，同时让红色记忆以规范模式进入课堂，把不成体系的对话活动转变为经常性活动，大范围传播个体感悟，打造思政教育新模式。

（二）活化红色文化传承，筑牢文化自信精神根基

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传承与发展直接牵扯到文化自信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明确要求要在红色文化传播方式上进行创新[9]。本平台凭借数字化手段，系统抢救即将消逝的红色记忆，让老党员们的切实感悟实现长久保存，让这些口述史料生动地呈现在青年跟前，使红色故事在数字时代再次焕发光彩。青年听红色故事的时候能感悟信仰的力量，进一步提升对红色精神的认知，红色文化由此在青年的心中扎根，为传承筑牢基础，为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持久推力。

（三）消融代际认知隔阂，凝聚民族复兴社会共识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推进阶段，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当前社会思想观念丰富多彩，搭建有效的对话平台对于增进不同群体间的理解、凝聚共识显得尤为重要。“百年对话”平台凭借建立新的对话模式，促使老一辈奋斗精神与新一代价值追求在交流中传递，使红色基因成为凝聚不同年龄群体的精神纽带。当青年聆听老党员讲起建设岁月的事迹，当老一辈目睹年轻一代的创新劲头，代际隔阂逐步消除，共同的价值认同就可以成功建立。这种共情为社会团结夯实基础，让各个年龄层的人们在红色精神的鼓舞下，心齐劲足朝着一处发力，一道投身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10]。

四、结语

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核心使命，数字化转型是红色文化永续传承、思政教育提质创新的必然趋势。本文构建的“百年对话”数字口述史跨时空对话平台，立足红色记忆抢救、思政场景创新、代际价值共鸣，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搭建了资源丰富、互动性强、场景鲜活、适配青年的红色育人新载体。平台有效破解了传统红色教育形式单一、资源零散、互动不足、传承断层等难题，实现了红色资源系统化留存、红色精神场景化浸润、思政教育数字化升级、代际共识常态化凝聚。

未来，需持续优化平台技术架构、丰富口述史料资源、完善互动育人机制、拓展跨界合作场景，持续深化数字技术与红色传承、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以跨时空代际对话激活百年红色基因、赋能新时代青年成长，持续推动大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引导新时代青年坚定理想信念、传承奋斗精神、勇担复兴大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参考文献

[1] 黄刚 . 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教育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M]. 南京 :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328.

[2] 刘斌 , 夏玉凤 , 杨谣 . 困境与突破：“互联网 +”背景下学校红色基因传承路径研究 [J]. 当代教育论坛 , 2022(02):74-79.

[3] 杨帆 . 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档案开发的内涵与路径研究 [J]. 北京档案 ,2023(05):41-42.

[4] 严萍昌 .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金课”建设的“四底”保障析论 [J]. 学术论坛 ,2020,43(03):120-125.

[5] 宋姬芳 , 朱小梅 , 王丽丽 . 传承红色基因助力资政育人——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红色文献整理与利用实践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22,40(01):102-107.

[6] 冯云 . 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数据库建设探讨 [J]. 西藏研究 ,2017(06):99-104.

[7] 李凤亮 , 周梦琛 . 数字文化产业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创新 [J]. 文艺理论研究 ,2022,42(06):12-19.

[8] 尹晴 . 伟大建党精神在高中《哲学与文化》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D]. 荆州 : 长江大学 ,2025.

[9]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EB/OL].(2018-07-29)[2026-02-06].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312199.htm.

[10] 潘岚迪 . 新时代背景下传承红色基因的路径研究 [N]. 河南经济报 ,2025-02-08(1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年度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研究专项——“‘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思政课‘一主双轮三驱动’实践教学模式创新研究”（SJGSJ2023019）；齐齐哈尔大学2024年党建研究重点课题“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实践路径和经验总结研究”（QQHRUDJ2024-02）；2025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百年对话’数字口述史工程：新时代青年与老党员跨时空对话平台”（202510232025）。

（作者：吴思语、罗艳红、王桐语，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师范类＞专业本科生；通信作者徐晨光，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学术理论研究部编辑）

复杂适应系统视域下老年公益教育供给的适应性研究

杨礼芳　李　慧　潘美意

摘要：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叠加演进，正在深刻重塑老年教育的发展环境。本文引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提出“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这一理论概念，将其界定为多元供给主体经由持续互动、反馈学习与协同演化，推动教育供给系统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能并实现公共价值增值的动态能力。研究构建了“技术嵌入—制度耦合—价值涌现”三维分析框架，并揭示供给适应性由技术接入、功能优化到生态重构的螺旋演进逻辑，拓展了该理论在老年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边界，为人工智能背景下老年公益教育供给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

关键词：复杂适应系统；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人工智能；开放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老龄化与教育数字化同步推进，正在重塑我国老年教育发展逻辑。2023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 15.4%，已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预计 2035 年前后迈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1]。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下，老年教育正由福利供给转向积极老龄化与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进一步强调以教育数字化开辟发展新赛道，为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契机 [3]。

近年来，以开放大学、老年大学与社区教育为主体的公益教育体系逐步形成，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开始嵌入老年教育场景。但供给体系仍存在结构性不足：多主体协同不足、资源配置不均衡、技术应用停留在工具层面、制度与技术赋能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现有研究多聚焦供需匹配或平台建设，对供给系统的动态演化机制解释不足 [4]。

审视既有文献，公共服务供给理论、终身教育理论与数字教育研究构成了三条主要分析脉络 [5]。然而，这些研究整体上遵循线性供给思维，对于多主体之间如何经由互动触发系统结构重组、如何在没有外部强制指令的情形下实现秩序再生，着墨甚少。大力发展老年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途径。“互联网 + 教育”将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推动教育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与变革 [6]34。数字时代老年教育供给的持续优化，其内在机理远非传统的线性分析框架所能解释。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新的认知工具。该理论揭示，由具有学习能力的行动主体构成的系统，能够在反复的互动与反馈中自发形成自组织结构，进而涌现出整体层面的适应性与非线性演化特征 [7]37。这一理论视角与老年公益教育供给的多主体动态结构之间呈现出高度的理论亲和性。

基于此，本文尝试提出“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这一概念，并构建相应的三维分析框架，以期为理解人工智能时代老年教育供给的动态演化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二、理论基础：CAS 理论及其与老年公益教育供给的适配性

纵观老年教育供给研究的演进脉络，一个显著的趋势是由供需匹配分析逐步走向数字化与智能化供给的探讨。但总体而言，现有工作仍以制度建设、资源配置和需求满足为主要分析切口，对于供给系统究竟如何通过主体间互动实现持续的结构优化，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解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渗透，使得老年公益教育日益超越单一机构或部门的边界，演化为政府、高校、社区、科技企业、社会组织与老年学习者等多方力量交织共构的行动者网络，其运行逻辑已具备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特征。

CAS 理论的奠基性工作由 John H. Holland 完成。该理论的核心判断是：由大量具有自主行为能力的行动者组成的系统，其整体秩序并非源于外部设计或中央指令，而是行动者在持续互动中依据环境反馈不断

调适自身行为，进而经由局部微观行为的自发汇聚形成宏观有序结构的自组织过程。较之于追求均衡与稳定的传统线性管理范式，CAS 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于开放性、非线性、适应性与涌现性，这使其在面对多主体协同治理与公共服务系统动态演进等议题时，展现出更强的解释力 [8]。

老年公益教育供给与 CAS 理论具有较高的契合性。从主体结构来看，老年教育供给涉及政府、开放大学、社区、社会组织、科技企业及老年学习者等多元主体，各主体既承担不同功能，又通过资源共享、信息反馈和利益协调形成持续互动网络。从运行过程来看，老年教育需求具有差异化、动态化和个性化特点，供给主体需要根据学习反馈不断调整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资源配置，形成持续学习与动态优化机制。从系统演化来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不断重塑教育供给方式，技术创新、制度调整与学习需求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供给体系持续升级，其演化过程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和自组织特征。

现有研究多数仍停留于资源增加、课程建设或平台完善等单维分析，对系统如何形成持续适应能力关注不足。大多数研究将人工智能视为提升教学效率的工具，较少讨论技术如何改变教育供给系统内部主体关系及治理结构 [6]36；对于开放大学在数字时代如何发挥平台组织、资源整合与协同治理功能，也缺少统一的理论解释。因此，仅依靠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理论，已难以充分解释人工智能背景下老年公益教育供给的动态演进机制。

相较于公共服务供给理论强调资源配置效率、协同治理理论侧重组织合作机制，CAS 理论更能解释人工智能背景下教育供给系统持续学习、自组织演化与公共价值涌现的动态过程。CAS 理论之所以较其他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根本原因在于老年公益教育供给系统具有多主体、非线性与开放演化的特征。

三、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的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

在 CAS 视域下，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并非被动回应外部压力的权宜之策，而是多元主体经由持续互动与反馈学习，推动系统结构不断优化的内生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不同于供给能力、供给效率等既有概念。供给能力强调资源供给的规模与水平，供给效率关注投入产出比与运行效益，而供给适应性强调的是供给系统面对环境变化时持续学习、自我调整和协同演化的动态能力，其关注重点由“静态资源配置”转向“动态能力生成”。这一概念的内涵更接近 CAS 理论所揭示的系统自组织与协同演化属性，因此能够弥补传统供给概念在解释教育系统持续优化机制方面的不足。

基于上述理解，供给适应性的理论内涵可分解为三个紧密关联的层次。

技术嵌入是适应性的物质基础。人工智能等技术并非外在于教育系统的工具，而是通过深度嵌入课程开发、学习支持与服务管理全流程，重塑供给系统的信息流动方式。技术嵌入的核心效用在于降低老年学习者的认知门槛与操作成本，使“数字可及”真正转化为“能力可及”。国际组织近年来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数字化学习是破解老年数字贫困、实现社会融入的关键路径 [9]。只有当数字技术能够适应老年人的学习能力、认知特点和行为习惯，技术优势才能转化为教育供给能力。

制度耦合是适应性的结构保障。老年公益教育涉及教育、民政、社区治理等多元场域，仅靠技术拉动难以形成稳定秩序。制度耦合强调通过跨部门协同、学习成果认证及资源共享规则的持续调试，使不同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与协作流程实现严密咬合，从而降低系统内耗，为技术创新提供制度接口。制度耦合的持续深化，体现为跨部门协同规则、资源共享协议及学习成果认证标准的迭代优化，使多元制度接口成为降低系统熵增的关键节点。其中，学分银行与时间银行的双轨互认被认为是打通养老服务与终身学习壁垒的有效制度探索 [10]。

价值涌现是适应性的高阶表征。复杂系统的整体功能绝非各主体功能的简单叠加。在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的基础上，老年教育供给系统持续产生超出传统办学范畴的新效用——既包括老年人数字素养与生活质量的提升，也包括代际互助、社区凝聚力增强等社会治理价值的溢出。这种无法被单一主体预先设计的整体效益，正是系统适应性达至成熟阶段的涌现性结果。已有实证研究亦表明，参与老年教育对维持老年人社会联结和提升晚年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效应 [11]，这与 WHO 倡导的健康老龄化战略目标高度一致。

技术嵌入解决“能否运转”的前提，制度耦合解决“能否顺畅”的规则，价值涌现衡量“是否值得”的成效。三者构成“基础—保障—目标”的闭环反馈链，共同推动供给系统从低阶运行向高阶适应跃迁。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 CAS 视域下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的三维分析框架。该框架以 CAS 理论为总体解释逻辑，以技术嵌入、制度耦合、价值涌现作为系统运行的三个核心维度，通过主体互动、资源流动和信息反馈推动系统持续演化。三个维度既各有侧重，又共同作用于供给系统：技术创新推动制度优化，制度创新保障技术应用，二者共同促进教育生态持续演进，并通过学习反馈不断形成新的供给能力。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并非静态结果，而是技术、制度与主体协同作用下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

基于此，本文提出供给适应性的螺旋演进逻辑。第一阶段为生存适应，系统主要回应数字环境变化，

实现基础技术接入和教育资源数字化，避免老年学员被技术浪潮边缘化。第二阶段为功能适应，系统依托人工智能持续优化课程供给、教学组织和资源配置，通过学习画像和智能推荐实现精准化课程开发。第三阶段为发展适应，系统突破传统教育边界，通过教育、社区、养老和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形成开放共享的公益教育生态，推动供给体系由资源配置逻辑转向生态协同逻辑。

四、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的实现机制

CAS 理论认为，系统适应能力来源于主体之间持续互动与反馈学习，而非外部行政控制 [7]37。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的形成，同样是技术创新、制度调适和主体协同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结合前文分析框架，供给适应性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机制。

技术赋能机制。人工智能通过学习画像与需求预测，将原本模糊的群体性学习诉求转化为可操作、可匹配的个性化课程方案，驱动供给由经验导向转向数据驱动。人机协同模式则通过智能助教承接重复性知识讲解，释放教师精力以投入情感关怀与高阶思维引导，在不增加公益办学人力成本的前提下显著提升服务精度。技术赋能并非技术替代，而是通过“人机协同”优化教育供给结构，使技术真正服务于老年学习者的真实需求。

制度协同机制。适应性的提升依赖跨部门制度接口的开放性。老年公益教育涉及教育、民政、社区治理等多个领域，仅依靠单一部门难以形成持续供给能力。通过细化学分银行与时间银行的双向互认细则，依托智能合约实现学习成果与志愿服务时长的标准化互换，能够有效打通养老服务体系与终身教育体系之间的制度壁垒。制度协同的核心功能在于固化主体间的信任预期，降低反复博弈带来的交易成本。

生态演化机制。当技术赋能与制度协同持续累积，系统将自发突破课堂物理边界，向社区、家庭与数字空间延伸，形成“教育 + 康养 + 治理”融合共生的新型组织形态。在此生态中，老年学习者的角色由被动受助者转变为知识生产者与志愿服务供给者，其主动参与反过来成为驱动系统持续迭代的新变量。开放大学不再只是课程提供者，而逐渐转变为资源整合平台和终身学习枢纽 [5]12，推动供给系统由“资源依赖”向“能力生长”转型。

三种机制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在持续反馈中形成“技术赋能推动制度协同，制度协同促进生态演化，生态演化反过来倒逼技术升级”的正反馈闭环。这种循环演进机制使供给系统在持续互动中不断增强适应能力，体现了 CAS 理论所强调的自组织与涌现性特征。

五、结论与展望

人口老龄化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面临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由资源供给向能力建设转型的新要求。现有研究多从供需匹配、公共服务或数字教育等角度展开分析，对教育供给系统如何形成持续适应能力缺乏系统解释。本文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提出了“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这一理论概念，并围绕“技术嵌入—制度耦合—价值涌现”的三维逻辑，构建了其生成机制与演化分析框架。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出了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的理论概念，将适应性界定为教育供给系统通过持续学习、主体互动与资源重组不断提升供给能力和公共价值的动态属性，拓展了老年教育供给研究的理论视角。第二，在 CAS 理论基础上构建了技术嵌入—制度耦合—价值涌现三维分析框架，揭示技术创新、制度优化与价值创造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提出技术赋能、制度协同与生态演化三种实现机制及其正反馈闭环关系，阐释了教育供给系统由静态资源配置向动态能力成长转变的内在逻辑。

同时，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作为理论建构研究，主要依据 CAS 理论及已有研究成果开展概念建构与逻辑推演，尚未通过大规模调查数据验证理论框架的解释效度；提出的适应性维度及实现机制仍需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办学主体的实践进一步检验。

未来研究可围绕三个方向深化：一是开发老年公益教育供给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尝试将“供给适应性”操作化为技术响应速度、制度迭代周期、价值溢出密度等可观测指标，构建可操作的测量工具，对理论框架进行量化检验；二是依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机构等开展案例研究与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区域教育供给适应性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三是结合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新技术应用，持续关注数字技术对老年学习支持、教育治理及公共价值创造的影响，不断完善理论体系，为积极老龄化战略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 吴峰 . 从老龄化社会到深度老龄化社会：面向 2035 的中国老年教育政策分析 [J]. 远程教育杂志，2025,43(03):96-105.

[2] 孟艳 . 应对人口老龄化办好老年教育 [J]. 北京观察，2024(03):33.

[3]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EB/OL].(2025-01-19)[2026-07-13].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4] 魏顺平，范学健，江凤娟，等 . 老年教育供给与需求是否适配——基于开源大数据的我国老年教育服务体系画像研究 [J]. 当代职业教育，2025(02):100-112.

[5] 吴玉韶，李晶 . 学习是最好的养老：老龄社会背景下老年学习服务体系建构 [J]. 人口研（下转 34 页）

高职学生社区志愿服务中“思政引领—社工赋能”双向融合模式构建研究

周　玟

摘要：志愿服务是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实践育人的重要载体。本文厘清思政引领与社工赋能二者内在的契合关系，阐释双向融合生成逻辑，建构高职学生社区志愿服务“思政引领—社工赋能”融合实施策略。推动思政教育价值引领力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力深度融合，一方面纠正志愿服务“有温无度”的随意性弊病，另一方面破解服务实践“有技无情”的工具化困境，在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落实职业教育育人使命进程中充分彰显高职学生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高职学生；社区志愿服务；思政引领；社工赋能；双向融合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时代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公共建设、共创美好生活的重要实践形式。202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将志愿服务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校社会实践体系。政策文件为高职院校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体系化育人提供制度支撑，同时对志愿服务育人成效提出更高要求。当前我国注册志愿者已超 2.4 亿人，高职学生作为青年志愿者服务重要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帮扶、助老扶幼、乡村振兴等各类服务实践。立足这一现实，本文构建“思政引领 + 社工赋能”双向融合模式，探索思政价值引领与社会工作专业

（上接 33 页）

究 ,2025,49(02):3-16.

[6] 高茜 , 许玲 .“互联网 +” 时代美国老年教育服务供给模式探析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28(33):34-40.

[7]Holland J H.Hidden order:how adaptation builds complexity[M].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95.

[8]Byrne D,Callaghan G.Complexity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the state of the art[M].London:Routledge,2014.

[9]UNESCO.Embracing a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s of education initiative[R]. Hamburg:UNESCO Institute for Lifelong Learning,2020.

[10] 陈功 . 以时间银行开发利用我国老年人力资本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1(24):61-67,135.

[11]Bowling A.Enhancing later life:how older people perceive active ageing?[J].Aging&Mental Health,2008,12(03):293-30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代际共学双螺旋：消解湾区老年数字鸿沟的思政育人新范式”（2025GXSZ153）；2025 年度中国成人教育协会课题“数智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学分银行建设的协同治理研究：理论框架、机制设计与政策实验”（2025-0705Y）；2025 年度佛山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数字化时代社区教育赋能社区治理的协同机制与低成本路径研究——探索能力建设转型与治教价值融合的佛山路径”（2025-SQYB45）；广东省成人教育协会 2026 年度成人继续教育科研规划课题“代际共学赋能老年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与机制研究”（Ycx262040）；2026 年度佛山市社会科学规划共建项目“‘一核五翼’背景下佛山‘银发专家’效能优化的代际共学机制研究”（2026-GJ263）。

（作者：杨礼芳，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教授；李慧，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讲师；潘美意，广东开放大学〈广东理工职业学院〉三级教授）

方法在志愿服务中协同发力的实现途径，为高职院校提升社区志愿服务育人质量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方案。

一、思政引领与社工赋能的内在契合性

（一）思政引领的价值导向与社工赋能的专业理念相互贯通

思想政治教育以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旨在培育具有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意识的时代新人。社会工作秉持“助人自助”这一根本理念，在服务的过程中重视对服务对象的尊重，努力调动服务对象自身的积极性。二者的价值取向非常一致。思政教育为社工赋能，可以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伦理界线，避免专业技术成为简单工具[1]。社工赋能可以给思政教育提供具体的实践载体，把宏大的价值叙述转变成微观的利他行为。譬如，在帮扶社区孤寡老人时，思政元素促使志愿者产生尊老敬老的道德自觉，社工技巧使志愿者用同理心和沟通技巧解决实际问题，两者共同构建了完整的育人链条。

（二）思政引领的育人目标与社工赋能的助人目标彼此同向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育要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服务[2]。该目标决定高职教育不仅要传授技能，还要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思政引领以学生政治认同、职业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为主要内容，属于立德范畴。社工赋能重在通过实务训练来提高学生的资源整合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属于“强技”。在社区志愿服务场景，“立德”和“强技”不是互相脱离的两个概念。志愿者在服务社区弱势群体时，也在自我社会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成长。目标同向性使思政教育和社会工作方法可以在同一个实践场域中同时进行且不产生冲突。

（三）思政引领的集体主义取向与社工赋能的社区参与取向功能互补

思政教育强调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提倡个人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社会工作重视“人在情境中”，重视借助社区参与来解决个人同环境之间的互动问题。高职学生正处在自我认同形成的重要时期，容易陷入狭隘的个人主义视野中。思政引领可以依靠宣讲国家政策、弘扬雷锋精神促使学生产生超越小我的集体意识。社工赋能则借助组织社区议事会、邻里互助小组等手段，鼓励学生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让其在具体事务中感受集体行动的价值。前者给予宏观的精神力量，后者赋予微观的行动方法，二者互相补充，较好解决志愿服务中“知易行难”的断层问题。

二、高职学生社区志愿服务中“思政引领—社工赋能”双向融合的生成逻辑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高职学生的成长成才不能脱离社会实践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认为，教育是促使个体实现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其中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社区志愿服务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形式，给高职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认识国情、磨炼意志的场所。思政引领遵循意识形态建构规律，解决“为谁服务”的认知问题；社工赋能遵循社会工作的实务规律，解决“如何服务好”的能力问题。从本质来看，两者融合其实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导下，对高职学生认知结构和行动结构做系统性重塑，此举符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以帮扶社区低收入家庭为例，思政元素引导志愿者树立共同富裕的信念，社工技巧指导志愿者用优势视角发掘家庭内生动力。两者贯通可以避免思政教育的空洞说教，也可以纠正社会工作中出现的价值中立偏差，实现政治性、思想性、专业性的辩证统一。

（二）现实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对职教人才的迫切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现阶段存在老龄化加重、流动人口服务、心理健康支持等诸多问题。高职院校是区域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方，理应对基层治理人才缺口做出回应。目前高职志愿服务大多采取“输血式”的慰问方式，缺少对社区问题的准确识别和长期干预。社工赋能加入需求评估机制之后，可以要求高职学生选用专业仪器检测、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给社区提供各种“造血式”解决办法。以人工智能学院学生为例，其可以把社工调研所得的老旧小区居民需求信息运用到智能改造方案设计中。这一融合模式直接把高职学生技术优势变成社区治理效能，满足了基层社会对于高素质应用型服务人才的实际需求。

（三）价值逻辑：德技并修职教方针的内生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深刻揭示职业教育的价值属性。长期以来，高职教育存在“重技轻德”或“德技两张皮”现象。在志愿服务领域，部分学生掌握了电工、护理等硬技能，但是他们缺少职业操守和服务意识；部分学生空有服务热情，其技能不足且服务低效。思政引领、社工赋能模式即为破解该难题的创新之举。思政引领保证志愿服务不偏离公益初心，社工赋能为思政教育赋予生活质感，防止德育空洞化。两者融合之后不但可以提

高志愿服务的含金量，在更深层次也能够实现“红”（政治底色）和“专”（专业技能）的有机结合。

三、高职学生社区志愿服务中“思政引领—社工赋能”双向融合的实践策略

（一）强化价值引领，锚定志愿服务育人方向

思政引领属于双向融合模式的方向保证，决定着社区志愿服务“为谁服务”“培养什么样的人”等根本问题。将价值引领融入志愿服务的全过程之中，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在服务动员阶段厚植价值认同。志愿服务动员不能停留在“召集人手完成任务”层面，而应通过讲述志愿服务同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之间的内在联系，充分强化学生的参与动机和价值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回信中指出，青年“在促进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自身也得到历练和成长”[4]。高职院校应让学生在参与之初就形成对志愿服务意义的深刻认识。二是在服务实施阶段嵌入即时育人契机。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的价值观形成是从观察、模仿到内化的过程。高职学生的价值认同不是靠一次性的说教来形成的，而是在不断地互动服务中慢慢加深的。指导教师在服务过程中要敏锐地发现教育的契机，当学生和服务对象产生情感共鸣时，当学生在解决困难的过程中体会到集体的力量时，及时引导学生把感性的体验上升到价值的认知上，把服务的行为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联系起来。三是在服务总结阶段，引导学生完成价值反思与意义建构。反思是价值内化的重要部分。经由组织反思会、撰写服务心得等形式，促使学生在回顾服务经历的过程中提炼认识、升华感悟，把具体的服务体会变成稳定的信念。思政教师在此环节可以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把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点滴体会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等宏大叙事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实现由“做了什么”到“意味着什么”的认识飞跃。

（二）引入专业支撑，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

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引进，是解决高职志愿服务质量不高、育人不深问题的重要手段。社会工作专业优势集中在需求评估、方案设计、过程督导、效果评估层面。

一是在需求评估层面，改变以往“拍脑袋定项目”的粗放式方法，用社会工作专业的手段来开展科学的需求调查。运用问卷调查法、焦点小组法、参与式观察法等了解社区居民真实需求和急难愁盼。经过研究发现，社会工作依靠需求评估、资源整合以及项目管理这些专业手段，把志愿服务由原来的“直觉式供给”变成现在的“证据导向型服务”[5]。只有以精准的需求评价为基础来开展服务的设计工作，才能避免出现服务供给同群众需求相脱节的状况，从而让志愿服务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二是在方案设计阶段，直接把思政育人目标转化为可执行的服务任务，融入社工服务方案的各个环节中。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种方法皆可承担价值观教育的具体任务。个案工作可以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共情能力，小组工作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和互助精神，社区工作可以培养学生的社区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服务方案设计则要兼顾解决社区实际问题和培养学生思想品质的双重产出，让每一次的服务都成为一次“行走”的思政课。三是在过程督导环节，着重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在志愿服务全流程中督导的作用。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形成一个从培训、实务、反思到提升的闭环，即专业社工对志愿者进行沟通技巧、服务伦理、风险防范等各方面的培训和督导。专业社工在服务开展期间可以参与其中，给予志愿者针对性和专业性指导，从而保证服务品质。四是在效果评价方面，优选社会工作专业评价的方法，分别从服务对象的满意度、问题解决的程度、学生成长变化等各个方面来评价服务效果。科学效果评价不但可以检验服务是否有效，而且可以给后续的服务改进提供依据，使志愿服务在不断改善中提高专业水准。

（三）完善制度保障，构建双向融合长效机制

双向融合模式由“理念倡导”转向“常态运行”，需靠系统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一是创建双师协同机制，这是制度保障的第一要务。从实践来看，高职院校要全力打造思政教师和社工导师共同参与的指导平台载体，让思政教师的价值引领优势同社工导师的专业指导优势在服务全过程中形成合力。譬如，建立集体备课制度，要求思政教师和社工导师一起制定服务方案，在方案中考虑育人目标和服务目标。同时，建立联合督导制度，要求两类指导教师在同一个服务场景中实现分工合作、互相补充。如有需要，还应建立定期沟通制度，及时交流服务进展情况和学生发展情况，共同调整指导策略。二是把志愿服务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把志愿服务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和学生社会实践”[6]。高职院校应把志愿服务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赋予一定学分，直接把志愿服务由“课外活动”提升为“必修环节”。如今，国内部分院校建立了志愿汇和第二课堂双轨制，此举实现了志愿者注册的全覆盖、过程的规范化，这一实践值得学习。

此外，健全激励评价机制是制度保障的重要补充。创建“思想成长 + 专业能力”的双维评价指标体系，从价值认识加深、服务技能改善、社会责任增进等各方面评判学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的发展情况。同时，对指导教师工作量认定和绩效考核也要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给双师的长期参与提供正向激励。

（四）拓展场景落地，推动服务模式多元转化

双向融合模式生命力在于落地实践，落地实践的核心即为找到服务场景、创新服务方式、形成可复制的服务模式。首先，应立足专业特色，开展融合型服务项目。高职院校专业应紧密联系行业需要设置专业，进一步强化学生技能，力求为志愿服务与专业实践深度融合赋予天然条件。例如，结合涉农专业优势，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漳州科技职业学院组织学生深入社区果园，协助农户开展杨梅、荔枝等特色农产品的农残检测与品控把关，既解决了农户面临的技术难题，又让学生在生产一线体悟了“工匠精神”与社会责任；结合技术优势，开展科技惠民服务。漳州科技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学院组织学生走进社区、走进中学，现场展示人工智能机器人及无人机的操作与维护，在普及前沿科技知识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自信与职业认同感。这些实践表明，志愿服务与专业学习深度融合，既能提升服务的专业水准，又能加深学生对专业社会价值的理解，实现“育人”与“服务”双赢。

其次，以社区治理痛点为依托打造品牌化服务项目。社区治理所面对的人口老龄化、留守儿童、社区融合等问题既是志愿服务的发力点，又是思政教育和专业方法的交汇处。以“一老一小”为重点人群，以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矛盾纠纷调解为重点领域，设计“思政引领＋社工赋能”融合项目，使学生在解决社区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加深对社会的理解，在服务重点群体的实践中增强责任担当。例如，漳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前往幼儿园开展“童心绘梦”志愿服务，教授小朋友绘画，在传递温暖与关爱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耐心、爱心及职业使命感。这能引导学生在解决社区真实问题中加深对社会的理解，在服务重点群体的实践中增强责任担当。

尤为关键的是，建立校地共建机制以达到服务的常态化，这是场景拓展的保证条件。国内高职院校应主动与社区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创建覆盖街道（社区）的实践基地，把志愿服务融入县域发展中。高职院校要主动对接社区需求，创建起长久稳定的联系，让志愿服务由“一阵风”变成“长流水”，从而为双向融合模式的持久运作赋予稳固的实践环境。

四、结论

高职学生社区志愿服务“思政引领—社工赋能”双向融合模式，是顺应新时代职业教育育人规律、基层治理需求的创新探索。该模式依托价值贯通、目标同向、功能互补的内在逻辑，弥补传统志愿服务价值引领虚化、专业支撑薄弱等短板。随着产教融合持续深化，这一融合模式在实践育人、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价值，有待在更多院校实践中持续检验、拓展完善。

参考文献

[1] 靳萌珠，杨炯 . 高职院校社区志愿服务体系优化路径初探 [J]. 应用技术教育研究 ,2026(01):1-7.

[2] 叶雪美 . 高职院校学生志愿服务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11):147-149.

[3] 徐艺凌 . 高职学生社区志愿服务的实施现状及路径研究 [J]. 教育科学论坛 ,2024(15):72-74.

[4] 冯红，李旭 . 高职院校社区志愿服务长效发展问题及路径探究 [J]. 机械职业教育 ,2024(02):40-44.

[5] 张志明，钟江颖 . 高职院校大学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实践探索 [J]. 才智 ,2023(21):137-140.

[6] 谭铮铮 . 高职院校大学生社区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及优化路径 [J]. 南方职业教育学刊 ,2023,13(04):62-67.

（作者系漳州科技职业学院研究实习员）



佛山市社区教育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中的作用研究

王保生

摘要：基层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社区教育是激活社区内生力量、培育基层治理主体、完善城乡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本文以佛山市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社区教育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中的功能定位、作用机制及实践路径。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调研与大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社区教育—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三维理论框架，揭示社区教育在组织架构创新、资源整合优化、能力建设提升等方面的实践逻辑。基于佛山市四级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成效与调研数据，提炼“需求导向—能力建设—制度保障”闭环培育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佛山方案”。研究成果可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社区教育赋能基层治理创新、培育基层自治主体、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佛山市；社区教育；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基层治理创新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将社区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纳入国家战略布局。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与基层治理的柔性载体，是凝聚社区力量、培育自治主体、提升居民素养、夯实治理根基的关键路径。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社区教育服务社会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外包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志愿力量参与社区教育建设，构建多元协同的社区治理格局[1]。《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进一步要求扩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快发展城乡社区老年教育，推动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为社区教育发展指明方向[2]。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省在“十四五”规划中将社区教育列为终身教育体系三大抓手之一，提出建设 100 个社区教育示范基地和 150 个创新区的具体目标，推动其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3]。佛山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其社区教育发展具有典型示范意义。2021 年《佛山市“十四五”社区教育发展规划》创新提出“一区一品、一镇一特”项目化推进思路，配套《促进办法》构建市—区—镇—村四级网络体系。2022 年正式施行的《佛山市社区教育促进办法》，作为广东省首部社区教育地方性法规，构建起“市—区—镇—村”四级教育网络、人均每年 2 元专项经费、多部门联席会议、绩效考核闭环的制度化保障体系，形成特色鲜明的社区教育治理“佛山范式”[4]。

当前学界多聚焦于社区教育单一功能、社会组织运营困境或志愿者队伍建设短板，对三者协同赋能机制、地方本土化实践路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立足佛山实证实践，突破传统社区教育单向知识输送的认知局限，构建“能力建设”与“资源整合”并重的治理框架[5]，精准剖析社区教育培育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的核心机制，总结成熟实践经验，兼具理论创新价值与基层实践指导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际研究中，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区教育可通过强化邻里互动积累社会资本；新公共服务理论凸显其多元主体合作纽带价值；人力资本理论聚焦其对公民能力的提升作用。国内研究中，李娜等以连云港为例，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教育中承担多元角色，但面临政策、运营、资源困境[6]；丁红玲等指出志愿者队伍存在管理制度、服务精准度、专业能力短板[7]。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主体，缺乏三者协同机制及地方特色实践方案，为本研究留足空间。

（二）理论框架构建

本研究构建了“社区教育—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三维理论框架。该框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强调社区教育通过增强社会联系积累社会资本；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指导，主张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以人力资本理论为支撑，关注个体能力提升。框架包含组

织架构创新、资源整合优化、能力建设提升三个维度，形成“需求分析—能力建设—制度保障”的闭环系统。

三、佛山市社区教育实践现状分析

目前，佛山市已构建“四级网络 + 专项经费 + 绩效考核”的政策体系。市—区—镇—村四级网络实现全覆盖，每个镇街至少建成 1 所社区学校、每个村居建成 1 个学习中心。财政保障方面，市、区财政按常住人口每年人均不低于 2 元标准安排专项经费。绩效考核已纳入政府年度工作，形成“规划—实施—评估”的闭环管理。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有效解决跨部门协作问题，项目审批周期缩短至 15 天。通过实地调研发现，佛山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呈现“政府主导—社会承接—居民参与”的三级结构。以禅城区“数字素养提升”项目为例，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开发针对性课程，提升居民数字技能。南海区桂城街道创新“社会组织孵化器”模式，培育出“粤剧传承”“智慧养老”等 12 个特色品牌项目。顺德区建立“社区教育联盟”，整合教育、民政、文广旅体等部门资源，形成协同治理网络。目前志愿者队伍呈现“专业化 + 多元化”特征。顺德区建立“志愿者学院”，实施“服务时长兑换奖励”制度，吸引年轻志愿者参与。

四、作用机制与路径分析

佛山市社区教育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志愿者”三级网络实现组织架构创新。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保障，社会组织承接具体项目，志愿者参与服务实施。在资源整合优化机制方面，社区教育通过平台建设实现资源整合优化。建立“社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整合 1.5 万件数字化资源，实现跨区域学分互认。通过“需求调研—课程开发—效果评估”闭环管理，确保资源精准对接需求。在能力建设提升机制方面，社区教育通过培训体系与激励机制实现能力建设提升。建立“志愿者星级评定”制度，根据服务时长与质量评定星级，给予相应奖励。开发“数字技能培训”课程，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通过“高校—社区”共建模式，引入高校资源提升培训质量。

五、“佛山方案”的制度设计

（一）宏观政策框架

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教育、民政、人社、文广旅体等部门协同机制。制定专项经费保障办法，确保财政投入持续稳定。将社区教育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建立“规划—实施—评估”的闭环管理体系。完善志愿者星级评定标准与奖励办法，建立激励机制。

（二）中观实施路径

构建“需求调研—课程开发—效果评估”的闭环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对接需求，开发针对性课程。建立“社区教育学院 + 社会组织孵化器 + 志愿者培训基地”三位一体模式，形成培育网络。实施“品牌项目”计划，培育特色品牌项目，如南海桂城桂园社区“三大学堂”模式使居民参与度提升 40%。

（三）微观操作细则

制定社会组织承接项目标准与评估办法，确保项目质量。开发数字技能培训课程包，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建立“高校—社区”共建机制，引入高校资源提升培训质量。制定志愿者服务时长兑换奖励制度，吸引年轻志愿者参与。建立“时间银行”通兑机制，使志愿者留存率提升 25%。

六、调研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一）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一是参与度与满意度方面，社区教育参与率达 70%（213 人参与），其中每月一次为最主要频率（50%）。满意度方面，60% 的居民选择“满意”或“非常满意”，仅 10% 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参与率统计图显示，南海区（35%）、顺德区（32%）参与率显著高于高明区（8%）、三水区（9%）。二是信息获取与认知方面，社区公告（40%）和社交媒体（30%）是居民了解活动的主要渠道，渠道统计图显示传统渠道仍占主导。社会组织认知度呈橄榄形分布：40% 选择“了解”，15%“不了解”，需加强精准宣传。三是志愿者服务评价方面，60% 的居民认可志愿者服务（“好”或“非常好”），但 5% 认为“差”或“非常差”，满意度统计图提示需优化服务质量管理。四是需求与建议方面，居民最希望增加文化教育类（30%）和技能培训类（25%）活动，活动需求统计图显示实用型课程需求突出。建议集中于加强宣传（30%）、提高服务质量（30%）、增加活动种类（30%），区域参与率统计图显示区域资源分配需优化。五是从培育不足分析，资源不足（40%）是首要问题，宣传不够（30%）、参与渠道有限（20%）次之，需针对性地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二）深度访谈数据分析

一是实践现状与典型案例方面，社区教育开展形式以文化讲座（提及率 100%）、技能培训（83%）、亲子活动（67%）为主，禅城区侧重亲子活动，南海区突出技能培训，顺德区强调文化传承。合作案例包括青年志愿者协会参与社区服务支援（4 次），环保协会联合开展环保宣传（3 次），老年协会合作开发老年教育课程（2 次），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志愿者”三级联动模式。二是在培育机制与效果评估方面，通过培训课程（100%）、资金支持（83%）、场地提供（67%）等措施，实现“提升参与度”（75%）、“增强组织能力”（60%）、“扩大影响力”（50%）的效果。志愿者管理采用线上招募平台（83%）、定期培训体系（75%）、星级评定制度（60%），形成“招募—培训—管理—激励”

全流程机制。现存的主要不足包括资金短缺（提及率100%）、人才匮乏（83%）、制度不完善（67%）、参与渠道有限（50%）。具体挑战涉及资源不足、参与度低、协调困难等。建议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培训体系、优化政策环境；实践创新包括拓展合作网络、创新活动形式等方面。未来的方向将聚焦社会治理与终身学习体系构建。

（三）网络数据挖掘核心结论

《佛山市“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教育行动方案（2023—2027年）》提出2025年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2027年实现城乡教育融合，五区达到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标准。举措包括新增公办学位47万个，优化城乡学校布局，推进特殊教育普惠融合，强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佛山市社区教育促进办法》确立四级网络与人均年2元专项经费，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教育、民政、人社、文广旅体协同治理。禅城区“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通过秋假研学活动实现家校社联合育人；佛山开放大学“青禾计划”孵化32个项目惠及10万人次。数字化赋能案例包括“社区数字教育直通车”计划针对老年群体开设“银发数字管家”课程，佛山终身学习网整合超1.5万件数字化资源。青年群体（68.2%）偏好图书馆学习，中年（20.5%）、老年（11.3%）群体参与度低，需开发适老化、本土化内容。居民对“政府机构”“教育机构”信任度最高，对“企业”“科研机构”参与社区教育持谨慎态度，需建立透明化合作机制。

七、现状诊断、现存挑战与优化对策

（一）现状诊断

一是从政策执行维度诊断，四级网络建设全市完成率达98%，但专项经费使用效率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南海区85% vs 高明区60%），需建立动态监管机制。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有效解决了跨部门协作问题，但会议频次（平均每月1次）与决策效率（项目审批周期15天）仍需优化。二是从实践效果维度诊断，70%的居民参与过社区教育，60%的居民满意度达“满意”及以上，但老年群体参与度仅11.3%，需开发适老化课程。成功孵化32个社会组织，培育志愿者队伍超5000人，但专业能力培训覆盖率仅40%，需完善“培训—考核—认证”全流程。三是从社会参与维度诊断，社区公告（40%）和社交媒体（30%）为主渠道，老年群体更依赖线下渠道，需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宣传。青年群体偏好图书馆学习（68.2%），中年群体参与度低（20.5%），需开发职场技能、亲子教育等针对性课程。四是从资源分配维度诊断，禅城区资源最丰富（人均2.5元），三水区最匮乏（人均0.8元），需通过“强区带弱区”实现资源倾斜。佛山终身学习网整合1.5万件资源，但老年群体数字技能不足，需开发“银发数字管家”等适老化产品。

（二）挑战应对

一是区域发展不平衡，通过“市级统筹、区级主导、镇街落实”的分级管理机制，实施强区带弱区资源倾斜，力争2025年区域人均资源差距缩小至1.5倍以内。二是补齐专业能力短板，例如，通过完善“高校—社区”联合培养机制，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社区教育专业方向年培训量提升至1500人次，专业能力认证覆盖率从40%提升至70%。三是数字化利用不足，通过推进“银发数字管家”“一键呼叫”等智能服务，2025年实现老年群体数字技能培训覆盖率达60%，智能服务使用率提升至50%。四是突破参与渠道局限，通过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宣传体系，拓展社交媒体、朋友推荐等多元渠道，2025年参与渠道增至10个，青年群体参与度提升至40%。

八、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佛山以地方性法规为支撑，构建“制度—资源—协同”三位一体框架，实现社区教育全域覆盖。政策、平台、培育、管理四维路径形成闭环，顺德“微创投”项目成功率80%，验证了全流程管理模式的有效性。目前已形成特色“佛山方案”，但区域失衡、能力短板、数字化不足、渠道局限等问题仍需破解，数字化赋能、多元参与为其提供新机遇。

（二）未来展望

未来佛山市需持续优化培育体系：深化资源均衡配置，完善经费监管；健全四方联动培训体系，优化激励机制；推进数字化转型，力争2029年全面实现老年群体数字素养提升与智慧服务全覆盖；拓展“社区教育+”跨界模式。力争2030年建成高质量社区教育育人体系，2035年打造全国社区教育赋能基层治理示范标杆，为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佛山经验。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有关情况 [EB/OL].(2016-07-29)[2026-01-23].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xwfbh_2016n/xwfb_160729/160729_sfcl/201607/t20160729_273303.html.

[2]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EB/OL].(2021-09-23)[2026-01-23]. https://www.gd.gov.cn/zwgk/gongbao/2021/31/content/post_3644881.html.

[3]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EB/OL].(2022-06-06)[2026-01-23].https://www.foshan.gov.cn/gkmlpt/content/5/5309/mpost_5309887.html#38.

（下转41页）

基于“一站式”服务平台的高校学生突发困难应急资助敏捷响应模式构建与应用

马红娟

摘要：高校学生突发困难应急资助工作长期面临识别机制滞后、审批流程繁复、数据分散割裂三重现实困境，传统资助模式在响应速度与精准程度上均难以满足突发性需求的时效要求。本文以敏捷管理理论为分析框架，提出基于“一站式”服务平台的应急资助敏捷响应模式，从主动感知、快速决策、即时支付、闭环反馈四个层面系统构建模式框架，并结合某省属高校的实践数据验证模式效果，结果表明响应周期显著压缩、学生满意度大幅提升，为高校精准资助体系建设提供可操作的制度路径。

关键词：“一站式”平台；应急资助；敏捷响应；精准资助；学生资助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明确资助工作需从“保障型”转向“发展型”，育人理念要贯穿资助全过程。政策导向已然明确，而传统资助模式的不足愈发突出。高校学生突发困难事件往往没有预兆，家庭经济骤变、重大疾病、意外事故，这些情境都能在极短时间内将学生推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对“发展型”资助的落地构成直接挑战[1]。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资助资金的总量，而在于制度响应的速度与精度：识别机制依赖年度周期、审批链条层层串联、学生数据分散于各自为政的系统之间，三重结构性缺陷叠加，导致学生的急迫需求与制度性供给之间产生明显的时间错位，部分学生在漫长的等待中被迫转向借贷乃至辍学，资助工作的育人价值因此大打折扣。教育部推进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了现实路径，平台汇聚的多维学生数据与贯通的跨部门业务流程，在技术层面已具备支撑应急资助敏捷响应的基础条件。本文以敏捷管理理论为分析框架，系统梳理当前高校应急资助工作的现实困境，提出敏捷响应模式的构建路径，并结合高校具体的实践数据加以验证，为高校精准资助体系建设提供可操作的制度参考。

一、高校学生突发困难应急资助的现实困境

（一）识别机制滞后，需求响应存在时间损耗

高校现行的困难学生识别机制大多以学年为周期，依托家庭经济情况认定表、家访记录及辅导员日常观察等传统手段开展信息采集工作。这套机制在评估学生的长期贫困状态方面尚有一定准确性，但对于家庭经济状况在学年中途发生骤变的学生，却几乎没有有效的动态捕捉能力，两者之间的落差相当明显[2]。部分学生因自尊心较强或对资助政策了解不足，不愿主动向辅导员或资助中心求助，突发困难长期处于“隐性化”状态，学校的主动发现机制在这类群体中基本失效。从现实操作层面看，资助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与学生数量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辅导员主动识别困难信号的实际能力因此被进一步削弱，识别机制的被动性特征成为陷入响应速度的第一道瓶颈，这道瓶颈不突破，后续流程的优化效果会大打折扣。

（二）审批流程繁复，资金到账周期难以压缩

高校应急资助的资金审批流程通常包含学生申请、辅导员初核、学院审核、资助管理部门复核、财务部门拨款等多个串联环节，大多数高校走完这套流程需要 5 至 15 个工作日。学生在遭遇医疗急救、家庭变故

（上接 40 页）

[4] 路长明，孙晶姝 .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社区教育管理研究 [J]. 成人教育 ,2024(04):89-93.

[5] 俞文忠 . 试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问题 [J]. 就业与保障 ,2023(09):61-63.

[6] 李娜 .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的现状研究——以连云港市为例 [J].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 ,2020(03):72-74.

[7] 丁红玲，杨尚林 . 政府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教育策略研究 [J]. 职教论坛 ,2019(11):101-10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佛山市“社区教育赋能社区治理”专项研究课题“佛山市社区教育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中的作用研究”（2025-SQYB21）。

（作者单位：广州工商学院）

等紧急情境时，超过一周的资金到账等待周期会对其基本生活保障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这不是一个可以用“流程规范”解决的问题[3]。各审批节点之间缺乏实时状态同步机制，申请材料在物理流转过程中容易出现搁置、遗漏等情况，审批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延误都会对整体时效产生累积放大效应。从更深层的制度逻辑看，财务部门的批量化拨款模式与应急资助对即时性的需求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制度张力，这一矛盾在现行条件下尚未得到系统性的制度回应，也正是本文试图重点破解的结构性难题。此外，部分高校在应急资助流程中仍保留大量纸质材料提交环节，学生须在紧急情况下奔波于多个职能部门收集盖章证明，既消耗宝贵时间，也在无形中加重了困难学生的心理负担，制度设计与人文关怀之间的落差在这一环节体现得尤为明显，亟须在流程再造中予以系统纠偏。

（三）数据分散割裂，精准识别缺乏信息支撑

高校内部涉及学生经济状况的数据分散存储于学工系统、财务系统、教务系统、后勤系统等多个相互独立的信息平台中，各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标准不统一，数据共享同时面临技术壁垒与管理壁垒的双重制约[4]。在这种条件下，资助管理部门在受理应急资助申请时，通常只能获取学生提交的纸质证明材料，无法实时调取消费行为、学业状态、宿舍出勤等多维间接信息，决策依据因此相当有限。数据孤岛现象的直接后果是资助决策主要依赖主观判断而非数据支撑，不同经办人员对同类困难情形给出差异悬殊的裁量结果，在实践中并不少见。资助的精准性与公平性难以得到客观保障，这一问题不只是技术问题，背后折射的是数据治理层面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短板。

二、敏捷响应模式的理论基础与框架设计

敏捷管理理论发源于软件工程领域，核心主张是以迭代、增量的方式应对复杂环境中的不确定性需求，强调快速交付、持续改进与跨职能协作。研究者将其核心原则转化为公共机构应对突发性需求的响应范式后，在应急管理、社会救助等领域均已得到实践验证[5]。回到高校学生突发困难应急资助这个具体场景，需求发生具有不可预测性、需求满足具有强时效性、需求处理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三项特征叠加起来，恰好与敏捷管理的适用条件高度契合，也共同指向对传统科层式审批模式进行变革的必要性。

从操作层面理解敏捷响应模式，可以将其拆解为三个相互支撑的维度。快速识别维度要求建立能够在24小时内完成初步评估的主动探测机制；快速决策维度要求压缩审批链条，赋予一线工作人员在一定权限范围内的自主决策权；快速交付维度则要求建立预授权资金池，实现资金在决策后数小时内到达学生账户。三个维度缺一不可，任何一环缺失都会导致整体响应链条断裂。模式的框架设计以“感知、判断、响应、反馈”为基本运行逻辑，四个阶段形成闭合的运转回路，每次完整的响应过程均为下一次响应积累经验数据，模式的整体效能随迭代次数的增加持续提升。

三、基于“一站式”平台的敏捷响应模式构建

（一）多源数据融合的主动感知机制

“一站式”平台通过建立学生生活困难预警数据模型，将校内食堂消费金额、图书馆访问频次、宿舍门禁记录、学业绩点变化趋势、心理健康测评结果等多维数据进行结构化整合，构建覆盖学生日常生活全场景的动态监测底座。这套模型采用异常检测算法，当学生的多项指标在特定时间窗口内同时出现显著偏离时，系统自动触发预警信号并推送至对应辅导员与资助管理员账户，由此将被动等待申请的传统模式替换为主动感知机制，思路上的转变是根本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在数据融合过程中严格遵循数据最小化原则，数据访问权限按岗位角色分级管控，每次数据调取均留存完整的操作日志以备审查。学生主动申请通道与系统主动预警通道在平台内并行运作，两套渠道的信息汇聚至统一的案例管理界面，资助工作人员可在单一界面内完成信息核验、类别判定与优先级排序工作，操作效率得以显著提升。

（二）分级授权的快速决策机制

敏捷响应模式将应急资助申请按紧急程度划分为三个等级。一级为涉及医疗急救、家庭成员死亡等极端紧急情形，资助金额上限设为5000元，授权辅导员在系统内完成一键审批，无需等待上级复核；二级为家庭遭受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严重困难情形，资助金额上限设为3000元，授权学院资助专员在接收申请后2小时内完成审批；三级为其他突发性经济困难情形，资助金额上限设为2000元，按压缩后的三步流程处理，总时长不超过1个工作日。分级逻辑的背后是一个基本判断：越是紧急的情形，决策链条越短，权力越应该下沉到距离学生最近的人手里。“一站式”平台的工作流引擎根据案例等级自动匹配对应审批路径，一线审批人员在平台内完成操作后，系统自动将结果同步至财务拨款接口，无需另行填报纸质凭证。平台内置的合规检查模块在审批结束后即刻完成自动化核查，检查项目覆盖身份核验、资助标准适配性、历史资助记录比对等维度，合规保障与响应速度之间的传统矛盾由此得以化解，全过程操作记录为事后审计提供可追溯的完整数据链。

（三）预授权资金池的即时支付机制

高校资助管理部门在年初预算编制阶段，按照上一年度应急资助实际支出金额的120%计提应急专项备用资金，该资金在财务系统中单独立账管理，不与其他资助科目混用。这一安排看似是个财务技术问题，实则是实现资金即时到账的关键前提。“一站式”平台与财务系统的支付接口打通后，获批申请可触发学

生账户直接转账功能，资金从审批通过到银行卡到账的时间间隔目标控制在 2 小时以内。对于一级紧急情形，平台支持生成应急临时借记凭证，学生可在校园一卡通关联账户中即时使用对应金额，正式划转在后续统一结算，差异由平台自动核销处理。预授权资金池的余额状态在管理端实时显示，当余额低于预警阈值时系统自动生成补充申请提示，所有拨付明细均完整存档，同时满足内控管理与外部审计的双重需求。

（四）全程跟踪的闭环反馈机制

“一站式”平台在每笔应急资助完成拨付后，自动向对应辅导员推送跟踪关怀任务，辅导员在资助后第 7 天与第 30 天分别完成两次跟踪记录，内容涵盖困难是否实质性缓解、资助金额是否覆盖实际需求、学生是否需要进一步综合帮扶等维度，结果作为结构化数据存入案例档案。跟踪记录不只是完成一个管理动作，其价值在于将散落在个案中的经验转化为可供系统学习的数据资产。平台对每笔案例的全程时间节点进行自动统计，生成各环节时间消耗报告，管理人员可识别响应链条中的薄弱节点并针对性优化制度安排。进一步看，每一笔经人工核实的真实困难案例均作为正样本补充进预警模型训练集，模型的识别精度随数据积累逐步提升，困难类型分布、高发时段、响应时效达标率等分析结果作为下一年度政策调整与预算编制的数据依据，模式由此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迭代能力。

四、模式应用实践与效果分析

某省属高校自 2022 年起系统推进应急资助敏捷响应模式的落地实施，该校在校生规模约 2.8 万人，资助管理团队由校级资助中心 4 名专职人员与 18 个学院的资助专员共同构成。模式上线前，应急资助的平均受理到拨付周期为 8.3 个工作日，学生对资助时效的满意度测评得分为 63.4 分（百分制），两项数据放在一起，已经相当直观地说明了问题所在。

模式全面运行后，数据的变化是系统性的，而非局部改善。平台预警模型在第一学年内共触发主动预警信号 347 次，经辅导员核实后确认为真实困难情形的比例为 68.3%，误报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辅导员的额外核实工作量并未因模式引入而显著增加。应急资助的平均受理到拨付周期压缩至 1.4 个工作日，较模式上线前缩短 83.1%；一级紧急情形的平均响应时间缩短至 4.2 小时，学生满意度测评得分从 63.4 分提升至 89.7 分。这一提升幅度在横向比较中同样具有说服力：同期对省内另外三所未实施该模式的高校开展对照调查，其应急资助满意度平均得分为 67.2 分，两组数据的差距直观呈现了模式改革的实际效益，也为模式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分级授权制度的引入使辅导员直接处理的案例比例从 0 提升至 41.3%，学院层面处理的案例比例为 34.6%，校级资助中心直接介入的案例比例降至 24.1%，权力下沉有效释放了一线人员的能动性。模式运行中也暴露了两类值得关注的现实矛盾：预授权资金池出现年末余额核销与下年度预算衔接的制度性障碍，该校通过与财务部门协商建立跨年度滚动备用金制度加以解决；部分辅导员出现规避一线决策责任的行为偏差，该校通过调整绩效考核指标与强化授权配套培训的方式在第二学年予以纠正。这两个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外，制度改革在执行层面遭遇阻力是常态，关键在于能否及时识别并给出针对性的制度响应。

五、结论

本文系统构建了基于“一站式”服务平台的高校学生突发困难应急资助敏捷响应模式，该模式以多源数据融合的主动感知机制破解识别滞后问题，以分级授权的快速决策机制突破审批流程瓶颈，以预授权资金池的即时支付机制解决资金到账延迟问题，以全程跟踪的闭环反馈机制支撑模式的持续优化，四个机制围绕“感知、判断、响应、反馈”的运行逻辑形成有机整体。实践数据表明，该模式能够将应急资助的响应周期压缩至传统模式的五分之一左右，学生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分级授权制度有效激发了基层资助工作人员的主动性，预警模型的识别精度随数据积累持续改善。需要坦诚指出的是，高校在推进该模式落地的过程中，数据隐私保护的边界划定、授权制度的刚性约束设计、预授权资金的跨年度管理这三个维度，目前仍是制度设计的薄弱地带，技术工具的引入与制度规则的完善需要同步推进，方能在提升响应效率的基础上保证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与资助结果的公平性。敏捷响应模式的推广应用，将为高校精准资助体系的持续深化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 高万豪 . “一站式”学生社区数字赋能发展型资助育人路径创新研究 [J]. 山西青年 ,2026(07):99-101.

[2] 刘裕章 , 陈晓敏 , 黄萍 . 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的价值、困境与路径——基于“一站式”学生场域视角 [J].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 ,2026,37(01):91-96.

[3] 王佳蕊 . 基于贫困大学生精准资助全过程管理的思考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5,24(24):239-241.

[4] 张海艳 . 大数据精准资助视域下高校学生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J]. 才智 ,2025(23):129-132.

[5] 武雯梅 . 新时代高校精准资助认定路径探索——以西北政法大学“地推式”谈话结合志愿活动为例 [J]. 中华志愿者 ,2025(07):102-10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山东省学生资助学会学生资助理论研究微课题“高校学生突发困难应急资助机制的‘敏捷响应’模式构建与应用研究——基于‘一站式’服务平台的视角”（2025WKTZ002）。

（作者系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讲师）

青年志愿服务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育人研究

姜景惠　刘雪杰　王浩然

摘要：本文探讨了青年志愿服务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中的作用，提出了若干有效的实施策略，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等方式，在实践中提升青年的思想政治觉悟，同时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提出分层设计志愿服务项目的策略，确保不同学段的学生能够参与并受益。文章还阐述了建立系统化评估与反馈机制的重要性，确保服务过程能够实时调整。本文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的实施提供了具体思路，旨在通过青年志愿服务更好地融合思政教育，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年。

关键词：青年志愿服务；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平台

随着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推进，青年志愿服务为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思政教育提供新机遇，依托大中小学一体化思政教育框架，志愿服务活动不只在校园举办，还延伸至社区、乡村和社会各层面，构建了遍及各处的社会化教育网络。参与志愿服务工作，让青年学生在实操岗位接受锤炼，提升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和创新意识，还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深化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使青年志愿服务在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时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作用，通过志愿者行动引导群众，推动思政理念落到实处，为营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添一份力。

一、青年志愿服务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的概述

国家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尤其是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覆盖整个教育体系，青年志愿服务已成为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青年志愿者在社会、社区、学校等各类场景的主动参与，志愿服务为思政教育打造出兼具生动性和真实性的实践平台[1]。这能进一步增强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还能培育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推进思政工作走进社会、扎根实践，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育人一体化模式，统筹不同层级的资源，让志愿服务覆盖各年龄段、各教育背景的群体，乃至更庞大的社会群体，做到思政教育全链条、全覆盖，取得普及性强的育人成果。依托青年志愿服务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和针对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更多具备责任感、使命感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人才。

二、青年志愿服务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的重要原则

（一）实践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思政教育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育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青年。在投身志愿服务期间，青年要亲身实践，去解决社会问题，在服务开展期间深入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志愿服务搭建起鲜活的实践平台，组织青年参与社区服务、公益活动、环保行动等，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服务内容摆脱了传统课堂教学框架，转而侧重于和实际社会需求深度绑定，引导青年以行促学，从实践中提升思想觉悟，通过创新志愿服务方式，依托现代科技手段，诸如互联网平台和移动终端，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服务模式，增强青年志愿者的参与感与认同感，实现思政教育创新突破。

（二）全员参与与全程育人相结合

志愿服务不仅是特定群体的责任，应当鼓励所有青年参与其中，形成全面覆盖的育人效应，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乃至社会群体，都应通过不同层次的志愿服务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将志愿服务纳入日常教育活动中，形成以学校为核心、社区为延伸的全程育人机制[2]。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体系下，各学校各学段应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不同认知特点，分阶段、分层

次、分步骤地开展思政教育，设计不同形式的实践育人活动，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志愿服务也应融入实践育人活动，通过顶层设计，确保志愿活动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能够促进学生思想认识的提升，从而实现全员育人的目标。

（三）理论指导与实践引领相结合

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有机融合，使青年在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体悟志愿精神，还能从中汲取理论的力量，提升思想政治觉悟，通过理论的指导，青年志愿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明晰社会责任，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3]。各学校、社会组织应紧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的要求，将小学、中学、大学各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系统设计和规划，实现各学段思政教育在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方面的纵向衔接、横向贯通，形成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育人体系。帮助青年志愿者夯实思想政治理论基础，从而不断完善自我，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走向更加生动的实践路径。

（四）多方协同与资源共享相结合

思政教育的常态化开展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包括学校、社区、家庭等多方参与，学校是思政教育的主阵地，社会是服务实践的重要载体，通过多方协同合作，能够更好地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志愿服务活动的广泛开展，确保每个学段的青少年都能参与其中[4]。依托教联体，联合家庭、社区开展传统文化实践活动，比如，“非遗进校园、进社区”“亲子传统文化体验营”“行走的传统文化课堂”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推动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同时，还可以邀请学校专家、非遗传承人进社区开展专题讲座，组织教师跨校交流、跟岗学习，共同提升协同育人能力，打造协同育人新范式。建立反馈优化机制，推动持续改进。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师生访谈等方式，收集家校社各主体对传统文化课堂改革的意见建议，形成“实践—反馈—优化—再实践”的闭环，保障教联体赋能效果持续提升。

三、青年志愿服务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的方法

（一）整合校内外资源

为了整合校内外资源，学校可以与社区、企业、公益组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多方协同的资源支持体系。学校应主动与社会各界联系，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定期组织联合活动，确保校外资源能够充分支持志愿服务。学校可以与社区合作，安排学生参与社区服务项目，为志愿者提供实践机会，帮助他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与企业合作，可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并借助企业的专业资源开展公益项目；与公益组织合作，可共同策划社会服务活动，为青年志愿者提供社会实践平台。通过对校外资源的整合，志愿服务活动能够更加多元化，从而丰富学生的实践经历，也能够确保思政教育的社会化[5]。学校需全面挖掘整合现有教学、科研、文化等各类资源，结合思政教育目标，打造多样志愿服务项目。学校可依托自有师资队伍，邀请对应专业的专家加入志愿活动，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依靠校内社团组织和学生会，统筹志愿服务活动，营造全校师生齐参与的环境；依托学校场地与设备资源，定期举办志愿服务项目的培训、交流和分享会，提升学生的参与度与收获感。学校可将志愿服务与学科课程相结合，引导学生依托专业课程开展社会实践，用好学科长处，对接社会需求。

（二）搭建实践平台

为搭建高效的实践平台，创建线上线下结合的多元化平台，促进青年志愿服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学校可以建立志愿服务的线上平台，如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发布志愿服务计划，方便学生随时随地获取志愿服务项目。平台可以设置任务模块，提供实时反馈渠道，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服务进展，线下平台可以依托社区、学校社团，定期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构建可操作的实地平台；线上平台可以与线下活动进行联动，通过实时数据共享等形式，增强平台的互动性，这不仅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也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实践机会。通过搭建契合实际的实践平台，推出一系列专题志愿服务项目，瞄准当前社会热点和思想政治教育需求，开设与环保、社区建设、老年人关爱相关的社会实践项目，引导青年学生参与这些专题活动，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学校可划拨专项资金改造校区的基础设施与教学培训场地，依据实际需求添置教学设备，建立专属教学场地、活动场地和工作场地等，完善硬件设施建设。例如某高校建设的“华商文化体验馆”，在传统教学环境中成功构建出一处文化与历史交融的创新型教学场景，利用数字化中国地图的形式，让参观者选择感兴趣的区域，深入了解当地的老字号，开辟“博物馆沉浸式学习”的新天地。同时学校可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国家级、市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等海量资源进行优化整合，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利用虚拟现实、互动教学、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方式，邀请大中小学生、社区居民走进学校，组织开展各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课程，让学校师生和社区居民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建立双向交流机制，发挥“1+1 ＞ 2”的作用，大力提高思政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构建大思政“学习型组织”的新生态。

（三）开展多元活动

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的背景下，可以

通过志愿服务活动，为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实践机会，这些活动可以将不同学科的知识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学校可以以社区教育项目为载体，充分运用好职业教育活动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平台，将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打造出一系列既具有创新性又贴近社区生活的志愿服务活动。这些活动涵盖了文化、科技、艺术等多个领域，旨在为不同年龄层、不同学段的青年志愿者提供服务岗位。例如开展木版年画、漆扇、脸谱、竹编画制作等非遗文化体验，“金融安全伴我行”金融知识讲座，智慧悦享—手机摄影培训，“智慧助老 乐享无忧”等一系列社区志愿活动，不仅能够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社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升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业务素质水平，更是为青年学子搭建了深入基层、服务社会的平台，激发了他们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四）设计分层服务项目

在设计分层服务项目时，根据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制定不同难度的志愿服务项目。小学阶段的学生可以参与一些简单的社区服务，旨在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初中阶段的学生可以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这些项目能帮助他们深化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并培养思辨能力；大学阶段的学生可以参与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志愿服务项目，这不仅能够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感，还能够提升他们的组织能力。每个层次的项目设计都要结合学生的成长需求，通过不同的服务内容，逐步引导学生提升社会意识。为了保持志愿服务的多元性，学校可结合学生兴趣，定制个性化服务任务，倡导学生在自身擅长的方向展现特长，提升服务实效。面向文科类学生，可策划文化宣传、历史遗产保护等相关志愿项目，引导他们运用所学开展社会文化服务；理工科学生可投身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项目，通过专业技能协助社区解决实际问题。学校可依据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的需求，将专业知识和社会服务相融合，开发跨学科综合项目，医学专业学生可投身医疗服务、健康咨询等项目，教育专业学生可开展青少年辅导活动，依托个性化服务任务，让学生在服务期间既能充分施展专业所长，又能体会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深远价值。

（五）构建反馈机制

为确保志愿服务活动的有效性，可以建立定期评估机制，系统化地评估每个志愿服务项目的实施情况。学校应定期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的总结会，邀请项目负责人、参与学生共同讨论服务项目的成效，在评估过程中，采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多种方式，收集参与学生的反馈，综合分析项目的实施效果。同时，学校可以根据不同年级的学生特点，设置不同的评估标准，并结合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的目标，重点关注学生的成长，评估结果应形成书面报告，及时反馈给相关参与者，特别是志愿者，以便他们了解自身的成长与不足，并根据反馈调整改进自己的志愿服务方式。促进志愿服务全程实时反馈，学校可搭建互动式反馈平台，方便志愿者和项目负责人进行信息沟通与协作，该平台可借助线上系统或社交媒体群组实现信息互通，学生和教师可随时在平台上发布服务进展、遇到的问题和优化方案，保障各方信息及时传达。借助这类实时互动，学生可同步获取指导，还可互相交流经验，树立团队协作理念。平台可增设专属模块，按期发布志愿服务活动的评价与反馈，依照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的要求，突出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成长。依托互动式平台，学校能及时汇总志愿服务中的问题，并迅速做出调整优化，让志愿服务兼具针对性，强化学生的参与感。

四、结语

青年志愿服务驱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实践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创新手段，具备重要的实践作用，通过推出分层服务项目、打造多元实践平台、统筹资源、建立反馈机制等办法，可有效将思政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社会参与能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目标并非只聚焦学术知识传授，还需加大力度落实思想政治理念的执行要求，志愿服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载体，学校、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联动协作，建立跨层级、跨学科的合作体系，为青年拓展多维度成长路径。未来，需进一步深化志愿服务和思政教育的融合，调整服务项目规划，优化反馈流程，推动青年志愿者在服务期间不断进步，切实做到奉献社会的同时，也实现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1] 申华，张翼，吴桦，等. 系统观视域下思政育人体系一体化设计的研究与实践 [J]. 大学教育，2025(14):91-98.

[2] 严艺方. “一体化 +”善小志愿体系的赋能实践 [J]. 当代电力文化，2022(03):82-83.

[3] 陈永芳，李艳珂，刘淑霞. 专业志愿服务赋能课程思政 [J]. 中华志愿者，2025(09):97-100.

[4] 卢佳，凌伟志. 数字赋能提升高校实践育人成效路径研究 [J]. 科研成果与传播，2024(07):185-188.

[5] 王娟. 数字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路径探析 [J]. 长江丛刊，2025(02):224-22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6 年度天津市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研究专项课题“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赋能大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课堂改革的路径与实践研究”(2026JXSGY13)。2025 年度天津市继续教育教学改革和质量提升研究计划项目“‘高校—社区’联动模式下终身学习联合体的建设路径与实践研究”（J2025046）。

（作者：姜景惠，天津商务职业学院讲师；刘雪杰、王浩然，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助教）

高职困难生“心理疏导＋社会支持”双轨帮扶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林　婷

摘要：高职困难生是指就读于高职院校且提出申请国家教育资助的学生。此类学生及其家庭尚不能完全提供所有上学费用，而且多面临着家庭收入低、多子女上学、家庭成员长期患病等问题，导致高职困难生难以实现全面发展或高质量就业。本文立足后脱贫攻坚时期与高校就业攻坚双重政策背景，针对高职困难生提出构建“心理疏导＋社会支持”双轨帮扶模式。该模式旨在通过重塑心理资本与重构社会网络，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功能转变，为高职院校提升资助育人实效、促进教育公平、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高职困难生；心理疏导；社会支持；双轨帮扶；精准就业

在高职院校中困难生占比仍较高，虽然这部分学生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是他们的家庭抗风险能力较弱，而且易因学、因病返贫[1]。《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表明，低收入人群的抑郁、焦虑等情绪指标的检出率比一般人群要高。高职困难生经济状况不佳，常常存在自卑、社交封闭等问题，从而阻碍其健康成长。一方面对其社会资本积累形成限制，另一方面又会致使其在就业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2024 年，教育部将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等就业困难毕业生列为就业帮扶对象[2]。在该背景下，打破仅仅依靠单一经济资助的路径，探索将心理帮助和社会资源对接融合的双轨帮扶模式，不仅是落实国家资助政策之举，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举措。

一、高职困难生“心理疏导＋社会支持”双轨帮扶模式概述

（一）心理疏导帮扶维度核心内容

心理疏导不是简单的病理矫治，而是针对高职困难生群体中存在的“心理贫困”现象进行预防性和发展性干预。此维度的关键是重塑学生心理资本。研究显示，长期经济压力容易让学生产生习得性无助且自我效能感低。从整体来看，心理疏导内容有认知重构、情绪管理和生涯辅导三大板块。认知重构是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贫困，去掉“因贫致卑”的负面标签；情绪管理重点是通过团体辅导和正念训练，减轻因经济差异导致的社交焦虑；生涯辅导主要是帮助学生探索职业兴趣和建立求职自信。《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高职院校应系统开展心理健康指导，丰富学生自主疏导心理压力的多元途径，提升学生心理自助能力[3]。譬如，系统心理赋能，使学生形成坚韧的人格品质，拥有直面困难的内在动力，由原来的“被动求助”变为“自我赋能”。

（二）社会支持帮扶维度核心内容

社会支持，即个体从社会网络中得到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对高职困难生而言，社会支持的缺乏比经济缺乏更具有破坏性。该维度的核心任务为建立一个由政府、学校、企业、家庭、同伴构成的多维支持网络。具体涵盖的内容有经济资本的持续投入、社会资本的扩展、人力资本的提升。在经济方面，除了国家助学金之外，还需要引入企业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岗位。在社会资本方面，重点处理信息不对称这一问题。譬如，借助建立校友导师制度、校企合作推荐等办法，为困难生搭建一条通向优质就业岗位的道路。在人力资本方面，高职院校应为其提供专业技能强化培训、通用软技能训练。简而言之，借助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一方面可以有效弥补困难生在家庭背景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为其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和资源，切实打破恶性循环。

（三）“心理疏导＋社会支持”双轨联动运行逻辑

双轨联动不是心理疏导和社会支持的简单叠加，而是内驱力和外助力互相影响、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它的运行逻辑是以内生动力激发为起点，依靠外部资源匹配、双向反馈加强的闭环式运行体系。心理状态

的改善可以提高学生对社会支持的接受程度和利用程度，防止他们由于自卑心理而出现“资源排斥”现象。同理，得到一份好的实习或者就业机会也会使学生对自身的能力有更加积极的看法，从而巩固心理疏导的效果。如此一来，可以冲破传统帮扶关系中“给钱不给志”或者“谈心不给路”的局限。教育部提倡的扶困、扶志、扶智相结合即为这一思想的生动表现。通过双轨并行，学生内在的心理韧性同外在的发展资源能够得到提升和增长，从而达到解困、育人的目的，甚至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二、高职困难生“心理疏导＋社会支持”双轨帮扶模式设计

（一）明确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设计目标

双轨帮扶模式的设计目标是推动高职困难生实现全方位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经济救济或者心理安抚等浅显层面。从宏观角度来看，教育扶贫的政策逻辑已从单纯的“保障入学”进一步拓展到“助力成才”。那么，帮扶工作的评价标准也需从单纯考量“是否解决经济困难”转变为关注“是否促进学生成长”。从个体角度来看，每一位困难生都是有着独特发展需求的个体，帮扶工作的价值在于协助他们摆脱困境、达成自我超越，而不是将其固定在“受助者”这一角色上。鉴于此，模式设计需要确立三个层层递进的目标：基础目标是要保障困难生的基本学习生活需求、心理健康安全；核心目标是提高困难生的心理素质、社会适应能力，强化他们的自我发展动力；延伸目标是帮助困难生达成高质量就业、构建可持续生计，切实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这三个目标分别对应着“保底线”“强能力”“促发展”的功能定位，共同建立起从生存保障到发展帮助的完整链条。

（二）构建“心理疏导”与“社会支持”双轨并行的内容体系

建立双轨并行的内容模式，首要任务是明确两条轨道各自的功能定位，然后达成内容板块的有序衔接、互补递进。心理疏导轨道应依照“预防—识别—干预—康复”四个环节来进行，主要内容涉及常态化心理健康教育与团体辅导、困难生心理普查与风险筛查、个体心理咨询与认知行为干预、危机预警与转介机制等。社会支持轨道包括三个维度，其一为制度支持，也就是落实国家和学校的各项资助政策，保证困难生都能得到帮助；其二是情感支持，借助家校协同、朋辈互助、师生结对等形式建立温暖的人际支持网络；其三是工具支持，提供勤工助学岗位、职业技能培训、实习实践机会、就业信息推送等发展性资源。需要注意的是，两条轨道的内容不是简单并列，而是构建双向互动循环：心理疏导助力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社会支持进一步舒缓心理压力，以此实现协同增效[4]。

（三）构建“识别—介入—评估”全链条闭环运行流程

全链条闭环运行流程要解决帮扶工作中“何时启动、如何推进、怎样判定成效”这些操作性方面的问题。首先，“识别”环节作为闭环的起始点，需要建立困难生精准识别、动态筛查机制。识别标准包括经济状况、心理状态、学业表现、社交关系等多方面指标，并非只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当作唯一依据。教育部规定对重点群体建立帮扶工作台账，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这为精准识别提供了政策方面的依据。其次，“介入”环节是闭环的核心部分，高职院校要依据识别结果实施分层分类的不同干预。譬如，对于有轻度心理困扰或者支持不足的学生，建议采用团体辅导、朋辈互助等普遍适用的措施；对于存在中度问题的学生，则需要进行个体咨询、定向资助等有针对性的帮扶；对于有重度心理危机或者支持系统严重缺失的学生，建议直接启动专业干预、多部门协同响应机制。最后，“评估”环节是闭环的关键之处，高职院校要建立过程性跟踪、阶段性效果评估制度，依照评估结果动态调整帮扶策略，达成从“识别”到“介入”再到“评估优化”的循环。全链条流程闭环运作，可以有效保证帮扶工作不断改进和提升。

（四）明确模式实施的适用边界与保障条件

双轨帮扶模式的运行并非易事，还需要明确其适用范围和保障条件。就适用范围而言，此模式主要针对高职院校中家庭经济困难、心理压力大或者社会支持缺乏的学生群体（高职困难生），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依靠心理疏导和社会支持积极满足困难生的复合型需求，而不是代替专业心理治疗或者社会保障制度。对已经确诊为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高职院校需要从宏观视角出发，为其提供值得信赖的支持性环境以及转介通道。从保障条件来说，模式的运转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支撑，即制度保障、队伍保障、资源保障和信息保障。制度保障就是把双轨帮扶纳入学校资助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制度框架中，明确各个部门的职责分工和协同机制；队伍保障则是配备好辅导员、心理咨询师、资助工作人员等各方力量，并加强跨领域合作能力的培训；资源保障，即统筹校内资助经费、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经费和社会资源，保证双轨运行的持续投入；信息保障则是建立困难生帮扶信息管理平台，实现识别数据、干预记录、评估结果的信息共享和动态更新。

三、高职困难生“心理疏导＋社会支持”双轨帮扶模式的实践路径与推进策略

（一）选择分层分类的实施路径

差异化是提高帮扶效能的关键所在。面向不同特征的困难生群体，高职院校应当施行分层分类的精准举措。对于经济极度困难并且伴有严重心理障碍的“双

困生”，首选“保姆式”跟进办法，推行心理教师与专业教师的“双导师”包干制度，提供从生活费补贴到心理治疗费用的全程兜底保障；对于经济困难然而学业优异的“励志生”，着重给予科研助手、参与学科竞赛的机会等“发展型”支持，助力其凭借知识改变自身命运；对于经济困难且学业滞后的“后进生源”，重点在于技能强化、行为规范，借助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达成入学便入职的目标[5]。这种分层分类的路径，可以保证有限教育资源流向最急需的学生群体。

（二）提倡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单一主体的力量不能解决复杂问题，必须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拨款和购买服务等方式保证资助经费的稳定投入，出台企业吸纳困难生就业的税收减免政策。高职院校要承担起主体责任，把双轨帮扶融入“三全育人”体系，促使心理咨询中心和就业指导中心的功能相融合。行业企业要承担起社会责任，除了捐款之外，还要为困难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实行“订单班”的定向培养。家庭要配合学校教育，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社会组织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为心理志愿服务、法律援助等提供专业支持。如部分省份所推行的“雨露计划 +”就业促进工程就是政府、学校、企业三者共同参与的典型[6]。经由多元主体的深度耦合，凝聚起全社会共同支持困难生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构建过程管理与动态调整机制

帮扶工作属于动态发展的系统性工程，必须构建灵敏的过程管理及调整机制。首先，创建“一生一策”的动态档案，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心理变化过程、受助状况以及就业意向的改变加以记载。同时，实行定期约谈制度，辅导员每月至少和困难生谈一次心，及时掌握困难生的思想动向和实际困难。其次，建立预警机制，当学生消费异常、学业成绩大幅度下降或者心理测评指标异常之际，相关系统应及时发出预警信号，相关部门立即作出反应。最后，建立退出、补充机制，对已脱贫并有良好心理状态的学生逐步降低直接干预程度，转为常态化的关注；对因家庭遭遇自然灾害等新出现的突发困难生及时将其加入帮扶体系。动态管理可以保证帮扶工作的及时性和灵活性，防止由于静态管理造成的滞后性问题，尽可能做到“不漏一人、不废一策”。

（四）注重风险防控与伦理规范

推进双轨帮扶之际，应重视风险和伦理问题。首先，存在隐私泄露风险。困难生的个人信息属于高度敏感数据，高职院校必须严格限定查阅权限。譬如，在校园公示栏上不得公开张贴名单，不得在评优评先中过度渲染贫困。其次，标签化风险。高职院校不能给学生贴上弱者的标签，在宣传报道中注意维护学生的尊严，多用隐性资助的方式。再次，心理依赖风险。基于实践经验可知，无条件的物质给予会削弱学生奋斗的精神，高职院校应在勤工助学中加入以劳动换资助的机制。最后，法律合规风险。高职院校应保证所有资助资金的发放符合国家财经纪律。在实践环节中，高职院校按照保密、尊重、无害、公正的伦理原则开展工作，既是保障学生合法权利的表现，也是提高帮扶工作专业化程度的要求。

四、结语

（一）总结

高职困难生“心理疏导 + 社会支持”双轨帮扶模式，是对传统单一资助模式的时代性超越。这一模式以当下后脱贫攻坚时代的实际状况为契机，紧密围绕国家针对高校毕业生相关工作所作出的战略规划，通过内修心性与外赋资源双向推动，切实解决高职困难生的自卑、畏难等心理问题。实践表明，唯有把充满温度的心理疏导同强有力的社会支持进行有效融合，才能切实激发困难生的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从“输血式”生存保障向“造血式”发展保障的根本性转变，从而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高注入新动力。

（二）展望

展望未来，鉴于现阶段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广泛且深入应用，双轨帮扶模式后期会朝着更具智能化、个性化的方向持续发展。后续相关研究应进一步探究怎样借助数字技术建立精确的贫困预警模型，同时着重分析如何量化心理资本增值对社会支持获取效率产生的影响。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整体大背景下，高职困难生帮扶工作不应仅仅局限于校园范围之内，还需要拓展到高职困难生毕业后并给予其终身职业发展方面的支持。期望每一位高职学子在人生道路上都能够获得机遇，让教育切实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利器。

参考文献

[1] 汪宇鹃 . 网络时代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工作创新方向的思考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5(16):148-150.

[2] 黄海宁 , 罗伟泰 , 林振程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高职院校困难生智能识别与精准帮扶策略分析 [J]. 广西糖业 ,2024,44(05):391-396.

[3] 顾思琦 , 张骐 . 后疫情时代高职院校困难生就业精准帮扶研究 [J]. 成才与就业 ,2022(S1):75-79.

[4] 檀森 . 高职院校资助育人工作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J].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19(04):9-12.

[5] 陈诗 . 对高职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育人工作的几点思考 [J]. 科教文汇 (上旬刊),2020(28):116-117.

[6] 李博祥 , 尚欣 , 刘宁 , 等 .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健康调查与对策建议——以天津一所高职院校为例 [J].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2023,25(10):19-24.

（作者系漳州科技职业学院研究实习员）

技工院校资助育人视角下受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

李洁琛　韦任嫣

摘要：资助政策是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受助学生除经济需求外，还有心理、学业、职业发展等多方面需求，资助工作应通过发挥育人功能，加强思想引领、心理疏导、能力培养等，助力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当前广西技工院校学生受助类型多，但资助育人主体单一，呈现出资助育人路径不清晰、资助育人效果评价不健全、评价数据归口难、部门协同弱等问题，构建科学、简易、可操作的受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模型，是提升技工院校资助育人实效的关键举措。本文以“技工院校资助工作中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与效果评估的研究与实践”课题为依托，构建思想道德、学业技能、身心健康、实践素养、感恩诚信五维度综合素质评价模型，并以广西商贸技师学院 2024 级、2025 级各 1 个班级学生为试点研究对象，借助学业互助提升、阳光少年守护、感恩思源实践三大资源库开展资助育人与评价，为技工院校开展资助育人评价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技工院校；资助育人；受助学生；评价模型

一、引言

技工院校是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摇篮，国家大力扶持技工教育。技工院校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均可申请国家助学金，品学兼优的技工院校学生可申请国家奖学金。各技工院校的校级奖学金、临时困难补助等资助政策也为技工院校学生保障了学生的就学权利[1]。随着技工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仅对困难学生实施经济帮扶已不能完全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将综合素质评价融入资助全流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二、广西技工院校资助育人现状及问题分析

通过对广西南宁、崇左、柳州、桂林等 12 所广西技工院校开展调研，以受助学生、班主任、资助工作相关人员为核心调研对象，以问卷调查为主要方式，辅以个别访谈，共收集有效问卷 2608 份，访谈班主任、资助办工作人员 30 余人，围绕资助政策认知、育人活动开展、主体协同、效果评价等维度展开调研，发现广西技工院校已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学生资助体系，为资助育人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现阶段资助育人工作仍存在明显的重资助、轻育人，重发放、轻评价的问题。

（一）广西技工院校资助育人现状

当前广西技工院校的资助育人体系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特征，资助类型主要包含国家助学金、国家奖学金、校级奖学金、临时困难补助四种。其中，国家助学金覆盖面广，涵盖所有班级学生，是最基础的保障型资助；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比例极低，面向极少数优秀学生，属精英激励型资助；校级奖学金，每学期评定一次，面向成绩优良学生，属常态激励型资助；临时困难补助则是针对突发困难个案设立，是应急帮扶型资助。

1. 受助学生对资助政策与评价流程认知存在偏差

依据广西技工院校资助育人现状线上调研数据，虽然国家助学金覆盖率已达 100%，但受助学生对资助政策与评价流程的认知却不全面，有 32.47% 的受助学生只是按班主任要求提交了申请材料，对资助政策、受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要求及流程的了解程度为“完全不了解”或“不太了解”。

2. 受助学生参与资助育人活动率偏低

调研数据显示，尽管多数技工院校开展了如资助政策宣讲、学生心理疏导、社会实践活动等各类资助育人活动，但受助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有 19.17% 的受访者表示未参与任何资助育人活动，对班主任在班级开展的关于资助政策的常态化宣传印象不深。

3. 资助育人主体参与范围较窄

当前广西技工院校资助育人工作主要依赖资助办、

学生科等校内部门及班主任，家庭和企业的参与度极低，仅有 21.47% 的受访者表示有家长参与到受助学生育人过程中，多数学生家长并未能与学校共同开展资助育人活动，对学生获得资助后的身心健康发展、学业动态未予以持续关注。

4. 资助育人效果跟踪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调研发现，仅有 12.58% 的院校开展了资助育人效果跟踪评价工作，多数院校未设立跟踪评价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未明确评价指标和评价工具，缺乏可操作的评价方法，评价数据难收集。

（二）存在问题分析

除了助学金类型外，其他类型的受助学生分散于各班，不利于以班级为单位开展育人评价活动，研究与实践难以持续；育人评价指标不明确，不同评价指标需不同部门、不同主体参与评价，各主体间的分工明确但协同不足，评价责任不清 [2]；评价工作烦琐，缺乏简易指标与工具，信息化评价应用不足，基层执行难度大；部分学生同时获得多项资助，形成“一人多资助”结构，易造成重复记录、重复管理及统计口径混乱等问题，数据难以统一归口。

三、受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模型构建实践

广西商贸技师学院在对受资助学生开展经济资助的基础上，以立德树人为导向，通过对学生进行学业帮扶、心理疏导、实践锻炼、价值引领等方式，促进受助学生全面发展。

（一）构建原则

导向性原则：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突出价值引领与技能成长；

简易性原则：指标易采集、流程易操作，贴合资助一线工作实际；

全面性原则：覆盖德、智、体、美、劳，兼顾过程与结果；

发展性原则：强调跟踪反馈，形成“评价—干预—提升”闭环 [3]。

（二）评价维度

对受助学生开展综合素质评价，包括思想、学业、技能、身心、实践、诚信等维度，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标准可量化、评价路径全程化。

1. 具体维度和评分值

思想道德（20 分）：遵纪守法、考勤纪律、集体观念、感恩意识、日常行为表现；

学业技能（30 分）：课程成绩、实训操作、学习态度、技能证书获取、专业竞赛参与；

身心健康（20 分）：心理状态、情绪调节、体育达标、抗压能力、同伴关系；

实践素养（20 分）：志愿服务、勤工助学、社团活动、职业体验、社会实践；

感恩诚信（10 分）：资助政策知晓、诚信履约、感恩言行、社会责任意识。

2. 评价主体

实行“学校—家庭—学生”多元评价。校内评价主体为三部门六主体，以学生科资助办、教务科、学生科为主要评价部门，专业课教师和班主任为直接评价人员，同时组织学生自我记录与反思。校外评价主体包括家长、企业导师（实践环节）。

（三）评价资源

建设三大资助育人资源库，依托资源库开展资助育人活动。

1. 学业互助提升平台

教务科牵头构建课程课件、技能操作视频、实训步骤、习题集、错题本、技能题库、优秀实训案例等资源库；班主任利用学习通平台对本班受助学生开展线上学习打卡、技能任务提交，并由科任教师点评，评价数据计入学业技能维度 [4]。

2. 阳光少年守护平台

由学生科牵头建设，依托超星学习通上传心理微课、情绪调节手册、压力自测工具；班主任每月开展心理班会、线上自测，组织每周晨会的体能打卡活动。评价数据计入身心健康维度。

3. 感恩思源实践平台

由学校办公室和学生科资助办牵头，常态化挖掘受助榜样事迹、创新创业案例，树立学习榜样并进行广泛宣传；制定志愿服务项目实施计划，开展类型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社团活动、职业体验活动，发动和组织受资助学生加入活动中。将活动评价数据计入实践素养、感恩诚信维度。

（四）实施流程

1. 分类建档和数据采集

在每学年秋季学期的第 1 至 2 周，由学生资助办牵头，以智慧校园数字化资助平台为采集工具，为所有班级受资助学生建立班级资助档案。以学号为资助 ID，首先录入覆盖面最广的国家助学金，统一录入基础信息、班级、资助类型，同时将数字化资助平台与教务科生成的学生成绩、学生科的心理筛查结果一键关联。每学期按月逐项补录国家奖学金、校级奖学金、临时困难补助等资助类型数据。通过班主任向学生及家长告知资助评价标准。

2. 全过程动态记录

每学期由班主任负责本班所有受资助学生的思想道德、日常表现、家校反馈记录；借助智慧校园数字化资助平台和教务平台关联，实现对专业课教师评价学业成绩、技能实训成绩、技能评价证书数据的一键载入。学生科负责心理监测、体育健康、活动组织；资助办负责记载和关联各维度评价数据、资助政策宣传、各类评价的复核。学生参与资源库学习与实践活动，实时留痕。

3. 期末归口汇总评定

期末学校开展学业测评结束后，资助办以智慧校园数字化资助平台为工具，一键下载受助学生的学业评价、关联受助学生的心理监测数据、汇总思想道德评价数据、实践评价数据等，按五维度加权计分，评定等级：90~100 分为优秀，80~89 分为良好，60~79 分为合格，60 分以下为待改进。公示 3 个工作日，受理复核申请。

4. 结果运用与反馈

资助办通过钉钉平台将评价结果以班级为单位反馈到班主任处，班主任一对一反馈，向家长推送成长报告，建立待改进学生帮扶计划，持续跟踪学生提升情况。评价结果与资助资格复核、评优评先、技能推荐、岗位实习挂钩。针对评定为待改进的学生，建立一人一档专项帮扶台账，由专业教师、心理辅导员、家长三方联合制定月度提升方案。

（五）保障机制

建立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担任组长，资助办主任统筹执行，资助工作小组包含学校办公室、教务科、学生科等业务部门，涉及相关部门中层领导、业务干事、班主任、专业教师等相关资助人员 [5]。

学校校长负责资助育人工作的统筹决策、资源调配、经费保障、部门协调、成果审定。

学生科资助办主任负责资助育人方案的具体实施，数据统一采集归口，落实与班主任、班级的具体对接，资助育人资源库的管理，资助育人评价活动的组织和实施。

教务科科长负责完善学业育人资源库，组织专业教师开展学业与技能资源建设，提供学业成绩与实训数据，执行教学协调。

学校办公室主任负责榜样挖掘、典型树立和宣传报道，做好相关育人活动的文件印发、材料保障和活动宣传。

学生科干事在学生科资助办主任领导下，组织班主任落实心理普测、纪律管理、各项活动组织的督促和执行情况的考核记录。

班主任负责本班级学生期初数据的建档，各项育人活动的组织实施和活动情况记录，开展家校沟通，与家长一对一反馈育人成效，协助资助办及时更新资助档案。

（六）实证研究成效

以广西商贸技师学院 2024 级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1 班、2025 级幼儿教育 1 班为实证班级，班级受资助学生涵盖所有资助类型。其中，对 2025 级幼儿教育 1 班（新生班级）重点开展政策适应、习惯养成、心理融入、基础技能培养；对 2024 级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1 班（老生班级）重点开展技能提升、实践锻炼、职业规划、感恩诚信教育。以电子化台账、学习通资源库后台数据、教师记录、家长反馈为数据采集方式。表 1 所示为 2025—2026 学年第一学期实证前后对比成效。

表 1　2025—2026 学年第一学期试点班级实证前后数据对比表

维度	核心指标	2024 级试点班前测	2024 级试点班后测	差值	2025 级试点班前测	2025 级试点班后测	差值
思想品德	违纪情况（人次）	57	13	↓ 44	69	22	↓ 47
学业技能	学业平均分（分）	67	81	↑ 14	63	79	↑ 16
	技能优良率（%）	18	37	↑ 19	24	35	↑ 11
身心健康	心理异常率（%）	17	8	↓ 9	15	7	↓ 8
	体育达标率（%）	53	88	↑ 35	61	92	↑ 31
实践素养	志愿活动参与率（%）	17	55	↑ 38	23	69	↑ 45
感恩诚信	政策知晓率（%）	53	100	↑ 47	47	100	↑ 53

实践结果表明，依托三大资助育人资源库开展资助育人活动，2 个试点班受资助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技能、身心健康、实践素养、感恩诚信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 [6]。模型落地后，班级互助学习氛围显著浓厚，受助学生主动参与技能竞赛、感恩宣讲分享的人数实现翻倍，学生自卑、消极等负面情绪明显减少，自主成长意识与责任担当意识大幅增强。

四、结论

研究表明，本研究构建的五维度受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模型，满足技工院校对资助育人评价规范化、简易化、可操作的需求。以学业互助提升、阳光少年守护、感恩思源实践三大资源库为依托，使育人内容更为丰富和全面。借助信息化育人平台，使育人数据留痕、归口统一，评价数据更为客观。建立校长牵头、资助办统筹、多部门协同、班主任落实的保障体系，确保实证研究可持续、可推广，显著提升了受助学生对资助政策的知晓度、育人活动的参与率、学业技能水平与心理健康状态，有效推动了资助工作从“经济保障”向“全面育人”升级。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EB/OL].(2007-05-13)[2026-06-30].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7/content_660401.htm.

[2] 叶俊 .“大思政”视域下高职院校资助育人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与体系研究——以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大学教育 ,2025(11):147-161.

[3] 蔡青 . 职业教育发展性资助育人体系 （下转 53 页）

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实践路径探究

田意颖　朱蓝溪

摘要：大学生志愿服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一项重要抓手，更是连接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重要纽带，在服务地方发展方面展现出重要价值。但现阶段，部分地区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存在供需错配及协同性不足等困境，不仅影响整体服务质量，也难以为大学生成长提供有效支撑。基于此，文章阐述了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现状，从供需错配严重、多元主体协同不足、难以形成持续效应等维度分析了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困境，提出了坚持需求导向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加强内外部资源整合搭建志愿服务平台、完善配套制度增强活动持续性、强化专业赋能健全传帮带机制等策略，旨在破解当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困境，为活动常态化开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志愿活动；地方发展；大学生；价值观

志愿服务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更是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大学生作为青年志愿者群体中文化层次高、社会责任感强的群体，在志愿服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22—2023）》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志愿者达2.32亿人，其中青年群体是志愿服务的核心主力军，在校大学生为青年志愿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显示，当下大学生志愿服务已经渗透到生态保护、社区治理以及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并涌现出“西部计划”“三下乡”等特色品牌项目，收获了各界高度赞扬。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学生志愿服务实际效果与规模扩张并未形成正比，种种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一、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现状

纵观当下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现状，其形式逐渐多样化，已从以往的碎片化活动转向多层次、多领域的服务。乡村振兴类活动是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最为广泛的领域之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文化下乡、教育帮扶以及环境整治等服务。支教助学作为教育帮扶维度中常见的服务形式，致力于为贫困山区儿童提供教育支持。以内蒙古民族大学为例，其组织的“暖阳”项目经过常年深耕，参与项目的志愿者达5.5万人次，受助中小学生约2800人，形成了全面覆盖乡村与校园的志愿服务体系。自1999年以来，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持续为宁夏西海固地区提供志愿服务，形成涵盖育人、教书和助学的立体化服务网络，在26年间累计服务时长约20万小时，超400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从中可以看出，乡村振兴类志愿服务逐渐从碎片化帮扶转向常态化赋能。

社区同样是大学生志愿服务的主要领域，主要得益于高校与属地社区之间的合作愈加紧密，大学生志愿服务从零散的“进社区”转变为“驻社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在党委领导和校地协同下，与本地众多街道社区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为社区老人提供常态化人文关怀，

（上接52页）

构建 [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4,43(09):94-97.

[4] 郭鹏程 , 玛尔哈巴·艾斯克尔 . 资助育人视角下高职人才生涯教育研究——以新疆高职院校受助学生为例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6,47(05):117-119.

[5] 张芷若 . 高职院校高质量资助育人创新路径探究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6(01):59-61.

[6] 巨博 . 浅谈高校资助育人工作 [J]. 科教导刊（电子版),2024(03):40-4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25年度广西技工教育科研规划课题“技工院校资助工作中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与效果评估的研究与实践”（GHY202527）。

（作者单位：广西商贸技师学院）

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参加一对一帮扶和心理慰藉等志愿服务；苏州旅游职业学院青年学子在越溪街道旺山儿童关爱之家，为暑托班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生命安全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珍爱生命、守护安全”的种子。志愿者们用专业与耐心，为暑托班的孩子们撑起了一把安全保护伞。从中可以看出，社区治理类志愿服务的本质在于嵌入社区，志愿者并非外来的帮扶者，而是社区治理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区居民提供常态化、立体化的志愿服务[1]。

二、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困境

（一）供需错配严重

尽管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取得了斐然的成果，但部分地区仍存在志愿服务未能嵌入地方发展网络的问题[2]。在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诸多困境中，供需错配问题最为典型，主要表现在志愿服务供给与实际需求不匹配。部分高校在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项目时，前期考虑的重点在于活动可行性以及宣传效果，对基层单位或地方社区的真实需求缺乏深度调研，在项目策划时过于盲目，以主观经验为驱动，在具体执行时难以吸引服务对象主动参与[3]。许多志愿服务局限于单一形式，鲜有回应基层治理创新、产业升级以及数字建设等领域的真实诉求，尤其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区域，当地更需要市场对接、技术支持等高层次志愿服务，但许多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仍停留在浅层，难以真正满足实际需求。这种供需错配问题的存在，导致大量志愿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甚至严重浪费，同时部分迫切需求无法得到有效回应，致使大学生志愿服务在服务地方发展中的积极效应弱化，不利于大学生志愿服务品牌形成[4]。

（二）多元主体协同不足

大学生志愿服务往往涉及多个领域，需要在社会组织、企业、高校等多元主体协同下，才能真正赋能地方发展。但实际上，部分地区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治理碎片化问题严峻，各主体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严重弱化整体服务效能。在部分地区的高校与地方合作层面，校地合作缺乏完善的制度支撑，如果项目相关负责人出现变动，将会导致双方的合作关系中断。加之校地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高校无法了解地方发展真实动态与需求，地方不了解高校的志愿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剧志愿服务的供需错配[5]。

（三）难以形成持续效应

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核心要点在于从碎片化活动转向长效化、常态化活动，但多数高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难以形成持续效应。一方面，大学生志愿活动周期较短，大多集中在大型赛事或寒暑假等期间，活动持续时间从数日到数周不等。后期志愿者结束服务撤离后，当地的服务现状未能得到真正改变，受益对象重新回到原有状态，暴露出明显的“短期化”特征。高校在大学生志愿活动前期宣传中投入力度较大，但对活动具体实施效果缺乏长期跟踪，加之缺少第三方评估机构的支持，导致志愿活动在服务地方发展方面的效果无法衡量，自然也难以为后续的志愿活动方案优化提供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时间有限，志愿队伍成员不断更替，但高校在志愿活动管理中忽视配套档案建设，导致新老成员之间交接不充分，同一服务项目在不同时期存在重复性开展的现象，进而造成志愿服务资源的浪费。

三、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有效策略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掌握地方发展真实需求，做好志愿服务供需精准匹配，并依托校内外志愿服务资源深度整合、完善配套制度以及专业赋能，助推大学生志愿活动从碎片化转向常态化。具体策略如下。

（一）坚持需求导向，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大学生志愿活动开展需坚持服务导向，结合地方发展真实需求，有针对性地配置优势资源、组织专业赋能的志愿活动，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供需错配的问题。具体可从以下几点展开：首先，编制需求清单，高校负责人前往基层，与地方部门交流沟通，了解地方发展的多元需求及难点；深入社区，全面收集居民的需求，为后续的志愿活动策划提供真实数据支撑；建立线上反馈平台，鼓励基层群众主动表达观点、提出建议。同时，服务清单应动态更新，并根据需求的紧迫程度和服务领域分类梳理，以保证供给精准匹配。其次，精准匹配供需双方。在编制需求清单的基础上，高校应结合实际需求，进行供给能力匹配，主要表现在各院系专业特色、志愿服务资源、师资力量、学生组织优势等，以实现地方需求与高校服务的精准匹配。最后，完善需求反馈与调整机制，需求识别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贯穿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全过程，根据阶段服务效果评估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数据，精准定位服务需求，并以此为依据动态调整服务内容与方式，推动大学生志愿活动常态化开展。

（二）加强内外部资源整合，搭建志愿服务平台

在精准识别地方发展真实需求的基础上，应注重配套资源的有机整合，为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提供合力。

高校应当尝试探索工作新路径，比如在党委主导下，将大学生志愿服务纳入学校整体的工作范畴，为其提供正确的方向引领和基础保障；团委负责项目管理以及统筹协调；各院系提供专业特色服务，并将其与社会调查、专业实践等深度整合，激发大学生参与主动性；教育部门将志愿服务与学分相挂钩，为活动常态化规范开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各部门协同联动，为大学生志愿活动持续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校地资源整合，关键点在于搭建稳定的合作对接平台。高校与地方相关部门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志愿服务内容、合作方式以及保障措施；建立校地联席会议制度，在团委和地方团委牵头主导下，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和街道社区参与其中，实现相关信息的互通有无，为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保障。同时，搭建志愿服务工作站，在地方设立专门的合作平台，为这项活动常态化开展提供物理空间支持，真正地扎根于地方。

除此之外，大学生志愿活动应积极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例如，社会组织可提供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和专业工作方法，企业则为志愿活动提供技术平台、物资以及资金等资源，并在 CSR（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公益合作等方面提供服务支持；与基金会合作，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提供持续资金支持，缓解大学生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的资金匮乏问题。

（三）完善配套制度，增强活动持续性

针对大学生志愿活动持续性不足的问题，可在校内考核制度、人才培养制度以及激励制度等方面提供支持。在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志愿服务融入其中，明确其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将志愿服务课时纳入第二课堂课程课时；深化服务课程建设，将社区服务与专业课程深度整合，大学生在学习专业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同步推进落实志愿服务，确保服务经验能够成为课程学习的重要延伸，在保障服务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服务的专业水准；提升志愿服务在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中的权重，对表现优异的教师，在评奖评优、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适当倾斜。

建立校地合作长效机制，是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常态化开展的基础保障。高校与地方部门合作建立志愿服务实践基地，整合双方优势资源，明确彼此在人员、经费、管理等层面的权责与义务所在，为志愿服务实践基地的规范化运营提供保障；建立经费保障制度，在高校年度预算中增设志愿服务经费，寻求相关基金会或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以缓解高校资金压力，形成多元经费投入格局。除此之外，面向指导教师建立激励机制，将教师指导学生志愿服务的时间与成果纳入绩效考核范畴，与教师评优、岗位晋升等相关联，使教师具备持久参与的内驱力。对学生而言，表现优异的人员可作为志愿服务典型被宣传以及获得优秀志愿者表彰，并根据志愿服务获取的积分，兑换不同的物质奖励，以调动大学生志愿服务的主动性。对服务团队整体而言，定期组织志愿服务项目或品牌评选活动，表现优异的团队可获得资源倾斜，其参与的项目会成为重点扶持项目，促进大学生志愿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四）强化专业赋能，健全传帮带机制

充分发挥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效能，提升服务的专业性是关键。高校可大力推动学科专业与志愿服务深度结合，如师范院校提供教育支持、师资培训等志愿服务；医学院校提供疾病预防、健康义诊等志愿服务；农学类院校提供乡村振兴规划、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等志愿服务。同时，将志愿服务融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鼓励各专业教师结合课程内容，设计特色志愿服务项目，在服务地方发展的基础上，锻炼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应用能力。

搭建系统培训体系，定期组织培训活动，对提升志愿服务质量具有重要作用。面向全体志愿者，重点讲授沟通技巧、礼仪规范、志愿精神、应急处理方法、地方风俗习惯等内容，强化志愿者的服务意识，使其具备基础的服务素养；专业培训需结合志愿者专业背景，具体包含法律咨询技巧培训、急救技能培训、支教方法培训等，全面提升志愿服务的专业水平；岗前实训，主要采取场景化模拟方式，重点锻炼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常见问题应对能力，以保证志愿者能够适应不同地区的服务需求，提升志愿服务水平。

搭建传帮带梯队，由高年级学生带领低年级学生参与其中，确保志愿服务连续进行，避免志愿服务传承断层。同时，健全志愿服务档案管理机制，将志愿服务项目方案、案例材料、操作经验等信息归档存储，将其转化为可长期利用的知识资产；建立评估与反馈机制，每学期结束后及时复盘，以促进志愿服务持续改进升级。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为推动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开展，高校应完善配套制度体系，加大资金与人力投入，结合地方发展真实需求，开展形式多样、兼具专业赋能价值的志愿服务，在满足地方发展真实需求的基础上，锻炼大学生的专业技能与社会治理能力，为培养更多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罗杰齐，陈骏洪 . 乡村振兴下高校志愿服务赋能地方发展的新路径研究 [J]. 中华志愿者，2026(02):45-48.

[2] 高政 .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服务地方发展的现状及对策——以宿迁学院为例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1,4(13):114-117.

[3] 邱亚楠，常光凯 . 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思考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1,20(10):266-267.

[4] 冯永鹏 . 研究生支教团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现实路径研究 [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39(08):94-97.

[5] 王增纳 . 对高校通过大学生志愿活动服务地方发展的思考 [J]. 课程教育研究，2019(18):241-242.

（作者：田意颖，苏州旅游职业学院团委书记、高级教师；朱蓝溪，苏州旅游职业学院志愿项目指导老师、讲师）

基于协同理论的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改革实践探索
——以G校毕业实习为例

刘百秀　蔡晓潼

摘要：产教融合战略下，校企协同育人广受关注。作为集实践性、应用性与理论性于一体的社会工作，其专业属性决定了实习教育的重要性。探索校企实习协同模式，提升实习教育质量，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重要议题。本文采取单案例反思性研究方法，对G校实习教育改革实践进行了全面梳理，提炼出以学生为中心的“主体—内容—过程—保障”四位一体协同实习模式，推动产教协同融合，实现实习教育全过程闭环，达成“学生成长、学校育人、企业用才”的三方共赢。

关键词：协同理论；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以学生为中心；协同实习模式

一、前言

在产教融合战略背景下，校企协同育人已成为各界关注热点。作为兼具实践性、应用性与理论性的专业，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决定了实习教育在专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实习教育组织学生在真实职业场景中开展社会工作实践，可有效提升学生的实务能力与专业素养。因此，探索校企协同实习模式，提升实习教育质量，已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

协同理论是一门研究不同事物共同特征及其协同机理的新兴学科。其核心观点是如果系统的各子系统之间能够彼此密切沟通交流、协调、共同协作，系统作用能得到最大强度的发挥[1]。协同理论引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实践教育与实习教育，催生出一系列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多停留在中观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模式与协同机制层面[2]。虽有部分研究涉及实习目标制定[3]、角色分工[4]、协同督导[5]及理论课程协同[6]，但鲜有可执行落地的操作方案。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以G校2023年至2025年三年的实习教育改革实践为研究对象，聚焦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场景，以学生为中心，探索协同理念指导下的操作实施细则，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习教育模式。

二、协同理论视域下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改革的实践探索

（一）改革缘起及目标

G校是广东省一所应用型本科院校，2013年9月设立社会工作专业，2014年9月开始招生。截至2025年6月，该校已完成6届学生的毕业实习。笔者在负责实习统筹时发现学生实习准备不足，适应期过长；实习机构被动参与实习，校企协同育人机制难以有效运转。如何帮助学生快速进入实习场域并发挥校企协同作用，成为专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围绕实习存在的问题，根据实习参与主体在实习中发挥的作用，以学生为中心，G校社会工作实习改革制定“三强化”实习目标，即强化学生的实习准备度、强化教师协同育人、强化校企合作互动。

（二）改革过程

整体实习改革分为三个阶段：

1. 提升学生实习准备度

核心目标是帮助学生做好实习的准备工作，加快学生的实习适应速度。具体工作为：一是实习前的认知强化工作，如加强实习筹备阶段学生的实习培训、开设专门的实习辅助课程等；二是制度准备工作，如建立精细化的实习管理与跟进制度。工作阶段性成果为完成学生实习准备资源库。

2. 优化协同育人机制

核心目标是优化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育人机制与系统。具体工作包括：做实学生主体的协作学习，完成朋辈督导的实践探索；完善教师主体会议协同模式、实习走访协同模式、课程协同模式以及特殊议题协同模式等的实习协同育人机制探索；优化校企之间的实习协同互动系统。工作阶段性成果为建立协同理念的

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模式。

3. 巩固协同模式的实习改革成果

核心目标是查缺补漏，检验已成型的实习教育模式并完善实施条件。具体工作包括：深挖协同理念的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模式实施的影响因素，完善与补充实施条件。工作阶段性成果为协同理念的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模式实施的影响因素分析。

（三）效果评估

结合实习教育改革的情况，对实习改革的成效进行了初步评估。发现主要取得以下方面成绩：

1. 实习适应时间缩短

由于实习筹备期做了大量工作，学生实习适应时间普遍缩短，由 2022 年平均 1.5 个月，缩短至改革后的 0.5 个月至 1 个月。这一点在实习机构负责人访谈中也得到验证：“你们的学生不错，不用我们操太多的心，点一点就能上手，适应特别快。”

2. 学生充分肯定协作学习

实习材料的文本分析发现，82% 的学生肯定协作学习小组的正面作用，认为同学之间的协作学习能够缓解实习压力，尤其是实习适应期的压力，传递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与人文关怀。同时，部分学生表示自己从同组同学获得启发。

3. 教师协同育人成果显著

通过访谈和文本分析可知，实习学生能感受到学校指导老师的分工合作，认为自己能从指导老师的合作中受益。同时，教师团队也有正面反馈：“指导学生的时候不是一个人，遇到问题有人帮忙一起解决。”

4. 校企协同育人初步见效

合作机构超过 103 家，累计提供超过 500 个实习岗位，其中 26 家实习机构成为长期实习基地。同时，合作关系全面升级，由单一实践育人走向全方位产学研合作。建立了包括现代化社会治理、司法社会工作、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基地在内的 6 个产学研基地。

（四）问题与不足

回顾三年实习改革，笔者发现学生协作学习和教师协作育人层面较为顺利，而校企协同方面则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实习机构认知定位偏差。部分机构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不顾学生实习体验与感受，甚至要求学生完成违背专业伦理的任务，这给学生带来了强烈的价值冲突。其次，目标存在分歧也是常有的情况。部分机构只使用不培养，协同育人动机不强，当学生无法达到预期时向指导老师投诉。最后，协同督导能力不足。机构督导经验不足，忽略学生的实际能力及个性特点，给学生带来较大压力。朋辈督导实习指导存在较大随意性，协同育人模式作用发挥有待深化。此外，年轻的校内指导老师也会存在经验与能力不足的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改进方向：一是制定机构筛选机制。严把实习机构理念操守关，把机构负责人认知与重视纳入机构筛选标准，建立实习机构库的准入退出机制。进行风险评估，安排资深的校内指导老师负责中高风险机构学生的实习指导工作，提前赋能，多管齐下协助学生正向化处理问题。二是寻找校企多元化合作需求点，增强校企互赖与黏性，提升目标协同度。三是建立督导协同成长体系，通过典型案例等方式，强化不同督导主体的指导、沟通协作能力。

三、以学生为中心的四位一体协同实习教育模式

G 校在实习教育改革中逐渐形成以学生为中心的四位一体协同实习教育模式。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一）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是协同实习教育的灵魂与出发点。它从学生实习的困惑、能力和职业期待出发，重塑实习教育流程与模式，使学校督导、机构督导和朋辈督导的协同支持真正围绕学生发展展开，提升实习成效、促进专业认同以及持续优化。

（二）协同主体

在 G 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改革中，参与主体包括：

1. 实习学生

学生具体包括实习学生与往届毕业生。其中，实习学生是实习改革的中心，需制定实习计划、按要求开展服务、参与督导并整理实习资料。往届毕业生受邀担任朋辈督导，组织领域学习小组、提供体验式分享或指导，协助指导老师推动小组互助成长。

2. 实习机构

机构主体包括带教社工、项目负责人以及机构负责人等，其中带教社工负责学生的实习指导，项目负责人安排学生到具体岗位，机构负责人（主要是机构人事专员或服务总监）承担实习对接沟通与统筹工作。

3. 高校教师

分为指导教师和统筹教师两类。指导教师负责具体实习教育，承担着指导、辅导和评价工作。统筹教师是实习计划的统筹人，保证指导教师实践育人的协同性，通常由指导教师兼任。

（三）协同内容

1. 学生协作学习

发挥学生自身能力与资源，推动同级学生、跨级学生的小组学习来解决实习问题以及提升实习效能。具体做法包括：一是由指导老师带领建立同级学生实习协作小组，每月开展 1—2 期线上实习督导会议，提供情绪、专业及行政支持；二是由朋辈督导带领组建跨年级开放式主题分享小组，聚焦同领域议题，形成体系化实践知识；三是根据需要组建专项任务小组，关注学生特殊需求开展个性化支持。

2. 教师协同育人

具体做法包括：一是会议协同，凝聚教师共识、系统分析与解决实习问题、复盘实习指导工作以及确定次年工作重点；二是走访协同和特殊议题协同，实现实习过程育人，前者是指采取联合走访或分工走访的形式实现跨导师的实习现场指导与实习检查，后者是针对实习临时突发事件，明确处理实习突发事件的协同成员、流程与步骤；三是课程协同，将校内课程教学与校外实习教育相结合，G 校经历了由零散碎片化课程嵌入到系统化专项课程的协同过程。

3. 校企协同互动

具体做法是在实习的前、中、后三个阶段，校企合作开展各类实践育人活动，如实习筹备期的实习宣讲、嵌入课堂、企业探访等，逐步提升学生实习准备度；实习初期跟岗报到、协同沟通以及中期的实习走访、电话探访、问题专题会议等常态化的过程协同；实习后期的实习总结会议以及论文联合开题报告会。校企双方通过互动协同，为学生的实习质量保驾护航。

（四）协同过程

1. 前期筹备阶段

协同实习顺利实施的基础环节，主要包含校企协同、教师协同与学生动员三个方面：校企协同方面，学校发出邀请，校企双方共同确定实习目标、内容与方法，机构发布实习岗位信息，同时签订正式校企合作实习协议，明确各方权责；教师协同方面，指导教师完成学校最新实习政策以及实习相关指引手册的更新，召开教师统筹会议凝聚共识，布置实习重点及年度优化方向；学生动员方面，通过嵌入式课堂、校园宣讲会、研讨会等形式帮助学生理解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角色转变。

2. 中期执行阶段

协同实习的核心环节，重点在于校企协同指导与学生协同实践。在校企协同指导方面，指导老师与机构带教社工形成协同指导关系，采取电话、微信、走访面谈等方式保持联系与互动。同时以实习跟踪和特殊议题为纽带，确保对学生实习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和及时干预。在学生协同方面，实习小组与领域小组按照学校部署开展协作，按部就班开始实习工作。学生完成具体工作任务，并记录实习日志与实习过程资料。校企双方在学习通实习管理平台进行跟踪定位，确保实习过程管理规范有序。

3. 总结评估阶段

协同实习的收尾环节，主要包含校企协同评估与学生总结归档。在校企协同评估方面，校企联合开展实习鉴定和评估工作，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实习评价。在学生总结方面，学生撰写实习总结报告，开展实习总结分享会。同时开展实习资料互查互检工作，学校组织归档材料并召开教师实习总结会议。

（五）协同保障

1. 制度保障

制定系列制度文件，统一实习指导要求，明确实习内容和考核标准，明确各方职责以及工作流程。具体包括：一是明确实习统筹架构，推动学生实习团队开展协同实习；二是明确“学生—教师—机构”三个核心主体的对接流程，为多元主体的协同提供条件与创造可能；三是制定《实习学生督导手册》，统一校内指导老师实习指导要求，同时区分学校指导老师与机构带教社工的督导重点及互动衔接机制；四是制定详细的《学生实习手册》《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内容清单列表》，明确学生实习内容及考核标准。

2. 协同互动

为确保实习机构与学校、与学生之间有更多的了解，确保信息互通和问题得到快速解决，G 校初步搭建了校企协同互动机制，具体包括：邀请机构以嵌入式课堂、实习宣讲会、实训研讨会、实训人才培养研讨、担任实训导师等方式参与实习工作；在机构内指定专门实习督导与学校指导老师对接，建立校内指导老师与机构带教社工一对一沟通渠道；建立校企两端特殊事件快速启动响应机制。

3. 协同督导

建立由机构督导、学校指导老师及朋辈督导组成的多元协同督导体系。其中，机构督导以工作任务为导向，针对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出现的疑惑、困难与问题给予即时性指导。学校指导老师关注知识运用的问题，协助学生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壁垒。朋辈督导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

4. 质量监控

安排实习走访、周记、月志、机构面谈、定期小组督导等活动，对学生实习状态进行全面的动态跟踪。此外，还设置了指导老师会议协同机制，对老师的指导工作进行跟踪。

四、研究总结与反思

通过对 G 校社会工作专业实习教育改革的单案例反思性研究，本文以学生为中心，在协同理念指导下系统提炼了操作实施细则，最终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主体—内容—过程—保障”四位一体协同实习模式。

本文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优势在于能深入揭示多方主体在真实情境中的互动逻辑，但单一案例的外部效度仍需后续多校验证。同时，反思性方法有助于不断修正协同过程中的偏差，但也对研究者的持续自省提出较高要求。总体而言，该模式为破解产教分离、学生被动等实习困境提供了实践路径，未来应进一步关注不同专业背景下的适应性调整。

（下转 59 页）

“医—护—防—养—管”五维六线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以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为例

岑指昊　石　龙 *

摘要：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的纵深推进，国内大健康产业已进入井喷式、多样化的增长周期，大健康产业对复合型健康管理人才的需求亦日趋增长。针对既往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同质化严重、理论实践脱节、时代适配性不足等普遍痛点，本研究构建了“医—护—防—养—管”五维六线育人模式，并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发展。该模式以医学、护理学、预防医学、康养、管理学为五大核心维度，细化为六类课程育人支线，结合专业学情与毕业生就业流向，重点突出老龄化适配、行业实践导向、数据素养等特色，通过重塑培养目标、重构课程体系，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时代趋势、老龄化社会的精准对接。

关键词：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人才培养与改革；育人模式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强健康人力资源建设，这为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作为衔接健康产业与人才供给的交叉学科，该专业天然地需要突破单一学科的育人局限，实现医学、管理学、护理学等多领域知识的深度融合，培育“懂得健康、善于管理、能够服务”的复合型人才，从而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的现实需求。

近十年来，国内大健康产业呈现出“医疗服务、养老康养、健康体检、医保管理”齐头并进的多业态融合发展态势，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岗位逐渐凝聚、收拢为两大核心集群：一是连锁健康服务实体（如大型连锁养老服务机构、连锁零售药企、公立医院健康体检中心等），亟须具备工商管理、市场营销、运营管理知识和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二是传统公共卫生与医保管理领域（医院医保科、政府医保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疾控机构等），此类公共部门需要掌握卫生事业管理、健康经济学、数据分析、医保政策解读能力的专门人才。因此，传统单一化的课程体系已

（上接 58 页）

参考文献

[1] 哈肯 H. 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奥秘 [M]. 凌复华，译 . 上海 :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36-38.

[2] 柳春慈 , 王琳 . 地方本科院校社会工作专业协同育人探讨——以 HZ 学院为例 [J]. 高教学刊 ,2018(08):73-76.

[3] 宁雯雯 . 社会协同与目标定位 : 社会工作专业实习中多元主体间的互动研究 [J]. 社会工作 ,2013(06):41-47,152.

[4] 林淼 . 多元协同视角下社会工作专业高本协同育人顶岗实习研究 [J]. 山西青年 ,2021(13):33-34.

[5] 余缅萍 , 刘修明 . 探索高校与机构协同督导社工人才的模式 [J]. 社会与公益 ,2015(10):56-59.

[6] 张静 . 多元协同育人视角下社会工作课程闭环式教学模式探索 [J]. 大众文艺 ,2021(16):195-19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校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课题“协同理论视域下实习教育改革实践探索——以社会工作专业为例”（2023JG008）。

（作者：刘百秀，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讲师；蔡晓潼，广州应用科技学院本科生）

难以适配现代社会分工所引致的多元化岗位需求，既往的专业人才培养规划与当前产业发展出现了结构性脱节。

右江民族医学院于2019年始设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专业，截至2025年累计培养学生567人（毕业生322人、在校生245人）。在学院2019版人才培养方案的实践过程中，三类问题逐渐凸显：

一是原版方案所设计的课程体系存在“重理论、轻应用”的问题，管理类课程冗余且脱离行业实际，存在“形而上的管理”倾向，学生的实践能力难以满足用人部门的要求；二是健康行业的适配性不足，未充分回应老龄化社会对健康管理人才的迫切需求，课程设置与毕业生就业流向的衔接较为松散；三是时代适配性的滞后，未能跟上人工智能背景下对数据分析能力的新要求，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不足。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亟待通过育人模式的创新加以破解。

二、国内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现状述评

自2016年首批高校开设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专业以来，该专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扩展，至2025年已有123所院校开设此专业，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然而，尽管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依然面临诸如专业目标定位模糊、师资队伍数量不足且结构失衡、课程体系繁杂多样、实践教学内容单一等挑战；不同领域的用人部门对专业人才知识与能力的需求亦存在显著差别。

（一）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提升，但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如人才培养优势不突出、课程体系特色不明显、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等，司建平等[1]（2019）通过对61所开设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本科院校官方网站数据进行分析，指出了人才培养存在课程体系特色不明显、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需要采取有效的对策加以解决。

（二）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在老龄化趋势加深以及人工智能逐步普及的社会背景下，高校应当如何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健康管理人才？钱国强[2]等（2020）提出高校要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专业课程结构，强化校企合作；施毓凤等[3]（2020）强调校企合作的重要性，提出要加强核心课程体系的建设，提升人才的核心技能；唐海峰等[4]（2024）探索了“中西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强调发挥医学院校的中西医的优势。

（三）对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探索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是“新文科”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方向，构建专业课程体系需要综合考虑多领域知识。陈江芸等[5]（2023）构建了包括通识教育、医学基础、管理学基础、健康服务管理、方法与创新五大模块在内的课程体系；若从彬等[6]（2022）提出建立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专业课程体系；杨芳等[7]（2024）探讨了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科交叉、产教融合、四轮驱动”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突出综合性和实践性。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其内在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建设也应当处于不断更新迭代的过程中。国内各高校对专业的育人模式和课程建设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试验，以回应时代对专业人才素养的新要求；这为本研究提出“医—护—防—养—管”五维六线育人模式提供了探索与实践的空间。

三、“医—护—防—养—管”五维六线育人模式的构建

（一）模式的定位

本研究提出的“医—护—防—养—管”五维六线育人模式，是以“回应大健康产业发展需求、适应时代与社会发展趋势、强调多学科融合”为基准方向；通过五大学科维度的纵深交融来打造人才能力底座；以六类课程支线明确育人路径，以期实现“医学、护理、预防、康养、管理”的全方位培养，将学生塑造为适配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

（二）核心维度

“医—护—防—养—管”这五大核心学科维度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共同打造人才培养的能力基石：

医学维度旨在筑牢健康管理的专业根基，使学生具备现代西医视角下常见疾病的识别、躯体健康评估的核心能力，是“懂健康”的关键支撑；护理学维度旨在强化学生健康服务的实操技能，重点聚焦临床护理与老年护理的核心场景，提升学生服务一线的实操水平；预防医学维度旨在教授学生群体健康干预和管理的能力，重点培养群体健康监测、公共疾病预防、健康干预的专业能力；康养维度突出中西医的“治未病”理念，回应健康养生与养老产业发展需求，融合中医养生、运动康复、公共营养等知识，适配康养产业对人才康养素养的诉求；管理学维度则赋予学生健康服务的管理能力，涵盖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两类行业，体现双重逻辑，精准适配不同就业场景的能力要求。

（三）实施路径

基于“五维学科”所设计的六大课程支线是人才复合能力培养的载体，具体编排如下：

一是医学支线：以人体结构与生理功能、人体疾病基础、诊断学基础、老年医学为核心课程，夯实医学基础知识；二是护理学支线：以护理学基础、老年护理学为核心课程，强化真实护理场景的实操能力；三是预防医学支线：以健康管理学、健康评估技术与

实训、预防医学、健康心理学、社会医学为核心课程，培养群体健康的干预能力；四是康养与治未病支线：以中医养生保健学、运动与康复、公共营养学为核心课程，适配康养产业发展需求；五是工商管理支线：以管理学基础、微观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会计学基础、市场营销、企业连锁经营与管理、数据分析与应用为核心课程，以对接大型连锁类健康服务实体的就业需求；六是卫生事业管理支线：以行政管理学、卫生事业管理学、健康经济学、社会医疗保险学、病案信息学、医学统计学为核心课程，适配各类卫生机构与政府医保管理领域的就业需求。

（四）模式特征

该模式将五大学科维度与六类课程支线进行有机编织与融合，体现了其独有的特点：

一是人才的复合式培养，该模式进一步打破了医科与管理学科的壁垒，构建了多学科交融的知识谱系和学缘体系；二是行业场景的适配，基于历届毕业生就业去向而设计的“双管理”课程育人支线，增设了老年健康干预的相关课程，精准对接连锁养老、健康体检、医保管理等重点就业领域；三是回应时代变迁的诉求，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直面老龄化社会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既强化学生在老年健康管理领域的能力培养，又增设了数据分析课程，意在提升人才核心竞争力，实现人才培养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

四、“五维六线”育人模式的实践

（一）学情基础

右江民族医学院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于 2019 年首次招生，截至 2025 年累计培养学生 567 人；对 322 名毕业生的跟踪调查显示，就业去向集中在四大领域：连锁健康服务实体（42%）、医疗机构相关部门（35%）、政府与事业单位（15%）、继续深造与其他（8%）。毕业生数据为重构课程体系提供了直接依据，确保了新版培养方案与就业的精准对接。表 1 所示为 2019—2025 学年右江民族医学院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生培养情况。

表 1　右江民族医学院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生培养情况

入学年份	招生人数	在校情况
2019 年	40	毕业
2020 年	49	毕业
2021 年	108	毕业
2022 年	125	毕业
2023 年	128	在校
2024 年	56	在校
2025 年	61	在校
合计	567	

（二）培养目标的重塑

基于“五维六线”育人模式，2024 版培养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育人目标，即：实行小班化育人，突出综合素质培养，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健康服务行业、大健康产业及“健康中国”战略发展需要的本科人才；塑造具有良好敬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具备现代健康管理理念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达成“精专业、懂人文、有理想、能创新”的成长目标，实现“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就业导向，具备胜任“现代健康管理、医疗卫生管理、社区卫生服务、健康体检、养老护理”等行业场景工作的综合能力。

培养方案重点塑造人才的三大核心能力：一是医学与康养服务能力，能运用医学、护理学、康养知识开展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和一线护理服务；二是管理实践能力，能运用工商管理或卫生事业管理知识解决所在行业的实际问题；三是数据应用能力，能熟练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处理健康管理相关数据。

（三）课程体系的重构

1.2019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探索与局限

2019 版培养方案作为专业初创期的探索，虽初步勾勒出了课程体系框架，但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医学类课程冗余，包含内科常见病诊疗、药理学等深度医学内容，超出了健康管理专业在行业场景应用的真

表 2　不同版本培养方案的课程差异

维度	2019 版	2024 版
医	人体结构与生理功能、人体疾病基础、诊断学基础、内科常见病诊疗、药理学、全科医学	人体结构与生理功能、人体疾病基础、诊断学基础、老年医学
护	护理学基础	护理学基础、老年护理学
防	健康管理学、健康评估技术与实训、流行病学、健康心理学、社会医学	健康管理学、健康评估技术与实训、预防医学、健康心理学、社会医学
养	中医养生保健学、运动与康复、公共营养学	中医养生保健学、运动与康复、公共营养学
管	管理学基础、公共管理学、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公共政策学、领导科学、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中外管理思想通史、管理文秘事务与实践；卫生事业管理学、卫生经济学原理、健康经济学；保险学原理、社会医疗保险学、健康保险学；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健康服务与健康产业、市场营销学；卫生统计学、办公自动化	管理学基础、公共关系学、行政管理学、管理文秘事务与实践；卫生事业管理学、健康经济学、社会医疗保险学、病案信息学；微观经济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会计学基础、企业连锁经营与管理、市场营销学、人际沟通与礼仪；社会研究方法、社会学概论；医学统计学、数据分析与应用

实需求；二是预防医学类课程针对性不足，流行病学课程偏重理论研究，与健康体检行业实践脱节；三是管理类课程繁杂并蓄，涵盖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学等数十门课程，脱离行业实际；四是适配时代的发展不足，未设置老年健康相关课程，也缺乏数据分析能力培养模块 (见表 2)。

2.2024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创新与突破

2024 版培养方案以“五维六线”模式为指导进行系统性重构，形成四大特色创新: 一是适配老龄化社会，方案增设了老年医学、老年护理学课程，强化学生对老年健康的管理能力，并将内科常见病诊疗、药理学等深度医学内容整合并入诊断学基础课程，采用问题导向教学，突出应用属性，避免医学知识“过深过专”；二是强化实践导向，将偏重理论研究的流行病学课程替换为实践导向更强的预防医学课程，保留健康评估技术与实训、健康心理学等核心实践课程，实现与健康体检行业需求的精准匹配；三是聚焦行业应用属性，方案重构了管理类课程体系，构建“工商管理”与“卫生事业管理”双支线，分别对接“大型连锁健康服务实体”与“公共卫生、医保管理”两大核心就业方向，摆脱“形而上的管理”倾向；四是适应 AI 趋势，在医学统计学课程基础上增设数据分析与应用课程，以培养学生的数据处理能力，适配人工智能背景下健康行业对人才的数据素养要求。

五、结论

“医—护—防—养—管”五维六线育人模式以“健康中国”战略为导向，以产业行业对人才素养的需求为核心，以时代趋势为牵引，构建多学科融合的“五维”能力塑造路径与“六线”课程育人方式，破解了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传统人才培养中学科融合不深入、行业适配性不足、时代特征不鲜明等突出问题。

2024 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呼应了“五维六线”育人模式的内涵：一是体现学科间的融合，方案构建了“医护防养管”的复合体系；二是促成人才培养与行业应用的衔接，通过“双管理”课程支线与老年健康类课程的设置，适配多元就业场景；三是推动人才培养与时代发展的协调，通过增设数据分析类课程提升人才的数字能力。

该育人模式也应在实践中持续完善优化：一是继续保持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与大型连锁养老服务机构、健康体检中心、医保部门等共建实践教学基地，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二是建立课程动态调整机制，及时更新课程内容，适配健康产业发展趋势；三是深化师资队伍建设，打造“医学加管理”双背景师资团队，通过校企互聘等方式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 司建平，王先菊 . 我国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需求及培养现状研究 [J]. 医学与社会 ,2019,32(10):131-135.

[2] 钱国强，吴卫榆，李卫东，等 .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J]. 教育教学论坛，2020(49):127-129.

[3] 施毓凤，万广圣，郑国华，等 .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以上海健康医学院为例 [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08):262-263.

[4] 唐海峰，田小英，陈硕旋 .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究——以湖南医药学院为例 [J]. 教育教学论坛 ,2024(41):98-101.

[5] 陈江芸，梁振宁，曾艺欣，等 . 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专业课程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 [J]. 中国健康教育，2023,39(03):259-262.

[6] 若从彬，王先菊，司建平 . 中医药高等院校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J]. 中医药导报 ,2022,28(12):233-237.

[7] 杨芳，张玉杰，常明，等 .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J].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2024,18(03):217-22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广西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普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项重点课题“人工智能时代卫生管理人才数智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培养路径研究”(2025ZJY580)。

(作者：岑指昊，右江民族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通信作者石龙，右江民族医学院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新‘枫桥经验’”引领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新路径的研究

——以G省G市城中村为例

秦总根* 陈珊琪 廖昕怡 黄 圣 王韵淇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中村流动人口产生一系列问题，其管理机制的滞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文以沿海G省城中村为样本，采用实地走访方法，以“新‘枫桥经验’”引领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当前G省城中村管理存在环境复杂、人口流动性强、法律法规难以落实以及自治组织缺乏管理能力等问题，将“新‘枫桥经验’”运用于城中村内流动人口的管理，以实现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的提质增效，具体包括强化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实现“四治”有机融合、强化数字驱动的科技支撑等。

关键词：新“枫桥经验”；城中村流动人口；数字赋能；管理

城中村分布在城市的中心区域或者郊区，凭借其地理优势和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其中[1]。但是，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激增也引起了更多的矛盾，成为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是治安管理中的难点[2]。

20世纪60年代“枫桥经验”落地问世以来，“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理念在当地基层得到广泛的实践和检验，并在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笔批示后得以向全国推广，成为我国处理人民群众矛盾的重要实践和方法。进入新时代，这一经验被进一步拓展为“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枫桥经验’”，为流动人口密集的城中村实现有效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行路径。

一、“新‘枫桥经验’”引领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的逻辑

（一）人口集聚态势显著，承载城市城镇化发展动能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城镇常住人口约9.0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3.89%；和10年前相比，乡村人口减少1.64亿，城镇化率提升14.21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

城乡人口结构在持续优化，且城镇化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在全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城中村属于城市扩容发展中重要的过渡载体以及特色空间，其凭借区位优势、租住成本优势，已经成为农村转移人口、外来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首要落脚点以及过渡性居住空间[3]。

流动人口朝向城中村聚焦，也能够填补城市服务业、基础产业的劳动力缺口，为城市建设、民生服务等领域注入了充足的人力动能。人口的持续流入也能够推动城中村逐渐形成多元融合的人口结构，并且助力城乡人口流动、要素互通，当今已经成为助力城市城镇化进程以及激活城市基层发展活力的重要单元。各地针对城中村流动人口增长态势，持续优化人口登记、动态摸排、分类管理机制，逐步实现人口规模化、常态化、规范化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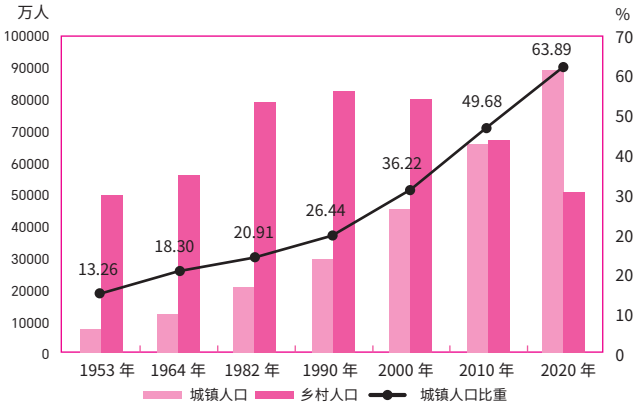


图1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城乡人口变化情况

（二）“新‘枫桥经验’”引领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的内在机理

1. 开创警民共治的良好局面

在“新‘枫桥经验’”的指导下，警民共治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一方面，公安机关积极转变，打破传统单一职能约束，由传统的管理者形象积极转变为新型的社会服务者，将警力下沉，深入基层一线，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服务。通过建立警民联调、警民联防等机制，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治安防范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也被充分动员起来，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人民群众在警民关系拉近的基础上，为民警提供治安线索，也积极协调城中村中民众的矛盾。群众也依托基层自治组织等多元途径主动表达现实诉求，参与城中村公共事务协商，监督政策落地执行，化解邻里基层矛盾[4]。

2. 引导管理向公共服务转型

在基层治理的实践中，不断涌现的矛盾、错综复杂的冲突以及风险的外溢效应，共同揭示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作为转变的迫切性[5]。所谓“新‘枫桥经验’”，其核心在于坚持“矛盾就地解决，服务全面到位”的原则，这既要求建立健全一个高效且稳定的利益协调机制，以迅速应对并从根本上消解矛盾；又聚焦于实现公共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以公众广泛认可为目标，构建新型公共服务体系，从而实现矛盾化解与公共服务之间的深度融合与良性互动[6]。把纠纷排查疏导嵌入日常便民服务全过程。以民生服务作为治理嵌入点，在办事服务中倾听群众诉求、理顺情绪分歧，从源头减少矛盾滋生，构建服务前置、调解跟进、闭环处置的基层治理运行模式。

3. 推动多元化自治的可行性

近年来，浙江省枫桥镇在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的过程中，尤为注重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培养。在探讨现代社会结构层面时，“城市社区”这一基层组织形式无疑是经济、文化及多重社会因素融合的产物[7]。随着城市社区内部矛盾冲突的日益增加，一种名为“党建 +N”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推动社区治理的新方向变革。该模式强调将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深入渗透到城市社区的每一个角落，以此作为改造社区治理结构的基石，并激励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细致倾听并理解群众多元化、复合型的利益需求。整体来看，依托“枫桥经验”推行多元化基层自治拥有政策、实践、人力与机制多重可行性。

二、城中村流动人口治理的发展优势与向好态势

（一）空间治理持续升级

当今在城市更新以及基层治理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城中村的空间建设以及治理规范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各地聚焦城中村建筑布局、基础设施、公共空间等核心板块，持续进行违建整治、街巷规整、楼栋标准化改造工作，并逐渐改善了以往建筑密集、布局零散的问题。针对城中村人口聚集度比较高的特点，政府也持续完善消防、安防、交通以及便民服务等基础项目，并构建出全方位的治安防控体系，从而实现监控全覆盖以及巡查的常态化[8]。

（二）人口流动有序规范

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合理流动与有序集聚，是城市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重要体现方式。当今各个地方持续性推动城中村规划升级，并有序进行老旧片区改造、功能业态优化，以此来推动城中村能够从传统的居住空间逐渐向城市配套服务空间进行转型，也能够实现人口居住、就业以及生活的衔接。对于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各个地方人社、社区部门要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就业指导以及相关岗位对接服务，共同助力流动人口提升自身职业技能，并稳定就业岗位。

（三）法治宣传纵深推进

各地都需要高度重视城中村的法治建设，并针对流动人口群体的实际特征，开展常态化的法治宣传、普法教育、权益保障科普等工作，以此来持续提升流动人口的法律认知、法治意识以及守法自觉性。当今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学历结构也在持续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文化水平以及综合素养逐渐提升，传统的学历结构不均衡格局得到持续性改善。

（四）自治组织日趋成熟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中村群众自治组织不断发展成熟，当今已经成为衔接政府治理、服务流动人口、参与基层共建的核心力量。当前阶段各个地方持续赋能社区自治组织、楼栋自治小组、流动人口志愿队伍等基层自治主体，明确自治权责、优化工作机制、拓宽服务范围，彻底激活基层自治活力。城中村自治组织立足辖区人口特点，能够常态化进行人口摸排、便民服务、矛盾调解、环境维护、政策宣讲等工作，这样也能够衔接政府公共服务与群众日常需求，补齐基层治理服务末梢短板。

三、“新‘枫桥经验’”引领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管理新路径

（一）强化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

党建引领是“新‘枫桥经验’”的本质特征，也是我国基层治理独有的优势。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的主体不能再仅局限于某个地方的一两个部门，而是应该发挥党建引领在加强政府、公安机关、基层自治组织等多方综合治理的耦合作用，利用国家大政方针对各个不同治理主体进行联合，同时加强在社会保险、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涉及民生等多个领域的信息交流，急人民之所急，充分了解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实时情况。作为“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延伸，它着重强

调了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致力于提升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动员能力与领导驾驭能力。在此基础上，基层组织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并对党建引领进行了创新，创造出一系列“党建 +”的基层治理模式，诸如“党建引领下的平安社区建构”“党建为志愿服务注入活力”以及“党建与社区文化融合发展”等，这些举措有力地体现了社区党组织作为坚强战斗堡垒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优化、赋能并引领了城市社区治理的整体效能。这些路径跳出老旧思路，把外来务工群体从基层的监管对象转化为基层共治的参与主体，既能降低城中村出租屋的消防安全隐患、防范流动人口引发的群体性冲突风险，妥善落实社保、子女入学、医疗便民等民生保障事项，也能弱化本地常住居民与外来流动人口的社群隔阂，提升流动人口的社区归属感。后续可以结合不同城中村片区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就业类型细化治理规则，持续构建共建共治的运行体系，助力城市片区实现长治久安，有序发展。

（二）多元共治，彰显合作效能

“新‘枫桥经验’”依托政府与社会协同、群众共防共治等多项机制，吸纳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融入社区事务，推动行政体系与基层自治的互补共振，勾勒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这就需要基层治理主体精准把握居民的深切期望并动态回应其多元诉求，以差异化治理策略匹配居民群体多样化利益需求，做到“想人民之所想”。此外，要培育群众自治组织的管理能力。社会公益组织、社区组织等各方人员需实地走访调研，从而明确城中村流动人口实际诉求及处境，同时加强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居住管理，向基层公安机关以及上级组织进行实时反馈，着力解决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问题，关心城中村流动人口心理状态，为保证其更高质量的生活提供必要服务与支持。满足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共同诉求，如就业指导、法律援助等，提升城中村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融入感。

不同主体可以依托自身资源补齐治理短板。属地企业可面向外来务工者提供工作岗位，开展岗前培训，缓解流动人口就业问题。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社工专业优势，针对外来务工群体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开展一对一心理疏导。热心租客和本地房东可以组成居民自治小队，就近缓解邻里噪音、租金扯皮等微小矛盾，在源头消除隐患。政府部门可以搭建常态化多方议事平台，定期邀请流动人口代表列席社区议事会议，完善社区管理方案。多元主体可以破除政府单向管控的困境，引导流动人口从被动的治理管控对象转变为社区的共建参与者。

（三）过程管理，实现“四治”有机融合

“新‘枫桥经验’”解决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的实践，需要将自治、德治、法治、智治有机结合。首先，自治是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的重要基石。通过建立和完善社区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或流动人口自治小组，可以充分调动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良好氛围。其次，德治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智慧结晶，在现代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中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通过树立道德典范、开展公德教育、推广志愿服务等活动，可以引导流动人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个人品德和社会责任感。再次，法治是推进法治化在城中村流动人口管理的根本。当前，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矛盾冲突往往不再局限于家长里短，而是涉及物权、经济、金融等多个方面，因此仅仅依靠自治、德治等还远远不够。法治化思维和法治化手段的嵌入，有力地为化解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支撑。在推动城市社区治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智治无疑发挥着引领作用，成为不可忽视的先进力量。它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的强大潜力，精心编织起一张覆盖社区生活的智慧网络。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四类治理手段并非独立运作，而是贯穿隐患摸排、纠纷调处、便民服务整套治理流程，能够助力实现长效善治的核心目标，持续优化城中村流动人口基层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1]Ke M,Yuhao L,Wangbao L.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Identification and Perceived Acceptance for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J].Geography &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2024,40(02):45-72.

[2]Rui Z,Xiaowen D.Research on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Urban Integ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J].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2024,9(02):16-33.

[3]Qin M.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com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Based on the Data of 2017 National Floating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J].Modern Management,2022,15(04):36-68.

[4] 刘天文 . 城乡多元共治 : 城中村流动人口治理的机制创新——基于广州市 N 街道的调查分析 [J]. 城市学刊 ,2024,45(01):75-82.

[5] 邹静 , 邓晓军 . 居住社区选择、主观认知和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 [J]. 人口与发展 ,2021,27(03):2-17.

[6] 周雯雯 . 基于多元治理目标的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有机更新模式研究 [J]. 建筑经济 ,2024,45(11):81-88.

[7] 杨晶 . 城中村聚居流动人口的空间实践与城市融入 [D]. 广州 : 广州大学 ,2023.

[8] 薛明月 . 城中村改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探析——以山西省太原市 S 村为例 [J]. 山西农经 ,2021(22):103-104.

（作者：通信作者秦总根，四川警察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警官学院治安与交通学院教授；陈珊琪、廖昕怡、黄圣、王韵淇，广东警官学院本科生）

大学生“就业内卷”现象的研究分析
——以东营市为例

郑钧文　厉明杰　杜丕隆　韩鹏羽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大学生基数的增加，以及人们普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学生就业难”“就业内卷”成了一个现实问题。目前某些领域的就业形势依旧比较严峻，这也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内卷”，且国内对其研究比较少。本文主要从经济环境、市场、社会发展、大学生特点等方面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就业内卷”的原因、探讨内卷的症结所在。同时以东营市大学生为例，结合社会经验，通过分析政府、用人单位、高校和大学生等情况，探索解决问题的切实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困难；就业内卷

一、研究目的

本文在信息化时代大背景下，主要阐述国内大学生的就业和内卷现状与原因，分析我国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内卷问题，并根据调查、访谈收集的实际情况，提出缓解中国大学生就业内卷的对策和建议，以帮助大学生解决或缓解就业内卷的问题。

（一）深度剖析“就业内卷”，弥补学术研究不足

我国大学生“就业内卷”的研究仍有不足，在中国知网上以“就业内卷”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得到342个结果，且大部分是“内卷化”研究，专门针对就业内卷的研究更少。且现有研究概念界定比较模糊，常将“就业内卷”与就业困难混为一谈，未充分考量大学生群体就业竞争的独特性，即竞争并非单纯源于岗位数量短缺，更是优质岗位供需失衡、大学生就业期望与现实错位，学历、能力与岗位要求不匹配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1]。

（二）助力高校专业人才培养结构调整，提升学生就业适配性

在“就业困难”和“就业内卷”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与就业市场需求的脱节问题愈发凸显。新兴专业因不确定性较高而建设缓慢，传统专业未能及时转型升级，导致毕业生专业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2]。课程体系重理论轻实践，实践教学环节薄弱，学生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难以满足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同时，高校就业指导服务针对性不强，多为泛泛的求职技巧培训，缺乏对学生个性化职业规划的指导，无法帮助学生应对复杂多变的就业市场。

（三）引导企业优化招聘策略，促进人才合理配置

部分企业在人才选拔中应更加注重岗位实际需求与人才能力的匹配，避免过度依赖学历作为唯一标准，以促进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虽是相同岗位但不同企业对招聘环节和招聘需求各不相同，增加了大学生求职的时间和不确定性，也影响企业招聘效率和质量。

（四）指导大学生理性择业，实现个人职业发展

在“就业内卷”的严峻形势下，大学生就业观念存在偏差，部分学生过度追求“铁饭碗”，热衷于报考公务员、事业单位等岗位，导致这些岗位竞争异常激烈；过于看重薪资待遇、工作环境、企业知名度等外在因素，忽视自身职业兴趣、能力和长远发展，盲目跟风求职。同时，大学生的求职技巧和能力不足，在简历制作、面试表现、职业礼仪等方面缺乏专业指导和训练，难以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为弥补差距，往往选择投入更多物质和精力，虽有一定提升，但也促进了更加激烈的“就业内卷”。此外，面对激烈的“就业内卷”，大学生容易产生焦虑、自卑、迷茫等负面情绪，影响求职心态和就业决策，忽视了个人兴趣与个人实际能力，盲目地深陷到内卷当中，迷失自我。

（五）研究政策，促进就业市场良性发展

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仍待提高，政策落实效果仍待加强[3]；区域就业政策不平衡，人才过度集中：东部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且内卷严重，但中西部地区和基层

人才流失严重，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4]。

二、理论分析

“就业内卷”一词最早用来描述就业市场中的过度竞争现象。1963 年，美国人类学家 Clifford Geertz 将其引入农业经济领域 [5]。1985 年，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首次用中文“内卷”阐释清朝农民面临的困境 [6]。后来，“内卷”概念逐渐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在就业领域，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求职者为获取有限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学历、技能等投入，却未带来整体就业质量提升，“就业内卷”现象由此产生并被广泛提及。

“就业内卷”是在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与优质岗位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非理性、低效化竞争状态，其核心表现为求职者为争夺有限的就业机会，持续追加时间、学历、技能、经济等成本投入，但整体就业质量如薪资水平、岗位匹配度、职业发展空间未同步提升，甚至出现“投入越多、边际收益越低”的恶性循环。

从形成逻辑看，其源于两大核心矛盾。一是供需总量失衡，即高校毕业生数量增长速度长期高于岗位供给增速，尤其优质岗位增量有限，直接加剧竞争烈度；二是竞争标准异化，市场评价体系过度聚焦学历、证书数量、实习经历等硬指标，忽视求职者与岗位的能力适配性，导致陷入“被动加码”的竞争怪圈。

从特征来看，它具有三个显著属性。其一，博弈性，个体通过额外投入获得岗位的过程，本质是对其他求职者机会的挤压；其二，成本低效性，额外投入的时间（如反复备考）、费用等，对求职成功率的提升作用逐渐减弱；其三，群体非理性，多数参与者明知竞争成本过高，却因“不投入就会被淘汰”的焦虑，不得不跟随竞争节奏，形成难以打破的内卷闭环。

三、“就业内卷”现象产生原因

（一）智能化时代对人才的新要求

当今世界已迈入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的时代。为提高产能和节省成本，大多数工厂已经实现半自动化，智能产品已经取代了一些人为设置的岗位，这些岗位覆盖面广、基础性强、要求较为简单 [7]，如最为先进的农业大棚只需要 1~2 人进行管理，无人快递车频繁出现在大街小巷中，道路桥梁等检测也搭配了机器人辅助工作等。

同时，一些前沿产业也在积极探索让 AI 取代更多的劳动岗位 [8]，且企业所需的人才类型也在发生变化，逐渐转向高端人才 [9]。

（二）经济发展趋势与政策要求

信息化时代下智能化产业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共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因此，“就业难”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有学者指出当前就业状况存在三大结构性矛盾 [10]，即供需矛盾、行业错配与区域不平衡发展。近几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目前甚至未来几年的总体就业压力不会减轻，结构性问题仍将明显存在，其他影响因素也将持续存在。所以必须优先解决就业难题，并首次将“就业优先”战略提升到国家宏观调控层面 [11]。可见，就业不仅关乎民生，也是促进国民素质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企业人才需求开始转向

企业的持续发展，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然而，目前企业可以提供的职位无法满足大学生的充分就业需求。企业所需的人才类型也逐渐转向高层次人才，而大多数毕业生由于自身能力的不足，无法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四）大学生就业现状

教育部 1999 年出台《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2] 伊始，随着全国高校的逐渐扩招，近年来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在四年前突破千万级毕业生人数后仍持续增长，至 2025 年创下 1222 万人的新纪录，2026 年仍持续增长，企业用人需求虽有增长，但远远无法达到毕业生数量增长的速度，更难弥补二者差距，这就直接导致大学生“就业难”“就业卷”的问题。

四、调查分析过程

（一）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线上、线下问卷向东营市的已毕业学生和大四学生发放问卷。为确保样本的多样性和代表性，涵盖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专业。共发放问卷 7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38 份。同时，对 19 位大学生进行了一对一访谈，并与 4 位高校就业指导老师开展了座谈会，可以从不同角度了解大学生就业内卷现状。

1. 竞争激烈程度

（1）岗位竞争比。平均每个招聘岗位收到的大学生简历数量达到 15 份，部分热门岗位如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的技术岗等核心岗位，竞争比更是高达 32 ∶ 1。

（2）求职时长。大学生平均求职时长为 42 天，其中 17% 的学生求职时长超过 2 个月。在访谈中，不少学生表示为了找到满意工作，经历了漫长的求职过程，不断投递简历、参加笔试面试，身心俱疲。

2. 求职成本投入

（1）经济成本。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平均花费为 909 元，主要包括购买求职辅导资料（平均 152 元）、参加各类培训课程（平均 617 元）以及面试产生的交通、住宿费用（平均 381 元）。参加热门笔试、面试培训课程花费 1000~3000 元不等，有些甚至超过 1 万元。一些追求高质量简历制作的学生，花费在简历上的费用超过 100 元。

（2）时间成本。大学生用于求职准备的平均时长

为 42 天，包括学习求职技能、准备面试、了解企业和岗位信息等。部分学生会选择待业进行考公、考编或考研的学习，即“二战”“三战”等。很多学生从大三甚至大二就开始关注就业信息，全身心投入求职准备。

3. 就业期望与现实差距

（1）薪资期望。大学生期望月薪平均为 5500 元，其中一、二线城市学生期望月薪达到 7000 元左右；而实际获得的月薪为 5000 元左右。在某些城市，不少大学生实际月薪在 4000~5000 元之间，难以达到预期。

（2）就业地点期望。约 81% 的学生期望在一、二线城市或新一线城市就业，但实际在这些城市就业的比例低于 20%。且部分学生因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等原因，最终选择回到家乡或前往三线城市就业。

4. 实习经历与考证情况

（1）87% 的企业在招聘时将实习经历视为重要因素，63% 的大学生表示有两段及以上实习经历。为丰富实习经历，很多学生利用寒暑假奔波实习。

（2）每位大学生考取证书数量约为 3 个，部分专业学生为增加竞争力，考取与专业不相关的证书，如工科专业学生考取教师资格证等，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备考。

5. 学历提升情况

面对就业压力，56% 的大学生想考研，19% 的计划考公、考编，25% 的计划考国企，约 22% 的学生想多方准备。考研报名人数逐年递增，部分学生为考研放弃秋招机会，选择“二战”“三战”的考生不在少数。

（二）情况分析

1. 主要产生原因

（1）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然而，就业岗位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尤其在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国际关系不稳定的背景下，部分行业岗位需求减少，导致人才市场供过于求，竞争加剧。

（2）一方面，大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有限，对企业招聘需求、岗位详情了解不全面，导致盲目投递简历；另一方面，企业难以精准找到合适的人才，招聘成本增加。例如，部分小型企业的招聘信息仅在小范围发布，大学生很难及时获取；高校就业信息平台因影响力有限无法针对非本省学生给予单独的就业指导，只能宽泛地提供就业知识。

（3）部分大学生就业观念传统，过于追求稳定、高薪、体面的工作，对某些新兴行业、中小企业、基层岗位关注度低，就业选择面狭窄。且学生因认为创业难、基层工作累、离家远等问题而对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创业公司、中西部地区基层岗位少有问津。

（4）招聘标准高。企业为提升竞争力，要求应聘者专业知识扎实、注重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等综合素质。很多企业倾向于招聘名校毕业生或有丰富实习经验的学生，导致普通院校学生、缺乏实习经验的学生在求职中处于劣势。

2. 产生影响

（1）“就业内卷”带来的巨大压力导致大学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增多。调查显示，27% 的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感到焦虑，3% 的学生出现失眠、食欲缺乏等身体症状。

（2）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大学生可能会盲目跟风考证、实习，忽视自身兴趣和职业规划，导致入职后发现工作与自身期望不符，不利于职业的长期发展。同时，过度竞争可能使部分学生选择妥协，从事与专业、能力不匹配的工作，限制其职业发展空间。

（3）“就业内卷”促使高校更加重视就业工作，但也可能导致过于注重就业率，而忽略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生职业规划指导和综合素质培养。

五、分析与建议

本次调查表明，大学生“就业内卷”现象较为严重，体现在竞争激烈、求职成本高、就业期望与现实差距大等多个方面。这一现象是由扩招、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学生就业观念偏差、企业招聘标准提高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对大学生身心健康、职业发展以及高等教育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为缓解大学生“就业内卷”，需要社会、高校和大学生自身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大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一）从大学生的角度来看

大学生应解放思想，转变就业观念，实现长远职业发展，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理性看待就业形势，拓宽就业视野，积极关注新兴行业和中小企业的就业机会。

大学生应首先树立独立意识，保持积极心态，保持乐观态度，摒弃不切实际的就业虚荣心与依赖思想，树立持久的职业观。要改变单纯追求高薪的传统就业观念。应更加注重长远发展，增强竞争意识，营造就业氛围，树立终身学习理念。

大学生应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树立正确的目标和志向。从大一开始了解自己的兴趣、优势和职业目标，有针对性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明确方向，探索可行措施，发挥特长，开发潜力，克服困难和障碍，并不断努力。注重综合素质培养，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还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创新创业项目等，提高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

经过学习和培养，大学生在知识积累方面具有优势，可以成为就业大军中的佼佼者。然而，长期学校教育往往会使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实践能力差。因此，学生应主动考虑社会需求，发挥专业特长，避免不利因素。

（二）从学校角度来看

1. 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就业指导

校园招聘是大学生就业最重要的渠道。其实际

效果并未发挥到最大，而信息充分的专业招聘会因其针对性强而受到毕业生的欢迎。就业指导教师应重视并努力改变校园招聘会存在学生过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及时更新就业观念，遵循就业发展的规律。招聘会必须根据市场进行详细划分，并创新方法和模式。

2. 完善教育模式，加强市场联系

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下，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同时，高校专业结构的调整将影响和推动劳动力和人才结构的重建，也将推进和指导优化经济结构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当务之急是在高校与社会之间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根据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优化专业设置，及时调整专业结构，加强新兴专业建设。加强实践教学，增加实习实训课程比重，建立稳定的实习基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3. 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

高校应加快毕业生就业信息网络建设，实现就业信息管理的现代化。例如，高校的条件和毕业生的详细个人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向企业开放，使企业能够及时、充分地了解毕业生的详细信息。与此同时，企业的综合信息也应向大学生开放。

4. 加强就业指导

学校应将就业指导融入整个教育过程。密切联系学生，掌握学生就业思想的发展趋势。通过专题讲座和其他形式，帮助大学生客观认识当前就业形势，客观认识自己，寻找合理的就业渠道。

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开设全程化、个性化的职业规划课程，邀请企业专家举办讲座和培训，提高学生的求职技能和就业竞争力。开展多种求职技巧培训，帮助大学生掌握有效的求职方法和策略，提高求职成功率。关注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方式，帮助大学生缓解就业压力，调整求职心态，增强自信心和抗挫折能力。鼓励大学生拓宽就业渠道，关注新兴行业和领域的就业机会，积极参与创新创业活动，实现多元化就业，为大学生实现职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支持。

学生就业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程，而“就业内卷”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如何抓住机遇是一个仍待深入研究的问题，国家、社会和学校都要为之努力。各方要协调配合，建立完善的用人规章制度，使毕业生就业工作规范化、系统化。只有保障人才公平竞争，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维护。

六、结语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转变为普及教育。然而过时的就业观念仍然对大学生的就业思想产生着影响，阻碍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转变。对学生来说，他们想找到自己期望的好工作，但是个人实力却又远远达不到要求。因此，就业困难是导致“就业内卷”的根本原因，而就业观念狭隘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大学生只关注热门就业地区和热门行业工作，而忽略了其他可能更有意义的工作机会。

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内卷的问题，必须探索多种方法相结合。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长期解决大学生就业的严峻问题。如果多方共同合作参与，大学生就业内卷问题一定会得到缓解。

参考文献

[1] 张宏辉，徐丽红，伍强瑞．大学生就业“内卷化”：表征、机理与对策 [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4,44(12):64-71.

[2] 吴丹妮．以高质量就业为导向构建高校就业育人体系的思考 [J]. 中国林业教育，2025,43(05):63-67.

[3] 秦芳，徐利军，欧阳俊．主动应变，加大青年群体就业政策支持——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2025年二季度就业形势分析会会议综述 [J]. 中国大学生就业，2025(07):93-96.

[4] 赖德胜，胡起源．“十五五”时期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形势与政策体系研究 [J]. 河南社会科学，2025,33(10):11-24.

[5]McCullough C.Review of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y Clifford Geertz[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2019,3(01):5.

[6]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500.

[7] 杨伟国．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市场效应与范式效应 [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29(05):41-52.

[8] 倪浩．“AI重塑劳动力市场”引美多方讨论 [N]. 环球时报，2025-09-30(06).

[9] 荆思凤，刘希未．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未来大学生就业 [J]. 中国大学生就业，2025(08):30-41.

[10] 曹洪军．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的专业结构性矛盾研究 [D].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2011.

[11] 姚崇，刘凌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 [J].中国大学生就业，2025(09):3-11.

[12] 周彬．中国教育政策对经济体制转型的归依——解读《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J]. 教育科学，1999(04):1-4.

（作者：郑钧文，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助教；厉明杰，日照航海工程职业学院助教；杜丕隆、韩鹏羽，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本科生）

希望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就业焦虑的生成逻辑与干预路径
——以大别山精神教育为例

刘远泽

摘要：缓解大学生就业焦虑是当前高校就业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运用积极心理学中的希望理论，剖析了就业焦虑在目标、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三个维度的深层心理成因。研究发现，大别山精神所蕴含的价值意蕴与希望理论的认知动力系统在结构上高度契合。基于此，构建了“目标重塑—路径思维活化—动力思维蓄积”的三阶转化机制，以信念叙事促成职业价值的内在认同，以破局智慧引导职业通道的多元建构，以信念感召与集体支持积蓄行动势能，为大别山精神有效融入大学生就业心理疏导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希望理论；就业焦虑；大别山精神；生成逻辑；干预路径

一、引言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结构性就业矛盾不断凸显[1]。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00多万人，再创历史新高[2]。随着大学生毕业总量压力与就业领域结构性矛盾的叠加，大学生就业焦虑问题日益突出。就业焦虑是指个体在面临职业选择时产生的一种紧张、不安、强烈、持久的情绪体验[3]。相关调查显示，约45%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4]。积极心理学中的希望理论为缓解大学生就业焦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理论指出，希望并非单纯的情绪体验，而是由目标、路径思维、动力思维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的认知动力系统，并且一个人的希望取决于他是否有清晰的目标、能否找到通往目标的多条道路、是否有足够的心理能量坚持走下去[5]。就业焦虑不仅是对外部就业环境的应激反应，更是大学生在面对就业时认知动力系统受阻的心理表征。因此，从希望理论视角审视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心理成因，进而探索有效的教育干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大别山精神蕴含丰富的心理资本，是修复希望感、重塑心理资本的潜在教育资源。以希望理论为分析视角，探索构建大别山精神教育缓解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心理转化机制，以期为红色文化赋能高校心理育人实践提供新的学理阐释。

二、生成逻辑：希望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心理困境

（一）目标的悬浮状态

目标是希望的起点和方向，是指个体想要达成的未来状态。大学生在职业目标的确立上存在两类突出问题，折射出目标系统功能失调的深层表征。其一，空洞的职业目标。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兴趣、能力优势和价值取向缺乏清晰的自我认知，尚未完成从学生角色向职业角色过渡所必需的身份认同建构。目标的缺失使求职行为失去了方向感与意义感。其二，他人期待的职业目标。有些大学生所持有的职业目标并非源于内在的价值认同，而是被家庭期待、社会舆论或同辈竞争所裹挟和塑造。

（二）路径思维的窄化倾向

路径思维指的是个体具备的能够生成通往目标的有效策略和替代方案的认知能力。路径思维的窄化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求职路径单一。在“过独木桥”这种求职心态的影响下，职业选择主要集中于考研、考编等传统且稳定的岗位。其二，职业认知的僵化。职业认知的僵化与就业焦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当考研、考编等传统路径受阻后，难以迅速调整职业认知。既缺乏对基层就业、西部计划、新兴行业等多元化路径的价值认同，也不愿正视现实就业环境的客观挑战。其三，职业决策的瘫痪。面对职业抉择时，因害怕做出错误决定而进入决策回避状态，最终以慢就业为由陷入被动的等待与观望之中。这加重了大学生的不确定性焦虑。

（三）动力思维的耗竭表现

动力思维是指个体运用自我调节的心理能量推动目标达成的动机系统。动力思维耗竭在大学生就业焦虑中呈现出四个特征。其一，自我效能感持续降低。求职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与高被拒风险，每一次简历石沉大海、面试失利等，都是对心理能量的一次消耗。反

复求职失败使“我能行”的信念逐渐被侵蚀，自我效能感呈阶梯式下降。其二，归因偏差的出现。将求职失败片面归因于自身能力不足或者外部因素，而不是辩证地、客观地分析失败的真正原因。其三，行动退缩的加剧。经历多次求职失利后，主动降低期望，减少投递简历频次，甚至彻底放弃找工作[6]。这种回避性应对策略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焦虑体验，但从长远来看却强化了习得性无助的恶性循环。其四，情绪耗竭的深化。持续的求职挫败与不确定性使学生陷入忧虑、焦虑乃至抑郁的消极情绪状态，其主体行动力受到严重抑制。

三、结构契同：大别山精神与希望理论的内在联系

大别山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内涵与希望理论的认知动力系统形成了深层结构契合，为精神资源向心理资本的转化提供了天然通道。

（一）心理资本的内在蕴藏

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大别山精神可以被转化为大学生可以激活的心理资本[7]。这些心理资本包括心理韧性、认知广度、全局思维、开拓进取、社会支持等，恰好覆盖了希望理论中目标、路径思维、动力思维三个维度的培育需求。

（二）目标系统的信念锚定

回望大别山军民长达二十八年的革命之路，虽历经了多次沉重的打击，但其信仰从来没有动摇，目标也始终清晰而坚定。当运用沉浸式叙事来传播大别山精神的时候，会出现社会学习理论当中所描述的替代性经验效应。学生在体会先辈于绝境之中坚守目标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积极的认知映射：先辈们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都能够坚持下来，自己也许也可以做到。这恰恰是提高自我效能感的关键之处[8]。具体而言，大别山精神对目标系统的信念锚定在三个方面起到作用。其一，观察学习与提高自我效能感。社会认知理论表明，观察学习他人的相似成功经历能够增强观察者的自我效能感。大别山先辈和当代大学生在直面困境、寻求突破的过程具有相似性，先辈的奋斗历程能够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其二，意义赋予与使命责任。当学生将个人职业选择与国家发展需求、社会价值创造相结合的时候，职业目标会让个人产生崇高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大别山先辈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历史，为大学生求职提供了赋予意义的红色实践范本。其三，认知映射与信念重塑。沉浸式学习促使学生在情感共鸣中达成“从我不行”到“我可以试试”的认知转变，进而突破消极的自我局限。

（三）路径思维的认知拓展

大别山革命史中所蕴含的破局智慧，为路径思维的认知重构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9]。其一，胸怀全局，教学生看得更宽广、更全面、更深远。革命年代，大别山根据地的每一次战略进退，都服务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全局。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转战川陕开辟新根据地是基于全局形势的主动调整。将这一全局意识投射到大学生求职中，要引导学生跳出“非一线城市不去、非体制内不进、非名校深造不可”的狭隘坐标系，树立“到基层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广阔就业观念。其二，勇当前锋，教学生思维更新、更活、更通透。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敌人腹地，展现了敢于舍弃沉没成本、勇于开辟新路的勇气。在职业抉择中，这对应着敢于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尝试新兴行业和跨界发展的创新型职业决策能力。

（四）动力系统的能量补充

动力思维的耗竭需要从内在信念加固与外在支持供给两个方面进行“补能”。大别山精神中的坚定信念与团结奋进，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修复这两方面的心理能量。其一，坚定信念，修复内在动力。红二十八军战士在极端困难中坚持游击战争的历史事迹，能够激发学生产生“他们能坚持、我也可以的”的信念，从而对非适应性的归因偏差产生矫正效应。其二，团结奋进，修复外在支持。大别山区“家家是哨所、人人是战士”的互助网络，为大学生提供了集体支持的历史经验参照。当学生通过集体学习、主题讨论、互助小组等形式共同感悟大别山精神时，便会产生强烈的群体归属感与心理认同感，有效消解“只有我焦虑”的孤独心理体验。

四、干预路径：大别山精神教育缓解就业焦虑的三阶转化

大别山精神需要通过教育转化为心理资本[10]。将大别山精神的价值意蕴系统性地转化为可操作的心理教育策略，强化学生职业目标规划，开辟多元化求职路径，提升求职心理动力，以理性平和、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就业挑战。

（一）目标重塑：以信念叙事促进职业价值的内在认同

目标重塑的核心是通过沉浸式信念叙事的方式，系统运用大别山的精神资源，帮助大学生根据自身实际确立具有内在认同感的职业目标。在具体实施中需把握三个重要环节。第一，精选叙事素材。优先选取与当下就业困境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的历史人物故事。例如，讲述一位出身富裕家庭却毅然投身革命的青年事迹，引导学生思考两个问题：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支撑他走下去的是什么？通过讨论，使学生意识到真正的职业目标来自内在的价值认同，而非外部期望与压力的简单投射。第二，设计反思性活动。在完成信念叙事后，适时地引导学生回答两个问题：如果我是当年的他，面对那样的困境会怎么选择？这个故事对我当下的求职有什么启发？让学生在反思中完成从听故事到反观自身的认知迁移。

（二）路径思维活化：以破局思维引导职业通道的多元建构

路径思维活化的关键策略在于借助大别山革命史中所蕴含的破局智慧，助力学生打破单一化的求职路径依赖、僵化的职业认知模式和瘫痪的职业决策方式，进而建立起多元化的职业通道。第一，建立基于历史经验的隐喻对照模式。将大别山革命史中的战略智慧与当代求职策略形成明确的认知对应关系。又如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开辟川陕根据地的那次战略转移，这相当于在求职时放弃竞争激烈的热门赛道，转而朝着中西部、基层或者新兴行业去寻找新的职业发展空间。这样的隐喻对照能够促使学生建立路径转换是生存智慧的积极认知模式[11]。第二，组织红色情境推演活动。创设决策情境并提出开放式问题，即假设你身为红二十五军的指挥员，奉命率部长征，前方敌情不明，而后方追兵紧逼，你会选择怎样的行军路线？学生分组讨论，分享各自的决策方案。随后，引导其进行类比推理：在求职过程中，当初设目标遭遇阻碍时，能否像指挥员那样迅速评估形势，制定备选方案。第三，绘制个性化职业路径规划图。让学生绘制自己的职业路径规划图，至少标注主攻路径、备选路径和创新路径，并在每条路径旁注明对应的历史案例。这种具象化的思维训练方式对增强路径思维的灵活性是有帮助的。

（三）动力思维蓄积：以信念感召与集体支持积蓄行动势能

动力思维蓄积的核心策略是通过大别山精神中所蕴含的信念感召与集体支持要素，修复被损耗的心理能量，积蓄直面求职挑战的行动势能。在信念感召层面，重点发挥替代性经验的效能。系统讲述大别山军民在缺粮、缺弹、被围困的绝境中保持有效行动的历史故事，突出“只要还在走，就还有希望”的精神内核。鼓励和引导学生认识到求职中的挫折不是绊脚石，而是通向成功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磨砺。在集体支持层面，系统创设集体性的体验场景。组织参观革命纪念馆、重走红军路、合唱红色歌曲等集体活动，在共同参与和情感共鸣中拉近心理距离。组建大别山精神学习小组等就业互助团体，定期举办求职经验分享会，消解“只有我焦虑”的孤独感。同时，为选择赴基层就业、西部就业、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业的学生举办庄重的出征仪式。将个人选择升华为集体行动，赋予个体更强的心理韧性，进而促使大学生的心理能量从耗竭走向持存，持续积蓄大学生面对求职挑战的行动势能。

五、结语

缓解大学生就业焦虑的关键在于重建希望感。大别山精神教育通过目标重塑、路径思维活化、动力思维蓄积的干预路径，可以实现心理资本的系统性培育。这让悬浮的目标于信念叙事里再度扎根，获取内在认同的精神力量；让窄化的路径在破局智慧中再次贯通，得到多元建构的认知视野；让耗竭的动力在信念感召与集体支持中再度蓄积，获得持续行动的势能。把希望理论引入红色文化育人研究，拓宽了希望理论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边界，还为缓解大学生就业焦虑提供了兼具理论深度与操作可行性的方法指引。大别山精神作为本土化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其心理转化功能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与系统开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J]. 求是 ,2024(21).

[2]新华网.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270万人[EB/OL].(2025-11-20)[2026-06-01].https://education.news.cn/20251120/0b6555b37e694cbcb00208581b5141f6/c.html.

[3] 李元薇 , 崔树军 , 任永友 . 职业生涯规划心理干预模型的构建及实施 [J]. 中国成人教育 ,2022(18):14-16.

[4]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R/OL].(2023-08-11)[2026-06-01].http://psy.china.com.cn/2023-08/11/content_42460957.htm.

[5]Shunying Z,Wencheng Y,Baojuan Y,et al.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Job-Seeking Anxiety: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Journal of Career Development,2024,51(01):106-124.

[6] 曾美容 . 大学生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 , 就业焦虑的关系研究 [D]. 南京 : 南京师范大学 ,2010.

[7] 李颖慧 , 王宁 . 红色旅游对基层党员积极心理状态的影响研究——以大别山红色教育培训项目为例 [J]. 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22,36(06):68-78.

[8] 邢成建 , 郑岚戈 , 李益智 , 等 . 大学生就业心理影响因素 : 一般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3,31(03):413-417.

[9] 王文鹏 . 大别山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教学模式的理论与实践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4(05):143-152.

[10] 吴雪芹 . 红色文化视域下大别山精神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J]. 中国军转民 ,2025(08):202-204.

[11] 孙东晓 . 新时期大学生就业心理分析及应对策略研究 [J]. 国际公关 ,2024(22):179-18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网络‘圈层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的影响机制及引导策略研究”（2024CXQ071）；2024 年度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专项课题“网络‘圈层化’对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的影响机制与风险防范路径研究”（2024SZX018）。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大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学院）

非遗蓝染赋能视角下发展型资助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以扬州职业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为例

王　锴

摘要：在终身教育体系加快构建与高校资助育人深度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经济资助已难以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全面发展需求。本文以扬州职业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为实践载体，立足服装专业特色与非遗文化资源，将非遗蓝染技艺融入发展型资助全过程，构建“精准摸排—技艺培育—实践锻炼—经济反哺—就业赋能”一体化育人路径。学校通过邀请非遗传承人驻校授课、成立蓝染文创社、搭建实践平台、完善闭环资助机制等举措，有效解决了困难学生自信心不足、实践能力薄弱、发展方向模糊等问题，实现了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赋能”的转变。研究表明，非遗赋能与发展型资助深度融合，既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专业技能与综合素养，又能完善资助育人体系、增强育人实效，为高职院校特色化资助育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非遗蓝染；发展型资助；资助育人；高职教育；纺织服装专业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为新时代高校资助育人工作指明了方向。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学生资助工作已从“保障型”的应助尽助，迈向以“发展型”为核心内涵的新阶段[1]79。发展型资助打破了传统资助仅注重经济帮扶的局限，强调在物质支持基础上融入思想引领、能力提升、价值塑造等育人元素[2]。高职院校作为职业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主阵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相对较高，其成长发展直接关系教育公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传统资助模式存在重物质轻精神、重救助轻发展、重短期轻长效以及与专业教育脱节等问题，难以激发学生内生动力，无法满足学生终身发展需求。服装行业与非遗文化联系紧密，蓝染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具文化价值、艺术价值与产业价值，与纺服专业高度契合，是天然的育人载体。在此背景下，扬州职业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立足专业特色，挖掘蓝染文化资源，将非遗传承、专业实践与资助育人深度融合，面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构建全链条、立体化发展型资助模式，有效破解困难学生成长困境，提升育人质量与就业竞争力。

本文以扬州职业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蓝染资助育人实践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实践背景、实施路径、主要做法与成效，总结经验启示，为高职院校推进发展型资助育人、深化非遗文化育人、服务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二、纺织服装学院发展型资助的现实背景与问题分析

（一）实践背景

扬州职业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以服装与服饰设计、服装与工程技术为核心专业，服务地方服装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约18.4%，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单亲或低收入、劳动力少、人口众多的家庭，面临经济压力大等现实问题，经济困难常与成长视野受限、社会资本匮乏、信息获取渠道狭窄、综合能力发展平台欠缺等“发展性困境”相互交织，形成“多重弱势累积”效应。许多困难学生在人际交往、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自信心与主动性不足，容易陷入“经济—能力—心理”的复合型困境循环[1]79。

传统资助以国家助学金、困难补助为主，仅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无法满足能力提升、职业发展、人格完善等深层需求。康易赟认为发展型资助育人相比较传统的育人手段而言更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一方面有

效维护了学生尊严，另一方面增强了学生的获得感，同时强化了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责任[3]195。蓝染作为与纺服专业高度匹配的非遗技艺，具备低成本、易上手、可产业化、可实践化等优势，适合面向困难学生开展技能培训与实践育人。基于此，学院决定以非遗蓝染为抓手，创新发展型资助路径，实现经济帮扶与能力培育、文化传承协同推进。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生发展层面，部分困难学生性格内向、缺乏自我认同感，表达与沟通能力欠缺；学习动力不足，对专业兴趣不高，发展方向模糊，对未来缺乏清晰的规划；依赖外部资助，缺乏主动进取与自立自强的意识。实践机会少，专业实操能力薄弱，就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发展型资助育人是一项系统工程，具体需要充分整合校内资源，链接受助者所处的社会网络，动员多部门、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但现实工作中往往是各高校资助部门“单兵作战”[3]197。各高校资助工作目前存在育人特色不突出的问题；重物质帮扶、轻能力赋能，内生动力激发不足；实践平台缺乏，学生难以将技能转化为实际成果与经济回报；协同育人机制不完善。

育人目标层面难以实现扶困与扶志、扶智统一，无法满足学生全面发展与终身成长需求；非遗文化传承与职业教育结合不紧密，文化育人功能未充分发挥。

三、非遗蓝染赋能发展型资助的实践探索

扬州职业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以“精准帮扶、技能赋能、实践育人、终身发展”为理念，构建了“技艺学习 + 项目实践 + 经济回报 + 人格培育”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模式，全程覆盖困难学生成长的关键环节。

（一）精准摸排，建立个性化帮扶体系

辅导员牵头，联合班主任、专业教师，通过家庭走访、学情分析、性格测评、需求调研等方式，全面掌握困难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性格特点、能力短板、兴趣特长与发展诉求，建立“一人一档”个性化成长帮扶档案，明确帮扶重点与路径。针对自信心不足的学生侧重表达演讲能力的训练与展示；针对实践能力薄弱的学生侧重专业技能培训与实操训练；针对发展方向模糊的学生侧重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针对经济压力大的学生侧重劳动回报与专项帮扶，实现精准滴灌。学院确立“技能提升、实践锻炼、经济支持、人格完善”四维帮扶目标，把非遗蓝染作为核心载体，贯穿帮扶全过程。

（二）非遗引航，夯实专业技能基础

学院邀请蓝染非遗传承人庄一峰老师驻校指导，定期开展专题授课与实操训练，内容包括扎染技法、染料配制、图案设计、面料处理、成品制作、文创产品开发等，确保学生掌握蓝染核心技艺，结合纺织服装学院的专业特色，实现非遗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提升学生专业适配度与文化素养，并向困难学生提供充足实操时间与练习资源，确保学生从“会做”到“做好”再到“创新做”。

（三）搭建平台，强化全流程实践锻炼

学院面向困难学生优先招募成员，成立蓝染文创社，实行项目制、社团化管理，学生自主分工，形成设计组、制作组、运营组、销售组，完整参与“设计—制作—包装—推广—销售—售后”全流程。围绕校园特色文创、主题产品、生活物品、校企定制等主题开展项目创作，提升困难学生的产品设计能力、相互协作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组织学生参加非遗展览、技能竞赛等活动，以赛促学、以展促练。对接非遗工坊、文创企业、文旅场所，组织学生开展实地研学、志愿服务、文化宣讲等活动，拓宽视野，提升职业适应能力。

（四）闭环资助，实现经济与育人双向增益

学院为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材料、工具、培训与场地，降低经济门槛，确保人人可参与、人人能提升。文创产品通过校园售卖、线上推广、直播带货、校企合作等渠道转化为经济收入，实现“以劳助学、以技养学”。设立“蓝染助学金”，对表现优秀、成果突出的学生给予奖励，强化正向激励，激发困难学生的内生动力。辅导员、班主任与专业教师全程跟踪指导，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实践、心理、生活等方面出现的困难，形成“培育—实践—回报—激励—成长”的闭环。

（五）文化传播，提升综合素养与就业能力

学院开展“蓝染文化进校园”“非遗体验日”“手工体验坊”等活动，让学生担任主讲人、助教与组织者，锻炼表达、沟通、组织、协调能力。将蓝染技能与文创设计、服装研发、品牌运营、非遗传承、主题活动等职业方向对接，帮助学生明确职业定位，提升就业竞争力。对接非遗企业、文创公司、纺织服装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与就业推荐，打通“技能—实践—就业”通道。

四、实践成效

（一）学生成长成效

参与学生的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明显增强，多人在各项技能比赛活动中获奖，表达沟通、团队协作、组织管理、现场路演能力大幅提升。学生通过文创产品售卖获得稳定劳动报酬，缓解自身经济压力，实现从“受助”到“自助”的转变，自立自强、自主意识显著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自我认同感明显提高，性格更开朗，学习动力更足，发展方向更清晰，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毕业生凭借蓝染技能与实践经历，在文创设计、服装品牌、非遗运营等领域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就业竞争力与职业发展潜力增强。

（二）育人工作成效

学院形成“专业 + 非遗 + 资助 + 实践”特色模式，实现从“输血”到“造血”转型，丰富发展型资助内涵。推动蓝染非遗在校园活态传承，增强学生文化自

信与职业认同，实现文化育人与职业育人协同。辅导员和专业教师在协同育人中提升实践指导、生涯规划、文化育人能力，形成育人合力。

（三）社会影响成效

项目助力地方非遗传承与文创产业发展，提升学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与美誉度。校园内形成自立自强、技能成才、文化自信的良好风气，传递资助育人的正能量。

五、经验与启示

（一）资助育人必须坚持从“输血”向“造血”转型

发展型资助的核心是赋能，只有通过技能培育、实践锻炼、劳动回报，才能真正激发内生动力，实现长效发展。发展型资助的价值体现在其长远性以及可持续性上，其不仅可解决受助者当下的经济困难，而且通过提高受助者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创业创新打下坚实基础[4]。非遗蓝染实践证明，技能赋能是破解困难学生发展困境的关键抓手。

（二）专业特色与非遗文化是高职资助育人的重要资源

高职院校应立足专业优势，挖掘本土非遗资源，走特色化、差异化资助育人道路，实现专业教育、文化传承与资助育人深度融合，提升育人辨识度与实效性。

（三）多元协同是提升资助育人质量的重要保障

发展型资助的推进依赖于资源整合与平台支撑。学校是资助育人的主要实施者，发展型资助的顺利实施需要整合校内各部门、各学院的资源，联合各方人员力量，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形成资助育人合力，共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5]，构建“学校＋传承人＋社团”协同育人格局，整合师资、平台、渠道资源，形成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格局，才能保障资助育人可持续、可推广。

（四）扶志与扶技并举才能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构建发展型资助模式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扶困”与“扶智”，“扶困”与“扶志”结合起来，实现由外源式扶贫向内生式脱贫、物质扶困向思想解困和能力脱困的转型[6]，经济帮扶解决眼前困难，技能培育支撑长远发展，志向引领决定人生高度。只有坚持扶困、扶智、扶志的统一，才能促进困难学生健全人格、成长成才。

（五）发展型资助应融入终身学习理念

非遗技能具有长期职业价值与发展潜力，资助育人不仅服务学生在校成长，更要为终身学习与职业发展奠基，契合学习型社会建设要求。发展型资助不仅是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物质支持，更应深度融入终身学习的育人理念。在资助过程中，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帮扶层面，更要以资助为载体，引导受助学生树立持续学习、终身成长的意识。通过技能培训、学业指导、实践锻炼、生涯规划等多元发展举措，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力，培养主动求知、自我提升的能力。帮助受助学生打破阶段性学习局限，认识到成长是长期过程，将感恩之心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把阶段性资助红利转化为终身学习的内在自觉，使其在未来的工作与生活中持续精进、不断突破，真正实现资助育人、赋能终身发展。

六、结语

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体现，契合高校立德树人的目标，符合教育发展和学生成长的规律[7]。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何让资助育人工作做到“鱼渔兼得”，怎样使受助学生由被动受助变为主动成长，不断激发受助学子成长内驱力，是资助工作需要思考和实践的命题[8]。非遗蓝染赋能发展型资助，是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资助育人模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有益探索。扬州职业技术大学纺织服装学院以实践证明，立足专业特色、挖掘非遗资源、坚持精准赋能、强化实践育人，能够有效破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难题，实现经济帮扶、能力提升、文化传承、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让困难学生在受助中成长、在实践中自强、在文化中自信。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应持续深化发展型资助改革，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整合资源、创新路径、突出特色、注重长效，让资助更有温度、育人更有深度、发展更有力度，为促进教育公平、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建设教育强国与文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朱千林，姚弘，叶青，等. 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路径探索——以苏中地区某高职院校为例 [J]. 华章，2026(13):79-81.

[2] 李洁华.“三全育人”导向下高职发展型资助与职业发展规划联动研究 [J]. 公关世界，2026(09):82-84.

[3] 赵歌. 高职院校“五位一体”发展型资助育人体系构建 [J]. 西部素质教育，2026,12(09):195-198.

[4] 申娇娣，方燕，李凌云，等. 发展型资助视域下高职院校资助育人问题及对策研究 [J]. 经济师，2026(02):231-232.

[5] 陈欢，黄竹清.“五育融合”视域下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路径探析 [J]. 公关世界，2025(21):160-162.

[6] 冯丽莎.“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模式研究 [J]. 公关世界，2025(20):68-70.

[7] 陈曦. 新时代视野下发展型资助育人路径探析 [J]. 新传奇，2024(16):83-85.

[8] 陶珊. 高职院校发展型资助育人模式的实践与思考——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资助工作案例分析 [J]. 品位·经典，2023(16):116-118.

（作者单位：扬州职业技术大学）

赋权视角下农村困境儿童自驱力培育的路径与效果评估
——以淮安农村地区学校社工项目为例

金雨洁　陈雨彤　李金晏 *

摘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本研究依托淮安农村学校社工项目，以赋权理论为基础，构建“个体—人际—社会”三维介入框架，采用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与行动研究法，对12名服务对象开展为期18周的实务干预。研究发现，农村困境儿童自驱力缺失是个体、家庭、学校三重权能障碍叠加作用的结果；三维递进式赋权干预可有效提升儿童自我效能感、人际互动能力与自主行动力，任务目标打卡率达85%以上，成功激活其内在成长动力。本研究验证了赋权理论在农村学校场域的本土化适配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三维赋权实务模式，可为农村困境儿童发展性帮扶、学校社会工作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赋权理论；农村困境儿童；自驱力；学校社会工作

一、引言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儿童福利关爱服务体系，坚持儿童优先发展，推进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分类帮扶，全面完善未成年人关爱保障机制[1]。困境儿童涵盖贫困致困、残疾致困、监护缺失或不当等多类群体，规模庞大。受经济条件、公共服务供给、家庭教育环境制约，农村困境儿童长期处于权能不足状态，易滋生无力感与习得性无助，陷入被动成长困境[2]。目前，我国困境儿童兜底保障体系基本建成，生活救助、学业支持等基础服务实现全覆盖，但服务重心仍偏向现金、物资等生存型支持，针对心理成长、能力建设、社会参与的发展性服务多为临时性活动，常态化机制缺失，难以满足内在动力培育的长期需求。

将赋权理论与农村困境儿童自驱力培育相结合，可拓展赋权理论在中小学社工场景的应用边界，弥补实证研究的不足，同时探索从“外部救助”转向“内生赋能”的帮扶路径，构建家校社协同服务体系。本研究立足淮安农村小学实务场景，围绕自驱力缺失表征与形成机理、“个体—人际—社会”三维介入路径的设计与落地，以及干预效果与推广价值展开探讨，突破单一学科视角，以学校社会工作为切入点，整合心理赋权与技术赋权，搭建三维一体化框架，实现理论与实务深度衔接。依托18周行动研究打磨的本土化模式，适配农村学校资源条件，具备较强操作性与推广价值。

二、文献综述

自驱力是驱动个体持续活动、指向目标的内在心理动力，源于自我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具备主动性、持续性与可成长性[3]。现有研究将其解读为包含求知欲、成长追求、自我认同的积极心理系统，证实其对儿童学业发展、抗挫能力、终身成长有显著正向作用[4]。但目前国内学龄儿童自驱力培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多以概念界定、宏观策略为主，缺少长期实务干预与效果检验，针对农村困境儿童的研究尤为匮乏。

国内社会工作介入困境儿童帮扶已形成一定积累，主流模式为“专业社工＋儿童主任”，服务场域集中在社区。但学校作为儿童主要活动空间，长期缺少专业社工入驻，服务内容多停留在生活照料、学业辅导、基础心理疏导层面，极少触及自驱力、社会参与等深层需求，未形成系统化介入框架[5]。学校社会工作具备独特场域优势，可联动教师、家长整合资源，推动服务从“基础保障型”向“潜能激发型”转型，这正是本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赋权理论是社会工作核心理论之一，旨在弱化无权感，唤醒个体内在改变力量[6]。实务中可划分为心理赋权（重塑自我认知、提升自我效能）与技术赋权

（传授知识、沟通技巧与实践能力），二者相辅相成。现有研究证实赋权方法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应用价值，但在学校社工领域仍存在实践范式缺失、两类赋权融合不足等问题。学界普遍采用个体、人际关系、社会参与三维框架开展赋权干预与诊断。结合农村儿童成长规律，本研究构建三位一体分析框架：个体维度为核心内核，聚焦自我认知重塑与心理效能唤醒；人际维度为重要支撑，着力搭建成长支持网络、提升互动能力；社会维度为实践闭环，依托公共参与行为固化自主行动。三个维度贯穿成因分析、实务介入与效果评估全过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淮安市农村H小学为调研与干预场域，采用立意抽样法确定12名研究对象，包含4名农村困境儿童及其对应的家长与任课教师。所有对象均知情同意，严格遵守社会工作专业伦理。4名儿童分别存在自我否定、习得性无助、兴趣被压抑、对未来无规划等典型问题；家长存在过度保护、专制高压、放任不管、忽视情感需求等偏差教养方式；教师存在标签化认知、低期望、评价单一、疏于家校沟通等倾向。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1. 儿童

20240910C-TX：自我否定，上课不敢发言，担心出错被嘲笑；缺乏主动性，缺少学习意义感；在学校得不到老师关注，作业出错没人指导，慢慢不想写作业。

20240910C-LH：曾努力学习，却因考试成绩不佳产生自我否定的情绪，遇到难题就想放弃，形成习得性无助；同时在学校缺少同伴交往，也较少得到老师关注，感觉自己被忽视，努力得不到认可，逐渐丧失了学习动力。

20240910C-WY：有绘画兴趣却被父母否定；努力学习仍跟不上进度，自认差生，不愿主动争取机会；和父母沟通不畅，父母不理解自己在学习上面临的困难还指责自己，因此逐渐不愿和父母交流，也不想好好学习。

20240910C-ZF：上课容易走神，不想听课也不想主动发言，怕被人注意，觉得自己笨；就算作业有进步也得不到老师表扬，认为努力不被认可，便不想再努力。

2. 家长

20240915P-MY：对孩子过度保护，大小事务、学习都一手包办，会让孩子越来越懒，缺乏主动性；而如果自身工作繁忙，没有精力和耐心与孩子沟通，在孩子抱怨学习困难时指责孩子，就会导致孩子越来越不爱说话，学习成绩变差。

20240915P-GH：对孩子要求严格、期望过高，希望孩子靠学习改变命运，孩子表现不好就批评指责，导致孩子越来越差，上课不敢发言，作业不敢提问，学习动力变差；同时给孩子报了多个补习班，严格要求成绩，孩子达不到期望就打骂，导致孩子越来越叛逆，不想学习。

20240915P-CY：因为工作繁忙没时间管孩子，既缺少和孩子沟通，也不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再加上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不知道该怎么引导孩子，只会催促孩子写作业，着急时还会打骂孩子，反而让孩子更不想学。

20240915P-ZH：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忽视孩子的情感需求，只要孩子作业写完、成绩不差就行，导致孩子越来越自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引导。

3. 老师

20240915T-LW：觉得学生能力差考不上好大学，大概率也只是读完职高后从事普通工作，因此在日常教学中疏于对学生的学业督促，放任学生自由发展，久而久之造成学生惰性加剧，丧失自主学习的内在动力。

20240920T-WL：认为成绩差、表现不好的学生难以改变，尝试引导后效果不好就不愿再费心，课堂上很少主动让这些学生发言，即使他们举手也会忽视，对他们要求很低，只要不捣乱、按时交作业就行；认为学校心理辅导老师不足，无法给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做专业疏导，平时很少和家长沟通，只在孩子出现严重问题时才联系家长。

20240920T-ZY：学校评价方式以学习成绩为核心，考试排名成绩靠后的学生很难获得表扬肯定，时间长了就越来越不爱学习，课堂上越来越沉默；学校的辅导面向全班同学，基础差的学生跟不上进度，学习困难无法解决，逐渐不想学习。

20240920T-LH：对成绩差、内向的学生，教师会认为他们能力有限、难有大进步，因此对其要求低，较少花精力引导。同时，教师和这类学生家长沟通少，难以了解孩子的家庭情况，也无法引导家长用科学方式教养，不利于家校合作。

（二）日常行为观测指标

研究综合运用一对一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访谈，围绕儿童心理状态、学习行为、家庭教养、学校教育态度展开调研，对访谈对象统一编码，完整留存资料。研究者以驻校社工身份，采用自制观测指标体系开展18周的参与式观察。指标涵盖三个主体：针对儿童，观测其课堂表现（主动发言、注意力集中度、独立完成任务能力、坚持性）、人际互动（主动交流合作、融入集体、清晰表达）、情绪状态（情绪稳定、受挫后平复快、积极心态）、任务行为（按时独立完成作业、主动求助、自我复盘）；针对教师，观测其是否主动关注困境儿童、给予公平提问机会、常用鼓励语言、避免标签化、抱持正向期望；针对家庭，观测其氛围温暖度、家长倾听理解能力、亲子沟通频率、教养方式温和性、陪伴质量。

（三）行动研究实施阶段具体过程

整体工作分三阶段，共18周，具体如下所示：

1. 准备阶段（第 1—3 周）

梳理困境儿童信息并对接班主任；筛选确定一对一访谈对象，摸排需求、细化方案、筹备物料；召开家校沟通会，讲解项目内容与伦理规范，完成知情同意。

2. 干预阶段（第 4—16 周）

第 4 周组建自我赋能小组，开展优势挖掘活动；第 5 周推进情绪管理训练；第 6 周持续开展小组活动并首次复盘优化；第 7 周组建挫折闯关主题小组；第 8 周继续进行个体赋能并筹备校园图书角整理活动、议事会等；第 9 周组建常态化小组并开展首批校园实践；第 10 周完成自我赋能核心小组活动，启动家庭赋能前期调研；第 11 周持续开展校园实践，筹备家庭教育讲座与亲子沟通训练；第 12 周推进校园实践和家庭赋能预热，双周复盘优化家校服务；第 13 周开展家庭教育讲座与亲子沟通训练，同步开展校园公益实践；第 14 周进行常态化家庭赋能与校园实践，跟踪亲子关系；第 15 周持续服务，双周复盘调整亲子互动指导策略；第 16 周完成全部校园实践与家庭赋能服务，汇总资料并梳理亮点与不足。

3. 评估阶段（第 17—18 周）

结合访谈和观测指标开展多维成效评估，收集师生及家长的主观反馈；整编全周期研究资料，总结三维赋权实务模式，研讨长效服务机制，完成项目收尾。

四、研究发现与分析

综合访谈与观察数据发现，当地农村困境儿童自驱力水平偏低，成长动力以外驱为主，问题集中体现于个体、家庭、学校三层面。个体层面，儿童普遍自卑，常刻意回避课堂发言，畏难抗挫力弱，学习高度被动，作业拖延，缺少成长目标，长期陷入习得性无助。家庭层面，存在专制型、过度保护型、放任型三类偏差教养模式，分别以打骂否定、包办代替、疏于引导为特征，持续压缩儿童自主成长空间。学校层面，教师对困境儿童存在标签化认知，产生低期望心态，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评价体系过度侧重成绩，忽视综合进步，长期负面评价弱化儿童自我价值感。三重权能障碍叠加形成“自我否定—人际疏离—被动成长”的恶性循环。

针对此困境，研究依托“个体—人际—社会”三维框架开展递进式干预，每个维度融合心理赋权与技术赋权。个体赋权通过优势挖掘、情绪管理、挫折训练提升自我效能；人际赋权以同伴互助、亲子沟通、家庭教育讲座修复支持网络；社会赋权引导儿童参与校园事务与公益实践，在真实行动中提升自主能力。经过 18 周干预，各维度成效显著：个体层面，儿童专注力与主动发言频次提升，作业自主完成度提高，任务打卡率达 85% 以上，抗挫能力改善；人际层面，同伴交往意愿增强，教师正向鼓励增多，亲子沟通改善，家校协同网络基本建成；社会层面，儿童从被动旁观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表达、协作与责任意识全面提升，形成“实践—反思—成长”的良性闭环。该模式依托校园现有资源，流程清晰、环节递进，在农村场景中具备较强实操性与适配性。

五、结语

全程研究与干预结果表明，农村困境儿童自驱力缺失是个体、家庭、学校三重权能障碍叠加所致，不能简单归因于儿童自身。“个体—人际—社会”三维赋权介入路径具备实践有效性，心理赋权与技术赋权双重赋能相结合，可有效激活儿童内在成长动力，学校社工在其中承担资源整合与多方联动的枢纽作用。该三维赋权实务模式贴合农村学校实际，干预效果稳定，是低成本、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性帮扶范式。本研究完成了赋权理论在农村学校社工场景的本土化应用，验证了其在儿童内在动力培育领域的适配性，弥补了当前研究重理论、轻实务的短板。传统帮扶多以物质救助为核心，本研究推动服务重心转向赋能增能，构建常态化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为破解农村儿童被动成长难题提供新思路。自驱力培育是长期工程，短期干预仅能初步激活动力，巩固效果还需长期陪伴与常态化专业服务，基层学校与社工机构应建立长效服务机制，将赋权赋能理念融入日常教育与校园管理之中。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 回顾历程 把握脉络 不断完善困境儿童服务保障体系 [EB/OL].(2026-02-02)[2026-06-17].https://www.mca.gov.cn/n152/n166/c1662004999980009108/content.html.

[2] 付聪 . 困境儿童“增权”：依据、模式与发展趋势——基于社会工作视角的文献综述 [J]. 青少年学刊 ,2020(03):31-37.

[3] 王语嫣 . 有自驱力的人不用点燃 [J]. 中学生博览 ,2023(01):1.

[4] 陆霞 , 王雄 . 激发中职学生自驱力 : 从内心播种，让力量茁壮成长 [J]. 新教育 ,2025(10):81-82.

[5] 黄先凯 . 农村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专业社会工作 + 儿童主任”的协同研究 [D]. 南昌 : 南昌大学 ,2024.

[6] 胡晓生 . 儿童行动的自驱力问题 [J]. 小康 ,2024(14):7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淮阴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国家级项目“‘青羽引航’——学校社工培育困境儿童自驱力工程”（202510323017）。

（作者：金雨洁、陈雨彤，淮阴师范学院社会工作系本科生；通信作者李金晏，淮阴师范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

党建引领生态价值转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层实践

——以白山市“六域党建”推动“两山”实践创新为例

王　智

摘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新时代创新成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白山市作为国家级“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新构建“六域党建”全域治理体系，以党的全面领导贯通生态资源管控、绿色产业运营、生态收益分配全链条，有效破解生态资源“守绿难增收、有价难变现”的现实困境。本文立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紧扣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部署，以白山市基层治理实践为样本，阐释党建赋能“两山”转化的核心理论逻辑，梳理现阶段成效并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研究旨在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基层落地生根，为全国同类功能区统筹生态保护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六域党建；“两山”转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集中彰显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的原创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集中体现[1]。回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生脉络，马克思《资本论》的物质变换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与资本逐利逻辑，必然引发生态异化与贫富分化双重危机，这构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理论原点[2]。不同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老路，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障，依托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推动生态红利全民共享。

从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一系列战略安排协同发力，为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行动遵循[3]。白山市作为吉林省绿色转型核心区域，坐拥双重国家级生态示范招牌，立足区域生态禀赋与基层治理实际，创新打造覆盖全域的“六域党建”治理体系，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两山”转化全过程，形成独具白山区域特色的党建引领“两山”转化治理范式。

一、理论逻辑：党建引领“两山”转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基层具象化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并非抽象理论范式，而是由所有制逻辑、文明融合逻辑、生产力发展逻辑三重维度构成的完整理论体系。白山市“六域党建”引领生态价值转化实践，本质是将三重理论逻辑转化为可落地、可运行的基层制度安排，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从宏观理论向县域基层治理场景的具象化落地，构成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导生态开发模式的核心制度标识。

（一）政党引领资源分配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逻辑的制度底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物质变换理论清晰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资本主义现代化将自然资源视作资本增殖的原料，土地、山林、水域等生态资源被私人资本垄断，生态收益绝大部分流入企业资本，普通劳动者难以分享资源红利，最终形成环境破坏与贫富分化同步加剧的局面[4]。马克思从所有制出发，明确主张公共自然资源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生态开发与收益分配必须服务于全民共同利益，而无产阶级政党是公共生态资源统筹管控、利益调节的核心主体。基层生态价值转化并非单纯的市场经营行为，更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与分配正义的基层实践。党的领导能够有效规制资本无序扩张，杜绝私人资本垄断、低价侵占集体生态资源，牢牢守住公共资源全民共享的制度底线。白山市推行“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运营模式，由党组织主导集体生态资源确权、管护、开发，从基层治理层面落实社会主义生态公有制，从制度源头规避资本主导的生态异化问题。

（二）“两个结合”赋予生态文明实践本土化文明根基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方法

论，也是基层生态治理本土化发展的根本遵循。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生态治理贴合区域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杜绝脱离现实的粗放式、“一刀切”治理。白山市依托“六域党建”分领域、分层级搭建治理体系，精准适配长白山生态保护刚性约束、林下特色产业发展、边境生态管护的区域实际，实现理论与地方实践的深度结合。

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智慧，为基层生态自治提供文明根基。白山市地处长白山文化核心区，历代民众形成了护林守山、永续利用的传统生产习俗。近年来，全市依托农村领域基层党组织，将生态管护村规民约纳入村民自治制度，把传统生态伦理转化为现代治理规则，使生态保护从行政任务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中华传统生态文明的扎根融合。

（三）绿色新质生产力要求党组织统筹产业转型的发展方向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是践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路径。在资源型城市转型阶段，新旧产业交替容易出现资本短期逐利行为（部分市场主体热衷于资源初级开采，不愿投入资金开展精深加工与循环利用），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极易陷入粗放发展误区。

基层党组织具备价值引领、资源统筹、利益调节的独特制度优势，能够有效校准产业发展方向。通过党组织统筹政策、技术、资金、人才等各类要素，引导资本投向碳汇经济、林下精深加工、生态文旅、循环利用等绿色产业，淘汰粗放式资源开发模式，推动产业升级与生态增值。同时，依托党建纽带推动产业收益向基层群众倾斜，契合社会主义生产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目标。

二、现状研判：现阶段党建赋能“两山”转化的成效与进阶方向

经过全域多年系统推进，白山市依托“六域党建”完整组织架构，在生态保护、集体经济增收、绿色产业培育、边境生态治理领域取得阶段性成效。立足“十五五”绿色转型更高标准要求，结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价值导向，全市党建引领生态转化工作仍可从资源管控、市场对接、基层治理三个维度持续迭代升级。

（一）集体生态资源共管模式稳步成型，资源收益均衡化建设具备提升空间

白山市严格落实农村集体林地、湿地、水域确权登记改革，依托乡村领域“六域党建”体系全面推广“党支部 + 村集体合作社”运营机制，实现全市行政村集体生态资源统一管护、联合开发全覆盖，从制度层面杜绝集体山林零散承包、低价长期流转、私人资本独占资源等损害公有制根基的行为。白山市全部行政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定突破 10 万元，依托集体林地、林下参、山野菜、碳汇资源形成稳定集体经营性收入来源，集体生态资源公有制在基层落地根基持续夯实 [5]。全域推行山林统一管护、联合开发模式，有效避免零散出让、低价流转等问题，筑牢公共资源全民共享的制度基础。

从共同富裕长远目标来看，现阶段集体经济增收渠道仍以财政扶持、公益项目为主，依托山林、碳汇、矿泉水等自然资源自主经营性收入占比有待进一步提升，进而持续放大集体资源带来的富民效应，推动生态产业收益更多向基层群众倾斜。

（二）生态产品市场化转化体系逐步搭建，产融对接一体化机制持续完善

全市全域开展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试点，同步搭建碳汇交易、生态补偿对接渠道，产业链党组织全覆盖工作有序推进，人参、矿泉饮品等主导产业上下游协同格局初步形成 [6]。以抚松人参产业为例，当地通过党组织联动龙头企业，推动种养与加工产值比例达到 1：17.5，精深加工增值能力持续释放。

顺应更高水平市场化发展需求，基层党组织产业运营专业服务平台仍在扩容建设，碳汇抵押、林权信贷、品牌运营等专业化服务供给持续加码。“生态资源—资产资本—群众收入”完整转化链条仍需彻底打通，进而推动产业链增值充分传导至种养、管护一线群众。

（三）“六域党建”全域治理架构全面落地，产业末梢专业化治理力量持续充实

城乡、边境、产业、行业等六大领域党组织体系完整建成，红色物业、产业链党支部、边境村联合党组织全面覆盖，生态保护常态化网格管理机制高效运转。依托“镇街吹哨、部门报到”协同体系，各类生态环境整治、资源管护任务实现快速处置，仙人洞村等边境村打造出党建引领生态产业、稳边富民一体化样板 [7]。

结合发展实际，各地仍需持续优化基层治理力量配置，进而实现治理体系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三、实践路径：依托六域党建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生态富民实效

紧扣白山市“十五五”绿色转型发展部署，立足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原则与分配正义要求，将党的领导贯穿资源确权、产业运营、收益分配全链条，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制度堵点。

（一）强化党组织对集体生态资源的所有制管控，构建兼顾资本与劳动者的分配机制

守住公共资源集体所有这一社会主义制度底线，由村党支部牵头开展集体山林、林地、湿地资源清产核资，统一完成确权登记，坚决杜绝低价长期外包集体资源。全面推广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模式，由村集体掌握生态资源开发主动权，企业只负责生产加工与市场销售，在合作协议中硬性划定利润分配比例，保证

集体股份与务工收益占据产业链合理比重。

借鉴江源区、浑江区村级股份合作改革经验，把森林资源折算成集体股权，村民以土地、劳务入股，形成“党支部＋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的利益共同体。严格规范招商引资项目联农条款，产业领域党支部全程监督项目分红，遏制资本独占超额利润，把生态产业收益更多留给村集体和普通群众，逐步缩小初次分配差距，践行科学社会主义消除两极分化的价值追求。

（二）推动产业链党建一体化建设，依靠组织联动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

依托“六域党建”中的产业领域党建板块，组建人参医药、矿泉饮品、林下文旅三大产业链联合党支部，把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村集体党员纳入同一组织体系，统筹推进产业链延链补链。针对初级原料外销的短板，由产业链党组织牵头对接科研资源，推进中药材生物育种、矿泉水深加工、尾矿固废循环利用等科创项目，培育低碳循环的绿色新质生产力，拉长产业价值链。

在抚松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中，依托联合党支部统筹龙头企业与种植农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稳定农户收益，推动产业增值向种植端下沉。同时，由市县两级行业党组织对接绿色金融机构，把集体林权、碳汇收益转化为可抵押资产，破解生态经营融资难题，打通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通道，把生态资源存量稳定转化为经营性资产流量。

（三）延伸基层网格党建触角，提升党组织统筹生态治理的履职能力

把生态产业发展纳入城乡网格党建事项清单，将山林管护、集体资产运营、生态项目监督纳入村民议事会、民主监事会常态化协商内容，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资源开发决策环节。在城市社区，依托“红心物业”打造的红色物业党建模式，同步推进老旧小区绿色改造、垃圾分类治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基层治理；在边境行政村，推广浑江区三道沟镇仙人洞村治理模式，由党支部统筹边境管控、生态管护、林下产业发展，实现生态安全、产业增收、边疆治理一体推进[8]。

持续落实基层减负赋能举措，选派产业红领专干下沉乡镇，常态化开展村党支部带头人市场化运营培训，补齐基层干部经营短板。完善跨部门协同机制，用好“参乡通”数字化治理平台[9]，实现生态产权确权、项目审批、收益监管一网闭环，真正破解“上热下冷”问题，让党建制度优势完整转化为“两山”治理效能。

（四）完善生态补偿与集体共享制度，稳步迈向山区共同富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立场，用好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政策红利，统筹推进横向生态补偿、森林碳汇开发、流域生态保护补偿等改革[10]。由乡镇党委统筹跨村域生态资源联合开发，打破村域单打独斗的格局，均衡发达村与生态保护重点村之间的发展收益。

对承担重点生态保护任务、产业开发受限的行政村，加大碳汇项目倾斜力度，让守绿护绿的村庄获得稳定经营性收入。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所有行政村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成果，逐步缩小城乡之间、村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让生态保护者成为直接受益者，走出一条保护有价、开发有度、收益共享的共同富裕路径。

四、结语

白山市立足“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任务，以“六域党建”为抓手，将政党治理贯穿生态资源所有制管控、产业链布局、收益分配全过程，用社会主义制度约束资本逐利弊端，打通生态价值市场化转化通道，使绿色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群众。面向“十五五”时期绿色转型新阶段，必须始终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立场，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完善党组织统筹集体资源、调节利益分配、引领产业转型的制度体系，不断畅通绿水青山向民生红利转化的制度通道，把白山生态优势稳定转化为共同富裕的发展胜势，为全国同类生态功能区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样本。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J]. 求是 ,2025(01):4-18.

[2] 毕秋 .《资本论》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阐释及其时代价值 [J]. 山东社会科学 ,2024(02):24-31.

[3] 习近平 . 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J]. 求知 ,2026(01):4-7.

[4] 陈学明 . 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1):4-23.

[5] 吉林省统计局 . 吉林省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2026-04-27)[2026-06-30].https://tjj.jl.gov.cn/tjsj/tjgb/ndgb/202604/t20260427_3627028.html.

[6]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EB/OL].(2021-04-26)[2026-06-30].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4/26/content_5602763.htm.

[7] 鸭绿江畔 , 一个小村庄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 [EB/OL].(2026-04-07)[2026-06-30].http://jl.people.com.cn/n2/2026/0407/c349771-41545562.html.

[8] 同 [6].

[9] 白山发布 .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我市实施“六域”党建引领“三城”创建纪实 [EB/OL].(2023-05-05)[2026-06-20].https://s.c1ns.cn/Yh1wa.

[10] 同 [5].

（作者单位：中共白山市委党校）

高职院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场域构建与实践研究
——以浙江省高职院校为例

胡　蝶

摘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是新时代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也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浙江省高职院校依托职业教育、数字经济和民营经济优势，形成了专业群推进、产教融合深化、数字化赋能等特色，但仍存在机制不健全、课程融通不足、教师能力不强和评价体系薄弱等问题。本文基于场域理论和协同育人理念，从制度、课程、教师、实践、文化五个场域分析其构成，并结合浙江实践，提出以顶层设计统领、专业课程重构、教师队伍共建、实践平台共用、数字资源共享为核心的协同育人路径，为高职院校构建“三全育人”格局提供参考。

关键词：课程思政；思政课程；协同育人；场域构建

一、引言

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1]。就高职院校而言，人才培养不仅要服务学生职业技能提升，更要注重价值塑造、品格养成与职业精神培育。随着《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等政策文件落地实施，课程思政已从理念倡导逐步走向系统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也由此成为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高职教育更注重实践性、应用性与职业性的特性，要求学生的知识学习、技能训练、岗位适应和价值养成高度依赖真实情境和职业场域。因此，高职院校的课程思政不能停留于“知识讲授中的简单嵌入”，也不能局限于思政课程的单独发力，而应当在学校治理、课程建设、师资培养、实践教学与校园文化等多个层面形成联动，构建协同育人的整体场域。只有将思政课程的主渠道作用与各类专业课程的承载作用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浙江省经济活跃、产业多元，产教融合和数字化改革基础较好，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实践场景。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高职院校为对象，探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场域构建、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二、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理论基础

（一）场域理论提供了整体分析视角

职业教育“场域”是由职业教育工作者、学习者以及领域内其他参与者共同构成的社会结构，涉及知识从生产、建构、传播到应用的连续过程[2]，构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研究场域，有助于打破“单一课程建设”的局限，从制度安排、课程组织、教师行动、实践资源和文化氛围等多个维度，考察思政育人如何在学校内部形成稳定运行机制。

（二）协同育人强调多主体联动

协同育人本质上是通过教育主体之间的协作，实现育人目标的一致化、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育人效能的最大化。思政课程主要承担系统理论教育与价值阐释功能，课程思政则通过专业知识、技能训练和职业场景实现价值浸润。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前者重在“立其大”，后者重在“入其行”，共同服务于学生综合素质提升与职业人格养成。

三、浙江省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实基础与主要特征

（一）专业结构与产业基础为课程思政提供了丰富载体

浙江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匹配度较高，财经商贸、智能制造、交通运输、数字技术、现代服务等专业群较为集中。产业与教育的紧密衔接，使课程思政具备较强的现实支点。例如，财经商贸类专业可以围绕诚信经营、合规意识、契约精神展开；交通制造类专业可以围绕安全生产、质量意识、工匠精神展开；医护、教育和民生服务类专业则可围绕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职业伦理等展开。专业内容本身蕴含着大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为课程思政落地提供了天然条件。

（二）区域文化资源为课程思政提供了价值支撑

浙江具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如浙商精神、工匠文化、数字创新文化和海洋文化等。这些文化资源不仅能丰富课程思政的内容表达，也有助于增强课程思政的地方辨识度。高职院校如果能够把地方文化、行业文化与课程内容结合起来，就可以把抽象的价值要求转化为具体的职业认同和行为规范，从而提升学生的接受度和认同感。

（三）数字化改革为课程思政提供了技术支撑

浙江在教育数字化、智慧校园以及在线精品课程建设等方面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这为课程思政的资源共享、教学评价与协同管理创造了条件。依托这一基础，学校可以进一步建设课程思政案例库、数字资源库和在线教学平台，从而推动优质资源的共建共享，扩大课程思政的覆盖范围并提升传播效率。同时，数字化工具的应用也能够更系统地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并对课堂互动数据进行分析。这样不仅有助于更加客观地掌握教学实施情况，也能够为课程思政评价提供更具依据性的支撑。

四、浙江省高职院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现实情况

（一）协同机制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近年来，浙江省不少高职院校结合办学实际，陆续制定了课程思政建设方案，并建立了相应的组织管理机制，课程思政建设整体上已取得一定进展。从运行现状来看，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在协同推进过程中，仍主要围绕各自教学目标展开，在课程设计、教学研讨、案例开发以及效果评价等方面的联动程度还有待加强。

（二）课程思政融入方式有待进一步优化

在具体教学实践中，部分专业课程对思政元素的融入仍处于探索和磨合阶段，个别内容与专业知识、岗位需求及实践任务之间的结合还不够自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嵌入不够充分或衔接不够紧密的现象。具体表现为，部分课堂在思政内容的呈现上较多停留于政策阐释、原则说明或价值倡导层面，而对专业案例、行业情境和真实任务的运用还不够深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程内容的整体连贯性与教学表达的生动性。

（三）教师协同育人能力仍需持续提升

课程思政建设对教师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既需要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教学能力，也需要其具有较强的育人意识、价值引导能力以及资源整合能力。从当前实际情况看，部分专业课教师在思政元素的挖掘、提炼与转化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培训与指导；同时，部分思政课教师对专业领域、行业实践和岗位特点的了解也有待深化。受此影响，在联合备课、案例共建、课堂协同等方面，教师队伍之间的融合度和协作深度尚显不足。

（四）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

从整体来看，当前课程思政建设在评价环节仍较多关注阶段性成果和显性展示，如示范课建设、精品课程遴选以及教学竞赛成果等，而对学生价值认同、职业精神养成、行为习惯变化等深层次育人成效的持续跟踪与系统评价相对不足。由于缺乏较为完善的评价指标与反馈机制，协同育人的实际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得到充分呈现，也不利于形成“建设—评价—反馈—改进”的闭环管理机制。

五、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场域构建路径

（一）构建制度场域：以顶层设计统筹协同育人

制度是协同育人的基础保障。高职院校应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教务处统筹协调、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二级学院落实、教师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组织体系。学校层面要将课程思政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学督导和考核评价体系之中，明确各部门职责，推动协同育人从“倡导”变为“常态”。在浙江高职院校的实践中，部分学校已经开始通过校级课程思政建设委员会、示范课程遴选、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等方式推动制度化建设。下一步应进一步强化制度之间的衔接，尤其是把课程思政要求具体落实到专业建设、课堂教学、实习实训和毕业要求之中，实现制度场域的全链条覆盖。

（二）构建课程场域：推进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同构共振

课程是协同育人的核心载体。思政课程应继续发挥理论引领作用，帮助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增强理想信念教育的系统性和深刻性。课程思政则应嵌入专业知识、技能训练和职业规范，形成“知识教学—价值引导—行为养成”的一体化链条。在课程设计上，高职院校应推动“课程标准重构”。每门专业课程都要梳理其知识点、能力点和价值点，明确思政融入的切入点。例如，财经类课程可将“诚信”“合规”“风险防控”作为主线；交通类课程可将“安全”“责任”“规范”作为主线；制造类课程可将“质量”“精益”“工匠精神”作为主线。与此同时，思政课程应与专业课程开展专题联动，如围绕职业道德、劳动精神、法治意识、国家战略等主题开展联合教学或专题讲座，使理论教育与专业实践相互支撑。

（三）构建教师场域：打造协同育人的教师共同体

教师是场域运行的关键主体。思政课教师要主动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场景，了解不同专业的发展趋势、岗位要求和行业规范；专业课教师也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在教学设计中主动挖掘思政元素。学校应通过集体备课、教学研讨、课程共建、教学竞赛、培训交流等方式，促进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间的

经验共享与能力互补。浙江省部分高职院校已探索并落实“思政教师 + 专业教师”协同备课机制常态化，学校还可建立课程思政导师制和教学团队制，把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纳入职称评审、绩效考核和教学奖励中，形成激励导向。对于青年教师，应通过岗前培训、专题工作坊和案例研修提升其课程思政实施能力，使其尽快具备把价值引领自然融入课堂的能力。

（四）构建实践场域：依托产教融合拓展育人空间

实践是课程思政的根本落点。浙江省产业资源丰富、校企合作基础较好，这为构建实践场域提供了现实条件。职业院校只有在对接企业中重构工匠精神生成空间，共建实训基地、实践场域，拓展课程思政实践平台，推进工匠精神实践化和具身化，才能形塑具有精益求精、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等核心内涵的工匠精神空间[3]。通过真实项目、真实任务和真实岗位，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职业责任、感悟劳动价值、形成职业认同。例如，在交通类专业中，可通过安全生产实训强化敬畏生命和规范操作意识；在商贸类专业中，可通过模拟电商运营、直播销售、市场调查等任务强化诚信经营与依法经营意识；在护理类专业中，可通过临床见习和志愿服务强化生命关怀与职业伦理。这样的实践场域不仅提升了专业教学质量，也使思政教育真正进入“做中学、学中悟”的过程。

（五）构建文化场域：以校园文化和区域文化涵养价值认同

文化是课程思政的精神根基。课程思政不是孤立于课堂之外的附加环节，而应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与区域文化传承之中。浙江高职院校可以围绕浙商精神、工匠精神、数字创新精神和地方产业文化，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课程思政文化品牌。通过校史教育、劳动教育、职业精神主题活动、优秀校友宣传和行业榜样引领等方式，把价值教育渗透到校园日常管理和学生成长过程之中。文化场域建设的重点在于“润物无声”。只有当学生在校园环境、课堂教学、实训基地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接触同一价值导向时，思政教育才会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认同。

六、浙江省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一）以专业群建设推动课程思政整体化

当前浙江部分高职院校形成了“专业群—课程群—项目群”一体化改革模式。其优势在于能够避免单门课程各自为战，将同一价值导向贯穿于多个课程模块之中，增强课程思政的系统性和一致性。对于高职院校来说，以专业群为单位推进课程思政，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和标准统一。

（二）以校企协同提升课程思政真实性

从高职课程思政的实施来看，企业真实案例、岗位标准和行业规范是非常重要的教学资源。浙江省不少高职院校在推进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入企业导师、行业标准以及真实项目，让学生在完成具体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感知职业责任和社会价值。这样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课程思政内容空泛化，也使思政教育更贴近职业成长和岗位发展的实际需求。

（三）以数字化平台实现课程思政可视化与可追踪性

浙江高职院校普遍重视数字化教学平台建设。数字化转型是课程思政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实现的系统性重构[4]，借助在线课程、资源库、教学评价系统以及学习分析工具，学校不仅能够更便捷地记录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还可以逐步积累相关案例资源，并持续跟踪学生的学习反馈。因此，数字化平台的作用并不只是承载教学内容，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课程思政资源共享的效率，也为后续的教学反思和持续改进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依据。

（四）以示范引领带动全员参与

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典型引路。浙江部分高职院校通过示范课程、精品项目、教学名师和竞赛成果带动全校课程改革，逐步形成“点上突破、面上推广”的格局，有助于降低教师对课程思政的陌生感，增强其可操作性和可复制性。同时，这种以典型示范促使整体提升的路径，还能够促进优质资源的集聚、经验的沉淀与制度化转化，进而推动课程思政从个别探索走向常态化实施。

七、结语

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更是应对产业变革、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对人才需求的必然要求[5]。未来，高职院校应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重构课程体系、打造教师共同体、拓展实践场域、深耕文化场域，才能真正构建起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格局。

参考文献

[1] 谢辉 . 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J]. 中国高等教育 ,2018(12):10-11.

[2] 刘生全 . 论教育场域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6(01):78-91.

[3] 向麟 . 职业院校课程思政的比较优势、主攻方向与实践举措 [J]. 教育学术月刊 ,2026(04):104-111.

[4] 穆希琳 . 职业院校课程思政数字化转型 : 基本逻辑、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46(35):45-49.

[5] 孙艳艳 . 高职院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46(32):35-4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学校高质量发展课题“高职院校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建设研究”（029020324011）。

（作者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红色文化赋能高职院校育人的实践路径研究
——以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葛维莉

摘要：红色文化是新时代高等职业院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革命理想、家国情怀和职业精神，与高职教育培养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高度契合。本研究以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案例，依托泸州四渡赤水、朱德旧居等本土红色资源，从价值内涵、现实条件、实践路径、育人成效四个维度，系统探究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教育的实现路径，提炼构建“红色文化六维赋能育人模式”（党建领航、课程融合、实景浸润、数字拓界、文化润心、校地共生），以红色文化为内核，搭建全方位、立体化育人体系，为地方红色文化普及、教育教学改革、提升育人实效提供实践参考，助力地方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德技并修；红色文化六维赋能育人模式；实践路径；高职院校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推动红色文化建设深度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与学校育人工作创新发展指明方向。《关于加快建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指出，要深入挖掘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将其有机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与实效性[1]。职业教育作为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传授专业技能，更要夯实青年学生理想信念根基，厚植家国情怀。

泸州是底蕴厚重的红色热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恽代英、萧楚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此留下光辉革命足迹。这里是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的核心主战场、朱德护国讨袁的重要辗转地、刘伯承领导泸顺起义的核心阵地、川南游击队开展革命斗争的主要区域，也是恽代英等革命先驱培育进步青年、播撒红色火种的摇篮。峥嵘岁月沉淀不朽精神，红色文脉在此绵延赓续。境内拥有太平四渡赤水纪念地、朱德旧居陈列馆、龙透关泸顺起义纪念地、护国公园等珍贵红色地标，承载永不磨灭的革命记忆与家国情怀。针对当前地域红色文化与育人工作融合紧密度不足、红色资源与专业育人融合深度不够等现实问题，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学校”）秉承“厚德、博学、广才、精业”校训，积极探索红色文化全方位融入育人全过程，凝练并推行“红色文化六维赋能育人模式”，推动红色精神贯穿办学治校、人才培养各环节。本文结合学校办学实际，系统梳理该模式的价值意蕴、现实基础、实践路径与实施成效，为同类型高职院校开展红色铸魂育人工作提供实践参考[2]。

二、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育人的内在价值意蕴

（一）铸牢理想信念，把握学生成长政治方向

高职院校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依托泸州本地红色史实、革命人物开展常态化红色教育，能够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地方革命历史，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强化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自觉将个人成长和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紧密相连[3]。

（二）涵养德技并修，契合职教人才培养定位

高职院校的育人目标是培育德技并修、知行统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既要锤炼学生的专业能力，更要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职业素养。红色文化蕴含的艰苦奋斗、坚守执着、精益求精、无私奉献等精神特质，与新时代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内在相通。将红色文化嵌入专业教学、实训实践环节，推动红色精神转化为学生职业准则和从业理想，引导学生在技能锤炼中涵养爱岗敬业、攻坚克难、廉洁自律的职业品格，实现成人与成才同步发展[4]。

（三）传承红色文脉，厚植校园文化自信

区域红色文化是地域历史记忆和精神标识的集中展示，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生动素材，学校积极挖掘泸州本土红色资源，以常态化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环境营造为基础，将红色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创建中，让红色文化渗透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引领师生尊重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培育校园文化自信，塑造特色校园文化品牌[5]。

（四）创新育人模式，增强思政教育实效

红色文化为育人模式改革提供多元载体。依托红色教育基地实景教学、红色剧目展演、数字化赋能、主题实践、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打破理论教学与社会实践的壁垒，提升思政教育吸引力、感召力，切实增强育人实效。

三、学校红色文化育人的现实基础

（一）明确办学导向，红色育人目标清晰

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将落实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传承红色基因纳入思想政治工作整体规划，贯穿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管理服务全过程，持续探索红色育人深度融合路径，把红色文化作为提升思政工作质量、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抓手，为落地红色文化六维赋能育人模式提供方向引领。

（二）本土资源富集，实践育人阵地完备

泸州红色教育资源禀赋丰厚，龙透关泸顺起义纪念地、朱德旧居陈列馆、四渡赤水遗址等一批红色场馆，为学校开展实景教学、研学实践创造有利条件。学校主动对接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泸州四渡赤水分院、地方党组织开展校地联动，共建共享红色实践基地，推动本土红色资源全面纳入育人体系，为实景浸润、校地共生搭建稳固实践平台。

（三）师生广泛参与，红色育人氛围浓厚

学校常态化开展红色剧目展演、红色宣讲、红色研学、红色文创创作等活动；广大教师积极开展本土红色文化研究，探索红色元素融入课堂教学路径，产出一批高质量的教研成果；学生们踊跃参与红色实践、技能竞赛、志愿服务，在实践中感悟红色精神，构建师生共建、协同提升的红色育人生态。

四、红色文化赋能高职院校育人的实践举措——红色文化六维赋能育人模式落地路径

（一）党建领航强根基，凝聚红色育人合力

坚持党建引领核心地位，将红色文化建设纳入党建工作统筹部署，推动红色育人下沉党支部、落实于日常，各二级学院结合专业特色打造党建品牌。泸州拥有深厚的化工红色文化底蕴，抗战时期兵工企业西迁建厂，三线建设时期国防化工扎根泸州等。一代代泸州化工人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铸就化工报国的红色精神，是得天独厚的思政育人资源。

应用化工学院紧扣“红色化工·先锋领航”主线，加强与万华化学等企业党支部的共建，开展党员技术攻关、红色主题共建活动，将红色基因与培育化工行业精神、专业人才深度结合；川酒学院携手泸州护国味业有限公司举办“红色铸魂守初心，匠心传艺兴非遗”活动，安排党员到企业参观现代化车间和党建展示厅，了解企业“红色基因 + 产业创新”模式，强化党员服务意识和理想信念。

强化思政师资培养，鼓励教师深耕本土红色文化研究，相关教学成果和思政案例获评泸州市思政工作创新案例等多项荣誉。数字经济学院和福建网龙公司运营党支部进行共建，开发党课“飞夺泸定桥　不朽的红色丰碑”。学生党支部开展榜样面对面、电脑义务检修等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建与专业学习、社会实践深度融合，持续传承红色血脉。

（二）课程融合筑支撑，激活专业育人动能

推动本土红色资源系统性融入思政必修课、专业课与通识教育课程，实现红色铸魂与专业赋能的有机结合。思政课堂融入泸顺起义、四渡赤水等史实，增加红色主题研讨、实地研学等环节。各二级学院基于专业特点推进课程融合，数字经济学院开展红色数字作品创作，应用化工学院开展“百年化工·红色记忆”展演活动，药品与环境工程学院将红色涵养、廉洁自律融入行业职业准则，机械工程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将红色奋斗精神与专业建设相融合，实现全方位育人目标。持续常态化地开展红色经典诵读、革命事迹分享等活动，推动红色文化贯穿通识教育全过程。

（三）实景浸润拓场域，打造沉浸式育人课堂

学校坚持实践育人理念，整合校内外红色资源，构建“校内实习、校外研修、志愿服务”三位一体红色实践体系，让学生在实践感悟中传承红色基因。

1. 常态化开展校内红色实践：依托红色文化进校园、与书记有约、入团仪式、榜样人物面对面等载体，以座谈会等形式开展思政活动。

2. 塑造“行走的思政课”校外研学：联合泸州市红色育人资源，组织学生到革命旧址、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浸入式研学实践活动，以实地参观、史料研究、现场讲解等方式，探寻红色过往，感悟初心使命，使学生在真实场景中接受红色熏陶，厚植家国情怀。

3. 开展红色志愿公益服务：安排学生参与红色文化讲解、革命遗迹保护、社区红色普及等志愿工作，带领学生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服务社会的具体行动，强化责任意识，在无私奉献中践行红色使命。

（四）数字拓界扩空间，丰富红色传播载体

学校运用虚拟现实（VR）、互联网新技术丰富红色文化传播形态，搭建“线上 + 线下”一体化数字化

红色教育平台，提升红色文化教育的时代感与吸引力。

1. 建设数字化红色教育基地：依托校内党建教育中心，整合虚拟仿真实训基地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设备，开展“VR+ 红色文化”“VR+ 安全教育”“VR+ 自然科普”等沉浸式体验教育活动，突破时空约束，让学生置身其中，感受革命历史情境；深入挖掘校内红色资源潜力，如校史馆、VR 党建等，实现红色资源网上共享，随时可学。

2. 拓展线上红色文化传播矩阵：依托校园官网、微信公众号、易班等平台推送红色故事、革命史料、红色理论文章；激发师生创作红色文化短视频等新媒体作品，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红色文化。

（五）文化润心厚底蕴，涵养红色育人氛围

将红色文化嵌入校园文化创建，擦亮“红色五月”育人名片，举办红色文化展演、红色主题交流、入团仪式等活动，丰富师生精神文化生活，参加省级高校红色传统文化打卡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传红；推动红色文化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开展红色家风廉洁视频制作，引导师生传承良好家风、培育廉洁品质；打造百年化工思政育人基地，深挖融入化工先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红色故事和奋斗历程，引导青年学子深入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与先辈崇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提升综合素养，传承弘扬化工行业红色文脉，让革命先辈事迹深入人心、永续流传。同时围绕泸州红色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开展专项调研，为地方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六）校地共生提效能，实现育人与地方共赢

深化与地方党组织、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泸州四渡赤水分院、帮扶地区以及地方企业的合作共建，共同建设实践教学与干部培训基地。一方面为师生搭建优质研修平台，另一方面承接基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助力乡村振兴。依托学校专业优势，组织师生投身乡村红色资源活化、红色文化数字化推广，培育适配乡村特色产业进步的技术技能人才，促进红色旅游与乡村产业深度结合，履行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使命。

五、红色文化育人实践成效——红色文化六维赋能育人模式实施成果

（一）育人机制持续完善，思政建设质量稳步提升

红色文化六维赋能育人模式日趋成熟，构建起目标清晰、路径明确、责任到位、协同高效的红色育人体系，学校易班网络育人项目获评省级思政工作精品项目，多项红色教研案例、展演作品在省、市级评选中获佳绩，思政教育规范化、特色化水平提升，红色文化与育人工作融合程度显著增强。

（二）学生综合素养双提升，成长成才成效凸显

持续的红色文化浸润促使学生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家国情怀和职业素养显著提高。学生积极参与红色研学、志愿服务、技能竞赛、创新创业，在“挑战杯”、各类专业赛事、红色文化展示活动中屡获佳绩，逐步成长为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校园红色氛围日益浓厚，文化底色更鲜明

红色主题活动实现常态化、品牌化运营，推动红色文化深度融入日常学习、融入校园日常、融入师生生活，持续营造人人学红色、悟红色、讲红色、传红色的浓厚氛围与优良风尚，彰显校园红色育人鲜明底色，切实厚植校园文化底蕴、提升立德树人综合实效。

（四）校地协同成效显现，办学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

学校红色育人实践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为川南地区同类高职院校盘活本土红色资源、创新思政育人模式提供有益参考，在红色遗址保护、乡村红色旅游规划、基层党员培训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依托校地协同持续深化，学校办学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稳步提高，充分彰显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价值。

六、结论与展望

红色文化是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目标、培育工匠精神、赋能地方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学校立足泸州本土红色资源，以德技并修为导向，深挖红色资源，构建实施“红色文化六维赋能”育人模式，依托党建领航、课程融合等六大实践路径，促进红色文化与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地方发展深度融合。未来，学校将持续秉承以文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为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泸州红色资源开发利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动能。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EB/OL].(2020-04-22)[2026-05-28].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5/15/content_5511831.htm.

[2] 程伟 . 新时代红色文化融入高职思政教育的路径探析 [J]. 职教通讯 ,2023(09):73-77.

[3] 李佳祺 , 徐成芳 .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45(03):47-50.

[4] 周恺 , 郑传娟 . 红色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析 [J].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37(01):90-93.

[5] 高雅静 , 颜吾佴 . 红色文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价值与路径 [J]. 社会科学家 ,2024(03):44-50.

（作者单位：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生成式 AI 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以“电商视觉营销设计”为例

李　岚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对电商视觉营销领域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也为高职“电商视觉营销”课程的教学改革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针对传统电商美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创意培养不足、个性化学习缺失、思政元素植入生硬等核心问题，本文以数智赋能育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导向，构建“双轮驱动、三阶递进、四维评价”的新型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研究深度挖掘生成式 AI 的教学赋能价值与思政育人潜力，将生成式 AI 转化为培育学生文化自信、工匠精神、职业伦理与法治素养的育人载体，有效破解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两张皮”难题。教学实践表明，该模式可实现知识传授、技能训练与价值塑造的协同统一，为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电商类课程思政教学创新、培育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可借鉴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生成式 AI；课程思政；电商视觉营销设计；教学模式；教学创新

一、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电子商务已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视觉营销属于电子商务产业链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其人才的质量状况直接和电商品牌形象塑造以及营销成效紧密关联。高职院校是培养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基地，在此背景下，“电商视觉营销设计”课程的教学质量显得格外关键。

就“电商视觉营销”课程而言，其思政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美学素养、工匠精神、法治意识、商业伦理、文化自信、家国情怀等诸多方面[1]。然而在实际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常常会陷入“贴标签”“两张皮”的尴尬局面，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彼此分离，很难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成效[2]。

生成式 AI 在图像生成、文案创作以及视频制作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在内容创作行业掀起了狂风巨浪。这不仅对电商美工人才的技能结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从以掌握软件操作为主的人才转变为 AI 辅助创意设计总监。这一转变为课程教学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手段。生成式 AI 不单是高效的生产力工具，更是强大的创意激发工具、个性化学习伙伴以及情境模拟平台。怎样将这一颠覆性的技术全面且系统地融入电商美工课程的教学以及思政育人整个过程之中，从而构建起一种契合数智时代需求的新型教学模式，已然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去探索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直面上述挑战，依据课程的学科特性以及思政方面的要求，充分参考已有的教学模式和思政建设经验，构建起一个以生成式 AI 作为核心纽带的思政教学模式，对其理论框架、操作流程以及评价机制展开详尽阐述，期望能为相关课程的教学创新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以及实践层面的范式。

二、生成式 AI 赋能课程思政的内在机理与育人价值

生成式 AI 绝非仅仅是一项简单的工具方面的升级，它实实在在地充当着催化教学模式产生结构性变革的关键要素，其发挥作用的赋能机理主要可从如下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赋能文化浸润，筑牢学生文化自信

传统教学里，学生创意往往受个人经历与素材库限制，生成式 AI 却能瞬时产出大量跨风格、跨文化的方案。如“国潮品牌设计”项目，可让 AI 生成“融入敦煌飞天元素的化妆品海报”或“有江南水墨韵味的女装详情页”。如此高效又低成本的头脑风暴，大幅提升了学生审美水平，拓展了创意范围。学生在反复调整提示词、筛选优化生成结果时，能直观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独特魅力，在深度审美体验中自然而然树立文化自信，激发源自文化底蕴的创新动力，

这与“坚持以美育人和以文化人”的思政理念极为契合。

（二）赋能细节打磨，培育极致工匠精神

视觉营销设计讲究把细节做到极致，传统教学里，每次修改都需耗费大量精力，很容易消磨掉学生的耐心。而生成式 AI 强大的迭代功能，让对细节“精雕细琢”的过程变得高效且有趣。学生能够围绕一个 LOGO 的字体设计或者一个 Banner 的光影塑造，和 AI 展开多轮对话，靠调整提示词得到不同变体并加以对比。这个过程仿照了专业设计师追求卓越的工作状态，让学生深切感受到“工匠精神”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在对每一个细节反复琢磨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仿佛在游戏里工作的体验，可有效培育学生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品质 [3]。

（三）赋能情境创设，强化法治与职业伦理

电商设计受到相关法规的严格限制，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明令禁止虚假宣传，《知识产权法》针对字体版权予以保护等等。仅靠课堂上单纯地讲解理论，往往枯燥乏味且难以在学生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老师能够借助生成式 AI 营造出极为逼真的伦理情境。举例来讲，可布置如下任务：为某款保健品生成三版宣传图，其中第一版要严格遵循广告法规定，第二版则可尝试打擦边球，第三版需明显存在违规之处。接着引导学生去对比分析由 AI 所生成的不同结果，共同探讨这些结果可能会引发的法律后果。这样一种基于对比分析的探究式学习方式，更能激发学生的深入思考，促使学生将法治意识以及职业道德转化为职业生涯当中的行为准则。

（四）赋能因材施教，重塑师生育人关系

生成式 AI 可给予全天候的个性化助力，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基础与兴趣，以不同速度与途径展开学习与创作，达成真正契合的因材施教。如此一来，教师能从重复的技能指点里解脱出来，把更多心力投放到组织高阶思维活动、引导价值辩论以及留意学生成长这类更有教育核心意义的工作上，促使老师的角色变成“学习的设计者、成长的引导者以及价值的同行者”。这种师生角色的转变，为深度思政教育的开展搭建了更为宽广的舞台 [4]。

三、“双轮驱动、三阶递进、四维评价”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构建

依据上述所阐述的赋能机理，本研究构建出了如下所示的思政教学模式。该模式最为关键之处在于要保证技术的应用以及价值的引领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同步推进，同时要让教学流程和认知规律相契合，另外还需使学习评价同育人目标保持一致。

（一）双轮驱动：AI 技术赋能与思政价值引领协同共生

此模式的运行是以“双轮驱动”为根基的。其中的一个驱动轮是生成式 AI 工具，它在整个教学模式创新方面充当着技术引擎的角色，赋予了教学模式前所未有的计算创造力、个性化以及交互性方面的特性。另一个驱动轮则是思政价值目标，其作为教学的根本指向与最终归宿，对技术应用的方向与意义予以保障，具体涵盖了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工匠精神、恪守职业道德、激发创新意识以及培养家国情怀等诸多方面。

这两个轮子并不是各自独立地运转，而是相互之间紧紧咬合在一起，协同发力进行驱动。技术轮给价值轮的实施提供了既高效又生动且十分深入的途径以及相应的承载平台，如此一来，思政教育便不再只是空泛无力的说教，而变成了能够被人真切感知到的、可以亲身参与其中的、能够实际体验的实践活动。价值论为技术的应用明确划出了伦理方面的边界，并且确定了价值层面的坐标，以此有效地规避技术有可能会引发的诸如抄袭、侵权以及思维惰性之类的种种风险，从而保证技术能够始终服务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性的任务。比如在利用 AI 生成设计稿的时候，价值驱动轮就会引导学生去思考设计稿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它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绝不仅仅是为了单纯追求那种视觉上的冲击效果。

（二）三阶递进：AI 赋能的全流程教学育人重构

教学模式最为关键之处在于对教学流程加以再造。依据学生的认知规律以及项目实践流程的具体情况，精心设计出了三个呈递进状态的阶段，每个阶段的思政目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生成式 AI 在不同阶段的角色和思政目标

	生成式 AI 角色	思政目标
阶段一	无限灵感源、文化数据库	主动挖掘思政元素
阶段二	协同设计伙伴、情境模拟器	思政认知内化、思辨能力提升
阶段三	效率提升器、成果抛光器	思政素养综合运用

阶段一：课前——AI 辅助创意构思与思政元素挖掘

教师借助超星学习通来发布项目任务书，比如“为乡村振兴农产品设计电商海报”这样的任务，同时给出相关的文化背景方面的资料以及法规文献的链接。学生借助生成式 AI 工具展开开放式探索，由此生成了数量众多的初始创意方案。之后，学生们要从这些方案里挑选出最具潜力的几个方向，同时撰写简要报告，阐明其设计思路是怎样回应引导性问题的，初步对其中所蕴含的“服务乡村振兴”（家国情怀）、“绿色环保”（社会责任）等思政元素予以挖掘 [5]。

阶段二：课中——AI 协同深化设计与价值冲突辨析

教师组织课堂教学，从学生课前生成的方案里挑选出典型的方案来展示并展开研讨。围绕设计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的价值冲突点去组织开展辩论活动或者小组讨论。教师在其中进行关键之处的点拨，把讨论引

导到对职业道德以及法治精神较为深入的理解层面[6]。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借助 AI 辅助，针对选定方案展开深化设计工作，在此期间，他们需持续和 AI 互动交流，对方案细节予以优化，且要将整个迭代过程都记录下来，另外还要参与课堂辩论活动，反思自身设计中涉及的伦理方面考量因素。

阶段三：课后——AI 赋能作品优化与价值成果外化

教师在课后还可以开展各类教学活动，像提供个性化的指导，鼓励学生把优秀的作品用到真实或者模拟的商业场景当中，比如可以上传至模拟店铺，也可以去参加设计竞赛等，并且引导学生对项目进行复盘，总结在知识、技能以及价值观方面的收获。学生借助 AI 达成作品的最终优化以及排版工作，同时撰写详尽的设计说明，着重阐述作品所蕴含的价值内涵。最后把成果予以展示并做汇报，学生还要参与到相互之间的评价当中。

（三）四维评价：全过程综合性育人评价体系

要全面评估新模式所取得的效果，需着手建立和其相匹配的“四维评价”体系。这一体系着重突出过程性、发展性以及综合性这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创意审美维度。对设计作品的原创性、艺术性、文化内涵以及品牌契合度加以评价，既看重最终呈现的结果，也留意创意构思的过程，尤其是运用 AI 展开探索所涉及的广度与深度情况。

二是技能协作维度。要对运用生成式 AI 工具所展现出的熟练程度以及创造性加以评价，同时也要对其在人机协作、团队合作当中呈现出来的表现予以考量。这一维度能够凭借 AI 平台所记录的操作日志以及版本历史来展开评估工作。

三是成长过程维度。借助各类 AI 平台所记录的相关数据，分析学生从课前到课后的整个完整的学习轨迹，其中包括学生的参与程度、迭代次数以及思考深度等诸多方面。

四是价值素养维度。通过上交设计说明报告、在课堂上开展辩论并发言、进行项目汇报以及同学之间相互展开评价等多种多样的方式，考查学生对于思政要点的理解水平、认同情况以及践行程度[7]。

该评价体系把定量数据和定性分析相互融合起来，把 AI 所做的客观记录同教师以及同伴给出的主观评价相互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全方位且科学地反映出学生“德技并修”这一综合素养的发展状况。

四、教学模式实施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任何教学创新都会面临挑战，我们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并提出了应对策略。

（一）学术诚信与版权伦理风险

学生可能直接提交 AI 生成图作为最终作业。应对策略：制定清晰的《AIGC 课程使用公约》，规定所有运用 AI 辅助产生的内容都需明确标注，并且最终的作品必须能够体现出学生实质性的创造性劳动，把多次迭代、局部重绘以及后期合成等内容当作过程性汇报来呈现。把“提示词工程”所蕴含的巧妙之处以及迭代过程的记录都纳入评价体系当中。举办专题工作坊，对知识产权法规加以讲解，以此来树立版权意识。

（二）教师数智能力转型与教学认知困境

教师需要完成从知识权威向学习设计师以及思政引导者的转变，并且要迅速掌握新技术。学校要开展有组织的教师培训工作，培训内容涉及生成式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Prompt(提示词) 编写技巧、AI 伦理以及引导式教学法等方面。组建跨学科的课程团队，邀请思政教师以及企业专家一同参与备课和研讨活动。鼓励教师先成为生成式 AI 的深度使用者，以此积累相关经验。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所构建的“双轮驱动、三阶递进、四维评价”的教学模式，无疑是对生成式 AI 时代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展开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探索。在实践探索中，把生成式 AI 当成能够用来重构教学关系、进一步深化价值引领的具备生态性的要素，由此达成了技术逻辑和教育逻辑、知识逻辑以及价值逻辑之间有机且完整的统一状态，切实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致以及创作激情。在促使专业技能提升的同时，还能明显强化学生对家国文化的认同感、对职业规范的敬畏心以及追求尽善尽美的责任心。

本研究为 AI 赋能高职专业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实践范式，但模式的落地成效仍需长期教学实践迭代优化。未来将持续优化人机协同教学流程、完善动态评价机制、丰富思政教学场景，进一步挖掘生成式 AI 的育人潜力，推动数智技术与课程思政、专业教学的深度融合，持续提升高职电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行业输送更多德才兼备、适配数智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1] 文求实 , 陈光忠 . 电商视觉设计课程思政设计与实践 [J]. 教育观察 ,2022,11(26):44-48.

[2] 郭缨 , 和呼 .《电影艺术欣赏》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路径探究 [J]. 传媒论坛 ,2023,6(09):73-75.

[3] 胡怡然 , 雷朝晖 , 李解 . 跨境电商视觉营销课程中“3 阶—3 层—3 梯”工匠精神培养模式研究 [J]. 科技经济市场 ,2023(07):150-152.

[4] 孟晋霞 , 高欣 . 共同富裕理念融入电商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文摘版) 社会科学 ,2024(05):204-208.

[5] 伏广璐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电商课程思政资源的整合与实践探索 [J]. 公关世界 ,2024(23):10-（下转 91 页）

以文化人　以文聚力
——长沙血液中心党建引领文化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谢　菁

摘要：文化建设是组织发展的灵魂。本文以长沙血液中心为案例，系统考察其党建引领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中心在实践中形成了“政治引领、组织嵌入、柔性引领、示范辐射”的四维驱动机制：以政治引领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制度刚性，解决“方向”问题；以组织嵌入将组织网络转化为整合力量，解决“聚力”问题；以柔性引领将外部要求转化为内部认同，解决“共识”问题；以示范辐射将内部共识转化为社会共识，解决“外部”问题。四维机制环环相扣，使“以文化人、以文聚力”从理念转化为现实。这一发现为同类机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党建引领；文化建设；采供血机构；四维驱动

一、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组织发展的血脉与精神纽带[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以文化人更好聚人心、暖民心、强信心”。对于承担保障临床用血安全重任的采供血机构而言，文化建设是提升管理效能“软实力”与守护人民健康“硬支撑”的铸魂工程[2]。然而，既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探讨文化建设的方向与原则，较少从微观机制层面揭示文化建设何以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长沙血液中心为此提供了典型的研究样本。中心成立于 1958 年，是湖南省会长沙唯一的采供血机构，承担着保障 200 余家医疗机构、1000 余万人口临床用血安全的重任，履行对全省 13 个市州中心血站的业务指导职责。现有职工 302 人，党委下设 6 个党支部，党员 139 人。近年来，中心党委将文化建设深度融入党建工作全局，系统构建了涵盖价值引领、服务为民、梦想驱动、品牌赋能的特色文化体系，走出了一条以文化人、以文聚力之路。

本文重点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党建引领文化建设何以能够发挥作用？其二，这一实践对同类机构有何借鉴意义？与既有研究将“党建引领”简单理解为“党的建设的引领”不同，本文借鉴学界前沿分析框架，将“党建引领”视作党建过程与治理过程有机结合的动态实践[3]，以此揭示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

二、党建引领文化建设的作用机理

文化建设何以能够真正发挥作用？长沙血液中心的实践表明，关键在于通过系统的作用机制，使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文化建设的引领优势和凝聚优势[4]。这一机制可概括为政治引领、组织嵌入、柔性引领、示范辐射四维驱动结构。

（一）政治引领机制：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制度刚性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等价值理念，若仅停留于口号层面，便难以产生持久的行为约束力。长沙血液中心的实践揭示了关键前提：价值引领必须通过制度安排获得刚性保障。中心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确保党的价值导向转化为组织决策的基本遵循；通过领导班子“行政查房”制度，将“人民至上”理念落实为管

（上接 90 页）

12.

[6] 汪玉莹，沈珺，陈倩馨，等.“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电商新媒体》课程思政建设与实施 [J]. 社会与公益，2025(04):225-228.

[7] 王冠辰 . 校企协同背景下跨境电商课程思政顶层设计——以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教育信息化论坛，2025(10):160-16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度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程“思政相关教学改革项目”（0450217）；2025 年浙江省职业教育一流人工智能课程建设项目“AI 跨境视觉营销设计”；2025 年浙江省高等职业教育省级教学改革常规项目“高职人工智能交叉课程建设路径探究——以‘AI 跨境视觉营销设计’为例”（JGCG2025172GZ）。

（作者单位：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理层每周深入一线的具象行为；通过 ISO15189 医学实验室认可和“6S”精益管理体系，将对生命的敬畏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的质量标准。这一机制的本质在于：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将抽象价值理念转化为具象制度规范，使文化建设从初始阶段就在正确航向上运行 [5]。

（二）组织嵌入机制：将组织网络转化为整合力量

文化建设不能仅靠宣传部门单兵突进，而需要组织体系的整体支撑。在内部，中心构建的“热血初心”主品牌统领五个支部子品牌的“1+5+N”品牌矩阵，将党的基层组织转化为文化凝聚的核心节点——每个支部既是战斗堡垒，也是文化阵地，“一支部一品牌”使文化建设触角延伸至组织末梢；在外部，中心与湖南妇儿医院、长沙银行等 13 家单位建立党建联盟，将组织网络扩展为社会动员网络，破解了采供血机构“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实现全社会动员”的结构性困局 [6]。这一机制的本质在于：通过党组织体系深度嵌入文化建设各环节，使组织优势转化为文化整合的系统力量。

（三）柔性引领机制：将外部要求转化为内部认同

“引领”区别于“领导”和“管控”的关键，在于其方向性和带动性而非强制性 [7]。长沙血液中心的文化建设鲜明体现了这一柔性特质：《梦想红》刊物不是单向灌输的读本，而是提供思想交流与典型展示的公共平台；“梦想·家”讲坛不是指令传达的会议，而是年轻干部平等对话、开展头脑风暴的成长空间；“五型”人才规划充分尊重个体差异，使不同类型的人才均能找到适切的发展路径 [8]。这些做法的共同逻辑在于：通过搭建平等参与平台、以启发替代说教，使职工在参与中生成认同，在认同中凝聚共识——这种共识不是“被要求的”，而是“生长出来的”。

（四）示范辐射机制：将内部共识转化为社会共识

采供血机构的特殊性在于，事业成败不仅取决于内部管理，更依托于社会公众的参与程度。中心将“长沙市党建·血液科普馆”打造为面向社会的教育空间；在地铁开通无偿献血主题专列、在楼宇电梯投放公益广告，将组织文化符号嵌入城市公共空间；在街头献血点设立“党员示范岗”、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使文化从理念形态转化为可感知的具象体验。这一机制的本质在于：通过将内部文化建设成果外溢为社会公众可参与的文化体验，使无偿献血从“专业工作”升华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价值实践”。

综上，四维机制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政治引领机制提供方向保障，组织嵌入机制提供力量保障，柔性引领机制提供动力保障，示范辐射机制提供效应保障。正是在这一系统机制作用下，“以文化人、以文聚力”从愿景转化为现实。

三、价值铸魂：政治引领为文化建设指明方向

价值理念要想真正管用，不能只挂在墙上，需要变成实实在在的制度并予以执行。

（一）强化政治引领，锚定思想航标

中心坚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严格落实党委“第一议题”制度，坚持把党建作为强化中心管理、促进事业发展的总抓手，不断完善“党建 + 业务”融合并进的工作格局，推动事业、单位稳定发展。开创采供血领域精准帮扶、双向互动的协作模式，以支部为单位创新成立无偿献血应急招募工作领导小组及党员应急队，相关党建经验在“长沙党建”“先锋潮”“我的长沙”等平台宣传推介。

（二）强化班子引领，崇尚务实风尚

坚持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强化示范带动和分工合作，不断增强政治领导、组织凝聚、担当作为的能力水平。如我们结合新的形势、新的常态，调整班子成员工作分工，明确班子成员分区域、分单位联系区县（市）、高校和团体无偿献血工作，形成团结协作、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同时，确立年度重点任务和难点问题，并以“走找想促”活动为抓手，聚焦献血者和用血者急难愁盼问题，班子成员带头下沉一线、深入基层开展专题调研，不断强化党委班子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采供血事业健康发展 [9]。

四、服务塑形：以组织深度嵌入提升能力

文化建设的生命力在于落地见效，而落地的关键在于组织。近年来，中心依托品牌矩阵和党建联盟等多种形式，将组织网络深度嵌入服务流程与社会动员体系 [10]。

（一）践行卓越服务，提升献血体验

中心坚持“以服务对象为中心”，推进智慧化和“互联网 +”服务，献血者与用血单位满意率稳定保持在 95% 以上。在公众服务号开通微信异地用血报销功能，实现血费偿还在线直报、异地直报等；延长献血点服务时间，开设夏季爱心夜市，开通 24 小时咨询热线，以“小切口”推动服务“大提升”。

（二）打造品牌矩阵，凝聚爱心合力

中心创新打造“热血初心”党建主品牌，统领五个支部子品牌，形成“1+5+N”品牌矩阵，将党建工作由“幕后”推向“台前”。先后与 20 余家单位建立党建联盟，签订共建协议，有效激发了高校、企事业单位、医院等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无偿献血事业的积极性 [11]。

（三）构建宣传矩阵，营造浓厚氛围

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对象，实施多元化、个性化宣传方式、宣传内容，同时借助新媒体、新载体，加强精准宣传、精确引导，促进群众由知晓到支持再到参与的转变。如发布《致高校学子的一封信》，成立“长沙热血讲师团”，打造高校“大宣传”格局。借助“6.14”世界献血者日活动、“湘超”体育赛事等开展无偿献血公益宣传，并在线下核心商圈、交通枢纽、楼宇电梯、

公交车身等投放公益广告，构建线上线下联动、全方位沉浸式的宣传生态，推动全社会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12]。

五、梦想聚力：以柔性引领激发内生动力

文化建设若仅依赖行政命令驱动，往往“人在心不在”，唯有激发内在认同，方能“人在心也在”[13]。

（一）创新文化载体，构筑精神家园

2015 年创刊《梦想红》双月刊，设置“党建”“科普”“活动”“典型”等栏目，目前已出刊 61 期，成为凝聚干部职工思想共识、宣传无偿献血知识的重要阵地。2020 年起启动“梦想·家”讲坛，组织年轻干部、业务骨干开展专题研讨和文化沙龙，采用“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模式，目前已举办 38 期。

（二）培育“五型”人才，夯实发展支撑

按照“抓两头、带中间”人才队伍建设思路和“五型”人才建设路径，针对不同类型人员制定不同的培养计划和工作措施，每年开展“梦想青蓝”活动，大力推进复合型人才培养，出台人才培育办法、领导干部联系服务高层次人才、新员工导师制等举措，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队伍呈现年龄结构均衡、学历结构优化、专业结构合理等特点。

（三）丰富群团活动，凝聚向心合力

依托工会和团委成立羽毛球、瑜伽、舞蹈、阅读等多个文体协会，常态化开展文化活动。持续开展“文明科室”“巾帼示范岗”“工人先锋号”“青年文明号”等创建评选，显著提升职工的归属感与满意度。

六、品牌辐射：以示范带动凝聚社会共识

无偿献血事业的高度社会依赖性，决定了内部文化建设的价值在于外溢与辐射[14]。

（一）建强红色阵地，拓展教育功能

2022 年升级打造“长沙市党建·血液科普馆”，通过“血站开放日”年接待参观者超 3000 人次。在街头献血点设立“党员示范岗”与“党员责任区”，联动社区党组织常态化提供便民服务，使“红色驿站”成为服务市民的亮丽名片。

（二）传递人文关怀，彰显公益温度

2021 年创设“送你一朵小红花”志愿服务项目，定期在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省儿童医院聚焦血液病患身心需求开展手工制作、绘本阅读、剧目排演等活动，累计开展 138 期，服务患儿超 2000 人次，志愿服务工时突破 3100 小时，获 2024 年全省卫生健康行业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银奖。

（三）推进廉洁建设，涵养清风正气

持续推进“清廉血站”建设，深化医德医风及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构建“党风清正、医风清新、站风清朗”的廉洁环境，为采供血事业营造亲清有为的良好生态。通过构建示范辐射机制，中心文化建设突破了“墙内开花”困境，实现了从组织内共识走向社会共识的跃迁。

七、成效、反思与展望

（一）实践成效

一是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围绕“智慧献血、智慧服务、智慧管理”理念，以信息化建设赋能综合实力提升，中心配套搭建智能化血液存储管理系统、智能成分流水线、实验室自动化系统、自动化仓储物流系统等。二是有效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开源节流”机制，优化高校、区县、街头献血板块协同联动，千人口献血率达 14.82‰，稳居全省首位、全国省会前列。三是社会共识逐步形成。成功搭建全省临床用血费用直免系统，中心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连续获评全市卫健系统党建工作优秀单位、“长沙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单位”称号，长沙市蝉联八届“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二）问题与反思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需正视面临的挑战。一是“品牌矩阵”协同效应有待挖潜。各党建子品牌之间联动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存在一定同质化倾向，从“多点开花”走向“系统集成”需持续用力。二是形式化风险值得警惕。随着文化活动不断增设，需防范为“做活动而做活动”的倾向，《梦想红》等平台如何持续保持创新活力，是需长期关注的命题。有学者指出，“党建引领”概念在拓展中可能面临“泛化、口号化和庸俗化”的风险，这一警示同样适用于文化建设领域。三是内外转化通道仍处于初步阶段。公众对献血安全的隐忧、对无偿献血与有偿用血关系的认知偏差等深层障碍尚未根本疏解，“墙内开花”如何更充分转化为“墙外飘香”，仍需传播策略创新。

（三）未来方向

一是深化理论武装。推动学习成果向实践转化，升级文化载体内容品质，将经验提升为学理成果。二是促进品牌协同。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将分散的“品牌盆景”整合为有机的“文化生态”。三是强化制度保障。将文化建设纳入党建考核和干部评价体系，建立最低运行标准和动态评估机制，推动从“能人驱动”向“制度驱动”过渡。四是丰富载体形式。探索建设“智慧党建 + 文化”线上平台，运用数字化手段增强文化传播的时代感与穿透力。五是对标先进经验。在文化建设柔性机制制度化经验和文化品牌长效运行方面加强交流互鉴。

总之，文化建设非一日之功。长沙血液中心的实践表明，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在总结中反思、在反思中提升，正是党建引领文化建设持续释放效能的根本保证。面向未来，中心将继续以党建为舵、以文化为帆，在推动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下转 94 页）

推进“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的探索

喻晓洁　吴秋霞

摘要：“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是新时代高校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党建与教育事业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当前部分高校工作室建设存在定位不够清晰、党建业务融合不深、示范辐射效能偏弱等现实问题。本文厘清工作室建设的核心定位、发展目标与核心功能，依托职业院校典型实践样本，总结党建引领机制搭建、党建业务融合创新、示范辐射效能落地的实践特征，从头雁队伍培育、运行机制完善、融合载体创新三个维度，构建工作室规范化、特色化、长效化建设路径，为高校基层党建提质增效、赋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高校基层党建；党建业务融合

一、引言

高校基层党组织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作为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抓手，在强化支部政治功能、、激活教师党员活力、推动党建与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深度融合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现阶段，部分高校工作室建设仍存在定位模糊、工作体系松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辐射带动效能不足等问题，难以充分释放基层党建的育人效能与发展动能。因此，系统厘清工作室建设逻辑、

（上接 93 页）

发展的航程中守正创新、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付翠莲,李春娇.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核心意涵、理论来源与实践指向 [J]. 江南论坛 ,2025(09):16-21.

[2] 刘悦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凝聚政治共识的契合性与实践路径 [J].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5(04):50-61.

[3] 唐皇凤 , 王孟瑶 .“党建引领”标识性概念的生成演变与创新意蕴 [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行政学院) 学报 ,2026(01):28-40.

[4] 林尚立 . 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国家——对中国政党制度的理论反思 [J]. 复旦政治学评论 ,2009(00):1-17.

[5] 丁辉侠 . 从思想引领到制度领导：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探索与治理启示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43(05):10-17.

[6] 黄晓春 . 党建引领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06):116-135,206-207.

[7] 孔凡义 , 庞仁洪 . 从间接管理到党建引领：党对社会组织领导方式变迁的动力逻辑 [J].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25(02):1-11.

[8] 张怡潇 , 黄晓璨 . 党建引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同发展中的复合型人才支撑体系研究 [J]. 社区文化 ,2024(16):106-107.

[9] 黄洋 . 传统文化智慧在提升领导干部治理能力中的作用 [J]. 社区文化 ,2024(19):124-126.

[10] 聂宁涟 . 新媒体视域下采供血机构党建品牌建设与传播路径研究——以北京血液中心为例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5,16(21):210-214.

[11] 李劼 , 刘侦 , 胡祎 . 加强企业支部党建品牌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34):76-78.

[12] 姜兰 . 精准化、故事化、服务化：采供血档案赋能无偿献血宣传 [J]. 健康必读 ,2026(01):12-13.

[13] 牟海英 . 激发、共通与升华：红色文化认同的情感逻辑 [J]. 潍坊学院学报 ,2025,25(02):68-73.

[14] 侯琳琳 , 孙硕 . 城市精神引领下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无锡无偿献血工作为例 [J]. 江南论坛 ,2025(11):80-83.

（作者单位：长沙血液中心党委办公室）

总结成熟实践经验、提炼可复制的建设路径，对补齐基层党建短板、夯实基层组织根基、助推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双带头人”工作室建设的核心定位与功能

（一）建设的根本目标

“双带头人”工作室锚定三个方向明确发展目标。在思想建设方面，工作室将理想信念教育和师德师风培育作为核心工作，引导教师站稳政治立场，贯穿立德树人教学科研全过程[1]。立足党支部标准化要求，工作室优化党建模式，梳理日常流程薄弱环节，补齐作用短板，强化战斗堡垒属性。结合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工作室搭建党建资源对接发展需求的通道，将工作优势转化为内生动力，提升教学科研能力，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然而，从当前建设实际来看，部分工作室在目标设定上仍存在“重挂牌轻运营”倾向，年度工作计划与支部常规工作同质化严重，缺乏围绕学科专业特性展开的差异化目标分解；在党建与业务的衔接层面，普遍缺少可量化、可追踪的阶段目标指引，致使后续资源配置与成效评估缺乏明确标尺。

（二）工作室建设的核心功能

结合高校基层党建赋能教育事业发展的现实定位，工作室在运行过程中承载三类差异化的核心功能，对应不同的工作落地场景。结合高校教师群体的思想成长需求，工作室把常态化的理想信念宣讲以及师德师风培育活动当作思想引导的核心载体，引导教师主动校准政治方向，把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融入日常教学科研以及人才培养的全流程。立足基层党支部标准化建设的推进要求，工作室依托成熟的党建工作机制开展先锋示范相关探索工作，梳理支部运行的薄弱环节与优化方向，为周边同类型党支部的规范化建设提供可参照的实践路径，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借助高校党建资源与业务资源的集聚优势，工作室开展资源整合的相关协调工作，打通党建资源对接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需求的畅通渠道，把党建工作的现有优势转化为业务能力提升的内生动力，契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整体部署方向[2]。上述三类功能在实践中的落地效果参差不齐，相当数量的工作室仍停留在常规党务执行层面，思想引导功能易流于单向传达，资源整合功能则常因缺少可持续的对接载体而难以形成稳定闭环。

三、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的实践样本特征

（一）党建引领机制的搭建路径

结合高校基层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的现实需求，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人居环境学院教师党支部探索的特色工作机制具备可复制的实践参考价值。该支部搭建的“1+1+3+N”工作机制中，第一项是具备双带头人身份的支部书记牵头开展党建整体规划工作，锚定党建引领业务的核心发展方向。第二项是支委班子作为核心执行力量，承接各项党建任务的落地推进与成效的复盘调整工作。三项固定工作模块分别对应思想引领、支部规范化建设、党建业务资源对接三类核心方向，把上级党组织的各项工作要求嵌入对应模块的日常运行流程。N 类联动主体覆盖专业教师、思政辅导员、学生骨干、合作企业党员等不同群体，拓宽党建工作的覆盖范围。支部把理想信念教育、师德师风培育的内容融入常态化学习会、教学研讨沙龙等活动场景，引导教师主动校准政治方向，把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贯穿教学科研以及人才培养的全流程，切实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作用。该机制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双带头人”的头雁角色从象征性符号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接口，即支部书记同时作为党建规划者和学科带头人的双重身份在此获得组织化表达，避免了常见的高低配置导致的党建与业务“两张皮”困境。

（二）党建业务融合的模式创新

结合人居环境类专业对接区域生态环保事业发展需求的现实背景，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人居环境学院教师党支部把党建资源融入专业建设全链条，打造契合专业属性的党建加工作模式。从教学融合的角度出发，党支部依托党员教师牵头的课程改革工作组，把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政策要求以及行业最新实践案例嵌入专业核心课程的内容设计，还组织党员教师带领学生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实地实践项目，推动立德树人要求融入专业教学的各个环节。从科研融合的角度来看，支部把党员骨干教师的科研攻关方向和区域生态环保领域的实际需求对接，依托工作室搭建的校企对接平台，推动党员科研团队和合作企业联合开展污染治理、人居环境优化等方向的课题研究，把党建引领的优势转化为科研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动能。这类模式既贴合专业发展的实际方向，也能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同类专业的党建业务融合工作提供可参照的落地路径[3]。该案例的深层逻辑是“生态党建 + 专业育人”的双向嵌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为党建工作提供了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指向的主题内核，使思想引领从抽象的政治表述转化为具体的学科实践议题；人居环境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因党建资源的持续注入而获得了政策对接、项目载体和行业网络，学生在参与真实的环境整治项目中同时完成了政治认知建构与专业技能习得。这种双向嵌入使得工作室在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和效能输出三个层面均形成了区别于传统支部的特色标识，但其可持续运行仍有赖于将项目驱动的阶段性成果转化为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和师资培养中的常态化制

度安排。

（三）辐射带动作用的落地方式

结合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发挥集群带动效能的建设方向，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人居环境学院教师党支部依托成熟的建设经验搭建分层联动的辐射传导路径。借助支部党员先锋岗的示范效应，把党员教师在党建业务融合中积累的课程改革、科研攻关经验开展常态化的分享工作，覆盖同教研室的所有专业教师，带动更多教师主动将立德树人要求融入日常教学科研的各个环节。面向区域内开设人居环境类相关专业的职业院校，定期举办党建业务融合成果展示交流活动，把已经成型的生态主题课程设计案例、校企联合科研攻坚模式面向相关院校的教师群体进行推广，搭建跨院校的党建业务交流协作载体。面向合作的生态环保类市场主体，把党员教师团队研发的污染治理、人居环境优化相关技术成果定向输送给有实际需求的合作方，一并吸纳企业的一线实践经验反哺专业建设体系，逐步形成校校协同、校企联动的良性发展态势。当前辐射带动的薄弱环节主要体现为经验输出的碎片化与受体反馈机制的单向性，即分享内容多以活动叙事为主，缺乏可迁移的方法论提炼；校际协作多停留在观摩交流层面，尚未建立联合教研、师资互聘等深度协同的制度接口。

四、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支部书记头雁能力培育

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作为工作室建设的核心牵头者，其能力素养直接关系党建工作的引领效能以及业务融合的落地成效，能力培育工作的开展需要锚定核心方向细化落地举措。结合高校基层党建的发展要求，把常态化的理想信念教育、党建政策解读、师德师风标杆学习作为政治素养培育的核心内容，在培育过程中可以依托线上的党建学习平台以及线下的主题研修活动，引导支部书记系统掌握党建工作的相关要求，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站稳政治立场，把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融入工作室建设的全流程[4]。政治素养培育是支部书记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支撑，需要贯穿支部书记任职的全周期，避免出现重业务能力提升轻政治素养培育的倾向，保证支部书记始终能够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引领工作室的各项建设工作。基于高校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政治素养培育之外需要推进支部书记的业务统筹能力培育工作。围绕教学能力提升、科研资源对接、社会服务落地这些核心内容，组织对应领域的优秀业务骨干开展专项培训，帮助支部书记熟悉专业建设的核心流程以及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搭建党建资源对接业务需求的畅通路径，推动党建工作优势逐步转化为业务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过程中可以搭建常态化的经验交流平台，引导不同学科领域的双带头人支部书记分享工作室建设的实际经验，在交流互动中补齐自身能力的薄弱环节。可以建立传帮带的培育机制，邀请已经取得成熟建设经验的支部书记与新任职的支部书记结对，针对性解答工作室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帮助新任职的支部书记快速适应岗位需求。结合支部建设的实际成效以及工作室的建设成果，定期梳理支部书记能力层面存在的短板，及时调整培育的内容以及形式，保证培育工作的针对性以及实效性，契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基层党建队伍提出的实际要求。针对当前支部书记培育中普遍存在的“重政治素养轻组织管理”“重个体能力轻团队赋能”的结构性偏差，应将组织协调能力、品牌策划能力和跨部门沟通能力纳入培育核心指标，建立基于支部书记实际工作场景的能力诊断工具，实现培育供给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

（二）完善党支部工作运行机制设计

结合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常态化有序运行的现实需求，运行机制的优化要围绕全流程落地的各个环节细化落地举措，保障各项工作安排切实转化为实际效能。基于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的基本要求，工作室把各环节工作的具体权责划分到对应岗位的人员身上，明确不同岗位人员承担的具体工作内容以及相应的工作标准，梳理各项工作从部署到落地的完整流程，及时排查流程中可能出现的责任模糊地带，避免出现工作推进过程中相互推诿的情况，保障每一项工作安排都有对应的人员承接落实。结合工作室各项工作涉及多类主体参与的实际特征，要打通不同岗位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对接通道，定期梳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推进过程中需要协同处置的各类事项，搭建固定的信息共享与工作对接平台，引导参与各项工作的人员及时共享手头的相关资源与工作进展信息，减少不同环节衔接过程中的沟通成本，保障各项工作的推进节奏保持统一，不会出现不同环节推进进度脱节的情况[5]。立足长期维持工作室运行活力的实际需要，要搭建贴合党建与业务融合特征的考核评价体系，把党建工作成效与业务工作成果共同纳入考核评价的维度，对应不同的工作内容设置合理的考核权重，把考核结果与相关人员的评优评先、岗位晋升等实际权益挂钩，对于在工作推进过程中表现突出的人员给予相应的正向激励，对于工作落实不到位的人员也要及时提醒督促，引导相关人员主动投入到工作室的各项建设工作中。运行机制的设计还要贴合不同学科专业的实际发展特征，根据工作室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相关的机制内容，保障机制始终适配工作室的实际运行需求，契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的相关要求，为工

作室各项效能的发挥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撑，助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充分发挥，引导教师群体主动将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贯穿到教学科研以及人才培养的全流程当中。当前考核体系中最突出的短板在于党建与业务融合成效缺少独立评价维度，往往以党务台账的完备性替代融合深度的衡量，导致工作室在资源配置中难以获得与建设成效相匹配的制度性承认。应增设涵盖课程思政覆盖率、党员教师攻关项目参与率等观测点的融合效能指标，将考核结果与支部年度评优、党建专项经费拨付直接关联，形成制度化的激励约束闭环。

（三）深化党建业务融合载体开发

结合高校党建与业务工作协同推进的现实需求，党建业务融合载体开发是搭建两者衔接路径的核心支撑，能够让融合工作摆脱空泛化的倾向，真正落地到教师群体的日常工作场景当中。从教学协同的角度出发，工作室把理想信念教育以及师德师风培育的相关内容嵌入专业课程研发、教学研讨活动以及实践教学组织的各个环节，开发兼具政治引领属性和专业教学属性的特色活动载体，引导教师主动把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融入教学工作的全流程。这类载体的开发要贴合不同学科的专业属性，不脱离教师日常教学的实际工作场景，避免出现党建内容与教学内容“两张皮”的问题，让教师在参与教学相关活动的过程中自然接受思想引导，主动校准自身的教学方向。结合科研服务的实际需求，工作室搭建党员教师科研团队对接行业发展需求的对接载体，把党建资源的集聚优势运用到科研方向引导、科研团队组建以及科研项目落地的相关工作当中，推动科研攻关方向契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助力教师群体科研能力稳步提升。这类载体的运行要围绕学科发展的核心方向，聚焦行业领域的现实痛点问题，为教师开展科研攻关提供更多的资源对接渠道，让党建工作的优势切实转化为科研工作的发展动力。依托教师成长的实际诉求，工作室开发覆盖教师职业发展全周期的融合服务载体，把党建引领的相关要求融入教师教学能力培训、科研资源对接以及职业晋升辅导等相关工作当中，为教师群体的职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撑，引导教师主动在日常工作中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这类载体的设置要充分考虑不同教龄、不同研究方向教师的差异化需求，避免采取一刀切的活动设置模式，切实提升教师群体的参与意愿，让融合载体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契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整体部署要求。

结合人居环境学院“生态党建＋专业育人”的探索经验，融合载体的深度开发应重点突破以下方向：将生态文明典型案例转化为兼具教学实训与党建实践的“双功能项目”，使学生在项目参与中同时完成专业能力训练与价值观念形塑；建立以党员教师为带头人的“党建＋教科研”攻关小组制度，将支部组织生活嵌入业务场景，实现组织生活与业务活动的功能叠加；围绕“双带头人”的学科背景构建特色化融合品牌矩阵，避免融合载体开发的同质化倾向，使工作室在服务区域生态治理、乡村振兴等战略中形成不可替代的专业标识。

五、结语

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成效直接关系高校基层党建的引领效能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地质量。建设过程中需始终锚定核心定位，既要结合院校与专业的实际属性挖掘特色发展路径，也要主动借鉴成熟实践的有益经验，从队伍建设、机制完善、载体创新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持续打通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效能、科研动能、服务能力的传导路径。本研究的核心启示在于：工作室建设的关键不在增设组织层级，而在重构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实现方式，使支部真正成为学科发展的组织化力量来源而非行政体系的外部附加。后续可围绕不同学科、不同类型院校的差异化需求开展更具针对性的探索，逐步完善工作室的建设体系，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层组织支撑。

参考文献

[1] 方堃 . 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协同创新模式探析 [J]. 社会与公益 ,2026(05):102-104.

[2] 蔺海晓 , 康俊亚 , 尹香琰 . 基于“双带头人”视角的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培育机制探索 [J]. 高教学刊 ,2026,12(03):78-81.

[3] 金晓萌 , 王新 , 潘瑞 , 等 . 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队伍建设探析 [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27(04):408-416.

[4] 杜菲 . 数字化生态下高职院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探索 [J]. 办公室业务 ,2025(22):131-133.

[5] 鲁琰 . 新时代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建设实践探索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38(20):123-125.

（作者单位：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短视频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多维影响及预防机制研究

李　阁　袁　珍　李颜君　赵国臣 *

摘要： 近年来，短视频凭借着内容丰富、传播便捷、互动性强等特点，深度融入了青少年的日常学习和生活，成为其信息获取、社交连接、娱乐休闲等方面的重要渠道。但是，随着短视频使用时长、使用频率的增加，对青少年的认知、行为、社交等方面均产生了一定影响。现有研究已初步证实，短视频使用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在此背景下，探究短视频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多维影响，构建科学、有效的预防机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与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对社会普遍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回应，也是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与良性成长的长远保障。

关键词： 短视频；青少年；心理健康；影响；预防

短视频是指在各种新媒体平台上播放的视频内容，它传播方便、互动性强，同时制作门槛低，用户能在移动端观看，可利用碎片化时间满足娱乐、学习等需求。当前，观看短视频已成为青少年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青少年心智不太成熟，自制能力不强，再加上短视频平台会根据用户的观看情况设置推荐算法，所以青少年很容易对短视频使用成瘾，从而影响其心理健康[1-2]。本文主要聚焦短视频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多维影响，构建多主体协同的预防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短视频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一）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短视频使用在青少年信息获取与知识拓展、社交连接与情绪疏导、自我表达与创造力激发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 信息获取与知识拓展方面

首先，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丰富、涵盖面广，短视频的使用必然会打破以往青少年通过课本、电视等途径获取信息的禁锢，使青少年群体视野开阔、认知丰富，从而满足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其次，短视频使用便捷，拥有一部智能手机、能获取网络信号即可使用，对时间、地域等限制较低，从而为青少年提供了成本低、效率高的知识获取渠道，对青少年的自我提升与成长有很大帮助。最后，青少年在面对互联网上海量信息时会有意识地进行辨别筛选，他们的信息素养能力会得到潜移默化的锻炼，这种能力的培养对数字时代的生存有重要意义[3]。

2. 社交连接与情感疏导方面

短视频平台通常具有一定社交功能，比如支持评论、点赞、转发等，构建了一定的虚拟社交空间，为青少年的互动搭建了便捷桥梁。可以让具有共同兴趣爱好的青少年摆脱孤立个体状态，融入同伴群体；同时，青少年在共同的话题标签下可以进一步深度交流、彼此呼应，不仅能获得强烈的身份认同，也能产生真挚的情感共鸣；对有些性格内向或存在一定社交障碍的青少年而言，这种同频的线上互动，可以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从而使沟通更加放松、从容，因此这种线上互动具有低压力属性。当他们学业上有压力困扰、成长中感到迷茫彷徨、情感上有纷乱烦恼时，便可以与线上朋友倾诉交流，朋友们的耐心倾听、真诚鼓励与有效陪伴，能够为青少年提供及时且有力的情感慰藉，这种支持能突破现实人际关系的局限，成为青少年缓解压力、疏导情绪的重要渠道[4]。

3. 自我表达与创造力激发方面

互联网普及的时代，短视频不仅是青少年接收信息的窗口，也是沟通表达、展示自我的平台，是与外界连接的枢纽。短视频创作的门槛低，无需复杂的设备与专业技能，拥有一部智能手机，会应用简单的编辑工具，就能满足创作需求。青少年可以随时随地展示自己的多元生活：分享生活状态、兴趣爱好，表达感悟、观点及生活思考，展示个性风格。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探

索自我风格，在互动中建立自己的社交关系，从而获得社交满足感。同时，短视频创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对其心理发展具有积极意义[5]。

（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通过调查发现，观看网络短视频可导致青少年无法集中精力学习。由于网络短视频内容多样、且良莠不齐，对青少年的辨别能力、是非判断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青少年一旦过度观看短视频，就容易对这种“低投入”产生较强的满足感，会产生懈怠心理，必然对学习、工作等需要投入精力的事情无法产生兴趣，久而久之就会影响青少年健康的心理状态[6]。

1. 情绪与认知层面

当下的短视频平台，会普遍依据用户的浏览习惯进行个性化的内容推送，虽然精准契合了用户的兴趣偏好，但也在无形中加固了“信息茧房”。对于青少年而言，由于心智尚在发育阶段，认知体系尚未成熟，如果长期被困在单一、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中，他们的知识边界会被压缩、认知视野会被窄化，这会阻碍其多元价值观的形成，不利于青少年健全人格塑造与思辨能力培育。同时，短视频内容更新迅速、节奏感强、吸引力大，非常容易对青少年的注意力产生不良影响，如果长期沉迷于刷短视频，必然影响其学习和生活，导致深度关注与持久思考问题的能力被逐渐削弱。此外，平台上呈现的非常理想的“精致生活”“完美容颜”，容易引发青少年不自觉的社会比较，而过度沉浸于他人光鲜亮丽的展示，容易对自身产生自我否定与自卑情绪。

2. 行为与社交层面

过度观看短视频会对青少年的行为模式产生显著负面影响。比如时间知觉可能会有所减退，刷视频的过程中会忽略时间，从而影响自己正常的学习或睡眠，成绩下降和睡眠剥夺成为普遍现象，睡眠质量的下降会加剧情绪波动与注意力涣散，形成恶性循环；使用时间的增加会减少户外活动时间，从而导致身体素质有所下降；更严重的是，过度观看短视频，可能导致现实社交能力退化，部分青少年在网络虚拟世界里侃侃而谈，但面对真实人际交流却紧张局促，长期缺乏高质量的现实交流，可能会增加青少年的孤独感、抑郁情绪，进一步加剧了现实社交隔离；另外，短视频的匿名性与传播迅速性，为网络欺凌提供了温床，易催生恶意评论、谣言散布等不良行为，可能会对受害者的心理造成极大伤害，甚至可能引发极端事件[7]。

3. 价值观与人格塑造层面

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可塑性很强，而短视频平台上内容良莠不齐，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塑造易产生影响。比如短视频平台中网红的过度推荐，容易使青少年淡化脚踏实地、奋斗进取的意识；短视频平台上低俗化的不良内容，会不断侵蚀青少年的道德底线，扭曲其价值观念，不利于青少年人格的健全发展[8]。

二、多主体协同的预防机制构建

短视频已嵌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在带来娱乐与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复杂影响，这亟须我们探究一套可行的预防框架。治理青少年短视频沉迷，既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生理上的可塑性，积极引导和唤醒青少年对短视频沉迷的自觉调控意识[9]，也要依靠家庭、学校、平台、社会等多方面的相互协同。

（一）青少年个体层面——培养自我管理能力

青少年应结合自身的学业进度、日常作息规律等情况，制定个性化网络使用规则，以书面形式张贴在醒目位置进行提醒，包括每日使用时长上限、固定使用时段、内容筛选标准等，严格执行，并及时调整优化；也可设置手机壁纸提醒。同时，要学会识别短视频依赖信号，如频繁无意识刷手机、学习时注意力涣散、情绪易受内容影响而波动等，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掌握科学的脱瘾技巧，比如运用 5 分钟延迟法：当产生刷视频的冲动时，先强制延迟 5 分钟，将注意力转移到运动、阅读、手工等线下活动，用健康行为替代短视频依赖。此外，需主动提升信息辨别能力，对观看的内容进行理性思考：这是客观事实还是主观观点，内容是否会引发负面情绪等，从而避免被低俗、同质化或不良信息裹挟。青少年应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树立正确价值观，持续提升自制力，以现实生活为核心，合理规划时间，真正做到科学用网、健康成长，在自我管理中养成自律、理性、积极的生活与学习习惯[10]。

（二）家庭层面——科学引导与陪伴

家庭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的第一环境，其教养方式不仅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韧性、情绪调节能力与行为自律性，还可以形成抵御网络沉迷的重要心理屏障。家长可以从自身示范、行为引导、情感滋养三个维度，助力孩子养成健康的用网习惯。

自身示范方面，家长应以身作则，理性用网，给孩子树立榜样，同时注重高质量的线下陪伴。行为引导方面，家长应理解青少年“自主需求”的心理特点，采用协商而非强制的方式建立用网规则，比如规定用网时间、设定观看内容等，通过规则强化孩子的自觉意识，减少孩子的抵触心理；同时多鼓励孩子参加户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让孩子在真实互动中得到快乐，从根源上降低对网络短视频的依赖[11]。情感滋养方面，家长应成为孩子情绪的“安全港湾”，要敏锐留意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发现孩子有异常用网行为时，不能只是简单说教与指责，而应该用包容、理解的态度倾听孩子的心声，帮助孩子梳理情绪、缓解压力。这种情感支持可以增强孩子的心理韧性，使他们在面对困境时，不是选择逃避，而是更愿意与家人沟通，从

而守护其心理健康[12]。

（三）学校层面——媒介素养教育与心理干预

网络媒介的高频使用虽然为青少年探索世界、释放压力提供了窗口，但是也容易使其陷入短视频成瘾的困境。因此，学校在对青少年进行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同时，需要注重与心理健康教育密切结合。合理设置课程与活动，教师在开展相关教育时，要传授网络信息如何分辨、媒介工具如何使用等实用技能，还要聚焦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与成长痛点。明确制定校园网络行为准则，规范网络言行，引导青少年文明上网。丰富线下校园文化活动，减少学生对短视频的过度依赖。通过现实的真实活动，满足青少年社交、娱乐、表达等需求，达到心理满足感，减少空虚感。

（四）平台层面——履行社会责任与算法向善

短视频平台作为内容传播的端口，覆盖的内容不能仅追求流量，还应该履行一定社会责任，将青少年保护工作做实做细。当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均有未成年人模式，有防沉迷系统，通过限制使用时长、屏蔽不适内容等方式，为青少年筑起了第一道防护墙。算法推荐是短视频平台的核心技术，平台需优化算法推荐，增加科学科普、国学诗词、传统文化、安全教育、兴趣素养等优质内容的推送，让青少年在刷视频的过程中既增长知识，又涵养品格。减少游戏类、暴力类、拜金类等不良内容。同时应根据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水平和成长需求，推荐适合的主题内容，精准满足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需求[13]。

（五）社会层面——政策保障与氛围营造

从社会层面而言，要持续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强短视频内容传播的法治建设，要筑牢青少年模式的安全保护防线。充分发挥政府在网络安全方面的主导监管职能，与学校、家庭和网络平台等多方主体联动，形成协同共治、同向发力的治理格局。可加大社会全民宣传与普及力度，借助电视、广播、公益广告、社区宣传栏等传统渠道，常态化普及短视频理性使用规范，青少年心理健康常识与网络安全防护技能等，持续提升全社会对青少年网络沉迷问题的关注与科学应对能力。同时，可定期开展“健康短视频生活”等主题宣传活动，邀请公众人物、教育专家、青少年代表等共同参与，结合真实案例分享经验与感悟，传递“理性刷视频、健康伴成长”的文明用网理念，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通过丰富青少年的生活体验，帮助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成就感与归属感，有效降低对虚拟世界的过度依赖与沉迷[14]。

三、结论

短视频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媒介形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它既带来信息获取与社交娱乐的便利，也能通过心理、算法等多重机制对青少年的认知、情绪、社交等方面产生风险。因此，青少年心理健康保护并不是简单禁止短视频使用，而是要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构建“个体—家庭—学校—平台—社会”五维协同的预防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于通过科学的管控减少负面影响，通过优质内容与教育引导发挥短视频的积极作用，最终帮助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数字生活习惯，培养其驾驭工具而非被工具驾驭的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1] 刘磊，王也．短视频热播的冷思考 [J]. 传媒，2021(20):62-64.

[2] 凌喆懿，曹梅娟．大学生短视频成瘾的研究进展 [J]. 职业与健康，2025,41(22):3159-3163.

[3] 李杨．青少年群体短视频使用及影响研究 [J]. 西部广播电视，2023,44(22):132-135.

[4] 王健．“滑动”的自我：青少年短视频沉迷现象的技术社会学解析 [J]. 理论导刊，2025(01):63-68.

[5] 王志昭．短视频对青少年的利弊影响及治理 [J]. 新闻爱好者，2019(11):60-62.

[6] 高晓波．网络短视频的发展对青少年产生的心理影响 [J]. 记者摇篮，2019(10):130-131.

[7] 郭延娜，李开云，林丰勋，等．网络短视频对青少年心理过程的影响与建议 [J]. 社会科学前沿，2022,11(06):2391-2396.

[8] 贾维．网络短视频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 [J]. 黑龙江科学，2023,14(17):101-102,105.

[9] 赵红勋，赵畅．迈向“健康”的媒介实践：青少年短视频沉迷治理策略 [J]. 中国出版，2025(02):42-48.

[10] 白京源．从心理学的角度浅析青少年沉迷短视频的原因及危害 [J]. 世纪之星—高中版，2021(23):88-89.

[11] 蒋俏蕾．青少年短视频使用的心理、风险及对策 [J]. 青年记者，2019(25):15-16.

[12] 邓紫莎．短视频成瘾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J]. 青春期健康，2025,23(14):113.

[13] 徐李红，胡珊．家庭视角下青少年短视频成瘾的干预措施 [J]. 漫科学（科学教育），2025(04):10-12.

[14] 梁超伟．自媒体时代青少年短视频沉迷问题的现状梳理、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J]. 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5,37(03):24-2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6年度菏泽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短视频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多维影响及预防机制研究”。

（作者：李阁，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副教授；袁珍、李颜君，菏泽医学专科学校讲师；通信作者赵国臣，菏泽学院校医院副主任医师）

校园守望：基于浙江省“校警驿站”建设的高校安全协同治理研究

朱意炜　孙亚娜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安全风险日趋复杂多元，单一依靠学校保卫部门的管理模式已难以应对各类安全隐患。高校安全协同治理有着现实需求和理论支撑。浙江省在实践中建立和完善“校警驿站”建设要求和运行机制，以驿站为协同载体，构建多方联动的协同治理体系，成为筑牢平安校园防线的关键举措。安全协同治理模式的巩固和长效运转，离不开柔性安全管理、信息对称的良性互动、完善的评估机制和以师生为中心的安全文化建设。多方协同、全员参与，安全治理与立德树人在校园内外进一步有机结合。

关键词：高校安全；协同治理；“校警驿站”；立德树人

高校安全事关师生切身利益、科教有序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高校安全治理，需要统筹各类资源、凝聚多方合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到要“完善校园安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和安全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2024年7月11日，浙江省召开全省校园安全工作现场会暨校园安全协同共治体系建设推进会，会议提出要“深化护校安全专项行动和平安校园建设，加快建设全省校园安全协同共治体系，以高质量平安校园建设助推高水平平安浙江建设”。浙江省公安机关坚持运用共治理念、机制和方法，会同教育部门，创新推进具有浙江特色的“校警驿站”建设。截至2025年8月，已实现省内高校“一校一站”全覆盖，驿站将维护安全的主要职能与多部门政务服务事项有机融合，累计服务师生7万余人次。“校警驿站”作为警校社联动的实体平台，打破传统的治理壁垒，形成协同治理的运行体系，通过梳理各参与主体职责分工、联动流程与运行机制，总结协同治理中的特色做法与现实成效，进一步探索常态化、长效化的校园安全治理路径。

一、高校安全协同治理的现实需求

校园安全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保障。“立德树人”是高校育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高校的立身之本，是高校工作的中心环节。人身、财产、网络、心理、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安全稳固是课堂教学、思政育人、实践活动正常开展的前提条件。

校园空间与设施条件，加大了传统安保工作难度。高校校园往往有更为广阔的公共活动空间与分隔更为精细的功能区域，遮挡物、距离、楼层、门禁、装饰等都会提升校内安保部门对校园活动的监控难度，仅靠校内安保队伍难以实现全时段、无死角管控。

人员流动特征特殊，衍生出多元安全管理隐患。与中小学封闭式管理模式不同，高校校园内外人员交互频繁，学生、教职工、访客在校园中的学习、工作与生活安排更多依据个体化的安排。虽然高校普遍采用身份识别与访客预约登记制度，但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单纯依靠安保人员随时定位某一位学生、教职工或访客难度较高。

二、高校安全协同治理的理论视角

德国学者赫尔曼·哈肯首先提出“协同学”概念，他认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配合产生了系统内部的协同，并提升整个系统的行动能力。而在公共安全领域，“协同治理是个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主体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其中既包括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促成协商与和解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1]。协同治理是一个多方主体围绕管理共同事务互动、协调的过程，呈现治理主体多元、系统动态、组织协调等方面的特点。

高校校园是一个物理环境封闭又开放、人群分布集中又分散、人员特征相似又多元的矛盾空间，校园安全协同治理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校内外多主体的参与能有效推动高校安全教育，“高校应构建警校联合、校地合作、校际联动机制，确保校内外资源和信息的交流与

共享，推动高校安全教育体系持续优化与进步，从而改善安全教育的效果与品质”[2]。有学者认为，应根据大学生安全突发事件产生的原因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在此基础上构筑高校安全管理体系[3]。有学者则观察到协同治理在安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校园安全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以宣传教育为基础、素养提升为核心、技术赋能为支撑、社会协同为保障”[4]。构建多方联动的高校安全协同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三、浙江省“校警驿站”建设情况

（一）因地制宜的“校警驿站”建设要求

“校警驿站”主要依靠足够的勤务力量和统一标准的硬件设施。勤务力量方面，“校警驿站”实行教育、公安、高校联勤制，其中至少有一名公安警力和一名教育部门人员，实行 24 小时运作。硬件建设方面，驿站设置办事区、工作区、谈话区、接待室、装备区、指挥调度室、休息区等区域，纳入学校整体规划，外观融入校园整体风格。

（二）灵活多样的人员配置

驿站采用公安民辅警常驻、校内职能部门人员协同、属地力量补充与学生自治参与的架构，各地结合规模灵活配置，部分高校驿站设立特色专项工作室。浙江理工大学临平校区设立“老许工作室”，由资深民警牵头负责，专人开展谈心谈话、反诈宣讲、危机干预等工作，形成品牌化服务。比如，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和润·天平解纷工作室”集结多名退休政法干部，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组建 630 名“平安助理”队伍，低空学院建设“空中义警”队伍。高校学生利用不同专业的多样优势，协助巡逻、宣传、辅助调解，外语能力强的学生可以成立涉外志愿队服务留学生。

（三）面向实务类型的功能分类

安全防控与应急处突。驿站承担校园日常巡逻、重点区域值守、外来人员管控、智慧视频监控、一键报警联动等工作，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依托驿站抓获盗窃外卖的校外人员。此外，驿站还兼顾排查消防、设施、网络等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同时，搭建反诈预警体系，拦截电信网络诈骗，处置盗窃、外卖被盗、寻衅滋事等治安警情。

公安政务便民服务。驿站的建设，把公安服务窗口前移进了校园。师生可就近办理身份证补换领、户籍迁移、居住证、无犯罪记录证明、车驾管、出入境证件及签注等业务。部分站点配备自助一体机、流动政务服务车，集成上百项民生服务，推行错时、延时、上门服务，同时为留学生提供涉外证件办理。

矛盾纠纷多元调解。驿站的硬件建设为设立专属调解室提供了条件，可在驿站开展寝室矛盾、同学口角、经济纠纷、校际冲突、文化差异等方面的矛盾调解。多方人员联合疏导劝解，让矛盾就地化解。比如，杭州滨江高教园区驿站跨校调解篮球赛引发的学生冲突，并推动制定校际赛事规范公约。

法治安全教育与宣传。驿站常态化开展反诈、禁毒、国家安全、交通、消防等主题宣讲；创新反诈剧本杀、安全知识竞赛、实景灭火演练、短视频创作等沉浸式宣教形式。驿站配合高校开设新生安全第一课，部分高校则将安全教育纳入课程与学分体系，进一步助推学生安全意识养成与技能提升。

心理疏导、意见收集与综合育人。驿站联动学校心理健康中心，缓解学生学业、情感、人际压力，同时作为社情民意收集站，汇总师生诉求并对接整改。驿站联动校内相关部门组建各类志愿队伍，吸纳学生参与校园治理，结合活动开展民族团结、职业指导、思想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四、高校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校警驿站”提供的平台打破部门壁垒、消除空间阻隔，汇聚公安机关、校内职能部门人员、属地工作人员及在校生力量，构建起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驿站运行因地制宜，形成了多样有效的机制（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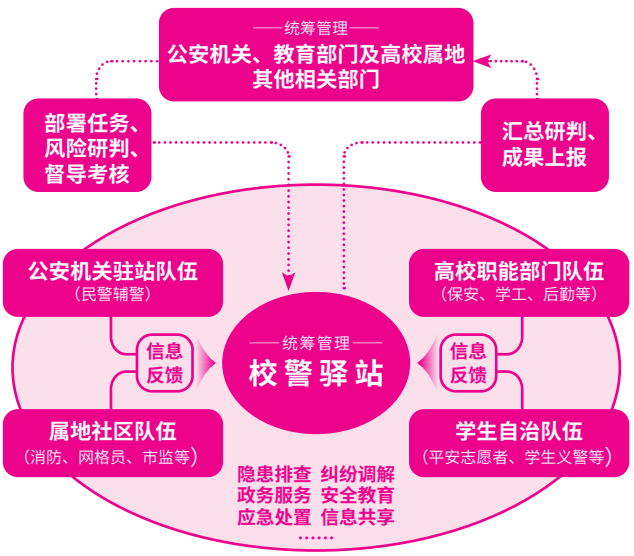


图 1“校警驿站”协同治理机制

多方共建协同机制。以“校警驿站”为协同中枢，整合公安机关驻站队伍、高校职能部门队伍、属地街道（社区）队伍和学生自治队伍等，落地各项安全与服务举措，多方协同履职，并以驿站为中心共享和反馈信息，构建公安、高校、属地街道（社区）多方参与的多跨联动体系。高教园区更是打破校际壁垒，定期召开联席研判会，分析警情，共同整治校园周边隐患，如杭州滨江高教园区搭建公安、高校、社区三级响应体系，每月召开共商会；温州理工学院构建“校—警—企—社”党建联建机制。

快速应急响应机制。依托 24 小时运作与校园 110 专线，多数驿站达成快速到场处置标准。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推行 1 名社区民警与 1 名辅警常态驻点值守模式，构建起“1 分钟响应、3 分钟处置”的快速反应机制。借助智慧安防、大数据预警，实现风险提前预判、隐患前置化解。比如，湖州师范学院“校警驿站”向校方提供大量有效情报信息，快速处置涉校反诈警情，预警平均响应时间缩短 43%。

分类办理服务机制。政务服务精细化为现场办、指导办、代跑办、集中办、预约办、上门办等模式，配合师生上课、考试、休假等时间节点。矛盾纠纷分级处置，简易纠纷当场化解，复杂纠纷多部门联合处置。例如，公安政务便民服务车开进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民警携带移动办证终端、拍照设备等，现场为师生办理身份证。

督导考核与激励机制。驿站建立周度研判、月度分析、季度通报、年度总结督查制度；学生参与平安巡防、安全宣讲等志愿活动纳入社会实践学分，推出平安积分、评优奖励等举措，调动师生参与积极性。在协同机制运行过程中，公安机关、教育部门及高校所在地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还具备统筹管理职能，部署任务、风险研判、督导考核，由驿站接收对接并负责多方信息的汇总研判和运行成果上报。

校地全域共治机制。驿站联动城管、交通、消防等部门综合治理校园周边环境，部分驿站还协同人社、企业，叠加就业服务，实现校园治理与区域治理深度融合。杭州市公安局钱塘区分局白杨派出所建设移动驿站“青牛直通车”，在提供上门办证服务的同时还展示各类企业招聘信息，为在校学生提供真实可靠的实习和招聘信息。

五、高校安全协同治理模式的巩固与长效运转

依托“校警驿站”，浙江省已构建起公安、高校、社区、师生多方联动的协同治理框架。共治体系持续落地、行稳致远，不能仅停留在硬件搭建与机制层面，还需从柔性管理、信息互通、评估改进、文化培育四个方面持续发力，补齐治理短板、优化运行逻辑，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平安校园治理样板。

（一）关注个体与偶然，推进柔性安全建设管理

传统安全管理多以刚性管控、集中整治为主，侧重群体性风险与显性隐患，容易忽视个体诉求、细微矛盾以及突发性偶然事件，若未能及时疏导化解，极易逐步升级为治安纠纷、安全事件。因此，需坚持刚性制度与柔性管理，推行精细化、人性化的安全建设模式。台州科技职业学院依托驿站成功化解多起因生活习惯差异引发的室友矛盾，以温和方式化解分歧，避免小摩擦演变为冲突。浙江理工大学临平校区结合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打造特色工作模式，用温情管理拉近心理距离。驿站对于高校学生群体的性格和心理特点的把握，有利于风险预防，而对于小群体乃至个体的关注，则能真正打通阻碍安全感提升的堵点。

（二）加强平台建设，促进信息对称的良性互动

信息壁垒、沟通不畅是制约协同治理效能的重要因素。公安、学校、社区、师生各方若信息不同步，易出现风险发现不及时、指令传达不顺畅、问题反馈无渠道等问题。必须坚持驿站的协同中枢地位，持续升级实体平台与数字化平台，实现风险信息、服务信息、诉求信息在驿站和师生间双向流通，构建信息对称的良性互动格局。在实体平台层面，驿站应进一步结合区位与规模迭代升级，如根据功能分立，可以将部分园区驿站合并，还可以让一部分驿站流动起来。在数字化平台方面，各地驿站应搭建一体化信息系统，驿站同步开设线上咨询端口、安全举报通道。线上线下平台融合运转，打破部门、校际、校地之间的信息隔阂，让各方精准掌握安全态势，也让师生诉求得到快速回应，推动多方互动更加高效顺畅。

（三）完善评估机制，“因校制宜”制定解决方案

高校类型多样，涵盖综合本科、高职院校，校区地点分散，校园规模、人员构成、周边环境、风险类型差异显著。统一化的建设和考核评估标准难以适配所有驿站，想要保障共治模式长效运转，必须分类施策。首先要构建全方位考核评估体系，将治安案件发生率、矛盾纠纷化解率、反诈拦截成效、政务服务满意度、应急处置效率等纳入核心评估指标。其次要坚持因校制宜。对于师生人数多、人员流动大的城区高校，侧重智慧安防与反诈预警建设；针对地处远郊、周边环境复杂的校区，重点强化校地联动、周边综合治理；高教园区重点推行跨校协同、资源共享。此外，部分院校可以结合评估结果开展研究，针对治理难点优化方案，使协同治理更加贴合各校实际。

（四）深化守望互信，营造以师生为中心的校园安全文化

“多方合作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参与各方能否超越个体利益，将目光投向更加广阔的公共领域。”[5] 高校安全治理，不仅在于保障物理空间的安全，还在于要将校地协同的创新模式与育人有机结合。通过教育和引导，提升师生对校园整体利益重要性的认识，培育高校安全“大格局”观念，树立以师生为中心的安全观。教育行政单位、高校职能部门、公安机关共同构建的协同治理机制中，学生群体是一支重要力量。学生通过个体或团体形式参与到安全教育、演练、报告、巡防等环节，树立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厚植社会责任担当意识。

高校安全协同治理的“校警驿站”模式行稳致远，离不开柔性管理、信息互通、科学评估与文化培育的共同支撑。多方协同、全员参与，不同主体都是校园守望的重要组成。未来，应持续完善以师（下转 104 页）

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的路径研究

黄　滟

摘要：我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面临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这一核心难题，其复杂性已超越单一经济援助范围。本研究聚焦于社会工作专业在解决此问题时的系统性角色，构建了涵盖风险识别、家庭赋能、国家监护和系统协作的综合性介入框架。本文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以优势视角观点为基础，在深入剖析安徽、福建、河南等地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对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的实践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在于从“被动救济”模式转向“主动保护”模式、从“问题干预”模式转向“能力建设”模式。研究提出了构建以法治保障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以专业推动为手段、以社会参与为补充的未成年人保护长效机制的必要性，以期推动未成年人福利体系走向与发展型、预防型相结合的新阶段。

关键词：困境儿童；监护缺失；社会工作；介入路径；国家监护

一、引言

未成年人个体社会化进程中的基础单元被普遍认为是家庭，而监护功能的缺失则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权益保护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与传统救济模式侧重于经济补贴与机构收容、难以应对监护关系断裂所引发的复杂需求相比，社会工作介入强调“人在情境中”和系统干预，通过专业方法增强家庭功能、构建支持网络，为修复儿童保护网络的关键提供专业力量。本研究结合具体案例，探讨社会工作介入未成年人监护缺失的有效路径，试图阐明专业社会工作如何通过精准化识别、差异化赋能、法治化保障与网络化协同，在未成年人、家庭、国家与社会之间重建可持续的保护性联结，对完善未成年人福利政策、创新未成年人保护实践提供借鉴与理论思考。

二、未成年人监护缺失的现状与类型分析

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是指各种原因导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法有效履行或完全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保护职责，使其处于无人照料、照料不当或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状态。其主要类型包括：监护缺位型、监护失能型、功能性监护中断、监护侵害型。其现状呈现出群体规模不容忽视、问题成因复杂、需求复杂多元的显著特征[1]。从规模上看，监护缺失的未成年人是困境儿童中的重点群体。这些监护缺失极少孤立存在，常与经济贫困、父母自身困境、心理行为问题等密切相关，形成“多重困境”的恶性循环，给未成年人保护带来多重且复杂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严峻挑战，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从“村（居）儿童主任”到“县（区）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四级工作网络，并通过教

（上接 103 页）

生为核心、全员共建共享的协同治理模式，让安全治理与立德树人在校园内外进一步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 . 治理与善治 [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5.

[2] 路昭亮 , 郭晓鹏 , 熊国余 . 高校安全教育研究 [J]. 中国教育技术装备 ,2025(24):59-61.

[3] 梁姗姗 . 大学生安全教育缺失及高校安全管理体系的构筑 [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9,22(09):35-37.

[4] 刘雅宁 . 安全文化素养提升的实践路径与优化策略——以江苏省 A 高校为例 [J]. 大众文艺 ,2026(05):148-150.

[5] 邢振江 . 公共安全多元协同治理研究 [M].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4:10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警察学院 2025 年校级科研项目“校园守望：基于浙江省‘校警驿站’建设的高校安全协同治理研究”（2025QNY011）。

（作者：朱意炜，浙江警察学院“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三级主任科员；孙亚娜，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一级警长）

表 1　未成年人监护缺失的类型

类型	核心定义	主要情形	典型特征	典型案例
监护缺位型	父母双方因客观原因完全无法履行职责	父母双方死亡、失踪、长期服刑、被强制隔离戒毒等	监护主体物理性缺位，儿童处于事实无人抚养状态，需外部即时介入提供生活庇护	福建省永安市的小兰（化名）在父母相继去世后，其同父异母的哥哥因生活压力明确拒绝履行监护职责，导致她一度居无定所
监护失能型	父母名义上存在，但实质上无力履行责任	父母患重大疾病、重度残疾，或一方死亡、失踪而另一方无力抚养	监护主体功能性缺失，虽有照料意愿但无能力满足儿童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	扬州 8 岁的小浩（化名）家庭即属此类，小浩本人有沟通障碍，母亲无法自理，全家仅靠父亲一人送外卖维持生计，基本的日常照护都难以为继
功能性监护中断	因长期空间分离导致日常监护功能中断	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	监护关系形式化存在，儿童沦为“留守儿童”，面临情感忽视、安全风险与学业监督不力等问题。	相关政策界定清晰，但现实中大量留守儿童面临的情感忽视、安全风险与学业监督不力，是此类型的普遍表现
监护侵害型	监护人有能力但拒不履行或恶意违背职责	对儿童进行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或长期情感忽视	监护功能异化为伤害源，对儿童造成直接的身心创伤，需司法力量强制干预	安徽省淮南市木木（化名），其父母长期消极怠于履行抚养照料义务，常年疏于照管孩子

注：表中未成年人姓名均为化名。

育、司法、公安等多部门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常态化制度化协同干预，助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单一救济向主动发现、综合保护的系统保护转型。基于监护失能的根本原因与性质表现，未成年人监护缺失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其核心特征如表 1 所示。

总之，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问题是一个多层次、多类型而又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从“事实缺失”“能力薄弱”“功能中断”，直到“行为侵害”，各种监护缺失给孩子带来的伤害程度和表现形式虽然有所不同，却都使他们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安全基石发生了根本性动摇 [2]。这种状况既揭示出家庭监护系统潜在的系统性失灵问题，又显示建构以国家责任为基础、以社会支持和专业干预为辅助的替代性安全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三、理论视域与介入原则：构建专业干预的基石

社会工作针对未成年人监护缺失现象展开介入时，并非简单替代或者指责家庭，而是依托一套严密且系统的理论框架以及价值原则，以此保障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科学性和人文关怀特质。生态系统理论从微观、中观、宏观等多个层面，为理解未成年人所处困境提供了全景式的分析角度，着重把未成年人放置在其生活的多重环境系统中加以考察 [3]。其中，微观系统关乎未成年人同家庭、学校、同伴群体的互动关联，中观系统协调家庭、学校、社区之间的互动关联，宏观系统包含文化、社会福利政策、法律法规等更为广泛的影响要素。该理论引导社工关注个体行为，还着重改进未成年人与一系列系统之间的持续互动关系。同时，优势视角与家庭系统理论共同挖掘未成年人与家庭之间的潜能，改善或修复家庭内部沟通功能与互动模式。

在此理论指导下，社会工作介入要遵循三大核心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所有行动的最终准绳，要求任何决策均以增进儿童的长期福祉与发展为最高标准；家庭为本原则强调家庭是儿童成长的最佳场所，干预的首要目标是支持、修复和强化家庭功能，而非替代家庭功能，当家庭确实无法履职时，再寻求基于社区的替代性方案；多部门协同原则强调监护缺失问题的解决绝非民政或社工单一力量可及，需要民政、司法、教育、卫健、公安等多部门打破职责壁垒，构建联动网络，形成保护合力。这些理论与原则共同构成了社会工作介入的“路线图”，确保干预行动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解决当下危机又谋划长远发展。

四、实践探索：社会工作多维介入路径的构建

基于以上理论与原则，结合全国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构建出以下四个层层递进又相互关联的社会工作介入路径。

（一）前端预防与精准识别路径：构建分级评估与预警网络

预防优于补救，而有效的干预始于精准的发现与评估。因此，建立一套系统化、标准化的风险筛查与评估机制是社会工作的首要路径。第一，建立网格化主动发现报告机制，依托覆盖“市—县—乡—村”四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网络，发挥乡镇儿童督导员与村居未成年人主任的一线“观察员”作用，通过定期入户走访与邻里沟通能敏锐发觉监护潜在风险。例如，安徽省宣城市通过专业社工与未成年人主任组成团队进行“温情走访”，在送上关爱物资的同时，细致观察和评估走访家庭的监护状况。第二，建立专业化精准风险评估体系，在初步发现后需要专业社工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浙江宁海县建立了“网格初筛—专业诊断—动态管理”三级评估体系。未成年人主任运用标准化的量表初筛建档后，由春晖博爱基金会等专业机构的社工进行深度评估，并创新实施将个案划分“红、黄、蓝、绿”四色的动态风险管理机制，采取差异化响应策略。这种精准“画像”有效地确保了有限服务资源与未成年人多变复杂需求之间的最优匹配。第三，建立常态化风险监测机制。江苏省扬州市建立了“常态巡访 + 预警派单”核查机制，河南省漯河市要求对困境儿童建立“一人一档”并定期跟进，这都是为了实现对儿童境况的动态掌握，及时监测变化中的风险。

（二）家庭支持与能力建设路径：开展监护赋能与“喘息服务”

对于监护能力受损而非缺位的家庭，社会工作的

核心策略是“支持”与“赋能”，通过外部支持增强家庭内在潜能，从根本上巩固未成年人保护的天然防线[4]。第一，开展个体化“家庭赋能”专项行动，社工直接针对监护人开展精准培训与能力建设。以上海市金山区的“爱有方”计划为例，社区通过结构性访谈评估家庭需求，启动了“智慧祖辈”成长小组，设计个性化方案，通过角色扮演、经验分享等环节，有效提升了亲子沟通和教养的质量。第二，构建制度化的“喘息”服务体系，主要针对因长期照料身心障碍的未成年人而处于能量耗尽的监护人，通过提供替代性服务，使监护者能获得短暂休息，从而维持其身心健康发展的可持续性。比如，扬州市就构建了居家喘息服务、日间照料、技能培训等多种形式的系统支持网络。安徽省淮南市的社工通过“七彩阳光”项目为一脑瘫未成年人家庭提供每日餐食、护理物资等居家服务；市儿童福利院开展“福伴童行”项目，提供日间照料和短期托养，让监护人得以“喘息”，维系工作与生活平衡，从而保护家庭功能的可持续性。

（三）监护监督与司法保护路径：推动监护权评估与依法变更

当家庭监护严重失职或损害未成年人利益且通过支持无法改善时，社会工作需协同司法力量，果断启动司法保护程序，推动监护权变更，为儿童寻找安全可靠的归宿[5]。第一，评估监护能力司法，社工在其中的关键角色是提供专业的评估报告。在安徽省淮南市木木的案例中，虽然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主体是祖母，但前期对父母长期不履职事实的调查、对祖母抚养能力及儿童成长状况的评估，是司法判决的重要依据。第二，协助监护指定与永久安置，变更监护权不是终点。在福建省永安市小兰的案例中，社工联动司法部门，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供支持。在缺乏合适亲属监护的情况下，社工网络持续发挥作用：教育局协助转至寄宿学校保障教育；项目社工链接“福蕾周末课堂”，帮助其重建社交和兴趣。第三，通过专业评估为她匹配了合适的收养家庭，完成了从“国家临时监护”到“永久性家庭安置”的温暖过渡。

（四）资源整合与危机干预路径：实施跨部门协同与个案管理

对于突发性、跨区域或高度复杂的个案，社会工作扮演着“危机干预者”和“系统工程师”的核心角色。第一，构建制度化跨部门协同网络，突破复杂个案的行政与地域壁垒。在河南省濮阳市的案例中，小鹏的户籍在河南濮阳，人却滞留在山东青岛，社工迅速构建了跨省协同网络，联动两地民政、公安部门，在48小时内完成信息核实、亲属定位和临时安全安置。第二，实施专业化危机评估与干预策略，社工运用专业方法多维度精准评估危机等级。在小鹏案例中，社工判定其为涉及生存风险、监护缺失、心理创伤等多维度的红色等级复合型危机，并启动“生命优先—关系重建—系统修复”三级响应模式，指导行动优先级。第三，链接与激活亲属网络资源。社工不仅协助认定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申请补贴等政策资源，也更擅长激活非正式支持系统。面对起初拒绝监护的小鹏的大姑，社工跨省面谈，通过共情、法律政策解读和提出“临时探望”的低压力方案，成功说服其承担监护责任，解决了根本性安置难题。

五、结论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在介入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问题上，已形成一套从预防、支持到干预、安置的系统化路径体系。针对家庭监护能力的不同状态，从精准识别与风险评估前端出发，修复中端的家庭赋能与支持服务，启动后端的监护监督与司法干预进行兜底替代，来破解复杂困境，实现从“治已病”到“防未病”的跨越。在此，可以看出未来中国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发展方向：一是由补缺型走向发展型，促进服务标准化和专业化，不仅要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还要注重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从分散型向整合型转变，打破部门壁垒，提升系统响应效率；三是变应急型为预防型，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预防与支持服务，构筑早期干预防线；四是实现由单一型向多元型的过渡，建立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国家部门相辅相成的监护网络。简言之，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的治理需要建构法律刚性、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等多方力量协同的综合治理体系。只有精心、精准、精细地构建可持续的介入路径，才能推动未成年人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 沈渭仙，王芃，张兴娟．多方联动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机制创新研究 [J].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25,23(04):45-50.

[2] 龙明桃，赵祥印，袁琴．家庭监护缺失下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对策 [C]// 北京市犯罪学研究会，贵州省法学会犯罪学研究会，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威宁县人民检察院．《司法问题研究》2025 年第一届“司法现代化”主题征文汇编（三）．大方县人民检察院，2025:214-222.

[3] 祝嘉忆．为未成年人撑起更加坚实的“保护伞”[N]. 青海法治报，2025-07-25(01).

[4] 刘永廷．我国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之行政干预制度研究——基于行政法视角 [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5,37(03):43-50.

[5] 王春香，刘亚茹．从家庭结构变迁看我国未成年人家庭监护之干预体系 [J]. 法制博览，2024(34):115-117.

（作者单位：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民政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赋能青年社会价值认同的影响研究

何诗语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是传统文化资源在数字媒介、青年文化消费和社会价值培育交汇中的重要转化形态。其价值并不止于符号包装与传播扩散，更在于借助形象塑造、叙事重构、情境体验和互动参与，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伦理精神、家国意识、审美品格与责任观念转化为青年可感知、可理解、可认同的价值内容。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能够弥合传统文化与青年生活之间的距离，促进青年由文化兴趣走向价值理解，由情感共鸣走向身份认同，并在现实参与中形成更积极的社会责任意识。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 化表达；青年群体；社会价值认同；文化传播

在媒介形态持续更迭的当下，青年接触传统文化的方式已悄然改变，典籍、文物、节俗与非遗技艺不再只停留于课堂讲授或展馆陈列之中，而是随着短视频、动漫、文创产品、沉浸式展演和数字互动场景进入日常生活。由此带来的，并非单纯的传播形式更新，更是文化价值融入青年生活的路径变化。传统文化若缺少鲜活表达，容易被青年视为遥远的历史知识；一旦依托 IP 化方式转化为可观看、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内容，其精神内核便可能在审美接受与情感参与中被重新理解，并进一步影响青年对社会价值、文化身份与公共责任的判断。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赋能青年社会价值认同的现实基础

（一）传统文化传播方式转型为 IP 化表达提供现实条件

随着数字媒介、社交平台与文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已由课堂讲授、展馆陈列和文本阐释，延伸至短视频、文创产品、沉浸式展演、数字博物馆及城市文化空间；传播渠道的扩展、视听技术的成熟与青年文化消费需求的变化，共同为传统文化的形象化塑造、故事化叙事和跨媒介开发提供了现实基础。所谓IP化表达，并非对传统符号的简单包装，而是围绕具有持续识别力的文化形象、叙事主题与价值内核，对历史人物、经典文本、传统节日和非遗技艺等资源进行系统转化，使其能够在不同媒介和消费场景中持续传播、延伸与再创造[1]。由此，传统文化不再局限于静态保存和单向阐释，而是在技术赋能、平台传播与场景融合中被重新激活，并以更具亲和力和参与感的形态进入青年日常生活。

（二）青年价值认同培育需要更具亲近感的文化载体

青年社会价值认同的形成，既需要理性层面的价值理解，也离不开情感层面的文化归属与生活层面的持续接触。相较于单向说教式传播，青年更容易在形象化叙事、审美化体验和互动式参与中建立对文化价值的真实感受，因而，具有亲近感和代入感的文化载体显得尤为重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修身立德、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和合共生等精神内容，这些价值资源与青年成长中的理想确立、身份确认和社会参与密切相关，但若缺少适合青年接受方式的表达通道，便容易形成文化距离。IP 化表达恰能在传统价值与青年生活之间搭建连接桥梁，使青年在接触国风影像、文博文创、非遗体验、传统节日新表达等内容时，逐渐从兴趣吸引走向意义理解，并在审美认同和情感共鸣中增强对中华文化及其社会价值的认可。由此可见，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具有现实基础，也具有价值培育的内在合理性。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赋能青年社会价值认同的必要性

（一）解决传统文化传播与青年接受之间的距离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价值容

量，但其传播若长期依赖知识讲授、文本阐释和静态展示，青年在接触过程中便容易产生审美距离与情感距离，文化内容虽被看见，却未必真正被理解、被喜爱[2]。置于青年媒介生活高度活跃的现实场景中，传统文化需要从“被动呈现”走向“主动连接”，依托IP化表达把抽象精神转化为鲜明形象，把历史叙事转化为可进入的情境，把价值观念转化为具有感染力的故事经验，由此降低理解门槛，增强文化亲近感。这样的转化并非削弱传统文化的深度，而是为其进入青年生活提供更适宜的表达入口，使传统文化在新的传播语境中重新获得可感性与在场感。

（二）适应青年社会价值认同从知识接受到情感认同的转变

青年社会价值认同的生成，并不只是对某种价值理念的记忆和接受，更包含情感触动、身份确认和意义建构。相较于单纯告诉青年“传统文化重要”，更有效的方式，是让青年在人物形象、视觉审美、互动体验和社群传播中感受到传统文化与自身成长之间的联系[3]。IP化表达恰好具有这样的承载能力，它能够借助连续叙事和多元媒介，把家国情怀、责任意识、诚信品格、和合精神等价值内容嵌入青年愿意接触的文化形态之中，使价值认同不再显得生硬。由知识接受走向情感认同，青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便有了温度，社会价值认同也更容易形成稳定的心理基础。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化表达赋能青年社会价值认同的作用机制

（一）依托文化符号转译深化青年价值认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化表达的作用，并不只是将传统文化元素重新包装为更醒目的视觉形象，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符号转译中完成价值意义的重新呈现。传统文化中的礼乐精神、家国情怀、仁爱意识、诚信观念与审美品格，往往具有较强的历史纵深感和思想厚度，若直接以抽象概念进入青年视野，理解门槛相对较高；而IP化表达能够借助人物形象、器物纹样、传统色彩、故事母题和空间场景，把较为深层的文化价值转化为青年容易感知的符号系统。由此，青年在接触国风影像、文博文创、节日品牌、非遗数字内容时，看到的不只是外在形式的古典美感，也能在反复识别和持续接触中逐渐理解其背后的价值指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符号转译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转化，而是在保留核心意涵的基础上完成当代表达，使传统价值从“被解释的知识”转向“可识别的意义”，青年对社会价值的理解也因此获得了更加自然的认知入口。

（二）借助情境互动体验激发青年情感共鸣

价值认同的形成，不能只依靠理性说明，还需要情感经验的持续支撑[4]。传统文化IP化表达之所以能够赋能青年社会价值认同，正在于它能够把文化内容置入具体情境之中，使青年在观看、体验、互动和分享中形成更具温度的文化感受。沉浸式展览、数字博物馆、传统节日互动活动、非遗体验课程、国风主题空间等形式，能够将原本相对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进入、可触摸、可参与的体验场域，让青年在其中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在身体感知、审美体验和情绪投入中接近传统文化。此时，传统文化所承载的社会价值并非以外在要求的方式出现，而是在情境参与中被慢慢体现，例如对家国关系的理解、对匠心精神的尊重、对集体记忆的珍视、对社会责任的感知，都会在具体体验中获得情感支撑。也正因为这种情感共鸣更贴近青年生活，价值认同才不易停留于表层认知，而能够向内在认同转化。

（三）凭借社群共创机制推动价值认同内化

在数字文化环境中，青年并不满足于单向接受文化内容，更倾向于在评论、转发、改编、创作和社群互动中表达自身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化表达若能激发青年参与共创，便会进一步推动价值认同由外部影响转向内部生成。围绕传统文化IP展开的二次创作、短视频表达、文创设计、主题打卡、网络讨论和校园实践，使青年在重新阐释文化符号的过程中，主动完成意义选择与价值确认。这样的共创机制具有较强的生成性，一方面，它扩大了传统文化的传播半径，使文化内容在青年社群中持续流动；另一方面，它也促使青年在表达个人兴趣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传播者的角色。由观看到参与，由参与到再创造，由再创造到责任意识的形成，传统文化IP化表达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更深层的价值转化。青年不只是认同某一文化形象，更是在共同表达中确认自身与中华文化、社会生活和时代责任之间的关系。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化表达对青年社会价值认同的具体影响

（一）促进青年由文化兴趣转向价值理解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IP化表达对青年社会价值认同的影响，较为直接地体现在价值认知的深化上。青年对传统文化的接触，往往从视觉吸引、审美兴趣或社交话题开始，但真正具有培育意义的，并不是短暂的“喜欢”，而是在持续接触中理解文化符号背后的价值结构。IP化表达能够依托形象设计、故事叙事和跨媒介传播，将传统文化中较为抽象的伦理精神转化为具体内容，使青年在观看、体验和讨论中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并非与现实生活无关的历史遗存，而是包含着关于个人修养、社会责任、家国关系和公共秩序的深层智慧。由兴趣进入理解，由符号接触进入意义辨析，青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便不再停留于“好看”“有趣”，而能进一步形成对其精神内核的判断。

以故宫文创和文博类数字内容为例，传统纹样、

宫廷器物、建筑色彩原本具有较强的历史距离感，但在文创产品、短视频解读、数字展览和互动体验中，它们被转化为青年日常可以接触的文化内容。青年购买一件带有海水江崖纹、瑞兽纹样或传统色彩的文创产品，最初可能出于审美偏好，但随着相关故事、工艺来源和文化寓意不断被解释，其对礼制文化、审美秩序、工匠精神和历史记忆的理解会逐渐加深。这样的案例说明，优秀传统文化 IP 并不是把文化资源变成简单商品，而是在消费、传播与学习之间建立连续通道，使青年在轻松进入的同时获得更深层的价值理解，社会价值认同由此拥有了较为稳固的认知基础。

（二）推动青年由情感共鸣转向身份认同

青年社会价值认同的生成，还需要一种内在的情感确认。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能够以更具温度的方式唤起青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归属，使青年在审美体验、故事共鸣和群体互动中重新确认自身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5]。相较于单纯讲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IP 化表达更强调情境营造和情感浸润，它让青年在具体形象中感受文化，在鲜活故事中理解历史，在共同传播中获得归属感。尤其在网络社群、城市文化空间和校园文化活动中，传统文化 IP 常常成为青年表达自我和连接群体的重要媒介，个人兴趣由此与民族文化、社会记忆和共同价值发生联系。

有代表性的，是近年来国风影像、传统节日新媒体表达和文化类节目对青年群体的影响。以端午、七夕、中秋等传统节日的数字化传播为例，许多平台将节日习俗、诗词意象、服饰礼仪、民间传说与舞台影像、动画叙事、沉浸式场景结合起来，使节日不再只是固定日期中的仪式活动，而成为青年可以观看、转发、评论和再创作的文化事件。青年在观看相关节目时，感受到的不只是画面之美，更是家国同构、亲情团圆、慎终追远、和合共生等价值意味；当这些内容进一步进入朋友圈、校园活动和社群讨论，传统节日便从私人感受扩展为集体文化经验。也正是在这种情感共振中，青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逐渐由外部接受转向身份确认，文化自信因此具有了更真实的情感来源。

（三）引导青年由文化参与转向社会责任

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的深层影响，还体现在对青年行为选择和责任意识的引导上。价值认同若只停留在认知和情感层面，仍然不够充分，只有当青年愿意参与文化传播、主动承担社会角色，并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积极的价值取向时，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的育人功能才能真正显现。借助 IP 化表达，青年不再只是传统文化的观看者或消费者，而逐渐成为文化内容的讲述者、设计者和传播者；在短视频创作、非遗体验、志愿讲解、文创开发、校园主题活动和城市文化推广中，青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被转化为行动，其社会责任意识也在参与过程中不断生成。

以非遗青年传播实践为例，一些高校学生和青年创作者围绕剪纸、皮影、刺绣、木版年画、传统戏曲等内容开展短视频制作、文创设计和社区展演，他们并非只是复述传统技艺的历史，而是借助镜头语言、现代设计和互动讲解，把技艺背后的匠心精神、地方记忆和生活智慧重新呈现出来。某些校园社团还会联合地方非遗传承人开展体验活动，让学生完整参与从材料选择、工序练习、作品展示全过程，过程中既理解“守艺”的不易，也体会文化传承需要耐心、责任和协作。这样的实践表明，传统文化 IP 化表达能够把青年对文化的兴趣转化为公共表达能力，把个人审美转化为社会参与意识，使青年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作为时代青年所承担的文化责任与社会责任。

五、结语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近青年，并不只靠宏大的叙述和庄重的阐释，更依赖能够进入生活、触动情感、激发参与的当代表达。IP 化表达的价值，也正在于让传统文化不再停留于遥远的历史深处，而是在青年可感、可亲、可参与的文化场景中重新焕发生命力。随着青年在审美体验、社群互动和文化共创中不断接近传统、理解传统、传播传统，社会价值认同也会由外在认知逐渐转为内在自觉，由此形成的文化自信，不是短暂的情感认同，而是面向现实生活和时代责任的精神生长。

参考文献

[1] 崔保国，邓小院 . 传统文化 IP 化：新型主流媒体的创新传播路径 [J]. 中国编辑 ,2024(04):10-15.

[2] 李怡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育青年大学生志气骨气底气的逻辑路向 [J]. 理论观察 ,2026(02):148-153.

[3] 范蓉蓉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青年文化自信路径探析 [J]. 社会与公益 ,2025(19):145-148.

[4] 刘茹茹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青年精神气质培养研究 [J]. 山西青年 ,2025(15):30-32.

[5] 付燕波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青年价值观培育的融合探析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1,5(14):29-32.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建构与价值重塑研究

乔　松

摘要：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本民族人文精神传统及其道义力量的深刻认同与自觉践行，其核心指向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为根基的价值体系。中华人文精神作为文化自信的深层内核，其当代建构与价值重塑直接关系到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激活、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以及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护。因此，深入探讨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人文精神的价值内核与建构原则，有助于为新时代人文精神的重塑提供有益的参考，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华人文精神；当代建构；价值重塑

中华人文精神植根于五千多年文明沃土，儒家“仁学”是其思想内核，经由“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的世代传承，构筑了中国人独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坐标。这一精神传统，关乎个体安身立命的道德根基，更关乎社会和谐运转的内在机理，以及民族精神家园的当代守护。同时，全球化与数字化交织构成当今时代的基本背景，激活传统人文精神的当代生命力，使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需求深度融合，成为文化建设的核心议题。因此，探索文化自信背景下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建构，梳理价值重塑的可行方向，对涵育时代新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基本概念阐释

（一）文化自信介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与灵魂。它既包括“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思想，也涵盖“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更凝结着“文以载道、器以藏礼”的人文精神[1]。所谓“文化自信”就是对本民族人文精神传统和道义力量的信仰与践行，文化自信的本质就是核心价值理念的自信。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新八德”，这些仍然是以儒家道德观念为核心的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自孔子以至近代的儒学名家，大都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元素，可见精神文化的本质是其核心价值观的构成。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等等，其主要的思想元素也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廉、和、敬”等价值观念。以上种种都有力地揭示了文化自信的本质就在于中华人文精神的彰显。

（二）中华人文精神概述

中华人文精神以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核心，围绕天人关系、人我往来、身心修养搭建起一套完整的智慧模式。这套模式的核心肯定人在天地运转之中拥有能动空间，需要承担对应责任，它支持“自强不息”的刚健前行，也推崇“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最终使个体形成既重视自我人格完善也关注他人成长的自觉认知。在天人关系上，它追求“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并非将自然视作征服的对象，而是在“与天地参”的共生中寻求规律与伦理的和谐，使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相互映照[2]。于人我之际，它以“中庸”为处世准则，倡导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通过礼乐教化将伦理规范内化为日常行为，在家族、社群与国家中构建差序有别却温润相融的情感联结。这种精神不依赖外在超越的绝对权威，而是在人伦日用中实现价值的安顿，以“知行合一”消除思想与实践的隔阂，使道德理想转化为具体的生命

形态。它既不属于避世的虚无，也不是功利方面的算计，它在日常烟火之中追寻永恒价值，最终凝练出“崇德尚群、经世致用、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支撑中华民族一路发展，成为民族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动力来源。

二、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建构与价值重塑应遵循的原则

（一）以价值引领升华人文精神的时代品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人文精神时代建构的价值坐标。人文精神的当代重塑，不能停留于抽象的道德说教，而需要与核心价值观实现深度融合、同向发力[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的价值要求高度契合。在建构过程中，需将这些传统人文理念置于新时代的语境下进行价值升华：将“天下为公”的情怀升华为富强民主的国家理想，将“修齐治平”的追求转化为文明和谐的社会责任，将“仁、义、礼、智、信”的德目落实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操守。通过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传统人文精神获得鲜明的时代品格与价值感召力，成为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风尚的精神旗帜。

（二）以实践养成促进人文精神落地生根

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最终要在“化成天下”的实践中得以确证与实现。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揭示了人文精神从个体修养走向社会教化的内在逻辑。文化自信视域下的人文精神建构，需要坚持知行合一、以文化人，将精神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感知的实践路径。这需要构建“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推动文物、非遗、古籍等文化资源向现代表达转化，让沉睡的典籍文字变成滋养心灵的源头活水。同时，要将人文精神的培育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在思政课中融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经典研读中体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使命担当[4]。通过全民阅读、文化惠民、文明创建等实践载体，让人文精神从知识记忆转化为情感认同，从书本理论转化为行为习惯。如此，中华人文精神才能真正摆脱“符号空壳”的困境，在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焕发出持久而鲜活的生命力。

三、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建构与价值重塑策略

（一）深耕内容建设，打造人文精神的精品力作

内容建设是中华人文精神当代建构的核心环节，直接决定着精神传承的深度与广度。所谓“深耕”，即立足传统文化经典，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挖掘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道德理念与生命智慧，同时结合当代审美需求与社会关切，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当今，人文素养的提升已成为教育领域的核心议题。文学经典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结晶，是提升人文素养的重要载体[5]。一批能够呈现中华人文精神的优秀作品诞生，在出版这个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不断推出“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系列，还邀请了学术界的知名专家，针对《诗经》《史记》等经典典籍进行通俗易懂的解读，既保留原典精髓，又兼顾当代阅读习惯，使经典走下神坛、走进寻常百姓家。同时，面向青少年的普及读物如《中华文明故事》《国粹图典》等，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先贤故事，让青少年从小浸润于“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底色。在影视创作方面，一批高品质纪录片与电视剧脱颖而出，《如果国宝会说话》以每集五分钟的微纪录片形式，用现代语言讲述文物背后的精神密码，让“礼乐文明”“天人合一”等理念触达亿万观众；《典籍里的中国》通过时空对话的戏剧手法，再现伏生护《尚书》、司马迁著《史记》的感人场景，使观众深刻体悟中华文脉赓续的精神力量。

在文学创作上，一批作家扎根传统文化资源，创作出《额尔古纳河右岸》《怀念狼》等作品，以文学叙事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与时代变迁中的坚守。此外，网络文艺亦成为内容建设的新阵地，网络文学平台开设“传统文化”专题，鼓励作者将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融入现代故事，如《大医凌然》等作品将中医仁心仁术的医德精神与当代职场结合，实现传统价值的青春化表达。这些深受热捧的优秀文艺作品，没有一个不是对内容进行深入挖掘的成果，创作者和传播者都怀着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在像大海一样浩瀚的诸多典籍里提炼其中的精华部分，在反复打磨中铸就了经典之作。

（二）培育传播主体，壮大人文精神的弘扬队伍

传播主体在中华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进程中，属于颇为关键的能动要素，传播主体自身具备的素养、能力，会直接对精神传递的准确性产生影响，还会对精神传递所形成的感召力造成影响。这里所说的“培育”，就是借助教育培养、专业训练、组织实践锻炼，建立起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能力精湛、工作作风优良的文化传播人才队伍[6]。

媒体机构亦参与传播主体培育，是该领域的重要参与力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设《中国诗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栏目，向大众传播文化知识，通过选手选拔、嘉宾点评环节，发掘培养一批民间文化传播者，如外卖小哥雷海为夺冠后成为传统文化推广的鲜活名片[7]。此外，各个地方的文化馆、图书馆都积极地组建文化志愿者队伍，并开展“文化进万家”“经典诵读”等活动。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走进社区、学校和乡村，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传统文化，使人文精神能够滋润百姓的内心。与此同时，在线上，一批知识博主和文化网红中，已有一些人快速成长起来，这类创作者依靠自身积累的学识，运用独有的表达方法，在抖音、B 站

等网络平台上对经典进行解读，对历史予以讲述，收获数以百万计的关注量，成为弘扬人文精神的新生力量。

（三）融入日常生活，拓展人文精神的实践场域

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最终要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实现。融入日常生活，即将传统美德、礼仪规范、审美情趣转化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使人文精神不再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或典籍里的抽象教条，而是可感、可行的实践智慧[8]。这需要拓展实践场域，从家庭、学校、社区到职场，处处皆可成为人文精神涵养的土壤，让人在举手投足、待人接物中自然体现仁爱、诚信等精神内核，达到“习焉不察”的化育境界。

各地在推动人文精神融入日常生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传统节日的振兴是典型实践，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举办庙会、祭奠先烈、龙舟竞渡、赏月诗会等活动，使人们在参与中体悟团圆、感恩、爱国、思亲的情感，节日成为传承家风家教、凝聚民族认同的重要契机。礼仪教育重新走进学校与家庭，不少中小学开设“礼仪课”，从着装整洁、尊师敬长、同学友爱等细节入手，将《弟子规》《朱子家训》中的规范转化为日常行为准则；一些社区开展“家风家训”建设活动，组织居民挖掘整理本族家训，评选“最美家庭”，让孝亲敬老、勤俭持家的传统在代际间传递。

在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上，城市书房、乡村记忆馆、文化礼堂等新型空间不断涌现，如浙江农村普遍建立文化礼堂，集村史展示、民俗活动、道德讲堂于一体，村民在此举办成人礼、婚礼、寿礼，感受乡土文化的滋养。文创产品的开发让传统文化元素走进生活日常，故宫文创以“萌萌哒”形象让文物“活”起来，将“福”字、祥云等符号融入文具、服饰、家居用品，使人们在日常使用中亲近传统美学。在社区治理中，一些地方将“和合”理念融入矛盾调解，设立“和事佬”调解室，以传统“和为贵”思想化解邻里纠纷，营造和谐氛围。职场领域亦开始倡导“儒商精神”，部分企业将“仁、义、礼、智、信”融入企业文化，开展“诚信经营”，设立“孝亲假”，在管理中体现人文关怀。此外，公共文化服务通过送戏下乡、非遗进校园、经典诵读等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接触高雅文化，如“戏曲进校园”不仅让学生观看演出，还组织体验脸谱绘制、身段学习，使传统艺术成为美育的一部分。这些实践表明，人文精神融入日常并非空洞口号，而是可操作、可体验的生活实践，在潜移默化中涵养着人的德行与情操。



四、结语

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建构，是关乎理论挖掘和实践推进的复杂工程。从文化自信方面审视，推进这一过程，需要守住“仁爱”内核的根本，保证人文精神不丢失自身核心脉络，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方向，为其注入清晰的时代特质。本文围绕原则梳理和路径规划两个方向展开讨论，提出内容建设、主体培育、日常融入等多个实践方向。唯有将传统智慧融入当代生活的细节，让人文精神走入日常生活，走向全球范围，才能真正完成“化成天下”的目标。新时代，人文精神走入更多公众视野，可以为民族复兴注入深沉持久的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 郑艳 .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做有根的中国人 [J]. 辽宁教育 ,2025(07):1.

[2] 谢鑫雨 . 文化自信视域下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路径 [J]. 新传奇 ,2025(39):24-26.

[3] 卢浩 .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赓续、话语创新和实践创造 [J]. 理论观察 ,2025(05):22-27.

[4] 秦宣 , 郭佳宁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 [J]. 探索 ,2026(01):30-41.

[5] 苏佩军 . 架设文学经典与人文精神的桥梁——评《文学经典重读》[J]. 语文建设 ,2025(10):87.

[6] 吴文新 , 蔡文秀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智化传播的“守正”命题 : 风险隐忧、核心要义、破局路径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45(06):88-99.

[7] 冉华 . 培育富有理性与人文精神的观看文化 [N]. 社会科学报 ,2025-10-23(06).

[8] 程雅娟 , 李浩嫄 .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路径探究 [J]. 吕梁学院学报 ,2025,15(03):76-8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6 年度沈阳市党校系统课题“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华人文精神的当代建构与价值重塑研究”（SYDXKT26-29）。

（作者系中共沈阳市委党校教师）

主理人思维赋能团青工作路径探索与实践创新

彭　睿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形态迭代演进，“主理人”概念逐步从潮流商业领域延伸至全域社会实践场景，其核心特质体现为个体与组织的深度绑定、人格化特征差异化彰显、多元资源的整合创新。本文创新性地将主理人思维引入团青工作领域，深度剖析该思维与团青工作的内在契合性，立足主理人思维蕴含的角色重塑、需求整合、差异赋能、价值共生等核心逻辑，结合企业团青工作实操场景，构建了以主理人思维革新团干部身份定位、精准对接青年需求与组织目标、创新工作载体方法、搭建协同发展机制的完整实践路径。研究表明，主理人思维可为新时代团青工作提供全新理论视角与实践范式，有效激活青年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助力团组织在服务中心大局、赋能青年成长中实现双向价值共生。

关键词：主理人思维；党建带团建；团青工作；身份认知；需求整合

2024 年，“主理人”入选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年度十大网络用语，依托全国文化主理人大会等系列活动，完成了从商业概念向社会治理、文化建设领域的价值跃迁。这一社会现象既折射出个体价值在组织发展中的权重持续提升，也凸显了人格化赋能、差异化运营、创新性突破在新时代社会实践中的核心价值。

团青工作作为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凝聚青年力量的关键抓手，新时代面临着如何适应时代发展、贴近青年需求、激发组织活力的核心课题。传统团青工作模式侧重组织统一性、流程规范性，但面对当代青年个性化诉求凸显、价值取向多元、参与意识强烈的新特征，单一化、灌输式、任务化的工作模式弊端凸显，难以适配青年成长需求、释放团组织活力。而主理人思维秉持的自我定位、精准赋能、资源整合、差异创新的认知体系，既为团干部破解角色固化困境、明晰岗位职责提供了全新思维维度，也为新时代团青工作提质增效、创新突破提供了重要实践借鉴。

一、主理人思维的核心内涵及其与团青工作的内在契合

主理人思维并非狭义的学术概念，而是源于商业实践、适配多元社会场景的系统化认知框架和行为模式，其核心涵盖精准身份认知、个性化价值创造、全域资源整合、差异化创新表达四大维度，与新时代团青工作的政治属性、服务属性、育人属性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适配性与实践价值。

（一）主理人思维的核心要义：身份认知与价值创造的统一

从身份认知角度分析，主理人的首要特征是清晰的自我定位。一个优秀的主理人不仅清楚自己是谁——是品牌的所有者、经营者还是文化构建者，更明白自己在哪儿——处于产业链的何种位置、面对怎样的消费群体、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这种双重身份认知使主理人能够准确把握自身角色，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找准立足点。对于团干部而言，同样需要回答“我是谁，我在哪儿”的问题。团干部既是党的青年工作的执行者，也是青年群体的代言人；既要传达组织的期望与要求，也要反映青年的诉求与心声[1]。从价值创造这一层面看，主理人主要是用个人特质为品牌价值赋能，把个人魅力变成市场竞争的能力，主理人可把自己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注入品牌之中，使品牌带有与众不同的人格化特征，在同质化的市场竞争当中具有明显优势。这种逻辑对团青工作同样起到启发作用，团干部的亲和特质、创新观念以及组织能力，都能够成为助力工作开展的重要资源。

（二）团青工作的时代需求与主理人思维的实践价值

新时代背景下，党建带团建工作纵深推进，团青工作面临全新机遇与挑战。青年群体的思想观念、行

为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多元化，传统的单向灌输式工作模式很难实现预期目标；组织对青年工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既要为大局服务，还要服务好广大青年。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团青工作要积极运用新的思维工具以攻克难题、打开新的局面。而主理人思维的实践价值刚好能够提供一套适应时代需求的工作理念和做法，该理念所着重强调的是身份方面的认知，有助于团干部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找到工作方向；主理人所看重的需求整合，有利于团组织精准衔接青年诉求和组织目标；推行的差异化工作办法，可以使青年工作突破同质化瓶颈、提高工作水平[2]。主理人思维为新时代团青工作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视角和实践途径。

二、主理人思维赋能团青工作的实践路径

（一）身份重塑：构建团干部双向履职认知体系

主理人思维赋能团青工作，首要突破口是推动团干部角色认知迭代升级。传统工作模式中，团干部多固化为任务执行者、指令传递者的单一角色，履职过程被动机械、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极易导致团青工作流于形式、成效不足。依托主理人思维，可推动团干部构建双向双重全新角色认知，实现身份重塑、履职提质。

基于这一认识，团干部需树立我是青年代言人和我是党组织传声筒的双重身份意识，牢牢把握团青工作政治性属性。团干部作为青年代言人，要深入了解青年的真实想法和实际需求，将青年的声音带到组织决策中；作为党组织的传声筒要准确传达组织对青年的期望和要求，引导青年将个人发展融入组织大局[3]。只有真正了解青年，才能更好地引导青年；只有准确把握组织方向，才能更有效地服务青年成长。例如，在参与组织决策时，团干部要有意识地反映青年群体的意见和诉求；在面向青年开展工作时，团干部要善于将组织的政策要求转化为青年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方式。

（二）需求整合：精准定位组织与青年的共生诉求

主理人思维强调对多方需求的整合能力，这一点在团青工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价值。团组织的工作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组织发展目标与青年成长需求的最佳结合点。过于侧重组织目标而忽视青年需求，工作可能失去吸引力；一味迎合青年需求而偏离组织方向，工作则可能失去政治性。因此，精准定位组织与青年的共同诉求，成为团青工作的核心课题。

在实践中，搭建双向需求调研机制，实现精准施策。一是面向广大青年员工，围绕技能提升、职业发展、学历深造、岗位建功、兴趣培养、婚恋交友、权益保障等维度开展全方位调研，系统梳理青年核心诉求与成长痛点；二是面向党组织，主动对接工作部署、专题汇报工作思路，精准把握党组织对青年培养、团青建设、青年赋能工作的目标要求与重点方向[4]。通过双向调研、双向对标，精准提炼组织发展与青年成长的共性需求，以此确定团青工作重点方向、核心内容与实施载体，实现大局所需、青年所求、团组织所能的深度契合。

（三）组织赋能：以项目制培养基层团干部履职能力

主理人思维不仅关注主理人个人的能力培养，更强调通过系统化的机制为团队赋能。将该逻辑融入团青工作，核心是搭建系统化、常态化、专业化的团干部培育机制，以项目化运作模式淬炼基层团干部综合能力，破解基层团干部经验不足、能力单一、履职被动的问题。

以部分企业团组织探索的书记领办项目制为例，明确各层级团组织书记年度领办重点团青项目，实行年度轮换、品类差异化、全域全覆盖原则，要求连续三年领办项目不得同质化。该模式具备多重赋能价值：其一，通过项目领办，将重点工作责任落实到人，提高了工作效率和质量；其二，不同性质项目的轮换，使基层团干部在多样化的实践中得到全面锻炼；其三，项目制的运作方式，培养了团干部从策划到执行再到总结的完整工作能力。该机制充分践行主理人思维的赋能逻辑，既尊重团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又通过制度化安排实现能力长效提升，夯实团青工作人才根基。

三、主理人思维赋能团青工作的实践创新策略

（一）认知创新：从“被动执行者”到“主动主理人”的角色跃迁

主理人思维带来的主要创新，是推动团干部从执行者到主理人的角色认知发生跃迁，在传统工作模式下，团干部一般被当作任务的执行者，他们的职责是依照上级安排开展工作、达成指标，该角色定位容易造成工作的被动化和机械化，团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效能。主理人思维启迪团干部以第一责任人的姿态去看待自己的工作，带动团干部从“要我做”的被动情形转变为“我要做”，工作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活力都能得到充分激发[5]。在创新实践开展的过程中，这种角色的变化体现在三个层次：一是责任意识得到强化，团干部把岗位作为个人价值的承载平台，主动承担起推进工作的责任；二是主体身份的确定，团干部在工作中不再是被动执行，而是成为积极参与和创造主体；三是得到成就感，团干部通过有效开展各项工作可以肯定自己的价值，从而产生持续投入的内在动力。

（二）方法创新：构建需求导向的精准化工作模式

主理人思维突出对多方面需求的整合能力，该理念为团青工作方法创新给出了重要方向，传统的工作模式一般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一套方案可应用到所有对象和场景，难以精确回应有差异的需求，主理

人思维启迪团组织创建基于需求整合的精准工作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方面是搭建双向需求分析机制，团组织要切实了解青年的真实需求，通过问卷发放、座谈访谈、数据分析等方式，全方位了解青年在思想引导、能力增强、职业进步、生活保障等方面的诉求；团组织要准确把握组织的期望和要求，掌握组织希望青年肩负怎样的使命、起到怎样的作用，在开展双向需求分析之后，就能精准发掘组织与青年的共同需求，确定工作的优先方向和主要领域。

（三）路径创新：以差异化策略打造团青工作特色品牌

主理人思维着重用差异化策略打造别具一格的品牌，此理念为团青工作的路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在一定程度上，团青工作存在同质化的现象，各个地区、各个单位的团组织工作内容和形式比较相似，不易创建特色和优势。主理人思维给团组织以启示，让团干部立足自身实际，探索有差异的品牌化发展途径，在实践当中运用差异化策略，可以将以下几个方面作为切入点：第一，内容差异化，结合本单位、本地区的具体特点，培育有特色的工作内容。二是使形式具有差异化，探索适合当代青年特点的表达手段和工作载体[6]。三是路径差异化，根据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和青年特点，挑选契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品牌化的发展是差异化策略的自然拓展，当团组织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工作内容、形式和路径后，就可以通过不断积累和系统完善，渐渐打造出有辨识度的工作品牌，这种品牌化发展能提升团组织的社会影响力，也可以使青年增强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机制创新：搭建个人成长与组织发展的价值共生体系

主理人思维强调个人与品牌的深度绑定，个人价值与品牌价值相互赋能、共同提升。该理念同样能够为团青工作提供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促使团组织积极构建个人成长与组织发展价值共生的长效机制。在传统工作模式下，个人发展与组织需要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7]。个人一般会更加关注自身的成长空间和发展机会，而组织则更强调完成工作任务、实现组织目标。在主理人思维赋能下，可以通过机制创新使个人成长与组织发展从对立走向统一、从分离走向融合。因此，要想实现这种价值共生，一是平台设计要兼顾组织目标与个人需求，使完成工作任务与实现个人成长有机统一；二是成果共享机制要公平合理，使个人贡献能够得到组织的认可和回报；三是发展通道要清晰明确，使青年能够看到在组织中成长的可能性和路径。

四、结语

主理人思维从商业领域到团青工作领域的迁移，不是简单的话语借用，而是深层理念的碰撞与融合。这种思维模式所蕴含的身份认知、需求整合、差异化策略、价值共生等核心理念，为新时代党建团青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通过推动团干部实现从执行者到主理人的角色跃迁，建立基于需求整合的精准工作模式，探索差异化驱动的品牌化发展路径，构建个人成长与组织发展价值共生的长效机制，团青工作可以在坚持政治性原则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主理人思维赋能团青工作的实践，最终指向的是对青年工作本质的更深刻理解。团青工作的核心不在于完成了多少任务、开展了多少活动，而在于是否真正激活了青年的主体意识，是否真正激发了青年的创造活力，是否真正实现了青年与组织的价值共生。未来，持续深化主理人思维的实践运用，不断优化工作载体、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路径，必将推动团青工作焕发全新生机与活力，让青春力量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绽放更大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颖杰 . 国有企业党建与青年人才培养的协同发展策略 [J]. 现代企业文化 ,2025(29):85-87.

[2] 夏新茂 , 魏伟 , 贺浩 , 等 . 党建带团建强机制，激发疆电“青”活力 [C]//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农村电气化专业委员会 ,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培训专业委员会 , 中国能源研究会城乡电力（农电）分会 , 中国能源研究会科技成果转化与专利评价工作委员会 . 全国能源电力优秀党建典型案例（2024）.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2025:262-263.

[3] 吕勇 , 施清水 , 王子晶 . 党建引领团建赋能解锁电网高质量发展的青春密码 [C]//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农村电气化专业委员会 ,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培训专业委员会 , 中国能源研究会城乡电力（农电）分会 , 中国能源研究会科技成果转化与专利评价工作委员会 . 全国能源电力优秀党建典型案例（2024）.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迁西县供电分公司 ,2025:18-19.

[4] 朱良志 , 田茵 , 乔仲萍 , 等 .“三个引领”推深做实党建带团建工作 [C]// 全国电力能源优秀党建典型案例论文集 .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陇西县供电公司 ,2024:55.

[5] 徐健达 . 企业党建引领团建，激发团青工作新动能 [J]. 中外企业文化 ,2023(12):180-182.

[6] 刘伟 . 坚持党建带动团建提升青年精神素养 [J]. 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2023(12):88-89.

[7] 陈晓平 , 惠军 . 中国石化忻州公司团委做好团青工作为青工“强筋壮骨”[N]. 山西青年报 ,2023-04-10(06).

（作者单位：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包容型治理赋能在地化高校“一站式”社区育人机制创新与实践探索

周烁烁

摘要：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是新时代大学生生活起居、知识浸润、价值塑造与社交发展的核心场域，已成为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三全育人”格局落地的关键载体。立足治理理论的教育转向视角，本文聚焦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系统阐释包容型治理的核心内涵与社区在地化育人的内在价值逻辑。研究以包容治理思维为引领，通过构建多元协同治理共同体、深度嵌入本土在地文化资源、搭建常态化协商诉求平台、健全长效制度运行体系，为破解当前高校社区育人改革、推进育人资源在地化深耕、实现治理模式与育人机制迭代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范式与可落地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包容型治理；高校“一站式”社区；在地化育人；协同治理；育人机制创新

新时代高等教育育人场域的边界消融正在改变高校育人的空间逻辑，教学区不再是知识传递的唯一场所，生活区、活动区、社交区共同形成沉浸式的综合育人场域，“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国内高校学生工作改革的主要抓手。行政管控思维一直占据着高校社区治理的主导地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简化了学生群体成长的表达方式，刚性约束手段束缚了青年学生个性化的诉求，单一化的治理主体无法覆盖复杂的多元社区治理事务。地域化理念认为育人活动要扎根于当地的文脉、本土的文化资源、本土的社会关系中，摒弃通用的育人模式，但很多高校社区育人建设只是对空间进行简单的翻新、硬件进行升级、活动进行堆砌，地域文化资源闲置、社会主体参与度低、学生话语权被忽略等问题一直制约着社区育人的内生动力。包容型治理抛弃了传统的排他性、强制性、单一性的治理思路，用开放性、兼容性、平等性的治理思维接纳多元主体参与到社区共建当中去，弥合制度管理与学生需求之间存在的认知断层，破解高校社区育人悬浮化、同质化、形式化的现实困境，从耦合逻辑出发，构建契合本土高校实际的在地化育人机制，成为新时代高校学生社区管理工作应有的要求。

一、包容型治理的理论内涵

（一）治理理论的教育转向

治理理论起源于公共行政领域，以消除行政垄断、协调多元主体权责为要务，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普及而逐步渗透到教育场域当中。教育治理并不是一种刚性管控方式，它减弱了层级压制式的管控模式，看重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和互相制约。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单向管控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生硬的行政手段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表达，固化了制度之间的割裂，治理理论的教育转向正好契合了高等教育人本化的发展需求，把多元参与、柔性规制的治理逻辑嵌入到育人的各个环节中。教育治理边界不断向外拓展，由校内行政改善扩展到学生社区、公共空间、校外社群等微观领域，为“一站式”学生社区推进多元共治打下理论基础[1]。

（二）包容型治理的核心要义

包容型治理是治理理论衍生出的一种新的范式，抛弃了非此即彼的二元治理思想，用兼容的态度去接纳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诉求、不同的文化形态。该治理模式尊重学生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成长需求等各方面的差异，不采用统一的标准来规训青年群体，打破校内行政部门之间的层级壁垒，吸纳学生、社会组织、本土社群一起参与到社区的运作当中去，抛弃强硬的管控手段，依靠平等协商、双向互动的柔性方式来解决治理中的矛盾，弱化制度带来的疏离感，达到秩序管控和人文关怀的动态平衡。

（三）社区育人的价值逻辑

“一站式”学生社区依靠聚合性的物理空间，集住宿、服务、教育、管理等多功能于一体，依靠日常交往、文化浸润形成隐性育人逻辑，具有课堂教学所不能比拟的生活化、沉浸式优势。在地化理念促使高校冲破育人孤岛的束缚，联手本地文脉、民俗资源及地方社群，助力学生达成文化认同和身份塑造的目的。社区育人的

本质是多元要素协同成长赋能，而不是被动的制度约束，包容型治理适应社区松散生活化运行特点，给资源整合、主体联动、诉求表达提供稳定的理论支持。

二、高校社区在地化育人的实践优势

（一）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行政力量在高校社区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高校后勤管理部门、学生工作部、二级学院辅导员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主要负责社区日常运行、安全保障、思想引领等工作。同时，校外社会组织、本土社群商户、学生自治群体在治理实践中也起到了作用，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多元主体参与的模式冲破了传统行政管理单向度的束缚，让社区治理不是单向的指令传递，而是互动的、共享的、互补的。行政主体通过制度权限来统筹社区管理的各个环节，保证社区运行的基本秩序和规范；学生以自治委员会、宿舍楼栋委员会等形式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自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当中，在社区公共事务中获得了表达权和表决权，实现了从“被管理者”到“治理参与者”的角色转变[2]。校外社会组织、本土社群商户的加盟使社区治理获得很多社会资源、专业力量，使社区服务更加多样化、专业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可以拓宽治理视野，兼顾安全管控、秩序维持、学生精神文化需求、个性发展需求等各方面，使治理供给与需求相匹配，从而形成治理供需良性互动的局面，在保持社区运行有条理的同时充满活力[3]。

（二）在地化资源的有效整合

高校社区建设注重校园内部资源与外部在地资源的有机结合，把育人的视野从校内拓展到更加广阔、有影响力、能够产生更大影响的社会文化空间之中。地域文化、本土产业、地方红色文脉、社区民俗资源被充分挖掘并融入社区育人实践中，成了滋养学生健康成长的精神养料。社区文化活动的设计要按照院校所在地区的文化特点开展在地化改造，让原本通用的活动模板同本土的生活场景产生联系，读书分享会加入地方文学经典，文体竞赛联系传统民俗项目，思政宣讲依靠红色文化遗址，这些在地化改造极大地增强了活动的文化亲近感和情感感染力，促使学生产生深层次的文化共鸣与身份认同。校内思政教师、专业教师、后勤人员之间构建联动机制，冲破学科和岗位之间的壁垒，塑造育人合力；校外博物馆、非遗工坊、地方产业园等优良育人资源实现常态化对接，给学生提供走出校园、深入社会、认识本土的实践场所。内外联动、上下贯通的资源整合模式把育人资源由零散分布变成系统集成，由简单堆砌变成有机融合，产生系统化的在地育人链条，资源整合由碎片化变成体系化，育人效果由浅层感知走向深层内化。

（三）诉求回应的多元渠道

青年学生在社区生活中的需求包括生活条件的改善、硬件设施的维修、文化活动的安排、社交场景的营造、实践训练通道的开辟、综合素质的培养等各个方面。现有的治理结构依靠常态化的诉求收集、评判、反馈闭环系统来满足学生各方面的需求。传统的意见收集方式与数字平台一起使用，线下意见箱、辅导员手工收集、线上沟通平台三者一起使用，信息传递及时准确，专业人员对问题进行跟踪研判和结果公示，双向互动模式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社区治理中的隐性矛盾得到及时解决。

（四）制度保障的协同效能

高校已经建立起一套适应多元共治模式的制度体系，现行社区管理条例中关于多元主体权责划分、资源融合利用、诉求协商处理等配套规定都比较完善。各部门之间消除行政壁垒，学生工作部、后勤保障处、保卫处等单位之间互相交流信息、相互配合工作、共同承担责任。长效运维机制保证了育人效果，社区活动有长期计划，资源整合有固定程序，主体联动有常态会商机制，长期化、系统化建设模式沉淀出可持续的在地化育人经验[4]。

三、包容型治理赋能社区育人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多方协同治理共同体

打破行政主体的垄断治理格局，重新界定各类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依靠包容平等的交互逻辑构建多元共治共同体，明确高校行政部门、在校学生、本土社群、校外机构的职能定位。优化校内行政治理结构，弱化垂直层级管控模式，推进辅导员下沉楼栋、后勤人员分片值守、行政人员轮岗巡查，缩短行政指令传递链，提高社区日常事务处理速度；激发学生自治内生动力，健全楼栋自治委员会、宿舍评议小组的选举制度，赋予学生活动组织、环境督查、意见表决的合法权利，依靠民主投票、小组评议等方式来决定社区公共事务，使学生由管理对象变成治理主体；联动校外本土主体，吸纳周边社区居委会、地方非遗传承人、本土小微企业入驻社区育人体系，依靠外部主体的多元视角充实社区治理维度，塑造行政管控、学生自治、社会赋能互相渗透的治理局面[5]。行政逻辑主导下的社区治理常常存在刚性管控的惯性思维，管理人员习惯于自上而下的任务下达，忽视学生群体的情感感知和群体诉求，多元共同体的建构可以消解单一行政视角带来的治理偏狭，使不同的主体以平等的姿态融入社区治理的链条中来，不刻意区分主次层级也不固化身份差异，使后勤运维、思政教育、学生自治、社会服务彼此嵌套交融，弱化治理过程中权力边界的划分，使社区空间从冰冷的行政管理属性中脱离出来，逐渐形成具有人文温度和自治活力的生活场域。

（二）嵌入在地化育人资源要素

根据院校所在地域的文化底色，挖掘本土红色文

化、民俗非遗、城市文脉、产业资源，将在地化要素系统性嵌入到社区空间改造、文化活动、日常教育全过程之中。优化社区物理空间布局，在楼栋走廊、公共活动室、休闲长廊设置本土文化展板、非遗手作展品、地方人文壁画，用沉浸式空间营造实现文化熏陶；改变社区活动模式，摒弃同质化文体活动，按照地域特点创建本土非遗工坊、地方文化沙龙、乡土调研实践，带领学生走进周边民俗村落、地方博物馆、本土产业园展开实地研学，使社区活动扎根本地生活；联系校内专业教师，凭借文学、艺术、思政类专业教师挖掘本土文化育人内涵，在地域文化与专业知识、价值塑造相融合的基础上，消解社区文化的空洞化表达，塑造出具有地域辨识度的特色育人社区。在地化资源不是简单的文化素材堆砌，而是依托本土文脉进行价值浸润和精神涵育，大多数高校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文化植入上，很难达到深层次的育人效果，只有把地域元素融入空间肌理、活动流程、认知建构当中，学生才能在常态化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形成文化认同，弱化思政教育的说教感，让乡土情怀、地域认知、人文素养自然生长在社区育人场域里。

（三）搭建诉求回应与协商平台

利用数字化技术建立双向沟通的诉求交互系统，依靠微信小程序、智慧校园平台搭建专门的社区协商端口，增设设施报修、意见投票、活动预约、线上评议等模块，简化学生诉求的提交过程，安排专人对提交的诉求进行分类研判、分级处理、限时反馈，形成提交、审核、处置、回访的闭环链条。增设线下实体协商空间，在社区公共活动室设立协商议事厅，定期从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中抽调代表参加议事座谈，就宿舍改造、活动安排、管理制度等公共事务展开平等磋商，包容接纳不同的意见表达，用协商的方式解决治理矛盾。留存诉求处理台账，对高频诉求、共性问题加以归纳整理，依照学生群体成长规律改进治理方案，使得治理决定契合学生真实的日常生活需求。数字化协商平台抛弃了传统的意见搜集方式，用透明化、可视化的处理过程来缓解学生的沟通顾虑，包容型治理观念表现在对于小众诉求、个性化的看法上，既不会忽略细小的生活难题，也不会轻视不同的情感反应，从而不断缩小治理供给同学生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

（四）完善制度供给与运行机制

重新构建适应包容治理逻辑的制度体系，对传统的管控式社区管理条例进行修订，增加多元主体权责划分、在地资源融合、协商议事流程、数据安全管理等内容的配套规定，用制度的形式固定多元共治的运行模式，明确各个主体的参与权限和责任边界。打破校内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建立跨部门会商制度，定期开展工作交流，梳理出目前存在的社区治理问题、资源利用情况、学生诉求办理进度等，避免出现权责不清、管理真空的情况。创建长效运维评价体系，把学生满意度、资源利用率、矛盾处置率作为社区治理考核指标，采用学生匿名评议、多方主体互评的方式开展综合测评，依靠测评结果动态改良治理方案，维持社区育人体系的长效运转。制度建设冲破惩戒管控的单向逻辑，重视保障、规范、赋能的诸多功能，用刚性的制度来守护柔性治理，让包容治理从理念层面走向可执行、可追溯、可改进的常态化治理模式，不断消除高校社区治理普遍存在的短期化、碎片化、形式化问题。

四、结语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在地化育人改革，本质上是一场治理思维的深刻变革，传统刚性管控、单向管理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配新时代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与发展需求，包容型治理以平等开放、多元兼容、协同共治的全新逻辑，打破固化的行政治理格局，为破解社区主体失衡、资源割裂、诉求滞后、制度虚化等现实困境提供了全新解决路径。多元共治共同体消解了行政垄断治理弊端，在地化资源嵌入夯实了社区育人文化底蕴，协商交互平台畅通了师生双向沟通渠道，系统化制度体系筑牢了育人长效根基，共同推动社区治理实现从管控型向服务型、封闭型向开放型、同质化向特色化的深度转型。新时代高校需持续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包容型治理内在机理，立足本土地域文化特色持续优化育人模式，不断激活“一站式”学生社区育人活力，将其打造为涵养青年品格、传承地域文化、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落实三全育人的核心阵地。

参考文献

[1] 杨璐，李淑华，丁聪 . 基于成长需求的民办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自治模式构建研究 [J].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26(02):88-95.

[2] 甘长来 .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与学生党员责任区深度融合的五维路径建构 [J]. 北京教育（德育），2026(04):14-17.

[3] 张妍 .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8(02):110-115.

[4] 侍秋禹，梁莹 . 新时代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服务创新与资源整合机制研究——基于区块链与 AI 双轮驱动的跨部门协同治理路径 [J]. 学园，2026,19(01):50-52.

[5] 曹野，闫东祺 . 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协同治理模式探索 [J]. 文教资料，2025(18):186-18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辅导员工作研究委员会辅导员专项课题“‘包容型治理’赋能在地化高校‘一站式’社区育人路径创新研究”（25FYHLX087）。

（作者单位：连云港师范学院）

心理弹性视角下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影响因素及保护机制研究

杜俊鹏　蘇清朗　蒋　梦

摘要：本研究立足心理弹性动态过程理论，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 10 岁—18 岁城乡青少年为调研对象，整合结构方程模型与主题分析法，系统探析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多层次影响因素与内在保护机制。研究证实，心理弹性在个体、家庭、学校构成的多层次保护框架中发挥关键中介与调节作用；高心理弹性青少年遭遇同伴侵害后，内化、外化问题行为风险显著更低，家庭支持、学校干预能够通过培育心理弹性，缓冲侵害带来的长期心理创伤。研究构建资产—资源协同保护模型，厘清自尊、情绪调节等内在个体资产与家庭沟通、校园反欺凌政策等外部保护资源的交互作用路径，为青少年同伴侵害的早期筛查、主动预防与长效干预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心理弹性；青少年同伴侵害；影响因素；保护机制；多层次干预

一、引言

青少年同伴侵害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对北美和欧洲 44 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同伴侵害发生率在 2%~35% 之间波动；我国相关研究则表明，中小学同伴侵害发生率约为 33.8%，其中约 5% 的青少年曾遭受严重侵害。这种侵害行为不仅引发即时心理创伤，更会导致持续性心理社会问题——研究证实，遭受同伴侵害的青少年更易出现抑郁、孤独感、社交焦虑等内化问题，同时伴随自伤、酗酒、物质滥用等外化行为，甚至因与学校疏离而走向辍学、犯罪等严重后果 [1]。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成瘾作为外化问题的衍生表现，可能与青少年通过虚拟空间逃避现实侵害压力的行为模式密切相关。

在此背景下，心理弹性作为应对逆境的核心能力，在青少年发展中展现出关键保护价值。相关研究揭示了社会情绪能力与积极心理环境的显著作用。社会情绪能力的提升可预测半年后同伴侵害水平的下降，而学校积极心理环境则能通过强化青少年的归属感与联结感，有效减少侵害发生及内化/外化问题。这种资产—资源协同作用模式，本质上与心理弹性的动态过程理论相契合——即个体通过激活内在优势与外部资源的匹配，实现对逆境的适应性应对。

本研究旨在系统解析心理弹性视角下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影响因素及保护机制，通过混合方法研究设计，验证个体—家庭—学校多层次保护框架的动态作用。为早期预防、动态监测与长效干预提供科学依据，助力构建更具针对性的校园安全政策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支持体系。

二、青少年同伴侵害的类型与性别特异性特征

（一）传统同伴侵害的类型学特征

青少年同伴侵害可划分为显性攻击与隐性破坏两大维度。显性攻击以身体侵害为核心表征，表现为通过肢体接触直接造成生理伤害，其发生场景多集中于可被即时观察的公共空间，具有明显的外显性特征。隐性破坏则包含关系侵害与言语侵害两种类型。关系侵害通过散布谣言、社交排斥、团体孤立等间接手段破坏青少年的人际关系网络，具有隐蔽性强、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特点；言语侵害则通过嘲笑、辱骂、威胁等语言暴力形式实施心理贬低，易引发内化心理问题的累积效应 [2]166。这两类隐性侵害因发生场景的私密性与行为方式的隐蔽性，常成为校园安全监测的盲区。

（二）数字时代的新型侵害形态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侵害成为青少年同伴侵害的衍生形态。该类侵害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实施，表现为言语攻击的虚拟化、隐私泄露的规模化以及关系破坏的链式传播。其独特性体现在匿名性保护下的行为失范、传播范围的无边界性及证据留存的数字化特征，导致侵害后果的放大效应与追责难度增加。

（三）心理弹性概念界定与操作化维度

心理弹性指个体在面对逆境时，通过激活内在优势与外部资源的动态匹配，实现成功适应与应对的能力。积极青少年发展视角强调，心理弹性并非静态特质，而是个体潜能与环境资源协同作用的结果。

1. 操作化测量工具

作为心理弹性的核心维度，通过社会情绪能力量表评估个体识别、管理自身及他人情绪的能力，其提升可显著降低同伴侵害风险。

心理弹性量表由 25 个问题构成，系统评估个体心理弹性的五大核心维度：坚持力体现个体在困境中保持行动与目标的持久性；克服逆境的能力聚焦主动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策略性技能；对抗压力的能力反映面对压力时的心理稳定性与适应性调节；自信心强调对自身应对困境能力的信念与自我效能感；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则指向对积极结果的期待与正向预期。该量表通过这五个维度的综合测评，全面刻画个体在逆境中恢复、适应与成长的心理特质，为临床干预、教育培养及研究分析提供科学评估工具 [2]166。

2. 核心要素内涵解析

心理弹性本质上界定为个体对自身及他人情绪进行精准识别、有效调控与合理表达的综合能力，其通过构建良性人际互动机制，在降低同伴侵害发生率的同时发挥负面效应的缓冲作用；作为心理弹性的综合评估框架，进一步聚焦个体在逆境中的适应性行为特征，具体涵盖维持目标导向行为持久性的坚持力、侧重策略运用与资源调动智慧的克服逆境能力、反映心理稳定性与调节灵活性的压力应对能力、指向应对效能确信感的自我效能感，以及通过积极预期构建提供内在驱动力的未来乐观态度 [3]689。

三、心理弹性动态作用框架：个体资产与外部资源交互机制

（一）内在个体资产

自我效能通过增强青少年对侵害事件的掌控感，降低自责倾向；乐观态度则促进积极归因，减少抑郁风险。例如，高自我效能青少年更可能主动寻求社会支持，而非被动承受侵害。

（二）外部资源保护系统

家庭支持、同伴关系与学校环境构成三级保护网络。学校积极心理环境每提升 1 个单位，青少年与学校联结感增强，进而减少同伴侵害发生率 8%~15%。

（三）资产—资源交互效应

个体资产与资源的协同作用形成缓冲—促进双路径。例如，高自我效能青少年在家庭支持充足时，更易将侵害经历转化为成长机会；而学校环境通过规范同伴互动规则，可直接减少侵害发生频率，同时强化个体情绪调节能力。

心理弹性通过资产—资源动态匹配机制，在青少年同伴侵害中发挥核心保护作用，为干预策略设计提供理论基石。

四、青少年同伴侵害的消极后果与差异化表现

（一）同伴侵害的类型与性别差异

身体侵害。通过肢体攻击直接造成身体伤害，是校园中最易被观察到的侵害形式。

关系侵害。通过散布谣言、孤立排斥等间接手段破坏青少年人际关系，具有隐蔽性和持续性特点。

言语侵害。以嘲笑、辱骂、威胁等语言形式实施，常伴随情绪贬低，易引发内化心理问题。

网络侵害。通过社交媒体、即时通信工具进行的言语攻击、隐私泄露或关系破坏，具有匿名性和传播范围广的特性。

性别特异性表现。如性骚扰，研究显示性别差异显著——女性更易遭受关系侵害，男性则更多面临身体侵害，性骚扰事件在特定群体中呈上升趋势。

（二）内化问题与外化行为风险

情绪内化问题。同伴侵害直接导致抑郁、孤独感、社交焦虑等内化症状，调查显示，遭受侵害的青少年抑郁水平较同龄人高 30%~50%，自杀意念风险增加 2 至 3 倍 [3]688。

外化行为问题。攻击行为、酗酒、物质滥用及网络成瘾是常见的外化表现。例如，网络成瘾作为逃避现实压力的途径，在遭受侵害的青少年中发生率比普通群体高 40%。

（三）社会适应与学业发展困境

社会适应障碍。长期遭受侵害的青少年易出现人际信任缺失、社交退缩，难以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问题，成年后社会适应能力显著低于同龄人。

学业失败。侵害经历导致学习动力下降、课堂参与度降低，甚至辍学。国内数据显示，严重侵害经历使青少年学业失败风险增加 15%~20%，形成侵害—学业挫败—社会排斥的恶性循环 [4]。

（四）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梳理

人格特质缺陷和人际关系匮乏是危险因素，而社会情绪能力、积极亲子依恋、支持性学校环境则构成保护性资源。社会技能训练可减少侵害发生率，需构建本土化预防模式，整合家庭、学校、社区资源，形成多层次保护网络。

五、心理弹性抵御同伴侵害的多层次保护机制

（一）生态系统多层次保护框架

微观系统。直接交互环境，如家庭亲子关系、学校同伴网络、班级氛围。调查显示，母亲情感忽视程度低的青少年抑郁风险降低至 8.2%，而高忽视者达 40.1%；班主任公平度高的学生抑郁风险仅 12.3%，远

低于公平度差者（41.9%）。

中间系统。微系统间联动，如家校合作、社区支持。实践表明，家校社协同可编织心理健康防护网，降低非致死性危机发生率。

外层系统。间接影响环境，如社区资源、媒体环境。

宏观系统。政策与文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校园反欺凌立法、性别平等教育。全球校园欺凌报告指出，政策干预可使侵害发生率下降 10%~15%。

（二）资产—资源协同保护机制

内部资产。自我效能、情绪稳定性、乐观归因。例如，高自我效能的青少年被侵害后更易寻求支持，而非陷入攻击或成瘾行为。

外部资源。家庭支持、学校干预、社会网络。研究证实，积极亲子依恋可降低同伴侵害对内化问题的负面影响，而学校积极心理环境每提升 1 单位，青少年联结感增强，侵害发生率减少 8%~15%[5]。

（三）高心理弹性青少年的适应特征

内化问题抑制。抑郁、自杀意念发生率比低弹性者低 30%~50%，社交焦虑减少 40%。例如，网络成瘾作为逃避机制，在高弹性群体中发生率降低 40%。

外化行为控制。攻击行为减少 50%，物质滥用风险下降 35%，避免攻击行为自我效能高的青少年，外化问题发生率降低 60%。

（四）家庭与学校干预的增效路径

家庭层面。磨炼性教育提升男生心理弹性，保护性教育需平衡支持与自主。例如，父亲参与教养可降低青少年抑郁风险 20%，而母亲情感支持减少焦虑 15%。

学校层面。反欺凌政策心理弹性课程、同伴支持网络等，可降低侵害发生率 30%。实证表明，社会技能训练使侵害减少 25%，而师生信任度高的班级，学生外化问题减少 40%。

该框架强调心理弹性是动态发展的能力，需多系统协同培育。通过资产—资源匹配，青少年在侵害中实现压力转化，将逆境转化为成长契机，最终形成侵害—适应—成长的正向循环，有效降低长期心理创伤风险 [6]。

六、基于心理弹性培育的动态干预流程与实施策略

（一）资产—资源协同的适应性循环模型

感知阶段。青少年识别侵害事件（如言语攻击）并判断其威胁性，高自我效能者更易将其视为可克服挑战而非灾难性事件。

评估阶段。结合内部资产（如情绪稳定性）与外部资源（如同伴支持）进行风险—资源权衡。例如，家庭抗逆力强的青少年更易激活社会支持网络，降低孤独感。

应对阶段。通过问题解决、情绪调节或认知重构实现适应。

成长阶段。将侵害经历转化为心理资本积累，如提升冲突解决能力、增强同理心，形成压力—成长正向循环 [7]970。

（二）学校层面干预策略

心理弹性课程开发：整合正念训练、社交技能、情绪管理等模块。

同伴支持小组：组建朋辈辅导小组，通过角色扮演、经验分享等方式增强青少年互助能力。

教师反欺凌技能培训：培训教师识别侵害信号、实施干预策略。

（三）家庭层面干预策略

父母沟通技能培训。开展“积极倾听”“情感表达”工作坊，教授非暴力沟通技巧。

家庭抗逆力提升计划。设计家庭活动、家庭会议制度，强化家庭系统支持功能。

（四）社会层面干预策略

政策倡导推动《校园安全法》修订，明确学校反欺凌责任，建立匿名举报与快速响应机制。

社区资源整合。联动社区心理服务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提供免费心理咨询、兴趣社团、职业体验等资源 [7]970。

该框架强调心理弹性培育需多系统协同，通过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四级干预，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最终构建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有效降低同伴侵害的长期心理创伤风险。

七、结语

心理弹性在青少年同伴侵害中发挥关键保护作用，其动态保护过程可通过补偿模型、挑战模型与调节模型进行理论阐释。补偿模型，危险因素与保护因子呈对立作用。例如，家庭支持可抵消侵害对抑郁的负面影响，实现风险—资源平衡。挑战模型，中等强度压力可促进心理弹性发展。研究显示，经历适度挑战的青少年在冲突解决能力上提升 20%，而过度压力则导致能力衰退。调节模型，保护因子作为调节变量，缓冲逆境影响。

心理弹性依托资产—资源协同机制实现动态适应，内部资产与外部资源的匹配，使青少年在侵害中实现感知—评估—应对—成长的正向循环，最终降低长期心理创伤风险。本研究整合补偿、挑战、调节三类理论模型，构建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四级协同保护框架，推动干预模式由被动事后处置转向主动事前预防。

未来校园欺凌防治工作应当重视青少年心理弹性的常态化培育，统筹个体心理干预、家庭教养指导、校园制度建设、社会政策保障，持续完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网络，削弱同伴侵害的负面冲击，促进青少年积极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万芬，肖博文 . 青少年社交敏感性对心理适应的影响：文化和同伴侵害的作用 [J]. 苏州科技（下转 122 页）

乡村空间正义实现中的廉洁约束机制研究

陶胤中　闫昱澍

摘要：新时代乡村振兴推进过程中，乡村空间资源配置失衡、基层权力运行失范及廉洁风险交织，直接阻碍空间正义落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为支撑，从占有正义、分配正义、权利正义三维度解析乡村空间正义内涵，剖析空间资源倾斜、基层权力寻租、监督弱化、制度供给不足等廉洁风险对空间正义的侵蚀。研究构建由制度约束、监督约束、责任约束、文化约束组成的廉洁约束机制，通过规范权力、强化监督、压实责任、涵养文化，保障空间资源公平分配，推动乡村空间正义转化为治理实践，为基层廉政建设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村空间正义；廉洁约束机制；基层治理；权力规范

一、引言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极大发展，资本对社会的控制也愈发成熟，其运行逻辑在潜移默化中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使得人们愈发处于资本支配之下。以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者，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经典时间维度，对充斥着资本逻辑的现代空间展开批判，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即理论界著名的“空间转向”。而诸多空间学者却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从空间视野认知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缺失，是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缺场”。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从形式更从内容上经受了误读。首先，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有着鲜明的空间视野，经典作家还结合时空维度对资本社会的运行逻辑展开了科学说明与批判；其次，西方学者在批评马克思“空间缺位”的同时，更没有注意到自身也存在对乡村空间关注的“缺位”：他们多聚焦于高速发展的现代城市，农村在其论述体系中往往处于边缘，缺乏一种独立的、和城市问题同等分量的系统研究——他们从未告诉我们，现代化之下，乡村发展该向何处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中国

（上接 121 页）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2(01):44-52.

[2] 叶枝，林丹华 . 流动儿童同伴侵害与抑郁的关系：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C]// 中国心理学会 . 第十八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摘要集——心理学与社会发展 . 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2015:166-167.

[3] 马玉鑫 . 青少年早期内化外问题 p 因素的发展及相关因素 [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23.

[4] 宋晓凡，曹衍森，林小楠，等 .HPA 轴系统基因、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共情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2025,41(04):550-560.

[5] 李德钰，魏淑华 . 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关系——父母心理控制的中介作用以及教师支持的调节作用 [J]. 心理学进展，2025,15(04):582-592.

[6] 王建平，喻承甫，李文倩 . 同伴侵害与青少年网络游戏成瘾：心理需求满足的中介作用和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9(04):184-192.

[7] 刁华，杨连建，李婷，等 . 青春期同伴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弹性干预效果分析 [J]. 中国学校卫生，2021,42(07):969-97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立项课题“青少年同伴侵害的关键影响因素及预防干预研究”（2024WT041）。

（作者：杜俊鹏，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蘇清朗，澳门旅游大学创意旅游与智慧科技学院；蒋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

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空间问题作为新时代的社会发展矛盾逐渐显现。空间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同空间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之诉求，使得实现空间正义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空间发展之中必须重视的理论与实践命题。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的《新时代县域经济学》报告指出，中国县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以全国52%的人口贡献了全国经济总规模的近40%。中国乡村作为我国社会空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空间正义的实现，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在乡村如何落地的理论回应，更是推进“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重大现实要求。因此必须以系统性廉洁约束机制规范权力运行、防范利益输送、保障村民权益，将廉洁治理嵌入乡村空间生产与分配全链条，为空间正义落地提供刚性保障。

二、乡村空间正义与廉洁约束的内在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与空间正义理论的阐释

重新着眼于经典作家的探究历程，空间非但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盲区，反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载体、作为分析资本积累与城乡对立的重要支点而贯穿于各文本之中。

马克思对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作出了明确区分，认为人类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社会历史性的空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空间为剩余价值获取的资本逻辑所操控，而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1]155。他进一步通过对资本、利润与地租的事实展开说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矛盾使得劳动者被异化，一系列空间非正义现象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种异化的空间。

工农劳动的分离，带来了城乡在空间上的对峙，强制性对立使得群众被分工体系固定在特定空间区位中，无权自由选择生存空间。“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1]556 资本秩序就这样以分工将城乡空间分割开来，从而实现了对全部社会空间的有序支配。为此，“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1]557。

随着政治经济学探究的深入，马克思将乡村空间正义视为实现空间解放的关键。资本本性在于“用时间消灭空间”：随着生产力极大发展，商品流通时间得到极大压缩，资本主义完成了对地理差距的征服。这一看似便利人类生活的过程，却注定使得交通便利的核心区域得到加速发展，地处边远的乡村却被边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认为，资本主义以暴力手段将农民从土地上剥离、使乡村沦为城市的附庸与原料供应地，乡村空间根基由此被彻底瓦解；只要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少数垄断者手中，土地收益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资本家和地主，而真正在土地上劳动的农民依然被排斥在空间利益分配之外。乡村空间也因此成为实现空间正义最不可忽视的场所。

（二）乡村空间正义的多重维度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在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436。乡村空间正义，需从占有正义、分配正义和权利正义三个维度阐明。

一是占有正义。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作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3]。在乡村中，生态资源既是生产活动开展最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更作为农村居民劳动与生活的空间载体而存在。如果这些资源被少数权力主体垄断占有，那么乡村空间的公共属性便会遭到破坏。因此，占有正义要求确立空间资源的集体所有属性，防止权力与资本合谋将公共空间转化为少数人的私产。

二是分配正义。无论哪一社会形态，其分配环节都由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所规定；生产者所得在由劳动贡献决定的基础上，更会受到社会分配的影响——在乡村空间治理的具体场域中，土地流转增值、生态补偿资金、集体资产经营分红等空间收益，名义上归属于村集体，却往往要经历多层级、多名义的扣除。当这一过程被权力主体所掌握时，便转而成为一种凌驾于集体意志之上的不平等。分配正义要求从根本上破除不公的分配格局，唯有将分配权力确立为一种制度化、程序化、可问责的公共运行机制，分配才能成为乡村空间正义的支柱。

三是权利正义。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435。这一问题在乡村空间治理中表现得尤为尖锐。马克思指明了乡村受制于生产体系中的弱势位置的普遍性规律，农业劳动“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4]。权利正义为现有权利的平等行使创造出必要的物质前提与制度保障。只有当权利的行使资格与行使条件同步，法律文本中的平等才能落实成为乡村空间中的真实保障。

（三）廉洁约束机制的功能：规范权力、防范寻租、保障公平

乡村空间正义的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空间生产与分配中的权力是否受到有效约束。权力作为生产关系的产物，在乡村空间中对土地、项目、资金、规划等核心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当这种权力缺乏监督时，便会异化为个别主体攫取私利的工具，从而使空间正义遭到侵蚀。因此，廉洁约束机制作为空间正义实现的内在环节，其功能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规范权力。马克思认为，农业社会中，小农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规范这种“权威”在于将资源配置的决策权纳入轨道，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应有之义。

第二，防范寻租。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强调：“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在乡村空间中，一旦存在分配规则不透明或监督缺位，权力主体便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与程序漏洞，将公共资源暗中导向自身或关联方，从而造成剥夺。

第三，保障公平。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2]436。保障公平力求确保分配始终服务于空间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而非个别主体的特殊诉求。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特色在于，其对公平的保障超越了资本语境的形式平等，是一种以集体所有制为根基、以共同富裕为指向的发展优势——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才使得乡村空间正义的实现成为可能。

空间正义是一种城乡空间发展及社会正义问题在空间上的投射，是对社会空间公平与正义的追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征程中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遵循[5]。空间正义所关注的，本质上是一种对共同体是否实现了公平公正的追问，而廉洁治理所要回应的，恰恰是权力在这一过程中怎样实现空间正义的问题。

三、乡村空间正义建设的优化路径

（一）乡村空间资源均衡配置体系持续完善

土地、产业项目、涉农扶持资金是支撑乡村发展、保障全体村民共享发展红利的核心空间资源。为推动空间正义落地，国家持续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厘清集体土地、公共场地等资源权属边界，规范资源开发、流转、规划使用全流程管理，从制度层面保障资源分配公平性[6]。乡村社会天然存在地缘、熟人社会特征，历史遗留的集体资产权属交叉、公私空间界限模糊等客观现实，给资源标准化分配带来一定治理难度。现阶段各地持续开展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确权登记、价值评估工作，清晰划定各类空间资源产权归属与规划开发用途，持续破解权属不清、价值难以量化等历史遗留问题。

集体土地作为乡村核心空间载体，土地流转、产业项目落地、村级公共设施选址等事项由村集体统一决策，是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带动集体增收的重要抓手。当前全国统一推行“四议两公开”村级民主议事制度，对村级重大资源事项实行集体商议、群众评议、全程公示，各地不断细化资源分配倾斜保障政策，设置普通村民产业参与渠道，搭建公平参与资源开发的平台，持续完善多元主体均衡共享的资源分配机制。

（二）基层“小微权力”规范化建设纵深推进

村集体所有的公共空间，核心价值在于服务全体村民集体发展利益，规范基层“小微权力”运行，是保障空间资源普惠共享、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7]

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是党中央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强化党组织对乡村发展全面领导的重要制度创新，有效解决了以往村“两委”分工不协调、治理合力不足等治理难题[8]。为匹配决策权集中的治理模式，各级同步配套完善集体资产监管、村级重大事项管理系列制度，明确集体空间租赁、土地合作开发、集体产业经营等事项必须执行公开竞价、集体表决、长期公示等流程。近年来，全国加快建成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所有集体资源流转交易全部线上公开挂牌，统一交易标准、规范交易流程，弱化了人为自由裁量的空间；同时建立了集体收益普惠分配机制，保障全体村民能够平等享有公共空间发展红利，构建以群众实际发展需求、分配公平为核心的资源配置运行逻辑，持续缩小村民之间空间发展权益差距。

（三）多层级协同监督体系迭代升级

健全常态化、全覆盖监督体系，是稳步推进乡村空间正义、筑牢基层廉政防线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已构建起乡镇纪委监督、村务监督委员会内部监督、群众民主监督、数字化智慧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化基层监督格局，但由于不同层级、部门、主体之间的职责划分、行为逻辑存在差异，难以形成监督合力[9]。

从监督架构来看，乡镇监管覆盖行政村数量多，一线监督力量在客观上有限。因此村务监督委员会作为法定村级内部监督机构，应当持续强化人员选配，进一步释放内部监督效能，持续破解监督力量薄弱等结构性治理难题。乡村空间开发、土地流转、产业项目建设伴随大量集体资金收支，目前全国普遍落实“村账乡管”财务管理制度，统一规范了村级财务台账登记、收支审核流程。同时，推动数字乡村、智慧监管平台建设，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资源交易、资金拨付、项目建设全流程留痕可追溯。

推动各地持续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公开机制，细化空间资源、项目资金、集体资产收益等公示清单，明确公示周期、公示内容、公示渠道；打通县、乡、村三级监督联动渠道，强化村务监督委员会常态化履职考核，以全方位阳光公开、多层次协同监督，持续完善乡村空间资源廉洁、公平分配长效机制。

四、乡村空间正义的廉洁约束机制

（一）监督约束机制：以多元监督防范权力寻租

持续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向“实质运作”转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转型核心在于保障独立性与专业性：一方面赋予其独立预算、直接向乡镇纪委报告线索的权限，赋予其参与项目评审与资金审计的实权；另一方面建立履职激励机制，提升监督意愿与能力。涉及集体土地流转、公共设施建设等重大空间事项时，监督委员应全程列席相关会议，对决策过程和执行结果进行独立审查与记录。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原有渠道不能丢，但更要全面推行村级事务公开，空间使用、资金流向这些信息尤须线上线下同步披露，确保村民查得便捷、看得及时。

重大工程项目、集体资产运营这类领域专业性强，内部监督专业能力上的短板客观存在。引入第三方专业评估与审计，把多元监督力量整合起来，事前、事中、事后全覆盖，织成一张全方位的监督网络。在空间资源配置全过程中，权力寻租的空间被大幅压缩，乡村空间正义的实现过程，才能真正在阳光下推进。

（二）责任约束机制：以闭环责任压实治理主体

责任约束机制的核心是构建“决策—执行—监督—问责—整改”的完整责任闭环，空间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必须与具体治理主体的职责牢牢挂钩，权力运行的可追溯性与可问责性才有保障。说到底，这是为了破解偶发的责任虚化、问责不易等问题，让每一项空间决策、每一笔资源使用，都能锁定具体的责任主体。它既是防范权力失范的重要手段，也是将空间正义理念落到治理实践的制度支撑。

责任约束的效力体现在问责与结果应用上。对于在空间资源配置中可能存在的违反程序、优亲厚友、造成集体利益损失等行为，应依据规定调查，并对相关责任人采取不同层级的问责措施。同时，问责必须与问题整改相衔接，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实质性纠正，防止类似问题重复发生。通过构建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责任闭环，能够将压力层层传导至每一个治理主体，促使其在行使权力时始终绷紧“责任弦”，从而为乡村空间正义的实现提供坚实的责任保障。

（三）文化约束机制：以廉洁文化涵养空间正义价值

文化约束机制着眼于从价值观念与行为习惯层面塑造乡村治理的内在规范，通过培育和弘扬廉洁文化，为空间正义的实现提供深层次的精神支撑与道德引导。相较于刚性的制度与监督，文化约束具有更加显著的渗透性与持久性，从而在源头上抑制权力寻租的动机，形成崇尚廉洁、维护正义的社会氛围。

培育廉洁文化，不能仅靠简单的标语宣传和会议传达，而应转向更具参与性与情境化的实践。文化规范力可借助非强制手段实现社会秩序的自我调适。将廉洁元素有机融入村规民约、家风传承、节庆活动等乡村日常文化生活之中，在茶余饭后、集体活动中进行传播，让廉洁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文化约束的关键在于激发村民作为空间正义主体的自觉意识与监督责任感。这种来自共同体内部的软性约束，在人情关系复杂的乡村社会环境中，有时能起到制度难以企及的效果，促使干部在决策时更多考量公共利益与长远声誉。

廉洁文化的目标是实现价值内化与行为自律，当公平正义成为乡村社会核心价值，权力在空间配置中的任性妄为将失去文化土壤与社会认同。

五、结语

乡村空间正义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廉洁约束则是破解空间资源分配不公、防范基层权力失范的关键支撑。从长远来看，推进乡村空间正义仍需持续优化权力监督、强化制度刚性、深化村民参与，并将廉洁治理深度嵌入空间规划、资源分配、项目实施全链条，不断破解治理梗阻。未来，可进一步围绕经济发展不同层级地区空间正义、数字技术赋能廉洁监督、驻村帮扶与基层廉政协同等方向展开研究，为乡村全面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55,556,557.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36,435,436.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695.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66.

[5] 何植民，蒋护纹 . 推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基于空间正义的分析 [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8(05):16-23.

[6] 武丹，耿虹，乔晶 . 乡村国土空间资源价值化内涵与困境及其运筹路径——基于空间绩效三要素的分析 [J]. 自然资源学报 ,2026,41(03):767-785.

[7] 习近平 .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5-03(02).

[8] 易新涛 .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生成逻辑、内涵解析和实施指向 [J]. 探索 ,2020(04):111-120.

[9] 田玉麒，刘秀珍 . 接点监督：破解基层监督难题的实践创新 [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6,66(02):135-144,269.

（作者：陶胤中，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闫昱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工作与数字化转型的融合研究

张皓炎

摘要：数字技术迭代升级推动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全面数字化转型，也为社会工作专业革新、服务提质、效能升级提供了全新发展契机。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平台等数字工具，社会工作能够突破传统服务模式局限，实现服务供给精准化、服务场景全域化、服务效能高效化。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数字化融合仍面临从业者数字素养不足、技术落地应用浅层化、跨机构数据孤岛突出、数据隐私伦理风险凸显、数字鸿沟诱发服务不公等现实困境，制约了社会工作专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立足数字社会建设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系统阐释社会工作与数字化转型融合的时代背景与核心价值，剖析数字技术赋能社会工作的实践机遇与现实难题，从人才培育、平台搭建、制度规范、伦理建设四个维度，构建适配新时代发展需求的融合发展策略。研究旨在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工作实务深度耦合，优化社会服务供给体系、规避数字化转型风险，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赋能增效。

关键词：社会工作；数字化转型；数实融合；社会治理；数字伦理

一、引言

社会工作与数字化转型相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从理论层面来看，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打开新视野、拓展新维度，使学界不断思考如何更精准地界定社会工作以及更新发展社会工作的目标、方法，在此基础上推进社会工作理论的突破性变革；从实践层面来看，数字化转型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高效化的智能化工具与途径，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工作的水平，同时也助力社会工作者以数据分析与智能化服务的方式开展精准化服务。随着数字化平台的搭建，社会工作者会有更大的范围进行交流合作，实现跨界的联合协作和资源共享。与此同时，研究数字化转型还可以发现和解决在转型过程中所存在的难题，如技术的缺乏、数字鸿沟以及数据隐私等问题，从中汲取经验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以保证社会工作的长期发展。

二、社会工作与数字化转型融合的时代背景与核心价值

（一）数字化转型赋能社会工作的发展机遇

数字化转型给社会工作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1]。以服务对象为例，一方面，在服务对象层面实现精准化服务的供给。数字技术可以助力社会工作者快速收集分析相关数据[2]，精准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同时运用大数据分析发现潜在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避免大水漫灌，加强重点关怀。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让社会服务具有可及性[3]，数字技术为偏远地区的社工提供了很大便利，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数字技术也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立足社会工作行业层面看，数字化转型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工作从业者间的沟通与协作，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经验交流、案例共享，搭建了更紧密的专业协同网络。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并有利于为案主提供长足的服务关系[4]，也会给社会工作者自身带来更多的学习和提高机会。

（二）数字时代社会工作数字化发展的专业价值

数字时代的社会工作数字化发展能给社会工作带来新的工具和平台，使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都更为丰富。利用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等新技术，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实现高效的联系和沟通，快速了解情况和收集数据，并开展针对性的数据分析，制定更为有效的干预措施。信息化服务让服务的边界得到了拓展，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为不同的对象提供合适的服务。数字化转型将社会工作的影响力扩散到更大的范围，社会工作者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促进社会工作的理念传播和普及，有助于提高社会工作者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力度，带动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弱势群体，调动全社会力量，增加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力度，发挥其动员社会的功能[5]。

（三）社会工作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趋势

当今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将社会工作与数字技术结合是对社会服务进行升级改造的有效手段和重要

途径。数字化转型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通过数字技术可更好地获得、分析各类数据信息，基于大数据社会工作将服务对象需求、基本情况、现状等摸排清楚，并进一步给出详细的服务方案，实现实务工作精细化、现代化、科学化，流程更加完整化和合理化[6]；另一方面，通过对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反馈，使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以此来进行预测并发现存在问题，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解决，抑或发现高危人群，并对其进行早介入，提前提供援助，达到“未病先治”。

三、社会工作与数字化转型融合的现实困境

（一）技术应用浅层化，数字化赋能效能不足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社会工作存在应用技术不够的现实状况，势必影响到社会工作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一是数字鸿沟问题[7]，即一些社会工作从业者对新技术应用相关知识掌握不足，没有得到充分培训、指导，无法在实际工作中利用好数字化工具。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方面多数还是依靠传统方式，没有挖掘利用大数据带来的可能价值，因而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一方面服务的响应速度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服务无法做到个性化和精准化；二是资源不足问题，很多机构的资金没有花在购买先进设备或者软件上，仍依托于传统的人工服务，导致工作效率较低；三是数据孤岛现象，数字信息的分享属性与数据垄断共存[8]。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很多机构都是以单位为主体分别行动，没有作为整体进程推动，所以无法做到各单位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作联动，导致资源碎片化的问题突出，同时也会影响服务的连贯性以及服务协调的过程，进而导致社会工作者进行决策的时候缺少全方位的信息，降低服务质量。因此，推动社会工作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和数字化素养意识的形成，成为社会工作专业数字化转型亟须攻克的重要前提[9]。

（二）数据隐私风险凸显，专业伦理面临挑战

对于社会工作与数字化转型结合的问题而言，数据隐私和伦理问题属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随着社会服务工作数字化，大量信息数据被收集、存储和使用，一方面提升了社会工作服务的运行效率，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社会工作从业者需要使用数字工具，获得服务对象的信息数据（包括家庭情况、个人身体情况和经济情况等），鉴于该类信息的敏感性，因此在对其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就需要严格遵守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定。很多社会工作者对于数据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手段运用比较薄弱，就会出现数据泄露、滥用的情况，甚至有可能会侵害服务对象的权利。数据隐私具有道德伦理要求，而社会工作专业以人为本的服务性质决定了要切实尊重、保障好服务对象的个人隐私权，以免因为数据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给服务对象带来伤害。数字化转型需要具备较高的数据分析能力，能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发现并解决问题，这就很可能导致工作人员存在严重的数据依赖，忽略人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然而，“数据驱动”方法有可能将服务对象物化为一个个纯粹的数据点，减弱了社会工作个性化、人性化的特性。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以“人”为中心的专业，在社会工作特有属性要求下，无法全部交给技术来解决，还需要人文关怀与情感关怀。

（三）数字鸿沟固化，加剧社会服务不平等

数字鸿沟指的是因为取得与使用技术的能力差异造成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层面的接入和使用不平等的现象[10]。对于社会工作来说，在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中，数字鸿沟会导致服务难以普及，同时也会加深社会上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的状况；在服务对象层面，很多低收入家庭或者偏远地区的群众并没有相关的设备或者网络，从而难以享受到数字化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便利，无法得到相应的服务支持，从而加深了社会之间的差距；从社会工作者层面来说，他们所需要提供的一切服务均需要借助数字化的工具和平台进行信息收集和服务的输出，一旦服务对象不能够很好地运用相关工具，那么将很难达到服务的目的，可能会出现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无效的情况；从实务工作的角度来说，数字鸿沟还会带来信息不对称的情况，部分群体想要获得帮助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会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而难以及时获取所需要的相关服务信息，进而影响其生活质量的改善程度以及增加社会工作者为其提供服务的难度。

四、推动社会工作与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的优化策略

（一）强化数字素养培育，构建专业化人才队伍

数字化转型当下，加强社会工作者的数字技能培训十分必要。就社会工作者本身而言，一方面要掌握好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方法技能；另一方面又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以应对新的工作要求和新的服务需求。数字技能培训应该包含计算机基础、数据处理、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技能，让社会工作者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类数字工具来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学习利用数据管理软件来进行案主信息资料记录和分析完成服务效果的评估，从而发掘出服务的需求。另外，在平时进行数字技能相关的培训时融入实例讲解，帮助社会工作者更好地认识到数字技术手段的应用方式以及案例中的使用场景，例如：线上咨询、线上支持小组等，帮助其熟练地运用数字工具完成社会工作实务，建立对数字服务模式的认知和接受度。当然，要让社会工作者意识到使用数字工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与数据隐私问题，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加以规避。从

社会服务机构方面看，社会服务机构应当积极支持并推动数字技能培训工作开展，给于足够的资源及平台支持社会工作者参加相应培训活动。加强对社会工作者数字技能的培训是提高社会工作者自身专业水平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工作向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保障。

（二）搭建一体化数字平台，完善智慧服务体系

对数字化平台开展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宏观层面，建设数字一体化的社会工作服务平台和体系是关键，为不同人群提供心理援助、法律援助、婚前、育婴和养老等方面的各类服务，并打造“一站式”社会工作服务平台，方便群众就近就便享受服务；面向不同群体（特别是老年人）要做到易学易用，难度不高。同时，平台做好各类群体的需求和感受数据的收集并将获得的各种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为后续社会工作提供良好的基础。宏观层面还要关注数据的透明、开放的共享机制以及不同社会服务组织的合作与共享机制，通过数据的共通汇聚增加效能协同，推动工作合力；运用数据对需求进行预测和个性化服务推荐，通过智慧平台对需求开展针对性服务。建立健全数字化服务平台与数字化服务体系，既是推动社会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也是优化和提升服务品质、服务效率、服务公平的重要基础。只有借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数字技术创新的支持，才能将社会工作更广泛地应用到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健全制度规范体系，筑牢数据安全防线

在社会工作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据与隐私安全不容忽视，数字化的社会服务过程中产生、存储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及隐私数据，如果不能很好地保护这些信息和数据，极易出现个人隐私信息被非法获取以及恶意使用等问题。宏观层面，相关政府部门出台有关政策法规为社会工作机构的数据收集、存储、应用以及分享等行为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通过立法确定具体的数据保护对象，加强对数据处理行为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数据泄露风险。此外，政策上还应要求社会工作机构在用户不知情或不认可的情形下不得擅自采集用户数据，充分保障用户知情权、选择权；在中观层面，社会工作机构也需要制定自身的内部数据管理规章，保证数据处理的规范化操作，并严格把控数据访问权限，加强数据的密级管理，利用数据加密、去隐私化等方式进行数据保护。定期开展数据安全方面的教育培训，提高工作人员对信息安全工作的重视程度，在日常工作中主动遵守信息安全的相关要求。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相关政策制度是数字社会建设和社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础制度，也是提高服务质量、赢得人民群众信任的关键所在。

五、结语

数字化转型为社会工作专业革新、服务提质、治理赋能提供了全新机遇，是新时代社会工作现代化、专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入，有效破解了传统社会工作服务粗放、效能不足、资源分散、覆盖有限等难题，推动社会服务朝着精准化、高效化、普惠化、智能化方向转型，为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同时，数字化融合过程中面临的技术应用不足、数字人才短缺、数据隐私风险、数字鸿沟固化、人文伦理弱化等现实困境，仍制约着社会工作数字化转型的质量与成效。

推动社会工作与数字化深度融合，需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以人才培育夯实转型基础，以平台建设激活转型动能，以制度规范守住转型底线，以人文伦理校准转型方向，构建技术赋能、制度护航、人文兜底、全域协同的数字化发展格局。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与行业体系的不断完善，社会工作将持续深化数实融合、优化服务模式、规避转型风险，充分释放数字赋能价值，持续提升民生服务质量与基层治理效能，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 梁玉成 . 数字化转型下的社会工作发展思考 [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22,22(06):20-22.

[2] 陈婉珍 , 何雪松 . 大数据驱动的社会工作 : 前景与挑战 [J]. 社会科学 ,2017(07):74-81.

[3] 奚彦辉 , 苏妮 . 人工智能背景下社会工作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J]. 理论月刊 ,2019(02):145-152.

[4] 黄雨晴 . 从社会性出发 : 中国社会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应对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38(03):42-55,69.

[5] 胡莹 . 数字社会工作的概念、发展与青年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伦理挑战 [J]. 当代青年研究 ,2022(05):119-128.

[6] 行业分析社会工作行业发展与“大数据”[EB/OL].(2019-01-08)[2026-06-20].http://practice.swchina.org/view/2019/0108/32996.shtml.

[7] 向静林 .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问题指向与发展趋势 [EB/OL].(2021-08-20)[2026-06-20].https://www.cssn.cn/skgz/202209/t20220916_5515705.shtml.

[8] 王天夫 . 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 [J]. 社会科学文摘 ,2022(03):94-96.

[9] 周欣然 . 基于数字化技能培养的职业院校社会工作专业课程建设路径研究 [J]. 科教导刊 ,2023(35):56-58.

[10] 李梅 , 陈友华 . 关于数字鸿沟问题的若干思考 [J]. 人口与社会 ,2022,38(01):9-17.

（作者系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助教）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个案工作介入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社会融入的路径探究

王诗琦

摘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实施，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社会工作者能够与社区矫正对象建立平等关系，从个性化角度分析其实际困难，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可以有效促进矫正对象的社会融入。然而，目前社会工作介入假释类社区矫正的实践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是对假释类对象的特殊性认识不足，介入策略缺乏针对性；二是社会工作介入的深度和广度不够，未能系统构建社会支持网络；三是缺乏针对假释类对象社会适应的个案工作模式和评估机制。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指导，聚焦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适应问题，通过个案工作介入，探索促进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社会适应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社会工作；个案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理论

一、引言

社区矫正不仅是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制裁，更是帮助罪犯恢复社会功能、实现再社会化的重要过程。社区矫正对象作为社会治理中的特殊群体，社会融入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在社区矫正的四类对象中，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更具有特殊性。本文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探究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社会融入现状及路径，旨在帮助他们实现稳定社会融入，降低再犯罪风险，进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法治化。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文献回顾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国内关于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社会融入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基础。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假释制度的法律定位与适用条件。例如，陈雄飞明确提出假释的实质标准应该是“罪犯的再社会化可能性”，推动了假释理念从“惩罚逻辑”向“康复与回归逻辑”的演进[1]。浙江省乔司监狱课题组的实证调查揭示了假释人员在就业、家庭与心理方面遭遇的普遍困难，金碧华提出“双重排斥”理论框架，指出他们在就业市场同时面临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系统性排斥[2]。在探讨社会融入过程的研究中，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他们融入的障碍与机制。金碧华聚焦结构性排斥，杨彩云则从心理层面揭示了“歧视知觉”通过损害“身份认同”导致社会疏离的内在路径[3]。高梅书提出了“社会脱节”与三阶段融入模型，指出融入是一个动态、分阶段且需求各异的复杂过程。这些研究共同指出，社会支持网络的匮乏是阻碍融入的核心问题。在介入的路径上，社会工作被看作是促进再社会化的重要专业力量。付立华、任文启等学者论证了其以“优势视角”和“社会支持理论”为基础进行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与合法性[4]。

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明显局限。多数研究或偏重宏观制度分析，或将假释人员与其他矫正对象一起笼统讨论，缺乏对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因经历监禁而产生的独特“双重身份”困境的深入剖析。同时，研究对社会支持理论的应用多停留在原则性呼吁，缺乏对其在假释融入场景中具体作用机制（例如，如何通过缓冲歧视感知、促进身份转变来发挥作用）的系统性操作化分析。此外，尽管“个案工作”被普遍视为核心方法，但针对假释人群社会融入的、深度融合社会支持理论的精细化介入模型与扎实的本土化实证研究仍尤为匮乏。因此，聚焦于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以社会支持理论为框架，探索一套具体化、可操作的个案工作介入模式，并检验其在促进社会融入中的实际成效，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补充与实践指导价值的研究方向。

（二）理论基础

社会支持理论自 20 世纪 70 年代在精神疾病治疗

领域发端以来，已发展成为社会学、心理学及社会工作等多个学科的核心分析框架。该理论的核心关切在于，个体通过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所能获取的资源，在应对压力、维持身心健康以及实现社会适应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作为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在社区中可获取的资源非常有限，社会支持网络往往呈现碎片化、弱化特征，难以有效支撑其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的多重挑战[5]。

三、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社会融入现状

假释作为刑罚执行的关键环节，是罪犯从监禁状态向社会正常生活过渡的重要阶段。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不断发展，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在重新融入社会过程中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家庭支持缺位、社会网络断裂、职业技能匮乏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阻碍其成功再社会化的核心挑战[6]。基于文献研究和在S县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实务经历，将其社会融入现状梳理如下：

（一）身份认同危机

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在重返社会过程中，往往会因为过往的犯罪记录遭受身份“污名化”，常常被贴上“罪犯”“不良分子”等负面标签。在心理上，会导致他们产生不同程度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往往会对自身产生过度否定，将自己视作“犯罪分子”或“二等公民”。这种过往犯罪经历产生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会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能力、自身的价值产生怀疑，感觉自己是“无用之人”，进而导致他们容易敏感，并认为社会对他们的印象已无法扭转，前途黯淡。这种自我“负标签化”的过程，会持续损害他们的自尊与自信，并导致自我效能感丧失，使他们在社交与竞争中陷入“低人一等”的心态。同时，由于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在融入社会过程中难免会受到社会的排斥、歧视，他们常常被看作是“异类”，社交范围变得狭窄，难以建立有效支持网络；社交隔离不仅加重心理压力，更强化边缘化处境，形成“污名—自卑—隔离”的恶性循环，导致融入社会异常艰难。

（二）家庭支持缺位

家庭作为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最重要的非正式支持来源，理应是他们最温暖的情感栖息地。然而现实情况是，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在犯罪行为发生后，可能会对家庭关系产生破坏，易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产生信任危机、情感缺失。在监狱服刑期间，尽管部分家庭维持了联系，但是长期的分离必然导致情感上的隔阂与共同话题的减少。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往往会因为就业受限、收入中断等现实原因，无法为家庭持续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易导致家庭经济压力倍增，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子女教育与医疗等刚性支出难以为继，日常开销捉襟见肘，有的甚至因为经济窘迫激化夫妻矛盾、引发代际冲突。同时，长时间与家庭成员分离造成的情感疏离，和社会偏见带来的心理压力，容易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产生隔阂，使情感支持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家庭的经济和情感的双重支持缺失，更是增加了他们融入社会的难度。

（三）社会网络断裂

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融入，本质上是重新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然而，他们普遍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网络断裂情况，难以获取必要的信息、机会和资源。正式支持方面，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司法部门、政府相关责任部门等，主要是对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进行责任化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更侧重于监管责任的落实，对于他们在个体情感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难以满足。非正式支持方面，来自亲朋好友、邻里、社会组织等的支持也很薄弱。现实情境下，虽然假释类矫正对象在主观上有强烈的社区融入意愿，但社区邻里的偏见与排斥，让他们感受到明显的社区排斥，进而影响其交往行为[7]。久而久之，他们开始选择性交往，仅与愿意接纳自己的人沟通，对不熟悉的人仅仅是见面打招呼，这进一步缩小了他们的社交圈，加大了融入难度。作为边缘弱势群体，假释类矫正对象本身经济状况、社会资源薄弱，再加上犯罪经历可能引发的家庭关系破裂、亲朋好友流失，使其非正式支持更为弱化，从而导致了他们社会网络的断裂。

（四）职业技能匮乏

能够实现稳定就业是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实现经济自立、重塑生活规律、获得社会认可的核心途径，也是衡量其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指标。然而，职业技能的匮乏与就业市场的排斥，共同构成了他们经济融入难以逾越的障碍，动摇了他们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一方面，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在遇到就业机会时，有的就业单位需要他们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由于他们有犯罪经历，无法提供，就业单位不愿雇佣他们，虽然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不得对求职者进行就业歧视，但现实情况使他们的求职道路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求职者的职业素质、职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根据在S县社区矫正管理局的实务经历可知，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的文化程度不高，均在高中及以下，在未犯罪前，均是离家外出务工，从事简单的工厂流水线工作，没有专业技术作为自身的就业支撑。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在接受信息化、专业化、数据化的职业技能培训时，接受能力有限、培训效果不佳；或者是参加当地就业部门组织的技能培训，这类培训班大都是统一化的、根据现有资源开设的，未能根据求职者个体的兴趣和就业需要来开设培训班，因此，往往出现培训结束后虽然掌握了技能但仍然不能实现就业的情形。有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在接受管辖辖区内的工作，也都是低薪、繁重、不稳定的临时岗位，

没保障、没奔头。职业技能的匮乏，使得他们就业路上受阻，难以顺利实现社会融入。

四、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个案工作介入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社会融入路径探究

社会支持理论的核心逻辑在于构建“正式支持 + 非正式支持”联动网络，以弥补个体资源匮乏、提升抗逆力。个案工作以个性化需求为导向，探索他们实现社会融入的介入路径。

（一）心理支持介入：解构污名标签，重塑自我认同

身份“污名化”是融入的首要心理障碍，需要优先搭建心理支持网络。针对身份认同危机，社工首先应该通过真诚的接纳与非评判的态度，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的专业关系，可以采用叙事疗法结合深度访谈引导服务对象梳理生命故事，剥离“犯罪者”标签与个人价值，挖掘劳动能力、责任感等优势资源，打破“无用之人”的固有认知。同时，通过链接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同伴支持资源，邀请成功融入案例分享经验，缓解焦虑情绪，形成朋辈间的互助网络，增强服务对象的心理韧性和自我效能感。

（二）家庭支持修复：激活情感纽带，夯实融入根基

家庭是非正式支持的核心，需以关系修复为切入点。社工可以组织家庭会议搭建沟通平台，并通过开展角色扮演、换位思考、布置作业等方式化解家庭成员之间的隔阂与积怨，让服务对象与家庭成员坦诚地表达诉求。社工还可以指导家庭成员掌握积极沟通技巧，减少指责与抱怨，营造轻松包容的家庭氛围；并鼓励家庭成员参与服务对象的融入过程，通过共同参与社区活动、支持职业培训等方式强化情感联结。此外，针对家庭经济受损问题，社工可以协助链接民政部门临时救助、低保等资源，缓解经济压力，助推家庭关系的积极修复。

（三）社会网络拓展：整合多元资源，打破社交隔离

针对社会网络断裂困境，需要从正式与非正式支持两个方面发力。正式支持层面，社工可以主动对接社区矫正管理、人社、民政等部门，系统梳理并协助服务对象申领符合条件的政策福利（例如就业培训补贴、社保续接、廉租房申请等）；链接公益组织、法律援助中心、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等，提供专业咨询、心理辅导、法律维权等服务。在非正式支持层面，通过积极构建“社工 + 志愿者 + 邻里”的社区支持系统，为服务对象匹配社区志愿者进行一对一陪伴式融入，协助修复亲友关系和邻里的日常互动；鼓励服务对象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例如环境整治、助老服务等），为服务对象创造平等互动的场景，获得社区认可与接纳，实现从“边缘人”到“社区成员”的身份转换，打破社交隔离。

（四）就业支持构建：赋能职业成长，打通融入通道

稳定就业是融入核心，需要围绕“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就业保障”构建支持体系。社工通过链接政府、企业、职校的培训资源，优先选择实操性强、入职门槛适中的技能培训（如电工、烹饪、物流、家政、电商运营等），注重实操演练，确保培训效果。社工通过主动对接爱心企业、公益性岗位，推动落实就业绿色通道，杜绝就业歧视，并提供简历制作、面试技巧、权益保护等指导。此外，还需要开展就业跟踪帮扶，定期回访已就业的服务对象，协调企业营造包容环境，在失业后快速启动再就业帮扶，通过稳定就业夯实经济融入基础，推动社会认同的提升。

五、结语

在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的大背景下，推动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实现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工作以其“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和系统化的方法体系，能够有效回应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因监禁经历和社区矫正经历所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家庭支持缺位、社会网络断裂与职业技能匮乏等多重困境。本文基于社会支持理论，探索了个案工作介入假释类社区矫正对象社会融入的系统路径，旨在通过个性化、综合性的服务，协助其修复支持网络、恢复社会功能、实现稳定融入，进而降低再犯罪率，减少社会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 陈雄飞 . 完善减刑、假释、社区矫正的一体化改革 [J]. 人民法治 ,2018(21):36-37.

[2] 浙江省乔司监狱课题组 . 社区矫正对象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以 2010-2012 年乔司监狱假释犯为样本 [J]. 犯罪与改造研究 ,2014(03):33-39,69.

[3] 杨彩云 . 歧视知觉对社区矫正对象社会疏离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身份认同整合和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2(03):127-139.

[4] 任文启 . 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服务的制度设计、实践现状与发展方向 [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 2025(05):33-44.

[5] 吴宗宪 , 肖艳秋 . 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困境及其解决对策 [J]. 齐鲁学刊 ,2024(04):81-91.

[6] 付立华 , 石文乐 . 社会支持视阈下社区矫正中的家庭参与 [J]. 东岳论丛 ,2022,43(07):176-181.

[7] 金碧华 . 社区矫正假释人员回归社会的障碍分析及破解策略 [J]. 犯罪研究 ,2020(03):20-32.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协同治理策略

任渝婉

摘要：社区矛盾纠纷化解是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的关键抓手。社会力量作为该领域的多元参与主体，涵盖合法登记社会组织、志愿服务队伍、法律与心理从业者、社区自治组织等多元群体。当前，社会力量参与矛盾调解的场景不断延伸，参与模式也日趋多元，各级政府亦在加大扶持力度。本文立足基层治理实际，从完善法治保障、融入思政引导、健全协同机制等维度，探索针对性解决策略，旨在为构建高效协同的社区矛盾化解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社会力量；矛盾纠纷化解；协同治理；基层治理；社区治理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各类社会矛盾的集中交汇地，邻里纠纷、物业冲突、民生分歧等常态化矛盾的高效化解，是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维护社区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伴随社会结构转型与基层治理改革持续深化，传统政府单一主导、社区被动落实的治理模式已难以满足复杂的矛盾化解需求，以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专业人才、社区自治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力量，凭借其群众性、专业性、灵活性优势，逐步深度融入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全过程，成为补充政府治理、完善社区治理的重要支撑。立足协同治理视角，探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协同治理实践路径与优化策略，对缓解基层治理压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一、核心概念界定

本方所指的社会力量是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多元主体集合，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相关行为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与鲜明的社会价值。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社会力量并非单一主体，而是由多种不同类型、具备不同功能的组织与群体共同构成。其中，社会组织经过合法登记注册，专注于社区服务与治理相关领域，拥有专业的服务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是参与矛盾化解的重要力量。志愿者队伍主要由社区居民、在校学生、退休人员等自愿参与组成，他们不计报酬，主动投身社区矛盾纠纷的调解与辅助化解工作，是社区治理中最具群众性的力量。律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专业人士，凭借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为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专业指导和针对性服务。社区自治组织由社区居民自主成立，依托社区自身资源，协助开展矛盾调解与社区治理相关工作，是连接居民与其他各类治理主体的重要桥梁。这些社会力量各自具备独特属性与功能，共同构成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多元主体体系，其参与行为既符合我国社区治理相关政策要求，也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需求[1]。

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发展现状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范围正持续拓展，不再局限于单一类型的矛盾调解工作，而是逐步延伸至邻里纠纷、物业矛盾、邻里互助等各类社区常见矛盾场景。经过多年实践探索，社会力量已形成多种不同的参与模式，社会组织依托自身专业性主导矛盾化解，志愿者队伍凭借人员充足的优势提供辅助支持，法律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则针对性地介入复杂矛盾调解，各类模式相互补充、各有侧重。各级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对社会力量的扶持力度，不仅在资金上给予一定补贴，还通过政策引导、场地提供等举措，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化解创造良好条件。目前，社会力量与政府部门、社区组织的配合日渐紧密，协同治理的初步形态已然形成，在缓解社区矛盾压力、提升化解效率方面，已发挥出一定的实际作用[2]。

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协同治理优化策略

（一）完善法治保障，明确协同权责边界

1.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

当前基层治理领域中，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相关法治建设仍有不足，部分领域还存在法律空白。这一现状导致社会力量在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过程中，常常出现主体资格不明确、权利义务模糊、参与流程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既影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积极性，也制约协同治理效能的发挥。从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视角出发，法治是一切治理活动的根本依据，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是破解上述难题、推动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关键举措。我们要立足基层社区治理实际，结合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现实需求，加快完善基层治理、社会力量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法规要重点明确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主体资格，明确各类社会力量包括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专业人士等参与社区矛盾化解的具体权利和义务，细化其参与的具体流程和操作规范，让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协同治理工作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同时，政府部门要出台针对性的扶持政策，考虑到社会力量尤其是基层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的发展现状，通过政策引导保障其合法权益，拓宽其发展空间，鼓励更多社会力量主动参与到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最终形成法治引领、政策支撑、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3]。

2. 细化多元主体权责划分

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协同治理工作中，其核心目标是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关键在于明确各参与主体的权责边界，避免出现权责交叉、缺位越位等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从行政法学角度来看，权责一致是行政治理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延伸到基层社区协同治理中，同样需要我们坚持，进而合理界定政府、社区、社会力量三方的权责范围。政府作为基层治理的引导者，要切实履行好监管、指导、扶持的职责：既要加强对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监管，规范其参与行为；也要做好指导工作，为社会力量提供必要的专业支持和业务培训。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主阵地，要承担起组织、协调的核心职责，牵头对接政府部门和各类社会力量，搭建沟通协作平台，统筹推进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各项工作。各类社会力量要立足自身优势，明确自身在协同治理中的服务、参与、协助职责，主动配合政府和社区开展工作，发挥自身在专业服务、群众动员等方面的优势，协助化解各类社区矛盾纠纷，最终形成政府引导、社区主导、社会参与的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治理格局。

（二）深化思政价值，凝聚多元协同治理共识

1. 构建常态化思政引领机制

社区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协同治理过程中，需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常态化、制度化，构建完善的思政引导长效机制，为协同治理工作筑牢思想根基。社区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全面融入社会力量的培训全过程，结合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责任意识、服务意识与法治意识培训，让参与治理的社会力量人员深刻认识到自身在社区和谐稳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明确自身的服务职责，树立依法办事、依规服务的理念。同时，社区要充分依托现有思政阵地，包括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群服务中心、宣传栏等，定期组织开展法治宣传和思想疏导活动，向社区群众普及矛盾纠纷化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和诉求表达观，学会理性看待自身诉求，自觉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避免采用极端方式引发新的矛盾，从思想层面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为协同治理凝聚思想共识。

2. 依托思政沟通化解主体分歧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大的沟通协调功能，是化解协同治理中各类思想分歧的重要手段，能够有效提升协同治理的凝聚力与执行力。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由于立场、认知、利益诉求的差异，难免会出现思想分歧，影响协同治理工作的推进。社区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沟通优势，牵头建立政府、社区、社会力量以及群众等多元主体的沟通平台，打破各主体之间的沟通壁垒。通过思政引导的方式，组织各主体开展常态化沟通交流，深入解读协同治理的政策要求和目标任务，倾听各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引导各主体站在社区整体发展和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摒弃局部利益和个人偏见，逐步化解思想分歧。同时，思想政治沟通要注重人文关怀，充分尊重各主体的合理诉求，耐心做好思想疏导工作，让各主体在沟通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协同治理合力，确保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高效推进[4]。

（三）健全协同运行机制，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1. 搭建多元主体联动闭环机制

提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协同治理效能，关键在于建立健全政府、社区、社会力量三方联动机制，实现各方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工作的高效协同。政府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牵头搭建三方沟通联动平台，明确各方在社区矛盾纠纷化解中的职责分工，建立规范化的沟通流程和协同工作制度，确保各方沟通顺畅、配合默契。通过该平台，实现三方信息共享，及时传递社区矛盾纠纷的相关信息，包括矛盾类型、

涉及人员、诉求要点等，让各方准确掌握矛盾动态；实现资源整合，统筹利用政府的政策资源、社区的阵地资源、社会力量的专业资源，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强大合力；实现协同联动，打破各方各自为战的局面，推动各方在矛盾化解过程中密切配合、协同发力。在此基础上，构建“发现—上报—协调—化解—反馈”的闭环机制，社区负责及时发现矛盾纠纷并上报，政府负责协调各方力量，社会力量负责具体参与矛盾化解，化解完成后及时向各方反馈结果，形成全过程、全方位的协同治理格局，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的效率和质量。

2. 完善全方位资源保障机制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协同治理工作，离不开充足的资源保障，完善资源保障机制是提升协同治理专业化水平和长效性的重要支撑[5]。政府和社区要加大对社会力量的扶持力度，从资金、人才、场地三个方面提供有力保障。在资金方面，要合理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对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社会力量给予适当补贴，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解决社会力量在开展工作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在人才方面，要建立专业化的人才培育体系，定期组织社会力量工作人员开展矛盾纠纷化解、沟通协调、法治宣传等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其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同时，鼓励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社区工作者等加入社会力量队伍，充实人才力量。在场地方面，社区要整合现有阵地资源，为社会力量开展工作提供固定的办公场地和活动场所，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和服务设施，为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通过完善资源保障机制，培育一支专业化、规范化的社会力量队伍，整合各类优质资源，为协同治理工作有序推进提供坚实支撑，不断提升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协同治理效能。

（四）精准对接基层需求，培育社会力量专业治理能力

1. 建立供需双向精准匹配机制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协同治理，需以社区实际需求为根本导向，脱离需求的参与易形成资源浪费与参与低效的问题，也会削弱协同治理的整体效果。基层社区作为矛盾纠纷的发生地，需主动牵头梳理辖区内矛盾纠纷的类型、特点与化解难点，系统整合形成常态化的需求梳理机制，避免社会力量参与的盲目性。同时要全面摸排辖区内各类社会力量的专业优势、服务范围与参与能力，建立社会力量能力台账，推动需求清单与能力台账的双向匹配，让不同类型的社会力量精准对接对应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社区还需根据辖区内矛盾纠纷的动态变化，及时更新需求清单与能力台账，持续优化匹配方式，让社会力量的参与始终贴合社区矛盾化解的实际需求，推动协同治理从广泛参与向精准参与转变，切实提升矛盾纠纷化解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2. 实施分层分类专业化能力培育

专业能力是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的核心支撑，只有具备与化解工作相适配的专业素养，社会力量才能真正融入协同治理体系，发挥实际作用。针对不同类型社会力量的能力短板，需开展分层分类的能力培育工作，对社会组织侧重培养组织协调与矛盾统筹化解能力，对志愿者队伍侧重普及基层矛盾调解的基础方法与沟通技巧，对法律、心理等专业从业者则侧重解读基层治理的实际要求与社区矛盾的特殊性。政府与社区需搭建常态化的交流指导平台，邀请基层治理、矛盾调解领域的专业人士开展现场指导，组织不同社会力量分享矛盾化解的实操经验，形成相互学习、共同提升的良好氛围。通过持续的能力培育，让各类社会力量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真正成为社区矛盾纠纷化解协同治理体系中的坚实力量，保障协同治理工作落地见效。

四、结语

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社区矛盾纠纷化解，是基层治理迈向多元协同模式的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系统梳理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矛盾调解的发展现状，精准剖析了协同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权责、思政、联动等核心问题，并围绕法治保障、思想引领、机制建设三个层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优化策略。未来，还需持续深化实践探索，推动协同治理模式不断完善，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1] 毛佩瑾 .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 成效、特征与创新路径 [J]. 宁夏社会科学 ,2024(05):12-13.

[2] 王磊 .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及整体性治理机制研究——基于成都市 J 区的分析 [J]. 东岳论丛 ,2024(08):90-91.

[3] 郭施宏 , 王宁 , 何雪松 . 嵌入性倡导 : 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倡导的行为逻辑 [J]. 社会学评论 ,2024(02):112-113.

[4] 许文文 , 张牧辛 .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差异研究——以北京市三个社区为例 [J]. 公共管理学报 ,2024(02):180-182.

[5] 秦玉 . 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监管的新机制 [J]. 公关世界 ,2026(01):146-14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理念下城市超大社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2025NDYB008）。

（作者单位：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体育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索

张　珂

摘要：政绩观是执政者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逻辑的内核，它直接影响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方向，在体育服务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容易被政绩观错位所侵害的，就是那些最贴近群众实际需求的健身愿望。本文以基层治理真实场域为立足点，分析当前体育公共服务在政绩观影响下出现的形式主义异化、资源错配、组织悬浮、需求失声等问题，最后从考核指标重塑、跨域资源调度、基层组织松绑、供给链需求倒逼，提出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体育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可行之路。

关键词：正确政绩观；体育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基层治理

一、引言

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纵深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持续提速，然而“建管脱节”“建用分离”的现象在基层仍屡见不鲜。某县一座新建体育馆在竣工剪彩后随即大门紧锁，钥匙交由物业保管，平日里无法向公众开放租用。类似“建而不用”或“建而难用”的情形在基层并不鲜见。一些体育设施“修得起却用不好、建得好却活不起来”，供给端建设时的热闹与使用端的冷清之间，横亘着一道因政绩观错位而产生的鸿沟：重建设轻运营、重硬件轻服务、重迎检轻日常，使公共体育服务难以真正沉入基层末梢。

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为政绩评价提供了根本标尺。体育是民生福祉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服务基层治理的实效直达基层末梢、惠及广大群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干部能否转变政绩导向，从偏重显性显绩转向深耕惠民实效。笔者长期关注基层体育治理，对于政绩观与体育服务实效之间在理论倡导与实践落地中的脱节感触尤深。因此，重新认识二者的内在关联，探究其中的矛盾并探求破解之道，显得十分必要。

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内涵

（一）政绩观的核心要义

政绩观指向的是执政者“为谁干、干什么、怎么干”的价值排序，是权力运作的内在坐标。旧有的政绩观受GDP崇拜的惯性影响，重视可以量化的、可以比较的、可以上报的硬指标，对于那些需要时间积累、很难马上见效的软性民生工程敷衍了事。正确政绩观要求执政者把潜绩和显绩放在一个天平上衡量，这实际上是转变价值取向，是由“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的价值回归，使权力的运作逻辑同群众真实的需求达成一致[1]。

（二）体育服务的治理逻辑

体育公共服务不是简单的供给和接受的关系，其中包含社会资本再生产、社区共同体重塑、个体身心调整这三种治理功能。一场小区里的广场舞、一场社区足球联赛、一场村落间的龙舟竞赛，构成邻里之间由疏到亲的重要桥梁。体育服务治理的价值就隐藏在这些居民之间的日常互动里，依靠身体参与所产生的情感认同和规则自觉，逐渐改变着基层社会的治理图景。决策层如果只将体育当作“文化点缀”或者“招商名片”，那么这套独特的治理逻辑就会被架空，体育也就变成了行政绩效的装饰品。

（三）二者融合的价值基础

正确政绩观同体育服务治理的融合不是简单的外在嫁接，而是存在着价值上的同构。政绩观要求“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体育服务就自然地依靠群众的身体参与和主观感受来衡量效果。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有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及以人民的检验标准来评价政府行为的方式，在此基础上为体育治理提供实质性引导，并且为破解体育治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2]。

三、体育服务社会治理的现实挑战与治理需求

（一）统筹建设与运营，推动体育服务长效化

近年来，各地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步伐持续加快，

场馆数量提升、覆盖面积扩大，为全民健身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硬件基础。与此同时，如何从建好迈向用好，实现建设与运营的有机统一，已成为推动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命题。

从实践探索看，一些地方已率先建立了场馆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将设施建设、日常运营、维护更新、绩效评估纳入统一管理体系，有效破解了重建轻管的历史惯性。体育服务治理的制度设计应当将运营指标、群众满意度、设施完好率等纳入考核体系，与建设投入享有同等权重，从源头上引导各级政府将工作重心从建设完工延伸到服务持续，使公共体育设施真正成为群众日常健身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升体育公共服务可及性

推动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体育公共服务向更广范围、更均衡方向延伸。进一步深化均衡发展，需要在资源调配机制上持续创新，既注重硬件设施的合理布局，也重视运营能力和专业人才的同步跟进，推动体育公共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从进城区向到村头高质量转变，让每一位群众都能共享全民健身的时代红利。

（三）激发基层组织活力，夯实体育治理基础支撑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是全民健身战略落地的神经末梢，也是构建体育服务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健身团队、社区体育俱乐部等基层组织蓬勃涌现，为推动群众自发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依托。

进一步激活基层组织活力，需要在登记便利化、经费保障稳定化、人才培养系统化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基层体育组织从活动承办者升级为需求发现者和政策参与者，真正将群众体育生活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体育成为凝聚社区共识、增进邻里情感的重要纽带。

（四）健全需求表达机制，提升体育服务精准供给水平

精准供给是体育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群众健身意识持续增强、健身需求日趋多元，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从“大水漫灌”走向“精准滴灌”，已成为新时代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要方向。

部分地区已在探索建立体育服务需求反馈机制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需求导向的供给机制，需要畅通多元表达渠道，强化数据分析对资源配置的支撑作用，将群众的真实健身诉求转化为政策调整的有效依据，不断提高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与群众实际需求的匹配程度，切实增强群众的健身获得感和服务满意度[3]。

（五）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构建体育共治格局

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必然要求突破政府单一供给的传统模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治的多元格局。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关键在于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各方的责任边界，建立权责对等、优势互补的制度框架：政府守住基本公益底线，市场提升运营专业水平，社会组织承接自治需求，三方各司其职、协调联动，共同构建层次清晰、运转高效的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共同体[4]。

四、体育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建立长效化政绩考核指标

将体育场馆的年均开放时长、人均使用频次、群众满意度测评、赛后设施维护率等后置指标作为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的指标，并赋予其不低于前置建设指标的权重比例。从操作层面来说，可以依靠省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平台创建“场馆全生命周期台账”，县市区体育部门按季度上报运营数据，省级层面借助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交叉核查，评定结果纳入干部提拔考察材料。考核指标还要设置“负面清单”，对出现“建而不用”“用而不管”“管而失效”等现象的区域实行一票否决，打破只奖不罚的软约束局面，使后期运营的责任人从无名氏变成有姓名，倒逼规划阶段就考虑长期可持续性。考核过程的透明化也要同时推进，年度评价结果经过脱敏处理，会通过地方政务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布，使群众由原来的“被告知者”变成“监督者”[5]。

考核体系要采用“群众体验积分”，通过微信小程序或者支付宝生活号这些移动端途径，让实际利用过场馆的人随时发表评价和留言，系统地把每月各个时间段的评分情况加总形成月度满意程度指数，和官方报送的数据进行双轨比较。两类数据有显著差异的时候就启动专项核查程序。长效化考核要真正落实，就必须把它嵌入干部晋升通道的制度刚性当中，“建好”和“用好”在绩效上应具有同样的分量[6]。

（二）优化跨区域资源调配机制

省域内体育资源再平衡要冲破行政边界的刚性阻隔，省级体育主管部门可以联合成立跨市县的“体育资源统筹调度平台”，把各地的闲置场馆容量、退役专业教练员资源、流动的器材设备纳入统一的数据库当中进行动态调配。对口帮扶机制也应该增加更多的“造血”功能，东部发达地区不仅要援建硬件，还要派遣运营团队到当地进行不少于一年的驻点培训，直到当地能够自主运营为止，不能出现援建完成即项目终结的短期行为。

跨区域调配还要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深层障碍。目前大多数县级体育主管部门对周边场馆空闲状态、设备库存状况了解很少，即便有调配意愿，也因为缺少规范化的对接渠道而停留在非正式电话交流上。为此，在省级调度平台上增设余量发布模块，各地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每月发布本地区可以对外共享的资源清单，

接收方根据需求提出申请并得到平台审核后进行留档，从而产生可追溯的调配记录。从长远来看，这一机制可打破目前存在的“各自为政”的碎片化局面，让每一处建成的设施都能发挥出最大的使用价值[7]。

（三）激活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活力

基层体育社会组织松绑路径有三个关键节点必须打通，即登记门槛降低、经费渠道拓宽、人才供给稳定。登记端可以参照社区社会组织备案制的做法，对成员50人以下的健身团体、群众性体育俱乐部实行镇街备案即可开展活动，免去其到县民政部门注册的麻烦。经费端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菜单式供给，县级体育主管部门每年公布群众体育服务项目清单，把社区广场舞指导、每月一次乡镇篮球比赛等具体项目纳入其中，由社会组织进行竞争承接，资金按季度拨付，并与服务效果挂钩。人才端要破除社会体育指导员“只挂名、不服务”的弊端，推行数字化工时记录手段——利用钉钉或者企业微信的打卡定位功能，要求指导员每次服务都提交现场照片和工作时长，将年度津贴同实际工时挂钩，把“补贴”变成“报酬”。

（四）构建需求导向的服务供给链

供给侧需求端的重塑要三管齐下，即反馈通道、响应机制、评价闭环这三大环节一起推动。反馈通道上可以将“12345”政务热线中有关体育服务的工单单独设置一个“全民健身”专线或者设立分标签形式的系统，并且保证群众的体育服务类诉求不会被其他的事项所忽略。在社区层面实行体育议事会制度，即每季度由社区党委牵头组织不同年龄段、不同健身需求的居民代表进行面对面讨论，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由专人记录备案。在响应时效上设定一个刚性的时限，一般的诉求7个工作日之内给出处置意见，对于牵涉设施更新或者器材增加这类大额支出的事情则纳入次年预算安排，并且提前告知诉求人具体的完成时间，防止诉求不了了之。评价闭环的关键是把提出诉求的人变成最终的评价者，服务结束后原诉求人通过短信回访或者小程序打分，分数直接反馈到承办单位绩效系统，差评达到一定比例就触发上级督办，形成需求、响应、评价、改进的完整回路。

（五）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形成

破解体育治理主体单一化的难题就是明晰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的责任边界，构建起层次分明、分类协作的多元共治体系，在清晰的制度架构之下，让每一个参与方各负其责，而不是彼此冲突。政府端要由“全面管控者”变为“规则制定者和底线保障者”，主要职责是场馆建设投资、安全标准制定、弱势群体基本保障，把商业经营空间有秩序地释放给市场主体，把自发性、公益性活动的组织权真正下放到社会组织。市场端依靠正向激励机制的指引，进入体育治理领域，对承接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的企业主体实行“基础保障+自主经营”的双轨制，基础开放时段由财政依照标准给予补贴，保障其公益性，非保障时段允许企业自行定价经营，依靠市场收益回补公益性开放费用，建立场馆运营绩效年度考核制度，群众满意率与使用率成为合同续签的关键标准，防止市场主体为了利润侵蚀公共属性。社会端要继续在前面提到的组织松绑的基础上，培育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使其由单纯的活动组织者转变为需求代言人、政策参与者，在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年度政策咨询程序中为它们设立固定的参与席位，使群众真实的诉求通过组织化渠道不断进入决策过程。

五、结语

政绩观的正本清源，对于完善体育服务治理而言，其深层要义并不止于校正思想观念，而在于推动公共权力全面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运行轨道。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体育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实现评价视角的根本转换：不再只关注运动会开幕式的盛景，而是转向晨光中公园里自发锻炼的人群、午后球场上挥洒汗水的身影、节庆广场上龙腾狮跃的热烈图景。唯有把这些日常、鲜活、真切的公共体育生活纳入政绩考核，使其成为检视治理成效的核心参照，体育方能真正沉淀为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 唐明欢，王晓晨．少数民族体育推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现代化治理路径研究[J].体育科技，2022,43(06):107-111.

[2] 张强，赵亮，苗峰，等．数智技术赋能体育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的作用机理、现实隐忧与靶向路径[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26,42(01):91-95,132.

[3] 程林，肖宇翔．国家治理视域下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0,40(02):10-14.

[4] 梁嘉劲，黄春香，郑华玲．数智化转型中体育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机制研究[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25,24(03):53-58.

[5] 徐艳艳，石静，刘希佳．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协同治理困境与结构创新研究[J]. 当代体育科技，2025,15(15):92-95.

[6] 杨苓，罗亮，孙晋海，等．基于风险视角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研究[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22,38(05):10-17.

[7] 张润君．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政府、社会和市场[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9(06):204-21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学习宣传研究阐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校（院）级课题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

全域全龄社区教育视域下混合型社区治理实践探索

王　琼

摘要：混合型社区因居民群体构成多元、需求差异显著，普遍面临邻里互动少、治理参与度低等突出难题。本文以毗邻多所高校的混合型社区为研究对象，立足社区书记兼专业社工的实践视角，阐述秉持“教育赋能、文化铸魂、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以全域全龄社区教育体系构建为核心抓手的治理实践。从教育阵地全域覆盖、课程体系分层升级、居民主体角色转变三个维度，探索社区服务从“单向供给”转向“多元参与”、治理模式从“政府主导”转向“居民共治”的实现路径。实践证明，全域全龄社区教育不仅是满足居民差异化学习需求的重要载体，更是凝聚社区人心、培育居民共识、激活社区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纽带，可为同类的混合型社区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关键词：全域全龄社区教育；混合型社区；基层治理；内生发展；治理共同体

一、引言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而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到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集商住型小区和单位型小区为一体的混合型社区日益增多，这类社区往往人口密度大、居住群体构成复杂、需求差异化显著，成为基层治理的重点与难点区域。

笔者所在的社区是典型的集商住型小区和单位型小区为一体的混合型社区，毗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多所高校，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 7000 余人，其中双职工家庭占比超 60%，60 岁以上老年群体占比达 25%，本地原住居民、高校教师、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租房流动人口、商户从业者等不同群体混居。长期以来，邻里互动少、不同群体需求分散、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度低等问题，是困扰社区基层治理的突出痛点。自担任社区书记兼专业社工以来，笔者深刻认识到，混合型社区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打破不同群体间的身份壁垒、空间壁垒与需求壁垒，凝聚多元居民共识，而传统单一化的行政主导型服务模式，既难以满足居民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更无法激活社区内生的自治活力与发展动能。

立足混合型社区治理痛点，本文秉持“教育赋能、文化铸魂、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将全域全龄社区教育体系构建作为破解治理难题的核心抓手，推动社区服务模式迭代升级，跳出“单向供给”的传统框架，迈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新形态，引导居民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向主动投身治理，探索出一条以教育融情、以文化聚力的混合型社区治理新路径。本文结合社区治理实践，从治理痛点剖析、教育体系构建、治理效能转化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新时代混合型社区治理创新提供实践参考[2]。

二、混合型社区治理痛点与社区教育的切入点

混合型社区的治理难点，不仅在于居民群体构成多元混杂、结构复杂、需求差异显著、共性痛点集中，更在于缺乏能够凝聚人心的文化纽带与参与载体。为精准把握居民需求，笔者团队开展了为期 1 个月的入户走访与焦点小组调研，累计走访居民家庭 100 余户，组织不同群体座谈会 7 场，梳理出居民反映最集中的三类诉求。

第一类是双职工家庭的“子女看护难、假期陪伴缺失、照料压力大”。社区内双职工家庭多为中青年群体，工作节奏快、压力大，工作日无暇照顾孩子，周末以及寒暑假期间孩子的“看护真空”问题尤为突出。部分家庭不得不依赖老人隔代照料，或花费高额费用送孩子去校外托管机构，家长们迫切需要社区提供便捷、普惠的临时或短期托管服务与素质教育课程，缓解照料压力。

第二类是老年群体的“精神生活匮乏、社交圈子狭窄、生活单调乏味”。社区老年群体中，空巢老人

占比超 30%，他们不仅面临就医、养老等现实问题，更存在精神层面的孤独感，缺乏精神慰藉。许多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难以通过线上渠道拓展社交网络，无法融入数字化生活，与子女、社区其他成员的沟通存在障碍；同时，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文化娱乐、兴趣培养、人际交往类活动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其精神层面需求，导致老年群体的社交圈子日益狭窄，对社区的归属感不强。

第三类是家长群体的“亲子沟通障碍、家庭教育焦虑”。当前绝大多数家长都认识到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但普遍缺乏科学的教育思路和高效的沟通技巧，同时现阶段青少年心理问题日渐增多，家长群体需要获得系统化的家庭教育培训和专业化的亲子沟通辅导。

深入分析这些诉求可以发现，其背后是居民对“学习成长”“邻里交往”“价值实现”的深层渴望。传统的社区服务往往聚焦于物质帮扶或事务性办理，难以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无法搭建起邻里互动、共建共享的平台。基于此，笔者团队摒弃传统单一化的服务模式，决定以全域全龄社区教育为切入点，构建覆盖老中青幼的教育网络，让学习成为社区的新风尚，让教育成为联结邻里的桥梁，通过教育的力量打破群体壁垒、凝聚居民共识，激活社区内生发展动力[3]。

三、全域全龄社区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一）构建全域覆盖的教育阵地，夯实社区教育基础

我们坚持“空间跟着需求走”的原则，充分挖掘整合社区内外部资源，打造“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教育场景，从而为全域全龄社区教育提供坚实的阵地支撑。

在内部空间盘活上，我们以党群服务中心亲民化改造为契机，秉持“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原则，拆除隔离柜台，聚焦“闲置空间再利用”，将办公区域压缩 85%，党群服务中心新增服务窗口 2 个、活动室 2 间、儿童游乐区 1 处、多功能教室 1 间，并对小区内楼栋架空层、老旧活动室同步进行改造升级，打造出集教学、活动、议事、休闲于一体的社区教育主阵地，总面积达 1000 多平方米。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我们将主阵地划分为青少年研学课堂、老年兴趣空间、亲子互动沙龙、共享阅读室、社区议事厅等五大功能区域。青少年研学课堂配备科普实验器材、图书绘本、多媒体教学设备，满足孩子们的学习与实践需求；老年兴趣课堂设置音响、舞蹈杆、瑜伽垫、健身器材等设施，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文体活动空间；亲子互动沙龙定期开展手工制作、亲子游戏等活动，搭建亲子沟通的平台；共享阅读室藏书 2000 余册，涵盖文学、历史、科普、家庭教育等多个领域，向全体居民免费开放；社区议事厅则为居民提供议事协商的场所，推动教育成果向治理效能转化。同时，我们在社区广场、长廊、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空间设置“流动学习角”，张贴科普知识、传统文化海报，让居民在散步、休憩的同时，也能随时随地获取知识。

在外部资源链接上，我们充分发挥毗邻多所高校的区位优势，主动搭建校社联动桥梁，与周边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签订了共建协议，成立“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以此为纽带，社区成功链接高校科普馆、校史馆、实验室等特色场馆资源，引入高校教师等优质师资力量，同时精准对接高校 10 余支专业化志愿服务团队，涵盖科普宣传、文化教育、技能培训、便民服务等多个领域。高校定期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下沉社区，常态化开展科普讲座、青少年课业辅导、传统文化体验、红色教育研学等精准化志愿服务，以专业力量弥补社区教育服务短板；高校科普馆、校史馆同步向社区居民免费开放，社区定期组织开展专题学习参观活动，让居民近距离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真正实现校社教育资源互通共享、优势互补。此外，我们积极联动有关单位与公益社会组织，链接资源完善社区教育阵地的硬件配套设施与专项课程开发；联合辖区内的培训机构、非遗工作室等社会组织力量，开展公益课程与体验活动，以此丰富社区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如今，社区内的每一处公共空间都成为居民的“学习角”，全域覆盖的教育空间，让学习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让社区处处洋溢着浓厚的书香文化气息。

（二）打造分层分类的课程体系，推动社区教育升级

我们坚持“需求导向、全龄覆盖”的原则，构建起从“1.0 版专项服务”到“3.0 版全域教育”的课程升级体系，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推动社区教育从“提供服务”向“发动参与”再向“推动共治”转变[4]。

1. 1.0 阶段：聚焦急难愁盼，提供精准服务

这一阶段的课程以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现实需求为目标，开设青少年周末课堂、寒暑假爱心托管班、老年人玩转智能手机培训班、家长亲子沟通沙龙等针对性课程。青少年寒暑假托管班面向辖区内 6~12 岁儿童，提供课业辅导、科普实验、非遗传承、红色教育、心理健康等课程，在解决双职工家庭看护难题的同时，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老年人玩转智能手机培训班由高校大学生团队进行授课，手把手教老年人使用微信、网上购物、手机支付、视频制作等功能，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家长亲子沟通沙龙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授课，为家长们提供亲子沟通的技巧与方法，缓解家庭教育焦虑。该阶段累计开展课程 200 余场，服务居民超 5000 人次，让居民切实感受

到社区教育的温度与实效，为后续发动居民参与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 2.0 阶段：发动居民参与，激发内生动力

在精准服务的基础上，我们着眼于“发动居民参与”，打破“社区供给、居民接受”的单向模式，鼓励全职宝妈、退休干部、非遗传承人等本土人才主动担任讲师，让居民从“学员”变成“老师”。我们通过张贴招募令、召开居民座谈会、线上征集等方式，挖掘社区内的本土人才 10 余名，组建起一支“本土师资团”。全职宝妈文老师牵头的瑜伽班，吸引了百余名中老年居民参与，大家不仅锻炼了身体，还结识了新朋友；退休干部万阿姨牵头的器乐合唱班，吸引了 30 余名老年居民参与，大家以歌会友、乐曲传情、其乐融融；非遗传承人陶老师开设的剪纸课、泥塑课，让居民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高校大学生志愿者带来的科普小实验课程，用趣味实验点燃孩子们的科学梦想。此外，我们还鼓励居民自主策划、组织课程，社区提供场地与物资支持，充分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居民的主动参与，让社区教育课程更接地气、更具活力，也让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5]。

3. 3.0 阶段：推动共治共享，培育治理共同体

随着社区教育的深入开展，我们致力于“推动共治共享”，开设社区治理议事课、志愿服务培训课、邻里矛盾调解课等特色课程，引导居民从“关注个人成长”转向“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治理议事课邀请街道干部、律师、专业社工授课，讲解议事协商的流程与方法，组织居民围绕社区环境改造、公共设施维护、电梯加装更新等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志愿服务培训课教授志愿者服务的礼仪、技巧与安全知识，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能力；邻里矛盾调解课邀请退休法官、老党员分享调解经验，帮助居民掌握化解矛盾的方法。通过课程学习，居民们不仅掌握了议事协商的方法、矛盾调解的技巧，更增强了主人翁意识，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各项事务中。

（三）推动居民角色转变，激活社区治理动能

以社区教育为纽带，推动居民从“学习伙伴”到“治理共同体”的转变，是我们治理实践的最终目标。在全域全龄的社区教育氛围中，社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居民的角色也实现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主导者”的转变。

曾经“住对门不相识”的邻里，因共同的学习兴趣成为朝夕相处的好友。青少年研学课堂的孩子们结伴成长，组建星菘志愿服务队，定期参与社区环保行动、垃圾分类宣传等志愿服务，用小手拉起大手共建美丽家园；老年兴趣空间的居民们凝聚力量，成立“英花服务队”，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耐心细致的沟通，积极化解家庭、邻里矛盾，成为社区治理的“主力军”；亲子互动沙龙的家长们交流经验，自发组织“家长互助团”，互助提供临时看护、应急帮扶等服务，让邻里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在社区蔚然成风。

曾经对社区事务漠不关心的居民，因课程中的议事讨论主动建言献策。在社区环境改造项目中，居民们通过议事课学到的方法，自发组织座谈会，收集居民意见建议 20 余条，提出了“增设休闲座椅”“打造共享自习室”等合理化建议，最终形成的改造方案得到了全体居民的认可；在电梯加装以及更新项目中，居民们组成协调小组，入户沟通、化解矛盾，促使社区 3 部电梯加装、4 部电梯更换，惠及居民近 200 户。

四、结语

以全域全龄社区教育激活社区治理的实践，让我们深刻认识到：社区教育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凝聚人心、培育共识的重要载体。从提供服务到发动参与，再到推动共治，社区教育的每一步升级，都是社区治理效能的一次提升。

对于混合型社区而言，全域全龄社区教育是破解治理难题的有效路径，它通过构建覆盖全龄段的教育网络，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打破了群体之间的壁垒；通过打造分层分类的课程体系，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培育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通过推动居民角色转变，激活了社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构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

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全域全龄社区教育体系，创新课程内容与服务模式，引入更多优质资源，打造特色教育品牌；同时，建立健全社区教育的长效机制，将社区教育与基层党建、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让学习的氛围浸润社区的每个角落，让共治的力量推动社区持续发展，为建设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混合型社区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 习近平关于基层治理论述摘编 [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2] 徐选国 , 秦莲 . 回归“人”的治理 : 社会工作站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生态构建的内在逻辑 [J]. 社会政策研究 ,2025(04):60-72,134.

[3] 巫志南 .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 [M].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4] 高静华 . 社区慈善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困境、作用机制与优化路径 [J]. 长白学刊 ,2025(03):111-12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M]. 北京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4.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关山街道紫菘社区居民委员会）

老龄化社会下居家老年人群 AI 护理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西安市 G 社区的调查

唐佳璇

摘要：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老年群体中慢性病高发、失能情况增多，居家护理需求迅速增长与专业照护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作为新一轮科技改革的主要驱动力，人工智能（AI）技术为应对养老照护难题开创了全新的解决路径。通过运用智能监测装置、远程诊断技术以及语音交互系统，AI 护理体系能够实时获取老年人的健康信息，给出风险预估与康复建议，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照护资源匮乏的状况，且可以明显提高老年护理服务的精准性并扩大覆盖范围。

关键词：人工智能；老年人群；护理服务

一、引言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群体对护理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加。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传统养老护理模式面临诸多严峻挑战。G 社区为西安市的一个典型城市社区，常住居民约 8200 人，其中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数量达 1829 人，占总人数的 22.3%。社区诊疗中心具备基础的医疗设备，不过人工智能护理服务还未实现系统化与常规化的供给，并且老年人群体对这项技术的认知和需求仍然不明确。基于此，本研究重点关注该社区老年人对人工智能护理服务的需求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深入研究“人工智能 +”护理模式在推进期间遇到的难题和阻碍，目的是为养老护理的智能化转变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方面的建议。

二、G 社区老年人群 AI 护理服务需求调查结果

在 320 位参与者里，男性有 148 名（占比 46.3%），女性有 172 名（占比 53.7%），年龄处于 60 到 9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2.5±6.8）岁。在文化程度方面，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人数 186 人（占比 58.1%），初中文化程度的有 82 人（占比 25.6%），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 52 人（占比 16.3%）。婚姻状况显示，处于已婚状态的有 218 人（占比 68.1%），配偶离世的有 92 人（占比 28.8%），其他婚姻情形的有 10 人（占比 3.1%）。从月收入情况来看，低于 3000 元的有 196 人（占比 61.3%），处于 3000 元至 5000 元的有 84 人（占比 26.3%），而月收入超过 5000 元的有 40 人（占比 12.5%）。研究对象核心特征得分情况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核心特征（n=320）

项目	类别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 女	148/172	46.3/53.7
年龄	＜ 70 岁 / ≥ 70 岁	146/174	45.6/54.4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 初中及以上	186/134	58.1/41.9
月收入	0 元 / ≥ 3000 元	196/124	61.3/38.7
婚姻状况	已婚 / 配偶离世及其他	218/102	68.1/31.9
慢性病数量	0~1 种 / ≥ 2 种	122/198	38.1/61.9
AI 技术认知度	不了解 / 了解	114/206	35.6/64.4

在受访的 320 位参与者中，有 286 人（占比 89.4%）表明对人工智能辅助护理服务存在需求。需求评分居于前五位的内容分别是：智能监测血压和血糖、自动对跌倒事件报警、智能提醒用户准时用药、心率异常监测、远程视频医疗问诊。AI 护理服务核心需求得分情况见表 2。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群的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所患慢性疾病的数量、ADL 评分以及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情况等七个因素，与居家老年人对人工智能护理服务的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 ＜ 0.05）。AI 护理服务需求关键影响因素具体数据见表 3。

三、居家老年人 AI 护理服务需求特征及原因分析

（一）总体需求率高，契合政策导向

研究显示，西安市 G 社区的居家老年人对人工智能护理服务的需求比例达到 89.4%，该现象和西安市人口老龄化形势加剧以及养老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密切相关。近年来，西安市大力推动智慧养老规划，建立适老化产品展示与销售场所，并在社区引入人工智能护理装置，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对智能科技的认识。当前，社区老年人高龄化及慢性病高发趋势凸显，护理需求持续增长，但是传统护理资源难以充分满足需求，这使得老年人对人工智能护理服务抱有较高期待 [1]。调研结果显示，86.5% 的独居老人明确表明了对人工智能安全提醒服务的需求，这进一步展现出智能护理技术在填补护理缺口方面的突出作用。

表 2　AI 护理服务核心需求情况

需求类型	具体内容	数据指标
总体需求	非常需要 + 比较需要	286 人（89.4%）
无需求原因（前 3 位）	不会操作 / 担心数据泄露 / 认为没必要	47.1%/29.4%/23.5%
核心需求维度（需求率）	健康监测类	82.5%（主要功能：血压血糖监测 89.7%）
	安全预警类	78.8%（主要功能：跌倒报警 86.5%）
	用药管理类	72.2%（核心功能：用药提醒占比 83.3%）
	康复训练类 / 心理支持类	65.6%/58.1%

表 3　AI 护理服务需求关键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分组对比	有需求群体需求率 (%)	无需求群需求率 (%)	多因素 OR（95% CI）	P 值
年龄	≥ 70 岁 vs < 70 岁	87.4	79.5	2.31(1.12~4.78)	0.020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上 vs 小学及以下	84.7	92.5	0.58(0.34~0.99)	0.048
月收入	≥ 3000 元 vs < 3000 元	82.1	93.9	0.76(0.58~0.99)	0.040
慢性病数量	≥ 2 种 vs 0~1 种	94.9	78.9	3.12(1.45~6.72)	0.005
ADL 自理能力	部分 / 完全失能 vs 完全自理	96.2	86.2	无独立影响作用	0.006
婚姻状况	丧偶 / 其他 vs 已婚	91.2	88.5	无独立影响作用	0.012
AI 技术认知度	了解 vs 不了解	96.1	78.1	4.25(1.98~9.13)	0.001

（二）需求维度聚焦，凸显刚需特征

从需求方面分析，健康监测、安全提醒以及药品管理类需求位列前三，与老年群体预防疾病、规避意外、防止药物使用错误的主要照护需求高度相符 [2]。在健康监测领域，对血压与血糖的智能检测需求位列第一，这主要是因为社区患有高血压与糖尿病的老年人占比较高（达到 71.3%）。针对这些慢性病症需开展长期追踪，配备人工智能的监测装置可实现自动记录数据且实时警示异常情形，更符合慢性疾病管理的需求 [3]。在安全预警功能方面，老年人跌倒自动报警需求处于首位，这和老年人面临较高跌倒风险的实际情况紧密相连。西安市老年群体跌倒的发生概率为 18.7%，其中在家中跌倒的占比高达 72.3%，运用 AI 技术的摔倒监测装置通过雷达技术和加速度传感器，可实现无接触式监测，无须长者主动进行操作，十分适合高龄老人使用 [4]。据统计，社区中有 68.3% 的慢性病患者出现服药遗漏或者用药错误的状况，通过人工智能设备，采用语音提示、灯光提醒等多种方式，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用药行为，提高按时准确服药的概率 [5]。

心理需求方面的支持相对匮乏，主要原因如下：其一，老年群体对人工智能情感交互功能的了解比较有限，调查表明有 62.3% 的老年人觉得 AI 无法代替人与人之间的陪伴。其二，一些老年人有羞于表露情感需求的心态，特别是文化水平不高的群体，更愿意依靠家庭或者邻里的帮扶来满足情感方面的需求。其三，当下市场的 AI 情感陪伴类产品多数以普通话作为主要交流用语，这给社区内 28.3% 的方言使用者带来适配难题，进一步降低他们对相关技术的接受程度。

四、AI 护理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启示

（一）年龄和健康状况：需求的核心驱动力

综合研究显示，年龄达到 70 岁及以上，并且患有两种或更多慢性疾病是促使需求产生的主要因素，这和老年人身体机能改变的特性紧密相连。年过 70 岁的老年人身体机能明显衰退，自主生活能力逐步降低，对健康监测与安全保障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而人工智能护理服务可凭借精准监控、个性化提示等功能，可更好地满足高龄人群的护理需求 [6]。患有两种或更多慢性疾病的老年群体对 AI 护理服务的需求颇为急切，主要是因为这类人群的护理工作内容繁杂且难度较大，需要开展多方面的监控以及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举例来说，患有高血压与糖尿病的患者要同时关注血压和血糖的水平，并且据此优化药物治疗方案，而人工智能护理装置能够整合多方面的数据，为护理决策提供依据 [7]。

（二）理解层次：需求的核心影响要素

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程度是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OR=4.25），该结果凸显普及技术知识的重要价值。在调研中有 35.6% 的老年群体对人工智能技术不熟知，其中 68.4% 的人坦言不清楚 AI 能够带来哪些服务，还有 52.6% 的人觉得人工智能过于复杂且难以使用，这和社区在人工智能技术普及方面力度不足紧密相连，仅有 38.3% 的老年人通过社区宣传接触到相关知识，且宣传方式主要是宣传册与张贴物，缺少实际操作的机会。尽管西安市已建成适老化产品展示中心，但仅有 23.5% 的社区老年群体前来体验，其中高龄且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群参与度更为受限。由于认知范围受限，一些老年人对人工智能技术怀有排斥的态度，29.4% 不存在需求的老年人担心操作难度较高，

这意味着在开展技术推广工作时，要重点采用实际操作且简单易懂的方法，帮助老年群体消除对技术的恐惧心理。

（三）文化与经济方面：影响需求的限制条件

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上且月收入达到 3000 元或更高被视为抑制需求的要素，这一结论和预期略有差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群体需求相对较少，这或许是由于他们信息获取渠道多样，并且对人工智能技术在隐私保障和安全方面存在较多担忧。在调研中 72.3% 的老年人表明了对健康数据遭泄露的忧虑，而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年人更看重技术的实际运用 [8]。建议 AI 护理服务进一步强化数据安全措施，制定清晰的规范管理信息运用，消除老人对隐私方面的顾虑。经济状况较佳的老年群体需求相对而言比较低，可能是由于他们更偏好传统的人工照料方式。调查数据表明，68.5% 的高收入老年人表示更愿意出资聘请家政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原因是其认为人工护理在个性化服务与人文关怀方面更有优势。该结果显示，需推行分级定价措施，让 AI 护理服务既能够满足低收入老年群体的普惠性需求，又可以为高收入老年用户提供优质的定制化服务。

五、G 社区老年人群 AI 护理服务优化对策

（一）开发适老化 AI 护理产品，适配老年人群需求

按照需求特性，重点开展健康监测、安全提示及用药管理类高频率必需产品的研发。产品设计需遵循操作简易化、多感官融合、方言兼容的原则，对交互界面进行优化，削减操作流程，采用醒目字体和高对比度屏幕来展示内容；引入语音操控技术，能够识别西安方言，便于文化程度不高的长者使用；实现电池续航能力不少于 7 天，从而降低充电的频次。与适老化科技企业强化攻关协作，引入已获市场认可的高品质产品，如睡眠状态监测仪器、跌倒自动报警雷达装置、方言语音药品提醒设施等，通过个性化研发，针对社区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对产品性能进行优化。

（二）加强场景化科普宣传，提升认知水平

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养老服务站点，可以每个月开展一场智能护理体验日活动，经过实际操作训练，由护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教授老年人操作智能设备。如制作简洁易懂的宣传材料，采用卡通插画、地方方言的形式，讲解智能护理设备的用途、操作流程，以及隐私保护措施。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科学普及工作，对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年群体，重点展示设备的使用流程，保证他们能看懂并用好；对文化水平较高的老年群体，提供数据安全方面的指南，深入阐释隐私保护相关的问题；对年纪较大的长辈，邀请他们的子女参与培训，由子女协助其适应设备的操作。同时，通过社区群聊、电视显示屏等渠道，定时分享人工智能护理设备的应用案例，以此加强老年群体对人工智能护理服务的信任感。

（三）构建整合型社区 AI 护理服务体系，强化服务协同

通过社区平台，整合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机构以及志愿者等资源，建立智能监控、信息传递、专家分析、指导干预的全流程服务体系 [9]。人工智能装置所收集的健康数据会实时传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由专业护理人员开展评估与分析，针对异常状况及时实施应对措施；对需要进一步检查或者治疗的老年人，与社区或者更高层级的医院展开联动，保障快速转诊渠道的畅通；针对护理需求较大的老年人，联系养老机构安排上门护理服务。清晰界定护理人员在人工智能护理服务中的核心职责，帮助老年人掌握使用方式，担任数据分析咨询顾问，扮演情感支撑者的角色，填补技术在情感沟通方面的欠缺。加强社区护士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培训，以此提高他们的能力，包括设备运用、数据分析以及紧急状况处理等。

（四）完善政策保障机制，提升服务可及性

建议政府主管部门进一步强化对社区人工智能护理服务的扶持，把智能护理设备纳入适老化改造补助政策，同时为经济困难或者行动不便的高龄人员提供购置补助。制定人工智能护理服务的监管方案，清晰界定数据的收集、保存与运用流程，保障老年人信息的安全 [10]。鼓励高校和科研单位与社区开展协作，促进 AI 护理服务相关研究，把人工智能护理服务纳入社区养老服务站的评价体系，推动服务的规范化与常态化运作，真正构建智能技术帮助与情感关怀融合的创新养老模式。

参考文献

[1] 王艳玲，李红，张艳 . 人工智能在老年护理中的应用现状与展望 [J]. 中华护理杂志 ,2023,58(12):1489-1494.

[2] 陈静，孙玉梅，张振香 . 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互联网护理服务需求及影响因素 [J]. 中国护理管理 ,2024,24(03):365-370.

[3]Smith J,Johnson L,Williams K.AI-driven home-based care for older adults:A systematic review[J].Journal of Aging and Social Policy,2023,35(02):189-208.

[4] 王红，张海燕，李峥 . 人工智能在老年护理中的伦理问题及对策 [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23,36(06):678-682.

[5] 李娟，王艳，刘敏 . 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在老年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J]. 护理研究 ,2024,38(05):892-896.

[6]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EB/OL].(2021-10-22)[2026-05-27].https://www.nhc.gov.cn/lljks/（下转 144 页）

气象学课程思政融入路径与教学模式创新研究

姚　平*　王　妍　李娅琼

摘要：在高等教育课程思政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如何在专业课程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已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议题。气象学作为兼具理论性、实践性与应用性的基础学科，具有良好的思政育人基础。本文立足气象学课程特点，系统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构建知识、能力与价值三维课程目标，并将思政内容以模块化方式融入各章节教学中，使学生既夯实理论基础、培养专业能力，又强化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与生态文明理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情境—知识—价值”三层嵌入式教学框架，通过案例驱动、问题导向、跨学科融合、翻转课堂和可视化等教学模式创新，将现实问题引入课堂，以专业知识为逻辑主线，实现价值引领，为同类专业课程思政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气象学；课程思政；融入路径；教学模式

一、引言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1]。与传统思政课程不同，专业课程思政强调在学科知识体系中挖掘价值内涵，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气象学是研究地球大气中各种现象、状态及其演变规律并探讨如何利用这些规律为人类服务的科学[2]。作为一门兼具理论性、实践性与应用性的基础学科，它不仅是传授大气科学知识与技能的载体，更是培育学生科学思维、责任担当与价值追求的重要平台[3]。

在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背景下[4]，气象学的教学价值更显突出，其不仅要让学生掌握“观天识象”的专业本领，更要引导学生树立“防灾减灾为人民”的责任意识、“科技自强护家国”的使命担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然而，当前气象学教学中仍存在“重理论推导、轻人文浸润”，“重技能训练、轻价值引领”的倾向，思政元素挖掘浅表化、融入形式化等问题亟待解决[5]。因此，探索气象学课程思政融入路径与教学模式创新，是提升课程育人质量、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人才的必然要求。

二、气象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以“气象服务国家发展与人民福祉”为主线，构建将气象学知识与国家需求（如“双碳”目标、“防灾减灾”）、生态文明思想理念、科学精神（求真、严谨、创新）、社会责任（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相结合的课程思政体系。

为此，必须深度挖掘、提炼气象学课程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系统梳理各章节知识点中的思政切入点，结合学科发展历程、生态保护理念、

（上接 143 页）

c100158/202110/a871dfd3e1fd45b89e9af1f40e44ba12/files/1733127377368_21866.pdf.

[7] 赵静，刘则杨，张玲娟 . 老年跌倒风险智能评估系统的开发与应用 [J]. 中华护理杂志 ,2023,58(08):965-970.

[8] 李丽，王丽，刘静 . 城市社区老年人智能护理设备需求及影响因素 [J]. 护士进修杂志 ,2023,38(09):821-825.

[9]老年人失能预防运动干预临床实践指南(2023版)[EB/OL].(2025-11-26)[2026-07-01].http://www.medtranslation.cn/shengzhijiankang/2025/1126/250793.html.

[10] 刘化侠，吴丽娟，沈宁 . 老年护理学 [M].5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2.

（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医学院）

家国发展需求与行业使命担当，将科学精神、生态文明理念、责任意识等有机融入教学内容（见表 1）。

表 1　气象学课程思政各章节部分案例

知识模块	思政案例	思政元素	育人目标
第一章绪论	中国气象科学的发展史	优秀传统文化、尊重自然规律与潜心研究的科学态度	家国情怀、科学精神
第二章大气概述	温室气体与碳达峰和碳中和	生态文明思想、国家战略认知和大国担当、绿色发展与低碳理念	家国情怀、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第三章辐射	太阳辐射	自然辩证思想、生态文明理念、科学探索精神	科学精神、生态文明理念
第四章温度	逆温与空气污染事件	生态环保意识、自然辩证思想、社会责任与法治意识	家国情怀、社会责任
第五章大气中的水分	人工降雨	科技服务国家需求、弘扬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家国情怀、责任意识
第六章大气运动	大气环流、季风	自然辩证思想、科学探索精神	家国情怀、责任意识
第七章天气与气象灾害	气象灾害（极端天气）	国家需求，民生担当、制度优势与协作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	家国情怀、社会责任
第八章气候	气候资源	生态文明思想、人地协调观念、绿色发展理念、国情认知	科学精神、生态文明理念
第九章小气候	森林小气候	生态文明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系统辩证思维、科学探究精神	科学精神、生态文明理念

三、气象学课程思政融入路径

（一）课程目标

为提升课程思政实施效果，有必要对课程目标进行系统优化，将其构建为涵盖知识、能力与价值三个维度的目标体系。在知识层面，重点引导学生系统掌握气象学基本原理、天气与气候规律、气象观测技术、气象灾害防控基础。在能力层面，着力培养学生具备气象数据采集与分析、天气现象识别、气象灾害预警分析、将气象知识应用于解决农林生产与生态环境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价值层面，注重培养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使其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强化社会责任感与团队协作精神，提升人文素养、科学思维能力和国际视野，致力于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二）教学内容

将思政元素以模块化方式融入各章节教学内容中，实现专业知识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与有机统一。譬如在“绪论”中，通过融入我国气象文化遗产，如“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价值、“相风铜乌”等古代气象仪器的发明智慧，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与实践经验，进一步结合现代气象事业发展成就，引导学生认识我国气象科技的进步与贡献，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在“大气概述”部分，围绕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变化，重点讲解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及其气候效应，结合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引导学生理解气候变化的科学内涵与现实挑战，培育其全球视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在“气象灾害与防灾减灾”部分，引入西南地区干旱、河南暴雨等灾害案例，分析气象预警在灾害防控中的关键作用，阐释气象服务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再结合一线气象工作者在应对气象灾害中的实际事迹，引导学生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内涵，增强其服务国家需求与保障民生安全的责任担当。

（三）资源整合

为提升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可整合多元化教学资源，为课程提供系统化支撑。通过构建多层次资源体系，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协同推进。

注重挖掘与整理传统气象文化资源，如古代气象仪器、气象谚语、二十四节气等文化遗产，建立“气象文化思政素材库”。围绕现代气象科技发展，收集风云卫星、短临预报系统、雷达探测技术等自主创新成果，制作“气象科技成就案例集”。通过引入实践主体资源，邀请气象专家、基层气象工作者走进课堂，分享科研历程与一线工作感悟。此外，整合中国气象局官网公开数据、气象科技活动周宣传视频、全球气候治理政策解读等线上资源，拓展思政教育边界。

四、气象学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创新

本文构建“情境—知识—价值”三层嵌入式教学框架，将现实问题作为情境载体，以专业知识为逻辑主线，实现价值引导。

（一）案例驱动

在案例驱动教学设计中，“情境”引入学习任务，“知识”侧重气象学原理的讲解，“价值”通过讨论与反思实现内化，从而形成知识学习与价值引领协同的教学模式。

以“我国天气预报的发展”为例。教学中，通过 1954 年和 1998 年长江洪水、2023 年京津冀暴雨等真实灾情的展示，让学生感受天气预报对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随后，讲解手绘天气图、数值预报（GRAPES）以及人工智能气象预报的发展历程，引导学生理解气象预报的技术原理和创新方法。最后，回顾我国气象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历程，引导学生认识科技自立自强精神，以及“科技为民、创新报国”的理念，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二）问题导向式教学

在问题导向式教学中，课堂以气象学现实问题为中心，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与探究学习。以“温室气体与碳达峰碳中和”为例，构建全过程教学设计。

课前阶段，教师通过平台发布预习任务，引导学生查阅温室气体知识、全球气温变化趋势及“双碳”战略政策文件，并提出“全球变暖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启发初步认知。

课中阶段，首先，讲解碳循环与气象要素的关系，夯实专业知识基础；随后，学生分组讨论温室气体的类

型与来源、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等。教师适时点评，将学生观点与国家“双碳”政策相结合，引导学生从气象学视角理解国家战略需求，培养其对生态文明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同感。

课后阶段，布置拓展任务（如撰写碳捕集、氢能源等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潜在作用的小论文），并通过线上讨论或学习反馈收集学生认知变化信息，实现教学效果的持续改进。

通过“课前引导、课中探究、课后拓展”的设计，能有效深化知识理解，帮助学生在真实问题中实现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协同统一。

（三）跨学科融合

引入跨学科融合的思路，把气象学与生态学、环境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拓展学生的认知视角并提升分析能力。譬如，在讲解极端天气时，不仅讲解基本概念和原理，还引导学生结合实际开展综合分析，如探讨干旱与洪水等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强降水引发的水土流失、气候变化对农产品供给与市场价格的影响及热浪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等。跨学科探讨有助于学生全面理解气象因素在生态环境和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深化对气象学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实际价值的认识。

（四）翻转课堂与自主学习

“情境—知识—价值”教学框架可结合翻转课堂模式，将课前基础学习与课堂情境分析、价值引领相融合。以“台风”教学为例，在课前，教师可依托微课视频、在线资源或相关文献，引导学生自主了解近期台风的发生情况、基本特征及其危害。在课堂中，基于真实案例，组织学生围绕“台风形成与发展机理”“气象预警系统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展开讨论，教师同步引导其思考气象科技应用的社会价值与伦理问题。课后，通过线上探讨与撰写《气象灾害预警系统在保障民生中的作用》分析报告，促进学生对专业知识与价值认知的内化。

总体来看，此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也能增强其服务国家需求与保障民生安全的责任意识。

（五）数据驱动与可视化教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气象学教学可引入气象大数据和可视化工具直观呈现抽象的气象现象，增强价值引领的现实感。在天气系统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历史数据和可视化软件模拟副热带高压的变化对我国雨带分布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降水异常对交通、农业、城市基础设施等的影响，并讨论科学预测在保障公众生产与生活中的现实价值，从而实现知识学习与社会责任感的有机结合。

五、气象学课程评价方式创新

为保障气象学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有必要构建“知识—能力—价值”三维教学评价体系，对学生的学习成效进行考查。其中，知识维度侧重学生对基础理论与专业内容的理解与掌握；能力维度关注其问题分析与实践应用能力；价值维度则考查学生家国情怀、生态文明理念、科学思维、社会责任感、团队精神等方面的培育。

在具体评价方式上，可采用全过程评价方式。对学生课堂参与情况进行记录，包括参与课堂讨论、小组汇报及问题探究等表现，了解他们学习的投入与思维的活跃程度。通过结果性评价对学习成果进行综合考查，主要形式包括课程论文与案例分析报告，考查学生运用气象学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及逻辑表达水平。同时，还需要将价值认同与社会责任意识也纳入评价体系。

六、结语

气象学课程思政建设应立足学科特点，结合时代发展需求，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促进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通过探索和完善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与教学模式，使学生在掌握气象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能够增强价值认同，逐步成长为具备扎实专业基础、良好道德素养和家国情怀的新时代人才。未来研究可结合具体教学实践，引入量化评价方法，对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进行系统分析与评估，并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和完善，从而推动气象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20-05-28)[2026-04-16].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 严菊芳, 刘淑明 .气象学 [M]. 北京 : 中国林业出版社 , 2023:1-2.

[3]陈樟.动力气象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及教学策略[J].大学教育,2025(22):92-95,100.

[4] 董林 , 贾莉 , 王月冬 , 等 .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的新特征与防御技术对策 [J].中国工程科学 ,2026,28(02):275-286.

[5] 杨舒畅 , 王美莲 , 邵东华 , 等 . 农业院校强化气象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探索 [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25,40(05):37-4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西南林业大学 2023 年教育科学研究“立德树人背景下林业院校气象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YB202336）。

（作者：通信作者姚平，西南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讲师；王妍，西南林业大学水土保持学院教授；李娅琼，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族职业高级中学高级讲师）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机制研究

杨　结

摘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立德树人理论、体验式学习理论为核心理论支撑，立足湖南省医药类高职院校办学特色与育人实际，结合实地走访、问卷摸排、师生访谈等调研成果，系统剖析新时代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开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深挖问题背后的育人理念、课程设计、协同联动等深层成因。研究紧扣中医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重点从组织运行机制、内容供给机制、资源整合机制、保障支撑机制四个核心维度出发，搭建起体系完整、逻辑严密、落地有效且契合高职办学定位的实践教学全新机制。

关键词：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机制构建

一、新时代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理论依据与现实意义

（一）理论依据

1.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遵循，决定了实践教学在思政课体系中的基础性、关键性地位。

2.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明确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新时代高职教育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必须坚持德技并修、工学结合，把职业道德、工匠精神、家国情怀融入实践教学全过程，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有机统一。

3. 体验式学习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体验式学习理论强调“情境—体验—反思—应用”的闭环学习过程，契合高职学生形象思维强、动手意愿强、实践参与度高的学习特点。思政课实践教学通过创设真实场景、组织参与式活动，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理解理论、认同价值、提升素养，比单纯课堂讲授更具感染力与实效性。

4. 协同育人与“大思政课”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要求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协同育人理论强调校内各部门、校内外各主体之间联动配合，形成育人合力[1]。新时代思政课实践教学不能仅依靠马克思主义学院单打独斗，必须推动教学管理、学生工作、团委、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单位协同参与，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

（二）现实意义

1. 破解思政课教学实效性不足的现实需要

当前部分高职思政课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讲授、轻体验”的问题，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专业学习、职业发展脱节，导致学生获得感不强、参与热情不高[2]。全面强化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构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育人体系，成为破解当前思政教学困境、提升育人质量的核心抓手与现实需要。强化实践教学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思政课理论与实践相互割裂的壁垒，跳出单一课堂讲授的局限，将抽象晦涩的思政理论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践行的具体场景与实际行为，让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鲜活生动、通俗易懂。

2. 落实高职教育德技并修培养目标的必然要求

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要使命，不仅要提升学生专业技能，更要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政课实践教学可以将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法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工匠精神培育与专业实践、岗位见习、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推动学生做到技能过硬与品德高尚相统一。通过贴合学生生活、对接专业学习、聚焦职业发展的实践教学设计，能够让思政价值引领融入学生成长全过程，推动思政教育生活化、具

象化、职业化，全方位提升高职思政课的课堂吸引力、思想感染力和教学针对性，真正实现以思政育人铸魂、以实践赋能成长的核心育人目标。

3.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成长成才的重要路径

新时代高职学生思想活跃、个性鲜明、注重自我体验，但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有待提升。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接触社会、了解国情、服务群众、锻炼能力的平台，有助于增强社会责任感、提升沟通协作能力、培育创新精神、锤炼意志品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更好适应社会与职业发展需求。

4. 提升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整体水平的关键举措

思政课实践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实践教学机制，能够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推动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劳动教育协同发力，丰富思想政治工作载体，提升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二、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机制构建

新时代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机制是一个由多要素、多环节、多主体构成的有机系统，核心是构建组织运行、内容供给、资源整合、保障支撑“四位一体”闭环运行的长效机制[3]，确保实践教学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推进。

（一）构建统筹协同、权责清晰的组织运行机制

组织运行机制是实践教学顺利开展的前提，核心是破解“单打独斗”的困境，形成校级统筹、部门协同、院部主责、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

1. 健全校级统筹领导机制

成立由学校党委书记、校长任双组长，分管思政教学与学生工作的副校长任副组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务处、学生处、团委、财务处、安全管理处、各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处负责人为成员的思政课实践教学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实践教学规划、制度建设、经费保障、重大活动安排等重要事项，统筹协调解决实践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把实践教学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与教学工作重点。

2. 明确部门协同分工机制

建立“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协同配合”的工作体系。马克思主义学院统筹牵头，全面承担实践教学方案编制、课程体系搭建、师资能力培训、课堂落地开展与思想理论指引等核心工作；教务处严格把控教学流程，做好实践学分核定、教学规划审议与全程质量督查；学生处、团委侧重统筹校园实训、校外实践、志愿公益及劳动教育相关活动组织。各方清晰划分权责范围，规范互通协作流程，凝聚起各司其职、联动互通、紧密协作的育人工作合力[4]。

3. 完善全流程规范运行机制

规范实践教学计划制定、方案设计、组织实施、过程管理、总结反思、成果运用全流程。每学期初由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相关部门统筹研讨，敲定实践教学年度规划与学期实施方案，清晰划定实践主题、活动形式、时段排布、负责人员及安全准则。正式开展实践活动前，集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细则方案讲解与人员任务划分，层层压实各项工作要求，以标准化流程管控推动实践教学闭环运转，切实提升日常管理的规范性与实效性。

（二）构建德技并修、特色鲜明的内容供给机制

内容供给机制是实践教学的核心，关键是立足高职特点、贴合学生需求、融入专业特色，构建分层分类、系统科学、时代性强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

1. 坚持价值引领，构建分层内容体系

按照“基础层—提高层—创新层”分层搭建系统化实践内容体系。基础层面向全体在校学生广泛开展普及式实践育人工作，紧紧围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与劳动教育五大核心内容深耕发力。结合课堂实操训练、校园日常历练、各类主题宣讲教育多元载体常态化组织活动，全方位筑牢学生思想认知根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锤炼道德品行，稳步培育积极向上、崇德向善的综合素养。

2. 突出高职特色，强化专业融合

结合医药类高职院校特点，重点打造“思政+医药”特色实践内容：一是融入“大医精诚”精神，开展医德医风、医药诚信、职业责任教育；二是结合药品经营、护理、药学、食品检测等专业，开展医药科普宣传、社区健康服务、药企观摩见习、食品安全宣传等实践活动；三是把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融入实践教学，邀请行业劳模、技术能手开展讲座、交流，引导学生崇尚技能、精益求精。针对不同专业设计差异化实践内容，实现“一专业一特色、一实践一主题”。

3. 紧扣时代主题，丰富实践内容类型

围绕新时代重大主题，设计三大类实践内容：一是理论内化类，开展课堂辩论、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红色故事宣讲、理论知识竞赛等，深化理论理解；二是价值引领类，开展红色研学、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等，坚定理想信念；三是职业素养类，开展职业礼仪训练、职业道德讨论、行业规范学习、职业规划实践等，提升职业能力。

（三）构建多元开放、共建共享的资源整合机制

资源整合机制是实践教学的支撑，重点是整合校内、校外、线上、线下资源，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实践育人资源体系。

1. 深挖校内实践资源

充分激活校园内部各类育人场域，深挖空间育人

价值。一是盘活校史馆、图书馆、党建活动室、思政教育活动室等文化阵地，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理论研学、育人成果展示等活动，厚植思想底蕴。二是立足专业实训室与校内外实训基地，推动专业技能实训和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做到知行协同培育。三是借助校园文化氛围，依托文化节、主题团日、社团特色活动载体，沉浸式开展思政实践教育。四是打造专属劳动教育基地，设置常态化志愿服务岗位，搭建稳固实践阵地，全方位拓宽校内思政实践渠道。

2. 拓展校外实践基地资源

着力构建红色教育基地、社会服务基地、校企实践基地三位一体的校外实践基地体系。共建红色教育阵地，联动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组织实地研学活动，厚植理想信念与家国情怀。打造社会服务平台，携手城乡社区、乡村基层及各类公益组织，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社会调研、科普宣讲等实践项目，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搭建校企实践载体，依托合作企业与实习单位，打造思政教育与专业实训相融的实践场地，聘请行业企业导师现场授课指导，打通校企育人链路，形成多方联动、协同共育的校外实践育人格局。

3. 整合数字网络资源

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建设线上实践教学资源平台：一是利用“学习强国”、全国高校思政课网络平台、红色云展厅、VR 虚拟实践平台，开展线上研学、虚拟体验、云端参观[5]；二是运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直播平台，开展微实践、微宣讲、微展示，打造“指尖上的思政实践课堂”；三是建设实践教学资源库，收集实践案例、活动方案、视频资料、优秀成果，为实践教学提供资源支持。

（四）构建稳定可靠、支撑有力的保障支撑机制

保障支撑机制是实践教学长效运行的基础，重点从制度、经费、师资、安全四个方面强化支撑，为实践教学提供坚实支撑。

1. 制度保障

不断健全完善实践教学制度体系，统筹制定多项配套管理文件。相继出台《思政课实践教学管理规定》《实践教学学分认定办法》《实践教学安全管理办法》《实践教学经费使用管理细则》《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办法》等规章制度，全方位制定实践教学准则。清晰界定教学目标、授课内容、活动形式、组织流程、日常管理、考核评价与奖惩激励等各项规范标准，从制度层面压实各环节责任。以标准化规章约束教学全过程，推动思政实践教学依规开展、有序推进，保障育人工作规范化、长效化落地实施。

2. 经费保障

专门设立思政课实践教学专项经费，将其正式纳入学校年度财政预算范畴，严格依照生均核定标准足额拨付，切实筑牢资金保障基础。经费使用有着清晰明确的投向，主要用于校外实践基地提质建设、师生外出实践交通开支、活动物料与实验耗材采购、授课教师能力培训、行业专家专题讲学以及优秀师生表彰奖励等方面。

3. 师资保障

一是加强思政教师实践能力培养，建立教师社会实践、企业调研、研修培训制度，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实践教学能力提升培训，鼓励教师深入行业企业、基层一线开展调研与实践；二是完善实践教学工作量认定机制，将实践教学设计、组织、指导计入教学工作量，在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中予以倾斜；三是加强团队建设，组建实践教学创新团队，开展教学研究与项目攻关，提升教师实践教学整体水平。

三、结语

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德技并修技术技能人才的战略性工程。当前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本质上是系统化运行机制缺失的问题。只有构建统筹协同的组织运行机制、德技并修的内容供给机制、多元共享的资源整合机制、稳定有力的保障支撑机制、科学高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才能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从“活动化”走向“体系化”，从“形式化”走向“实效化”，从“阶段性”走向“常态化”。

参考文献

[1] 茶世俊，梁娜，靳伟，等. 区县教师教育新体系协同机制的理论构建——以协同学为理论视角 [J]. 教育学术月刊，2021(05):42-50.

[2] 马晓燕. 基于实践体验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探究 [J]. 思想理论教育，2019(02):107-111.

[3] 胡建兰. 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现状及提升路径 [J]. 文化软实力研究，2018(05):32-39.

[4] 石书臣. 以问题导向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的思考 [J]. 思想理论教育，2020(05):24-29.

[5] 孙旭，陈毅. 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 [J]. 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理论学习），2019(10):33-3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资助项目“新时代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现状及培育机制研究”(24A171);2024-2025 年度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科研规划课题“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机制研究”(XH2024300)。

（作者单位：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民办高校“思政大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的模式与路径研究

肖欣怡

摘要：“大思政课”建设强调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突出实践导向、协同导向和育人导向。民办高校推动“思政大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不只是思政课教学方式的改变，更是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办学特色塑造、立德树人实效的提升。目前，部分民办高校推进两类课堂融合时还存在着理念统整不够、资源转化不深、协同机制不强、评价闭环不完整等问题。根据民办高校办学机制灵活、贴近区域产业、校企合作基础好等特点，提出构建目标同向、内容联动、场域贯通、主体协同、评价闭环的融合模式，从课程体系重构、社会资源整合、实践项目设计、师资协同培养、制度保障优化五个方面提出实施路径，为民办高校提升“大思政课”建设质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民办高校；思政大课堂；社会大课堂；融合模式；实施路径

民办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大高等教育供给、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大思政课”建设的不断推进，单纯依靠传统课堂灌输的育人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成长的需要[1]。民办高校学生来源更加多元，就业导向更加明显，办学资源统筹方式也更具灵活性和社会关联性。这就决定了民办高校思政教育要守住课堂主阵地，又要主动面向社会现实、行业场景和基层治理，把书本中的理论、社会中的问题、学生的成长体验有效贯通起来。因此，推动“思政大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民办高校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现实命题[2]。

一、民办高校推进“两类大课堂”融合的现实逻辑

所谓“思政大课堂”，并不是对思政理论课课堂的简单放大，而是以思政课教学为主干，把课程思政、校园文化、网络思政、日常管理与实践教学等育人环节统筹起来形成的校内综合育人场域；“社会大课堂”则是把社会生活、基层治理、红色场馆、行业企业、志愿服务、创新创业实践等社会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理解理论、辨析问题、形成认同。二者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而是校内育人和社会育人的有机衔接[3]。前者解决理论武装、价值引导、认知建构的问题，后者解决情境体验、实践检验、价值内化的问题。只有把两类课堂贯通起来，思政教育才能从“讲道理”走向“懂道理、信道理、践道理”[4]。

对民办高校而言，推进两类大课堂融合有三重现实意义。第一，有利于破解思政教育与学生现实经验相脱离的问题。民办高校学生更看重职业发展、社会竞争、个人成长，如果课堂内容停留在概念层面，容易造成“听得懂但感受不深、记得住但转化不强”的局面。把“社会大课堂”引入“思政大课堂”，可以将国家发展、行业变革、基层治理、企业实践等转化为鲜活的教学案例，使理论阐释更加贴近现实社会与学生认知实际[5]。第二，有利于把民办高校办学特色转化为育人优势。许多民办高校在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有较好的基础，为思政课与专业实践、就业教育、社会服务融合创造了天然条件。第三，有利于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合力。思政教育不是思政课教师单打独斗，需要学校管理部门、专业教师、辅导员、行业导师、社会机构共同参与。两类大课堂融合本质上就是把零散的育人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形成更具协同性的育人格局[6-7]。

二、民办高校“两类大课堂”融合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理念上重实践轻统整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学校虽然组织了参观研学、志愿服务、社会调查等活动，但是更多地停留在活动的叠加上，没有形成一个从课堂讲授、议题导入、社会实践、成果反思、价值提升的链条。“思政大课堂”和“社会大课堂”之间仍然

存在“两张皮”现象，课堂讲授重知识传递，社会实践重过程参与，中间缺少稳定的议题设计和价值统摄。

第二，资源层面的“有资源缺课程化”问题比较突出。一些民办高校周边不缺少红色资源、产业园区、社区平台、企业基地，但是能够转化为教学方案、考核评价、可持续实施的课程资源很少。部分学校开展实践教学依靠临时联系、阶段性安排，实践主题分散，组织成本高，不能形成持续性、品牌化项目。

第三，主体协同不足。一些思政课教师熟悉理论阐释，但是不一定熟悉行业实践和场景组织；一些专业教师掌握专业知识和产业实情，但是思政育人意识和方法不够；辅导员贴近学生，但是在课程化设计和学理提升方面存在短板；一些校外导师参与热情不稳定。不同主体之间职责边界不清、沟通渠道不畅，造成融合推进依靠个别教师或者学院推动，不能实现常态化。

第四，评价机制薄弱。目前一些民办高校更重视实践活动“有没有开展”，对活动质量、学生获得感、价值认同变化、成果转化情况缺少有效评估。部分考核仍然以签到记录、心得、照片等过程性材料为主，不能准确反映学生在认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的真实提升，也不能反向推动课程设计的优化。

第五，学生需求识别不准。民办高校学生在专业背景、成长经历、就业期望、社会参与兴趣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仍然以统一的主题、统一的任务推进融合教学，容易造成部分学生参与热情不高、实践体验浅表化的问题，影响育人针对性[8]。

三、民办高校“两类大课堂”融合的基本模式

根据民办高校办学实际，可以构建出“目标同向、内容联动、场域贯通、主体协同、评价闭环”的融合模式。

所谓目标同向，就是把立德树人作为共同目标，把价值引领、能力培养、人格塑造统一起来。“思政大课堂”负责夯实理论基础、锚定价值坐标，“社会大课堂”提供真实情境、实践检验，二者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形成共同发力方向。

内容联动就是围绕学生成长中的真实问题组织教学内容，而不是把课堂理论与社会实践机械拼接。可以围绕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基层治理、劳动教育、就业创业、生态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主题，形成理论讲授、案例解析、场景体验、任务反思的内容链条，把社会议题作为课堂深化的入口，把课堂理论作为实践分析的方法。

所谓场域贯通，就是打破思政课只发生在教室内部的空间限制，形成课堂、校园、网络、社区、企业、场馆相互衔接的复合育人场域。“思政大课堂”要向学生熟悉的日常生活和专业学习场景延伸，“社会大课堂”也要经过教学化改造后再进入课堂，不能停留在一次性参观层面。

所谓主体协同，就是建立校内外共同参与的育人共同体。学校党委要发挥统筹作用，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课程主导，二级学院负责专业融入，学工系统负责组织衔接，校外基地和行业导师负责实践支持，最终形成分工明确、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

所谓评价闭环，就是把学生在融合过程中参与的表现、问题分析、实践成果、反思能力、价值认同等纳入综合评价之中，将评价结果反向用于课程迭代、基地遴选、项目优化。只有形成设计、实施、评价、改进的闭环，融合模式才具有可持续性。

四、民办高校推进“两类大课堂”融合的实施路径

（一）以议题化重构课程链条，增强融合的教学牵引力

民办高校要打破传统思政课程和实践活动相脱离的推进模式，冲破长久以来存在的惯性做法，以现实社会问题为切入口，对课程内容和形式实施全面地重新塑造。在每学期的教学计划中，要按照课程章节的逻辑关系以及学校自身办学定位，精心设计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教育价值的主题模块，比如区域产业发展与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基层社区治理与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红色文化传承与青年理想信念的塑造、劳动教育实践与个人责任担当等。每一个主题模块下面还要将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实地调研、成果展示等活动综合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教学单元。因此，这样设计可以保证思想政治课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也可以把广阔的社会实践作为贯穿课程的主线，有效地避免课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活动化、表面化、碎片化的倾向，真正达到理论联系实际、课堂内外融通的效果。

（二）以地方化整合社会资源，增强融合的场景支撑力

民办高校应该充分利用和挖掘所在地的特色资源条件，创建起多层次、多类别的“社会大课堂”资源体系。对红色资源重点打造以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优秀文化传承为主的实践教育基地，在社区资源上紧密对接基层社会治理、志愿服务行动、普法宣传教育、民生状况调研等系列实践项目，在企业资源上主要围绕工匠精神培育、职业伦理建设、创新创业训练、劳动教育实践等几个方面开展教学合作。学校要努力把外部社会资源由原来的“可参观场所”转变为“可教学场景”，对实践教学主题、具体教学目标、任务实施要求、效果评价方式等展开系统化、标准化的设计，从而明显提高资源利用的实际效果，进一步加强其与教学需求的契合度。

（三）以项目化组织实践任务提高融合的学生参与度

民办高校学生对参与式、任务式、成果导向式学

习的接受度较高，因此在融合过程中要加大项目化设计的力度。教师可以按照提出问题、进入场景、完成任务、展示成果、反思提升的逻辑来组织学习，开展社区调研报告、企业访谈、红色场馆讲解词撰写、志愿服务方案设计、短视频思政作品制作等。通过让学生带着问题走向社会、带着材料返回课堂、带着思考完成表达，使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建构者。

除此之外，融合推进还要重视网络空间的再组织。对民办高校学生来说，短视频平台、校园微信公众号、线上课程平台、班级社群都是学生接受信息、表达态度、形成认同的重要场域。学校可以将社会实践素材转化为微案例、微视频、微讨论、线上展示任务，形成“线下实践采集—线上资源沉淀—课堂再度阐释”的链式机制，使一次实践活动沉淀为可重复使用、可持续传播的思政资源，进一步提升“社会大课堂”的育人效应。

（四）以双师化提升育人能力，提高融合的协同实效

融合并非仅仅简单地在教学过程中增加实践环节，而是对教师能力结构提出全面、深层次的要求。民办高校要努力创建起一种包含思政课教师、专业教师、辅导员和校外导师在内的“双师多元”协同育人机制，从而达到教育合力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要不断加强自己的议题设计能力、项目组织能力和社会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能力，使思政教育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另一方面，专业教师也要进一步增强课程思政的意识，积极寻找把专业知识教学与价值引领有效结合的方法，在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为此学校可以采取组织跨学科联合备课、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题培训、推进教学案例共建共享、安排教师到实践基地参加研修等方式，系统性地提高各个育人主体的协同能力和整体素养，从根本上解决以往工作中出现的各自为战、互相脱节的问题，真正形成育人的合力。

（五）以制度化完善保障体系，提高融合的持续推进力

要使两类大课堂融合真正落地，必须有稳定的制度支撑。学校应在人才培养方案、思政课实施方案、实践教学管理办法、教师考核制度中明确融合要求，把实践教学学时、项目成果、基地建设、协同育人成效纳入年度考核。对优秀实践项目、典型案例、课程成果进行制度化推广，逐步形成“一校一品”“一院一特色”的融合品牌。同时还要完善经费保障、安全预案、过程监督、成果认定等机制，为融合常态化开展提供可持续的支持。

此外，应建立一个把学生反馈和毕业跟踪结合起来的质量与效果观察机制，该机制要对学生的职业伦理、社会责任、公共参与、家国情怀等各方面持续发展的动态变化进行全方位、细致的考察。要深刻认识到，融合教育的效果不能简单地看活动数量的增加、形式的叠加，而应该看学生内在素养的实质提高、行为的积极改变。因此，要着力推进民办高校“大思政课”建设实现从只注重“做过”一些活动到重视“做好”育人工作、保证育人实效的根本性转变，使思政教育融入学生成长全过程并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9]。

五、结语

民办高校“思政大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融合不是对原有思政课教学的局部修补，而是“大思政课”建设要求下对育人方式、资源配置、组织机制的系统重塑。民办高校这项工作既要坚持思政课的政治性、理论性、方向性，又要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性、开放性、社会性。只有把课堂中的理论引导、校园中的文化浸润、社会中的真实实践、多主体协同机制有效衔接起来，才能把“思政大课堂”真正建成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育人平台，把“社会大课堂”真正转化为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空间，进而不断提升民办高校立德树人的整体质效。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J]. 求是 ,2020(17):4-16.

[2] 教育部等十部门 . 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EB/OL].(2022-08-18)[2026-05-26].https://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772/202208/t20220818_653672.html.

[3] 王娜 , 韩喜平 . 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相结合 [N]. 光明日报 ,2019-10-25(06).

[4] 韩喜平 , 王晓阳 . 论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结合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9(10):68-71.

[5] 何益忠 . 论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10):71-75.

[6] 吴增礼 , 李亚芹 .“大思政课”视域下“社会大课堂”的多维阐释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12):73-78.

[7] 孙秀玲 , 郭倩倩 . 论“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效衔接 [J]. 教学与研究 ,2023,71(09):113-120.

[8] 朱思慧 , 赵宝新 .“大思政课”背景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现状及对策——基于对调查问卷的分析 [J]. 科教导刊 ,2023(31):122-125.

[9] 黄钟贤 , 程俊文 . 高职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效果提升路径研究 [J]. 科教导刊 ,2025(26):43-4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武汉文理学院 2025 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思政大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的模式与路径研究”（2025JGZK10）。

（作者单位：武汉文理学院）

城市文化助力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赵　霞　涂晓洁

摘要：城市文化是地域历史积淀、空间符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兼具具象化、生活化、沉浸式的育人特质，为新时代思政课教学创新提供了可感知、可转化、可深耕的优质育人资源。立足“大思政课”开门办课、实践育人的核心导向，本文系统阐释城市文化融入思政课的内在逻辑，梳理城市文化资源多元性、叙事层次性、空间可及性、评价可追踪性的天然育人优势，针对当前文化融课浅表化、素材堆砌化、价值转化断层等现实问题，构建“资源系统整合、情境深度转化、体验模式重构、评价机制优化”四位一体的实践路径。通过盘活在地城市文化资源、重构情境育人体系、创新具身体验课堂、完善全过程多元评价，推动城市文化从外在教学素材转化为思政课价值引领的内生动力，助力学生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的协同生成，为思政课生活化、在地化、内涵式改革提供可落地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城市文化；思政课；情境教学；文化认同；价值引导

城市是承载地域文脉、孕育精神价值、涵养时代品格的鲜活载体，每一座城市在历史演进与时代发展中积淀形成独特的精神气质，依托历史街区、地标建筑、红色遗址、名人事迹、民俗风貌、城市治理实践等多元载体，构建起有温度、有记忆、有内涵的在地文化体系，成为思政教育扎根现实、贴近生活、浸润心灵的优质场域。《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明确提出，思政课要通过真实情境的创设和活动的体验，使学生由知识的获得走向价值的认同。城市文化融入思政课堂并非将本土案例简单罗列，而是经过从素材选择、情境建构到价值内化的系统转化。目前，该转化过程在实践上还存在一定的结构断层，相关的研究也需要更加细化、深入。基于此，本文立足逻辑机理、现实优势、实践路径三维视角，系统探究城市文化赋能思政课提质增效的实施框架，为新时代思政课依托在地文化资源实现守正创新提供实操参考。

一、城市文化融入思政课的逻辑基础

（一）城市文化的核心内涵与育人底蕴

城市文化不是单纯的物质遗存，它是历史积淀、空间符号和精神特质这三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从历史积淀上看，城市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社会变革、人物活动等，形成了时间上的集体记忆。从空间符号上看，街道格局、纪念场馆、红色遗址、工业遗产等成为可以触摸的文化载体，把历史具体化为可以感知的物质形态。从精神特质上看，城市长久形成的地域气质，即革命精神、工匠传统、海纳百川的开放性等，是文化最本质的内核，也是价值引领的源泉。

城市文化融入思政课的核心育人价值，在于把宏大的国家叙事锚定在学生可以触及的生活场域上。历史不再只是存在于教材上的内容，当它以当地街道的名字、建筑的轮廓或者口头流传的方式出现的时候，学生对它的认知距离就会变短，价值认同的心理门槛也会随之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文化给思政课提供的是具有具象化作用的素材，而不是简单的补充[1]。

（二）思政课程的育人目标与价值导向

2022 年版《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明确将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人格、责任意识确立为核心育人目标，其中政治认同与责任意识是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核心导向。新时代思政课的价值引导功能要求教学不能停留在知识的陈述性传递上，而应该触动学生的情感结构和价值取向，在认知上认识制度，在情感上认同文化，在行为上践行价值。该目标决定了思政课教学的底层逻辑就是情感卷入和价值内化，而不是单向灌输[2]。

城市文化资源在这个目标体系里有内在的契合度。城市历史叙事能激起情感共鸣，城市空间符号能给予价值体验的现实依托，城市精神传统能为政治认同赋予文化根基。思政课正是需要这样的具有情感厚度和认知深度的育人媒介，城市文化因此具有了从素材转化为主导的教学资源的可能性。

（三）文化融课的内在转化机制

城市文化进入思政课堂要经过三个层次的转化机制。情境转化是基础，教师把城市文化要素转化为课

堂情境，使学生在具体的场景中感受历史，在具体的情境中认识价值问题。案例嵌入属于中间环节，从众多文化案例中挑选出与课程核心概念高度契合的案例，将其融入教学论证链条当中，让城市故事成为价值论证的现实支撑，而不是课堂上的装饰性材料。体验生成属于深层机制，借助参访、田野调查、项目式探究等途径，使学生亲身参与文化现场，产生具有身体层面的体验，促使知识认同转变成情感认同[3]。

二、城市文化助力思政课教学的资源优势与实践契机

（一）城市文化资源多元丰富，支撑课程结构化素材整合

城市文化资源种类繁多、层次分明，给思政课构建结构化的素材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革命遗址、工业遗产、城市建筑、街区格局、地方人物故事等不同的文化载体，分别对应着历史认知、劳动精神、法治意识、家国情怀等各个思政课程的核心议题，主题覆盖面广，选择弹性大[4]。

（二）叙事结构层级递进，适配情境深度教学转化

城市文化本身就存在着事实层、意义层和价值层三者叠加的叙事结构，正好符合情境教学由浅入深的认知规律。历史事件可以还原出具体的事实，历史行动者的价值选择可以辨析出意义的张力，城市精神的当代延续可以给价值参照提供依据。多层叙事结构使得城市文化案例可以支撑起从历史事实还原、价值冲突辨析、当代意义建构这三者之间的递进式问题设计，而一般素材直接从事实跳到结论的逻辑跨越过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给教师进行深度的情境教学、引导学生自主完成价值论证提供了一个天然的思维脚手架。

（三）实体空间触手可及，拓展具身体验育人场域

城市文化相比远距离的历史叙述而言，有着空间接近、直观可感的明显特点。纪念馆、历史街区、文化园区等城市文化场所属于学生日常生活半径内能够到达的体验空间，具有开展城市参访、田野调查、项目式探究的现实条件。地理可及性让思政课堂真正走入城市空间之中，学生可以借助实地考察、访谈、信息搜集等手段，把感官体验转变为认知建构的预备材料[5]。

（四）价值生成轨迹可视，赋能过程性评价创新

城市文化融入思政课的价值生成过程具有可观察、可记录的特点，给过程性评价创新提供操作基础。学生在参访日志、项目报告、课堂讨论中对于城市文化要素的运用方式、论证逻辑的完整性、价值立场的形成过程都可以成为可以分析的文本证据。与抽象的价值观评价相比，用城市文化为媒介的评价任务，比如设计城市精神当代表达方案、撰写城市治理政策建议等，具有情境真实性、思维可见性等特点，使评价由知识再现变为论证过程的考查，从而让教师可以依据价值生成的真实信号不断改进教学设计。

三、城市文化助力思政课教学的实践路径

（一）系统资源整合建设，构建主题化文化素材库

素材库的组织可以按照主题模块进行展开，革命历史类模块对应政治认同和家国情怀目标，城市工业和劳动传统类模块对应劳动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教育，城市空间规划和治理类模块对应法治意识和公民参与议题，多元文化交融类模块对应开放包容和文化自信目标。各个模块内部按照教学层次进行分层，分为适合情境导入的轻量素材和适合深度探究的厚重素材，供不同的课型使用。学校层面可以组建教研团队定期更新迭代，形成校本化的活态资源库，避免素材陈旧、课程脱离实际。

从技术实现角度来说，素材库的创建可以利用校本知识管理平台，用标签体系来达成跨模块检索的目的，同一个城市文化事件可以同时挂载“历史类”“法治类”等许多标签，教师可以按照不同的课时需求自由选取，不会受到单一分类框架的限制。部分城市已经建立起了数字博物馆、地方志数字化项目等公共资源，可以成为素材库的外部链接来源，在充实素材库的同时也降低了教研团队整理素材的成本。素材库的建设应该成为教研共同体的一项长期工作，而不能把它看作一次性的工程——每个学期由备课组对调用次数较少的板块进行审视并加以充实，保证资源库一直跟上课程改革的步伐。

（二）情境教学深度转化，推动文化叙事向价值论证升级

把城市文化由展示性的素材转变为价值引领的论证手段，核心之处在于打通文化叙述同价值推演之间的思辨途径。教师在设计城市文化案例的时候，要清楚地区分出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在两者之间设置供学生探究的问题节点，而不能直接得出价值结论。

以城市红色纪念场馆的课堂使用为例，可以设计出三层递进的情境任务。历史事实还原层让学生整理出事件的时间线和历史背景，形成基本的历史认识；价值冲突辨析层提出开放性的问题，让学生去探究历史行动者在特定的环境中所作出的选择逻辑，感受价值的张力；当代迁移层让学生讨论历史精神在当下的表达方式，实现从历史认识向当代价值认同的思维跃迁。三层结构把城市文化案例从例证的附庸变成学生自己建构价值判断的思维脚手架。情境任务越深，文化转化就越深，价值引导也就越能进入学生的思维结构。

情境设计要考虑到问题的梯度性。面向价值结论的问题过于直接，学生容易产生预期答案的意识，从而迎合而不是思考，完全开放的问题又会导致讨论偏

离价值轨道。较为有效的做法就是设置对比情境，把同一城市事件的不同历史解读并置出来，或者把历史处境和当代类比情境配对，让学生在比较中主动去寻找价值坐标。此类问题的设计可以在不给出答案的情况下，把学生的思维引向课程的核心价值，情境转化既有开放性又有方向性。

（三）体验课堂模式重构，以具身参与激活文化认同

为了解决学生体验缺失的问题，思政课堂要冲破物理界限，把城市本身当作教学场域。城市参访属于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教师事先制订出结构化的观察任务清单，学生在实地参访时按照任务线索去观察、记录并思考，把感性印象变成问题意识。参访结束后进行课堂研讨，把现场体验同课程概念联系起来，把具身感知转变为概念理解的前置经验。

项目式探究也是另外一条可行的道路。以城市历史街区保护与更新、城市名人精神当代价值等为话题，设计出一个持续的小组探究项目，在资料搜集、田野调查、成果展示的全过程中，学生慢慢体会到城市文化，并且产生情感上的认同。项目式学习的关键之处在于议题的真实性以及开放性，议题应当与城市当下真实的状况相关联，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可以接触到观点的分歧和价值的张力，而不是仅仅去证实已有的结论。在这一类探究中，学生对于城市文化的认同不是被告知的，而是通过思辨和体验交织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产生的。

无论是参访还是项目探究，体验活动的育人价值能否得到充分转化，就看活动前的设计和活动后的加工这两个环节是否到位。活动前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认知框架，使体验有方向、有焦点；活动后要留出足够的反思提炼时间，让学生把感性积累上升为概念理解，最后指向价值立场的澄清。缺少两端支撑的体验活动，只能停留在见闻拓展上，不能使文化认同产生深层次的改变。

（四）优化多元评价机制，关注价值生成的过程轨迹

创建可以追踪价值内化过程的评价体系，是城市文化融入思政课形成教育闭环的必要条件。过程性评价主要从课堂讨论中观点的表达、项目探究中问题的产生及推理逻辑、参访日志中反思质量等来记录学生的各个教学节点上思维的变化，发现价值认知的动态变化轨迹。

表现性评价是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城市文化素材分析价值问题的能力，即设计城市精神当代表达主题展示、围绕城市治理问题撰写政策建议书、以本地历史人物为原型设计思政讨论情境等任务类型。该类评价任务不是以标准答案为依据，而是以论证质量、文化理解程度和价值立场是否清楚为评价标准，考查的是学生思维的过程而不是记忆的结果。过程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相结合，可以使得教师不断地得到有关文化认同的真实信号，进而对城市文化素材的选择以及教学转化策略做出调整，从而达到教学动态优化的目的。

从操作上来说，评价量表的设计要防止把价值认同指标化为表态性的选项，否则很容易使学生给出符合预期的表面答案，从而掩盖真实的价值生成状态。较为合理的方法是以思维可见性作为核心评价维度，学生能否清楚地陈述出自己的判断依据、能否识别出价值问题的复杂性、能否在比较不同的立场之后仍然保持论证的内在一致性，这些表现比单纯的立场表态更能体现价值内化的实际程度。与此同时，教师对评价结果的反馈方式也十分重要，聚焦论证逻辑而不是结论对错的反馈，有利于营造出一个安全的价值探讨环境，让学生在思政课上真正地表达出来，而不是做策略性的回答。

四、结语

城市文化同思政课的深度融合，其实质就是把国家叙事的宏大视角同学生生活世界的微观感受联系起来的一种教育活动。资源整合、情境转化、体验重构、评价优化这四个路径分别对应当下融合实践的结构性问题，是资源供给到价值生成的一条完整的教学生态链。城市文化处于持续迭代、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思政教师需持续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挖掘城市新内涵、新精神、新实践，不断优化文化融课教学模式，让鲜活的城市文化成为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源头活水，持续助力学生文化自信涵养、政治认同培育、时代责任塑造，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教学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1] 周敏星 . 晋城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4,8(27):133-136.

[2] 刘颖 , 张玉森 . 城市历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 [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5(01):36-39.

[3] 王玉坤 , 吴莹 . 地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 [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3,40(04):87-90.

[4] 明成满 , 傅桐耶 , 姜强强 .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学思政课程教学研究——以融入高中“哲学与文化”为中心 [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2024,23(01):72-77.

[5] 赵婷 .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艺术概论课程思政教学路径研究——河东传统文化视角 [J]. 黄河之声 ,2025(20):4-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湖北本科高校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研究”（2024572）。

（作者：赵霞，长江大学文理学院讲师；涂晓洁，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

从“有”到“优”，向“夜”而生
——余姚市民夜校课堂品质优化的实践探索

陈逸安

摘要：自 2024 年起，余姚市民夜校依托上级统筹的资源与标准，有效填补了县域范围内夜间终身学习资源的空白。结合市民下班后的碎片化学习需求，围绕课程供给、教学实施和保障体系三大维度，系统推进课堂品质优化，逐步构建起“精准适配、场景创新、精细保障”的基层实践模式。实践表明，余姚市民夜校课程报名热度持续攀升，特色课程常常“一课难求”，出现快速满员现象，老学员复报意愿强烈，整体学员满意度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本文通过解析余姚市民夜校从零起步的真实课程案例与运营逻辑，系统揭示基层夜校在课堂品质升级方面的可行路径，以期为同类基层院校开展市民夜校工作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关键词：市民夜校；从有到优；夜间学习；课堂品质；基层实践

一、办学背景

此前，县域内缺乏针对普通市民的规范化夜间学习平台，上班族、社区居民等群体“下班后想学习却无渠道”的需求长期存在。在上级单位“构建全域终身学习体系”的战略框架下，浙江省余姚市社区学院主动承接基层办学任务，明确市民夜校“服务县域、品质优先”的核心定位，将课堂品质视为夜校生存发展的关键竞争力。

为助力夜校顺利起步，上级单位提供了三大支撑：一是共享数字化报名平台，实现报名、选课、评价全流程线上化，适配市民下班后碎片化操作需求；二是提供“职业技能 + 文化艺术 + 生活美学”课程开发模板，明确夜间课程“时长 1.5—2 小时、内容轻量化、实操性强”的核心标准；三是依托市级师资库，为夜校引入了前沿教学理念与优质师资，为夜校起步阶段的教学质量兜底。这种“上级赋能 + 基层自主”的模式，让浙江省余姚市社区学院既能快速搭建夜校框架，又能结合本地市民夜间学习偏好（如避开通勤高峰、兼顾家庭事务）打造特色课堂，为后续品质优化奠定“从有到优”的基础。

二、余姚市民夜校课堂品质优化的三大核心实践

余姚市民夜校围绕课程供给、教学实施、保障体系三大核心维度，紧扣夜间学习“时间碎片化、状态易疲劳、需求重实用”的特点，以精准化、场景化、精细化为方向，系统性推进课堂品质全链条优化，形成适配县域基层、可落地可复制的夜间办学实践体系[1]。

（一）课程供给：锚定本地需求的“精准化”设计

市民夜校摒弃日间成人培训“重理论、长周期、高强度”的模式，以夜间场景适配、市民真实所需、短期快速见效为原则，构建“基础课标准化、特色课本土化、迭代课数据化”的课程供给体系，让课程真正贴合上班族、社区居民的夜间学习节奏。

1. 基础课程：标准化落地，适配夜间学习节奏

参考上级单位的课程标准，同时调整时长与内容节奏以适配夜间学习。2024 年冬季班首开的非洲鼓初级课程，将课时设定为 12 课时、每次 1.5 小时，避开晚高峰通勤；学院统一采买非洲鼓并配备专业音响，由执教 20 余年的音乐老师从基础音教起，放缓教学进度以适配学员下班后的疲惫状态，最终吸引近 20 名零基础学员报名。2025 年春季班新开设的现代舞课程，精准贴合市民“放松解压、轻度运动”的需求，选用大众熟悉的流行曲目，课程强度以“舒缓身心、塑形减压”为主，不追求高难度技巧，结课后学员普遍反馈“下班后跳舞既能锻炼身体，又能释放工作压力”，课程续课率高达 85%，成为夜校基础课中的热门爆款[2]。

2. 特色课程：本土化创新，聚焦“学完能用”

针对市民“学习想快速见成效、学完能用”的需求，开发特色课程。2025 年夏季班新增的中式面点课，源于前期调研中超六成市民希望学习“家用实用生活

技能”的强烈需求，夜校专门购置大容量蒸箱、烤箱、发酵箱及 20 套专业烘焙工具，12 课时全覆盖牛奶刀切馒头、鲜肉包、花式馒头等家常面点制作，学员每节课都能动手实操，学完即可在家复刻，课程上线几分钟内便满员，后续加开班次依旧供不应求。茶与健康课程深度结合本地茶文化底蕴，邀请茶叶专业教师授课，摒弃复杂烦琐的茶艺流程，重点教授本地特色茶简易冲泡法，学员课后在家就能泡茶待客，课程广受好评，后续开设的生活茶道、雪沫擂茶课同样“一位难求”。

3. 课程迭代：数据化驱动，动态优化课程结构

建立以报名率、续课率、课堂满意度、课后实用性评价为核心的评价指标，动态调整课程以适配夜间场景。2024 年 10 月试点开设的燃脂健身操，报名率虽然达到 80%，但学员反馈“夜间运动强度太大，第二天上班没精神”，最终满意度一般，课程遂暂停开设；后续调研发现市民更倾向“轻度拉伸、放松类”夜间运动，计划将其优化为“古典舞”后再评估重启。而手机短视频拍摄与剪辑课程，因贴合市民“下班后记录生活、可以兼职增收”的需求，“案例教学 + 即时实操”的模式也受到学员的认可，自开设以来连开两期均满额，2025 年秋季班将新增“手机构图修图”“场景实战”模块，实现了课程的动态进化与良性循环 [3]。

（二）教学实施：聚焦学习体验的“场景化”创新

针对夜间学习“注意力易分散、身体易疲劳、参与感易弱化”的痛点，以场景化教学为核心，从教学空间、教学方法、成果呈现三方面发力，打造“沉浸式、轻松化、有获得感”的夜间课堂。

1. 教学空间：分场景适配，营造舒适学习氛围

根据不同课程的教学特性，量身打造专属教学空间，杜绝“一室多用”带来的体验下降，全方位适配夜间学习的舒适需求。舞蹈教室配备全身镜、专业把杆，地面铺设防滑地胶，门口设置临时储物柜，方便学员存放通勤包、外套等物品；中西式面点课设在食堂楼上的专用实操教室，搭建大型 U 型操作台，清洗池配备 24 小时热水，解决夜间使用冷水的不适感，让学员实操更舒心；茶艺教室以暖光为主色调，采用中式简约装修风格，配备专业茶艺桌椅，墙面悬挂茶文化书画，营造雅致静谧的学习氛围，让学员在夜间放下疲惫、沉浸式感受茶文化魅力。

2. 教学方法：分层化设计，兼顾不同基础学员

充分考虑学员年龄、学习基础、接受速度的差异，采用分层教学、差异化指导的方法，确保零基础学员跟得上、有基础学员有提升。中式面点课采用“教师示范—全员实操—一对一纠错”的三段式教学，对零基础学员手把手指导揉面、擀皮等基础动作 [4]，对有一定基础的学员额外教授花样造型、口感优化技巧；八段锦课程教师将整套动作拆解为“分解练习—完整演练—纠错优化”三个步骤，针对中老年学员肢体僵硬、记忆较慢的特点，适当放慢教学节奏、增加休息间隔，确保每位学员都能熟练掌握；非洲鼓课程以“趣味化、互动化”为核心，通过节奏游戏、小组 PK、集体合奏等形式调动学员情绪，全程保持课堂活跃度，让零基础学员在 1.5 小时内高效掌握《小宝贝》《桥边姑娘》等热门曲目演奏，提升学习自信心。

3. 教学成果：可视化呈现，提升学习获得感

突出强调学习成果“可带走、可使用、可分享、可展示”，增强学习的获得感。中西式面点课每节课结束后，学员可将自制面点打包带回家，与家人分享成果，不少学员反馈“晚上学完带点心回家，既有成就感，又能增进家庭氛围”；手机视频拍摄与剪辑课程结课时，举办小型“学员作品展”，优质作品通过班级微信群、学校微信公众号展示，让学员获得认可与鼓励；古典舞、现代舞、民族舞等艺术类课程，结课组织小型汇报演出，为学员提供展示平台。这种“看得见、摸得着、能分享”的成果呈现方式，极大激活了学员的内在学习动机，成为老学员持续复报的重要原因。

（三）保障体系：支撑品质稳定的“精细化”构建

依托上级“多元协同”保障框架，针对夜间办学“时段特殊、服务要求高、运营细节多”的特点，从师资、运营、反馈三大维度构建精细化保障体系，为课堂品质稳定输出筑牢根基。

1. 师资队伍：双渠道建设，优选夜间适配型教师

构建“市级优质师资引荐 + 本土专业人才培育”的双渠道师资体系，优先选拔“熟悉市民需求、适配夜间授课节奏、擅长轻量化教学”的教师，兼顾课程专业性与实用性。一方面，依托上级市级师资库引进前沿型优质师资，如擅长职场形象美妆、AI 实操等轻量化课程的专业教师，为夜校注入新教学理念与前沿内容；另一方面，邀请县域内“时间灵活、贴近市民、口碑良好”的本土专家，如余姚市健身气功协会副会长、专职中式面点师、本地茶艺师等来上课，让课程更贴合本地市民的学习习惯与需求 [5]。

2. 运营管理：全流程规范，坚守公益便民定位

全面对接上级“统一平台、统一标准、统一收费”的“三统一”要求，在规范运营的基础上优化服务，凸显公益性与便民性。报名环节共享上级数字化报名平台，实现选课、缴费、评价全流程线上操作，适配市民夜间碎片化操作需求；收费严格执行公益性标准，12 课时仅收费 260 元，远低于县域市场同类培训课程价格，大幅降低市民学习门槛，让不同收入群体都能平等参与。课程管理实施“课前提醒—课中服务—课后关怀”全流程规范：课前通过班级微信群推送上课时间、地点、所需物品等提醒信息；课中做好学员考勤、助教配合、设备保障等工作；课后提醒学员夜间出行安全，及时整理课程资料、课堂照片发送至群内，

随时为学员答疑解惑，全方位提升服务体验。

3. 反馈机制：闭环化运行，快速响应市民需求

建立“便捷收集—高效分析—快速落地—持续跟踪”的闭环反馈机制，让市民意见真正推动课堂优化。学员完成 12 课时学习后，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便捷提交课程满意度、改进建议、新增课程需求等评价内容；每一期课程结束、新一期课程筹备前，夜校都会系统汇总分析反馈数据，重点梳理高频改进建议与热门新课需求，并快速落地优化。例如，2024 年秋季西式面点课，多位学员反映“18:30 开课太晚，面点制作耗时较长，结束过晚影响休息”，夜校立即将开课时间调整为 18:00；有学员提出“非洲鼓教室与其他教室距离过近，鼓声易干扰相邻课程”，夜校迅速将非洲鼓教室迁移至独立区域，并做好隔音处理。通过闭环化反馈机制，真正实现“市民提需求、夜校快改进”，让课堂品质持续贴合市民期待。

三、实践成效与经验启示

（一）品质优化带来的多维成效

余姚市民夜校从 2024 年 10 月“零起步”，到 2025 年形成稳定运营模式，以课堂品质提升为核心，深化与市党群服务中心等教学点的合作，构建起“学员—市党群服务中心等教学点—学校”的多方共赢格局。

1. 学员层面：需求精准满足，学习热情持续高涨

夜校有效破解了县域市民“下班想学无去处、想学优质课程价格高、想学技能没时间”的三大痛点，成为上班族与社区居民的夜间“精神充电站”。2024 学年累计服务市民超 500 人次，其中 85% 为在职上班族，覆盖不同年龄、职业与收入群体。课程整体满意度稳定保持在 93% 以上，老学员复报率达 42%，“一人报名、全家关注、同事跟风”的口碑效应突出。学员普遍评价夜校“时间友好、内容实用、价格亲民、体验舒适”，主动通过朋友圈、社群推荐亲友报名，中式面点、茶艺、短视频剪辑等热门课程多次出现“秒满、候补排队”的现象，真正让终身学习走进市民日常生活。

2. 合作点层面：资源高效整合，基层服务效能显著提升

依托市党群服务中心等多个教学点合理布局，有效解决市民夜间跨区域通勤不便、学习就近难的问题。各合作阵地与夜校深度联动，共同推出茶道、八段锦、咖啡制作、AI 实操等贴合群众的优质课程，既丰富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也让服务阵地从“被动等待”转向“主动吸引”，显著提升群众黏性与组织凝聚力。夜校模式让基层公共空间“晚上亮起来、阵地活起来、群众聚起来”，成为基层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的典型实践。

3. 学校层面：办学模式成熟，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彰显

余姚市民夜校成功实现从“无”到“有”，再努力向“优”发展，夜校聚焦夜间学习、深耕课堂体验、坚持公益惠民的创新实践，得到上级单位高度认可与充分肯定。截至 2025 年 11 月，已有省内外多所兄弟院校专程前来考察交流，夜校的课程开发、场景教学、精细运营、闭环反馈等经验被广泛借鉴，为基层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范例。

（二）余姚市民夜校品质优化的经验启示

“上级标准 + 基层特色”是核心原则。上级单位的标准为夜校“落地”提供兜底保障，余姚市民夜校的“夜间适配创新”让课程更贴合市民需求，二者结合既避免“千校一面”，又防止“夜间办学走样”，是基层夜校从零起步的关键。

“需求导向 + 数据驱动”是关键方法。通过调研精准定位市民“下班后想学什么、能学多久”的需求，依托数据动态优化夜校课程（如调整时段、增加实操），让课堂品质始终与市民的需求同频，才能保持夜校吸引力。

四、结语

余姚市民夜校的实践表明，基层院校通过“依托上级赋能、聚焦本地需求、创新教学实践”，就能有效实现课堂品质升级。以学员体验为核心的优化路径，不仅提升了市民参与度与满意度，更为基层夜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清晰范本。未来，市民夜校可进一步深化与上级单位的联动，在“数字化课程开发”“跨区域夜间师资共享”等方面探索突破，持续释放基层院校的夜间育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 高志敏 . 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化社会 [M].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 陈乃林 . 终身教育理念观照下的社区教育 [J]. 成人教育 ,2008(10):16-18.

[3] 张菁 . 当代年轻人为何迷上了新型夜校——社会变迁视角下青年学习需求研究 [J]. 广东开放大学学报 ,2024,33(04):11-17.

[4] 吴鹏宏 . 聚焦城市美育办好民生实事 [J]. 上海人大月刊 ,2024(01):49.

[5] 曲娜 . 公共图书馆夜校服务探析——以济南市图书馆“YEAH 归人”市民夜校为例 [J]. 图书馆学刊 ,2024,46(10):72-7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宁波市教育科学规划专项（终身教育与民办教育）课题“终身教育视域下县域市民夜校课程品质优化的实践研究”（2025YGHZM13）。

（作者单位：浙江省余姚市社区学院）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逻辑与路径研究

杨巨慧

摘要：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实践教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在“大思政课”视域下，系统探讨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在改革中应坚持问题导向、守正创新、自信自立的基本原则，聚焦高等职业教育特征、地方文化特色与高职院校自身特点，以天津地区红色文化、工匠文化、生态文化资源为依托，构建“一个核心、两翼支撑、三色融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旨在破解高职思政课教学浅表化难题，实现知识传授、技能锻造以及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大思政课”；高职院校；实践教学

一、“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的价值意蕴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实践教学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提升育人实效发挥着关键作用[1]。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通过拓展教学空间、整合社会资源、汇聚多元力量，对高职思政课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空间延展：突破课堂边界，激活社会场域的育人效能

“大思政课”强调善用社会大课堂，将教学从封闭的教室拓展至广阔社会空间，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有效打破“知行分离”的局面，使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深化认知、锤炼品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一是打破课堂边界，构建社会大课堂的育人模式。“大思政课”视域下的实践教学强调“课堂无边界”，将教学场域延伸至社会各处。红色场馆、乡村一线等均可转化为鲜活场域，学生通过实地走访、情景模拟，在历史或现实场景中感悟理论，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体验的转变，推动思政教育从知识传递向价值内化跃升。同时，线上线下融合成为重要方向，虚拟现实、云端平台等数字化手段突破地域限制，构建虚实结合的教学环境，彰显技术创新对思政教学的赋能[2]。

二是紧扣时代主题，打造实践内容动态更新机制。教学内容须与时代同频共振。高职院校需围绕国家战略与社会实际，结合职教特征与地方特色，设计针对性实践项目。“四史”教育、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既是国家发展命题，也是思政教育载体。通过将国家战略转化为教学内容，确保教学内容的前沿性与现实性。

三是聚焦育人目标，涵养学生“大格局、大视野、大情怀”。改革不仅关注知识传递与能力培养，更致力于引导学生树立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大格局”、以全球视野洞察时代的“大视野”、以人文精神滋养心灵的“大情怀”。“大格局”要求跳出个人利益局限，将职业规划与国家战略结合；“大视野”需突破专业壁垒，拓宽认知边界；“大情怀”以情感共鸣为纽带，引导学生在实践中直面社会现实，感悟“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二）资源融通：联结多元主体，构建协同联动的实践生态

开门办思政课，根本上要依托校、企、馆、社四方联动，搭建覆盖范围更广的实践大平台，完成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3]。

首先，突出学校的教学主导作用，高职院校可系统整合社会资源，搭建科学化实践教学框架，围绕人才培养目标，编制对接社会需求的教学大纲，搭建校、企、社、馆合作平台，形成资源互补的协作网络，保证实践教学贴合育人目标。

其次，发挥企业的工匠帮助作用，企业深度参与实践教学，可为培育工匠精神提供鲜活载体，组织参观访问、实操体验，引导学生从技术更新过程中理解职业态度和创新精神；企业教师依托“劳模讲堂”“技能大师工作室”等载体，把工匠精神转化为具体案例进行教学，让学生在情感共鸣中认可工匠文化的时代意义。

再次，场馆可发挥文化滋养作用，博物馆、纪念

馆保存民族记忆，承载精神符号，学校组织学生参与文物讲解、非遗传承、红色主题展览等活动，把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可直接感知的教育资源，场馆设计沉浸式场景，学生身处其中，感悟中华文明和革命精神，强化自身文化自信。

最后，社区可发挥基层浸润作用。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可容纳思政教育进行贴近民生的实践活动，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感知基层治理智慧，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社区实践以问题为核心展开，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过程中逐步培养社会责任意识，锻炼公共参与能力。

（三）师资重构：引入社会力量，打造专兼结合的育人团队

建立大师资模式，是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的关键一环，大师资模式打破传统思政课师资的单一结构，汇聚多元力量，形成专兼结合、内外互补、理论融合实践的师资队伍[4]。

传统实践教学存在师资来源单一、教学内容脱离社会实际等问题，引入多元力量可弥补原有不足，高职院校可以联合行业协会、文化机构，搭建覆盖多领域的校外导师资源库，依照实际需求调整库内人员，教学采用协同模式，让各方优势互相补充，在乡村振兴相关实践中，思政教师搭建理论框架，农业专家给出技术指导，村干部分享基层工作经验，形成理论加技术加实践的完整闭环。同时完善激励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引入行业前沿内容、文化经典，拓宽课程知识维度，组织案例研讨、进行项目实践，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邀请道德模范做示范，可以唤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最终实现知识、能力、价值三者的有机统一。

二、“大思政课”建设中，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的内在逻辑

高职院校需贴合问题导向，秉持守正创新的准则，遵循自信自立要求，对应职业教育发展方向，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结合院校自身实际，搭建“一个核心、两翼支撑、三色融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一）价值引领作为改革的核心原则

在“大思政课”建设进程中，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以问题为导向、守正创新、自信自立为基本原则，破解传统教育存在的“空泛化”“悬浮化”问题，培育同时掌握专业技能、兼具家国情怀的新时代技能人才。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实践教学针对性。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核心方法论，要求将出发点放在现实矛盾与学生思想困惑之上，可从问题识别、实践设计、效果转化三个方向分步落地，搭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流程，推动理论教育和价值塑造融合统一。

坚持守正创新，增强实践教学吸引力。守正是开展工作的根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创新是发展的活力，要依托形式创新打破课堂边界，依托载体创新提高实践体验，依托方法创新增强育人实效。两者配合运转，可让思政课实践教学保有理论深度，同时具备实践温度。

坚持自信自立，增强实践教学有效性。自信自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底色，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核心价值导向要围绕“四个自信”建立，它依托理论阐释和实践浸润两种路径推进育人工作从而引导学生把个人成长和国家命运结合，搭建起“理论认同—情感共鸣—行动自觉”的完整育人链条，让育人过程从“他者叙事”转为“主体自觉”。

（二）特色彰显：改革的核心策略

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需立足“大思政课”全局视野，紧扣职业教育类型特征，对接地方文化资源，贴合高校办学定位，推动思政课完成从“普适性”到“精准化”的转型，完成从“理论灌输”到“实践浸润”的调整。

一则聚焦职业教育特征，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以培养大国工匠为目标，将工匠精神、质量意识融入实践教学设计，把思政教育嵌入技能实训、项目攻关等环节，搭建职业价值观评价模式，推动思政教育完成从“软要求”到“硬标准”的转化，实现德技并修。

二则聚焦地方文化特色，激活在地资源。地方文化可涵养家国情怀，本身便是这类情感培育的载体，深度挖掘在地资源，搭建“传统文化—红色基因—现代文明”相联结的育人框架，依托文化遗产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整合红色资源强化革命文化教育，连接社区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践，融合在地化与时代化特色，形成对应的育人模式。

三则聚焦高校自身特点，强化专业性教育。高职院校具备专业性特征，实践教学要和行业需求紧密对接，立足行业发展趋势，动态调整教学内容，把“双碳”战略、数字化转型等前沿议题融入实践环节，让职业素养与思政教育协同发挥作用，突出应用方向，搭建“问题提出—方案设计—成果转化”的实践链条，引导学生以技术创新和服务优化回应社会需求。

（三）系统建构：教学模式的架构

高职院校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以聚焦职业教育特征、地方文化特色和高校自身特点为核心策略，构建“一个核心、两翼支撑、三色融合”的教学模式。

一个核心：指向提高思政课实践育人实效，实现知情意行统一，将理论教育转化为具体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搭建目标导向、过程设计、成效评价的全链条模式。实践教学中明确思政与职业素养双重目标指向，过程中突出问题导向与任务驱动，

引导学生在实践中验证理论，推动育人效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5]。

两翼支撑：指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让思想道德素养同职业技能素养相结合。打破课堂原有边界，把社会热点内容融入日常教学，同时把课堂教学场景拓展到企业、社区当中，形成“理论—实践—再理论”的螺旋上升路径，把职业道德与工匠精神融入技能培养环节，借助院校与企业配合进行育人活动，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感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实现技能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深度融合。

推进三类文化融合育人，红色革命文化、蓝色工匠文化、绿色生态文化共同参与育人过程，红色文化塑造思想灵魂，依托各类文化基地进行沉浸式学习，强化参与者的政治自觉；蓝色文化强化技能水平，围绕工匠精神核心内容，引导学生体悟“技能报国”的使命担当；绿色文化浸润内心思想，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培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三类文化相互配合，搭建起“红色基因—职业精神—未来责任”的育人网络，最终指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核心使命。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以天津市为例

天津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工匠文化和生态文化资源，为“三色融合”实践教学模式的落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红色铸魂：开展红色革命文化育人，培根铸魂

天津拥有丰富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高职院校通过在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觉悟社旧址、于方舟故居等开展“场馆里的思政课”，将这些历史场所转化为培根铸魂的鲜活教材。在筑牢理想信念方面，学生从历史逻辑中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根本问题；在厚植家国情怀方面，以革命先辈的爱国事迹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在锻造使命担当方面，学生将革命传统中的闯劲转化为职业素养中的工匠精神。通过解码天津党史的实践智慧、觉悟社的启蒙精神、于方舟的信仰力量，红色文化育人实践让学生在触摸历史脉搏中完成理想信念的自我建构。

（二）蓝色强技：开展蓝色工匠文化育人，德技并修

蓝色工匠文化的内核体现为工匠精神及技能报国的使命担当。天津以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等先驱创办的“永久黄”团体为标志，开创了中国自主化工工业的先河。高职院校通过在汉沽盐场展览馆、天津海洋化工科普展等地开展“场馆里的思政课”，在天津长芦汉沽盐场开展“盐田上的思政课”，使学生寻根千年盐业文化、感悟百年化工梦想。学生了解到“永久黄”团体的创业历程是中国近代工业从跟跑到并跑的缩影，理解范旭东“实业救国”理念、侯德榜首创“侯氏制碱法”、李烛尘推动盐化工业体系化发展所共同诠释的工匠精神——以技术创新打破垄断、以产业实践服务国家。通过实践教学，学生体悟到科技自立自强与产业报国的精神传承，加强对自主创新科学精神、产业报国情怀、系统观念全局视野的培养。

（三）绿色润心：开展绿色生态文化育人，知行合一

绿色生态文化的内核在于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引领，培育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如天津七里海湿地、第六埠村等生态资源，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果，也是绿色生态文化育人的鲜活载体。七里海湿地从过度开发到科学修复的转型历程，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层逻辑。第六埠村以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为核心，探索出“农旅融合”“零废弃社区”等可持续发展模式，展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普惠性。绿色生态文化育人的首要目标是唤醒学生的生态主体意识，通过湿地研学、生态农业参与，学生自觉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增强做“两山”理念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的行动自觉。

四、结语

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通过拓展教学空间、整合社会资源、汇聚多元力量，能够有效构建“社会大课堂”育人格局。在改革进程中，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守正创新、自信自立的基本原则，聚焦职业教育特征、地方文化特色与高校自身特点，构建并实施“一个核心、两翼支撑、三色融合”的实践教学模式，为高职院校培养兼具专业技能与家国情怀、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障与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 梁晴雪，孙博文．习近平文化思想塑造“大思政课”育人新格局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 [J]. 中州学刊，2025(02):14-20.

[2] 刘朝晖．数智时代“大思政课”空间建构的基本逻辑、关键问题与实践进路 [J]. 教育科学研究，2024(09):13-18.

[3] 王强，金维民．协同治理视域下“大思政课”协同育人机制构建研究 [J]. 江苏高教，2024(12):141-145.

[4] 王璐，关敏．行业高校“大思政课”师资培训路径探析——以华北电力大学为例 [J]. 北京教育（德育），2025(08):27-30.

[5] 成林萍．“大思政课”视域下“五微一体”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 [J].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02):63-68.

（作者单位：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产教融合视域下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专业建设与实践探究

冯卫宏　叶晓明

摘要：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围绕“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这一核心要素，在产教融合背景下，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作为学校和企业的纽带，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打破智能制造类各专业之间的技术壁垒，将新质生产力理念贯穿于专业融合、课堂实施、教学资源建设等环节，探究“产教融合、校企共研”的专业建设与实践教学模式，以新质生产力驱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推动新质生产力与教育供给的协同发展。

关键词：产教融合；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教育链—产业链融合；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

为深化人才培养与就业精准对接，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需以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构建多专业交叉融合的产教协同育人体系。自 2014 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提出“产教深度融合”目标以来，2023 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其作为产教融合“助推器”的定位。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以及《“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通过新质生产力赋能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形成具有示范价值的实践路径。

一、产教融合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产教融合项目目标与学校育人目标没有完全契合

产教融合项目的主导方在企业，企业在与学校合作的过程中，常常会偏离产教融合本身的意义，大部分企业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以产量、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为主要任务，往往忽略对学生的全面培养和指导。企业与学校在人才培养、课程开发、教材统一、企业技术人员参与授课等方面做得不够系统和规范，未能充分融入新质生产力对人才复合能力的要求。

（二）产教融合项目涉及的学生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产教融合项目本身具有综合性，但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是学校某一个专业引入的企业，在开展活动时往往只针对一个专业进行，并没有涉及其他相关专业学生。因此学生的受益范围较窄，专业交叉融合发展的思路不足，缺乏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跨学科协同培养机制，没能真正把学校引入的企业联合在一起，共同商定人才培养目标，共同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产教融合项目的推广没有做到系统化、全面化、多样化。

（三）产教融合项目缺乏科学全面细致的评价机制

学校和企业之间在产教融合方面的顶层设计不够充分，常常过多地强调完成结果而忽略过程的重要性 [1]，对其完成的效果是否达到预期值常停留在表面的简单判断，对于完成的质量、体现的成效、学生的收获以及是否可持续发展等并没有翔实的评价系统，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对人才创新能力和实践成果的量化评估需求。

二、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的必要性

根据当前社会发展需要，企业急需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人才，而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纽带，把学校与各相关企业紧密结合。以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为例，围绕“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这一核心要素，以适应技能习得规律、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为切入点，打破智能技术应用系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和物联网专业之间的技术壁垒，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细致提取各专业的通用知识和通用技能，学校和企业共同建立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联合开展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体系的融合、教学模式的创新、特色教材的编写，并致力

于明确学生的就业方向及加强师资的培养等。

与此同时，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要立足信息化技术，紧跟国内外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处理等相关领域的先进技术，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按照高标准、重实用、可发展的要求，通过构建开放式的实验环境、科研创新开发环境、应用创新开发环境、虚拟仿真开发互动环境、智慧科研实验室控制环境等，建设“专业融合、巩固教学、学做同行、学科竞赛、科研创新、服务毕设”等递增型、全方位的实验环境，为促进智能技术应用专业人才的培养、人才与产业链的无缝接轨提供有力支撑。

三、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建设要点

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要以人才培养、技术服务和教育输出为重点，通过机制体制创新，集成学校现有平台，充分利用参与各方企业的优质资源，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打造融合实践教学、技术服务、创新创业、技能大赛、对外开放等为一体的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大平台。

（一）人才培养目标

1. 以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型人才为主要培养目标

目前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着就业难与招工难的双重困境，其根本原因就是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不具备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所以培养能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型人才既是国家和社会的需求，也是学校发展的有效路径。因此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要围绕这一目标，以学校为中心，联合各专业对接的相关企业共同合作，让学生在学校提前体验上课如上班的模式[2]，提前学习企业需要技能人才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为更好地就业和服务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2. 以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工匠精神等优秀品德的高素质人才为首要培养目标

爱国主义精神、工匠精神等优秀品德是学生立足社会、取得成绩的内在关键因素，是学生自身良好发展的重要保障。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秉承“同频共振，融合创新”的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思路，打造实践课程思政体系，形成企业专家、技术能手、大国工匠、劳动模范等优秀人才与学校教师统一育人的目标，让学生在学习先进文化知识的同时，随时与企业优秀人才零距离接触，从面对面的课程思政教育交流中，真正吸收正能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3. 以培养掌握多学科专业知识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人才为重要培养目标

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具备多专业交叉融合特征的复合型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各企业要与学校各专业深入对接，研究制定符合学生的系列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方案，以新质生产力技术为支撑，让学生在上岗前广泛学习相关知识，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有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同时还要涉猎多个相关专业的学习，并将不同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整合和创新，逐步形成多专业知识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人才。

（二）课程设置与教学实施

为推进智能制造产教深度融合，需构建多专业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贯穿智能制造通用技能，联合打造专业方向课与融合课，形成特色化课程结构。校企合作开发实践教学模块，以创新型应用能力为主线，融入新质生产力要求，强化学生岗位职业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同时，引入行业前沿技术标准，动态更新课程内容，确保教学与产业需求同步。

充分发挥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集人才培养、科研创新及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作用，依托新质生产力驱动的智能生产线，在实践教学环节中紧密对接企业实际生产需求。通过将企业零部件产品的生产过程引入教学，以产代学，让学生从毛坯准备、粗加工、精加工到检验、防锈、包装的全流程中亲身体验，从而掌握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指导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全程参与指导，确保学生贴近实际生产环境，熟悉岗位标准和工作流程，显著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此外，中心发挥高水平专业群优势，校企协同开展智能化改造、工艺流程优化等技术研发，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服务区域智能制造产业发展[3]。通过课程改革、实践教学与科研服务联动，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服务。

（三）教学资源建设

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将学校资源和企业资源有机结合，以新质生产力理念引领教学资源建设，共同建设适应市场需求的教学资源。丰富教学资源建设，形成集文字、图片、视频、动画等载体的“1+1+1”知识点和技能点资源，即一套纸质版资源、一套电子版资源，并研发一套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系统，把传统媒介和先进技术有机结合，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动力和提升学生探究知识的兴趣。同时细化课程思政建设，建立思政库案例集，包括爱国主义专题、大国工匠专题、科学技术专题、安全规范专题等多类思政教育专题库等。通过教学资源的建设，有效促进教育与实践的结合，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人才，提高教学质量，有效推动学校教育和社会经济的良好互动。

（四）师资队伍建设

为深化智能制造产教融合，需构建多专业融合的教师培训体系，依托校企合作实践项目，发挥教学名师和创新团队的示范作用。针对智能制造跨机械、电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特性，教师应在企业引领下突破传统专业限制，围绕新质生产力需求更新知识，建立工

程实践导师制度，促进多专业教师交流学习，确保技能与产业同步。同时，通过引进企业人才任教、选派教师挂职锻炼，校企协同打造“双师型”队伍，提升实践与教学水平，共同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五）教学场景的建设

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以新质生产力理念为引领，通过多专业交叉融合项目打造开放式学习空间，践行教师情感工作要素与现代学徒制要求，构建“一切皆可学”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该空间包含项目实践区、教学咨询区等多元功能区，融入新质生产力技术场景，提供开放多元的解决思路，强化探究式学习与错误引导机制。

在开放式学习空间中，可实践丰富的教学方式，如独立学习、同伴互助、小组合作等常规模式，以及圆桌会议讨论、团队建设教学、作品创作分享、学生主题播报、基于展示的学习、实验探究学习、思维可视化学习、游戏化学习、连接户内户外学习、使用移动技术学习、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学习等创新形式。这些方式充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习效率与团队协作水平，为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奠定坚实基础。

（六）评价机制的建设

评价机制以新质生产力需求为导向，确保产教融合项目成效。对学生采用分层评价、增值评价，融入创新能力要求，通过课前、课中、课后针对性地引导，促进学生发展。企业则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学习效果等评估合作成效，若与目标有差距，及时调整方案[4]。该机制与前期师资建设、课程改革等形成闭环，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保障产教融合项目良性可持续发展。

1. 坚持以人才培养质量为主要指标进行专业建设评价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才培养质量是最主要的评价指标，是衡量专业建设最重要的依据。特别是要重视社会对人才质量的评价，该评价应作为今后专业建设与改革的风向标。以新质生产力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为基准，通过社会对学校毕业生的反馈意见，反推产教融合模式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否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趋势，校企共同制定的专业和课程体系建设是否紧密对接产业链、服务创新链，共建智能协同创新中心的理念是否适应岗位职业要求等。

2. 坚持以全要素、全过程体系来进行学生评价

学生评价体系构建横向全要素（知识、技能、思政、职业素养）与纵向全过程（课前准备、课中实践、课后作业）的立体化评价框架，确保评价的完整性与客观性。通过引入智能化评价工具，实现数据实时采集与分析，增强评价的实时性与发展性。聚焦新质生产力技术应用能力，重点评估学生在实践创新、解决复杂问题、自主探究及团队协作等核心能力上的提升效果，为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精准反馈[5]。同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产业需求变化及时优化评价指标，确保评价体系始终与行业发展同步。

3. 坚持以教学成果转化效果进行产教融合评价

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专业建设的目的就是在保障产教融合优质发展的基础上，更好地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以新质生产力技术成果转化为核心，尤其要注重教学成果的转化率。通过对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教师的教科研及比赛、企业与学校合作的专利输出及创新研究、学生的就业、教学模式的辐射和推广、产生的社会效益等教学成果的转化进行全方位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反思各项教学成果是否达到了预定目标，好的方面持续保持，欠缺的方面及时予以调整，为后续良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在产教融合视域下，学校与各企业联合打造的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各行业技术更新日新月异，生产企业对于综合素质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学校和企业时刻保持紧密的联系，持续加强合作交流、共同育人，持续研究专业融合，制定更加合理的教学方案，打造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开放式的教学环境，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综合性专业技术人才，更好地为社会输送优秀的毕业生。

参考文献

[1] 程培蕾，黄长兵，毕德 . 产教融合视域下园林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 智慧农业导刊，2023,3(24):133-136.

[2] 郭湘红，梁永祥，吐尔逊古丽·热克甫 . 产教融合视域下职业院校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J]. 商品经济，2023(21):141-144.

[3] 梁建伟，李彪 .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机电专业人才培养策略 [J].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35(05):21-24.

[4] 邹栋林，李亚 . 基于协同创新中心校企合作育人机制研究与实践 [J]. 科技风，2023(16):93-95.

[5] 杨静秋 . 产教融合视域下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实践研究 [J]. 科技风，2025(36):160-16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天津市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课题“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及赋能路径研究”（XHXB2025A014）。

（作者单位：天津市经济贸易学校）

高等职业教育机械 CAD/CAM/CAE 教学改革与数字化设计融合策略

南丽霞　慈瑞梅　郝欣妮　吕　宁

摘要：在《中国制造 2025》实施以及工业 4.0 技术的应用背景下，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对高职机械类人才的数字化素养、工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根据 TRIZ 创新理论、新工科理念以及产教融合政策，从课程体系重构、教学模式创新、产教融合深化、数字化资源建设、评价体系优化这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高职机械 CAD/CAM/CAE 教学与数字化设计深度融合的策略，并明确了师资队伍建设、实训平台完善、质量保障机制健全的实践保障路径。本文旨在创建“课程贯通、能力导向、产教融合、数字赋能”的教学新生态，给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支持，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CAD/CAM/CAE；教学改革；数字化设计

一、引言

随着《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深入实施与工业 4.0 技术深度应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对机械类技术技能人才的数字化素养、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提出更高要求。CAD（计算机辅助设计）、CAE（计算机辅助工程）、CAM（计算机辅助制造）作为机械工程领域数字化研发的核心技术，已成为现代制造业产品设计、性能分析、生产制造全流程不可或缺的工具。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其机械 CAD/CAM/CAE 课程的教学质量直接关乎毕业生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适应能力。

新工科理念强调“学科交叉、产教协同、创新驱动”，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明确提出，推动企业深度参与教材开发、课程设计和实训基地建设。在此背景下，推动高职机械 CAD/CAM/CAE 教学与数字化设计深度融合，重构教学体系、创新教学模式、深化产教协同，成为摆脱当前教学困境、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本文基于相关教学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系统探索二者融合的核心策略，以期为高职机械类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实践参考。

二、高职机械 CAD/CAM/CAE 教学与数字化设计融合的核心策略

（一）重构课程体系：构建数字化导向的模块化课程群

以数字化设计能力培养为核心，打破传统课程边界，重构“基础模块 + 核心模块 + 拓展模块”的模块化课程群。基础模块主要聚焦机械制图、三维建模基础、数字化设计原理等核心知识，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核心模块则突出整合 CAD 三维造型、CAE 仿真分析、CAM 数控编程等内容，进一步构建“设计—仿真—制造”一体化教学链条，通过融入 TRIZ 创新理论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拓展模块则重点引入自由曲面造型、数字孪生、协同设计等前沿技术，通过设置工业机器人仿真、智能产线设计等交叉学科内容，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1]。

课程内容编排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采用项目驱动的方式，将企业真实产品的数字化研发流程转化为教学项目。如在机械零件设计项目中，引导学生使用 CAD 软件进行三维建模，利用 CAE 工具进行应力分析和性能优化，再运用 CAM 软件进行数控加工编程和仿真，实现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的有机统一。将岗课赛证融通的思想贯彻到课程体系中，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技能竞赛要求转变为课程内容、考核指标，使课程内容和岗位需求、行业标准同步。

（二）创新教学模式：推行数字化驱动的混合式教学

构建“双螺旋—四维赋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把线上教学的灵活性与线下教学的互动性结合起来，以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线上部分依靠超星、MOOC 等学习平台创建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包括微课视频、虚拟仿真实验、三维模型素材、案例库等，供

学生自主完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和拓展学习等环节。教师利用线上平台跟踪学生的学习数据，准确掌握学情，给线下教学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

线下教学聚焦理虚实一体化，充分运用项目驱动、小组协作、案例分析等教学方法。借助虚拟仿真平台构建高仿真数字化实训环境，让学生在虚拟场景中开展复杂零件设计、仿真优化、数控加工等实践操作，降低实训成本，进一步减少设备损耗。引入企业真实项目，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协作式学习，完成方案设计、建模仿真、加工验证的全流程任务，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教学过程中融入TRIZ 创新理论，引导学生运用创新原理解决设计中的技术难题，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为学生制定个性化学习路径，提升教学精准性、有效性 [2]。

（三）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校企协同育人生态

建立校企深度合作的长效机制，推动企业全面参与教学改革的各个环节。与企业共建数字化实训基地，引入企业真实的生产设备、软件系统和技术标准，为学生提供与企业一致的实践环境。校企联合开发课程和教材，教材编写团队由院校教师、企业工程师、行业专家组成，确保教材内容既符合教学规律，又贴近生产实际。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数字教材，整合动态演示、虚拟仿真等数字资源，实现教材内容的动态更新 [3]。

推行“双导师制”，院校教师负责理论教学和基础技能训练，企业导师参与实践教学、项目指导和职业素养培养。企业导师将自身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融入教学，为学生提供真实项目的设计思路、技术难点解析和行业发展动态。定期组织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训，参与企业实际项目研发，让学生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提升数字化技能和工程实践能力。

（四）建设数字化资源：打造立体化教学支持体系

构建数字教材、在线课程、虚拟仿真、案例库四位一体的立体化、数字化的教学资源体系。数字教材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征，采用模块化、项目式体例设计，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家国情怀。在线课程重视互动性、实践性，具备在线测试、讨论区、虚拟实验等功能，为混合式教学、自主学习提供支持。虚拟仿真资源覆盖 CAD 建模、CAE 仿真、CAM 加工等核心环节，创建高保真的虚拟实训场景，达到“虚实结合、工学一体”的教学目标。

案例库建设搜集企业真实项目案例、优秀设计作品、技能竞赛获奖作品等，按难度梯度划分成不同的教学层次。引入先进的数字化设计工具和软件，如支持 NURBS 曲面造型的 CATIA、NX 等商用软件以及国产自主研发的 CAX 软件，让学生熟悉主流的数字化工具的应用，提高就业竞争力。建设数字化教学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为教学质量监控、教学改革提供数据支持。

（五）优化评价体系：建立多元立体的过程性评价

突破传统单一结果性评价模式，构建涵盖知识掌握、技能运用、创新能力及职业素养等多个维度的多元过程性评价体系 [4]。评价主体涵盖教师及企业导师评价、学生自评、小组互评等环节，从而保障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评价内容涵盖课前线上学习时长、互动讨论参与度及预习测试成绩等；课中主要包括课堂表现、项目完成质量、软件操作规范性及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课后则以作业完成情况、创新拓展训练成果及实习实训表现等为主。

实行“过程性评价 + 成果评价”模式，过程性评价占比不低于 60%，重点考核学生学习过程；成果评价侧重学生完成的项目作品、设计报告及技能证书等，重点考核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及创新成果。运用数字化评价工具，实现评价数据自动采集、分析和反馈，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中的问题并给予针对性指导。评价结果既作为课程成绩的依据，也用于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形成“教学—评价—优化”闭环。

三、融合实践的保障路径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高职机械 CAD/CAM/CAE 教学与数字化设计深度融合的核心支撑，应以“双师型”建设为核心，构建多元化师资培育与优化体系。建立常态化校企互聘机制：学校定期选派专业教师深入装备制造企业一线，参与产品数字化设计、CAE 仿真分析、CAM 工艺优化等真实项目研发，积累企业实际工作经验，掌握行业最新技术动态与岗位需求标准，将工程实践案例转化为教学资源。邀请企业技术专家、行业技能大师担任兼职教师，深度参与课程设计、实训指导、教材编写及技能考核等环节，将企业生产工艺、质量控制要求及工程问题解决思路融入教学全过程。

构建分层分类的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培训体系，针对不同教龄、不同技术基础的教师制定个性化培训方案。定期开展 CAD/CAE/CAM 主流软件高级应用、虚拟仿真平台操作、数字教材开发、线上教学工具实操等专项培训，邀请行业技术骨干与教育技术专家联合授课。建立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考核机制，将数字化教学设计、虚拟仿真教学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组织等能力纳入教师绩效考核，激励教师主动提升数字化教学水平。搭建师资交流平台，组织教师参与国内外教学改革研讨会、数字化技术研修班等，学习先进教学理念与实践经验，促进教学能力与行业技术同步提升。

（二）完善实训平台建设

实训平台是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桥梁，应以数字化、智能化、校企共建为原则，持续改善实训平台的功能和资源分配。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根据行业技

术发展与教学改革的需要，定期更新实训设备和软件系统，配置高性能计算机、数控机床、3D 打印机等硬件设备，选用具备 NURBS 曲面造型、T 样条建模功能的商用 CAD/CAM 软件和自主开发的 CAX 软件，保证实训平台与企业生产设备和技术标准一致。

重点建设多学科融合的虚拟仿真中心，将 CAD 三维建模、CAE 结构分析、性能仿真、CAM 数控加工轨迹规划等核心实训模块整合在一起，开发机械零件设计、模具开发、智能产线优化等场景的虚拟仿真项目。对复杂的曲面加工、多轴数控编程等高风险、高成本、难实施的实训内容，可以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创建真实的实训环境，使学生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反复练习，从而降低实训成本和设备损耗。

深化校企实训资源的共建共享，与优质企业联合搭建云端实训平台，实现校企实训资源的互联互通。企业开放真实产品的数字化设计图纸、工艺文件、仿真数据等资源，学校提供教学场景与技术支持，共同开发实训项目与教学案例。学生可通过云端平台随时随地访问企业真实研发资源，参与远程虚拟实训、项目协作等活动，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提升实训的灵活性与实效性。建立实训平台动态更新机制，紧跟数字化设计技术发展趋势，及时增补 T 样条曲面造型、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相关的实训资源 [5]。

（三）健全质量保障机制

质量保障机制是确保教学与数字化设计融合成效的重要支撑，应构建“多方参与、全程监控、持续优化”的闭环体系。建立全方位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明确监控指标与流程，定期对课程内容的时效性、教学模式的适用性、教学资源的有效性、学生技能的达成度等进行全面评估。采用课堂观察、技能考核、项目成果评审等多种方式，跟踪教学全过程，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成立以院校专业教师、企业技术专家、行业协会代表等组成的教学指导委员会，吸纳数字化技术骨干参与其中，充分发挥其在教学改革中的论证、指导、监督作用。教学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就课程体系重构、实训项目设计、教学评价方案等进行论证，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和岗位能力标准提出符合数字化转型的优化建议。建立教学改革动态调整机制，按照委员会论证意见以及行业技术发展变化，及时对课程内容进行更新、教学模式进行优化。

健全学生反馈机制，拓宽反馈渠道，采用问卷调查、线上留言、座谈会、个别访谈等多种方式，定期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训安排、师资水平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建立反馈信息处理和回复闭环，对学生的反馈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分析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及时向学生反馈落实情况 [6]。加强与其他高职院校的交流合作，通过教学改革研讨会、校际观摩、资源共享等形式，学习先进的教育改革经验及质量保障模式，结合本校实际情况不断优化融合策略，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高职机械 CAD/CAM/CAE 教学要不断深化与数字设计的融合，吸收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改进教学体系、教学模式，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四、结语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高等职业教育机械 CAD/CAM/CAE 教学改革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推动教学与数字化设计的深度融合，是培养适应产业需求的数字化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然要求。通过重构数字化导向的课程体系、创新混合式教学模式、深化校企协同育人、建设立体化数字化资源、优化多元过程性评价，有效破解当前教学的突出问题，构建“课程贯通、能力导向、产教融合、数字赋能”的教学新生态。在融合过程中，充分发挥院校、企业、行业的三方协同作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实训平台、健全质量保障机制，确保融合策略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姜利华 . 基于 TRIZ 创新理论的教学模式在机械类 CAD/CAM/CAE 教学中的应用——以山东华宇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为例 [J]. 黑龙江科学 ,2022,13(03):22-23,26.

[2] 马俊强 , 韩雪松 , 陆美文 , 等 . 基于新工科理念的《模具 CAD/CAM》混合式教学改革研究 [J]. 模具工业 ,2025,51(12):78-82.

[3] 李汾娟 . 高职装备制造类专业课程产教融合教材建设逻辑与策略——以计算机辅助设计课程为例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5,(36):153-156.

[4] 柏曹敏 . 产教融合视域下机电专业 CAD/CAM 综合实训课程开发 [J]. 农机使用与维修 ,2025(12):157-161.

[5] 韩飞燕 , 赵一鹏 , 吴宝海 , 等 . 面向 CAD、CAE 和 CAM 的自由曲面造型理论研究现状与展望 [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2025,43(05):1041-1054.

[6] 崔方圆 , 陈小龙 , 高志强 . 数字化转型在机械设计制造教育中的实践与创新：基于 CAD/CAE/CAM 课程体系的构建 [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25,41(02):129-136.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机械行业智能制造类专业课程思政联盟专业群专项课题“基于虚拟仿真与数字资源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索”（ZZKSKT-2025-34）；2025—2026 年度江苏职业教育研究课题“基于生成式 AI 的职业教育动态评价构建研究”（XHYBLX2025287）。

（作者单位：扬州职业技术大学）

AIGC 技术支持下高职心理第二课堂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模式构建

唐奕佳　花燕锋

摘要：高职院校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为育人目标，心育工作亦应重视学生职业心理发展。然而，当前高职心理课程重理论、轻实践，与学生的专业关联较浅，职业心理部分较单薄，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不高，难以达到较好的育人效果。心理第二课堂作为第一课堂的延伸与拓展，以实践活动为主要载体，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且可与学生职业发展相关联，帮助培育学生的职业心理素养，表达性艺术治疗是其中重要的活动形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为高职院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开辟了新的思路，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心理第二课堂融合，能有效提升第二课堂育人成效。为更好地开展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本研究提出以心理第二课堂中的表达性艺术治疗为研究重点，将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渗透到活动方案设计、活动实施过程的全环节中，构建“一核两维三阶段”的系统性心理第二课堂模式，帮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自我认识，培养职业心理素养。

关键词：AIGC；心理第二课堂；表达性艺术治疗

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育人理念的重要载体。“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作为公共必修课程，在培养学生积极的心理健康观念、提升心理健康素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高职心理课程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参与度不高，且课程内容多以心理理论及调适方法为主，和学生的职业实践关联较浅。高职院校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为主要育人目标，心理健康教育亦应与学生未来的职业场景深度关联，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职业心理，毕业后能更好地适应职业环境。传统单向灌输式的心理课堂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亦与高职院校的育人目标不匹配。

第二课堂作为传统课堂的延伸与拓展，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已成为高职院校心育工作的重要突破口。表达性艺术治疗因其形式多元、内容生动有趣，是心理第二课堂的重要活动形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为心育工作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通过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可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心育工作效率，丰富心理第二课堂的开展形式。基于此，本研究拟探究 AIGC 对心理第二课堂的支持作用，以表达性艺术治疗为切入点，构建 AIGC 技术辅助高职院校在心理第二课堂中开展表达性艺术治疗的应用模式。

一、当前心理第二课堂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心理第二课堂是在传统课堂教学以外开展的实践育人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拓展与延伸，相较于传统课程，学生在心理第二课堂上能亲身参与各项体验活动，通过情景模拟、实践体验等方式增强心理调适能力，激发自身的主体参与感[1]。由于第二课堂多在团体中开展，学生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提升人际沟通与表达能力，并借助他人的视角更好地认识自我，学会从不同角度解决自身心理困扰。

为健全心理健康教育育人机制，当前众多高校已开展了丰富的第二课堂实践活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大多数学校的心理健康主题活动呈现碎片化特点，如学期初开展新生适应讲座、依托“5·25 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开展心理系列比赛、活动等。心理第二课堂虽然活动类型繁多，但各类活动缺乏整体规划，且未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有效衔接[2]。其次，第二课堂活动与学生的职业心理关联不强，对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帮助较小。大多数学生参与活动只是为了获得第二课堂成绩，对活动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认知不足，难以从活动中实现心理素养的提升。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辅助完成第二课堂活动。已有

研究显示，基于学生的心理特征与职业发展需求，可以生成个性化的心理素养提升方案，培育学生良好的心理素养。例如，为内向型学生推荐 VR 社交训练与演讲类社团活动，为职业迷茫学生提供职业心理测评，利用元宇宙技术创设沉浸式教育场景，构建“心理成长虚拟社区”，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参与心理剧表演、职业场景模拟等活动，提升心理调适能力等 [3]。尽管现有研究已经探索出部分 AI 技术与第二课堂的融合方式，但融合层面依赖于使用 AI 设备且缺乏成体系、与课程关联强的活动方案。

综上，本研究拟运用 AIGC 技术辅助系统制定心理第二课堂活动方案，与学生心理需求相呼应，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相衔接，与高职院校育人理念相契合。

二、表达性艺术治疗在心理第二课堂中的应用与不足

表达性艺术治疗指以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多元艺术为媒介，以非语言性艺术表达的形式为个体提供安全的情感宣泄与自我探索空间，对个体进行心理治疗 [4]。表达性艺术治疗以具身认知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身体感受对心理状态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手工类艺术疗愈活动对抑郁症、焦虑症有一定的疗效，能够帮助患者放松身心、培养专注力并提升自我价值感 [5]。

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开展表达性艺术治疗，既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身心发展观，注重自身身心健康，又能帮助学生将心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在实践中提升心理素养。高职院校在心理第二课堂中融入表达性艺术治疗，可帮助学生学会在实践中调节自身心理健康状态，实现自我疗愈。但实际开展过程中，由于学生缺乏艺术基础，部分学生参与意愿较低，或在活动中缺乏自信，不敢尝试，导致活动效果欠佳。

人工智能技术兴起后，艺术治疗与数字技术融合催生了数字艺术疗愈，为艺术疗愈开辟了新的途径。已有研究显示，数字艺术疗愈可以降低学生情绪表达的门槛，帮助学生在安全的情境中重新解读负面事件给自身带来的影响；数字艺术疗愈亦可降低艺术表达的门槛，帮助学生在 AI 技术辅助下完成艺术创作，能有效缓解学生因缺乏艺术基础不敢参与、不愿参与的情况 [6]。然而，高职院校在开展艺术疗愈活动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较浅、缺乏系统化设计、与学生职业关联较浅等问题。如何将 AI 技术与艺术疗愈深度融合，结合学生职业心理发展，形成系统性的活动方案，更高效地发挥心理第二课堂的育人功能，是当前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AIGC 赋能心理第二课堂表达性艺术治疗模式构建

AIGC 是指利用预训练大模型、生成对抗网络、多模态技术等，自动生成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内容的技术体系 [7]。在心理健康教育中，主要可以使用这几种核心 AIGC 工具：DeepSeek 大模型、千问大模型、豆包、Midjourney、即梦 AI、剪映、WPS AI、腾讯智影等。这些工具具备文本生成、图像生成、视频生成与剪辑、文档生成、语音转写等功能。研究表明，AIGC 可用于艺术疗愈方向，分析情绪文本，生成个性化艺术作品。通过使用 Midjourney 生成的动态曼陀罗纹样能有效缓解焦虑情绪，带来情感联结与安全感 [8]。

本文拟将 AIGC 技术与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育人目标结合，适应高职学生心理需求，从活动内容设计、活动实施方案两方面深度赋能构建“一核两维三阶段”的第二课堂艺术治疗模式。

（一）AIGC 赋能第二课堂艺术治疗活动内容设计

在活动正式开始实施前，需先根据学生心理需求、专业特色等进行活动内容设计。为了解学生对心理第二课堂的心理需求，可利用问卷星等线上工具展开调查，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分类设计第二课堂活动。在设计问卷时，可使用 DeepSeek 完善问卷题目设置，确保问卷结果能更好地为设计第二课堂活动方案服务。

第二课堂活动需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相衔接，同时与学生职业发展相关联，能为学生未来就业提供帮助。因此，可将活动内容设计为“一核两维”三大模块：以自我认知为核心，以职业心理构建、职业心理发展为两个重要维度。以文旅类高职院校为例，学生毕业后多进入服务业工作，情绪调节能力与抗压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职业心理素养，这些都属于职业心理发展维度，在设计活动方案时，可侧重这一维度。

自我认知模块与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自我认识板块高度契合，旨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明确自身优缺点，建立自我认同感。部分高职学生因学业表现不佳，在成长过程中易形成自卑、敏感的人格特点，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应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使其学会接纳自我，树立正确的自我发展目标并逐步实现自我完善。在活动设计上，可以让学生运用 AIGC 技术，以“自我”为主题，融合美术设计、文本创作等进行深度自我探索。例如，在 Midjourney 的辅助下完成自画像创作、在 DeepSeek 的辅助下以“我”为主题编写一个心理剧剧本等。通过完成自画像、编撰自传等方式可以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自我，学会和自我和解，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更客观地看待自身的优缺点。

职业心理构建模块与课程中的环境适应、职业生涯规划板块高度契合，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做好职业规划，使学生具备快速融入职场环境并适应的能力。高职学生通常在大三学年开始实习，但大多数学生此前缺乏对职场的客观认识，环境适应

能力较差，在 AIGC 技术的辅助下，学生在校期间可提前感知职场环境。在这一模块中，教师可运用即梦 AI、剪映等工具生成与学生未来就业岗位相关的图片、音乐、视频等，为学生呈现岗位工作实际情况，请学生结合相关内容，在 AIGC 辅助下展开艺术创作，例如，为初入职场的自己设计一支解压舞蹈，根据未来的职业场景绘制自己的职业生涯图谱等。

职业心理发展模块与课程中的挫折应对、情绪管理、压力管理、人际沟通板块高度契合，旨在帮助学生具备职场心理调节能力，能有效应对职场的压力，建立团队协作意识，能和他人有效沟通，完成工作任务。高职学生在进入职场后，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容易产生挫败感，难以应对职场中的高压任务。为此，可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创设职场压力情境、人际沟通情境等，帮助学生提前学会应对这些职场困境。教师可运用即梦 AI、剪映生成与职场情境相关的视频、动画等，请学生结合情境展开艺术创作，例如将职场中的压力转化为色彩，完成曼陀罗绘画，在豆包的辅助下，将人际冲突文本作为歌词，配上旋律，以歌唱的方式化解人际矛盾带来的烦恼等。

（二）AIGC 赋能第二课堂艺术治疗活动方案实施

设计好活动方案后，教师可招募学生，带领学生完成第二课堂活动。此时，可以将 AIGC 技术运用到第二课堂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分为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三阶段，与前文“一核两维”的活动内容设计结合，共同构建起高职第二课堂艺术疗愈的“一核两维三阶段”模式。

活动前，教师需对活动进行完整的方案设计，根据活动主题，设计合适的活动，并将活动相关内容提前告知学生，引导学生做好相应准备。教师可运用 AIGC 技术生成与活动相关的视频及文本对活动进行介绍。例如，以曼陀罗绘画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可在活动开展前生成视频介绍曼陀罗绘画，视频可通过学习通平台提前发布，帮助学生在活动开展前初步认识曼陀罗绘画，为后续活动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活动中，学生需在老师的帮助下，学会使用 AIGC 技术辅助完成图片绘制、音乐创作、舞蹈编创等艺术活动，通过不断优化提示词，优化创作作品。作品完成后，请学生互相分享，并在听取他人建议后进一步优化作品。活动最后，教师请学生将作品上传至学习通平台，以便教师在活动结束后进一步分析学生作品，对学生进行个体心理干预。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获得艺术创作带来的心理疗愈，在和他人的互动交流中，获取社会支持力量，增强自信心，提高自身心理调适能力。

活动后，教师运用 AIGC 技术辅助分析学生完成的艺术作品，将学生进行分类，根据学生的心理状态在学习通上推送不同的心理资源。为心理状态良好的学生推送心理科普视频及图文；为心理状态中等的学生推送心理测评链接，根据测评结果辅助判断是否要对学生进行个体咨询；针对心理状态较差的学生，直接联系学生本人，与学工部、学生辅导员、班主任一同做好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以“一核两维三阶段”的应用模式为蓝本，在 AIGC 技术的辅助下，能有效提高第二课堂的实施效率，帮助学生充分感受艺术治疗的魅力。活动内容与心理课程内容相衔接，是课程的有效补充。活动主题与学生专业、职业发展高度契合，能有效培养学生的专业认同感，辅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培育其基础职业心理素养，为学生步入实习岗位奠定基础。

四、结语

本研究通过系统构建 AIGC 技术在第二课堂表达性艺术治疗中“一核两维三阶段”的应用模式，为高职院校开展心理第二课堂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 AIGC 技术现已发展得较成熟全面，但在实际运用中仍需注意平衡好技术支持与人文关怀，心理疗愈需要共情、关注，技术只是辅助手段，不能替代教师及其他支持系统的重要作用。各高职院校在应用本模式开展第二课堂活动时，需结合本校实际，设计出更符合本校学生需求的活动。

参考文献

[1] 刘洋 . 五育润心视域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第二课堂体系构建探索 [J]. 大众文艺 ,2025(14):198-200.

[2] 方秀莲 , 张君 , 邱双 . 基于“第二课堂”的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重构研究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 2025,41(12):160-162.

[3] 叶春燕 , 尹超 , 周丽娟 . 数字化赋能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态系统的路径探索 [J]. 山西青年 , 2025(23):123-125.

[4] 张冠萍 , 韦晶晶 . 表达性艺术治疗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教学改革探索 [J]. 公关世界 ,2026(09):52-54.

[5] 吴颖琛 , 吕琳 . 艺术疗愈背景下陶艺疗愈与 AI 动画创作的融合路径研究 [J]. 景德镇陶瓷 ,2026,54(01):106-108.

[6] 瞿林维 , 龙宗煜 , 符运昕 . 多模态 AI 艺术疗愈系统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中的开发与实践 [J]. 华东科技 ,2026(01):118-120.

[7] 刘秉政 , 苑宁萍 .AIGC 赋能心理健康教育资源生成路径探索 [J]. 中国电力教育 ,2025(10):70-71.

[8] 曹佳 , 曾勇 . 基于 AIGC 的曼陀罗纹样生成在艺术疗愈中的实践研究 [J]. 设计 ,2026,39(08):27-31.

（作者单位：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大思政课”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实施路径探究

曹　卓　罗义欣

摘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建设，是“大思政课”建设的重要维度。调研发现，当前实践教学在课标设计、师资协同、资源整合等方面存在衔接不畅、交流不足、共享有限的问题，深层原因在于顶层设计缺失、协同机制不健全、资源壁垒明显。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系统思维理论及认知发展理论，构建课标体系一体化、师资队伍一体化、载体平台一体化的实施模式，推动实践教学从分散割裂走向系统融合。

关键词：“大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实施路径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接续的过程”。实践教学作为思政课的重要环节，是提升育人实效的关键抓手。当前，实践教学在纵向衔接与横向贯通上仍面临诸多困境：课标设计缺乏系统衔接，教师协同交流有待加强，实践资源整合尚需提升。将实践教学一体化置于“大思政课”视域下，探寻科学有效的实施路径，构建全方位育人体系，对增强思政课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思政课”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概述

在新时代思政教育格局中贯通各学段实践教学协同发展，是指立足学生思想品德培育阶段性特点与递进性规律，统一规划不同教育阶段实践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实施方法及成效评估，形成纵向有序衔接、横向有效联动、渐进深化的实践育人架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检验标准，为教学实践的一体化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整体性思维强调打破学段壁垒，对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活动载体及考核方式等环节进行系统性设计，进而构建起纵向连贯一致、横向协同配合的运行机制[1]。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个体在认知与品德方面的发展存在阶段性特征，这给分阶段开展实践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小学阶段要着重进行情感教育，中学阶段需加强价值辨析工作，大学阶段应强调培养责任意识，构建和学生成长规律相契合的阶梯式教育体系，这对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有着深远意义。

三、“大思政课”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的现状与问题

课题组问卷调研以及开展实地访谈，梳理出目前实践教学一体化建设在课标设计、师资协同、资源整合等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实践教学体系缺乏连贯设计

目前，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在目标、内容、形式以及评价等方面还未构建起连贯体系，调研数据表明，有 68.3% 的教师觉得各学段培养目标边界比较模糊，小学与初中的目标区分度并不明显；56.7% 的学生反馈参加过内容相似的实践活动，缺少螺旋上升式的深化设计。42.1% 的教师表示实践活动组织形式没能紧密结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73.5% 的教师指出各学段评价标准相对独立且缺乏贯穿始终的指标体系（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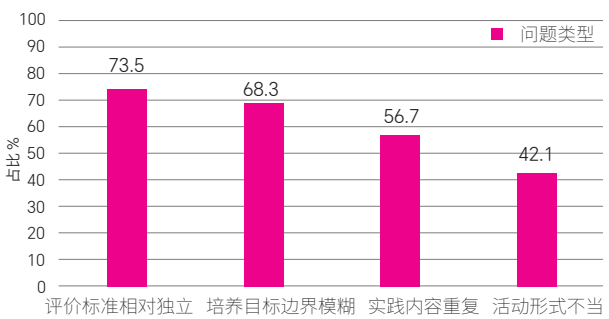


图 1 实践教学设计衔接问题调研数据

（二）实践协同交流机制尚不健全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之间缺少常态化沟通协作平台，致使实践教学纵横衔接存在不足。调研结果显示，

71.2% 的教师对其他学段教学目标内容及学生基础了解有限，难以形成环环相扣的教学链条；56.7% 的教师承认对前序学段学生已有实践经历掌握不充分，从而造成实践教学内容重复。从横向拓展情况来看，实践教学师资主要依赖思政课专职教师，仅有 28.6% 的学校能定期邀请家长、行业专家等多元主体参与，未能充分发挥“大思政课”的师资优势 (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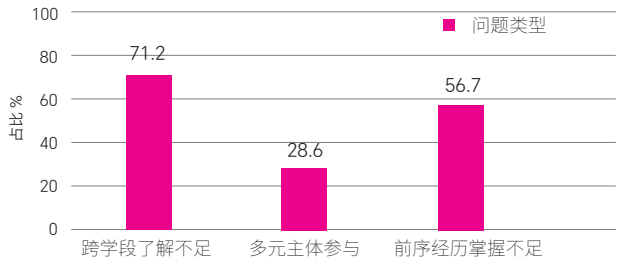


图 2 教师协同交流现状数据

（三）实践育人资源整合尚不完善

目前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资源统筹共享机制还不完善，整体呈现出相对分散的状态。调研结果显示，64.9% 的学校反映优质实践基地难以实现跨学段共享，像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场馆等资源仅服务单一学段，这就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情况。57.3% 的教师觉得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实践育人资源未能有效联动起来，育人功能也没有得到充分整合；仅有 31.4% 的学校建设有线上实践教学平台，虚拟仿真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比较有限 (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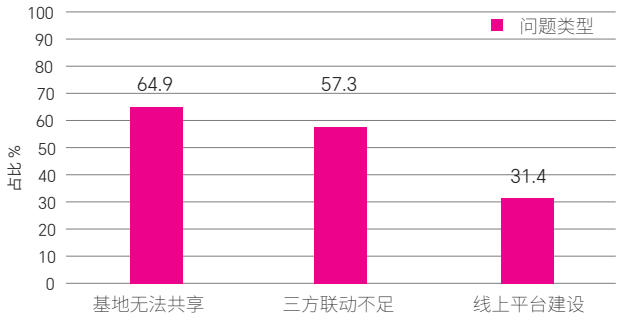


图 3 实践育人资源整合现状数据

四、“大思政课”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的阻碍因素

在当下教学实践融合推进的过程中，存在教学设计、教师协同、育人场域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设计缺乏系统性

目前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在培养方向、课程设计、方法采用以及效果评估等环节，还没有构建起连贯统一的整体体系 [2]。各学段培养方向设置存在不够清晰的问题，同时还存在内容重叠的情况。小学与初中目标差异较小，高中到大学阶段跨度过大，教学内容方面，不同学段围绕国家认同、团队精神等主题开展的实践活动多有雷同，缺少循序渐进的深化设计，实践活动开展未能充分结合学生身心成长规律，评价标准相对独立，缺乏贯穿始终的衡量指标体系。

（二）教师协同机制尚未健全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之间缺乏定期交流机制，导致各阶段实践教学处于相对孤立状态，从纵向衔接角度来看，不同学段教师对彼此的教学目标、内容和学生情况认知有限，难以设计出连贯衔接的实践教学方案 [3]。部分教师对前学段学生已开展的活动掌握不足，导致实践教学内容出现冗余现象。在横向拓展层面，实践教学师资主要依靠思政课专职教师，家长、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及社会工作者等参与的范围有待扩大，深度有待提高。

（三）实践育人场域壁垒未打通

目前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资源整合共享体系存在明显不足，造成各学段与学校间的实践资源彼此割裂的现状。在纵向资源流通方面，优质实践基地未能实现大中小学各学段贯通使用，部分适合多学段共用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文化场馆，在实际应用时常常局限于某一学段。在横向资源协同方面，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实践育人资源未实现高效联动，校园文化、家庭及社会场域的育人效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线上实践教学资源建设进度比较滞后，虚拟仿真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范围也相对有限。

五、“大思政课”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的实施模式

打造课标体系、师资队伍和载体平台协同运行机制，指导实践教学从零散孤立状态转向整体贯通模式。

（一）课标体系一体化：螺旋上升的实践教学设计

实践教学体系要实现有序衔接需依靠课标体系的一体化设计，这就需要从目标、内容、实施和评价四个层面统筹规划，以此打造循序渐进且不断深化的教学框架。其一，明确总目标与学段目标的辩证统一。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培育能承担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人才，不同教育阶段的目标呈现递进特点。小学阶段侧重“情感启蒙”，依靠各类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真挚情感；中学阶段突出“素质奠基”，借助实践体验强化学生的政治认同与责任感；大学阶段强调“使命担当”，通过实践锻炼提升学生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其二，构建三个层面的内容体系。在纵向方面要明确划分不同教育阶段实践教学的侧重点，小学阶段着重聚焦日常行为规范养成训练，中学阶段重点强化社会认知与公民意识塑造，大学阶段主要注重理论知识实际运用和社会服务能力培养。在主题方面，需构建贯穿各学段的实践教育体系，围

绕党史学习教育、国家概况、文化传承、劳动实践等核心主题，依据不同学段的学生认知特点设计循序渐进的内容。在横向方面要挖掘本土资源来打造特色实践项目，依托地方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开放成果等独特优势，培育具有鲜明地域标识的实践教学品牌。其三，遵循学生成长规律设计递进形式。小学阶段主要通过参观体验、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具体活动来开展，中学阶段以志愿服务、社会调查、主题研学等实践形式为主导，大学阶段则注重专业实习、理论宣讲、创新创业等综合实践活动，各学段的活动设计既保持衔接又体现出各有侧重的特点。同时需要构建多方参与的发展性评价机制，评价主体包含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实践基地指导员等多方人员[4]。评价内容要与各学段的培养目标相匹配，小学阶段重点考查学生的情感态度表现，中学阶段着重评价学生的素质能力状况，大学阶段则突出对学生担当作为方面的评价，以此来建立科学化、差异化的实践考核方式。

（二）师资队伍一体化：纵横贯通的教师协同体系

构建协同高效的师资团队是实现实践教学一体化的核心支撑，需在纵向衔接与横向延伸两个维度协同推进，以此形成专兼互补且纵横交融的教师联合体[5]。一方面，为了推动各个学段之间进行协同合作，需要构建常态化的交流平台来助力，要构建贯穿大中小幼的思政课教师协同教研体系，通过定期开展跨学段集体备课、课堂观摩与专题论坛等多种形式，帮助各学段教师精准把握实践教学的培养目标、核心内容与有效方法。协同教研能够让小学教师明晰为中学阶段打下的实践根基，让中学教师掌握小学学生的既有实践基础以及大学阶段的育人标准，让大学教师了解中学阶段的教学重点，以此避免教学内容重复或者衔接不畅的情况，确保各学段教学能够层层递进、呈现螺旋上升的良好态势。要构建教师成长共同体，建立一体化的教师培育机制，在国家级、省级培训项目中增设专项模块，组织不同学段教师共同参与，促进教师之间相互交流，凝聚起育人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构建兼职教师队伍。要提升“大思政课”的师资力量，需要依据不同教育阶段的育人目标与实践教学要求，吸纳家长、专业教师、教辅人员、行业专家、社会工作者、先进模范及优秀学生等多元群体成为实践教学兼职师资。要建立兼职教师遴选机制，设定政治素养、专业水平、教学热情等方面的准入标准来保障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时健全兼职教师培养体系，针对不同背景群体开展教育理念、教学策略及学生特点等专项培训，以增强其实践教学指导能力；此外，完善激励机制，借助颁发聘书、发放津贴、表彰优秀等措施，充分调动兼职教师参与实践教学的主动性与持续性。

（三）载体平台一体化：开放共享的实践育人场域

资源平台的一体化发展为实践教学一体化打下基础，它要求在纵向互通、横向合作与全面普及这三个层面共同打造开放共享的实践教育环境。首先，建立分学段实践基地目录。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承担统筹工作，集中筛选并整合区域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场馆、博物馆、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改革开放示范点、现代企业以及美丽乡村等优质实践教育资源。依据资源属性和教育价值，按照不同教育阶段编制实践教学基地名录，明确各基地适用的学习阶段、教学主题以及可开展的活动形式，各级学校可根据名录按需选用和预定资源，推动实践教育资源的整体共享，避免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各实践基地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和教学要求，设计层次化的实践活动方案，配备专业讲解和实践指导，确保各学段学生都能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实践学习体验。其次，构建家校社协同机制。联合家庭共同打造生活实践平台，充分发挥家庭在行为习惯培育和传统美德弘扬方面的特有价值，把家务料理、尊老爱亲、社区互助等元素纳入实践教育框架，联动企业积极建设实习训练场所，为不同学段学生匹配与专业相关的实习机会。在真实职场环境中塑造学生的职业操守和精益求精的态度，携手社会公益组织精心组建志愿服务阵地。借助社区、养老机构、文化场馆及环保平台等载体，组织多样化的公益服务，增强学生的社会担当与奉献意识；构筑校园文化实践平台，依托主题班会、学生社团、校园节日等活动形式，推动实践教育深度融入校园文化发展进程。最后，建设线上平台与虚拟教室。构建能覆盖各个学段的思政实践网络学习平台，把影视素材、电子图书、短视频等多元教学资源整合起来，让学生可以依据自身学习阶段和个人偏好灵活选用教学内容，配备VR沉浸式智慧教学空间。运用虚拟仿真技术开发红色历史场景模拟等互动式实践课程，使学生能够突破时空阻隔，直观感受历史情境并参与实践活动。依托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体系，推动优质实践教育资源全面流通，保障所有学子都能公平享有多样化实践教学体验。

六、结语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建设，需要构建课标体系、师资队伍、载体平台三位一体的实施模式。本研究通过实证调研，梳理了当前实践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深层阻碍因素，并提出了系统化实施路径。该模式立足学生成长规律，彰显“大思政课”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要求。未来应进一步健全运行机制、保障机制与效果评估机制，推动实践教学由经验探索向科学范式转变，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 沈壮海，刘灿.多重视野中的大中（下转174页）

新时代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的实践探索

王力加

摘要：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四史”教育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家国情怀的核心载体，其与思政课堂的深度融合是强化育人实效的关键路径。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大数据、虚拟仿真为核心的数智技术，为推动“四史”教育创新发展、提升课堂吸引力与育人精准度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创新思路。本文立足高校思政教育实际，结合数智技术发展特征，从内容重构、模式创新、机制优化三个维度，探索数智技术赋能“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的实践路径，旨在构建“技术赋能—内容增效—价值引领”的育人闭环，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四史”教育；思政课堂；数智技术；育人实效；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四史”教育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密码，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高校思政课堂的重要教学内容。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数智技术凭借其交互性、沉浸式、个性化等优势，正深刻变革教育教学形态，将数智技术与“四史”教育、思政课堂三者有机融合，不仅能摆脱传统教学困境，更能实现“以史育人、以文化人”的价值目标。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高校思政教育实际，系统探索数智技术赋能“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的实践路径，以期为高校思政教育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一、数智技术赋能“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的时代价值

（一）丰富教育载体，增强“四史”教育吸引力与感染力

数智技术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对历史场景、事件脉络、精神内涵进行立体化、可视化呈现，通过虚拟仿真、动态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让历史可感、可知、可体验，有效拉近青年学生与历史的距离，增强“四史”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与传播力[1]。在数字化传播环境下，青年学生更倾向于接受具象化、沉浸式、互动性强的学习内容，数智技术恰好契合当代大学生认知习惯与学习特征，能够把静态历史转化为动态场景，把抽象理论转化为直观体验，让“四史”教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二）创新教学形态，凸显学生学习主体性与参与度

数智技术推动思政课堂从单向讲授向双向互动、从被动接受向主动探究转变，借助智能工具、虚拟场景、协作平台等，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历史解读、内容创作、场景实践与问题研讨，推动课堂教学从“教师主导”向“师生协同”转型，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四史”知识入脑入心。依托数智技术搭建的探究式、项目式、体验式教学场景，打破课堂边界与时空限制，学生可自主查阅资料、模拟历史情境、创作红色文化作品，在主动参与中深化

（上接 173 页）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及其突破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23(02):121-130.

[2] 李爱华 , 王磊 . 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一体化案例库开发与建设对策研究 [J]. 石家庄学院学报 ,2026,28(02):134-140,146.

[3] 周悟 , 陈小飞 . 党史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建设的思考 [J]. 职业教育 ,2023,22(05):11-13.

[4] 唐未兵 .“四位一体”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J]. 新湘评论 ,2026(01):51.

[5] 曹文彬 .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路径探析 [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6,45(02):65-6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3 年度一般课题“大思政课视阈下‘大中小学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的实施路径”（2023GB132）。

（作者单位：武汉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历史认知、厚植家国情怀，真正实现从“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

（三）提升育人精度，满足学生差异化学习发展需求

数智技术能够精准分析学生学习特征、认知水平与兴趣偏好，为个性化学习供给、分层教学实施、精准辅导支持提供技术支撑，推动“四史”教育从统一化供给向精准化供给转变，更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与成长发展需要[2]。通过数据画像与智能分析，教师可实时掌握学生学习进度、理解难点与薄弱环节，针对性推送学习资源、调整教学节奏，实现因材施教与个性化指导，让不同基础、不同专业的学生都能在“四史”学习中有所收获、有所提升。

（四）整合优质资源，构建协同联动全域育人格局

数智技术能够打破地域、部门与学科壁垒，整合高校、党史研究机构、红色场馆及档案馆等多方优质“四史”资源，实现资源数字化、标准化、共享化；同时促进思政教育、历史研究、信息技术等多学科力量协同，推动师资、资源、技术深度融合，构建校内外联动、多学科协同、线上线下一体的“四史”教育协同育人新格局[3]。数智技术打通资源壁垒与学科壁垒，推动红色资源、学术资源、技术资源高效汇聚与高效利用，形成课内课外衔接、线上线下融合、校内校外协同的育人体系，全面提升“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二、数智技术赋能“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的可行性与价值意蕴

（一）技术可行性：数智技术的发展为融合提供支撑

近年来，数智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成熟，为“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AIGC 技术能够快速生成与“四史”相关的文本、图像、视频、动画等教学资源，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的呈现形式；虚拟仿真技术通过构建三维立体的历史场景，能够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增强学习的沉浸感；大数据技术可以对学生的学习行为进行实时监测与分析，精准把握学生的学习需求与认知短板，为个性化教学提供数据支撑；区块链技术能够确保“四史”教育资源的真实性与安全性，为资源共享与传播提供保障。这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四史”教育与思政课堂的深度融合具备了现实可行性[4]。

（二）价值意蕴：数智技术赋能育人质量提升

数智技术赋能“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本质上是育人理念与教学模式的系统性升级，而非单纯的技术叠加。首先，让“四史”内容“活起来”，强化教育吸引力。数智技术可打破传统静态呈现局限，通过场景复刻、角色代入、实时互动等方式，将抽象的历史脉络与精神内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教学载体：如运用虚拟仿真技术搭建“中共一大南湖红船”“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等沉浸式场景，让学生在具象化体验中触摸历史温度，有效破解“四史”教育“枯燥说教”的难题[5]。

其次，推动课堂结构“转起来”，凸显学生的主体性。数智技术重构了“教”与“学”的关系，通过人机协同探究、跨组协作创作、项目式学习等新型模式，让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收者转变为历史的主动探究者：学生可利用 AIGC 工具自主策划“四史”主题微纪录片、编写红色情景剧脚本，通过虚拟仿真系统参与“抗战时期根据地建设”等历史场景的模拟决策，在实践创作中深化对“四史”的理解，同步提升创新思维与主体意识。

再次，实现育人供给“准起来”，提升教学针对性。大数据技术的核心优势在于精准画像与需求匹配，通过采集分析学生的学习时长、知识点掌握程度、兴趣聚焦方向等数据，可清晰勾勒个体学习特征。教师基于此制定差异化教学策略，为基础薄弱学生推送通俗化历史解读与知识点梳理资源，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学术论文、专题研究等深度内容，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让“四史”教育适配不同学生的认知节奏。

最后，促进育人力量“合起来”，构建协同新格局。数智技术打破了资源与学科的时空壁垒，一方面可整合高校、地方文旅部门、党史研究机构的优质资源，构建数字化“四史”教育资源库，实现跨区域、跨单位资源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能推动思政教师、信息技术教师、历史学科教师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通过协同备课、联合教研、课程共建，将技术优势与学科特色、育人需求深度融合，形成“技术支撑—学科赋能—价值引领”的育人合力[6]。

三、新时代数智技术赋能“四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的实践路径

（一）内容重构：依托数智技术丰富“四史”教育资源体系

构建智能化“四史”教育资源库是基础环节，需联合党史研究机构、档案馆、红色旅游景区等单位，利用大数据技术整合“四史”相关的文献资料、历史图片、视频影像、实物档案等资源，建立标准化、数字化的“四史”教育资源库。同时，利用 AIGC 技术对资源进行二次开发，生成互动式电子书、三维历史模型、动画短片、虚拟讲解等多元化资源：针对“党史”中的重要事件，生成系列化的微课程视频；针对“改革开放史”中的关键节点，构建数据可视化图表，让学生直观感受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

资源库应具备智能检索、个性化推荐等功能，方便教师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在此基础上，打造定制化“四史”教学内容模块。根据思政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大纲，结合不同专业学生的认知特点，利用数智技术打造定制化的四史教学内容模块：针对文科专业学生，侧重“四史”中的精神内涵与文化价值，开

发历史文献研读、精神谱系解读等模块；针对理工科专业学生，侧重“四史”中的科技发展、工程成就，开发“两弹一星”研发历程、重大工程建设等专题模块。同时，通过 AI 技术实现教学内容的动态更新与优化，确保“四史”教育内容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二）模式创新：借助数智技术构建新型教学场景

沉浸式场景教学以虚拟仿真技术为核心，打造高还原度“四史”主题场景，搭配 VR/AR 设备让学生“走进历史现场”。如构建“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全景虚拟场景时，通过模拟海拔、气温、地形等真实环境参数，学生可在设备操作中体验环境恶劣、物资匮乏、行军受阻等困境，直观感受革命先辈在极端条件下坚守信仰的精神力量；搭建“中共一大”虚拟会场时，还原石库门建筑格局、会议议程细节，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参与议题讨论、暗号传递等模拟环节，在沉浸式体验中体悟建党初心与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彻底摆脱历史“旁观者”的被动身份，成为场景“参与者”，显著强化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

互动式探究教学依托 AIGC 技术搭建智能教学助手，教师抛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成功逻辑是什么？”等深度问题后，学生可通过人机实时互动，获取定制化历史文献节选、多维度观点对比梳理、逻辑框架搭建指引等精准支持，开展分层级自主探究与小组协作研讨等活动。智能助手根据学生回答的逻辑完整性、观点创新性动态反馈优化建议，助力深化认知层次，同时鼓励学生运用 AIGC 技术将探究成果转化为思维导图、专题演示课件、微视频等可视化作品，通过课堂展示、跨班级线上答辩等形式促进思想碰撞，同步提升逻辑思维、表达能力与学术素养。

针对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依托大数据技术构建“精准推送—过程监测—动态调整”闭环自主学习体系。通过采集分析学习进度、错题分布、兴趣聚焦方向、答题时长等多维度数据，生成精准的个人学习画像，同时借助学习分析系统实时监测学习状态，当出现知识点理解卡顿、学习动力衰减等问题时，自动推送通俗解读视频、互动问答闯关等针对性资源，保障自主学习的有效性与持续性。

（三）机制优化：健全数智技术赋能的协同育人保障体系

健全资源整合机制，高校需主动与地方文旅部门、党史研究机构、档案馆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通过 3D 扫描、高清拍摄、数字化标注等技术手段，将红色遗址实景、纪念馆珍稀展品、未公开历史档案等线下优质资源转化为可重复调用的线上教学资源，纳入“四史”教育资源库进行统一分类管理。同时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资源确权登记与溯源管理，既保障史料资源的真实性与原创性，又为跨单位、跨区域资源合法共享提供技术支撑。例如，与地方党史研究机构合作，对民国时期党史文献进行数字化扫描与注释解读，开发专属教学案例。

强化师资建设，构建“系统化培训 + 跨学科协作 + 专家化指导”三位一体能力提升机制。高校定期开展数智技术专项培训，内容涵盖 AIGC 工具实操、虚拟仿真平台运营、大数据分析方法等实用技能，配套搭建线上学习社群与线下实操工作坊，破解中老年教师技术应用难题；组建“思政教师 + 信息技术教师 + 历史教师”跨学科教学团队，通过集体备课、联合教研、课程共研等形式，推动育人需求、学科知识与技术应用深度融合，避免技术与教学“两张皮”。

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构建“知识掌握 + 能力提升 + 价值认同”三位一体评价体系，摒弃单一考试评价模式。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参与表现、成果质量、情感态度等数据，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有机结合，既关注“四史”知识的掌握程度，更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价值认同的深化。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将“四史”教育有机融入高校思政课堂，是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举措，而数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二者深度融合开辟了全新路径、提供了实践新解。数智技术凭借其独特优势，能够持续丰富教育载体、创新教学形态、提升育人精度、整合多方资源，推动“四史”教育与思政课堂从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转型，不断增强“四史”教育的感染力与实效性，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未来，高校应持续深化数智技术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完善技术支撑、资源保障与协同机制，不断创新教学范式与育人路径，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思想根基、注入强劲动力。

参考文献

[1] 张运萍 . 红色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价值导向与实现进路 [J].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2024(01):161-166.

[2] 王力岩 , 刘东琳 . 新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析 [J]. 新丝路 : 中旬 ,2020(04):2.

[3] 刘佳晨 .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价值的三重纬度及路径 [J]. 教育探索 ,2024(03):285-287.

[4] 孙婧 , 王鹤岩 .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19):78-80.

[5] 田永静 , 李潇涵 . 数智技术赋能“大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4(06):114-119.

[6] 胡刚 . 人工智能促进高校思政课范式转换与话语生态重塑协同发展探赜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3,41(03):136-142.

（作者单位：武昌职业学院）

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学情分析：价值意蕴、赋能逻辑与提升路径

张静超

摘要：精准化学情分析是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的逻辑起点，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多源数据采集、智能画像生成和动态监测等功能优势，为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学情分析提供了技术支持。立足职业本科教育类型属性，本文在系统阐释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学情分析价值意蕴的基础上，剖析其推动学情感知由“经验观察”转向“数据驱动”、学情识别由“主观归类”转向“精准画像”的赋能逻辑，进而提出夯实学情数据基础、开发智能分析工具、培育教师“人机协同”能力的提升路径，为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本科思政课精准化学情分析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职业本科；思政课；学情分析；分众化教学

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全新业态，兼具高等教育的学术属性与职业教育的实践属性，承担高层次、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育使命，其人才培养定位对思政课立德树人、德技并修育人提出了更高标准与更细要求。思政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课程，亟须适配职业本科生源结构、成长规律与职业发展需求，突破传统同质化教学桎梏。当前，职业本科思政课学情分析仍普遍存在研判维度单一、精准度不足、动态性缺失等现实短板，依托教师主观经验、课堂观察、问卷反馈的传统研判模式，难以精准捕捉多元化生源的认知差异、思想动态与职业价值分异，无法有效支撑分众化教学的精准实施。2026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人工智能 + 教育”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广泛融合”，强调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教师开展学情分析”[1]。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介入，为思政课学情分析从“群体划一”走向“精准分众”提供了技术可能性。本文聚焦职业本科这一特定教育类型，系统阐释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分众化教学学情分析的价值意蕴，深入剖析其赋能逻辑，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

一、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学情分析的价值意蕴

（一）回应类型之需：职业本科教育的类型特质与分众化教学的内在必然

职业本科教育兼具“高等性”与“职业性”双重属性，其人才培养锚定生产与服务一线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其类型定位塑造了思政课教学对象的独特性，中职对口升学、高职单招、普通高考等多条通道生源汇入同一教育场域。不同生源背景的学生在认知基础、政治素养、价值关切等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决定了标准统一、内容同质的教学供给难以适配职业本科思政课教学，“一刀切”的教学模式既无法回应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也难以实现思政课分类施教的内在要求。

人工智能技术凭借其强大的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力，能够将分散的数据信息整合为多维度的学生特征数据集，以此为基础的聚类分析与群体画像技术可实现对不同类型群体学情的精准化分析，为思政课分众化教学提供客观依据，进而有效回应职业本科人才培养需求、提升思政课育人实效。

（二）聚焦身份之别：职业身份意识驱动下的分众识别与需求回应

职业本科学生具有强烈的“职业身份意识”，其思政课学习期待与价值认同并非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接受层面，而是与职业发展关切形成深度绑定，并构成衡量课程实效与学习获得感的内在尺度。这一特质使思政课学情分析面临超越传统认知诊断的特殊任务：不仅要掌握常规学情分析内容，更需准确研判其职业价值取向的群体分异与个体差异，方能为分众化教学奠定学情基础。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学生学习及生活等多场景数据的语义分析与情感识别，能够精准描绘不同专业背景、不同产业面向的学生价值需求图谱，揭示其职业身份建构过程中对思政课的学习期待与价值关切。这赋予思政课精准捕捉学生差异化需求的“靶向”能力，进而使思政课教学内容选配、案例择取、话语转换，均可依据学生的职业价值关切进行针对性调整，有效发挥思政课对职业本科生职

业人格塑造与职业素养涵育的有效支撑作用。

（三）彰显效能之变：驱动思政课针对性与亲和力的双重提升

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学情分析的深层价值，在于有效提升思政课的“针对性”与“亲和力”，二者既是新时代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思政课教学实效的关键标尺。“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加强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2] 针对性的提升以需求的精准识别为逻辑起点，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多模态学情数据的融合分析，能够辨识不同职业取向学生的差异化学习需求，进而精准把握学生的理论关切点与情感认同点，将“需求端”信息转化为教学供给的精准靶点，规避传统教学中“主观经验驱动”所带来的偏差。亲和力的提升则根植于对学生思想世界的深度理解，借助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计算能力，教师得以透视学生话语表达背后的价值焦虑与思想矛盾，进而在教学话语转换、议题设置优化等方面有效对接学生心理诉求。针对性重在解决内容的精准化供给，亲和力重在解决方式方法的精准化适配，二者共同推动思政课从知识传递走向价值塑造的质性跨越。

二、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学情分析的赋能逻辑

从技术哲学视角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思政课学情分析并非仅停留在工具性效能提升这一层面，其赋能逻辑指向更深层次的学情分析范式，重塑思想政治教育者把握教育对象的方式与深度。

（一）学情感知逻辑：由“经验观察”转向“数据驱动”

信息感知是思政课学情分析的起点。在传统分析范式下，教师主要基于“经验观察”进行信息感知，如依托问卷调查和课堂互动、作业反馈、课后交流等，容易造成个体观察的覆盖面与学情信息丰富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职业本科多元化生源结构下的学情分化尤为复杂，基于教师个人能力边界的有限性观察不足以支撑对学情信息的全面感知。

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推动学情信息感知逻辑由“经验观察”向“数据驱动”转变。依托智慧终端与在线学习平台，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实现对学生课程学习、课堂互动、实践参与等多场景、全过程学习数据的自动化记录与结构化存储，使原本隐藏于群体表象之下的差异化信息得以被感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数据驱动的感知方式具有持续性与动态性特征，传统学情信息感知多以某一时间节点的调查为主，容易忽视职业本科生在“学生”与“准职业人”双重身份转换中的学情演变。对比而言，数据驱动的感知方式则能够实现学情的持续追踪与动态更新，呈现学生思想认识的发展轨迹，让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群体性或个体性学情差异被看见，形成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实施的逻辑起点。

（二）学情识别逻辑：由“主观归类”转向“精准画像”

“思政课教学是以思想观念、精神品格和心理情感为基础内容的活动，从本质上讲是‘教’和‘学’双向互动的精神性交往活动。”[3] 这些特点决定了学生的思想动态、价值倾向、情感态度是关键学情依据。传统学情分析方法更利于开展认知层面的量化分析，情感与价值层面的学情信息由于缺乏有效的量化方法同样易陷入基于教师个人经验的主观研判。人工智能技术借助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计算等技术能力，可以生成基于算法中介的学情识别分析框架，将分散在学生课程作业、课堂讨论及问题留言中的海量文本类信息进行深度语义挖掘，识别话语表达背后的价值取向与情感倾向，进而将其转化为可辨识、可归类的学情“数据画像”。这一学情识别逻辑的转换解决的不是让“测量更准”的问题，而是让“原本无法测量的维度获得分析可能性”的问题，促使思政课学情分析走向“认知—情感—价值”的多维结构性呈现，为分众化教学提供了超越主观经验判断的识别依据。

三、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学情分析的提升路径

（一）夯实数据基础：构建全域贯通的学情数据采集体系

数据是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学情分析的第一资源。“学情分析的内容涉及主观与客观、显性与隐性、动态与静态、个性与共性等范畴”[4]，因此，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学情分析的基础任务是构建覆盖全场景、贯通全流程、体现思政特色的多维数据采集体系。

第一，拓展数据采集的场景维度。打通教务、学工与教学平台之间的数据壁垒，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将数据采集从单一的课堂教学场景延伸至“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全场景。充分利用职业本科产教融合的办学优势，将学生在企业实习、顶岗实践中的职业伦理认知、工匠精神体悟等纳入采集范围，形成覆盖学习发展全场景的学情数据网络。

第二，开发思政课专属的数据采集工具。针对思政课“认知—情感—价值”递进性育人逻辑，设计嵌入课程教学流程的专项数据采集模块：如课前设置时政热点快速测评，了解学生对时政热点的初始态度；课中嵌入“观点漂流”即时反馈，捕捉课堂讨论中的价值交锋与认知变化；课后设置学习收获、延伸思考等模块，记录学生的情感波动与价值体悟。

第三，建立多模态数据融合采集机制。综合运用文本分析、语音情感识别、行为轨迹分析等技术手段，实现对学情信息的多角度交叉验证。同时严格遵循数据采集的伦理规范。坚持“最小必要、授权同意、安

全加密”的采集原则，建立数据采集的知情同意与隐私保护制度，确保技术应用始终服务于育人目标。

（二）开发智能分析工具：建设适配的学情分析系统

数据采集解决的是“原料”问题，而智能工具解决的是“加工”问题。通用型数据分析工具以知识认知为建模核心，难以适配思政课特殊分析需求。开发专业适配的智能分析系统，需要在算法模型中嵌入思政逻辑，在功能设计上回应职教特色，实现从“能分析”到“分析准”的跨越。

第一，构建思政课学情分析的三层递进算法模型。遵循思政课育人规律，构建“认知水平—情感态度—价值认同”三层递进的分析框架。认知层运用知识图谱技术识别学生的理论盲点与思想困惑；情感层运用情感分析技术捕捉学生的态度倾向与情绪反应；价值层运用语义网络技术追踪学生的价值判断与信仰状况。三层分析逐层深入，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学生作业、讨论文本进行深度语义挖掘，形成对学情的结构性认知。

第二，开发面向职业本科场景的特色分析模块。针对职业本科“校企双元”育人的特殊性，开发基于岗位场景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素养分析模块，通过模拟真实工作场景中的价值选择问题，分析学生的职业价值取向与伦理判断能力。构建校企间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互通与整合机制，将学生在企业的职业表现数据与在校学习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检验育人实效在职业场景中的外化程度。

第三，建设嵌入“价值校准机制”的智能推荐算法。在识别学生需求偏好的同时，确保推送内容服务于思政课的价值引领目标，既回应“学生想学什么”的需求满足，更指向“学生应该学什么”的价值引导，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三）提升教师素养：培育“人机协同”的学情分析能力

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学情分析的深度与效度，与思政课教师的数字素养高度相关。“在智能技术支持下，思政课教师能够突破传统经验判断的局限，构建精准化、动态化的学情诊断模式。”[5] 人工智能赋能学情分析，并非替代教师分析，而是提升教师学情分析的能力和效果，形成“人机协同”的学情分析模式。《“人工智能 + 教育”行动计划》指出要提高广大教师的智能素养与技能。技术的介入使教师从重复性的数据处理中解放出来，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价值判断和教学决策。这种“人机协同”模式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

第一，培养教师的数据解读能力。数据本身不构成学情，同一数据信息在不同课程中、同一课程的不同专业班级中均表征着不同的学情信息，只有经过教师的解读与赋义，才能转化为有效性教学信息。因此，既要培养教师理解不同智能技术生成的学情分析报告的技术指标与分析方法，更要培养其将数据与学生群体和个体建立关联的能力，在技术赋能中彰显教师的能动作用。

第二，培育教师的教学转化能力。学情分析的最终价值在于服务教学实践。教师需将分析结果转化为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让学情分析成为教学设计与实施的精准化依据。尤其就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而言，教师更应根据诊断结果为不同学生群体匹配差异化的教学策略，让学情分析阶段的“精准识别”转化为教学实施阶段的“精准施教”，使学情分析真正进入教学决策的核心环节。

第三，培育教师的价值判断能力。对于正处于职业人格塑造关键期的职业本科学生而言，思政课的价值引导对其具有特殊的职业塑造意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能够呈现学生“在想什么”“态度如何”等事实性信息，但面对这些数据“应如何回应”“向何处引导”，则必须由教师作出专业判断。应进一步提升教师在具体教学情境中的价值判断能力，明确“AI 提供数据参照，教师做出价值判断”的责任边界，警惕对技术的盲目依赖，确保学情分析始终指向育人目标的实现。

四、结语

精准化学情分析是职业本科思政课从“大众化”走向“分众化”不可或缺的前提环节，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学情分析从必要性研究走向可行性实践。然而，技术赋能始终是手段而非目的。学情分析的精准化旨在服务于落实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而非以技术逻辑替代价值逻辑。未来研究应持续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边界与伦理问题，在推动技术赋能的同时，始终坚守思政课的价值引领本质，实现“精准”与“育人”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2026-04-02)[2026-06-25].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604/content_7065138.htm.

[2] 习近平 .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20:21.

[3] 唐晓勇 . 智能时代思政课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动力机制及实施进路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5(11):71-83.

[4] 陈爱香 , 姚利民 .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情分析的逻辑理路与推进策略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3(04):75-79.

[5] 谭亚莉 , 袁荷春 . 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深度学习的应用图景与优化路径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5,43(06):22-2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河北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职业本科思政课分众化教学模式改革研究”（2024ZJJGGD07）。

（作者系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数智化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实践探索

章　雅

摘要：红色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积淀与精神内核，是新时代高校思政理论课最鲜活、最具感染力的特色教学素材。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推动数智化红色资源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已成为突破传统教学局限、提升教学实效、强化价值引领的重要途径。本研究立足数智教育发展趋势与思政育人核心诉求，融合 BOPPPS 课堂教学模型优化课堂互动范式、重塑沉浸式教学场景，同时依托 ADDIE 系统化教学模型搭建全流程教学设计框架，构建资源赋能、模型支撑、闭环提质的新型教学模式。研究旨在激活红色文化育人活力，提升高校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与育人实效性，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提供可落地的实践路径与范式参考。

关键词：数智化红色资源；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BOPPPS 模型；ADDIE 模型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明的底色，红色血脉凝结着党的初心使命与政治本色，红色资源作为百年党史奋斗征程的宝贵精神遗存，是赓续红色基因、传承革命精神的核心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1] 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高校思政课教学面临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变革，红色资源作为思政课教学的重要资源必然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将数智化红色资源系统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体系，不仅能为传统思政课堂注入全新活力，更能推动思政育人模式迭代升级，对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数智化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意蕴

红色资源是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活化石”，更是赓续红色血脉的宝贵财富。然而，当前传统红色资源多集中在老区苏区等偏远地区，存在地区分布不均、交通不便等诸多应用困境，导致高校思政课面临参与度低、体验感弱和实效性不足等现实问题。2022 年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建设“大课堂”、搭建“大平台”、建好“大师资”，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2]。在此背景下，数智化红色资源应运而生，它通过对革命博物馆、党史馆等传统红色资源的数智化建构，让红色资源进校园、入课堂、向云端，为师生提供全息式、沉浸式、交互式的学习体验，对高校思政课教学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赋能红色资源数字化革新，打造沉浸式育人场景

在教育数智化转型的大背景下，高校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利用数智技术赋能，在内容传播、覆盖范围和互动时效性这些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为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时空限制，高校亟须积极推动数智化红色资源与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搭建全方位的思政教学新样态[3]。一方面，各地高校积极推进数智技术赋能思政课教学，系统整合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红色事迹、英雄人物等，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数智化红色资源共享平台。另一方面，高校也可依托学校官网、抖音、小红书等平台，开设红色文化主题专栏。比如，湖南地区可扎根湖湘文化沃土，将韶山故居的革命精神，岳麓书院的文脉传承，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中，并借助专栏推送一批又一批既有理论深度又具有情感温度的红色网络作品。

（二）革新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提升精准育人效能

传统思政课常因形式与资源的双重局限，难以有效地激活课堂，为破解这一困境，实现教学模式革新提供了关键路径。其一，创设教学情境，推动认知深化。教师通过科学构建情境化的教学模式，将区域化的红

色资源融入理论教学中，能够引导学生实现从认知到实践，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跃升，从而推动理论知识的价值内化。其二，增强师生互动协作，重构课堂生态。教学模式的革新必然伴随着师生关系的重塑，我国传统书院推崇的“亲其师信其道”曾是士子求学一贯坚守的原则，也为今日的课堂教学提供了宝贵借鉴[4]。数智化资源的融入，能直接赋能课堂教学，推动教学从“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灌输，转变为依托资源共研与思想碰撞的互动新形态。

（三）夯实思政育人核心目标，增强思政课吸引力与实效性

当前，提升思政课的吸引力与针对性，已成为落实思政育人的迫切任务。从吸引力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在于教学形式与资源的创新，通过数智化技术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构建起沉浸式、交互式的学习场景，有效贴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针对性的提升，则源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互转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社会实践是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因此，思政课教学应主动打造“行走的思政课”，设计一些植根于红色资源与时代课题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认识国情、世情，从而将“思政小课堂”的学习成果，转化为“社会大课堂”的行动自觉，实现从“入耳入脑”到“入心入行”的跃升。

二、数智化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设计理路

当前高校思政课改革需破解传统课堂吸引力不足、针对性不强的困境，将数智化红色资源进行教学转化并纳入结构化模型，是实现价值引领、促进深度学习的关键。本章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3年版）》第二章第二节“中国革命在曲折中前进”为例，聚焦微观的课堂教学。引入含导言、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和总结的BOPPPS教学模型，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的精准化设计，实现数智化红色资源从“素材呈现”到“情境建构”、学习活动从“被动接受”到“意义协商”的范式转变，以解决“如何上好一堂课”的问题[5]。

（一）课前启导：问题导向学情研判，精准开展导学设计

本环节旨在通过数智化红色资源的沉浸式导入，在历史情境中引发学生认知冲突，进而激发探究动机，并根据教学的重难点，实施针对性教学，从而实现以学定教。具体而言，教学设计以《血战湘江》的精选片段作为情感共鸣与认知建构的逻辑起点，其极具冲击力的视听语言能够将学生拉回长征初期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场域，从而自然引发出对革命道路抉择的价值追问。基于此，教学目标被明确构建为以史实掌握为基础、方法论运用为关键、价值认同为旨归的三维目标体系，确保教学方向与思政育人紧密相连。为实现精准化教学，课前依托学习平台进行结构化前测，其意义不仅在于知识摸底，更在于通过数智化工具采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数据，为课堂中实施差异化与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提供科学依据，从而系统性地解决传统课堂中吸引力不足、学情判断模糊的现实困境。

（二）课中探究：聚焦难点解惑提质，搭建参与式学习体系

参与式学习是BOPPPS教学模型的核心环节，旨在扭转传统思政课“单向灌输”的困境，其理论根基在于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情境”“协助”“会话”等原则。本部分并非简单的课堂活动，而是依托数智化红色资源，系统构建一条从沉浸式历史情境出发，经集体决策推进，最终落脚于价值认同的渐进式探究路径。其一，聚焦“遵义会议”，利用文献、人物图谱、军事态势图搭建一个结构化的历史争论场域。学生通过角色扮演亲历思想路线的交锋。这一亲身体验不同于简单的史实复述，而使“实事求是”这一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感知、可论辩、可选择的活的方法论，更回应了思政课如何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理解的个体认知与价值抉择的难题。其二，围绕“红军长征”，利用动态的交互地图重绘路线，将崇高的“长征精神”具象化为一系列关乎生存、充满不确定性的连续决策。学生根据动态互动地图及长征路线图，模拟应对围追堵截和艰难抉择，其决策过程再现了在极端条件下所激发的理想信念、智慧与牺牲精神。

（三）课后固化：聚焦知行合一，构建闭环反馈评估体系

课后环节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旨在构建“评价—反思—迁移”的教学闭环，推动学习成果内化为价值观念外化为实际行动。在这一阶段，后测评估常常采用“巩固性测试”与“迁移性应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设置开放式的教学问题，考查学生将历史史实和价值理念应用于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从而实现思政育人。而作为BOPPPS的最后一个环节，总结并不仅仅是知识的梳理，更是基于全流程学习数据的教学反馈。教师综合前测、课堂互动与后测进行多维度全层次的教学反馈，对教学成效进行精准评估与反思。这一数智化技术的驱动，优化了当前的教学设计，也为后续教学的发展提供了迭代更新的依据，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思政育人，最终实现知行合一的教学旨归。

三、数智化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策略优化

为推动数智化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改

革得以持续深化与系统化，本部分从宏观的视角，引入 ADDIE 教学模型，它是分析、设计、开发、实施、评估的简称，五个环节相互联结、互为依托，每个环节输出的结果亦是下一个环节的起点，并以评估为核心，保证每个环节的延续性 [6]。基于前述 BOPPPS 模型在微观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依托 ADDIE 模型作为系统化反思与改进的工具，打造一条从精准分析、科学设计、有效开发、有序实施到全面评价的完整改进路径，从而系统化地推动数智化红色资源与高校思政课的融合，切实提升育人成效。

（一）前端贯通：以精准分析锚定教学起点

“前端贯通”指在教学实施前，系统地分析教学内容、学情与环境，以数智技术为支撑，精准锚定思政课教学的逻辑起点、认知起点与情感起点，为后续教学的高效实施奠定基础。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下简称“纲要”课程）为例，其逻辑起点在于通过近代中国的历史事件，深刻阐明“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进而引导学生筑牢“四个自信”。然而，在具体的教学中，往往存在着学生虽具备一定的历史史实，但其认知呈现碎片化与片面化的特征。基于此，我们需要从三个维度展开分析，第一，内容方面，借助知识图谱和数据挖掘等技术，分析教材与历史事件的关联性，确定教学的核心问题，进而完成从教材体系向以“历史选择与道路自信”为核心的教学体系的转化，将数智化红色资源设计为可承载核心问题、可供学生探究的物质化学习载体。第二，学情方面，面向具有“数字原住民”特点的学生，分析他们在智慧平台上的学习数据，诊断他们对现有知识的理解和一些比较常见的认知误区，以此来明确思政课教学的切入点。第三，在环境方面，不再进行虚拟技术的简单叠加，利用数智技术培养“智慧教师”，打造“虚实结合，深度探究”的育人场域。

（二）中端创新：以叙事重构活化教学进程

“中端创新”指的是在 ADDIE 教学模型的设计、开发、实施阶段进行创新，构建一个以课堂互动叙事为轴心、数智化红色资源为支撑、数智技术为方法的系统，将知识、能力和价值目标融入一个连贯的教学进程中。具体而言，是通过 BOPPPS 教学模型设计课堂教学的方式，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情感参与，教师作为教学者灵活穿插讲解、研讨与情境体验，形成师生双向互动的教学闭环。因此，为实现“纲要”课程叙事的生动性与沉浸感，结合教材特点，将教学内容分成“救亡图存”“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三大专题，并围绕中国近代史中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展开教学，力图打破简单的事件罗列，引导学生理解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阶段性和连续性。除此之外，大力开发 VR 实景、高清影像等数智化红色资源，推动数智化红色资源成为“可进入、可互动、可思辨”的叙事载体，使其可以随时作为“情境道具”嵌入课堂，让学生身临其境，增强历史叙事的感染力。从整个教学过程来看，教师从简单的知识讲授者转变为叙事设计者，学生从单纯的听众转变为课堂教学的体验者，让思政课在课堂中真正“活”起来。

（三）后端闭环：以多元评价提升教学效能

评价阶段是 ADDIE 教学模型的终点环节，也是推动教学质量持续优化的全新起点，核心是将单一的评价从教学终点转变为驱动教学质量提升的新起点，具体而言，是结合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全面收集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的数据 [7]。依托数智教学平台，全面采集课前、课中、课后全流程教学数据，精准抓取学生课堂参与度、互动活跃度、任务完成质量、知识掌握程度等核心数据，精准识别课堂教学的育人共鸣点与薄弱阻滞点，精准匹配学生成长需求与育人短板。教师依托全方位数据复盘结果，系统总结教学优势与现存问题，针对性地优化资源开发、教学设计、课堂实施与活动安排，形成“数据分析—问题研判—设计优化—资源更新—课堂实施”的动态育人闭环，实现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的持续迭代、稳步升级，推动数智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的最大化释放。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J]. 求是 ,2021(12):4-10.

[2]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2(10):8-14.

[3] 胡钟喆 . 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探索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45(21):45-49.

[4] 吴殿朝 , 刘军伟 .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要加强高校师生互动与协作 [N]. 光明日报 ,2019-02-26(13).

[5] 邱燕燕 , 范嘉盈 , 夏青 , 等 . 融入 BOPPPS 的混合式形态学实验教学探索与实践 [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5,44(01):136-140.

[6] 刘追 , 刘佳 . 基于 ADDIE 模型的系统培训模式研究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2(09):47-50,78.

[7] 刘炜 , 李可 . 加涅认知学习理论指导下应用 ADDIE 模型的大学通用学术英语课程教学系统设计 [J]. 大连大学学报 , 2024,45(05):120-13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数智化红色资源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路径研究”（CX20251662）。

（作者系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高职院校美育浸润体系的三维建构：价值·现实·路径

赵新来 *　嵇　怡　杨红进

摘要：本研究聚焦于新时代高职院校美育浸润体系的系统化建构，旨在回应国家教育战略需求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使命。论文首先深入剖析了高职院校实施美育浸润在教育强国与产业升级背景下的重要价值，其次直面当前美育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与核心困境，最后从顶层统筹、体系构建、机制保障三个维度，构建多维协同的美育浸润生态，推动高职教育从单一技能培养向全面育人转型，为新时代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注入美育力量，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职院校；美育浸润；现实挑战；体系建构

美，镌刻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基因里，是跨越时空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美育，美学素养始终是国人综合素养的核心组成，最终指向精神世界的丰盈与人格的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美育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成为落实立德树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国家战略。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当前美育育人体系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普遍存在认知窄化、课程碎片化、场域单一、师资缺乏、评价缺位、保障不足等问题，与专业教育脱节，难以实现全程全域浸润。如何立足办学定位，构建系统化美育浸润体系，将美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实现审美素养、人文素养与职业素养协同提升，培养技能精湛、品行端正、气质高雅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已成为高职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新时代高职院校美育浸润的价值意蕴与时代使命

（一）美育浸润的价值意蕴

“美育的实质是培育学生对艺术、生活之美的直观感知与理性理解，塑造其正向的审美认知、审美情趣与价值评判标准，并发展其在艺术方面的创造性素质和才能。”[1]“美育的浸润是指在恒久、缓和的环境中，接受美的熏陶、感触美的体验、产生美的行动、生成美的心灵的过程。”[2] 浸润式美育突破了传统美育以艺术课程与技能训练为核心的局限，通过系统化审美熏陶、体验式活动与实践性创作，覆盖课堂教学、校园生活、社会实践的一体化育人生态，强调潜移默化、全程渗透，引导学生形成审美自觉、塑造健全品格。浸润式美育摒弃了传统的说教式灌输，审美感知在寓教于乐、耳濡目染中自然培育，塑造学生的审美品格和丰盈的精神世界，激发学生的探索欲与创造力。在高职院校实施浸润式美育，既能摆脱传统美育的困境，提升学生的审美与职业素养，又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培养兼具技能水平与人文情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教育强国战略下美育的时代使命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美育，美育渗透于学校教育、社会美育与人格培育各个环节，形成了美善合一、以美育人的文化传统。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更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向。新时代在教育强国战略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双重驱动下，“技艺＋审美”复合型人才成为产业迫切需求，更是匹配时代需求、提升新质人才质量的时代命题。“美育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意识、提升审美素养，塑造学生德艺双馨的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优良品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 职业教育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其育人质量直接关系国家产业竞争力与高质量发展大局。高职院校应将美育提升为育人主轴，推动其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培育技艺精湛、审美自觉、文化自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同时，美育浸润能引导学生涵养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传递正向审美理念、带动社会审美水平提升，为教育强国、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与强大精神动力，彰显新时代美育的使命担当。

二、高职院校美育浸润的实践现状与优化方向

（一）高职院校美育浸润的实践成效

近年来，在国家美育政策引领下，高职院校美育浸润行动计划持续深化，整体育人成效显著提升。高职院校普遍树立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育人理念，正逐步突破技能本位的传统局限，将美育全面纳入人才培养总体规划。课程建设日趋完善，公共艺术课程实现全覆盖，非艺术类专业嵌入技能美学、专业美学等教学模块，校本特色课程与线上美育资源不断丰富，有效促进审美素养与职业技能协同发展。实践载体持续拓展，校企地协同育人机制逐步健全，校内外美育实践基地、非遗工坊、研学阵地建设稳步推进，学创赛演一体化模式日趋成熟，学生参与度与实践获得感显著增强，创新创造能力得到有效锻炼。与此同时，复合型美育师资队伍建设、多元过程性评价改革、专项经费投入及校园文化环境优化同步推进，为美育长效实施提供坚实保障。高职院校美育逐步从零散活动转向系统浸润，实现与专业教育、工匠精神培育、文化传承创新的深度融合，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筑牢人文根基。

（二）高职院校美育浸润面临的现实挑战

当前高职院校美育浸润工作在推进过程中面临多重现实困境。结合国家相关政策要求与既有调研成果，其突出问题可梳理如下：一是育人理念存在偏差，育人价值共识尚未形成。受技能本位办学惯性影响，部分院校对美育重视不足，将其窄化为文体活动与技能竞赛的辅助环节，忽视审美感知与创新能力培养。因缺乏系统规划与顶层设计，美育在育人、职业、文化、创新等维度的价值难以充分彰显[4]。二是实践育人环节薄弱，平台建设滞后。美育实践开展不够系统深入，学生参与体验感不强，未能按照可直观感知、可触摸体验、可深度参与的思路搭建完善的实践平台，审美素养培育与职业技能提升难以有机融合。三是资源供给不足，育人氛围淡薄。专用美育场馆覆盖率低、利用率不高，场地、设备等资源供给短缺；课程、师资、文化三者协同不足，“高职院校学生参与美育课程的程度不高，学校开设的美育课程尚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与专业教育、职业发展融合不深，未能凸显高职职业性与实践性特色[5]。复合型美育师资缺口较大，教师美育素养有待提升，校外资源整合与协同育人机制尚不健全。四是评价与运行机制不完善，长效生态未形成。现有评价体系重显性、轻隐性，过度依赖量化指标，难以衡量深层育人成效；校本化实施细则与保障机制缺位，制约了可持续美育育人生态的构建。

三、高职院校美育浸润的实践进路

高职院校美育浸润体系的现代化构建，必须突破课程开设与活动组织思维，以生态系统的视角，从育人体系、资源协同、保障机制等多个支撑维度进行系统性革新，推动美育育人核心价值回归。

（一）体系构建：课程、平台与环境的融合设计

重构课程体系：将美育全面融入人才培养总方案，确立“审美素养 + 职业能力”双核目标，对接“三全育人”要求。构建“基础层—专业渗透层—创新层”三级课程体系，基础层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足公共艺术课程，实现全员覆盖、全员参与，落实基础性美育浸润。建设线上美育资源平台，整合各类美育资源，如优秀作品、美育课程视频、文化讲座等，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习和欣赏；专业渗透层，将技术与审美进行深度融合，对专业课程进行审美化改造，开发特色课程并嵌入相关美学模块，结合专业开设“专业美学”“技术美学”等课程，渗透各类美学理念，让技术赋能审美，让审美升华技术；创新层，立足实践，进行多层次课程开发，探索具有时代特征、学校特色、专业特点并与课程配套的美育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能够认识美、了解美，而且能够感受美、体验美、创造美。

搭建实践平台：搭建校内校外贯通、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美育实践场域，构建“校—企—地—数”四位一体美育协同生态，以沉浸式实践提升育人实效。推动实训场景美育化，将生产线、实训基地转化为美学实践场景，建设“实训室美术馆”等微空间，融入学生作品；校外共建实践基地，组织学生走进文化场馆、非遗工坊开展研学与真实项目实践，促进审美素养向职业能力转化。强化学生社团美育功能，推动其与课堂教学融合，激活第二课堂活力。深化校地协同，联合文联共建艺术家资源库，依托非遗工坊建设文创实践基地，联动各类校外阵地推行三导师制，开发特色资源包。搭建高职美育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跨校选课与学分互认。推动美育志愿服务与乡村振兴融合，拓展实践外延；校内依托社团、文化节等营造氛围，运用 AI、VR 技术创设情境化项目，提升美育体验实效。

营造浸润环境：营造“时时处处皆美育”的校园浸润环境，需践行“环境即课程、空间即教材”的理念，多措并举让美融入校园各处。优化校园景观、实训场所及教室宿舍的视觉设计，融入工匠精神、地方文化与艺术元素，让建筑、绿化、文化墙、实训设备皆具审美价值，让师生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感受美。同时丰富校园美育活动，定期举办艺术展览、非遗体验、文创设计大赛等，结合高职特色开展“技能 + 审美”展示、展演等活动，让工艺之美、服务之美、创意之美走出课堂。充分盘活校园现有空间资源，如将公共走道改造为艺术长廊，张贴与专业相关的优秀美育作品，将实训车间打造为“车间美术馆”，把生产现场转化为艺术展厅；利用校园闲置角落设置展示架，展示学生的美育实践成果等，进行轮展式文创作品展示，构建全方位、沉浸式的美育育人场域。

（二）支撑强化：师资、评价与激励的机制保障

建强师资队伍：既要配齐配强专业美育教师，更要对全体教师进行美育素养培训，使其掌握在各自领域渗透美育的方法。实施“专兼结合、全员提升”策略。邀请行业大师、非遗传承人等担任兼职教师，内培外引，聘请行业专家担任兼职导师，构建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美育育人队伍，全面提升高职美育教学与实践育人水平。实施“双师型”美育教师培育计划，依托校企实践基地，支持教师赴行业一线挂职锻炼，开展分层研修，提升辅导员的美育素养。将美育实践指导、课程开发与赛事辅导纳入职称评审核心指标。设立“美育实践突出贡献奖”，对指导省级以上赛事者给予评审加分、专项津贴与评优倾斜。同时，建立将美育成果与工作量、绩效、职称评定挂钩的激励制度。

革新美育评价机制，开展增值性评价、过程性评价、体验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应用性评价[6]。将学生的政治素养、道德品质、专业技能、身心健康、审美素养及实践能力纳入常态化考核，建立以素养为导向的多元评价体系。评价内容从单一知识技能转向审美情感、态度与实践能力并重，评价方式融合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互评、社会评价，并引入过程性成长记录。关键在于将评价结果与学生综合评价、评奖评优及学校办学质量评估挂钩，构建“过程可溯、成长可测、成果可兑”三位一体评价框架，按 40% 过程性评价、30% 成果性评价、30% 认证衔接设定权重，设置核心指标，依托美育数字凭证平台上链存证，实现评价透明可视化，评价结果对接“学分银行”，可兑换学分、作为 1+X 证书申报及企业招聘参考，强化导向作用。

夯实资源保障：高职院校应单列美育专项预算，实施精细化管理，重点保障课程建设、场地设施、教学资源、师资队伍、校园环境、数字化平台及校地协同育人等投入，强化数字化教学平台、非艺术专业美育课程与实践活动支持，积极整合政府、企业、社会资源，构建多元协同保障机制。完善美育专项奖励政策，对美育工作成效显著的师生予以表彰激励；将美育课程开发与学生审美素养提升纳入职称评审，在省级以上展演中获奖者、优质校本课程开发者可直接参评并给予配套奖励。社会层面聘请非遗大师担任“驻校艺术家”，给予经费补贴与成果收益分成；认证“美育实践基地”，赋予文创优先转化权与政策激励；设立“社区美育贡献奖”，引导社会美育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多方协同的美育育人格局。

（三）顶层统筹：战略规划与协同推进的系统工程

高职院校需从战略高度推进美育顶层设计，成立校领导牵头的美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教务、学工等多方力量，强化党委领导，健全管理与运行机制，构建全员协同的责任体系。将美育经费纳入预算，建立多元筹资机制，依托校级美育机构整合校地、行业资源，明确权责与考核标准。结合学校定位、专业特色及地方资源，制定中长期美育浸润规划，加强理论研究，探索贴合高职特点的浸润模式，推动校校、校企、校地协同，构建多元特色美育体系。设定指标形成“美育浸润指数”，纳入院校绩效考核，通过举办学期美育听证会收集多方意见，建立动态闭环，推动美育从“有政策”走向“有实效”。

四、总结

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既要坚守技术技能培养之本，更要强化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将美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高职院校美育浸润是推动职业教育从“技能本位”向“全面育人”转型的核心路径，是涵养职业品格、提升育人能力、优化校园文化的战略抓手。立足体系构建、机制保障、顶层统筹三维协同，推动美育由课堂延伸至实践、由显性教育转向隐性浸润、由单一供给走向多元协同，真正实现“浸润无痕、赋能有形”。以美育厚植工匠精神、职业道德与人文素养，促进技术理性与审美素养相融互促，不断完善全域育人格局，持续增强职业教育的文化底蕴与育人效能，为培养德技并修、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筑牢根基。

参考文献

[1] 哈尔拉莫夫 . 教育学教程 [M]. 丁酉成 , 等译 . 北京 :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3:410.

[2] 曹韦璇 . 高职院校美育浸润：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 [J]. 美术教育研究 ,2024(17):70-72.

[3] 李忠跃 , 许云珍 , 欧阳河 .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建构动因、依据与框架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20):5-14.

[4] 李桂萍 , 墨子莘 . 基于美育浸润视角的高职美育传播力提升路径研究 [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0(05):104-108.

[5] 贺桂祯 . 新时代高职院校美育的价值意蕴、问题审视及实践路径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5,38(12):81-83.

[6] 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EB/OL].(2023-12-20)[2026-01-02].http://www.moe.gov.cn/srcsite/A17/moe_794/moe_628/202401/t20240102_1097467.html.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高职院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美育空间构建与思政实践研究”（2025SJSZ1013）。

（作者：通信作者赵新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育讲师；嵇怡，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茶与食品科技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思政副教授；杨红进，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茅山校区党总支副书记）

数字生态下红色文化与高校辅导员工作融合的路径研究

彭焕卜

摘要：数字生态正重构高校思政教育格局，红色文化作为铸魂育人的核心资源，与辅导员工作深度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举措。本文立足数字生态特征与辅导员职责定位，阐释二者融合的时代价值，剖析技术应用浅层化、内容适配不足、机制保障薄弱、队伍素养不均等核心困境，从传播、教育、管理、服务维度创新实践方法，构建资源整合、队伍建设、场景渗透、机制保障的多维路径，为提升辅导员育人实效、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生态；红色文化；高校辅导员；育人方法；路径融合

一、引言

数字生态构建已成为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重要契机。高校辅导员作为科研、教学、管理之外的“第四支队伍”，是学生思想引领、日常管理与成长服务的核心力量，更是红色文化传承的关键纽带[1]。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红色基因，在思政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新时代大学生作为“数字原住民”，其认知习惯与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红色文化传播模式与辅导员工作方法难以适配。如何依托数字生态让红色文化入脑入心、见行见效，是高校思政教育亟待解决的课题。本文探讨了数字生态下红色文化与高校辅导员工作融合的时代价值、核心困境、方法创新与实施路径，旨在构建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实效性的育人体系。

二、数字生态下红色文化与高校辅导员工作融合的时代价值

（一）筑牢理想信念，强化思想引领

数字生态下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多元化，易导致青年学生思想迷茫、价值困惑、信仰动摇。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奋斗历程和精神谱系，是坚定理想信念的“活教材”[3]。将红色文化融入辅导员工作，通过数字化打造互动式、体验式场景，帮助学生理解和把握红色精神，从根本上筑牢思想根基，提升思想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丰富内容载体，提升育人效能

传统辅导员工作存在覆盖面有限、吸引力不强等问题。数字生态为红色文化融入提供多元载体和技术支撑，辅导员可借助新媒体平台、数字技术，将红色文化转化为短视频、线上研学等，既拓展工作内容边界，又契合时代学生特点，实现育人工作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动”、从“统一供给”到“精准对接”的转变，显著提升育人工作的精准度与感染力。

（三）传承红色根脉，培育时代新人

青年是红色文化传承的核心，高校是红色文化传播的主阵地。辅导员作为与学生接触最密切的教育者，其工作场景是红色文化传承的关键渠道。通过数字生态推动红色文化融入辅导员工作，能够打破时空限制，让青年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熏陶、感悟红色精神。这种融合能引导青年学生自觉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把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四）革新工作模式，提升辅导员能力

数字生态为辅导员工作模式革新提供了新机遇和新要求。红色文化与辅导员工作融合，是以红色文化为内核、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模式。这一过程能够倒逼辅导员主动提升红色文化研究与解读能力、数字化技术应用与开发能力、跨界融合与精准育人能力，推动辅导员实现工作理念、方法、载体与机制的全面升级，促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三、数字生态下红色文化与高校辅导员工作融合的核心困境

基于高校实地调研、辅导员访谈、工作案例分析及相关研究文献梳理，聚焦融合实践中待优化的关键

维度，其核心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技术应用深度不足，融合育人效能有待释放

高校辅导员在红色文化育人工作中对数字技术的应用多集中于线上信息传递、线下活动影像留存等基础场景，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仿真等先进数字技术尚未深度应用。数字技术在互动体验、个性化推送、场景化构建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红色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性仍有待增强。线上线下育人环节的协同衔接机制尚未健全，技术应用与文化内容的融合契合度有待提升，协同育人的聚合效应尚未充分释放。

（二）内容供给适配性不够，精准对接机制有待完善

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体系建设仍需优化，现有资源多以历史影像、理论文献等传统类型为主，符合青年学生认知习惯与兴趣偏好的短视频、互动体验项目、虚拟研学课程等产品供给仍有提升空间。内容设计环节对不同专业背景、年级层次学生的思想发展特点、成长成才需求、职业规划方向的差异化关注不够充分，与学生现实关切、生活实际及发展诉求的关联性需进一步强化，以提升红色文化的情感共鸣力与主动参与度。

（三）融入机制构建不深，协同保障体系有待健全

红色文化与辅导员工作融合的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有待完善，相关工作多以阶段性开展，尚未完全纳入高校数字生态发展整体布局，缺乏明确的目标设定与实施路径。高校内部宣传部、学工部、信息技术中心、各院（系）等协同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红色文化与数字化资源的整合共享效率有待提升。数字化平台建设、专项经费投入、评价激励机制、长效保障措施等支撑体系仍需优化，为融合工作的持续推进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四）队伍素养建设不足，综合育人能力有待提升

部分辅导员对红色文化的系统研究与深度解读能力有待提升，将红色文化与学生思想实际、成长需求有机结合的转化能力需进一步增强。在数字化技术应用层面，辅导员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个性化设计、精准化传播等方面的专业能力仍有提升空间[4]。针对红色文化与数字化技术融合应用的专项培训机制尚不完善，辅导员参与融合工作的时间与资源保障有待加强，助力其更好地实现融合工作“融得深、融得透、融得实”。

四、数字生态下红色文化与高校辅导员工作融合的方法创新

立足高校育人实践与数字生态发展趋势，结合辅导员工作实际与学生成长需求，聚焦“传播、教育、管理、服务”的方法创新与效能提升。

（一）传播方法：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

构建“新媒体矩阵 + 互动场景”的传播体系，实现红色文化传播互动化、场景化、个性化。辅导员可利用短视频平台，制作“红色故事宣讲”“红色精神解读”“红色人物风采”等视频吸引学生；依托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开展“线上红色读书会”“红色知识打卡”“红色主题征文”等活动，设置话题讨论，激发参与热情；邀请老党员、革命后代开展“云端讲座”“红色故事会”等活动，实现从“单向传播”向“双向互动”的转变；分析学生兴趣偏好，精准推送个性化红色文化内容，提升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教育方法：从“线下为主”到“双线融合”

构建“线上 + 线下”“虚拟 + 现实”的教育模式，提升红色教育的感染力。线上依托智慧平台搭建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库，提供微课学习、线上讨论等服务，满足学生碎片化、个性化学习需求；线下结合主题班会、团日活动、社会实践等，开展红色文化情景剧表演、红色文创设计大赛、红色歌曲传唱、红色基地实地研学等活动，强化沉浸式体验和实践感悟。有条件可借助虚拟仿真技术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组织“线上云研学 + 线下实地探访”相结合的红色研学活动，提升教育效果。

（三）管理方法：从“经验管理”到“数据驱动”

形成“人类智慧 + 机器智能”的赋能体系，实现教育效能的系统性提升[5]。通过分析学习行为、兴趣偏好等，把握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程度、需求特点和接受习惯，为个性化方案制定、内容优化、方法调整提供支撑；在日常管理中将红色文化融入学生行为管理体系，设置“红色榜样”“红色标兵”等机制，将学生参与红色文化活动、践行红色精神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践行红色精神；借助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红色文化融合工作的流程化、规范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效能。

（四）服务方法：从“被动响应”到“主动精准”

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依托数字化平台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红色文化服务。在学业指导上，针对不同专业推送不同的红色资源，如为理工科学生推送“红色科技工作者奋斗故事”典型案例，为文科学生推送“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相关案例，将红色精神与专业学习相结合；在心理健康教育上，通过红色故事、榜样力量等形式，帮助学生缓解心理压力、增强心理韧性；在就业帮扶上，搭建数字化就业平台，链接基层岗位、西部计划等资源，引导学生将职业选择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

五、数字生态下红色文化与高校辅导员工作融合的实施路径

以“四位一体”的方法创新为载体，构建“资源整合为基础、队伍建设为支撑、场景渗透为关键、机制保障为依托”的实施路径，将载体与路径深度融合，

最终实现学生、辅导员个人成长与高校组织发展的双向赋能。

（一）整合优质资源，打造数字资源平台

一方面，加强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建设，组建“党史专家＋数字技术人才＋辅导员＋学生骨干”的资源开发团队，深入挖掘红色人物、红色事件、红色基地等核心资源，制作短视频、音频等多样化数字产品，构建分类清晰、内容丰富、适配性强、更新及时的红色文化数字化资源库；另一方面，推动校内外资源共享，主动对接本地革命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数字企业、兄弟高校等，争取免费数字化资源授权，同时加强校际合作、校企合作，共建共享红色文化数字化平台，打破资源壁垒。在现有平台基础上优化功能，设置资源检索、在线学习、互动交流三大核心模块，方便辅导员快速调取资源、学生随时在线学习。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升综合育人素养

构建多层次、系统化的辅导员培训体系，提升红色文化素养与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定期开展红色文化专题培训，邀请党史学者授课，组织辅导员赴红色教育基地实地研学、参加红色文化研讨会等，深化辅导员对红色文化的理解能力；开展数字化技术培训，涵盖短视频制作、直播运营、大数据分析等内容，提升辅导员数字化工具使用能力。建立“辅导员＋党史专家＋数字技术教师”结对帮扶机制，组建复合型育人团队；搭建辅导员交流平台，组织红色文化融合工作经验分享、案例研讨等活动，促进辅导员相互学习、共同提升；将红色文化融合能力纳入辅导员考核评价和职称晋升体系，激励辅导员主动提升综合素养。

（三）聚焦核心场景，实现精准融入渗透

围绕辅导员思想引领、日常管理、学业指导、心理健康、生涯规划等核心工作场景，推动红色文化精准融入。思想引领场景：开展“云端红色主题团日”“线上党史知识竞赛”等活动，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日常管理场景：将红色文化融入学生行为规范、宿舍文化建设、班级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学风建设场景：搭建线上红色交流平台，开展相关竞赛项目与社会实践活动，将红色精神与学术竞赛、实践创新相结合[6]；心理健康场景：借助数字化平台开展红色文化心理疏导等服务，增强学生的心理韧性；生涯规划场景：通过线上讲座、案例分享、职业测评等形式，引导学生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需求、红色传承相结合。

（四）完善机制保障，确保长效稳定推进

将红色文化融合纳入高校数字生态发展规划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成立校院两级专项工作组，明确党委统一领导、多部门协同联动、辅导员具体落实的工作格局。加大经费投入，重点用于资源建设、平台维护、培训与活动开展，经费向一线辅导员倾斜；加强技术保障，由信息技术中心组建技术支持小组，负责平台日常维护和突发问题处理。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将融合工作成效纳入年度考核，兼顾活动参与人数、资源使用量等量化指标与学生反馈、思想转变等质化成效；建立动态反馈优化机制，通过学生问卷调查和辅导员座谈收集问题建议，及时调整工作方法，形成“实践—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

六、结语

数字生态为红色文化与高校辅导员工作融合提供了重要机遇，也提出更高要求。红色文化作为铸魂育人的精神富矿，与辅导员工作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配数字生态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技术应用浅层化、内容适配不足、协同机制僵化、队伍能力不均衡等现实问题，高校需以资源筑基、队伍赋能、场景浸润、机制护航，通过传播、教育、管理、服务创新，让红色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新活力。同时，辅导员应主动适配数字趋势，提升红色文化素养与数字化应用能力，在育人实践中主动作为，助力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1] 孙浩 .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辅导员新质思政胜任力提升研究 [C]//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讨会论文集 . 东北电力大学 ,2025:461-463.

[2] 徐功献 , 王兴平 . 高校思政课推进红色文化育人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意蕴、原则机制与实践遵循 [J]. 井冈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4,45(01):56-62.

[3] 管越 . 红色文化精神融入高校辅导员心理育人工作的路径探析——以沂蒙精神为例 [C]// 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4 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与职业发展论坛论文集 . 临沂大学 ,2024:330-334.

[4] 何建巧 , 王敏 .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辅导员网络育人创新路径研究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4,15(07):206-208.

[5] 周婉琴 .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路径 [C]//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讨会论文集 . 大连交通大学 ,2025:530-533.

[6] 明望舒 . 陕西红色文化融入本省高校辅导员思政工作研究 [J]. 商洛学院学报 ,2023,37(03):8-1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陕西省商洛学院 2025 年度校园文化精品项目“‘走新’又‘走心’：探索教育数字化赋能高校红色文化育人新路径”(XYJP2504)；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青年课题“新工科视域下《人工智能》课程教学模式创新与人才培养路径研究”（SGH25Q521 ）。

（作者系商洛学院数学与计算机应用学院助教）

“大思政课”视域下非遗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政实践教学的创新路径研究

王湘臻　郭亚茹　高红敏　黄亚薇

摘要：在“大思政课”建设纵深推进、职业教育迈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双重时代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承载民族文脉、劳动智慧、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活态文化载体，与高职院校思政实践教学的立德树人核心目标具备高度的内在耦合性。“大思政课”秉持开门办思政、实践育新人的核心理念，打破传统思政课堂的时空壁垒与育人边界，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通，为非遗文化赋能高职思政教学改革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与广阔实践空间。本文立足“大思政课”育人格局，系统阐释非遗文化融入高职思政实践教学的内在逻辑与价值意蕴，梳理当前院校实践探索的现状与短板，从理念重构、平台搭建、师资培育、数智赋能四个维度构建系统化创新路径，打造“理论阐释—技艺体验—专业联结—社会延展”沉浸式闭环育人范式，实现非遗文化传承、职业素养培育与思政价值引领的双向赋能、同频共振，为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政实践教学提质增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大思政课”；非物质文化遗产；高职院校；思政实践教学；育人创新路径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持续推动思政课守正提质、迭代升级。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1]。此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要求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强化问题导向、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资源与力量，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2]。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阵地，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更为紧迫的改革需求，亟待探索契合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思政实践教学创新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所蕴含的工匠精神、价值理念与实践智慧，同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目标存在高度内在耦合性。当前学界已有不少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思政教育融合的研究，但现有成果大多是对一般性融入路径的宏观阐释，针对高职院校，开展“大思政课”与非遗育人功能的系统性整合研究仍有明显不足。基于此，本文立足“大思政课”全域育人视域，结合多地高职院校非遗思政实践典型案例，系统剖析非遗融入高职思政实践教学的内在机理、现实短板，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长效化的创新育人路径，助力高职思政教育内涵式、特色化、高质量发展。

二、“大思政课”视域下非遗融入高职思政实践教学的内在逻辑

（一）“大思政课”的育人理念和核心内涵

“大思政课”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现代教育模式，其本质在于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桎梏，构建起“理论学习—情感认同—行为践履”的闭环育人链条。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通过课堂内外的协同育人机制，整合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多方资源、联系社会实际，培养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的人才。依托“行走的思政课”等创新形式，“大思政课”破解了传统思政课在“知行脱节”问题上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瓶颈，为学生在实践参与中实现价值内化创造了条件。“大的责任担当、大的内容格局、大的课程体系、大的延伸空间”共同构成了“大思政课”的核心内涵[3]。总体而言，“大思政课”突破了传统思政课堂的物理边界，以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为重点内容，通过有目的、有设计、有组织的课程，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资源，在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的有效融合中，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故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特别是新时代故事。

（二）非遗文化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及其育人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精神的结晶，涵盖传统技艺、表演艺术、民俗活动、节庆礼仪等多元领域，其思政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在道德教化层面，非遗是思政教育的鲜活教材。传统戏曲通过剧情与人物塑造，将忠义、孝悌等价值观融入艺术表达；传统技艺中匠人的精雕细琢，诠释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些非遗代表性项目将抽象的传统文化精神规范转化为可感的文化符号与实践场景，打破了理论说教的局限，增强了思政教育的感染力[4]。

在文化认同层面，非遗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记录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智慧与精神追求。让学生参与非遗体验，能够跨越时空与先辈产生情感共鸣，直观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进而建立民族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

在工匠精神培育层面，非遗技艺讲究手脑结合、精益求精，强调在重复性实践中追求极致、在规范化程序中寻求突破。这与高职院校培养德技并修、知行合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深度契合。非遗融入高职思政教育，能够有效发挥以文化人的育人功能，两者的融合以“人”为先，观照学生的精神成长与职业理想；以“文”为重，挖掘技艺背后的历史文化脉络；以“化”为核，实现价值观在实训场景中的自然渗透与内在生成。

（三）非遗融入思政实践教学的理论基础与耦合机制

非遗与高职思政实践教学的融合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课程论视角看，隐性课程理论强调文化环境对学生价值观的潜移默化作用，非遗正是通过技艺体验、文化浸润的方式实现思政教育的隐性渗透。从体验学习理论视角看，美国教育学家大卫·库伯提出的“体验—反思—抽象—应用”学习循环，与非遗“做中学”的教学模式高度吻合[5]。学生在非遗实践中经历具体体验、反思观察、抽象概括和主动验证的完整过程，从而实现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同的价值内化。从文化生态学视角看，文化生态理论强调教育系统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非遗嵌入思政教育本质上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本的生态重构过程[6]。

非遗融入思政实践教学的耦合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目标耦合上，非遗育人所追求的文化传承、价值引领与高职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高度一致；内容耦合上，非遗蕴含的工匠精神、家国情怀、劳动智慧等元素，与思政教育核心内容形成互补互融；方法耦合上，非遗技艺的亲身体验、动手实践特性，为思政实践教学提供了天然的活动载体和方法创新空间。这一耦合机制为非遗深度融入高职思政实践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内在逻辑。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非遗融入高职思政实践教学的创新路径

近年来，全国各地高职院校在非遗融入思政实践教学方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探索。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开展扎染、茶艺、剪纸等非遗工艺体验活动[7]；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探索“非遗传承 + 美育实践 + 思政育人”三位一体模式[8]；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与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9]；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聘请10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为思政课实践教学导师，推动非遗进校园从“活动化”走向“体系化”[10]。上述实践在课程融入、平台搭建、师资建设等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但多集中于局部环节的创新探索，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育人范式。基于此，本研究立足“大思政课”视域，从理念重构、平台搭建、队伍建设和数智赋能四个维度协同推进，构建“理论阐释—技艺体验—专业联结—社会延展”的沉浸式育人新范式，实现非遗传承与思政教育的双向赋能。

（一）理念重构：以系统性思维推进非遗与思政教学深度融合

“大思政课”建设要求打破传统思政课的固有边界与运行模式，实现育人范式变革，围绕育人生态、价值内化与意义生成重构理念、创新路径、升华文化。将非遗融入高职思政实践教学，首先要转变理念。第一，树立系统融合思维。从整体多维考量，将非遗融入思政教学纳入高职“大思政课”建设整体框架，构建“思政课教师 + 非遗传承人 + 专业课教师”的课程开发团队，协同设计“必修 + 选修 + 实践”的非遗思政课程体系。第二，树立长线育人思维。将非遗融入从短期“进校园”升级为“在校园”的常态机制，避免表面化，通过建设非遗工作室、驻校传承人、常态实践项目等，实现非遗文化可持续融入。第三，树立价值转化思维。从“为何融入”和“如何融入”出发，深度挖掘梳理非遗资源的思政元素，提炼适配思政内容体系的教学素材，推动非遗资源从展示性资源转化为过程性实践载体，发挥非遗以文化人的作用。

（二）平台搭建：构建“课堂—校园—社会”三级联动实践场域

“大思政课”之“大”强调开放办课，整合全社会资源，高职院校应立足这一理念，搭建多层次立体化的非遗育人实践平台。首先，打造“行走的非遗思政课堂”，组织学生走进各类非遗相关场地，开展研学实践等活动，依托“非遗 + 文旅”等现实场景，让学生在服务地方文化建设时，深化文化传承的责任与担当。其次，建设沉浸式非遗校园文化生态，高标准建设非遗传承基地和主题展览，展示各类非遗项目，定期举办非遗相关主题活动，在校园空间融入非遗元素打造浸润环境，让非遗催生出鲜活的思想增量。最后，构建校企协同育

人实践平台，高职院校立足产教融合办学特色，和相关企业共建非遗产业学院或校外实训基地，由企业提供真实项目，学生以团队形式参与研发，实现学做结合。

（三）队伍建设：培育“思政＋非遗＋产业”复合型双师育人团队

高素质师资队伍是非遗融入思政实践教学的关键保障，首先要着力构建专兼结合、优势互补的“双师”育人团队。其一，要健全思政课教师非遗素养培训机制，将非遗知识纳入思政课教师继续教育体系，定期组织教师赴非遗传承基地研修调研，提升相关认知与教学融入能力；同时鼓励思政课教师与非遗传承人共同备课、联合教研，探索形成稳定合作机制与标准化集体备课流程，实现非遗技艺传授与思政价值引导的融合共生。其二，要建立非遗传承人驻校任教制度，推动非遗传承人从“讲座嘉宾”转变为“驻校教师”，构建“传承人＋双师型”教师协作机制，共同开发校本教材，推动非遗走进课堂融入实践；有条件的高职院校还可依托优势专业建设“非遗大师工作室”，聘任高级别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长期驻校，形成结构完善的师资格局。其三，要深化“产业导师”制度，聘请合作企业的劳模、技术能手、非遗文创从业者担任产业导师，分享非遗技艺在产业发展中的实际应用，通过现身说法，向学生传递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和职业规范。

（四）数智赋能：依托数字技术打造智慧化非遗思政育人新生态

数智化技术为非遗融入思政教学提供了新可能，顺应教育数字化发展趋势，以数智技术赋能非遗育人，已经成为“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实践教学创新的重要突破点。首先是开发数字化非遗思政教学资源，搭建数智化育人平台，整合地方非遗资源数据库，结合学生审美偏好定制沉浸式体验场景，让非遗从可观赏的“他者文化”转变为可参与的“自我表达”，同时制作适配新媒体的各类教学素材，让非遗突破时空限制，覆盖更多学生。其次是推动非遗的数字化创新与传播，依托高职院校相关专业优势，鼓励学生运用新媒体技术开展非遗传播实践，指导学生借助新媒体平台记录非遗传承过程、解读非遗内涵，创作适配传播的内容，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相关非遗账号运营，提升非遗传播的时代性与传播力，这种“非遗＋新媒体”的实践方式，既实现了思政教育的内容载体创新，也为学生提供了将专业技能应用于文化传承的实践场景。

四、结语

在“大思政课”建设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时代背景下，推动非遗文化深度融入高职院校思政实践教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夯实青年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也是破解高职思政育人知行脱节、推动思政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创新举措。非遗文化所蕴含的工匠精神、劳动智慧、家国情怀与人文底蕴，精准适配高职院校德技并修的人才培养，为高职思政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育人资源。

本文立足“大思政课”全域育人视域，厘清非遗融入思政实践教学的内在耦合逻辑，结合多地院校实践案例梳理现存短板，通过理念重构打破育人思维局限，通过四维联动平台拓宽育人场域，通过复合型师资筑牢育人支撑，通过数智技术激活育人活力，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长效化的非遗思政育人新范式。未来，高职院校需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产教融合、数智赋能，持续挖掘非遗育人价值、优化育人路径、迭代育人模式，让非遗文脉在校园落地生根，让匠心精神滋养青年成长，助力培育兼具专业技能、职业素养、文化自信与家国担当的新时代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文化强国建设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参考文献

[1]“‘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N]. 人民日报 ,2021-03-07(01).

[2] 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工作方案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N]. 中国教育报 ,2022-08-20(01).

[3] 燕连福 .“大思政课”建设的基本内涵、历史回顾与未来着力点 [J]. 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2021(03):127.

[4] 牛威震 , 郑宽宽 .“大思政课”背景下非遗与思政课融合路径研究——以舟山渔民号子为例 [J]. 社会与公益 ,2026(08):54-56.

[5] 陈沉 . 开放教育创新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研究——基于“体验学习圈”教育理论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4,37(16):26-28.

[6] 蒋士会 , 王远芳 , 刘燕群 .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乡村学校文化功能的重构 [J]. 当代教育科学 ,2025(03):52-59.

[7] 江苏省教育厅 .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展“非遗铸匠心，技能报国情”系列活动 [EB/OL].(2024-10-22)[2026-06-18].http://jyt.jiangsu.gov.cn/art/2024/10/21/art_57813_11394068.html.

[8] 张菡喆 .“老民歌”唱响高校课堂 [N]. 安徽日报 , 2025-10-22(09).

[9]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 行走的思政课 | 学校与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EB/OL].(2025-04-16)[2026-06-18].https://jwc.sdvcst.edu.cn/info/1005/8985.htm.

[10] 齐鲁网·闪电新闻 .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成立潍坊非遗工匠精神传承发展研究院 [EB/OL].(2026-04-27)[2026-06-18].https://sdxw.iqilu.com/w/article/YS0yMS0xNzE2NjY3Mg.html.

（作者：王湘臻、黄亚薇，菏泽职业学院讲师；郭亚茹，菏泽职业学院助教；高红敏，菏泽职业学院副教授）

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基于N市调研数据分析

梁丹丹

摘要：近年来，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日益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的热点议题，受到职业学校思政教师的广泛关注。本研究立足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律，对N市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情况进行调查，系统分析当前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四个维度的现实状况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促进中高职思政课的有效衔接与协同育人效能的提升，助力培养兼具理想信念与职业素养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现代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关键词：职业教育；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召开五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这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创新发展的规律，为新时代推进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就是要把学校思政课视作一个跨多个学段的有机整体，根据大中小学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阶段与认知规律，统一部署、分类启动，形成铸魂育人的合力[1]。了解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分析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的现状、探讨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的对策，对提高职业教育育人水平、培育时代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调研设计

（一）调研对象

本研究以N市为例，采用分层和目的性抽样方式，在五年一贯制院校中，选取5所院校的学生及思政课教师开展问卷与深度访谈，从而确保调研的全面性与针对性。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调查，参考现有的文献资料，并结合思政课专家的访谈和评定意见，将问卷的题目主要分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四个维度，对5所院校师生进行线上调查，回收有效问卷437份（高职教师36份、中职教师24份，高职学生186份、中职学生191份），并每校访谈3名教师和2名学生，最后整理问卷和访谈结果，进行分析。

二、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的现状

（一）教学目标衔接意识全面确立

在《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中明确要“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中提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中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渠道，其思想政治教育的衔接与协同至关重要。中高职教师高度认同且重视一体化建设，在目标衔接方面也积极践行。调研显示，高职教师设计课程目标时，对中职课程标准系统参考并衔接和部分参考的占比为64%；中职教师设计课程目标时，对高职课程目标系统参考并衔接和部分参考的占比为46%。结合访谈内容可知，在实践上，中职阶段聚焦“常识性学习”，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认知”和“认同”教育；高职阶段侧重“理论性学习”，更强调“理解”“运用”和“践行”，要求学生能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这表明中高职教学在目标衔接方面已具备良好基础，同时仍有拓展空间，未来可以通过加强双向沟通与资源共享，进一步提升衔接的系统性并扩大覆盖面。

（二）教学内容体系构建初具基础

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对于有效利用教学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调查显示，教学过程中，高职教师对中职与高职教材内容衔接处理时，衔接合理和略有提升的占比为25%，可进一步优化的占比为75%；中职教师对中职与高职教材内容衔接处理时，衔接合理和略有提升

的占比为12%，有待加强的占比为88%。高职学生认为，高职思政课程内容与中职阶段内容有重叠属于自然过渡，其中认为极少重复和全新内容的占比为30%，能感知到内容存在一定重复的占比为70%（见图1）。结合访谈内容可知，中高职教材内容存在交叉重叠现象，这既为知识衔接提供了连续性基础，也对梯度设计提出更高要求。例如，改革开放、新发展理念等内容在中职阶段已涉及，高职阶段需在此基础上深化理论分析和现实应用；而对于一些需要深厚理论铺垫的内容，如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中职阶段可适度介绍相关概念，以利于高职阶段的深度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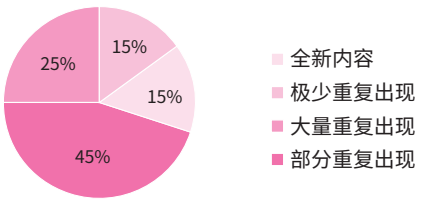


图1 高职学生认为中高职思政课程内容重复出现情况

（三）教学方法持续创新

在教学方法上，中职思政课教学因学生年龄和认知特点，更多采用案例故事、视频观影、小组讨论等趣味性、体验性较强的方法；高职则逐步增加项目式学习、专题研讨、辩论赛等更具思辨性和探究性的方法。问卷调查表明，有66%的高职教师采用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有34%的高职教师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和实践教学法；有54%的中职教师采用讲授法和案例教学法，有46%的中职教师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和实践教学法。有43%的高职学生喜欢教师讲授和视频/多媒体教学的教学方式，有57%的高职学生喜欢小组讨论学习法和实践教学法；有35%的中职学生喜欢教师讲授和视频/多媒体教学的教学方式，有65%的中职学生喜欢小组讨论学习法和实践教学法。结合访谈内容可知，中高职两个学段的教学方法呈现出基于学情的自然差异，有效的衔接设计是引领学生从中职“情感体验”跨越至高职“理性思辨”的关键桥梁。

（四）教学评价多元探索

当前评价体系方面，中职侧重期末笔试结合平时表现，关注知识记忆和行为养成；高职同样以笔试为主，但试题更注重材料分析和观点论述，同时结合社会实践报告等进行评价。问卷调查显示，高职教师采用标准化考试的占比为100%，采用实践报告的占比为56%，采用课堂展示的占比为83%，采用德育行为记录的占比为6%；中职教师采用标准化考试的占比为100%，采用实践报告的占比为42%，采用课堂展示的占比为83%，采用德育行为记录的占比为13%。结合访谈内容可知，思政课教师认为应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在实践中，各校也进行了积极探索，评价方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笔试。

三、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一）教学目标衔接实践待推进

现有政策多聚焦“大中小学”一体化，针对职业教育的也在持续健全。调查问卷显示，高职教师中认为当前系统建立有效中高职教学目标衔接机制和有临时沟通渠道的占比为28%，认为当前没有建立有效中高职教学目标衔接机制和不清楚的比例为72%。调查分析可见，中职思政课程和高职思政课程间一体化的课程标准与协同教研机制尚处在建设完善阶段，教学目标衔接实践仍需进一步推进，以更好地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梯度效果。

（二）教学内容衔接待优化

平台建设是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途径[2]。调查显示，高职教师与中职教师定期开展和偶尔开展协同备课或教研的占比为58%，从未开展和无合作渠道的占比为42%，中职教师与高职教师定期开展和偶尔开展协同备课或教研的占比为54%，从未开展和无合作渠道的占比为46%；高职教师认为跨学段教学（如中高职同上一堂课）的主要障碍是课时安排冲突的占比为28%，缺乏合作机制的占比为89%，学生水平差异大的占比为56%，无政策支持的占比为92%，中职教师认为跨学段教学（如中高职同上一堂课）的主要障碍是课时安排冲突的占比为21%，缺乏合作机制的占比为83%，学生水平差异大的占比为75%，无政策支持的占比为42%。从调查和访谈中可以看出，中高职学校间的合作机制与沟通平台尚处在逐步建立和完善阶段，教师对中职已讲内容、高职需深化内容和需补充内容的整体把握有待进一步精准，教学内容衔接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

（三）教学方法设计需递进

教师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必要性认知清晰，教学方法创新与实施能力逐渐提升。问卷调查显示，高职教师认为根据高职生特点设计教学活动完全适配和部分适配的占比为67%，需进一步优化来更好适配学情的占比为33%；中职教师认为根据中职生特点设计教学活动完全适配和部分适配的占比为71%，设计需进一步加强针对性的占比为29%。访谈结果显示，高职思政课教学注重理论思辨（如项目式学习、案例深度研讨），这些设计可以更好地衔接中职阶段已有的教学方法基础，进一步形成递进关系；中职强调直观体验（如故事、情景模拟），可以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注重与高职思辨方法的衔接与过渡。教学方法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梯度设计，以利于实现从“感知体验”到“理论内化”的顺畅过渡与螺旋上升。

（四）教学评价维度待拓展

中高职思政课程评价以学期末的笔试和平时作业

为主要形式，需进一步拓展评价维度来更好地呈现学生学习过程、态度转变和行为养成等方面的成长信息，从而更全面地体现学生从一个学段到另一个学段的成长轨迹。问卷调查显示，高职教师和中职教师需要高职课程标准解读资源、跨学段教学案例库、数字化共享平台及保障专项教研经费等方面的支持。访谈结果显示，高职教师表示在德育或思政分数之外，期待获取更多过程性评价信息。“分数只是一个结果，它无法告诉我这个学生价值观塑造的特点、参与过哪些有意义的实践活动等。”分析结果表明，现有评价体系在持续追踪与增值评价机制方面尚在探索完善中，数据共享机制可进一步建设，以利于不断增强评价的针对性。

四、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的对策

（一）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学段贯通”的目标协同机制

制度建设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3]。规章制度的完善，对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依章有序开展工作起到重要作用，具体包括管理制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培训制度、评价制度、考核制度等，能够切实推进中高职院校依章工作。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课程标准和协同机制，依据学生认知与心理发展规律，明确阶段性学习目标以及各学段在知识、能力、素养方面的具体要求，形成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课程目标。

（二）搭建教研平台，构建“螺旋式上升”的教学内容体系

实现课程教学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要加强交流，构建沟通交流机制[4]。搭建教研平台，建立“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教学联盟”，通过集体备课进行中高职思政教学内容的难度、逻辑、案例的衔接研究。例如，组织师资对中职课程和高职课程教材进行对比研读，绘制“知识点地图”，明确区分“基础知识点”“重复深化点”和“高职延伸点”。设计中高职衔接的“专题教学模块”，如“共同富裕”“生态文明”等，实现教学内容的逐层递进。

（三）加强协同合作，推进“能力递进”的教学方式创新

思政课教学目标是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教育者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将教育内容作用于受教育者进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5]。中职阶段在开展常识性学习、以学生的认知为基础的同时，有意识嵌入简单的案例分析、观点陈述等，培养初步的思辨能力。高职阶段充分利用高职生实践能力强的特点，大力推广社会调研、理论宣讲等实践性教学方法，促进理论内化与践行。探索信息技术建设一体化网络教学平台，共享优质课程资源。例如，中职思政课以“脱贫攻坚”案例开展教学，高职阶段进一步延伸学习“乡村振兴战略”“共同富裕”等相关内容，同时利用VR技术复现改革开放历程、“一带一路”建设等场景，为中职学生提供沉浸式体验，对高职学生开展“数据可视化分析”与“国际合作研究”，实现学生能力分层递进培养。

（四）完善评价体系，建立“纵向跟踪”的发展性评价机制

构建科学合理的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评价体系。探索建立中高职贯通的学生思政素养成长档案，记录其在各学段的行为习惯、关键表现、作品成果和评价数据。改革评价方式，增加项目作业、实践报告、口头答辩等综合评价比重，注重考查理论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尝试开展增值性评价，关注学生从中职到高职阶段在思政素养方面的进步幅度，科学评估一体化教学效果。开发一体化评价平台，搭建“中高职思政课评价云平台”，构建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关注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表达的能力、学习行为及表现等，实现中高职学生学习成效的全面评估，生成学生个性化成长报告。

五、结语

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坚持问题导向，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相结合，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四个维度进行一体化建设，推动各学段思政课教学纵向衔接、横向贯通，提升思政育人成效，为培养大批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 凌小萍 .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实践困境与突破路径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03):11-20.

[2] 王慧 .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J].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21(04):58-63.

[3] 许瑞芳 , 张宜萱 . 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现状调研与对策分析——基于上海市的数据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07):60-65.

[4] 马宝娟 , 张婷婷 .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 问题与对策 [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0(02):4-8.

[5] 赵浚 , 白如 .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实践策略 [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1(05):16-1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年度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立项研究课题“中高职思政课纵向一体化建设研究”（B/2024/7/018）。

（作者单位：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南京财经分院信息艺术系）

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张越君　李晓晨　冯潇潇

摘要：本文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阐释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意蕴，系统剖析当前融合工作在理念、机制、实践、师资、评价五大层面的深层困境。针对学科认知割裂、统筹机制缺位、教学融合浅表、师资能力失衡、评价导向滞后等问题，基于协同育人、全人教育与积极心理学等核心理论，构建顶层统筹、课程融合、师资共育、评价保障“四维联动”的系统化实践路径。“四大机制”环环相扣、协同发力，旨在推动二者从形式叠加走向深度耦合，为高校完善协同育人体系、提升育人实效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思政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价值意蕴；实践路径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学生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这一重要论述为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指明了根本方向，也契合全人教育视域下青年身心与思想协同发展的核心要义。

国家顶层政策层面接连作出明确部署，为二者融合提供权威依据：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提出“以德育心”的核心要求，明确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德育思政工作全过程；2018 年教育部党组印发的《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进一步指出，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育心与育德相统一。

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的“一体两翼”：前者解决“思想航向”，后者筑牢“心理根基”。当前学生心理困惑与思想偏差相互交织，单一干预易陷误区。推动二者融合，是破解育人碎片化难题、完善大思政格局的必然选择。

二、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意蕴

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并非简单的工作叠加或形式结合，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人教育理念、协同育人理论与积极心理学核心内涵的深度融合，具备多层次的育人价值，有助于弥补单一育人模式的学理缺陷与实践短板。

其一，实现标本兼治，破解心理育人“工具化”困境。从内在学理来看，大学生心理问题大多源于价值认知偏差、理想信念缺失与责任意识淡薄，是思想问题外化引发的心理失衡，单纯依靠积极心理学层面的情绪疏导，只能缓解表层症状，无法根治根源问题。将思政教育融入其中，立足立德树人的根本导向，能够以价值引领纠偏思想认知，跳出传统心理育人重矫治、轻预防的工具化误区，可有效弥补心理健康教育在价值引领方面的不足[1]，契合全人教育重视个体整体性发展的核心要求。

其二，完善育人格局，补齐协同育人的体系短板。长期以来，高校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分属不同工作体系与学科范畴，难以形成育人合力。同时，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目标设置模糊、内容不完善，制约了其与思政教育的协同效应发挥[2]。将思政教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能够打破学科壁垒，把心理育人纳入大思政格局。既以心理关怀的人文温度软化思政教育的生硬感，又以价值引领的思想高度提升心理教育的育人层次，推动高校育人从单一模块发力转向全域协同推进，实现两类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三，积极心理学倡导培育理性平和的积极品质，这与思政教育倡导的奋斗精神、家国情怀高度契合。新时代大学生学业、就业、人际压力交织，融入思政教育能够引导学生跳出个人情绪的狭隘视角，树立正确的成败观与义利观。在培育积极心理品质的同时，

厚植家国情怀与责任意识，实现心理素质与思想素养同步提升，真正培育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担当者[3]。

其四，立德树人是高校的中心环节，心理健康是成长成才的基础，价值观念是发展的方向，二者统一于培养时代新人的核心目标。思政教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始终围绕“培养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既守护青年身心健康，又坚定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筑牢思想与心理的双重防线。

三、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层困境与归因剖析

当前高校思政教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普遍停留在浅层磨合、形式融合阶段，难以实现深度耦合，究其根源，是违背协同育人、全人教育等核心学理逻辑，在理念、机制、实践、师资、评价五大层面存在深层次、根源性困境。

（一）理念认知层面

核心困境体现为育人理念与学理认知的双重割裂，背离了“全人教育与立德树人”的核心要求。一是学科认知壁垒固化，部分高校将思政教育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心理健康教育归属于心理学学科，片面强调学科专业性差异，忽视二者在立德树人目标下的统一性，将心理教育等同于纯技术工作，将思政教育等同于纯理论教学，割裂了思想与心理的内在联系。二是工作定位偏差，部分管理者秉持“重思政、轻心理”或“重干预、轻预防”的片面思维，未将融合工作上升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忽视积极心理学“全员育人、全程育心”的核心要求。三是育人思维碎片化，一线教师缺乏全人育人的系统思维，思政教师不懂心理疏导逻辑，心理教师缺乏价值引领意识，形成“各管一段”的被动局面，完全违背协同育人的内在要求。

（二）机制运行层面

统筹缺位、缺乏闭环协同机制是融合工作难以长效推进的核心症结。当前，多数高校普遍存在“无统筹、无制度、无闭环”的机制空白。协同育人理论强调统一统筹、系统联动，而当前多数高校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分属不同管理体系，缺乏校级层面的统一统筹机构，二者工作部署各自独立、资源互不共享、学情互不互通[4]；同时，未出台契合学理要求的制度化实施细则与课程标准，融合工作缺乏规范依据，完全依赖教师个人意愿。加之缺少从学情研判、方案设计到落地反馈的全流程闭环机制，导致融合工作流于形式，无法实现长效化、系统化推进。

（三）教学实践层面

多数高校的融合停留在“物理叠加”而非“化学融合”，背离全人教育与积极心理学的内在逻辑。一方面，课程内容融合生硬脱节，未立足思想与心理的内在关联，要么在心理课末尾简单堆砌思政理论，要么在思政课中零星穿插心理知识，没有将价值引领与心理调适有机结合。另一方面，教学方法违背青年接受规律，仍以单向讲授为主，未运用积极心理学倡导的团体辅导、共情沟通等互动形式，也未实现思政实践与心理实践的一体化。此外，心理健康育人覆盖片面，主要聚焦少数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开展干预，忽视全体学生积极心理品质与价值素养的培育，容易陷入“病理化矫治”的误区，违背积极心理学与全人教育的核心导向。

（四）师资供给层面

师资队伍的能力结构失衡，是制约融合落地的关键瓶颈。协同育人要求育人主体具备跨领域、复合型的专业素养，而当前两支队伍均存在明显能力短板：思政教师与辅导员未接受系统的心理学专业培训，缺乏心理危机识别、共情疏导的专业能力，在处理学生心理危机时存在能力短板[5]，无法将思政引领与心理关怀有机结合；心理教师与心理咨询师缺乏专业的思政理论素养，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理解不深，仅能开展技术层面的心理疏导，无法融入价值引领。同时，缺乏常态化联合教研与双向培训机制，两支队伍知识互补不足、协同能力欠缺，难以支撑深度融合的育人需求。

（五）评价考核层面

评价体系滞后，缺乏正向激励同样阻碍融合工作的开展。当前评价体系重量化、轻质性，重形式、轻实效，仅考核课程开设、活动举办等表面指标，忽视学生心理状态、思想素养提升等核心育人成效。评价主体单一、结果运用不足，未将融合工作成效与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挂钩，无法发挥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导致教师开展融合工作缺乏内生动力，最终形成“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局面，彻底偏离协同育人与立德树人的评价导向。

四、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系统化实践机制

针对上述背离核心育人理论的深层困境，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人教育、协同育人与积极心理学的内在学理逻辑，摒弃零散化、形式化的实践思路，构建顶层统筹机制、课程融合机制、师资共育机制和评价保障机制的四维联动长效实践机制，四大机制环环相扣、协同发力，形成全流程、规范化、贴合学理的深度融合闭环，具体运行框架如表 1 所示。

表 1 清晰呈现四大实践机制的内在逻辑与核心内容，以立德树人与全人教育为核心引领，顶层统筹为前提保障，课程融合为核心载体，师资共育为关键支撑，评价保障为长效闭环，四大机制相互衔接、双向联动，共同构建全方位协同育人体系。

表 1　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四维联动实践机制表

机制名称	核心定位	核心实施内容	理论依据
顶层统筹机制	前提保障，打破壁垒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专项实施制度与教学大纲；设立专班实现常态化联动，统筹资源、学情共研	协同育人理论
课程融合机制	核心载体，课堂落地	重构心理课程模块，思政内容精准嵌入；实践教学一体化，思政与心理活动融合开展	全人教育、积极心理学
师资共育机制	关键支撑，队伍赋能	开展思政与心理队伍双向专项培训；建立联合教研制度；搭建交叉实践锻炼平台，培育复合型师资	协同育人理论
评价保障机制	长效闭环，激励约束	构建“量化＋质性”多元评价体系；评价结果与考核评优挂钩；加大资源投入，健全危机联动干预机制	全人教育、协同育人理论

（一）顶层统筹机制：打破壁垒，构建校级协同管理体系

立足协同育人理论核心要求，打破多头管理、资源割裂的壁垒，搭建校级统一协同管理体系，破解育人碎片化难题。成立由校领导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思政＋心理”融合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整合育人资源，明确各部门权责分工，定期开展联席研判，实现学情共研、资源共享、工作共推；出台专项实施制度与教学大纲，紧扣全人教育与立德树人要求，明确融合目标、内容标准与实施流程，让融合工作有章可循；设立日常工作专班，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打通两支队伍的协同通道，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协同格局。

（二）课程融合机制：深耕课堂，打造深度融合的教学体系

立足全人教育与积极心理学理念，以课程教学为主阵地，实现内容、方法、实践的全方位深度融合，摒弃浅层叠加模式。重构心理健康课程模块，将思政价值内核精准嵌入情绪管理、挫折教育、生涯规划等心理教学内容，实现思政要义与心理知识的有机统一[6]；推广“双师同堂”协同教学模式，思政教师与心理教师联合备课、同台授课，立足学生心理痛点同步开展价值引领与心理疏导，兼顾思想高度与心理温度；推动实践教学一体化，将心理实践活动与思政实践活动有机结合，依托各类载体开展融合实践活动，实现知行合一。

（三）师资共育机制：双向赋能，培育复合型育人队伍

紧扣协同育人对复合型师资的核心要求，构建“培训＋教研＋实践”三位一体共育机制，补齐师资能力短板。开展双向专项培训，针对思政课教师队伍强化心理学专业能力培训，针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强化思政理论与立德树人理念研修，实现两类教师的素养互补；建立常态化联合教研制度，组织两支队伍共同开展备课、案例研讨与教学观摩，在交流中强化协同意识、打磨融合方案；搭建双向实践锻炼平台，推动思政课教师与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交叉履职，在实践中提升双向融合能力，打造兼具思政素养与心理专业能力的复合型育人队伍。

（四）评价保障机制：闭环考核，完善长效支撑体系

立足全人教育与协同育人的评价逻辑，构建科学闭环的评价与保障体系，激发融合工作内生动力。建立“量化＋质性”相结合的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既考核工作开展的量化指标，更注重学生心理状态、思想素养提升的质性成效，纳入多维度评价主体；强化评价结果刚性运用，将融合成效纳入教师绩效考核、职称评定核心指标，设立专项奖励，激发教师主动融合的积极性；加大资源保障投入，完善配套设施与专项经费，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育人平台，健全心理危机预警与思政引领联动干预机制，实现早发现、早疏导、早引领，筑牢融合育人的长效保障。

五、结语

思政教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是优化育人体系的深层变革。高校必须立足全人教育与协同育人理论，以顶层统筹打破壁垒、以课程融合夯实载体、以师资共育强化支撑、以评价保障激发动力，实现二者深度耦合，方能化解学生思想与心理双重困惑，培育身心健康、信念坚定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唐璐 .“思政元素”融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 [J]. 公关世界 ,2026(03):59-61.

[2] 王琳 , 刘梦瑶 , 陈俊成 .“大思政”视域下积极心理学融入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教学的研究 [J]. 大学 ,2026(03):116-119.

[3] 高晓露 .“大思政”视域下心理育人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探究 [J]. 四川劳动保障 ,2026(01):56-57.

[4] 王澜钧 .“大思政课”视域下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学策略探究 [J]. 社会与公益 ,2026(01):177-179.

[5] 王瑞 , 陈竞飞 , 颜冰 .“大思政”理念下高校思政教育的融合传播机制研究 [J]. 新闻研究导刊 ,2025,16(24):158-162.

[6] 李育恒 . 新时代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困境及突破路径——以四川商务职业学院为例 [J]. 科教导刊 ,2026(02):103-10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山西开放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在线精品课程建设实践与创新研究——以‘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为例”（SXKDJG202415）。

（作者：张越君，山西开放大学助教；李晓晨，山西开放大学副教授；冯潇潇，山西开放大学讲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分析

李天宁

摘要：本文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思政教育融合为研究对象，立足新时代民族工作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剖析二者在目标导向、内容内核与实践要求上的内在一致性与融合价值。在此基础上，从强化思想引领、优化内容供给、完善育人格局三个维度提出具体融合路径。研究认为，压实主体责任，构建本土化、职业化特色思政体系，推动家校社协同联动，能够增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筑牢学生“五个认同”根基，为民族地区长治久安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地区；思政教育；职业院校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高度重视[1]。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服务边疆稳定与地方发展的重要阵地，肩负着立德树人与维护民族团结的双重使命。当前，社会思潮复杂交织，青年学生价值观念多元多变，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全过程，是职业院校必须回应的现实课题。本文立足宁夏等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实际，结合辅导员一线育人实践，深入阐释二者融合的内在逻辑与时代价值，探索贴合职教特色，可落地、可操作的融合路径，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工匠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二、融入思政教育的时代背景

思政教育是强化青少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重要途径，能够不断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深度和广度[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当前和今后我国民族地区各项工作之纲，是推进我国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所必须遵循的主线[3]。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民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走向深入。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依旧复杂，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建设面临新的更高要求。党中央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将其纳入学校思政教育核心内容，依托政策体系推动相关教育覆盖人才培养各环节。民族地区职业院校需推动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思政教育实现深度融合，结合地域实际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特点开展思想引领，夯实学生对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基础，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守护边疆地区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三、共同体意识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内在逻辑与价值意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职业院校思政教育在目标导向、内容内核与实践要求上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政策要求，更是育人规律的必然体现，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一）目标同向，共育时代新人

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目标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二者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方向上完全一致，共同指向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时代新人。对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而言，将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教育，是实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政治素养、家国情怀培育同频共振的关键所在。

（二）内容互嵌，强化思想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承载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与文化观，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精神脉络，也为思政教育注入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价值内涵。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拓疆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培育精神，这些真实而鲜活的史实成为思政课堂中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教学资源。通过系统化的思政教育，学生得以从零散的感性认知上升为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性把握，理解其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时代意义。这种由情入理、由知促行的转化过程，有助于将对本民族的热爱自然融入到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之中，使共同体意识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实现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

（三）实践协同，服务区域发展

民族地区职业院校的办学定位紧密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将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思政实践，能够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与家乡建设、民族复兴紧密结合。通过组织学生参与乡村振兴、社区服务、民族文化传承等实践活动，不仅能让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深化对共同体理念的理解，更能激发他们扎根边疆、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知行合一的协同实践，有效打破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壁垒，使共同体意识教育真正落地生根，为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思想保障。

四、共同体意识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路径

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入民族地区高校思政课应遵循动态性原则[4]。在此基础上，从提升政治站位、优化内容供给、完善育人格局三个方面系统构建融合路径。

（一）提升融合育人的政治站位与思想自觉

1. 压实主体责任，健全顶层推进机制

民族地区职业院校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摆在思政教育突出位置，纳入学校党委重要工作部署，构建党委统一领导、行政牵头落实、思政部门统筹协调、各二级学院分工负责的协同推进机制，规避“上热中温下冷”的落实落差。学校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办学实际，制定专项工作方案与年度推进计划，明确责任分工、重点任务与考核标准，将融合育人成效纳入部门绩效考核、党建述职和日常工作督查，以制度化要求保障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组织专项督导检查，纠正重技能轻育人、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强化顶层设计，压实各级工作责任，提升全体教职工的思想认识与育人自觉。

2. 深化教师培训，铸牢思想认知根基

常态化、分层分类的教师培训体系需持续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方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边疆民族团结典型案例均纳入培训核心范畴。集中研修、专题讲座、集体备课、示范课观摩、跨校交流等形式帮助教师把握教育核心方向，纠正常见的认知偏差。教师民族团结教育能力考核机制同步建立，将融入成效纳入师德师风评价与教学能力综合考量。教师可在备课、授课、班级管理各环节自然嵌入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实现育人理念与行为模式的积极转变，为思政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度融合提供稳定可靠的师资保障。

3. 强化学生教育，厚植国家认同观念

以学生为中心，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各环节，依托主题班会、专题宣讲、读书分享、国旗下讲话等形式，常态化开展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立足民族地区发展现实，选取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等典型案例，引导学生领会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捍卫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脉络与时代价值，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民族分裂思想等错误思潮影响。榜样示范、实践体悟、同伴交流等路径促使“五个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生在思想层面确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思政教育质量提升夯实思想根基。

（二）构建贴合民族地区的特色思政内容体系

1. 推进课程内容本土化，增强教育贴近性

立足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红色资源与发展实践，挖掘本土化思政教育素材，将各民族共同开发边疆、守护国土、建设家园的历史史实，民族团结模范人物事迹、区域重大发展成就等转化为具象化教学内容。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已有四部作品入选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微宣讲优秀作品，“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专题教学。通用教材与地方实际存在脱节，专家与一线教师可联合编写校本案例、专题读本与教学参考资料，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故事融入课堂教学，弱化理论宣讲的空泛化与口号化倾向。教学环节可依托身边人物与身边事例提升话语说服力，让学生借助可感可知的内容深刻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共同体意识教育更接地气、更具温度、更富感染力，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同的思想转变。

2. 构建学段衔接体系，实现教育梯度推进

结合职业院校学生的认知特点和成长规律，衔接中小学阶段共同体意识教育基础，搭建贴合职教特色的阶梯式、递进式教育内容框架。中职阶段侧重基础认知引导，依托生动案例、日常交往场景，帮助学生感受各民族文化魅力，培养互助友爱的良好习惯，树立基本的民族团结理念。高职阶段侧重实践导向与价值引领，结合专业学习、实训实践，围绕边疆建设、地方发展、民族工作实际等主题，开展探究式学习，

引导学生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系统规划各学段（衔接中小学）的教学目标、核心内容与考核方式，有效解决内容同质化、衔接不畅、难度失衡等问题，逐步形成纵向衔接、横向协作的一体化育人体系，让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

3. 推动学科融合渗透，拓展思政教育载体

破除思政课程单一育人模式，推进课程思政全域建设，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融入语文、历史、地理、艺术、体育等学科课堂。历史课堂呈现各民族共建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语文课堂选用承载民族交融与家国情怀的篇目，艺术课堂组织多民族文化共创实践，地理课堂解读边疆地域与国家发展的内在关联。思政教师与学科教师开展联合备课与协同教研，共同规划融入路径与教学方式，推动知识教学与价值引导同向发力。多学科全方位的渗透式教学，能够丰富思政教育载体，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整体成效。

（三）打造校内外协同联动的融合育人环境

1. 优化校内育人环境，营造共融文化氛围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打造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民族团结主题长廊、文化展示墙、班级文化角等阵地，集中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成果。广泛开展多民族师生共同参与的文体活动、互助结对、文化体验、志愿服务等项目，促进师生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例如，学校常态化开展“石榴籽文化节”，组织各民族学生展示文化特色、开展文艺交流，并通过“一对一互助结对”，在学习与实训中互帮互促，在潜移默化中厚植共同体意识。推动形成全员育人格局，明确所有教职工的育人职责，将共同体意识融入课堂教学、管理服务、社团活动与日常交往，让校园处处成为育人场域，以浸润式环境潜移默化提升学生的共同体认同。

2. 搭建校外实践平台，拓展实践育人渠道

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面融入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亲身实践中提高认识、拓宽眼界、改变思维，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交往观[5]。深化校地合作，与地方统战部门、民族事务部门、文旅单位、社区街道共建民族团结教育实践基地、红色教育基地、乡村振兴示范点等校外平台[6]。通过常态化共建机制，学校可以充分整合地方优质育人资源，把课堂延伸到社会一线，推动理论教育与实践体验深度结合。学生走进历史遗迹、民族村寨、建设一线，亲身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生动实践，感受边疆地区发展成就。实践体验推动理论认知转化为情感认同与行动自觉，打破课堂教学单一灌输模式，提升教育的真实感与说服力，为思政教育与共同体意识融合提供鲜活实践支撑[7]。

3. 健全家校社协同机制，凝聚全方位育人合力

构建学校主导、家庭参与、社会支持的协同育人体系，通过家长会、家长课堂、家访、线上沟通平台等渠道，向家长普及民族团结理念，引导家长重视子女国家认同与共同体意识培育[8]。加强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共青团、妇联等组织联动，开展共建宣讲、主题活动、典型宣传等合作项目，邀请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基层干部、老党员进校园进行分享交流。整合家庭、社会、网络等多方资源，形成育人闭环，补齐校内育人短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学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营造全方位、立体化、可持续的良好环境。

五、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边疆稳定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强化思想引领、优化内容供给、完善育人格局，能够有效提升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夯实学生“五个认同”根基。未来，应持续推动主体责任落实，深化本土化、职业化思政体系建设，拓展校内外协同育人路径，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生态。在知行合一中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伟业，为培养政治坚定、技能过硬、情怀深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坚实支撑，助力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普丽春，费洋洋，赵伦娜．民族地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基于文化传承视角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5(03):117-126.

[2] 马红芳．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探索 [J]. 中国民族教育，2024(05):33-35.

[3] 邓可煜．民族地区中职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优化路径研究 [J]. 科学咨询，2025(19):104-107.

[4] 孙溢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民族地区高校思政课实践 [J]. 世纪桥，2025(09):87-89.

[5] 马晓娟．民族地区职业院校以大思政课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中国军转民，2024(19):111-113.

[6] 李嘉欣．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优化路径 [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25,24(21):151-153.

[7] 张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 [J]. 新西部，2025(10):161-166.

[8] 乌博林．新时代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创新研究 [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0):46-50.

（作者单位：宁夏职业技术大学）

整体思维视域下大中小学思政教育的全过程一体化育人路径研究

伯　洁

摘要：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协同育人视角下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思政教育工作的生动实践，既有利于打造立体化大中小学协同育人体系，也有利于促进各学段思政教育目标协同和过程协同。在整体思维的指导下，通过对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的价值进行分析，剖析目前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在学科建设和师资力量、育人目标衔接、教学方式以及评价机制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并从夯实学科与师资基础、统筹育人目标设计、创新分阶段教学策略和完善全过程评价体系方面提出全过程一体化育人路径，旨在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保障。

关键词：整体思维；思政教育；全过程一体化；育人途径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关键期，培养兼具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的高素质人才成为教育体系的核心任务[1]。思政教育是价值引领的主渠道，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分段进行的思政教育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创建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全过程一体化体系，突出“协同育人”“同向同行”，成为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

一、整体思维视域下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价值

（一）构建多层次协同育人框架

从整体思维的角度来说，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不但是纵向衔接的教育工程，而且是横向协同的系统建构。系统性协同育人框架的创建要从顶层设计上协调政策引领、机构合作、资源调配，塑造“跨学区、跨学科、跨学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从而破除教育区隔和学段壁垒，达成教育资源、课程实践、教师协作的逐层联动。不同教育阶段在思政教育组织机制、课程资源、实践平台等各方面的协同，可以形成跨域育人合力，在宏观上建立起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共鸣性的教育协同体系，有助于实现学生认知结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的整体形成与优化。

（二）实现思政教育目标一体化衔接

从思政教育一体化的整体视角出发，实现目标一体化衔接就是保证教育的连续性与育人效度。不同学段的育人目标并不是简单的平铺，而是以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阶段性的价值塑造为逻辑递进体系[2]：从小学阶段的情感认同启蒙、中学阶段的理论理解深化，到大学阶段的责任担当与使命觉醒，构成层层递进、结构统一的价值成长曲线。有效的一体化衔接要求在目标体系构建中坚持价值指向的一致性，同时兼顾阶段特征和发展需求，通过明确的衔接机制使各个学段的目标在内在逻辑上形成整体性推进的闭环，为学生系统思想、历史观与归属感的培养提供可持续、连续的教育路径。

（三）推进全过程教育环节协同

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是希望将各学段的思政课教师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实现整体育人目标。全过程教育环节协同是整体推进思政教育一体化的实践基础，强调教育活动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连续互动。从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创新、育人实践和评价反馈等每一个教育环节都要纳入贯通机制之中，从而实现教学、实践和评价三者之间的系统协同性。在此过程中，大思政教育框架下的课程资源、社会实践平台、课堂内外学习体验等环节互相渗透，既体现出思政教育的理论深度，又体现其现实性、互动性和生成性。

二、整体思维视域下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推进的现实挑战

（一）学科建设与师资力量薄弱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推进，常

常被学科建设体系不完备、师资力量结构不合理所制约。当前，虽然思政课程在各个学段得到了政策上的高度重视，但是在具体的落实过程中，中小学和高校在课程内容体系、教材资源、师资结构、专业素养培养机制上尚未实现有效整合，导致教学体系碎片化、资源不能共享，从而制约了协同育人机制的深化实施。尤其是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不同学段教师对于整体育人理念、教学目标衔接逻辑、课程设计方法等的理解存在差异，不仅削弱了协同教学的协同性，也制约了育人效果的整体性提升。

（二）育人目标衔接不够清晰

虽然一体化建设强调从小学到大学应形成螺旋式上升的价值认同与素养培养体系，但实际上各学段之间的目标体系制定往往基于各自发展需求而非整体框架，缺乏统一的目标分解与量化指标。这种现状使得学生在不同阶段对思政教育的关注点、理解深度与认知结构不能形成自然过渡，从而影响学生价值观形成的连贯性与稳定性。

（三）教学方法与教育手段单一

目前，大部分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依旧采取传统的课堂授课模式，教学形式以灌输式、线性发展为主，缺少与学生生活实际相结合的互动体验设计。单一的方法不能满足新时代学生多样化的认知需求，也不能在不同学段之间形成有效的教学方式的联动和衔接。另外，虽然信息技术等现代教育手段给思政教育一体化带来了创新机会，但是在教育实践当中对数字化平台、跨学段协同教学和社会参与等手段的使用仍显不足，这不仅制约了教学效能的提升，也阻碍了整体育人路径的构建。

（四）评价机制不完善，质量监控缺失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评价机制属于教育系统运作的反馈与调节机制，其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的质量和成效。然而，现实中评价体系过于依赖学段内部成果考核，缺少对跨学段衔接性、过程性、整体性成果的系统评价，使得一体化建设的实际效果难以量化与监控。另外，对于全过程育人成效的评价大多集中在结果层面，忽略了过程性指标和育人内涵的质量评价，这样的评价导向既不能激发教育内在的发展动力，也不能为政策调整和实践改进提供有效的依据。

三、整体思维视域下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全过程一体化的路径设计

（一）夯实学科与师资基础，推进思政课教育教学体系建设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当中，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属于整个系统的根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思政教育的学术源泉和理论支撑场域，只有经过系统的建设才能增强其引领作用[3]。例如，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策略的关键点，从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科研项目布局和政策支持机制入手，保证在学术体系、师资培养和科研产出方面具备引领全国思政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实力。在教师培养机制上，高校可以构建“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框架，把思政教育一体化理念纳入专业课程必修内容，设置教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模块，提高未来教师对整体教育生态的理解和实践能力。同时，应通过校际协同培养机制，使高校师范类、教育学类的学生可以参与到中小学思政课堂的实践中来，把各个教育阶段的教学情境融入教师教育的全过程之中，以此来减少一体化推进过程中理念上的断层以及实践上的障碍。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的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高校可以组织以马克思主义学院牵头的常态化研修、教学观摩、跨学段集体备课活动，使中小学教师在与高校教师的协同合作中开阔理论视野、丰富教学方法。尤其要建立大中小学教师“大思政”联盟，定期开展协同研讨、课例共创活动，使不同学段教师在教学目标、内容设计、方法创新上达成共识。同时，学校可以设立教师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专项资金，支持教师参加国内外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研究、课题立项和实践创新。通过这些系统性举措，一方面可以巩固学科根基，另一方面又可以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的专业水平和协同育人能力，从而为一体化教育体系的稳定运转提供坚实支撑。

（二）统筹育人目标，强化一体化系统思维

一体化的核心就是系统性地统筹育人目标，把不同学段的教育目标纳入一个统一的价值发展框架，实现整体目标、阶段目标、衔接目标的系统性设计[4]。一方面，需要在政策、课程设计上确定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的总体目标，即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实践能力为总体导向。总体目标要通过层层分解，形成阶段性、连贯性和衔接性的分段目标：小学阶段重在情感认同与价值感知，中学阶段重在理性理解与价值判断，大学阶段则重在理论深化、实践创新和行动能力的生成。实现这一转化过程要依靠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形成协同机制，在育人目标框架、育人目标执行监测机制等方面实现统一协调，确保各个学段之间育人目标的有效对接。

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在课程标准、教材编写、教师指导手册、教学实施方案中同时体现这一目标体系。例如，在小学思政课中引入涵盖国家认同、责任担当的模块，在中学育人目标中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性理解纳入核心指标，而高校则应围绕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社会实践与全球视野培养等目标设置评价指标。各个学段课程开发者要运用系统思维工具，如逻辑框架图（Logic Model）、能力发展指标体

系等，保证目标体系在各个层次、各个学段上实现动态的连续性。另外，还要建立跨学段育人目标研讨机制，依靠大中小学教师、教育专家和区域教育管理者协同研讨，及时对育人目标体系进行调整和优化，使育人目标的系统性真正落实到教育实践的全过程、全方位。

（三）创新教学策略，实现分龄分阶段的教育衔接

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教学策略的创新是实现教育效果最大化的关键桥梁。根据螺旋式上升的目标体系、衔接有序的课程内容，不同学段的教学设计要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实现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三者之间的整体连通[5]。教学策略要兼顾教学内容的系统性以及教学过程的连贯性。在教学组织上，学校可推进跨学段协同备课机制，通过集体备课、同课异构、跨校联合教研等形式，使教师能够分享各学段学生的学习特点、思想动态和学习问题，从而为制定最优教学策略提供基础数据。教师在备课时要以目标体系和核心问题为依托来设计教学单元，采用问题驱动式、项目学习式、案例分析式等不同的教学方法，促使学生在理解、分析、反思的过程中建构知识和价值认同。

创新教学策略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教学资源共享方面的作用。创建区域一体化数字资源平台，把优质的思政课程资源、教案库、教学视频、互动学习模块整合在一起，使教师、学生在不同的场景下都可以访问和使用。同时，教师要针对不同年龄层学生的特点设计差异化在线互动学习活动，小学生可以采用情境式故事化的教学方式来加强情感体验，中学生可以采用模拟讨论、角色扮演等方式提高理论理解能力，高校学生可以采用在线研讨、专题研究、社会调研报告等方式提高实践能力、系统思辨能力。数字化平台可集成智能学习分析工具，对学生的每一次学习行为和学习成果即时跟踪评价，为教师提供反馈，保证教学策略在一体化体系中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四）完善评价机制，深化全过程质量监控

考核评价体系是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准确把握各学段思政课教学效果的“试金石”[6]。评价机制的设计要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并且要达到目标导向、过程监控和效果反馈三者的统一。教师要建构起多层次、多主体的评价体系，把学生的价值认知、情感态度、行为表现以及教师协同教学等都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当中。评价体系应该既考虑量化指标，又考虑质性描述，通过设定阶段目标达成指标、成长性评价档案与动态反馈机制等手段，使各学段评价既关注学生的发展轨迹，又可以为教育实践的改进提供具体的依据。例如，在学生评价中，教师可以设置成长性学习档案，记录学生在不同学段思政课程中认知加深、价值认同和行为实践的变化，从而达到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目的。

评价机制的设计要兼顾教师发展和课程质量两个方面。对于教师的评价应该采取多维度的评价方式，把同行评价、学生反馈、教学案例展示、专业发展成果等纳入教师绩效考核中来，从而激励教师创新实践和协同合作。教学评价机制应鼓励跨学段评价合作，让中小学、高校的教师共同加入区域性的评价联盟，建立协同的评价网络来提高评价数据的有效性和可比性。另外，引进第三方教育研究机构参与评价体系的建设，可以提高评价结果的客观性、权威性。全过程质量监控体系还包含数据收集、分析反馈和政策调整三个闭环，通过定期发布一体化建设质量报告、区域教育评估研讨等方式，对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优势和短板进行梳理，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从具体操作角度来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制定区域一体化思政教育质量监测指南，确定评价标准、数据指标和反馈机制，确保评价可以真正促进一体化建设的持续优化和良性循环。

四、结语

在新时代互联网覆盖到教育领域的背景下，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发展有了新的契机。思政教师是思政课提质增效的动力源泉，是推动思政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整体思维视域下的大中小学思政教育全过程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任务。因此，推进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与专业发展，使其真正成为育人全过程的主要力量和实践推动者。

参考文献

[1] 刘严欣，付帅，王勇 . 工匠精神融入大中小学思政教育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J]. 社会与公益 ,2025(22):145-147.

[2] 张竹婷，童红斌 .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内容设计与实践路径研究 [J]. 甘肃教育研究 ,2025(24):66-70.

[3] 安静 . 数字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探析 [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25(09):28-29.

[4] 陈建军 . 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核心意义 [J]. 西部学刊 ,2025(19):131-134.

[5] 袁小梅，李林 .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内涵、价值遵循和区域路径 [J]. 成都工业学院学报，2025,28(06):97-102.

[6] 仲昭旭 . 系统论视域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要素、特征与路径 [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5,45(10):16-2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江苏省 2021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运用整体思维构建高校‘大思政’育人格局”（2021SJB0688）。

（作者系苏州科技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讲师）

“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陈　杨

摘要：当下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受限于传统单向灌输与固定时空，育人效果不佳。数字技术为打破话语隔阂、扩展学习场域、精准识别对象、量化评估成效提供了契机，但也暴露出内容重复、互动流于点赞转发、数据画像粗糙等短板。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年轻化、互动化、场景化为导向进行内容重构，以智能互动、虚实共生、精准画像为核心开展技术融合，以懂数字、懂思政、懂学生为目标实施队伍素质提升，以数据共享、活动共办、资源共建、评价互认为纽带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共同体，为形成目标一致、优势互补的数字思政生态系统提供可行方案。数字化赋能为其破局提供关键钥匙——借大数据精准画像、用虚拟现实活化内容、以智能算法优化传播，可实现思政教育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跃升。

关键词：数字化；网络思政；大学生；内容重构；协同育人

“互联网 +”时代，数字技术深度嵌入青年生活场域，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其思想认知、价值塑造愈发依赖虚拟空间。传统思政教育面临“话语隔阂”“触达乏力”等挑战：单向灌输难抵信息洪流，线下场景难以呼应线上需求。

一、“互联网 +”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核心优势

（一）打破泛众覆盖的话语隔阂

传统思政教育常因规模化供给陷入话语错位——教师面对同质化群体输出统一内容，难以回应学生个体思想差异；而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其认知习惯已适配个性化信息获取。数字化赋能通过“大数据画像 + 精准推送”，将隐性思想动态转化为可量化的需求标签：一方面，采集学习 App 的高频检索，如考研焦虑、职业迷茫，获取社交平台的情绪表达以及关于躺平、内卷等讨论，得到校园消费的行为轨迹的数据，为每个学生生成思想图谱；另一方面，基于图谱推送定制内容——给关注就业压力的学生推荐 985 硕士“村官”扎根基层的纪录片，给讨论价值选择的学生推送大国工匠徐立平的访谈内容。这种千人千面的话语供给方式，打破了传统思政“一刀切”的隔阂，让教育从泛众喊话转向个体对话，真正对接学生的真实困惑。

（二）弥补平面说教的吸引力短板

传统思政多依赖“文字 +PPT”的二维呈现，内容抽象、形式单调，与大学生视觉化、互动化的信息偏好冲突。数字化技术通过“场景重构 + 沉浸体验”，将思政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精神具象，比如用 VR/AR 打造重走长征路虚拟场景，学生能触摸夹金山的积雪、跨越泸定桥的铁索，直观感受革命牺牲的分量；又如通过 AI 复原青年英烈陈延年、王尔琢的虚拟形象，开展跨时空对话——学生问“您为何选择牺牲”，虚拟英烈会结合自身经历回应“为了新中国，让更多人活成光”。这种代入式教育激活了情感共鸣，让抽象的道理变成鲜活的记忆，解决了传统思政课吸引力弱的痛点，使学生从被动看转为主动沉浸。

（三）转变单向灌输主体关系

传统思政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多处于受众地位，缺乏表达与参与的空间。数字化平台为思政注入互动基因，推动主体关系从教师讲、学生听转向师生共构：一方面，依托思政 App 开设热点思辨论坛，针对 AI 伦理、文化自信等学生关心的话题，鼓励学生发表观点、展开辩论，教师从讲授者变为引导者——通过提问“AI 会取代人类的创造力吗”推动深度思考，而非直接给答案；另一方面，组织开展“身边思政”创作活动，如“寻找校园党员榜样”微视频大赛，学生拍摄辅导员深夜查寝、教师带病上课的故事并分享。这种共创式教育让学生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创造，既强化了对思政内容的认同，更培养了独立思考与表达能力。

（四）突破即时反馈的育人局限

传统思政的效果评估多依赖课堂提问、期末测试

等即时反馈，难以追踪思想的长期演变。数字化工具通过“全轨迹记录 + 动态调整”，实现过程性育人：一方面，搭建思政成长档案，整合线上课程完成度、主题活动参与率、社交言论情感倾向、思想汇报文本分析等数据，形成思想动态曲线图，比如某学生初期认为“集体主义约束个人”，但参与抗疫志愿者线上分享后，后续言论频繁出现团队奉献的关键词，档案会自动标记这一转变；另一方面，基于档案动态干预：若发现学生对理想信念的认知波动，教师可通过线上谈心、推送“张桂梅 12 万公里家访路”等案例引导。这种全程追踪突破了传统思政重结果、轻过程的局限，实现对学生成长的精准守护。

二、数字化赋能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现状

（一）基础支撑体系成型，技术渗透进入常态化阶段

国内多数高校已完成数字化思政的底层框架构建，依托“云、数、网”技术形成多端联动的教育载体 [1]。《2023 高校思政数字化发展报告》显示，92% 的高校开通了官方思政短视频 / 微信公众号账号，68% 搭建了思政云平台，整合线上党课、心理测评、榜样故事等资源；部分头部高校更推出元宇宙思政实验室、VR 红色展馆等项目，将革命历史、理论课程转化为可交互的虚拟场景。同时，大数据技术开始嵌入思政管理，不少高校通过分析学生校园卡消费、网络社交言论、学习 App 轨迹等数据，生成思想动态热力图，为精准识别学生困惑提供支撑。技术已从辅助工具升级为思政教育的常规基础设施。

（二）内容创新瞄准青年话语，互动性与代入感显著提升

为破解传统思政传播乏力的痛点，各高校聚焦数字原生代的认知习惯，推动内容从平面说教转向立体共鸣。一方面，技术重构内容形态：VR/AR 还原长征爬雪山、开国大典等场景，让学生触摸历史细节；AI 生成党史小剧场、榜样人物漫画，将大道理变成可视化故事，如某高校用 AI 复原“陈延年烈士的青年日记”，阅读量破 10 万人次。另一方面，互动式内容成主流：不少高校开设线上思辩厅，围绕躺平是不是妥协、AI 时代如何守初心等话题组织辩论，教师从讲授者变为引导者；还有的推出“身边思政”创作活动，鼓励学生用 vlog 记录辅导员深夜查寝、校园党员先锋岗志愿服务等鲜活场景，将思政从远距离说教转为近距离共鸣。这类内容的学生参与率较传统课堂高 3—5 倍，有效激活了青年主动学习的动力 [2]。

（三）深层矛盾仍未破解，发展质量亟待提升

尽管表层数字化进展明显，但实践中仍存在重技术、轻内涵的短板。一是技术与内容“两张皮”。部分高校仅将线下教案搬到线上，未利用数字技术重构逻辑，比如用静态 PDF 代替互动课件，用录播课代替实时研讨，数字化外壳下仍是传统内核 [3]。二是数据安全隐患凸显。部分平台过度收集学生隐私，如聊天记录、位置信息，且缺乏严格加密，曾出现学生思想动态数据泄露事件，引发舆论担忧。三是学生参与表面化。不少产品停留在流量导向，短视频追求短平快却无思想深度，学生刷完即忘；线上互动沦为任务打卡，如为凑分数答“红色知识题”，未真正触动思想。四是教师数字素养不足。部分思政教师缺乏技术培训，不会用大数据分析学生需求，也不擅长制作互动内容，仍依赖照本宣科，难以发挥平台效能。

三、数字化赋能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打造年轻化、互动化、场景化的思政内容

内容是思政教育的灵魂，数字化赋能的关键是用青年话语重构内容逻辑，让大道理变成身边事 [4]。一是年轻化。用 Z 世代语言翻译理论，摒弃文件式、说教式表达，将思政内核融入青年熟悉的梗文化、弹幕体、表情包。例如某高校推出“党史小剧场”系列短视频，用“吐槽大会”形式讲“红军长征为什么能赢”，把理想信念转化为队友倒了也要拉一把的战友情，播放量破百万。二是互动化。实现从看客到创作者的转变，设计可参与的内容形态，比如“我的红色家史”AI 生成项目，学生上传家人的革命故事，AI 自动生成漫画或短视频，既唤醒个人记忆 [5]，又串联集体叙事；还有线上思辨擂台，围绕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初心等话题，学生以“弹幕 + 连麦”形式辩论，教师实时引导，让内容从静态输出变为动态共创。三是场景化。用技术还原沉浸式体验：依托 VR/AR、数字孪生技术，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场景。比如重走长征路 VR 项目，学生使用设备能触摸夹金山的积雪、回望泸定桥的硝烟，还能触发战士牺牲的剧情——屏幕弹出烈士绝笔信中的内容：“我不怕死，只怕你们忘了我们来时的路”，瞬间击中情感共鸣点。此类内容的学生分享率比传统课堂高出几倍，真正实现思政教育的入脑入心 [6]。

（二）构建智能互动、虚实共生、精准画像的思政场景

场景是思政教育的载体，数字化需打通线上线下边界，用技术构建可感知、可响应、可追踪的育人环境。首先，智能互动让机器变伙伴，通过开发思政 AI 助手，整合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既能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论问题，也能回应考研失败怎么办、人际关系矛盾怎么处理等现实困惑。通过分析学生提问的情绪关键词，推送对应的案例或心理疏导资源，成为学生的线上思政好朋友。其次，打造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模式。通过打造元宇宙思政馆或红色数字地标，学生可在线参观展厅，点击展品查看详细讲解，还能和虚拟讲解员对话；线下则组织重走一大会址路

线、重走长征路等实践活动，线上同步直播，形成线上学理论、线下践初心的闭环。最后，精准画像可以从泛众覆盖转变为个体关怀。通过依托大数据整合学生的数字足迹，如校园卡消费、学习 App 轨迹、社交平台言论等信息，生成思想动态热力图。教师据此推送个性化内容，实现千人千面的精准供给[7-8]。

（三）培育懂数字、懂思政、懂学生的复合型队伍

教师是思政教育的主力军，数字化需倒逼队伍转型，打造“技术 + 思政 + 学生”的三维能力模型。懂数字是指提升技术应用能力，高校开设数字思政培训班，内容包括大数据分析、VR 内容制作、AI 工具使用等，比如邀请计算机学院教师讲解“如何用 Python 分析学生思想动态”，邀请传媒学院教师指导“如何制作互动式思政短视频”。懂思政是坚守内容本质，要明确数字技术是工具，思政是内核。队伍需强化内容把关意识，比如在使用 AI 生成内容时，要审核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使用大数据画像时，要避免标签化学生，不能仅因学生关注游戏就判定其已沉迷。懂学生是指贴近青年需求，教师需定期走进学生中间，通过线上座谈会、班级群聊、社团活动等方式，了解学生的真实困惑和兴趣点，引导学生朝着目标前进[9]。

（四）打造家校社联动的数字思政共同体

思政教育是系统工程，数字化需整合家校社资源，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合力。首先，搭建与家庭云端共育的桥梁，通过开发家长思政小程序，定期推送家庭教育中的思政课，家长可上传孩子的成长故事，学校将其纳入思政成长档案；还可设置家长课堂，邀请思政教师讲解“如何应对孩子的躺平言论”，让家庭成为思政教育的延伸课堂[10]。其次，学校要积极整合校内资源，通过打通思政课、心理咨询、社团活动、志愿服务的数字壁垒，比如思政课布置寻找身边的党员榜样任务，学生完成后，将成果上传至校园思政平台，心理咨询中心可据此关注学生的价值观形成，社团可邀请榜样做分享，志愿服务队可组织向榜样学习的实践活动，形成课上课下、校内校外的联动[11-12]。最后，链接外部资源，与企业、博物馆、红色景区等合作，拓展思政教育的社会场景。比如和华为合作，开展“科技报国”线上研学，学生通过直播参观华为研发中心，听工程师讲芯片研发的艰辛；和故宫博物院合作，推出红色文物数字展，学生可在线欣赏开国大典用的国旗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建议政府出台支持政策，设立数字思政专项基金，鼓励高校和企业合作开发思政资源[13-14]。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化为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注入新动能，也提出更高要求。数字化赋能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本质是用技术重构“人—内容—场景—生态”的关系：以年轻化内容对接青年话语，以智能场景增强沉浸体验，以复合型队伍保障内容质量，以共同体凝聚育人合力。唯有如此，才能让思政教育真正“活”在数字时代，走进学生心里。

参考文献

[1] 张甲田 .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究 [J]. 高科技与产业化 ,2025,31(08):53-56.

[2] 叶瑶 , 曹婉婷 . 数字媒体视域下高校辅导员网络思政教育创新路径探析 [J]. 三角洲 ,2025(18):193-195.

[3] 王琛 , 屈晓婷 . 高校关工委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角色重构与实践路径探析 [J]. 北京教育 (德育),2025(05):63-66.

[4] 何万燕 . 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 [D]. 成都 : 电子科技大学 ,2025.

[5] 温学燕 . 数字化赋能“大思政课”育人途径——以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为例 [J]. 中国军转民 ,2024(18):176-178.

[6] 陈卓君 , 钟声 . 智媒时代数字赋能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时代意蕴与实践路径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4(01):146-151.

[7] 杨晓宏 , 郑新 , 梁丽 .“互联网 +”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研究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0,41(12):8.

[8] 贺全 . 新媒体环境下思政教育赋能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提升路径研究 [J]. 世纪桥 ,2025(15):45-47.

[9] 边成敏 .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数据素养与学科教学知识（PCK）的融合路径研究 [C]//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5 年高等教育发展论坛思政分论坛论文集（上册）. 绵阳城市学院 ,2025:70-72.

[10] 赵国芳 , 郭若冰 . 以“行业嵌入型”思政课建设赋能新质生产力高素质人才培养研究 [J]. 全球教育视角 ,2025,1(04):29-34.

[11] 陈璐 , 王玉琴 .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AIGC 赋能高职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探索——以《网络安全技术》课程为例 [J]. 华声 ,2025(18):24-26.

[12] 郭倩倩 . 教育强国背景下科技赋能思政课的实践路径——评《信息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24,44(18): 封 2.

[13] 蔡晓淇 , 都霖 . 数字技术赋能高校网络思政话语体系的逻辑理路与实践推路 [J]. 教育进展 ,2023,13(12):10105-10113.

[14] 张荣 . 数字时代图书馆与思政育人融合的路径探索——《赋能高校图书馆第二课堂——课程思政等教育模式创新探究》荐读 [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5,48(07):210.

（作者单位：长春中医药大学）

社会工作方法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探索

马　静　高红敏

摘要：社会工作方法的融入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有效的创新方式。文章研究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及社会工作行政方法在思政教育中的具体应用途径。采用个案工作方式，教师可以按照学生的个人差异，实施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小组工作方式依靠团队协作与互动，提升学生的集体责任感与社会参与意识；社区工作方式经由社会实践活动，助力学生在实际服务中提高社会责任感；社会工作行政办法借助成体系的管理以及资源的分配，使思政教育活动得以高效落实。文中剖析了这些社会工作办法怎样借由实践活动和个性化扶持，增强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与针对性，促使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实现更全面进步。

关键词：社会工作方法；高校思政教育；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高校思政教育是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提升道德素养的重要方式，近几年遇到了新的挑战。以往思政教育的模式重点在理论教学，与实际生活联系不够紧密，未有效唤起学生参与的热情以及社会责任感。伴随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学生的思想观念逐渐丰富多样，单一的课堂授课形式，无法契合当下教育的需要。怎样让思政教育更契合时代发展需求，成为教育工作者急需处理的问题。社会工作方法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模式，在高校思政教育中有重要应用价值。本文为研究怎样把社会工作方法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以及如何实践性教学与个性化支持来提升思政教育的成效。

一、社会工作方法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一）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与实践性

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社会工作取得重要成就。

社会工作方法是指在社会工作中实施各种服务的方式、程序与步骤。一般分为直接服务方法和间接服务方法两大类。直接服务方法是给受助者直接提供社会服务，通常包括社会个案工作、社会团体工作和社区工作。间接服务方法指对受助者实施帮助前的社会工作活动形式，通常包括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督导、社会工作咨询和社会工作研究等。

社会工作方法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提升针对性与实践性的有效举措。以往思政教育着重理论学习，经常会忽略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具体社会难题。用社会工作方法，教育者可以深入知晓学生的社会背景、生活环境及实际问题，进而更精准地规划教育内容及形式，让教育有的放矢。社会工作方法把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辅助学生明白社会中的复杂情形。社会工作方法强调借助社会调查、社区服务等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实际操作当中体会理论同实践的联系，加深对思政理论的认可与领会。

（二）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参与意识

社会工作方法能极大地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参与意识。众多高校的思政教育仅仅停留在理论知识传授方面，忽略了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养成。社会工作方法的采用，让学生直接投身社区服务、志愿活动等社会实践，让他们在处理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成长。这种实践能让学生深入领会社会责任与公民意识，还能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让学生切实参与社区改造、弱势群体照料等项目，可以更直观地察觉到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变革的需求，由此激发他们为社会贡献的热情。该过程还能够辅助学生形成更积极的价值观念，推动他们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变化，让他们成长为有责任心、能担当的社会公民。

（三）丰富思政教育的教学方式

融入社会工作方法，使思政教育的教学方式得以

丰富。过去的思政教育大多依赖课堂讲授以及理论灌输，很少把学生放在真实的社会环境里。社会工作方法主张借助实践、互动和合作等方式推动学生学习[1]。采用这种方式，让思政教育不再是知识的单向灌输，而是成为多元交互的学习过程。学生参与诸如社会调查、志愿服务等活动，可更深入地理解社会难题并摸索解决方案，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实践水平，也拓展了他们的视野。社会工作方法给学生搭建了一个多层级的实践舞台，运用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方式，让学生从参与中得到经验，靠行动去践行思政教育的理念。新的教学方式能使思政教育变得更生动、灵活且吸引人，可助力学生在实践当中检验理论，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最终助力学生全面进步。

二、高校思政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一）高校思政教育的主要任务与目标

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按照新时代发展要求，培养具备坚定政治信仰、高尚道德品质、扎实专业素养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思政教育的内容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传授，关键要让学生理解国家发展的需求、社会变化的规律和发展方向。这对强化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作用重大。思政教育要引导学生从宏观层面认知社会，认清自身社会角色与责任。思政教育需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让他们在直面社会变革与挑战时，拥有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能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建设添砖加瓦。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不是只做质疑和否定，而是要带领学生深挖问题核心，探寻事物的多维度，拥有全局视角与深度认知能力。

（二）当前高校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当前高校思政教育遇到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有目共睹，诸多高校还沿用传统教学模式，主要采用理论授课，未实现与学生实际生活及思想观念的有效衔接。这类模式常过分聚焦知识递送，未顾及学生的情感认可和思想交锋，让思政教育失去吸引力。课程内容虽属严谨，却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教育氛围沉闷，调动不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最终阻碍教育目标达成。思政课程内容多为抽象理论，和学生真实生活脱节明显，难以贴合学生日常的实际问题，学生接触这类内容学习时总认为课程和自身生活体验、思考方式没关联，无法生成实在的触动和感悟，使学生形成“思政课和我不相关”的认知，最终降低课程实际成效。思政教师队伍建设面临一定困难，部分教师的教学方法与理念相对滞后，跟不上现代教育的步伐，诸多教师仍把讲授当作核心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无创新，互动环节缺位，单向传输的模式调动不起学生的自主思考，学生参与度不足，造成思政课教学效果变差。同时，思政教育内容更新滞后，没能及时跟上社会发展节奏，也没能匹配学生思维模式的转变。

（三）思政教育面临的新需求与变革契机

社会发展不停歇，学生思想日益多元，思政教育出现新的需求和变革契机。学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学生可接触到更多社会信息与思想观点，以往的思政教育模式已不能满足如今学生的需求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思政教育需要创新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方法，加强与学生实际生活的密切结合，提升教育的实际效果[2]。社会变化促使高校教育更重视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创新能力，思政教育要教学生怎样理解社会现象、分析社会现象，推动学生踊跃投身社会实践，增强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与处理问题的能力。新的教育需求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必须更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尤其是道德素质、社会责任、创新思维等方面的提高，思政教育面临着新时代构建更开放、互动、创新教育体系的契机。

三、社会工作方法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具体路径

（一）个案工作方法的融入路径

社会工作中运用个案工作法，重视个体差异，突出要依照全面评估和个性化干预措施行事，为每个个体配备定制化支持方案。在高校思政教育环节中，采用个案工作法能协助教师更清晰地掌握学生真实情况，尤其指向有特殊需求、存在心理困扰或情感问题的学生。与学生开展一对一沟通并建立信任关系，教师可全面掌握学生的思想状态、情绪困扰和家庭情况，为每个学生定制适配性强的思政教育方案。该方法尤其适配思维独立、存在特殊困扰或成长中需更多支持的学生，个案工作法采用一对一的形式，指导学生正视并化解阻碍其成长的诸多问题，促使思想素养进步，引导学生形成更完备的价值观和社会适应能力。实施个案工作法不能只依托课堂教学，也可借助个别谈话、专题辅导、心理疏导等形式达成。这个过程中，教师除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外，更关注学生思想、情感和心理发展的变化。思政教育不再走单一理论灌输路线，反倒更重视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重视学生的内心想法与情感诉求，让教育过程更贴合个体需求与人文属性。个案工作法借助细致关注与多维度支持，引导学生深化思想水平，获取情感与行为层面的支持，逐步培育契合社会需求的积极心态与正确价值观。依托个案工作，教师能及时察觉学生成长中的困惑，持续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助力学生在更全面支持下健康成长。

（二）小组工作方法的融入路径

社会工作中的小组工作法，着重靠集体互动协作来推动个人进步，凭借集体研讨、合作去解决问题，增强群体凝聚力与社会的责任意识[3]。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中，把小组工作法运用到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可以增进学生间的思想沟通和情感共鸣。教师通过安

排学生参加小组讨论、集体活动、角色扮演，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与集体责任感。众人一起互动时，学生不仅能听取别人的想法，借助集体智慧提高对社会问题的理解程度以及对思政教育内容的认知水平，小组工作模式为学生打造了开放、互动的学习环境，可以推动他们在团队里互相配合、一同进步。借由这种途径，学生的社交能力以及团队精神均得到了增强，协助他们在集体研讨和合作中形成更成熟的观念。在小组互动期间，学生可交换自身见解，增进对多元文化与社会实际状况的认识，这对培养他们的集体观念、协作精神以及社会担当很重要。凭借小组工作的引导，学生能够更好地领悟思政教育核心要点，在集体互动中达成个人思想的升华与成长。

（三）社区工作方法的融入路径

高校开展思政教育时，把社区工作方法融入其中，能给学生搭建真实的社会实践平台，协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社会问题及社会责任。教师可组织学生投身社区服务、社会调研、志愿活动等事宜，促使学生在为他人服务时认识社会、了解社会需求并提升责任感。实际投身于社区服务工作，学生可以直观地看到社会中的困难群体以及急需处理的问题，进而唤起他们的社会责任观念与公民意识。学生亲身投入社区服务，可以更透彻地知晓个人同社会、集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提升对社会的认同度。社区工作方法助力学生领会多元文化与社会的复杂状况，增强其沟通协调、团队合作与处理问题的能力。在实践过程中，学生思想政治觉悟有了提高，也增强了自身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适应力与行动力。经由社区服务，学生可以把思政教育当中的理论跟社会实际结合，在助人及服务社会的进程中达成自我成长[4]。以实践为导向的教育模式能助力学生加深对思政教育观念的领会，助力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把他们培养成有担当、有能力的社会公民。



（四）社会工作行政方法的融入路径

高校开展思政教育，采用社会工作行政方法能有力提升思政教育活动的组织性与系统性。学校可凭借社会工作行政方法，构建科学的思政教育管理系统，经过妥善规划与安排，让思政教育活动高效地开展。教师与管理者可借助行政手段去拟定具体的思政教育计划，合理分配资源、组织活动，让各项任务的执行都不脱离目标。社会工作行政办法能助力高校更有效地调配不同教育资源，使思政教育活动顺利实施，学校可凭借这一方式加强对思政教师的专业培训，提升教育管理及组织方面的能力。学校还能借助行政管理方式推动思政教育内容的革新，保证它跟上时代步伐，符合学生要求。依靠这种管理办法，学校可以更好地召集各方力量，使思政教育形成合力。依靠行政方法，学校可以提高思政教育活动的执行力与实际成效，保证学生可以获取各式各样的学习资源，助力学生在思政教育中全方位、系统性地成长[5]。这种办法的融入，使教育活动的整体效果提升，又为学生构建了更丰富的学习平台，使思政教育更具长效性和影响力。

四、结语

本文探寻社会工作方法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具体应用方式，剖析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行政方法所蕴含的潜在价值，强调其在增强思政教育效果、强化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方面的关键作用。由于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思政教育得到持续变革与优化，进而更好地契合社会发展的需求，社会工作方法的引入为思政教育增添了新的教学手段，也对教育管理起到了有效助力。随着这些方法的不断普及和深化，社会工作方法会成为高校思政教育改革的关键推动力量，能助力培养出更多有社会责任感与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韩一凡 . 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实践路径探究 [J]. 秦智 ,2025(12):56-58.

[2] 沈阳 . 基于“社会工作 + 思政教育”的高校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探索 [J]. 成才之路 ,2025(27):57-60.

[3] 李玉智 .“优势视角”下退役军人精神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对策与建议 [J]. 中国军转民 ,2025(13):71-72.

[4] 姚琳文 . 知识产权法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必要性与路径研究 [J]. 科教文汇 ,2025(03):61-64.

[5] 张雪洁 . 融入社会工作教育方式的高校思政教育创新路径 [J]. 理财 ,2023(10):48-50.

（作者单位：菏泽职业学院）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路径研究

江美娜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育人的功能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如何准确把握未来高校思政文化育人的发展方向，帮助学生建立起积极正向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已成为思政教育工作者面临的关键性挑战。本文以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的意义和价值作为切入点，立足实际系统探讨了当前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基于积极发挥高校育人作用、夯实课堂教学渠道建设、重视思政教育团队培养以及激发学生自主培育能力等角度，对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的具体路径进行了分析与阐述，旨在为有关高校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高校建设；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在高校思政育人体系的建设与实施过程当中，相关教育团队也应当严格遵循国家关于文化事业以及文化教育的部署要求，立足于高校学生实际情况，积极组织开展文化实践育人活动，帮助学生强化文化自信，坚定思想信念，更好地落实高校思政育人目标。

一、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的意义和价值

（一）强化学生文化认同

数千年历史积淀形成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与精神内核，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红色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了中华文化体系，而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促进作用[1]。但受制于时代变革、媒体引导以及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高校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受到冲击和影响，文化价值的教育意义难以得到充分彰显，严重制约了学生文化自信的建设与发展进程。在高校思政教育进程当中积极组织开展文化实践育人活动，则能够通过丰富多元的形式路径，深化高校学生对于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与演变历程的印象和了解，充分强化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帮助学生筑牢文化根基，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与审美能力，真正实现学生个人成长与价值观念塑造的目标要求，化解当前社会面临的地域、民族文化隔阂，持续强化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二）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当中，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以高校思政教育为基础组织学生参与文化实践育人活动，能够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帮助学生在具体的实践历程当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思想价值与精神价值，有效抵御社会环境变革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使国家文化主体性得到充分捍卫，同时还能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中华文化能够在高校学生的推动与传播下实现更好地“走出去”，强化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进程当中的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提供精神动力。

（三）促进思政教育发展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开展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活动，能够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备更加丰富的素材，立足于文化实践育人活动，能够使中华文化充分融合于高校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当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高校学生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同时还能有效丰富学生的文化理论体系以及理论架构，使其能够从中华文化当中汲取养分，为其今后的成长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2]。

二、当前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文化实践育人活动在高校思政教育体系当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但受制于教育理念以及教育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依然面临

着一系列挑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育人条件不够充分

充分完备的育人条件对提升思政文化实践育人活动的开展质量与组织成效具有关键性作用，但结合当前一些高校的育人工作开展现状以及育人条件落实情况来看，其对应的效果与水平较为有限，不利于育人目标的有效落实。部分高校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存在一定欠缺，相关课程体系与上述中华文化内容之间的衔接性与契合度较为不足，学生无法通过系统化的文化课程完成对中华文化的全面了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学生文化素质的发展以及文化自信的建设进程，阻碍了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工作的开展效果。

此外，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传统的文化实践育人模式已不再适应新时期的学生成长要求，如何适配新时代文化实践育人目标，强化育人方式对于学生的吸引力已成为思政教育团队面临的另一项关键性挑战。作为高校建设进程当中的重要舆论路径以及舆论阵地，校园官网、微信公众号以及短视频平台等载体在文化实践育人当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从一些高校对于相关平台的开发运用情况看，上述平台当中有关的文化实践育人内容存在一定欠缺，学生缺乏具体的学习途径与交流平台，不仅影响了高校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水平，同时也制约了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的持续推进[3]。

在此基础上，一些高校内部的文化环境建设较为滞后，在不同教育环境下未能形成合力，校园内对于文化精神的践行和追求停留于表面，在教育实践开展过程中对于文化元素、文化思想以及文化精神的引入存在一定欠缺，亟待对其进行改进与优化。

（二）育人实践相对薄弱

在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的组织开展进程中，需要具备雄厚的实践基础与实践条件，才能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感知与体验，这对提升高校思政教育开展水平以及文化育人组织成效具有关键性作用。但从现阶段一些高校的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的开展情况看，教师所运用的方法与策略相对较为单一，文化理论内容以及思政理论内容在整个教育体系进程当中的占比依然较高。教师团队对于文化实践育人的重视与关注程度较为欠缺，同时也未能立足于学生的成长发展特点为其打造符合实际的实践路径以及实践环境，学生难以在理论教育进程中感悟文化育人的重要价值，影响了学生对于思政课程以及文化育人的参与度，制约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三）教师队伍建设滞后

教师团队的能力与素养直接影响着思政教育进程中文化实践育人的开展效果。但从一些高校思政教师队伍的培养建设情况看，对于教师团队的选拔标准仅限于论文发表以及项目成果等内容，对于教师文化实践育人能力的重视程度存在一定欠缺，导致一些教师不具备充分的实践引导能力以及文化育人能力，严重影响了学生在思政课程当中的收获，学生甚至会对思政课程教育内容产生一定的负面排斥情绪，不仅影响了高校发展进程当中的专业建设水平，同时对高校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开展也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4]。

（四）自我培育能力欠缺

相较于以往初高中思政教育阶段和模式而言，高校思政教育组织开展进程当中对于学生的自我培育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只有通过自我认识、自我学习、自我体验与自我反思等一系列过程，才能完成对中华文化的系统化认知，确保中华文化得以在学生的内心和精神层面落地生根，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的精神引领作用。但针对现阶段一些高校学生的成长发展情况以及文化实践育人参与现状来看，部分学生参与学习的动力较为不足，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存在一定欠缺，自我实践能力较弱，影响了思政教育进程当中学生的自我培育效果，难以实现文化自信的树立目标。

三、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的具体路径

为更好地推动高校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目标的有效落实，应当从育人条件、实践路径、团队建设以及自主发展等角度，采取多元化措施进行全面完善，使高校文化育人的效能得到更加积极的展现。

（一）积极发挥高校文化育人作用

以往部分高校内部的文化实践育人条件存在一定不足，导致思政教育与文化育人的开展成效面临阻碍。因此，教育工作者应当积极发挥高校育人作用，立足于本校优势与特点，推动中华文化教育资源的全方位整合，帮助学生增强文化自信。学校与教师应当基于当下的思政教育开展模式与开展体系进行改革与优化，通过思政周课等渠道和方式，深化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同时基于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引领学生建立并巩固文化自信，认识到未来社会发展进程当中中华文化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使思政内容以及中华文化核心内容得以真正让学生入脑入心。

此外，为加强思政教育文化实践育人对于高校学生的吸引力，提升学生对于文化实践育人活动的参与积极性，相关高校与教师团队还应积极推动官网、微信公众号以及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平台的活化开发，使其能够成为思政内容以及文化育人内容传播交流的关键性载体，真正实现对传统文化育人模式的全面创新。通过上述文化载体与教育路径，能够使文化自信根植于高校学生的内心，丰富高校学生的精神世界。高校应当及时与学生代表展开沟通协调，明确学生成长发展进程当中的文化追求以及文化倾向，并通过校内文化环境建设等一系列方式，完成教室、宿舍、食堂、宣传栏等相关环境的文化改造，让中华文化元素能够

在潜移默化当中深入学生内心，为学生的成长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加强思政课堂教学渠道建设

在高校思政教育的开展进程中，思政课程以其育人模式和育人路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相关高校应当进一步加强校内思政课堂教学渠道建设，使其能够有成为文化实践育人的关键路径，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与充分交流，更加充分地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首先，在思政课堂教学渠道建设的过程当中，高校应携手教师促进中华文化教育内容的重构，遵循动态原则与整体性原则，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发展成果以及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对其进行全面串联，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能够融于一体，共同引导并塑造学生的思想认知与价值观念，不断强化学生的文化自信，提升学生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崇洋媚外思潮以及拜金思潮等不良社会风气的抵御能力，引导学生在中华文化的熏陶感染和引导下更加自觉地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道路当中，为提升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开展成效以及文化育人实践成效作出卓越贡献[5]。

其次，高校与教师应当加强对文化育人实践模式与育人路径的关注度，针对既有高校思政教育发展进程当中单一育人模式进行全面迭代与改革创新，使专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以及项目式教学法得以在文化实践育人进程当中得到充分运用，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深化学生的文化感知，强化文化实践育人的吸引力，使文化自信教育以及文化育人的实效性得到显著提升。在路径与模式的创新进程当中，高校应及时组织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充分掌握学生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与认知水平，并构建符合学生思维的文化育人评价体系，助力文化育人模式进一步完善。

最后，高校应加强对信息化、数字化平台以及虚拟仿真技术的关注，使其能够成为新时期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培养路径与培养方法。教师应立足于学生的成长发展特点，积极引入多种平台进行开发，使学生与教师之间能够实现密切互动，显著提升学生在文化实践育人活动中的参与感、沉浸感与体验感，为落实高校思政文化育人的目标奠定基础。

（三）重视专业思政教育团队培养

教师团队的能力素养对于高校思政教育以及文化育人工作的开展成效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因此，高校应当立足于学生实际情况以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对于思政教育的具体要求，加强对专业思政教育团队的重视程度，使教师团队能够明确践行文化自信教育理念，同时具备丰富的文化实践教学经验与教学心得，能够准确把握文化实践育人以及高校思政教材的核心和基石，并以此为依据积极组织开展文化实践育人活动，让学生能够通过对原理、概论、纲要等具体内容的学习，从中国近现代史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进程当中领会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感受中华文化在民族发展与复兴当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为促进文化育人效果的不断提升提供支持。

（四）充分激发学生自主培育能力

在高校思政文化实践育人过程中，学校与教师还应充分激发学生的自主培育能力，使学生能够成为文化自信建设与内化的主体，引导学生从文化立场、学习进程以及实践行为等方面系统化完成对文化自信的建设，强化学生的文化自主性。

与此同时，院校与教师还应当针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全面锻炼与强化，使其能够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结合院校有关部署以及教师的相关要求，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关的资料进行整合研究，完成对相关文化资源的充分感受与系统化运用，使学生能够在文化资源当中取得圆满收获，激发学生参与文化实践育人活动的内在动力，帮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文化自信在引领文化实践、促进自我发展等层面所发挥出的价值和作用，让学生能够从文化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作出更加突出的贡献。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背景下，加强高校思政教育水平，对促进学生文化自信的培育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关院校与教师应当明确当前学生的成长发展水平，并立足实际针对高校思政进程中的文化实践育人模式进行系统化迭代与创新优化，确保相关育人模式能够充分契合学生成长需求，推动学生思维认知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 朱泽启 .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与经验 [J]. 理论观察 ,2026(02):154-160.

[2] 王怀毅 . 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公共协同路径——以长春理工大学为例 [J]. 公关世界 ,2026(03):161-163.

[3] 冀艳利 , 楚森森 .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高校红色文化实践育人共同体构建 [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6,42(01):22-24.

[4] 余璐 . “第二个结合” 赋能新时代高校文化育人的学理探析与路径思考 [J]. 高教论坛 ,2026(01):82-86.

[5] 顾云倩 . 文化育人视角下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创新路径 [J]. 新传奇 ,2026(02):68-70,5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育人的路径创新研究”（JJKH20241480SK）。

（作者系吉林建筑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价值优势、实践挑战与优化路径研究

吴沂珊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思政教育创新提供了全新动能，在提升教学效率、丰富教学形式、精准匹配需求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是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本文立足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实践背景，系统梳理技术应用的价值优势，分析当前融合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从技术优化、数据治理、主体赋能等维度提出优化路径，为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育人实效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人工智能；思政教育；算法偏见；价值偏离；伦理困境

一、引言

思政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其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才的培养方向与成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融入教育领域，智能平台、个性化推送、虚拟仿真等应用逐步渗透思政教育全过程，推动教育模式从传统灌输式向精准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人工智能凭借数据处理、智能分析与交互的优势，有效弥补了传统思政教育在需求精准把握、教学形式创新、互动反馈及时等方面的不足，为思政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正处于探索深化阶段，实践中仍面临技术适配不足、数据体系不完善、教师能力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立足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实践背景，系统梳理技术应用的价值优势，分析融合过程中的现实挑战，并提出针对性优化路径，以期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高质量融合，更好发挥育人功能。

二、人工智能助力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与价值

（一）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助力教育均衡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平衡思政教育资源的供给提供了技术保障。智能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地找到不同学生群体的基础、特点和需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统一化供给”向“精准化适配”的转变。整合优秀的课程资源、案例资源以及实践资源，建立开放型共享平台，有利于扩大优质资源共享范围，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区域公平、校际公平以及群体公平，从而保证教育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同时，智能化推送形式也能够使学生不受时空局限，无论其身处何地何境，都能便捷地得到适合自己的思想政治学习内容，拓宽学习渠道、增加学习经历，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1]。

（二）强化主流价值的精准传递，提升价值塑造实效

人工智能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能切实提升主流价值引领的针对性和感召力。智能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所包含的价值内涵进行挖掘与分析，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成长发展特点把抽象理论具体化为案例教学、情境创设及个性化内容，使主流价值观渗透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利用智能技术和新媒体打造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并投入思考，促进学生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内化，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智能化赋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价值引领从“以我为主”的灌输转向“双向互动”的模式转换，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塑造上的有效性。

（三）丰富教学形态与互动模式，提升育人温度与实效性

人工智能技术促进教学模式创新，解决了思政教育传统课堂互动匮乏和及时反馈的难题。智能交互、虚拟仿真以及学情分析等技术支持下的多元化师生、生生互动构成学习生态系统，实时获取学生的认知状态、思想情绪变化，为教师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有

针对性地适时进行个性化干预提供数据支撑。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下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与个体差异情感需求，将标准统一教育与个性化培育相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既有思想深度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温度，有效提高育人的亲和力、感染力。

（四）拓展实践育人载体，提升知行合一育人效果

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人工智能技术为营造真实、互动的实践育人场景提供了有力支持。通过虚拟现实和数字孪生、虚拟仿真、AR/VR 等技术手段，可以创建红色文化体验教育、国情教育、道德教育实践、法治教育体验等不同主题的虚拟实践教室，解决了传统思政教学实践受限于时空因素、场地因素、安全因素的问题，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里参与历史事件，感受榜样魅力，模拟社会实践，把理性知识升华为感性认识、情感认同、自觉行动，增强了思政教学的实践性和影响力。智能教育实践平台可以记录和监测学习者在实践中的参与率、情绪表达、行为方式等过程性数据，并形成个人的实践成长电子档案，便于教师评价学习者的实践活动情况，并且可以对实践活动方案进行实时的调节，变形式化活动为深层次体验式参与，增强知行合一效果 [2]。

（五）推动教育评价改革，建立立体的多元化评价模式

评价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和育人成效的保证，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从结果评价向过程性、多元化综合评价发展。以往思政考核评价依据的是考试成绩、心得体会等形式上的静态终结性评价形式，而难以反映学生的思想变化、价值判断与成长情况。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进行多维度的信息采集，结合课堂行为表现、学习互动数据、实践参与数据以及日常生活等相关数据融合形成“知识 + 能力 + 价值”的综合评价机制，全面跟踪和描述学生的政治思想发展状况和思想成长情况。智能分析系统能够针对这些数据分析得出相应的个性化评价结论报告，并客观地体现学生的优势和劣势的成长趋势等，避免主观评价的影响并使评价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公正性。与此同时还可以将相应的分析报告信息反馈到教学活动中，使得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优化自身的教学内容、调整教学策略，从而对学生实施有针对性的指导，最终形成一个“教学—评价—改进”的闭环育人模式，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作出贡献。

三、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现实挑战与优化方向

（一）技术适配性有待提升，需强化价值导向型算法建设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思政教育场域还存在适配性不足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思想性、价值性与实践性的教育活动，目前的智能算法主要关注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分析和提高运算效率，较少将算法与价值观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结合考虑，很难达到价值引导和思想教育的目的。算法透明性和可解释性需要增强，还需要规范和完善算法设计流程，要将立德树人的要求和主流价值取向融入算法设计全过程，建立技术效率和价值引领相结合的算法体系，保证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以育人为目的 [3]。

（二）数据治理体系尚不完善，需构建高质量的数据支撑体系

数据作为人工智能融入思政教育的基础要素，其品质决定了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的有效性。而当下，思政教育所拥有的数据存在着样本范围不广、内容质量不高、安全措施不足等方面的问题，还需在保证样本覆盖所有专业与年级学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范围，在严格的价值筛选下确保其符合主流价值观念且具有积极正向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内容质量，并通过完善相关规范制度来对收集、存储及使用等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约束，在保障学生的信息安全及正当权益的基础上更加全面地健全全过程标准，尽快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的数据管理机制，运用数据清洗、审查与安全管理等一系列手段来为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主体综合素养需持续强化，需构建协同育人能力体系

教师及辅导员作为人工智能 + 思政的主力军，其技术运用能力及引导价值直接决定着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效果，当前部分教师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及应用水平有限，对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如何运用及怎样进行价值引导掌握得不够充分，部分主体角色职能需要更加明晰，并完善相关协作机制。需要对教育者开展系统化的培训工作提升技术应用、伦理以及价值观引领综合素质。明确并落实教师、辅导员和技术开发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协同职责。发挥各自优势协同作用，充分发挥育人主导功能，在技术赋能过程中做到价值引导不断档、不缺位，育人效果不断流、不偏移。

四、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一）技术改进：构建价值嵌入算法体系

升级算法体系向价值引领转变，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立德树人融入算法设计、内容推荐、学情诊断、评价反馈等各环节，构建思政教育的价值指标系统，使算法运行符合正确的价值导向。在使用推荐算法时一定不能完全依赖体系数据的结果，也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推荐系统。例如，“红色文化”“党史党建”等内容会被系统检测为“正能量”高价值标签，设定正向反馈闭环，当学生循环多次观看高价值标签的内容时，系统会自动调整推荐内容，继续多推荐类

似内容，减少娱乐休闲信息。强化算法的透明性与可解释性，明确算法决策原则、数据来源及运行过程，实现可跟踪、可监督。建立常态化优化机制，在思政教育教学应用场景下开展测试与迭代，增强算法的适应性和稳定性。

（二）数据治理：建立规范化的数据管理体系

规范数据采集、清洗、审查、存储和使用流程，确保全周期数据治理的规范化。在采集环节遵循知情同意和最小化原则，保障学生知情权和隐私权，扩大样本规模，提高代表性和完整性。在数据处理阶段组建专业队伍，对数据进行清洗筛选与标准化处理，并进行价值导向把关，保证数据内容的积极向上。在数据安全管理上采用先进的防护技术，对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并设置权限控制，防止敏感数据访问。

（三）主体赋能：提升思政课教师及辅导员的素质能力

建立系统化培训机制，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平台运用以及如何引导价值导向等问题进行专项培训，增强教育者的 AI 运用能力、价值导向判断能力以及教学创新等能力。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让教师参与到算法设计与内容筛选、学情诊断与解读等重要环节之中，并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引领的功能；同时利用辅导员离学生近的优势，及时把握学生思想动态并做好日常引导工作。打造教师与辅导员以及技术团队的协同合作机制，并将思政教育需求融入技术优化过程之中，形成育人合力 [4]。

（四）教育引导：强化学生的媒介素养与价值认知能力

在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活动中引入媒介素养的培训，组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信息识别等专门议题教育内容，培养学生对智能特性形成正确的认识，提高筛选和分析判断的能力。拓展教学方式，开展小组讨论、专题活动以及价值辨析等活动，使学生面对多种观点进行思考，提高选择价值的能力。创设反馈机制，倡导学生运用智能平台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形成师生共同构建的良好环境。

（五）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凝聚多方联动育人合力

人工智能对思政教育赋能是一项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以及技术企业等相关方协同合作才能完成的系统性工作。高等学校要发挥牵头和组织作用，积极构建学校与社会协作育人的平台体系，主动联合当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与爱国主义和红色教育资源单位、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益组织开展全面深度的合作，实现优质思想政治教育力量的整合，共建智能思政教育的资源库、实践基地和育人共同体，促成校内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形成无缝对接、同向而行的良好局面。通过加强家校合作来实现育人合力的构建，借助智能家校互动平台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及时将学生的最新思想状况和成长情况传递给家长，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并配合高校进行价值观的培育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从而形成家校携手育人的良性互动。与相关的技术公司之间深化合作，共同组建学校—企业协同发展机制，基于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需求，一起完善优化智能平台功能与算法模型，开发具有特色的教学内容，使技术研发更加符合育人的导向并服务于教学过程，打造各方积极参与、取长补短、合作共赢的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为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全方位支持 [5]。

五、结语

人工智能赋能思政教育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趋势，为新时代思政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人工智能在资源优化、价值塑造、教学创新等方面的优势，能够有效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吸引力与实效性 [6]。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仍需正视技术适配、数据治理、主体能力等方面的现实挑战，通过持续优化算法体系、完善数据管理、强化教师素养、健全协同育人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良性发展。未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与应用体系持续完善，从技术、数据、主体、教育等多维度协同发力，通过构建价值嵌入型算法体系、完善规范化数据管理、提升思政教师综合素养、加强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等举措，筑牢伦理安全防线。随着技术持续进步与制度不断健全，人工智能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将更深入、精准、有序，有效突破传统模式局限，以技术赋能强化价值引领，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人工智能将更好地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思政教育提质增效，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保障。

参考文献

[1] 相晓爽，刘晶晶 .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N]. 中国工业报 ,2025-07-28(18).

[2] 马驰洋 .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路径选择 [J]. 林区教学 ,2025(07):16-19.

[3] 王乐乐 .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艺术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机遇、挑战与实践路径 [J]. 艺术教育 ,2025(10):230-233.

[4] 陈伟 .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价值及实践路径 [J].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03):99-101.

[5] 杨仁财 .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应对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 2020(05):54-59.

[6] 梁雪，方冉，沈长龙 .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网络思政教育的多维价值、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6,46(01):74-79.

（作者系广西职业师范学院传媒学院讲师）

融媒体 AI 时代高校附属医院开展医学生思政工作的路径研究

傅　强　朱冠宇 *

摘要：融媒体 AI 时代为高校附属医院医学生思政工作创新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围绕附属医院医学生思政工作这一核心议题，首先阐明其在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中的重要意义，继而分析融媒体 AI 时代开展思政工作在内容供给、全场景覆盖、双向沟通三方面的独特优势，最后从明晰导师德育责任、发挥言传身教作用、正视身份认同矛盾、补齐沟通保障短板四条路径提出实践对策。研究表明，AI 技术与融媒体矩阵能有效破解传统思政工作问题，而导师责任明晰、言传身教融合、身份认同正视与沟通体系完善是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育人实效的关键。唯有技术赋能与制度建设协同推进，附属医院医学生思政工作才能实现从“附加任务”向“内在需要”的根本转变。

关键词：融媒体；AI 技术；思政工作；附属医院；医学生

高校附属医院是医学生理论学习、技能培训、临床见习的重要阵地。目前较为主流的研究都着眼于如何利用好融媒体思政资源，整合优化实现思政工作的成效提升[1]。医学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有温度、有担当的医者，思政工作是实现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环节。高校附属医院作为医学生从课堂走向临床的关键场域，其思政工作具有天然的场景优势与实践深度。融媒体 AI 时代的到来，为破解传统思政工作内容同质化、传播滞后化、互动单向化等难题提供了技术支撑。本文立足附属医院实际，系统分析融媒体 AI 时代开展医学生思政工作的优势与路径，以期推动思政工作与医学教育深度融合。

一、医学生思政工作的重要意义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医学教育肩负双重使命，既要传授扎实专业知识与临床技能，更要塑造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与高尚的医德医风。在融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医学生易受多元价值观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协同开展思政工作，能够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筑牢思想根基，而他们的人文关怀素养也将直接决定未来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站在医学培养的角度来分析，医院所具备的核心社会价值是公共医疗服务，但医疗卫生领域仍然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当前医患关系、医疗改革等话题备受社会关注，医学生作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后备力量，他们的思想动态直接影响着未来医疗队伍的稳定性和战斗力。因此，附属医院开展思政工作不仅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更是保障医疗卫生事业后继有人、行稳致远的战略之举。唯有将思政教育融入医学人才培养全过程，才能确保未来医者既有精湛医术，更有仁心仁术，真正担起守护人民健康的时代重任。

二、融媒体 AI 时代高校附属医院开展医学生思政工作的优势

（一）AI 赋能思政资源的精准化与个性化供给

在融媒体 AI 时代，高校附属医院进行医学生思政工作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内容生产能力。长期以来，传统的思政教育面临着资源同质化、更新缓慢以及与医学专业的割裂等问题，老师只能利用有限的教学资料备课，无法满足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的需求。但是 AI 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它可以围绕医学伦理的热点、临床上的具体情况、国家的卫生健康政策等方面，迅速产出与医学生的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从而实现由“一刀切”的思想政治教育到“有的放矢”的指导过程。更重要的是，AI 可根据学生认知程度、专业基础以及所在年级等对学生进行不同层次的内容推送，让低年级的学生了解职业认同及医者初心，让高年级的学生了解临床伦理和社会责任，让研究生关注科研诚信与公共卫生等。这样精细化的内容推送可

以有效解决以往思想政治工作“一刀切”的问题。此外，AI 还可以把较为枯燥的思想政治内容以图片、视频、互动等方式展现给学生，符合当前医学生获取信息的习惯，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由原来的“灌输式”转变为现在的“探究式”，在内容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和魅力。

（二）融媒体矩阵打破时空壁垒，实现全场景覆盖

高校附属医院医学生群体有其特殊性，在校学习的同时还要进行实习，地点从教室到病房再到手术室再到宿舍，时间非常零散。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固定的课堂以及集中的报告会等，无法做到对这个流动群体的有效覆盖 [2]。但是融媒体 +AI 时代却给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全方位、全天候的传播方式。利用 AI 驱动的智能推送，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可以精准地嵌入学生日常的信息流之中，在早上交接班时、中午休息时、上下班的路上都可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附属医院有临床一线的真实现场，AI 可以将思政内容融入查房记录、病例分析、医患交流等日常工作当中，让思政教育渗透到医学实践的方方面面。而融媒体矩阵的广泛传播力，可以让一个话题在短视频、微信公众号、学习通等多个平台上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最大限度地吸引学生的关注。这样全覆盖使得思政工作不再是“一时一事”的任务，而是“随时随地”的存在，取得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三）AI 驱动的双向沟通重塑参与感与实效性

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单向灌输”，老师讲、学生听，缺少交流和反馈，老师无法了解教学情况，学生也无法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而融媒体时代的 AI 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全方位的便利。AI 聊天机器人、智能问答系统可以给医学生提供一个匿名的、无压力的思想倾诉渠道，在职业迷茫、伦理困境、心理困扰等方面都可以与 AI 私密交谈并且得到及时的回答及指导，在以往的教学中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AI 还可以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学生在融媒体平台上所发的评论、交流内容进行情感分析以及主题分类，便于思政课教师了解学生的想法及兴趣点，及时调整教学思路。这是一场互动过程，是从“我说你听”到“你说我应”，是从“被动听讲”到“主动参与”的过程。而 AI 记录这些交流信息能够为学生思想历程画出一张完整的图谱，让思政教师看到每一个学生的具体变化，从而由“凭感觉”变为“有依据”，真正做到因材施教、适时而教 [3]。

三、融媒体 AI 时代高校附属医院开展医学生思政工作的路径

（一）明晰导师德育责任，破除“课堂化”思政育人误区

导师是医学生在医院教育中最为核心的角色，不仅在专业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以自身言行成为医学生职业行为的直接范本。附属医院的学术导师大多兼任医疗骨干，肩负着治病救人和教书育人的双重任务，而此种身份的复杂性，常被简单归结为思政教育工作缺位的核心原因。在落实导师德育责任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一个现实难题，即如何将德育责任直观化履行，部分导师因此刻意剥离医疗身份，还原为单一的教书育人身份，对学生开展思想说教，强制要求学生加强理论学习。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附属医院等同于高校，把临床实践学习改造成传统课堂教学，根源在于导师对附属医院思政教育的定位认知模糊。立足临床育人实际，医学生在医院的思政教育决不能脱离医院场景本身的属性定位，其工作核心并非强化课堂教学特征，而是切实强化导师的榜样模范引领作用。

导师的德育责任是“隐性的教育”，不需要刻意地去讲解，而是体现在每次查房、每台手术、每次与病人交流时。医学生通过看导师对待不同的疾病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面对突发的情况能够沉着处理，在经济条件较差的病人面前能够施以援手等，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做一个有仁爱之心医生的思想意识。所以明确导师的德育责任就是让导师认识到自身的一言一行都在给学生做榜样，在日常带教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渗透思想政治工作。医院应当引导导师在临床一线，以病人为例，给学生讲解医学伦理学、法律知识以及人文关怀，让德育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变成可以感知、可以理解的行为准则，使附属医院成为医学生在提高技术水平的同时也受到良好熏陶的地方。

（二）发挥导师言传身教的作用，实现思想与专业育人融合

在医学专业培养体系中，导师往往是医学生心中理想职业形象的缩影，其一言一行都直接为学生展现出真实的职业图景。相较于生硬的课堂式说教，导师在医疗岗位上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日常行医中的严谨处世、医者仁心的行为作风，都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学生自我价值实现的认知之中，医学生导师的思政育人成效，恰恰积淀于师生日常临床交流的点滴细节。即便处于融媒体时代，若是一味让导师转变为思政说教角色，借助新媒体工具转发学习内容、布置线上自学任务，非但无法实现融媒体思政的有效应用，反而会使师生关系疏远，为思政教育搭建无形的壁垒，本质上是借助融媒体工作逃避德育职责。导师对思政工作的态度与学生的思政认知高度契合，而具体落实院内思政育人，无需导师刻意转型为专职思政工作者，只需导师始终保持对思政工作的积极正向态度，坚守医者职责，履行医者的社会责任，便能让思政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因此，导师的言传身教是连接医学知识与职业道德之间的纽带，在导师站

在无影灯下，或者对病人轻声细语的时候，“无声的思政课”所体现出来的敬业精神以及仁心仁术对学生的感染力远远大于一切数字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而融媒体技术只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用来记录并传播导师们那些动人的瞬间，而不是代替导师本人去进行这样的示范，让导师回到临床一线，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才是最有效的思想引领与业务指导相结合的方式，才能培养出既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又有人文关怀的高素质医师[4]。

（三）优化院内学生管理，正视医学生身份认同矛盾

在融媒体、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高校附属医院是医学生成长道路上重要的“第二课堂”。做好院内学生管理工作是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基础，也是使医学生树立医德观念、明确自身角色的重要一环。

基于融媒体打造全覆盖式“云上”思政课堂，有利于缩小医学生与临床之间的差距。医院可以借助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新媒体进行传播，报道优秀年轻医生努力工作的事迹以及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动人情景。这种方式能够让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产生从事医疗行业的光荣感，在自己的碎片时间里也能体会到医学的崇高，进而产生未来作为医生的认同感。

人工智能的应用使精细化管理有据可依。建立智慧学工平台，学校可以准确记载医学生在临床实习期间所进行的各项操作以及医德医风情况等。这不是简单的监管，而是在更好地发现他们的优点与问题的基础上给予有针对性的帮助。当医学生感受到学校对他们成长的关注以及合理安排时，他们就会更加认同学校的风气。

此外，加强仪式感的培养以及人文关怀也是改进管理的有效方式。举行隆重的白大褂授予仪式、医师节宣誓等活动，使医学生感受到自身的神圣身份。其次，设置导师与学生“一对一”的指导关系，在技术上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辅助教学以提高水平，在精神上传授医学人文关怀。这样一种“技术 + 人文”相结合的方法可以使医学生顺利地从学校走向医院，树立“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信念，成为既有温度又有情怀的新一代医生[5]。

（四）补齐沟通保障短板，筑牢思政工作兜底支撑体系

思政工作开展通常致力于帮助学生融入医院。借由党团建设、集体关怀、学生活动等方面营造医院“大家庭”氛围是常见且有效的工作方式。这类工作往往只聚焦于弥合“距离感”，却忽视了客观存在的“差异感”。要实现从“身份疏离”到“身份认同”，可从三方面发力。其一，以情感联结为基础，消除身份疏离感。建立常态化师生、医患、学生沟通机制，安排临床带教老师、思政辅导员定期与医学生谈心谈话，精准回应身份认知上的迷茫；挖掘院内正能量案例，宣传优秀医学生、青年医师成长故事，让医学生在身边榜样的引领下，感知医学职业的温度和附属医院的人文氛围。其二，附属医院主动赋予医学生合理的身份权责，结合其学习进度，合理分配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到被需要、被认可，逐步树立“我是医院一分子”的主体意识。其三，优化医学生管理服务，完善驻院学生的学习、生活配套，建立专属成长档案，将院内表现与评奖评优挂钩，让医学生感受“驻院学习”不仅是专业成长的过程，也是自身身份逐步转型的过程。通过情感联结拉近距离、身份赋能体现价值、场景融合打通壁垒，让医学生在医院学习期间，建立对医学职业的清晰认知和情感归属，为思政教育落地见效奠定坚实基础[6]。

四、结语

融媒体 AI 时代赋予高校附属医院医学生思政工作新的可能性，但技术始终是手段而非目的。优势的发挥依赖于路径的落地：导师责任的明晰是根基，言传身教的融合是核心，身份认同的正视是关键，沟通保障的补齐是底线。唯有将技术优势与育人逻辑深度结合，思政工作才能真正从“附加任务”变为“内在需要”，培养出既精于医术又厚于德行的新时代医学人才。

参考文献

[1] 丛亮 . 融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9(11):82-85.

[2] 章恒通 , 王志中 , 张亚亚 . 医学生述情障碍与手机成瘾的相关研究进展 [J]. 西部学刊 ,2025(08):108-111.

[3] 朱普庆 . 新时代附属医院在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对策与思考 [J]. 当代医学 ,2021,27(28):190-192.

[4] 邵鲁文 . “数字泊水”污染加剧，怎么管？ [N]. 新华每日电讯 ,2026-02-03(05).

[5] 胡晓丽 .AI 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角色重塑与素养提升探析 [J]. 阿坝师范学院学报 ,2022,39(03):41-46.

[6] 廖偲偲 . 融媒体时代高校文化育人的实现路径 [J]. 传媒论坛 ,2025(18):152-15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苏州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项目“融媒体背景下高校附属医院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3830441124）。

（作者：傅强，苏州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 苏州市独墅湖医院 > 副研究员；通信作者朱冠宇，苏州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 苏州市独墅湖医院 > 研究实习员）

新媒体背景下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策略研究

王晓倩

摘要：在当今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青少年学生的文化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高中思想政治教师通过运用各种新媒体资源，使课程在培育学生文化自信方面呈现出教学方式更灵活、教学内容更多元的优势。这种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教学模式促进了学生对文化自信的内化。本研究基于高中思政课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以及新媒体对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作用，进一步探讨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策略。

关键词：新媒体；高中思想政治课；文化自信

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的传媒形式，已经深深地融入大众生活当中。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日新月异，它以自身独特的优势通过高中思想政治课促进学生文化自信的养成。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有利于提升其自我认同，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高中思想政治课作为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其作用发挥与策略创新，是当前教育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一、高中思政课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1]。高中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将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纳入核心育人目标，既是回应时代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应对新媒体时代挑战的需要。

（一）回应时代发展的战略需要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自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重要范畴，并进一步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文化自信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并将文化自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也不断增强。现阶段，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迫切地需要文化层面的精神供给，而文化自信正是这一供给的灵魂所在[2]。高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渐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是培育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阶段。通过高中思政课的系统培育，能够帮助青少年筑牢内心的文化根基，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这正是新时代赋予思政课的重大使命。

（二）应对新媒体时代挑战的需要

新媒体技术的广泛普及，深刻改变了青少年的信息接收方式。当下青少年更喜欢借助多媒体获取各类文化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拓宽其文化视野。然而，由于部分学生缺乏主动筛选和深度思考的能力，长时间接触网络内容，容易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在享受信息便利的同时也容易陷入认知碎片化和娱乐化等现实困境。针对这一现状，高中思政课应主动回应时代命题，既要充分发挥新媒体数字化育人优势，也要引导学生理性审视纷繁复杂的网络文化信息，提高自身的文化辨别力，使学生在面对良莠不齐的网络文化时，能够用理性思维和所学知识进行鉴别和审视。可以说，培育学生文化自信是高中思政课应对新媒体时代育人挑战的主动回应。

二、新媒体对学生文化自信教育的价值意蕴

（一）增强文化认同，拓宽国际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围绕文化自信作出深刻阐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3]。文化自信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也关系着民族精神的独立性，所以我们必须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而培养高中生文化自信的一个

重要渠道就是充分利用新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新媒体可以通过视频、动画等直观、生动的形式，帮助学生更清楚地看到以及感受到本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从根本上激发高中生了解、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兴趣，在无形之中增加了文化认同感[4]。

（二）打破时空限制，增强互动交流

新媒体的特点是具有即时性、互动性和共享性，只要是在移动互联网覆盖的地方，高中生可以随时随地搜索、查阅和发布信息。新媒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时，高中生的面授方式受到制约，居家进行网络学习成为常态，这样的上课方式既保障了学生的身体健康，也为学生居家学习提供了有效的途径[5]。

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高中生可以在新媒体上进行点赞、分享、评论等，通过这种方式参与文化话题的讨论，同时，他们还可以创新自己发布的内容，进行文化交流，这种文化参与感可以大幅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三）增强主体意识，提升学习兴趣

在新媒体时代，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常常会使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新媒体载体，例如 QQ、微信、微博等，为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多样化的形式和手段，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去了解学生的观点和想法，为学生的交流提供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的平台。比如，教师因此可以快速了解到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感悟与深层思考。学生也可以在众多的新媒体平台上检索感兴趣的文化内容，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分享或是发表自己对相关文化的理解，这样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主体意识，提高了高中生对中华文化的学习兴趣，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对文化自信产生了坚定的信念。

三、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策略

（一）强化教师新媒体应用能力，助力文化自信培育

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培育学生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深度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关键所在。但是由于思想政治学科逻辑性和学科性较强，缺乏一定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对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而新媒体资源对于高中生来说具有一定的娱乐性和吸引力，能够和学生的认知特点以及兴趣偏好相契合[6]。因此，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教师在对新媒体资源的应用方面应该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强化新媒体应用能力，为高中思想政治课培育学生文化自信注入新活力。

1. 系统培训，夯实应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强化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师在新媒体方面的应用能力也是如此，学习新媒体的有关知识是强化新媒体应用能力的基础。每位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应用新媒体资源的能力是参差不齐的，所以要针对教师的新媒体应用水平进行差异化培训，对于初学者，要设置有关新媒体应用的基础课程，进行新媒体平台的基础操作培训，让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对于新媒体的背景、功能、优势有所了解[7]。对于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教师，开设进阶课程，进一步强化新媒体应用能力。

2. 开发资源，增强教育吸引力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多种教学资源开展教学，这是《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提到的内容。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要依托新媒体平台，将静态文字叙述转变为动态影像，比如可以通过 AR 技术将各种中华文化生动地呈现出来，使其更符合高中生的年龄和特点，使学生可以身临其境，仿佛置身于历史场景之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

3. 创新模式，深化培育效果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各行各业不断变革与创新，高中思想政治教师也应该抓住这一契机，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不断创新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新媒体时代下弊端愈发凸显，学生的主动性难以调动，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在此困境下，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应该充分运用新媒体时代的混合式教学、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8]。这些教学模式不仅是对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也是对他们应用新媒体技术能力的考验。因此，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要不断提升学习新媒体技术的能力，并将这些能力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灵活驾驭这些新的教学模式。

（二）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筑牢文化自信根基

以学生为本，简言之就是要以学生的发展、需求、兴趣、个性和权利为本。这就要求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要关注学生的主体性需求，要把学生当作“发展中的人”进行教育。教师只有真正树立起“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才能真正关注学生的兴趣和需要，针对不同阶段学生的个性特点展开教学，将抽象的文化理论转换成学生喜闻乐见的文化内容，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认知、激发学生的文化情感，增强文化自信，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任。

1. 走近学生，了解学生需求

马克思将人的需要划分为多种类型，认为人的需要是多层次、不断发展的。高中学生作为独立发展的个体，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认知的需要以及追求知识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他们渴望自己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些多元的需要，既是高中生成长的内驱力，也是教育工作者工作的出发

点。因此，高中思想政治教师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传授的层面，而是应该以新媒体为桥梁，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转化为学生乐于接受的形态，主动走近学生，全面了解学生的需要，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并不断满足学生的多元化需求。

2. 与学生沟通，创新互动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教师要对青少年进行引导，必然少不了和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在新媒体背景下，互动式教学是很有效的教学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师生之间以及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例如，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营造出特定的场景，教师作为学习的引导者，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以小组为单位扮演特定的政治人物、企业管理者、进城务工人员等，开展对话交流，结束后教师总结，并对表现优异的小组进行表扬。通过这种教学模式，教师可以站在学生的角度设计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构建新型的教学模式，加强师生以及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3. 多元评价，促进学生成长

在学生成长环境日趋多元的当下，教育评价和教学活动具有同等重要性，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要注重“教—学—评”的一致性[9]。传统的评价模式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方式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新媒体背景下，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应该积极构建包含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成果性评价的多元评价体系。例如，教师可以应运用电子成长档案袋，动态记录学生成长过程，进而对学生进行实时评价和客观评价，助力学生明确发展方向。

（三）提高师生的媒介素养水平，夯实文化自信根基

在注重升学率和优秀率的时代，“唯分数”观念在高中教师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高中思想政治教师也不例外，在扭转这一观念，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树立文化自信的进程中，提升教师的媒介素养是关键一环。学校应该定期组织专门的媒介素养培训课程，包括对新媒体信息的筛选和分析、内容创作等方面的内容。通过培训课程，高中思想政治教师不再依赖于模板，可以在已有媒体素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充分运用数字化工具和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广泛认同中华文化，树立文化自信。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是提高学生媒介素养的关键引领者和重要推动者，他们应该正确引导学生形成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的意识，并凭借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教育经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媒介的功能和作用，使其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良好的媒介使用习惯和道德规范。学生拥有了较高的媒介素养后，可以运用多媒体资源，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四、结语

新时代的高中生是一群积极向上、活力四射的青少年，肩负着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时代使命。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培育高中生文化自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以即时性、互动性和共享性等特点为高中生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内涵、特性以及价值，帮助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文化自信。因此，在新媒体时代，学校应借助信息传播优势和新媒体资源优势，不断增强对高中生文化自信的培育，助力莘莘学子成长为坚定的文化传承者与创新者。

参考文献

[1] 张晶，漫柏园．高中思政课培育学生文化自信路径探究 [J]. 科学咨询，2025(06):210-214.

[2] 刘瑛．新媒体在高职学生文化自信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J]. 新闻研究导刊，2019,10(11)30-31.

[3] 张可．微文化视域下加强高职学生的文化自信教育 [J]. 文教资料，2021(19):34-35,24.

[4] 王申萍．新媒体下青海大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研究 [D]. 西宁：青海大学，2019.

[5] 武善领，张媛．新兴媒体对高中学生道德行为的影响及策略 [J]. 教书育人，2012(08):27.

[6] 吕杰．新媒体环境下高中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措施 [J]. 宁夏教育，2024(09):21-22.

[7] 仇琦，蒋诚钢．新媒体助推高校思政课程融合创新路径研究 [J]. 大众文艺，2023(18):126-128.

[8] 杨乔乔．新媒体时代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策略探究 [J]. 新闻研究导刊，2025,16(06):113-117.

[9] 陈宇婷．小学语文大单元情境下的多元评价实践 [J]. 天津教育，2025(10):96-98.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高校运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挑战及路径探析

周　杰　姬咏华

摘要：新媒体依托传播渠道多元、信息呈现立体、迭代纵深发展的技术特质，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信息接收便捷化、内容呈现生动化、利于赋能教育实践等优势。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也会出现诸多现实挑战，例如信息碎片化导致学生知识体系构建断裂、内容泛娱乐化造成学生思政理解偏差、媒介传播迅捷化加大舆论思潮管控难度。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可从整合新媒体思政育人平台体系、健全内容审核监管机制、培育师生全媒体媒介素养三个维度精准破局，推动新媒体从思政教育的“变量”转化为育人提质增效的“增量”，全面提升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与感染力。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育人；媒介素养；育人路径

青年大学生是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其思想认知、价值观念与道德素养直接关系国家未来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高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承担着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核心使命，是引领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的关键场域。步入网络信息时代，新媒体技术迭代升级重塑了信息传播格局与青年成长环境，成为影响大学生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与价值塑造的重要媒介。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提高网络育人能力，扎实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 [1]。新时代高校亟须主动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推动思政教育传统优势与新媒体技术深度融合，创新育人模式、活化育人话语、拓宽育人场域，破解网络思政育人现实难题，让新媒体赋能高校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一、高校运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 [2]。新媒体具有渠道广泛化、信息立体化、发展深入化等特点，能够全方位渗透进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相较于传统媒体工具更有利于赋能教育，有助于为国家发展更好更加全面的思政育人事业，培育更多更坚定的时代新人。

（一）渠道多元泛在，拓宽思政信息传播边界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依托师生之间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受时空限制较大，信息传播的覆盖面与时效性难以满足当代大学生的学习需求。新媒体具有即时性、互动性、超时空性、海量性、虚拟性的特点，使信息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同时能够提供更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渠道 [3]。新媒体平台种类丰富，涵盖社交应用、短视频平台、校园微信公众号等多元渠道，学生可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获取时政热点解读、红色文化故事、思政理论科普等内容，高校也能通过多平台联动，以差异化内容满足不同学生的认知偏好，实现思政信息的全域覆盖与高效传递，提升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二）信息呈现立体鲜活，降低理论认知接受门槛

单一的文字教育难以满足高校学生的认知需求，直观化的表达方式更加符合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新媒体包括更加直观立体的音频、视频、虚拟现实等多元融合形式，多模态融合打破了理论认知壁垒，使知识更加直观，帮助学生快速理解核心概念，有效提升知识可接受性。新媒体能够将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转化成直观、生动的传播内容，通过更加具象化的表达使学生实现沉浸式体验和情感共鸣，例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兴技术创造出了沉浸式学习场景，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在过程中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流价值观认同感，有效增强了教育吸引力，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更好地坚守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赋能精准育人，推动思政教育纵深发展

新媒体的迭代升级推动高校思政教育向纵深发展，从表层形式创新转向深层价值塑造有利于赋能教育。高校思政教育从单纯的“信息传递”转向更深层次的“价值塑造”，实现了多个环节层层递进。通过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持续性的教育体系，思政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堂内的信息传递，而是延伸至学生生活全场景，实现与学生日常的深度融合，形成“时时可学、处处可育”的浸润式育人环境。同时，依托新媒体平台收集学生思想动态数据，高校可精准把握学生需求，优化教育供给，推动思政教育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为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

二、高校新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挑战

新媒体的便捷高效能够更好地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但同时在内容、形式、传播上的缺陷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挑战。

（一）信息碎片化引发大学生知识体系碎片化

在新媒体时代，教师固然能借助渠道多元、信息来源丰富的平台开展理论传播，为学生提供丰富资源，但新媒体本身的碎片化特性，也让信息呈现出海量化、零散化的状态，思政内容很容易被割裂。思想政治教育本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系统性知识，而碎片化信息往往会把完整的理论体系拆解成零散的观点与片段。大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获取这类零散知识，很难构建起完整的思政知识体系，也难以深入理解理论内涵，直接影响了思政教育成果的连续性与完整性。长期接触随机性、无序性的碎片化信息，还会削弱学生的深度思考与内化认知能力；频繁的内容跳转，也让学生无法建立知识间的逻辑关联，导致学习过程缺乏连贯性与系统性。

（二）内容泛娱乐化引发大学生思政理解偏差

新媒体时代，部分高校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内容泛娱乐化趋势日益加剧，产生多种思政内涵理解偏差。在教育创新中通过新媒体的负向机制削弱了大学生对思政理论的深度认知，造成理论浅薄化，语言与形式喧宾夺主，消解了思政理论严肃主体性，造成学生注意力偏移，价值引导失效。一方面，部分高校为了追求传播热度与教育时效，容易在短视频等平台向学生传递过度娱乐化的思政内容。这些内容不仅会让预期的教育效果大打折扣，更会削弱思政教育本身的实效性与权威性。另一方面，教师在通过新媒体平台创新教学内容的过程当中为吸引学生兴趣，可能会在平衡思政课严肃深刻的内涵与突出教育趣味性方面失之偏颇，盲目使用新媒体上的部分网络流行语等教育方式，易导致教育低效，使大学生丧失了对复杂思政理论深入思考的能力与耐心，仅习惯于接收直观、简单的娱乐化信息，真正提供的教育内容也就逐渐被学生所抵触。

（三）媒介传播迅捷化引发大学生舆论思潮难控

在算法驱动的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迅速，能够突破物理时空限制。信息传播强度的增大体现在网络舆情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上。相较于传统舆论传播语境，新媒体平台的匿名性、虚拟性等特性，使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更容易表达真实想法和情感态度，加剧了网络舆情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从而容易导致不良舆论思潮瞬间扩散。

大学生作为互联网原生群体，是网络空间最活跃的参与主体，他们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速度快，但同时也存在社会阅历不足、理性思辨能力欠缺、情绪易受煽动、价值判断易受外界干扰的群体特征。信息在网络中往往经过多次分享、评论、转发，因此可能出现断章取义、误传、篡改等情况，失去了信息本来的面貌，不仅影响大学生对事实的正确理解，也可能对其造成误导[4]。在信息高速流动、内容碎片化呈现、观点情绪化表达的网络环境中，海量多元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思潮、价值观念、舆论观点无差别地涌向大学生群体，主流价值引导的节奏往往难以跟上舆情裂变的速度，极易导致部分学生在海量信息中丧失判断力，被非主流思潮、极端言论、片面观点影响，进而引发思潮导向难引导、群体情绪难疏导、负面舆情难管控的现实难题，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舆论治理的重要挑战。

三、高校新媒体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路径

面对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政教育的多重挑战，高校必须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既要遵循新媒体传播规律，也要尊重思政教育的育人规律，从平台体系整合、监管机制完善、主体素养提升三个维度协同推进，切实增强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与吸引力。

（一）整合平台矩阵，构建一体化精准育人传播体系

新媒体平台愈加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传播载体与阵地依托，破解当前平台信息分散、功能割裂、联动系统不足的问题，核心在于打破各类新媒体渠道的信息壁垒，打造层级清晰、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一体化育人平台体系，实现思政教育资源的集约化、精准化传播。

其一，针对新媒体信息供给分散问题，高校应贴合青年大学生认知特点，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梳理整合并统筹于校内新媒体平台矩阵建设。高校需整合校园官方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校园社群、思政学习平台等多元传播渠道，打破平台独立运营、资源分散的发展壁垒，构建校级统筹、院系联动、班级延伸的层级化新媒体思政平台矩阵。高校必须加大整合力度，统筹规划运营现有账号，进行有重点的扶持，切实形成网络思政矩阵，牢牢占领网络主阵地[5]。结合不同平台传播特性划分运营职能，例如短视频视听

平台聚焦轻量化思政内容创作，贴合青年学生话语习惯；互动社交平台聚焦日常思想引导与师生交流互动，实现各类平台优势互补、同向发力，凝聚线上思政育人传播合力。同时可借力外部优质新媒体资源如对接人民网等主流权威新媒体平台拓展育人阵地，引入红色文化、时代楷模等优质思政内容，提升本校思政平台的权威性与专业性。

其二，坚持推动线上线下思政平台深度融合，将新媒体平台作为线下思政教育的延伸与拓展，将线下思政课堂、主题教育活动等实体育人内容进行数字化转化，制作成微课、图文推文等线上思政资源，依托新媒体平台广泛推送传播。同时依托线上平台发起思政话题讨论、红色文化打卡等互动活动，引导学生从线上思想学习延伸至线下实践践行，打通线上思想浸润与线下行为培育的衔接通道，实现新媒体思政平台从单纯信息传播阵地向全方位实践育人阵地转变。

（二）健全监管机制，筑牢规范化内容安全育人防线

内容是新媒体思政教育的核心灵魂，筑牢内容安全防线、严把思政育人导向，是保障新媒体思政教育正确政治方向的关键。高校必须构建全流程、严标准的内容审核监管机制，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确保思政内容始终传递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其一，健全分级分类内容审核制度与应急处置机制。一方面，落实分级分类内容审核管理。针对政策解读、理论宣讲等不同类型内容，推行分层逐级审核流程，重点把关内容的政治导向、价值取向、事实准确性，杜绝错误思潮、虚假信息通过新媒体平台传播；对涉及敏感话题、重大舆情、热点事件的内容，实行从严审核、一事一议，从源头杜绝思政内容风险隐患，筑牢思政内容传播第一道防线。另一方面，完善网络舆情监测与应急处置体系。依托专业舆情监测工具，实时监测校园新媒体账号评论区、学生常用网络社群的思想动态与舆论倾向，针对负面舆情、突发网络事件，快速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澄清事实真相、做好正面引导，避免负面舆论发酵扩散，持续净化校园新媒体思政传播环境。

其二，强化内容生产的规范管理与责任落实。明确学校宣传部门、思政工作部门、新媒体运营团队的监管职责，将新媒体思政内容监管纳入学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思政工作考核体系。制定高校新媒体运营管理办法、思政内容生产规范等制度文件，规范运营人员的内容创作、发布、互动行为；定期开展运营团队合规培训，强化政治意识、底线意识、责任意识，确保每一条新媒体思政内容都符合思政育人要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三）培育双主体素养，打造高水平网络育人队伍

师生是新媒体思政教育的双主体，教师是育人主导者，学生是受教主体与网络参与者，二者的新媒体信息素养直接决定思政教育的育人成效。

其一，全面提升思政教师新媒体育人能力。针对部分思政教师新媒体运用能力不足和网络舆论引导薄弱等问题，构建系统化、常态化的教师培训体系。将新媒体思政教学方法、内容创作、舆情引导、信息技术应用等纳入教师岗前培训内容，切实增强教师运用新媒体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能力，同时大力倡导教师主动挖掘新媒体在该领域的独特应用模式与创新方法，大胆尝试新兴技术工具，探索新颖的教学策略，不断更新教学手段，以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发展的需求[6]。鼓励思政教师主动走进网络空间，探索运用青年话语体系、可视化表达形式，将抽象思政理论转化为鲜活网络内容，打造接地气、有温度、入人心的网络思政课堂。

其二，强化大学生网络信息素养教育。将网络信息素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道德规范纳入高校思政教育、通识教育、新生入学教育体系，通过专题课程、主题讲座、新媒体科普等形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观、价值观、法治观。重点培养学生的信息甄别能力、理性思辨能力，让学生学会辨别网络虚假信息、抵制错误思潮，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侵蚀；引导学生规范网络言行，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与公序良俗，争做中国好网民；同时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校园新媒体思政内容创作、传播、运营，变“网络受众”为“育人主体”，在参与中提升网络素养，自觉传播正能量，成为新媒体思政教育的参与者、推动者、践行者。

此外，可构建师生协同的新媒体思政互动机制。搭建师生网络沟通桥梁，通过师生协同发力，让新媒体真正成为思政教育的“助力器”而非“绊脚石”，全面激活新媒体思政育人的内生动力。

四、结语

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是新时代网络育人、智慧育人的必然趋势，也是高校思政教育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核心路径。新媒体既为思政教育突破时空局限、创新育人模式、实现精准赋能提供了全新机遇，也因网络生态复杂、传播特性特殊面临知识碎片化、内容娱乐化、思潮多元化的育人挑战。高校需主动顺应媒体融合发展大势，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整合育人平台、健全监管机制、培育媒介素养，全方位破解新媒体思政育人困境，持续优化网络育人生态，让新媒体技术优势充分转化为思政育人实效，助力新时代青年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品德修为，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与育人支撑。

（下转 225 页）

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瓶颈及对策研究

李明运

摘要：新职业教育发展背景下，推进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是深化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举措。然而，当前我国中高职思政课在课程体系构建、管理机制运行、师资协同教研、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断裂，难以支撑学生从“技能型”向“高端技能型”人才的素养跃迁，制约了职业教育德技并修育人效能的整体释放。本文立足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定位，系统剖析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瓶颈与深层成因，构建具有职教人才成长规律的一体化衔接路径体系，为新时代高职思政课内涵式、系统化、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中高职衔接；思政课一体化；育人瓶颈；提质对策；职业教育

一、引言

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育人维度看，思政课是职业院校落实“德技并修”培养目标的核心载体，其一体化衔接直接关系到高技能人才的政治认同、职业伦理与工匠精神的塑造。从改革维度看，当前中高职思政课仍存在“普教化”倾向，亟须通过衔接机制创新彰显职业教育特色。从政策维度看，国家层面已将中高职贯通培养纳入职业教育法修订重点，但地方实施方案与配套机制尚未完善，研究如何将顶层设计转化为基层实践具有紧迫性。因此，破解中高职思政课衔接难题既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更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人才战略的重要支撑。

二、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的现实瓶颈

（一）课程体系断层，育人梯度缺失

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的首要瓶颈在于课程体系的结构性断层与递进性缺失。从课程设计来看，中高职思政课目标定位缺乏梯度衔接，中职阶段侧重基础性知识传授，高职阶段则未能基于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和职业能力需求，系统性深化理论深度或强化职业素养培育，导致课程内容重复率高、层次模糊。教材内容衔接断裂问题尤为突出，中职教材偏向普适性价值观教育，高职教材未能充分融入职业教育特色，未能构建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知识模块，且缺乏体现“职教类型”特征的案例和实践资源[1]。此外，课程设置未遵循技能形成规律，中高职思政教学内容在理论深度、实践广度和价值引领上未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连贯链条，

（上接 224 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 [J]. 求是 ,2023(18):4-17.

[2] 习近平 .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12-09(01).

[3] 慕健 .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与对策探究 [J].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 ,2025(11):25-27.

[4] 王映兰 . 融媒体时代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优化路径探析 [J]. 才智 ,2024(25):17-20.

[5] 常伟鹏 . 新媒体时代下高校网络思政的痛难点分析及对策研究 [J]. 传播与版权 ,2024(10):105-107.

[6] 于奕菲 . 新媒体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J]. 中关村 ,2025(03):243-24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吉林省高等教育学会 2025 年度大学生专项课题“新媒体时代高校国家安全意识培育研究”（JGJX25D0422）。

（作者：周杰，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姬咏华，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导致学生难以实现从“技能型”向“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能力跃迁。这种课程体系的“平面化”特征，削弱了思政课对学生职业认同感和综合素养的培育效能。

（二）管理机制碎片化，统筹协调效能不足

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协同治理的有效框架。从纵向管理看，中高职分属不同学段，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管理层及教学单位之间缺乏统一的政策指导和制度约束，导致课程建设、师资调配等环节存在“各管一段”的割裂现象。横向协同方面，校企合作、校际联合等“大思政课”协同机制尚未建立，实践基地共建、教学资源共享等环节缺乏常态化合作平台，难以实现教育资源整合。政策执行层面，尽管国家层面提出一体化建设方向，但地方配套实施方案缺失，具体操作中仍依赖院校自发探索，缺乏标准化流程和激励机制。此外，职业院校内部思政课管理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如学工、教务）权责边界不清，跨部门协作效率低下，进一步加剧了管理资源的分散化与低效化。

（三）教师教研割裂，跨学段协同体系缺位

教师队伍的分工壁垒与教研协同不足是中高职思政课衔接的关键障碍。首先，中高职思政课教师分属不同学段，缺乏常态化的集体备课、联合教研等互动机制，教学内容设计呈现“闭门造车”倾向，导致案例重复、逻辑断层等问题频发。其次，教师专业发展路径单一，中职教师普遍存在学历层次偏低、科研能力薄弱等问题，高职教师则对中职学情和教学重点缺乏了解，双方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上难以形成共识[2]。再次，教研支撑体系薄弱，职业院校思政课教科研机构建设滞后，跨学段课题研究、教学改革项目缺乏统筹规划，导致教师难以依托科研反哺教学衔接实践。此外，教师培训机制存在僵化问题，中高职教师研修内容趋同，未能针对一体化衔接需求设计分层分类的培训课程，这进一步固化了教师的学段本位思维。

（四）评价标准模糊，质量监测闭环未形成

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的质量保障因评价体系模糊而难以落地。其一，评价标准缺乏连贯性，中高职思政课在知识掌握、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等维度的考核指标未形成梯度化设计，中职阶段重知识记忆、高职阶段轻实践反思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评价结果无法真实反映学生的阶段性成长。其二，评价主体单一化，教育行政部门、学校、企业及社会力量未形成协同评价机制，学生思政素养的多元表现（如职业伦理、社会责任感）难以被纳入考核体系。其三，过程性评价缺位，现有评价多依赖终结性考试，忽视课堂表现、实践参与等动态监测，导致教学反馈滞后，无法为课程衔接改进提供数据支撑[3]。其四，督导机制不健全，中高职思政课建设标准尚未完全统一，尤其是中职思政课缺乏独立的评估框架，督导过程中重形式合规、轻实质衔接的问题突出。

三、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的优化对策

（一）构建螺旋式课程体系，强化职教特色分层递进

破解中高职思政课衔接难题需以课程体系重构为核心抓手，遵循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与学生认知发展规律，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螺旋式课程框架。首先，需以核心素养为轴心，系统设计中高职思政课的进阶式教学目标体系。中职阶段立足职业启蒙，聚焦政治认同、职业伦理等基础性素养培育，通过情境化教学强化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性认知；高职阶段则紧扣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围绕创新思维、工匠精神等高阶素养深化理论阐释与实践转化，形成从“价值感知”到“价值内化”的梯度化目标链。其次，教学内容设计需以职业能力形成为导向，依托“大思政课”理念整合职教资源。通过提炼产业转型升级中的思政元素，开发具有职教特色的模块化教学案例库，例如将智能制造、绿色经济等产业前沿议题转化为教学资源，使课程内容既体现国家战略导向，又贴合职业岗位需求，实现知识传授与职业素养培育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需强化教材体系的衔接性与创新性，构建“基础性教材 + 职业拓展读本 + 数字化资源包”的多维载体，中职教材侧重案例引导与行为规范，高职教材突出理论深度与思辨空间，同时嵌入虚拟仿真、企业实景等数字化资源，支撑教学场景从“课堂认知”向“职场浸润”跃迁。在课程实施层面，应推行“理实一体、虚实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中职阶段采用项目化学习强化学生实践体验，高职阶段引入议题式研讨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并依托校企共建的实践基地开展“车间思政”“岗位思政”等特色活动，使思政教育贯穿技能训练全流程。此外，需建立“核心课程群 + 特色选修课 + 隐性课程”的立体化课程生态，核心课程群夯实共同价值根基，隐性课程则通过校园文化、企业导师制度渗透职业精神，最终形成“素养进阶、职教赋能、多元共生”的课程创新范式。

（二）健全一体化管理机制，构建多方协同治理格局

推进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需以系统性治理思维重构管理框架，通过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制度设计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在政策衔接层面，应建立“省级统筹、区域联动、校际协同”的三级管理架构，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制定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明确中高职课程目标衔接标准、师资互聘机制、资源共享目录等核心要素。重点强化政策配套的“最后一公里”落实机制，例如建立中高职思政课建设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组织跨学段政策解读、需求对接及问题反馈，确保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动态适配。在资源调配层面，需构建“政府主导、校企共育、校际共享”的资源整合模式，依

托区域性职业教育集团或联盟搭建思政教育资源云平台，整合中高职院校的实践基地、企业德育案例、数字化教学资源等，形成“统筹规划—按需分配—动态更新”的资源流通机制。管理机制创新还需注重多元主体协同效能，一方面完善“政—校—行—企”四方参与的督导评价体系，将中高职思政课衔接成效纳入职业教育质量年报和院校考核指标；另一方面建立“中职—高职—本科”纵向贯通的教师发展通道，通过跨学段师资互聘、联合教研、项目共研等机制打破教师协同壁垒。通过制度规约与弹性激励相结合、资源集约与精准供给相协同，方能构建起全要素贯通、全链条可控的一体化管理生态[4]。

（三）搭建跨学段教研平台，构筑师资协同育人体系

破解中高职思政课教师协同壁垒需以教研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跨学段教研共同体。首先，应建立常态化集体备课与联合教研机制，依托区域性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联盟，搭建“省级统筹—校际轮值—学科主导”的三级教研架构，定期组织跨学段教学标准研讨、课程模块衔接论证及典型案例互鉴，重点围绕职业素养培育、产业思政资源转化等核心议题开展协同攻关，推动教学逻辑从“分段割裂”转向“螺旋上升”。其次，需构建数字化教研资源共享平台，整合中高职院校的优质教学案例、企业实践场景及虚拟仿真资源，形成“基础模块共享+特色模块定制”的开放式资源库，通过线上集体备课、教学示范直播、跨校课程互选等模式，实现教学资源从“封闭自用”到“动态流通”的转变。在教师协同培养层面，应推行“中职—高职—企业”三方联动的师资互聘机制，建立跨学段教师发展档案与学分互认制度，系统设计分层分类的培训课程体系：中职教师侧重理论素养提升与高职学情认知，高职教师强化职业教育理念与产业实践对接能力，企业导师则聚焦职业精神提炼与课程思政转化。此外，可创新“项目共研+成果反哺”的教研生态，围绕中高职衔接难点设立专项教改课题，组建跨学段、跨院校、跨领域的复合型研究团队，通过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协作开发校本教材、共同撰写教学案例等途径，促进教研成果向教学实践的渗透转化。为保障教研协同长效运行，需完善激励机制与质量督导制度，将跨学段教研参与度纳入教师绩效考核，并建立“教研需求清单—问题反馈闭环—成效评估矩阵”的全流程管理模型，最终形成“平台赋能、资源融通、研教共生”的师资协同新格局。

（四）完善进阶式评价体系，构建全链条质量闭环

要解决中高职思政课衔接的质量监测难题，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循序渐进、全程跟踪、持续改进的评价体系[5]。具体来说，要针对职业教育特点设计分阶段评价标准，中职侧重考核学生的政治认同和职业规范等基础素养是否达标，高职则重点评价学生创新思维和工匠精神等进阶能力的提升情况，从而打造从知识掌握到能力发展再到价值观塑造的完整评价链条。在评价实施中要整合多方力量，教育部门负责统筹指导，行业企业参与职业素养评估，社区和家长反馈学生日常表现，实现从课堂学习到社会实践的全方位评价。同时要运用智能化技术搭建动态监测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实时追踪学生成长轨迹，运用虚拟仿真技术测评职业情境中的价值判断能力，借助数字档案实现学习成果的跨阶段衔接。评价方式上要注重过程记录，中职可以采用项目化考核记录行为养成，高职则可以采用理论答辩与实践成果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并建立学分互认机制保证评价结果在升学衔接中的有效性。此外，还需建立评价结果的应用机制，将诊断发现的问题转化为课程优化方案和教学改进措施，通过学校、企业、教师三方协作推动育人质量提升。评价标准还需保持动态更新，定期组织专家结合产业发展需求调整素养要求，使评价体系始终与职业教育改革同步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打破中高职思政课衔接的壁垒，实现思政教育在中高职阶段的有机融合与协同发展。然而，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研究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未来，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衔接需持续深化，唯有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方能实现思政课从“分段衔接”到“全程育人”的质变，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参考文献

[1] 嵇苏媛 . 新质生产力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逻辑与路径研究——以中高职“3+2”分段制为例 [J].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学报 ,2025,24(01):49-53.

[2] 苏凯 . 中高职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现实归因、问题指向与提升路径 [J]. 广西教育 ,2024(36):37-41,56.

[3] 陈金海 , 秦臻 . 广西体育类中高职思政课教学内容一体化建设的探讨 [J]. 武当 ,2024(12):58-60.

[4] 陆小娟 .“大思政课”视域下五年制高职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J]. 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2024,38(04):42-46.

[5] 师洪文 , 李春霞 .“组团式”教育帮扶赋能中高职思政课教学一体化建设的价值、困境及路径探析 [J].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37(05):16-20.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 年广西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立项（一般课题 A 类）“中高职思政课教学衔接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路径探究”（2023LSZ084）。

（作者系梧州职业学院讲师）

高校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刘　超　马梦婷

摘要：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是高校培育高素质创新人才、服务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当前，两类教育融合育人仍存在层次较浅的问题，在育人理念、课程体系、育人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本文立足国家战略与高校育人实际，剖析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时代价值与现实困境，从理念、课程、机制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实践路径，通过更新育人理念、优化课程体系、健全育人机制，推动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实现内生耦合、双向赋能。研究旨在实现价值引领与能力培育的有机统一，破解双创育人重技能、轻素养的片面化难题，提升高校融合育人实效，为新时代高校培养德才兼备、勇于创新、担当有为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双向融合；育人机制；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部署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确立了科技赋能、人才支撑与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总体格局，为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建设与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划定了根本方向。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贯通人才培养全流程、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筑牢高校思政育人主阵地。在此政策背景下，推动思政教育深度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打破两类教育割裂发展的育人壁垒，构建“思政铸魂、双创赋能”的协同育人新模式，既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适配国家创新人才需求、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举措。

一、高校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时代必要性

（一）思政铸魂，引领双创育人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构成了人才培养体系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维度。思想政治教育凭借其独特的价值育人功能，为创新创业教育注入精神内核与方向引领。创新创业教育则立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通过系统化的创新实践与创业运营能力训练，搭建了价值转化的实践载体。二者的协同育人机制，实现了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深度融合，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重要路径。其一，通过法治教育、诚信教育、商业伦理与职业规范教育的一体化建构，将合规意识、诚信准则与职业底线转化为创新创业实践的内在约束机制，引导学生在项目全生命周期中自觉践行法治精神与职业伦理，筑牢创新创业的制度底线与道德根基。其二，依托家国情怀、工匠精神、社会责任等核心思政元素的系统性涵育，构建学生的创新创业价值认知体系，推动个人创业理想与产业升级需求、社会发展目标、国家战略意志的同频共振，实现创新创业动机的正向引导与格局的全面拓展，真正规避单纯逐利、目光短浅的功利化创业思维。

（二）双创载道，活化思政育人形态

创新创业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落地扎根、完成知行合一转化的核心实践载体。依托项目研发、学科竞赛、团队协作等多元实践场景，搭建起具象化思政育人实践平台，将价值引领有机融入学生专业研习与创新实训各环节。一方面，学生在双创项目深耕打磨、难题突破攻坚、团队协同磨合、基层实地探索的真实历练中，直面实践任务与现实挑战，自觉涵养诚信守矩、担当奉献等优良品格，推动思政层面的理念认知转化为可实操、可积累、可衡量的实践素养与行为范式。

另一方面，创新创业教育坚持以学生自主探究与亲身实践为核心导向，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实践内生动力，能够有效激发学生主体意识，促使其从被动吸纳理论知识转向主动践行正向价值观念。各类一线实践场景打破了传统思政课堂说教式教学的局限，让理想信念教育不再悬浮于理论层面。该育人模式促成价值塑造与实践训练的有机融合，切实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精准度、贴合度，筑牢高校立德树人工作根基，为培育兼具创新本领与高尚品德的青年人才提供坚实支撑。

（三）双向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

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并非两类教育的简单叠加，而是新时代高校适配人才发展需求、夯实铸魂育人根基的必然选择。思政教育立足于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强调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以及组织各类学术讲座和实践活动，鼓励学生不断创新[1]。二者育人逻辑相通、育人功能互补，能够形成互促共进、双向赋能的协同育人体系。创新创业教育能够为思政教育提供稳固的实践载体，将抽象的思想理念转化为学生可参与、可落实的实践行动，推动思政教育从理论认知走向实践内化，提升价值培育的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则为创新创业教育筑牢价值根基、明晰发展导向，弥补双创教育偏重实操技能训练的片面化不足，端正人才培养价值取向，达成专业能力培育与思想品德涵养同步推进。二者融合打破了高校思想德育与实践能力相互脱节的育人隔阂，构建起德能并重、知行合一的系统化育人模式，助力高校持续培育兼具创新实践能力、综合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意识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二、高校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育人理念亟待更新

正确育人价值取向，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使命、实现价值塑造与能力培育有机统一的核心基础。现阶段，国内部分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仍受功利化、单一化的工具主义价值取向束缚，简单将其局限于创业实操技能训练、商业计划书编制及双创赛事项目孵化等表层实践环节，过度以赛事获奖数量、学生创业注册企业数量等短期量化指标作为核心评价导向，片面追求显性成果，忽视其作为立德树人重要载体的本体育人价值。价值理念的错位，本质上反映出一种重术轻道、重智轻德的片面育人取向，即把创新创业教育窄化为提升学生市场竞争力、创造短期经济效益的工具，而淡忘了其培育有社会责任、家国情怀、道德操守、创新担当意识的时代新人的根本使命。若不能从顶层育人理念上正本清源、纠偏正向，创新创业教育在实际推进中便容易偏离立德树人的价值主轴，难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深度融合，其铸魂育人功能的长效、深层实现也将面临显著制约，更无法为国家输送德才兼备、胸怀大局的创新型青年人才。

（二）课程体系尚需优化

课程体系是思政元素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载体，目前高校双创课程的思政融合存在一定结构性困境。在顶层设计层面，部分高校缺乏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协同推进的一体化课程规划，双创课程建设整体偏向实操技能与创新能力训练，相对缺乏适配双创场景的层级化思政育人设计，进而使课程育人目标呈现能力与价值相分离的碎片化特征。在课程内容建构上，双创课程以商业模式等工具性知识为主体，思政内容多以专题补充方式浅层植入，思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极易流于形式，内容丰富但与实际联系不足，显得空泛和说教，难以深入学生内心[2]。在教学实施层面，双创课程思政设计存在模块割裂问题，思政育人资源多集中于理论课程板块，实践类双创课程普遍缺乏配套思政教学设计，课程体系内部理论与实践育人无法贯通，对思政育人的全域覆盖形成一定制约。在课程评价层面，现有双创课程考核体系仍以课程技能掌握、实践成果等指标为核心，创业伦理、职业素养等德育要素相对未纳入课程考核体系，课程评价的育人导向缺位，致使双创课程思政融合流于形式。

（三）育人机制有待健全

育人机制是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保障立德树人育人成效常态化落地的制度根基。两类教育的融合育人难以向纵深推进，其根源在于育人制度体系存在一定结构性缺陷。其一，育人管理体系呈现条块分割现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分属不同管理架构，多以双轨并行模式运行。各育人主体运行相对独立，常态化、制度化的联动协作不足，难以形成稳定且持久的育人合力。其二，育人制度支撑相对薄弱，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融合尚未完全纳入人才培养制度化建设范畴，统一的实施标准与配套落实细则较为欠缺。育人融合的实施效果多依赖于教师个体的教学认知与自主探索，制度约束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育人融合的规范性与稳定性。其三，育人闭环运行体系仍有待完善，现有育人模式侧重教学环节单向推进，针对两类教育融合育人的过程督导、成效反馈及动态调整机制建设较为迟缓，相关机制缺位，不利于及时补齐育人短板、推动育人模式优化革新，长久下来容易造成育人工作浮于表面、融合流于形式。

三、高校思政教育融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更新育人理念，确立融合导向

育人理念的革新进阶，是推动思政教育与创新创

业教育内生相融、深度联动的先决条件与思想基础。唯有转变固有育人思维，方能突破融合发展的思想壁垒，为两类教育协同发展筑牢理念根基。立足育人发展实际，首要之举是更新育人思维，树立能力培育与价值引领相融共生的一体化全新育人理念。在高校人才培养整体规划中，把思政育人内在逻辑融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核心目标，明确家国情怀、社会担当、创业操守等精神素养与创新实践能力同等重要的育人定位，达成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目标统一、同步推进。与此同时，以理念转变明确教育融合发展导向，推动双创授课教师完成育人思维转变。深刻明晰思政教育在端正创业发展方向、纠治功利化创业心态、坚守创新创业初心等方面的核心作用，依托日常双创教学深挖潜藏的思政育人元素，让思想价值引领从教学附加内容转变为育人核心内核，稳步构建双向互促、深度相融的协同育人新格局。

（二）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内在衔接

优化完善课程体系，是打通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壁垒、促进二者深度结合的关键路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既有利于向大学生传授创新创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又能引导大学生把创新创业的志向追求与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追求相结合，实现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于一体的教育目标[3]。高校应打破传统学科界限，把高等教育的思政内容诸如道德法治观念等，与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进行有机融合[4]。依托现有双创课程基础，从课程内容、整体架构等方面统筹调整升级。在课程内容上，结合双创课程不同教学板块的授课特点与实践场景，精准融入思政育人元素，将法治思维等价值内涵，贯穿于市场调研等实操教学全过程，让思想引领真正融入课程主体内容，实现知识讲授、实践实训与价值塑造同向同行。在课程结构统筹层面，均衡统筹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思政建设力度，补齐实践教学环节思政育人短板，围绕创业实训、学科竞赛、项目孵化等实践场景增设专属思政育人内容，打通理论育人与实践育人的衔接通道，筑牢两类教育融合发展的课程根基。

（三）健全育人机制，构建闭环体系

系统化、规范化的育人机制是维系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保障育人成效长效落地的制度保障。高校需构建全方位、闭环式的融合育人运行机制，夯实双创思政融合的制度根基。首先，搭建跨领域协同育人运行机制，打通不同育人部门、师资团队的工作衔接通道，建立专业课教师、思政教师、创业导师常态化联动教研、协同育人的工作模式，将高校优秀的思政教育工作者引入双创教育中，将他们的思政教育经验、对思政教育的深刻理解转化为双创工作的重要推动力[5]，能够有效整合育人资源、凝聚一体化育人合力。其次，健全育人制度化保障体系，细化融合教学的实施规范、育人标准与落地流程，将思政价值赋能纳入双创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教学体系，提升融合育人的标准化与规范性。最后，构建全流程动态育人闭环机制，建立覆盖教学实施、过程督导、成效研判、迭代优化的完整育人运行体系，动态优化育人方案与实施模式，持续迭代融合育人体系，推动双创思政育人从阶段性表层融合转向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的深度闭环育人状态。

四、结语与展望

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协同建设的新时代，推动思政教育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核心举措，也是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新时代高校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更新育人理念、优化一体化课程体系、健全闭环育人机制，推动思政价值引领与双创实践磨砺同频共振、双向赋能。通过两类教育深度融合，引导新时代青年学生厚植家国情怀、矢志科创报国，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创业征程中，实现个人抱负与民族复兴伟业的深层联结。

参考文献

[1] 吕君，李圣昕.高校思政教育、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经济金融支持[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46(S1):287-289.

[2] 何依伊.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路径研究[J].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21(10):106-107.

[3] 关春燕，何淑贞.协同理论视阈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2022(12):49-51.

[4] 檀西西.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路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46(S2):293-295.

[5] 姜虹伊.高校思政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与发展[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47(S1):271-27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年度河南中医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医药文化塑造大学生文化自信的作用机制研究”（HZYSZ2025-04）；2026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岐黄筑基、产教聚力、数字赋能：中医药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构建研究”（2026SJGLX389）；2026年度郑州市社会科学调研课题“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赋能大学生返乡创业生态优化研究”（ZSLX20260407）。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探析

李幼琳

摘要：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高职院校育人体系的两大支柱，二者在育人目标、教育方法上具有相似性，二者的深度融合能够取长补短，有效打破传统育人方式的局限，构建起更新的育人格局，有利于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文章以高职院校为背景，首先系统剖析了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与特征，然后分析了心理健康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用的意义，最后探析了心理健康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效融合的具体路径与策略，构建深层次的融合机制，充分发挥不同育人主题的独特优势，形成育人合力平台，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关键词：心理健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高职院校

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职业院校学生作为国家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储备力量，不仅要求具备相应的技术技能，更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健康的心理状态。高职院校学生正处于生理及心理趋于成熟但未完全成熟的状态，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容易受到多元的社会思潮和网络舆论等各方面的影响，出现人际关系、就业焦虑、价值迷茫、认知偏差等多方面的心理困惑。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学生的个人成长与发展，也关系到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更对社会长远发展有着潜在的影响。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效融合，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帮助学生更好成长成才。

一、当前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一）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组织、学生日常管理等维度均与初高中阶段存在明显不同，这对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知识基础较为薄弱、学习自主性不足的特征，加上多数学生是首次离家进入集体生活，环境与角色的多重转变易使得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新生在入学初期出现学习适应困难、人际关系调适不良、职业生涯规划模糊等适应性问题。上述问题若未得到及时干预，可能进一步导致学生出现学习兴趣衰减、人际交往困难，严重情况下甚至会引发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等深层心理问题。在大三时，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及岗位的高要求，部分高职院校学生产生就业焦虑，他们在求职时患得患失，既担心自己不符合用人单位的选聘标准，又害怕被其他求职人员抢先而错失宝贵机遇[1]。甚至有部分学生因为求职失败而逐渐丧失信心，陷入自我封闭、情绪低落的负面状态中，进而引发一系列心理矛盾。

（二）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

高职院校学生作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储备力量，除了需要具备过硬的技术和实践能力外，还须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及道德水平。如今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相关课程及活动，为学生普及和宣传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学生成长成才。然而部分高职院校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误区，课堂上更多偏向理论知识的讲解和灌输，以课堂讲授、专题讲座为主，学生忙于记笔记、听讲座，未能及时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导致难以将知识转化为实际心理调适能力[2]。此外，学校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除心理健康相关工作外，还要承担行政工作，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双肩挑”使得心理教师压力加重，无法更好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工作模式上，部分高职院校也较为单一，心理健康教育以学校为主，未能很好地开展家校联动，家长对心理健康相关知识不甚了解，认识存在偏差，这都会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效果。

二、心理健康教育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学生自我意识趋于完善但心理并未完全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逐渐形成。加之基础薄弱，认知水平有限，容易受到外界不良思潮的冲击，产生认知偏差与价值错位，影响正确思想观念的形成，造成心理问题的产生，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帮助高职院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侧重于从思想层面引导学生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政治观念、道德理念以及行为规范，而心理健康教育则侧重于从心理层面帮助学生培养积极情绪、完善个人人格、提升认知水平，二者在育人目标、育人方法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更有利于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提高育人质量。

心理健康教育注重个体差异，在教育过程中常运用心理咨询、团体辅导、心理危机干预等方法帮助学生梳理情绪、理清思路，掌握心理调适的技能与方法，从而走出心理困境。面对个体差异化大，喜欢追求自我、彰显自我的高职院校学生，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能够让思想政治教育从学生实际心理需求出发，有利于打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注重思想引领而忽略个体差异的局限，弱化学生的心理防御倾向，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层次，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温度与实际效果；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可以为心理健康教育明确正确的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善于观察学生的思想动态，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快速识别学生的心理问题，而学生的某些情绪及行为问题恰恰是因为缺乏正确的思想认识或内心空虚迷茫造成的，二者的融合有利于在识别并处理学生所遇到危机的同时筑牢其思想根基，帮助学生解决困惑和疗愈创伤的同时激发学生内核，使其明确权利与义务、使命与担当，从根源上减少因认知偏差、价值迷茫引发的各类心理问题，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说教到共情与倾听，从疗愈创伤到价值引领，工作方法的转变与育人效果的提升更能增强教育工作者的职业效能感。

三、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的应用途径探析

（一）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不仅能有效地解决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还能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顺利开展。我国教育工作的开展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忽视心理健康教育，更重视学生的成绩。因此，高职院校要提高育人效果，必须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在思想政治日常教育中纳入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构建系统化的工作机制等具体措施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再者，学校须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常规内容，并列为教学重点[3]。此外，高职院校可以运用校园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以及心理健康日等特殊日期，通过举办讲座、心理沙龙、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对心理健康的关注，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

（二）全面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全面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重要环节。对于高职阶段的学生而言，他们的自我意识正处于走向成熟的时期，更倾向于展现个体主体性、表达个人观点，但同时其价值观念与心理状态易受多元社会思潮冲击，进而诱发各类心理问题，造成行为偏差，影响正常的学习与校园生活。因此，依托学校心理系统，辅导员、班主任或朋辈心理咨询等，通过科学规范的心理测评、专业系统的专题讲座、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沉浸式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等把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对开展后续的学生管理与思想引导工作尤为重要。全面掌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后即可对学生进行分级分类管理，针对存在不同程度心理困扰的学生采用对应的干预方式。在干预过程中，除心理教师的专业帮助和疏导外，辅导员可在日常谈心谈话中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与情绪疏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跟进学生思想动态，在纾解情绪的同时纠正认知偏差；对需要干预的学生做好人文关怀与思想帮扶，切实提升育人工作的精准度与实际效果。

（三）优化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开展课程思政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方向高度契合，都是以学生为本，致力于提升学生素养，让学生在两者的教育中得到全面的发展，帮助学生在情感认知层面实现自我完善，树立正确的“三观”，进一步提升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的适应能力[4]。良好的心理素质为各学科教学特别是思政教育提供了基础性支持，拥有健康人格的学生更易接受并认同思政教育内容。反过来说，学生正向的思想价值观能够指引心理的健康发展，从而形成良好的心理素养[5]。可见，二者在育人的具体内容方面具有内在关联，可以同时协作开展育人工作，实现有机融合。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深入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完善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和方法路径，是提升心理育人和思政育人的有效途径。

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体验式教学、案例分析、心理剧排演等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教学内容上有效引入思政元素，例如，在心理教育教学过程中可以结合实时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关注时事；在讲授人际交往能力相关知识时引入“团结合作”的精神、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引导学生学会团结协作，和他人交往时要诚信、友善；在生涯规划及个人职业发展等教学内容中引入“大国工匠”、劳模榜样等内容，帮助学生树立良好职业道德，并将个人发展和国家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提升学生的认同感和价值感；在“爱情”这一专题中可引导学生将个人的情感升华为爱家人、爱同学、爱祖国等大爱，做心有大爱之人。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侧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道德理念以及行为规范进行教育，极少涉及学生情绪管理、压力及挫折应对、人际交往调适等具体心理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教育内容方面，有效地开展心理健康课程能形成互补，进一步完善育人内容体系。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育人水平

教师是学校各项工作开展的主体力量，开展课程思政与心理健康教育关键在于教师，因此，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很重要。高职院校应通过多样化的培训强化师资水平，帮助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能更好地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进行融合。高职院校可以通过邀请专家到校为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培训为教师提供成长平台，分享前沿的知识，拓宽教师教育教学思路，提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帮助教师掌握心理学相关知识，丰富与学生沟通的方式、方法和技巧。

虽然同是职业院校教师，但部分院校心理教师和思想政治教师分属不同的院系或部门，课程为单独的体系，平时沟通联系较少。因此，校内可以组织心理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进行集体备课或开展交流会，就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进行研讨，分享育人经验，打破两类教师之间的工作壁垒，推动双方知识能力互补。

此外，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合理分工，避免教师一人身兼数职，使其减少额外压力，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及育人工作中。同时，适当的奖励机制及政策有利于调动教师在教育教学各方面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升育人效果。

（五）多方联动，共建育人平台

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并非单纯依靠学校，只有通过多方联动，构建共同育人的体系才能真正保障育人效果落地。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重要场所，父母良好的认知、和谐的家庭环境及良好的教养方式有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高职院校可以通过线上方式，例如线上会议、家长群等为家长提供心理知识，普及心理健康相关知识，提高家长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此外，平时可利用电话或网络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使得家长能及时掌握学生在校时各方面的情况，教师也能了解学生在家时的思想和心理状态。

同时，高职院校可借助地方心理卫生机构、精神卫生中心的专业社会资源共同搭建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为存在严重心理问题需要进行转介的学生提供专业渠道，保障学生能够及时获得专业的医疗干预与支持，避免心理问题进一步恶化，守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此外，高职院校还可与社区、企业、事业单位等共同搭建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学生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行走的大思政课”等活动，帮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自己，重塑自我效能感，明确社会责任感。学校、家庭、社会多方位联动，发挥不同主体的育人优势，帮助学生塑造更健康的心理品质，完善人格。

四、结语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既能让思政工作更加贴合学生的心理需求，又能让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正确的思想引领，弥补了单一育人工作的不足，有效提升学校育人的质量和效果。高职院校应采取措施，多途径、多方式促进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形成更加完善的协同育人体系，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和思想价值引领，有效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和思想政治素养，为学生的成长成才保驾护航，为社会输送更多综合素质过硬的技能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赵心路 .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成因及应对策略研究 [J]. 时代青年 ,2025(22):111-113.

[2] 丁梅 . 高职院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提升路径研究 [J]. 大学 ,2025(34):8-11.

[3] 王郅 . 心理健康教育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分析 [J]. 现代交际 ,2019(05):150-151.

[4] 李艳玲 , 史文芬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J]. 黑河学刊 ,2018(05):144-145.

[5] 王笑笑 . 课程思政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教学中的探索实践 [J]. 青年与社会 ,2019(04):106.

（作者系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高职辅导员融入学生日常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刘慧慧　郑欣敏

摘要：高职学生的思想变化常隐含于课堂出勤、室友交往、网络表达、实训参与和实习适应等日常细节中，辅导员长期处于学生成长现场，具备角色在场、师生信任、多元信息和校内外衔接等融入基础。辅导员融入学生日常思政教育，需要依托生活化话语拉近距离，借助分层识别适配学生差异，将管理服务环节转化为价值引导入口，并以过程反馈提升育人质量，使思想引导、行为规范、心理支持和职业素养培育在学生日常成长中形成连续支撑，为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实践路径。

关键词：高职辅导员；日常思政教育；学生管理；实践路径；职业育人

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常面临一个难题：学生并不总是在课堂讨论中呈现真实状态，更多变化藏在迟到早退、室友相处、实训态度、网络情绪和求职选择里。辅导员若只负责通知传达、事务办理和秩序维护，日常工作便难以沉淀为育人资源，只有把学生身边的具体事件转化为价值辨析、规则理解、职业认同和行动修正的契机，日常思政教育才能摆脱活动化、表层化倾向，真正进入高职学生成长过程。

一、高职辅导员融入学生日常思政教育的价值

（一）拓展日常思政教育边界

高职学生的思想状态并不只在思政课堂和主题班会中呈现，班级秩序、室友关系、网络互动、社团参与、志愿服务、实训纪律和实习管理同样承载价值生成过程[1]。辅导员融入日常思政教育后，原本分散的管理场景、生活场景和实践场景能够转化为育人载体，使思政教育从固定课堂延伸到学生真实成长空间，在考勤规范中渗透规则意识，在室友共处中涵养公共责任，在网络表达中强化法治观念，在实训实习中融入纪律意识，进而拓展高职思政教育的覆盖范围和触达深度。

（二）提升学生成长识别效能

高职学生的成长困惑常以具体行为外显，迟到旷课可能关联学习目标模糊，课堂沉默可能反映专业认同不足，宿舍冲突可能折射人际边界不清，实习退缩可能隐含岗位适应能力不足。辅导员长期参与学生日常管理与成长指导，能够在谈心谈话、宿舍走访、课堂反馈、网络沟通和实习联络中捕捉学生状态变化，把零散行为转化为思想动态判断依据，及时辨析纪律问题、心理问题、能力问题和价值认知问题之间的差异，使个别引导摆脱经验化处理，逐步转向更具针对性的成长支持。

（三）贯通职业素养培育过程

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具有鲜明职业指向，学生从入学适应到专业学习、技能训练、岗位实习和就业选择，始终伴随职业身份的形成与调整[2]。辅导员将日常思政教育嵌入专业认知、技能竞赛、实训管理、实习跟踪和就业指导之中，能够把劳动精神、规则意识、责任担当、服务观念和工匠精神转化为学生可感知的职业要求，引导学生理解专业学习与岗位责任、个人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使思政教育不只停留在价值倡导层面，而是在职业准备全过程中持续塑造学生的职业态度并指引发展方向。

二、高职辅导员融入学生日常思政教育的内在支撑

（一）角色在场夯实融入基础

辅导员的岗位属性决定其并非只在课堂之外承担事务协调工作，而是长期嵌入学生入学适应、班级运行、生活秩序、心理支持、职业准备和毕业离校等成长链条之中，这种持续在场使其能够了解学生学习状态、生活习惯、交往方式和发展期待的真实面貌[3]。高职学生成长节奏与技能训练、岗位认知、实习转岗联系紧密，辅导员在院系管理和学生生活之间形成稳定连接，既能理解学校育人要求，也能感知学生日常反应，推动思政教育融入日常管理环节、生活细节和职业准

备过程，为全方位育人夯实履职根基。

（二）师生信任提升教育接受度

日常思政教育能够进入学生内心，需要稳定关系作为依托，辅导员在长期陪伴、持续沟通和具体帮扶中积累了学生对其的信任感，能够使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人际困扰、家庭变动、实习适应和就业选择时愿意表达真实想法。高职学生对教育内容的接受，往往不只取决于话语本身的规范性，也取决于表达者是否了解其处境、尊重其感受、能够提供可依赖的支持，辅导员在日常互动中形成的关系黏性，使价值引导拥有较为稳定的情感基础和沟通入口[4]。

（三）多元协同汇聚育人信息

学生成长状态分布在课堂学习、宿舍生活、实训表现、社团活动、家庭互动和岗位实践等不同场域，辅导员若要把握学生的思想变化，需要依托多主体信息汇聚形成较完整的观察视角。任课教师能够反馈课堂参与度和学习投入度，班干部、宿舍长能够补充同学交往和生活秩序相关情况，心理教师提供专业支持意见，实习指导教师和企业导师反映岗位适应情况，与家长沟通了解家庭支持背景。将上述多元信息汇聚后，辅导员对学生学习、生活、实践和职业准备状况的判断更具整体性。

（四）校内外衔接延展育人过程

高职学生培养具有鲜明的实践场域转换特点，学生从校内课程学习进入实训训练、岗位实习和就业准备阶段后，思想状态、行为规范和职业认知会在不同环境中继续生成[5]。辅导员连接校内管理、专业培养、实习联系和就业指导各环节，能够使日常思政教育不随场景转换而中断，在学生由校园角色走向准职业角色的过程中，使其保持对规则意识、劳动态度、责任观念的连续关注，让学生在学习、实训、实习和求职各环节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

三、高职辅导员融入学生日常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话语转译：激活生活化思政表达

辅导员开展日常思政教育前，宜先把学期内需要传达的思政内容拆成若干生活议题，建立“理论主题—学生场景—案例材料—行动要求”四栏清单，比如将诚信教育对应考试纪律、资助申请、实习考勤和简历填写，将法治教育对应网络转发、兼职合同拟定、校园纠纷调解和个人信息保护，将责任教育对应班级岗位设置、宿舍值日、小组实训和志愿服务。每次班会或谈话只聚焦一个小切口，材料选取近期学生能够感知的校园情境，开场可由学生先判断“这件事该不该做、为什么会这样、后果由谁承担”，再由辅导员把学生的零散观点归入规则意识、公共责任、职业规范等价值框架中，班会结束前再让学生写下一个可执行动作，如修改简历诚信承诺、调整宿舍公约、完善实训小组分工或补充求职风险清单。后续班委收集完成情况，辅导员在下一次班会前选择两三个典型反馈进行简短回应。

日常表达还要形成固定转换方法，辅导员可将“文件语句”改写为“情境问题”，将“纪律要求”改写为“行为边界”，将“价值倡导”改写为“行动清单”。比如讲网络文明时，设置“未经核实的实习单位负面信息能否转发”“同学照片能否配文调侃后发布”“如何遏制班级群里的矛盾冲突持续发酵”等问题，让学生列出发布前核验、涉及他人先征得同意、情绪激烈时延后表达、出现误伤后主动澄清等做法；讲就业观时，不空谈职业理想，而是围绕薪酬期待、岗位成长、通勤成本、企业制度和个人能力匹配进行比较，引导学生把正确的价值取向融入求职填表和岗位抉择的全过程，辅导员再依据学生填写的内容筛选出共性误区，安排一次小范围答疑或优秀毕业生案例分析，并把学生修改后的岗位选择理由纳入后续就业谈话材料。

（二）需求识别：开展分层思政引导

辅导员需要把学生成长需求识别做成连续工作，而不是等到问题集中出现后再临时处置。班级层面可建立“一生一档、一月一更新”的成长记录表，字段包括出勤波动、课程成绩、宿舍同伴反馈、活动参与、心理状态、家庭变动、实训表现、职业意向和近期谈话要点。记录不宜只写“表现良好、状态一般”等笼统结论，需标明具体事实，比如连续两周晚归、某门课程三次缺交作业、宿舍同伴反馈情绪低落、实训项目中不愿参与分工、实习岗位沟通受阻等，再结合任课教师、宿舍长、班干部、实习指导教师和家长反馈进行交叉核对，对信息来源、发生时间、变化频次和已采取措施作简要标注，月底按“稳定关注、一般关注、重点关注”进行归类，防止后续谈话停留在印象判断上。

分层引导可按需求类型设定不同介入动作，为学业困难学生安排“目标拆分表”，把补交作业、课程答疑、技能练习和阶段检查设置为周任务；针对心理压力较大学生采用“低频稳定陪伴 + 专业转介”的方式，辅导员记录情绪触发点、支持资源和后续预约情况，不用励志话语替代专业判断。为实习适应困难学生建立“岗位复盘单”，围绕工作内容、沟通对象、纪律要求、出错环节和改进动作进行记录；让就业迷茫学生使用“能力盘点表”，从证书、技能、实训成果、性格特点和岗位要求中梳理匹配关系，谈话重点放在选择依据而非简单催促签约；对暂时缺少目标的学生，可安排其访谈一名毕业生、查阅两类岗位说明、完成一次模拟面试反馈，让职业认知在具体任务中逐步清晰，辅导员再依据任务完成质量调整下一轮谈话重点。

（三）事务嵌入：释放管理育人功能

考勤、资助、评优、违纪处理和活动组织都能形成思政教育入口，辅导员需在每项事务中预设育人节

点，避免仅是通知、收表和归档。考勤管理可采用“周提醒、月分析、个别谈话”的流程，周提醒只反馈事实，月分析引导学生核对作息安排、课程投入和实训纪律，个别谈话再将迟到旷课与职业岗位的时间规则相连接；资助认定可在材料审核后增加诚信承诺、受助规划和成长反馈，要求学生说明资助资金使用方向、学习改进目标和可参与的公益服务事项。辅导员对申请材料中家庭情况、消费情况和学习状态保持审慎核验，对获得资助的学生建立学期成长反馈单，记录其学习投入、志愿服务、技能训练和班级参与情况，使资助工作与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和自我发展要求相衔接。

评奖评优要把榜样标准写清楚，辅导员可在班级公示前组织学生对学习成绩、技能训练、集体贡献、志愿服务、宿舍表现和诚信记录进行说明，形成“事迹材料—同伴评价—辅导员审核”相互印证的过程。宿舍检查不只公布扣分结果，还可让寝室成员轮流填写“公共空间责任单”，明确卫生分工、作息约定、用电安全和矛盾处理方式；违纪处理不只完成谈话和处分程序，还需让学生写出事实复盘、规则依据、影响对象和改进行动，辅导员在两周或一个月后检查行为变化；活动组织前由学生提交岗位分工表，活动后补充责任履行记录和协作复盘，针对推诿任务、临时缺席、材料敷衍等情况开展小组谈话，把班级事务从任务完成延伸到责任训练。

（四）过程反馈：提升日常育人实效

过程反馈要从工作完成记录转向学生变化记录，辅导员可建立“教育介入—学生反应—后续表现—调整动作”四项记录法，每次谈话后不只记录谈话主题，还要写明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变化、承诺事项、需要提供的资源和下一次观察节点。班级层面可按月整理出勤稳定度、课堂参与情况、宿舍矛盾、活动完成情况、实训纪律和网络舆情等数据，把数据变化与近期班会、谈话、宿舍走访和学生干部反馈放在一起分析，材料中不只保留结果，还需记录辅导员采用的教育方式、学生当时的反馈、后续行为变化和仍需观察的风险点，班干部反馈、任课教师意见和学生自评分开记录，避免不同来源的信息混在一起影响判断。

要根据反馈结果进行下一轮工作安排，辅导员可每月选取三类对象进行复盘，一类是问题有改善的学生，核对哪些谈话方式、同伴支持或任务安排产生作用；一类是反复波动的学生，重新分析原因是否与家庭压力、课程难度、宿舍关系或职业预期相关；一类是班级共性问题，调整下月班会议题、宿舍走访重点和个别谈话顺序。实习阶段还需增加企业导师反馈和学生周记比对，若学生在岗位纪律、沟通协作、任务完成上出现问题，辅导员可联合专业教师开展一次岗位复盘谈话，将学生自述、企业评价和专业要求放在同一张问题清单中核对，并在两周后查看改进记录、岗位评价和学生自我反思；对已经稳定改善的个案，则减少高频提醒，转为阶段性观察，避免过度干预削弱学生自我管理空间。

四、总结

高职辅导员融入学生日常思政教育，深层指向是让学生成长中的普通片段沉淀为价值塑造的连续过程。高职学生从校园学习走向岗位实践，思想逐渐走向成熟，这一变化体现在规则遵守、关系处理、任务承担、实习适应和职业选择的细节之中，辅导员的角色在场，为其融入日常思政教育提供了稳定支撑。面向高职育人质量建设，辅导员需在管理服务中保持教育敏感，在职业引导中坚守价值尺度，在过程反馈中积累育人经验，使日常思政教育成为学生理解社会、认识自我、走向岗位的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1] 李昂 . 高职辅导员在学生管理中融入思政教育的实践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3(32):165-168.

[2] 法如克·马合木提 , 阿依登古丽·阿曼台 . 高职辅导员学生管理中对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入 [J]. 现代商贸工业 ,2023,44(20):106-108.

[3] 王迪 . 高职辅导员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生日常生活中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3(17):157-160.

[4] 揭丽 . 探析高职辅导员将思政教育有效融入学生日常管理的策略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2(23):145-147.

[5] 高祎擎 . 高职辅导员在学生管理中对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入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2,21(06):167-168.

（作者：刘慧慧，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助教；郑欣敏，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张　咪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高校承担着将共同体意识融入思政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使命。现阶段部分高校这项教育工作存在突出短板，面临认知教学与情感培育脱节、行政管理取代育人逻辑、量化考核违背价值内化规律三大困境，造成教育浮于表面，学生只知理论却难以形成思想认同。本文依托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结合互动仪式链理论，搭建认知奠基、情感催化、行动内化三维互动框架，深入剖析育人难题根源，围绕课程建设、校园文化、考核评价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打造知情行一体化育人模式，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知识讲授转化为青年内在价值自觉，切实增强高校思政铸魂育人成效。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互动仪式链

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把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列为核心发展目标，部署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推动高校思政教育从单一理论授课转向全方位青年价值塑造提供重要行动遵循。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学校思政课的一个重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提出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这一部署为高校常态化推进相关教育工作提供政策依据，明晰了该项教育的战略定位[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政治认同、文化归属、价值共识与实践行动于一体，依靠共同历史记忆凝聚情感，引导青年树立 “四个与共” 理念，主动承担强国复兴使命。高校是意识形态培育的关键阵地，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既是落实民族工作战略的政治要求，也是思政教育突破同质化困境、守正创新的内在需要。目前多数高校已把相关教育纳入课堂、党团活动与社会实践，但育人成效不达预期，存在认知灌输与情感培育割裂、行政考核挤占育人本位、量化指标代替思想评价三重失衡的问题，造成活动热度高、思想认同弱的困境。本文立足青年心理成长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和互动仪式链理论构建三维分析框架，剖析育人症结，打造闭环实践育人路径，补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短板。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三重互动逻辑

（一）物质—意识互动：具象情境赋能理性认知奠基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互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逻辑起点，核心是依托具象实践场景，将抽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理解的客观内容。马克思指出，观念是人脑改造之后的客观物质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实体，无法依靠口头讲解直接进入学生的思想体系，必须依托具象化的物质场景、文化符号、历史载体完成认知转化。

在思政实践育人场景中，红色研学基地、民族文化博物馆、非遗体验工坊、传统节日庆典、爱国主义政治仪式等，都是连接客观共同体实体与学生主观意识的中介载体[2]。通过实地参观丝绸之路历史遗存、体验多民族非遗文化、祭奠革命先烈、重温入团入党誓词等沉浸式活动，能够把抽象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文物、文化故事与真实场景，激发学生主动认知，帮助学生摆脱空洞的理论记忆，建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基础、最直观的理性认知，为后续情感认同培育筑牢认知根基。

（二）个体—群体互动：群体共情推动情感认同升华

个体与群体的社会性互动，是打通认知与认同的关键桥梁，依托群体聚集、共同关注、同步行动三大互动要素，实现个体情感向集体情感的汇聚，完成从“知道理论”到“内心认同”的跨越。马克思强调，人的

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青年学生的价值认同从来不是个体独立形成的，而是在群体交往、同伴互动、集体共鸣中逐步建构而成的。

单纯的理论认知无法生成稳定的价值认同，只有群体之间的情感能量传递，才能催生持久的共同体归属感。标准化的集体主题活动、小组研讨分享、民族团结主题演讲、团队社会实践等场景，能够让学生实现时空聚集，形成统一的关注焦点与集体行动[3]。在同伴交流、思想碰撞、真情分享的过程中，个体的感悟与情绪相互传递、相互感染，逐步形成共同价值立场，塑造统一的群体道德感与共同体归属感。调研数据显示，学生认可度最高的育人活动，并非理论宣讲环节，而是同伴之间思想交流、团队协作共情的互动环节，也印证了群体互动在情感催化中的核心作用。

（三）行动—情感互动：自我反思实现价值长效内化

行动与情感的自我内在互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最终归宿，聚焦学生自我反思、自我复盘、自我教化，推动育人从被动外在约束转向主动内在自觉。在育人初期，学生参与思政实践活动大多源于考勤要求、学分考核等外在强制约束，属于被动性参与行为；而持续的实践行动会不断给予学生视听刺激与情感反馈，推动学生开展与自我的对话并反思复盘。

经过反复的实践体验与内心反思，学生逐步摆脱外在规则的束缚，自发完成“情感触动—价值认同—行为模仿—主动践行”的心理转变，最终将共同体理念转化为自身稳定的价值信念与日常行为准则。三重互动逻辑并非单向递进的割裂关系，而是全程闭环、相互渗透的有机整体：物质—意识互动贯穿育人全过程，夯实认知基础；个体—群体互动发挥催化作用，加速认同生成；行动—情感互动立足内因驱动，保障育人长效性。当前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效不足，本质就是三重互动链条出现断裂，认知无情感载体、群体无真实互动、行动无内心反思。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实践育人的现实困境及成因

结合面向全国 6 所综合性本科高校、2 所民族类高校开展问卷调研与师生深度访谈获得的数据，立足三重互动逻辑框架，梳理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三大核心困境，精准剖析内在成因。

（一）认知与情感转化脱节：理论教学与实践场景双向割裂

当前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存在理论课堂与实践场景脱节、知识点与核心概念脱节的问题，破坏了物质—意识互动的完整链条。一方面，思政理论课侧重政策条文、民族理论知识的单向讲解，实践活动孤立开展历史参观、文化体验等活动，二者缺乏内容联动与逻辑衔接，学生无法将课堂所学的民族理论、共同体核心要义，与实践场景中的历史故事、文化遗存建立关联；另一方面，高校缺乏一体化的共同体教育学科支撑，实践育人缺乏专业化学理指导，实践场景仅停留在碎片化知识点展示，无法系统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最终导致学生只会背诵理论知识点，无法产生情感共鸣，理性认知难以顺利转化为内生情感认同。

（二）管理与育人逻辑错位：行政流程挤压群体互动空间

高校思政实践育人工作分属宣传部、学工部、团委、各院系等多部门，多头管理、重复办活动的问题普遍存在，行政管理逻辑凌驾于育人逻辑之上，直接阻碍个体—群体互动的有效开展[4]。一是部门协同机制缺失，各部门依据自身行政考核指标独立开展活动，活动同质化严重、数量冗余，加重学生学业之外的负担，引发学生抵触心理；二是活动过度预设化，大部分主题演讲、团日活动、文化展演均提前彩排、预先确定发言人员与流程，全程追求流程规范、展示效果，剥夺了学生即兴交流、思想碰撞、真情表达的空间。标准化、模板化的集体活动无法形成真实情感共鸣，群体情感能量无法汇聚，集体育人价值弱化。调研显示，76% 的受访学生表示校园思政活动流程完全固定，无自由交流空间，34% 的学生认为活动过度彩排失去教育意义。

（三）评价与内化规律偏离：结果导向制约自主行动内化

现有育人评价体系以结果量化考核为核心，违背青年价值内化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阻断行动—情感自我互动闭环。其一，评价维度片面化，考核指标聚焦活动参与人数、开展场次、书面报告成果等外在数据，忽视学生参与过程中的思想变化、情感波动与成长反思。其二，育人模式自上而下“一刀切”，活动方案、实践内容全部由教师与行政人员统一制定，没有结合青年的兴趣、网络生活习惯设计内容，同时缺少学生自主策划、自主组织实践活动的空间，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其三，缺少过程性反思评价环节，没有引导学生开展自我复盘，学生参与活动之后无内心沉淀，参与行为流于形式，无法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认同的转变，共同体意识难以真正入脑入心。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优化实践路径

针对三重互动链条断裂引发的育人困境，紧扣认知奠基、情感催化、行动内化三大环节，从内容供给、组织管理、评价机制三个维度系统改革，构建全链条、一体化的思政育人体系。

（一）重构课程学科体系，补齐认知短板，打通知情转化通道

立足物质—意识互动规律，打造课程、学科、科

研三位一体的认知供给体系，破解理论与实践脱节难题。第一，统筹思政课程一体化衔接，打破课程内容壁垒。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必修课，联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核心思政课程，明确各门课程的育人分工：原理课夯实民族理论学理基础，纲要课梳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脉络，概论课聚焦新时代民族工作政策解读，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程贯穿、逻辑统一。第二，推动多学科交叉赋能教学，依托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资源，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案例与实践选题，开设“民族文化田野调查”“共同体历史专题研讨”等特色实践课程。第三，强化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文化普及，立足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双重视角，讲清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价值，筑牢学生理性认知根基，为情感认同做好铺垫。

（二）优化组织管理机制，激活群体共情，搭建情感共鸣场域

立足个体—群体互动规律，重构育人组织模式，弱化行政管控思维，回归育人本质，释放群体情感互动空间。首先，建立校级层面多部门协同育人专班，统筹团委、学工部、宣传部、各院系育人工作，整合同质化活动，精简低效形式化活动，统一规划年度共同体意识育人主题与实践项目，减轻学生活动负担[5]。其次，优化活动流程设计，减少全程彩排、固定流程等预设性环节，增设自由分享、小组辩论、即兴发言等生成性互动环节，保留学生真实思想表达空间，依托真实交流汇聚集体情感能量。最后，线上线下联动打造沉浸式文化育人场景，线下建设民族文化校园长廊、开展传统节日文化活动、举办民族团结文化艺术节；线上依托短视频平台、校园新媒体，打造青年喜闻乐见的情景剧、科普短视频、文化类视频博客，拓展网络情感育人阵地，实现全方位润物无声的情感浸润。

（三）改革全过程评价体系，释放自主空间，促成知行长效内化

立足行动—情感自我互动规律构建过程性、多元化育人评价体系，尊重青年价值内化规律，推动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践行。一是转变评价导向，构建量化+质性结合的评价指标，删减活动次数、出勤率等单一量化指标，重点考核学生过程反思、情感收获、实践行动、思想成长等质性内容，引入学生心灵成长日记、实践反思报告、一对一访谈记录等自述式评价材料，完整记录学生思想动态变化。二是下放部分活动自主权，坚持顶层方向把控不变，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践方案、自主开展民族文化调研、自主创作文化宣传作品，让学生从活动参与者转变为活动组织者，在自主行动中完成自我教化。三是拓展校外实践育人场域，联动地方社区、民族文化场馆、乡村振兴一线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开展民族文化志愿服务、边疆发展调研、民族团结宣讲等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社会场景中感悟共同体价值，最终实现认知、情感、行动的高度统一。

五、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兼具政治性、教育性与实践性的系统工程，绝非简单增加活动形式、扩充课堂内容即可实现育人目标。新时代高校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政教育，必须回归青年价值形成的基本规律，依托认知、情感、行动三维互动闭环，修复当前断裂的育人链条：以系统化课程建设夯实理性认知根基，以人性化组织互动激活集体情感共鸣，以全过程评价改革助力价值长效内化[6]。高校需要彻底摒弃形式化、行政化的育人误区，立足学生主体需求，联动校内校外多方育人资源，构建全域、全程、全员的协同育人生态。唯有让共同体理念真正贴合青年思想实际、融入青年日常行动，才能持续提升高校思政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实效，引导新时代青年牢固树立共同体理念，自觉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 持续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J]. 青海党的生活 ,2024(07):4-8.

[2] 魏荣 , 秦心怡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推动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26,32(05):3-14.

[3] 李青文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的逻辑层次和实践路径——基于“认知—情感—行动”的分析框架 [J]. 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6,56(01):114-121.

[4] 牛绿花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体系构建的法治保障——基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八条的思考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6,47(03):84-92.

[5] 郭富城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机制探究 [N]. 重庆科技报 ,2026-06-04(14).

[6] 王炳程 , 刘禹昕 .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意蕴 [N]. 临沧日报 ,2026-06-02(0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南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观培育的策略研究”（2025CSH088）。

（作者系昌吉学院讲师）

老干部工作中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穆琳宁

摘要：老干部思政教育需回应离退休干部身份记忆、精神滋养与公益参与需求，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可为教育内容注入历史经验、情感连接和行动场景。围绕基层公益法律服务平台参与老干部服务的实践场景，从身份记忆、精神滋养、公益参与和教育转化等维度展开分析，梳理资源清单筛选、红色故事转译、公益服务嵌入、反馈台账回流的操作链条。研究认为，红色文化资源应从静态材料转化为老干部愿意听、能够讲、便于参与的教育内容和公益行动，并在社区服务、普法宣传、困难帮扶等场景中持续延展，进而增强老干部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实践性和效能。

关键词：老干部工作；红色文化资源；思政教育；实施路径

老干部工作是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政治实践，在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价值远超出单纯的服务保障层面，承载着深远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意蕴[1]。进入基层治理和公益服务场景后，老干部群体仍保持较强的组织情感、公共意识和经验表达意愿，思政教育若停留在会议传达、材料学习和节点参观中，难以充分回应其精神需求与参与期待。红色文化资源具有历史记忆、价值引导和情感凝聚功能，将其嵌入公益性法律服务、社区关怀、普法宣传和志愿帮扶等具体场景，有助于把老干部的经历优势转化为教育资源和服务力量。

一、老干部工作中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教育的实施价值

（一）身份记忆承接教育根脉

老干部长期参与组织建设、公共事务和基层服务，在个人经历中沉淀着较为深厚的岗位记忆、组织记忆和服务记忆，这些记忆与红色文化资源中的理想信念、群众立场和奉献精神具有天然关联。红色文化资源融入老干部思政教育，应尊重其人生阅历和情感基础，把历史叙事转化为能够回忆、讲述和讨论的具体内容，使教育内容与老干部亲历过的工作场景、服务经验和价值选择形成呼应[2]。老干部在教育活动中既能回望自身经历，也能以亲历者、讲述者和传承者身份参与红色文化再表达，进而增强思政教育的历史支撑和参与温度。

（二）精神滋养回应银龄需求

老干部离开原有岗位后，生活节奏和社会角色发生变化，但学习交流、情感归属、价值表达和继续参与公共生活的需求依然存在。红色文化资源具有较强的情感凝聚力和精神支撑力，红色书信、人物故事、地方记忆和模范事迹等内容进入思政教育后，能够为老干部提供可阅读、可交流、可共鸣的精神材料，从而减少单向传达带来的距离感。思政教育若能贴合银龄群体的理解习惯和表达方式，引导其在回顾历史、交流经历、分享体会中确认自身价值，便能使红色文化资源成为连接组织关怀、精神滋养和社会参与的重要纽带。

（三）公益场景拓展育人半径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老干部思政教育，其价值还体现在教育场景的延展上，基层公益法律服务平台贴近社区和群众，能够为老干部参与公益活动提供具体、适度、可持续的实践空间。老干部熟悉群众工作，具有较强的政策理解能力、社会经验和沟通耐心，可在普法宣传、法律咨询引导、社区关怀、邻里矛盾疏导等活动中发挥辅助作用，使红色文化中的为民情怀、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进入可感知的行动过程。教育内容与公益服务相互衔接后，老干部思政教育便能从集中学习延伸到日常服务，在社区互动和公共关怀中扩大教育覆盖面。

二、老干部思政教育中红色文化资源的转化框架

（一）资源入口：从分散素材到主题清单

红色文化资源进入老干部思政教育前，应先完成主题归类与对象匹配，将分散的历史遗址、人物事迹、红色书信、地方记忆、家风故事和公益服务案例纳入同一资源入口。资源清单可围绕理想信念、群众立场、纪律作风、家风传承、法治为民、志愿奉献等主题建立对应关系，每项资源同步标注适用对象、叙事重点、呈现形式和使用场景，例如地方红色故事适合交流分享，老干部亲历经历适合口述整理，法治为民案例适合公益服务场景衔接。资源入口的核心在于把材料属性、教育主题和老干部接受方式提前校准，使红色文化资源进入教育活动时具备清晰边界和实践导向。

（二）故事转译：从历史文本到银龄话语

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转化，需要把史料文本改写为老干部愿意听、听得进、能够参与讨论的银龄话语。故事转译可围绕“人物身份、现实处境、关键选择、行动过程、经验启示”展开，将较长的历史材料压缩为情节完整、细节清楚、问题明确的交流文本，例如讲述地方模范人物时，可从其面对群众急难事项时的判断、协调和服务细节切入，减少概念铺陈和口号式表达。老干部熟悉基层事务和群众工作，叙事语言越接近真实处境、具体人物和生活细节，越容易引发经验互证，使红色文化资源由外部材料转化为可进入个人记忆的教育内容[3]。

（三）场景承接：从集中学习到公益服务

红色文化资源完成主题筛选和话语转译后，还需要进入适合承接的教育场景，使学习内容与老干部日常交往和公益参与形成连接。基层公益法律服务平台接触群众需求较多，服务事项具有明确对象和具体问题，可承接红色文化中的群众立场、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将其落实到普法宣传、社区关怀、法律咨询引导、邻里互助等场景之中。场景承接关注的是教育内容与现实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例如“法治为民”主题可衔接老年人权益保护宣传，“家风传承”主题可衔接赡养、继承等社区普法议题，使红色文化资源获得可感知的现实载体。

（四）成果回流：从活动记录到教育素材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老干部思政教育后，活动中的发言、讲述、心得、服务记录和群众反馈应进入成果回流环节，成为后续教育内容的再生素材。老干部口述经历可整理为“银龄故事卡”，公益服务中的典型问题可转化为主题讨论材料，活动反馈可归入资源清单的修订栏目，参与意愿较强的老干部则可纳入讲述人和志愿服务资源库。成果回流强调教育链条的连续积累，使一次学习、一场交流、一次公益参与留下可整理、可复用、可延展的内容基础，避免红色文化资源在活动结束后重新分散。

三、老干部工作中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教育的实施路径

（一）梳理资源清单，筛准教育主题

基层公益服务平台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老干部思政教育前，应先完成资源底账整理，将地方红色故事、模范人物事迹、红色书信、家风材料、老干部亲历经历、公益服务案例和法治为民案例纳入统一清单[4]。清单宜设置“资源名称、来源渠道、核心主题、适用对象、呈现形式、活动场景、时长建议、延伸任务、注意事项”等字段，工作人员在活动筹备阶段据此完成材料核对、主题匹配和场景预判。对地方红色故事，应注明人物、地点、事件和精神指向；对老干部亲历经历，应记录讲述人意愿、经历类别、可公开范围和适合呈现方式；对公益性法律服务案例，应标明涉及领域、服务对象、普法切口和可延展话题，使资源从零散材料转为能够直接进入教育设计的基础底账。

资源筛选还需建立分层匹配标准，先看主题是否对应理想信念、群众立场、纪律作风、家风传承、法治为民、志愿奉献等教育方向，再看内容是否符合老干部年龄结构、身体状态、阅读习惯和表达意愿，最后看资源能否衔接集中学习、口述交流、社区服务和普法宣传等具体场景。例如“法治为民”主题可优先选取困难群众法律援助、老年人权益保护、邻里纠纷疏导等案例；“家风传承”主题可匹配红色家书、老干部家庭教育故事、赡养继承普法议题；“志愿奉献”主题可衔接社区关怀、政策宣传和公益陪伴内容。主题筛准后，每次活动控制一项主线资源和两项辅助材料，避免材料堆叠削弱教育指向。

（二）转译红色故事，激活银龄表达

红色文化资源完成主题筛选后，应进入故事脚本转译环节，由工作人员围绕“人物身份、具体处境、关键选择、行动过程、现实连接”五个要素重组材料，将较长史料、人物事迹和地方记忆整理为 800—1200 字的交流文本。脚本写作应保留人物所处环境、事件起因、群众需求、处理细节和结果反馈，减少概念堆叠。例如在讲述基层模范人物时，可从其接待群众、协调矛盾、奔走服务、守住原则等细节切入，让老干部能够顺着具体情境理解精神内涵。每次活动宜选取 1 个核心故事、配套 2~3 张图片或实物线索，并预留 10~15 分钟交流时间，保证讲述节奏清楚、讨论入口明确。

银龄表达的激活，应依托“故事导入—问题牵引—经历互证—观点整理”的交流链条展开。故事讲完后，主持人员可设置三类问题：事实追问聚焦“人物面对什么困难”，经验追问聚焦“类似情境在基层服务中怎样处理”，行动追问聚焦“相关精神怎样进入公益参与”。老干部发言时，工作人员同步记录关键词、

典型语句和可延展案例，对于表达意愿较强的老干部，可提前征集岗位经历、群众工作经历、家庭教育故事和志愿服务经历，经本人确认后整理为“身边红色故事卡”，卡片内容包括讲述人、事件时间、服务对象、关键行动、教育主题和适用场景，并标注适合导入的活动类型与讨论问题，便于后续在读书交流、普法宣讲和社区活动中调取使用。

（三）嵌入公益服务，延展教育场景

基层公益法律服务平台应把红色文化学习嵌入社区公益服务单元，按照“主题设定、故事导入、法治衔接、公益参与、现场记录”的顺序组织活动。活动主题可围绕“法治为民”“银龄守望”“家风传承”“邻里互助”等内容设置，每次活动前由工作人员明确服务对象、普法议题、老干部参与任务和现场支持人员，例如老年人权益保护主题可先引入为民服务类红色故事，再衔接赡养、继承、财产保护、防范诈骗等案例讲解，最后安排老干部协助发放资料、引导咨询、讲述家风故事或参与社区关怀走访。活动单元宜控制在 90 分钟以内，其中红色故事导入 15 分钟，普法讲解 20 分钟，咨询引导和公益互动 40 分钟，现场反馈和资料整理 15 分钟，使教育内容进入具体服务流程。

老干部参与公益性法律服务应明确辅助定位和任务边界，平台工作人员需提前完成身体状况确认、活动路线安排、服务事项审核和专业人员配备 [5]。现场应设置签到确认、固定陪同、休息座位和应急联系人，涉及外出走访的活动还需提前核对路线、天气和往返时间。老干部可承担群众接待引导、政策资料说明、秩序协助、经验分享、情绪安抚和社区陪访等工作，涉及法律判断、文书审查、个案办理和风险提示的事项，应由专业人员负责答复和跟进。对于行动便利、表达稳定的老干部，可安排社区普法微课堂、红色记忆分享和公益陪伴任务；对于高龄或行动不便的老干部，可采用室内座谈、电话慰问、线上音频分享等轻量形式参与，保证红色文化教育与公益服务在安全、适度、规范的条件下有机融合。

（四）完善反馈台账，固化长效运行

基层公益服务平台应在每次红色文化教育和公益参与活动结束后建立专项反馈台账，将活动过程从简单留痕转为能够追踪过程、整理反馈、支撑后续安排的工作资料。台账字段宜设置为“活动主题、使用资源、参与老干部、服务对象、交流要点、公益事项、现场问题、老干部意见、群众需求、后续跟进、资料归档”等内容，工作人员在活动结束当日完成初步记录，三个工作日内补充照片、讲稿、发言摘要和服务反馈。反馈收集宜采用口头访谈、电话回访、简短问卷和小组记录相结合的方式，每次重点询问内容理解程度、参与强度、时间安排、服务体验和后续意愿，避免把老干部纳入繁重填报流程；对涉及个人经历、服务对象信息和法律咨询内容的记录，应做好脱敏处理和分类保存，确保后续使用边界清楚、资料调取有据。

台账信息形成后，应按学习建议、服务需求、活动改进、志愿意向四类归档，并明确对应处理方式。涉及法律咨询和权益保障的需求，由公益性法律服务站点安排专业人员登记、答复和跟进；涉及生活关怀、情绪陪伴、困难帮扶的事项，可转交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组织协同处理；涉及学习兴趣和表达意愿的内容，可纳入下一轮红色阅读、主题观影、故事交流和上门送学安排。对参与稳定、表达清楚、服务意愿较强的老干部，可建立“银龄宣讲员”“红色记忆讲述人”“法治宣传志愿者”动态名册，按身体状况、时间条件和专长方向调整参与频次，并在月度梳理中标注适合参与的活动类型、服务时段和陪同要求。工作人员可每季度对台账进行一次复核，筛出高频需求、成熟主题和待跟进事项，使每次反馈都能落到具体事项、具体人员和具体跟进节点。

四、结语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老干部思政教育，需要把历史记忆、组织情感和公益参与连接起来，使教育内容贴近老干部的人生经历、表达习惯和现实需求。基层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依托社区服务、普法宣传、困难帮扶和志愿陪伴等场景，能够为老干部学习交流和作用发挥提供具体载体。今后实践中，还需持续完善资源清单、故事脚本、活动边界和反馈台账，进一步细化老干部参与公益服务的任务分工、专业支持和安全保障，让红色文化资源在日常学习、社区互动和公益服务中长效传承，推动老干部思政教育保持温度、深度与实践效能。

参考文献

[1] 黄旭东 . 推动新时代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应把握的重点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5(08):68-72.

[2] 欧阳雪梅 .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论述 [J]. 党的文献 ,2024(01):3-10.

[3] 袁瑜菊 . 红色故事融入干部党性教育的叙事困境与路径探究 [J]. 铜仁学院学报 ,2025,27(06):27-34.

[4] 龙丽红 . 推动新时代老干部工作高质量发展 [J]. 当代贵州 ,2023(33):56-57.

[5] 唐凤艳 , 王娟 . 浅谈新时代老干部活动中心服务工作 [J]. 统计与管理 ,2021,36(09):94-98.

（作者单位：南京市江宁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站）

新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路径的实践架构

南田玉

摘要：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更是助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现实需要。新疆科技学院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核心，通过组建三支专业队伍、构建家—校—医三方联动机制、完善“四位一体”心理健康体系，形成育人实践架构，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的深度融合。这些实践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还为新时代新疆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有力的心理支撑。

关键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协同育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重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为新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教育部印发的《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进一步细化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目标任务与实施细则，着重强调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高校作为培育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平台，肩负着锤炼学生身心健康素养、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使命。新疆科技学院结合自身办学实际，依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研室，确立了“育心与育德相融合”的核心教育理念，将心理健康教育提升至培育全面发展时代新人的战略层面。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学校逐步构建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有效推动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与身心健康素质的协同发展。

一、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架构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架构是实现育人目标的关键支撑，需以系统思维整合资源、明确方向、强化协同，为学生心理健康保驾护航。学校积极围绕“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这一根本目标，构建起“一个核心、三支队伍、三方联动”的核心支撑体系，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有序推进筑牢基础。

（一）坚持一个核心，锚定育人方向

以心育人需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将价值引领贯穿于心理健康教育全过程。立足学校办学实际与地域文化特色，挖掘课程体系、校园活动中的心理健康元素与思政元素，引导学生在认识自我、调节情绪、应对压力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需紧扣“育心与育德相融合”的核心理念，将心育目标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密结合，使学生不仅具备健康的心理品质，更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成长为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基础。新疆科技学院明确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升心理素质水平”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核心要义，突破传统心理健康教育仅聚焦“问题干预”的局限，确立“发展性教育与预防性干预并重”的育人思路。学校通过将心理健康教育全面纳入整体教育发展规划，与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统筹推进，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从“边缘性工作”向“核心育人环节”的转型，凸显其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关键作用。这一核心定位既契合教育部专项行动计划中“健康第一”的教育导向，也精准匹配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现实需求，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

（二）组建三支队伍，强化专业支撑

专业队伍建设是保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质量的核心所在。高校应精准对接心理健康教育的多元需求，组建起结构合理、分工清晰的三支专业队伍，形成“专职引领、兼职补充、全员参与”的队伍建设模式。

一是专职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学校至少要按照1∶4000的师生比例配备专职教师，确保师资数量与质量并重。专职心理健康教师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中坚力量，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教学经验，

拥有心理学或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并持有国家认证的心理咨询师资格。他们承担心理健康课程教学、个体与团体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核心工作，同时负责开发校本心理教育教材，组织心理健康主题讲座与活动，并定期参与督导和继续教育，以提升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

二是校内兼职心理咨询师队伍。兼职咨询师应持有专业心理咨询资格证书，涵盖心理学、教育学、医学等多学科背景，能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心理咨询服务，可以协助专职教师开展咨询。兼职队伍还应引入校外专家资源，定期举办研讨会，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丰富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三是心理辅导员队伍。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升高校辅导员的心理健康素养，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高素质辅导员队伍的迫切之举，更是助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现实需要[1]。学校中负有学生管理职责的二级学院需成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组，由党总支书记或副书记担任组长，配备专职心理辅导员，负责学院层面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组织实施、学生心理动态的日常监测等工作，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下沉式”覆盖。心理辅导员还积极参与校级培训，学习常见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策略，并与班级导师、学生干部联动，构建基层心理支持网络。

三支队伍协同配合，构建“校级统筹、院级落实、专业支撑”的工作网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规范化开展提供人才保障。校级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负责制定政策、提供资源与督导评估；院级工作组负责具体执行与反馈，确保教育措施贴近学生实际；专职与兼职专业队伍则提供技术指导与深度服务。通过定期联席会议、案例研讨和资源共享机制，三支队伍形成合力，推动心理健康教育全员参与、全程渗透，共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三）构建家—校—医三方联动，筑牢协同防线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家庭、学校与医疗机构的协同发力。相关研究表明，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具有明显的生态系统特征，具体体现在服务对象、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教育内容以及服务途径与方式等多个方面，这种需求并非孤立存在，会受到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

在学校层面，班主任、辅导员作为联动核心，每月定期与学生及家长沟通联系，及时反馈学生在校心理动态，指导家长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在医疗层面，学校与属地精神卫生中心、专业心理咨询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聘请医院临床心理科医生担任心理健康专家顾问，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研判、专项面诊等工作，为重点学生提供专业的医疗指导，实现了“心理问题专业诊断、危机情况快速干预”的闭环管理。在家庭层面，学校通过家长会、线上讲座等形式，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主动参与学生心理疏导工作，形成学校主导、医疗支撑、家庭协同的全方位防护体系，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心灵防线。此外，三方需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整合学生在校心理测评结果、家庭反馈信息及医疗机构诊断记录，为精准干预提供全面数据支撑。通过这种多维度、深层次的协同联动，将家庭的情感支持、学校的教育引导与医疗机构的专业治疗有机结合，织密大学生心理健康防护网，切实保障学生的心理健康与生命安全。

二、“四位一体”心理健康体系的实践路径

在核心架构的支撑下，学校聚焦“教育、监测、咨询、干预”四大关键环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四位一体”心理健康体系，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推进”的转变。

（一）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夯实认知基础

心理健康教育以课堂教学为核心，以多元化活动为补充，构建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帮助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知识，树立自助与求助意识。

一是打造精品课程体系。学校应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必修课程体系，设置不少于 32 学时的课程，融合理论教学与体验教学，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心理测验等多样化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实现“课前自主学习、课堂知识内化、课后习惯养成”的完整学习闭环。同时，开设与心理健康相关的全校选修课，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心理发展需求，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

二是开展多元化教育活动。依托大学生心理健康协会，借助“一个总会 +n 个分会”的组织架构，充分发挥各二级学院朋辈辅导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推送心理防护知识推文，扩大教育覆盖面；紧扣“5·25”大学生心理健康节、“10·10”世界精神卫生日等关键时间节点，开展主题系列活动，营造关注心理健康的校园氛围；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培训计划，面向辅导员、班主任、心理委员等关键群体开展培训，提升全员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

（二）规范心理健康监测，实现精准识别

精准监测是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前提。学校建立“测评筛查 + 分级管理 + 督查监督”的全流程监测机制，实现对学生心理状况的动态掌握与精准识别。

一是开展常态化心理测评。每年新生入校后，学校组织开展全覆盖的心理健康测评，对测评结果进行科学分析，根据学生心理状况严重程度分为红、黄、绿三类进行分级管理：红色类为经医院诊断存在心理疾病并落实台账管理的学生，黄色类为测评数据中需重点回访的学生，绿色类为存在一般心理困扰的学生。

针对不同类别的学生，学校需建立“一生一策”心理健康档案，制定个性化教育方案，实现“精准画像、分类施策”[3]。

二是建立分级督查机制。学校应构建校级与院级两级心理健康教育督查监督机制，每学期召开专项工作会议，通过工作部署、督查整改、二级学院包联、走访调研等方式，压实各级主体责任，不断提升二级学院及学生队伍开展心理健康工作的能力，确保监测工作落到实处。

（三）优化心理咨询服务，满足多元需求

心理咨询需构建线上线下融合、专业与朋辈互补的多元服务体系。线上依托校园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开通 24 小时咨询热线、智能问答模块，支持学生随时倾诉困惑；线下设立个体咨询室、团体辅导室、情绪宣泄室等，针对新生适应、学业压力、情感关系、就业焦虑等不同主题开展定制化辅导。同时，组建由专职心理教师、兼职精神科医生、朋辈心理辅导员构成的服务团队，为红色类学生提供医校联动的持续跟进咨询，为黄色类学生安排定期回访式咨询，为绿色类学生开展普及性心理成长小组活动。此外，严格落实咨询保密制度，通过预约制、一对一专属咨询等方式保障学生隐私，让学生能够放下顾虑主动寻求帮助，切实满足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需求。在个体咨询方面，学校还可通过 App 软件、QQ、电话、面对面等多种预约渠道，提供面对面咨询、邮件咨询、网络咨询等多样化服务。在团体心理辅导方面，结合学生共性需求，每学期组织开展美悦读书会、时间管理、人际关系等系列活动，同时针对新生开展适应性团体辅导等。通过团体互动、经验分享等形式，帮助学生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增强心理支持感。

（四）完善预警干预处置，筑牢安全底线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往往具有隐蔽性，特别是内化性问题，学生在评估测试中可能刻意隐瞒情况，甚至给出虚假反馈[4]。针对这一现实难题，学校应通过建立“制度保障 + 预警体系 + 协作机制”的全链条心理危机预警干预处置机制，确保心理危机事件“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搭建多主体协同联动的立体式监测体系，为更有效的预防工作与更及时的干预行动提供支撑。

一是强化制度保障。成立由校党委副书记担任组长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学校心理健康危机干预方案，建立定期反馈、及时汇报的跟踪机制，明确自伤、自残、自杀等危机事件的即时报告流程，为危机干预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

二是健全五级预警体系。构建“学校—心理中心—学院—班级—宿舍（一站式学生社区）”五级工作网络，实现心理危机的全方位监测。各班级设男女心理委员各 1 名，各宿舍设宿舍长 1 名，充分发挥朋辈作用和信息员作用，二级学院定期研判，心理中心积极干预，形成“宿舍排查、班级上报、学院研判、中心干预、学校统筹”的动态管理模式。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心理危机预警机制，通过学生日常的数据变化精准掌握，有助于加强对有风险预兆学生的监管[5]。同时，辅导员通过定期走访宿舍、院系通过每月研判学生心理状况等方式，实现对被关注学生的精准管理。

三是优化医校协作机制。学校与属地医院建立深度合作关系，邀请临床心理科医生定期到校为被关注学生提供面诊服务，为突发危机学生及重点学生开通就诊绿色通道，同时做好需转介学生的协调沟通工作，实现“校园干预—医疗诊断—后续康复”的无缝衔接。

三、结语

新时代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精准定位核心目标、构建专业支撑体系、完善协同育人机制。新疆科技学院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核心，通过组建三支专业队伍、构建家—校—医三方联动机制、打造“四位一体”心理健康体系，形成了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模式，实现了育心与育德的深度融合。

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既要强化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也要完善监测预警与危机干预机制，筑牢学生心理健康的安全底线；更要构建多方协同的育人格局，形成心理健康教育的合力。未来，高校还需进一步优化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创新教育方法，提升专业队伍水平，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更加坚实的心理健康保障。

参考文献

[1] 杜和军，陈旭．高校辅导员心理健康素养的价值意蕴、基本内涵及培育路径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3,41(07):110-115.

[2] 钱闾建，胡春梅，葛宁，等．生态系统理念下“校家社”多维协同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策略——基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求的实证分析 [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5,47(12):11-23.

[3] 杨娜．织密“心网格”：全流程网格化护航学生心理健康 [J]. 人民教育 ,2025(12):66-68.

[4] 赵玉芳，左有霞．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体系构建与实践进路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4(23):60-64.

[5] 陶进，马建青．新时代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发展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11):84-88.

（作者单位：新疆科技学院）

数字赋能视角下高校辅导员角色转型对大学生思想引领效能提升研究

路　遥

摘要：数字时代下高等教育育人环境持续迭代，传统辅导员工作模式滞后于新时代思政育人发展要求，制约了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实效。本文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系统梳理数字赋能、辅导员角色转型与大学生思想引领效能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明确数字赋能驱动辅导员角色转型的实践方向，探索以辅导员数字化角色转型赋能思想引领效能提质的具体路径。以期推动高校辅导员育人工作数字化革新，全面强化高校思政育人实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关键词：数字赋能；高校辅导员；角色转型；思想引领

一、数字赋能与辅导员角色转型、思想引领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数字赋能是辅导员角色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数字赋能是指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平台、新媒体技术等数字化工具，为辅导员工作提供资源、场景等，使其工作效率更高，使传统的工作从经验化、粗放式走向数据化、智能化、精准化、全过程化。数字赋能之所以能成为辅导员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根本在于它不是简单的换工具、工具升级，而是着眼于工作中的痛点、能力、价值定位等层面，倒逼高校辅导员在当前数字化背景下做出改变，更好地实现立德树人目标。

过去辅导员深陷事务性工作的“泥沼”[1]，大量时间都用于基础性、重复性的工作中，导致辅导员忙于完成事务性工作而忽视对学生的思想引领与教育工作。数字赋能能够科学辅助辅导员实现日常管理事务性工作的“减负”[2]，解放辅导员精力，有利于其回到主业上去。例如，通过整合门禁、成绩、网络行为等数据，能较为精准地构建学生画像，有利于辅导员从被动应对问题到主动预判、精准介入，有效应对滞后性。当下辅导员充分利用数字赋能其工作，是辅导员角色转型的重要条件，离开数字赋能，辅导员角色转型难以落地。

（二）角色转型是提升思想引领效能的关键路径

在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辅导员角色转型是突破思想引领工作瓶颈、提升育人实效的关键路径。在学生心目中，辅导员通常是管理者、说教者、规则的执行者、信息的传递者，难以亲近，当学生对辅导员印象固化时，“立德树人”就无从谈起，这些形象就像筑起的一座高墙，阻挡了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和情感共鸣。因此，辅导员必须主动完成角色转变、身份转型。

辅导员可以通过数字赋能精准画像，主动关怀学生，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学习中的困难，根据学生实际，提供个性化的有效建议，让学生感受到辅导员带来的温暖，打破对辅导员的刻板印象。辅导员将自己从烦琐的重复性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把宝贵的时间留给一对一谈心，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做只有人能做的事，这最能体现辅导员的价值。还可以通过漫画、视频等方式将网络中的热梗、热点话题、社会新闻等有机融于价值引领教育中，激发学生的主体性，用“小故事”汇聚“大力量”[3]，通过身边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三）效能提升是数字赋能与角色转型的最终目标

效能提升之所以是数字赋能与角色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因为它直接解决的是辅导员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核心问题：长期陷入繁杂事务，面临忙而不获、教而不入心的职业困境。所谓“效能”不是单纯地指干活快、干活多，对于肩负育人职责的辅导员工作而言，效能主要指的是立德树人这个核心使命的实际完成质量与落地效果，数字赋能与角色转型是服务于育人核心使命的重要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数字赋能让辅导员从烦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精力与真

情实感投入到对学生的思想引导中，让辅导员的情感价值和教育价值大幅提升，这就为角色转型提供了坚实基础与有力支撑。角色转型是跳出事务性桎梏，从管理者转变为思想引领者、价值陪伴者，让辅导员能够适应大学生成长需求，为效能提升筑牢能力根基。其实，三者相辅相成、彼此赋能，技术的运用不能脱离育人本质，角色的转型不是形式主义，最终都指向思想引领针对性不强、亲和力不足、覆盖面有限等问题。

二、数字赋能倒逼辅导员角色转型的实践方向

（一）工作思维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首先，利用日常管理数据提前识别学生思想与行为异常。通过精准抓取校园教务系统的日常考勤记录、校园卡深夜消费记录、图书馆借阅记录等数据，特别是考试周、假期前后、奖助学金评定期间、评优评先期间等学生情绪和状态易波动的关键节点，及时发现问题，精准预判学生的思想波动与心理隐患，打破传统思政工作依靠经验判断、滞后处置的“事后补救”被动模式。利用数据，帮助辅导员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4]，将被动的工作状态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前置式育人。其次，借助相关数据辅助谈心谈话，提升针对性。以往辅导员与学生谈心谈话大多采用通用化沟通模式：常以“最近怎么样？学习生活方面有没有困难？”这类宽泛的提问开展交流，全靠学生自己主动说，辅导员容易被隐瞒、敷衍。将学业、消费等方面的客观数据作为依据，在与学生谈话前掌握学生潜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与学生谈心谈话，“对症给药，靶向治疗”，能有针对性地提升谈心谈话的质量，缓解学生的抵触情绪，从而进一步增强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信任感，使得学生愿意对辅导员敞开心扉。

（二）育人场域从实体空间延伸到数字空间

随着网络、科技、人工智能的发展，传统的教室、宿舍、办公室等已经不能满足辅导员育人的需求。新时代的大学生是“网络原住民”，这就要求辅导员必须从实体空间转向数字空间。了解学生常常使用的是哪些网络空间，分别用来做什么，有利于工作效能的提升。例如微信是开展日常管理与落实温情思政教育的基础阵地，抖音短视频节奏快、娱乐化氛围浓厚，B站可为学生学习提供资源等。掌握学生常驻足的平台，通过开设官方账号、推送正能量图文、视频等多种途径，精准实现数字育人。强调数字空间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实体空间，线上线下应该是各司所长，虚实互补。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不是简单线下拍个照然后线上转发就结束了，而是真正要做到场景分工、资源互通、评价统一。线下注重深度互动、仪式感、面对面的交流，消除线上易产生的隔阂感，解决线上气氛弱等问题；线上可以扩大参与范围、异地同步、异步发言、云资源调取、灵活回看等，解决线下时间场地受限等问题。

（三）师生关系从单向管理约束转变为协同成长伙伴

一方面，传统线下场景辅导员自带管理者标签，学生天然拘谨畏惧，有所保留。在微信、抖音等平台上用适度的关注、走心的评论给学生点赞、评论甚至私信等属于非正式无压力的沟通，剥离说教、通知、奖惩等管理属性，用日常互动缩小层级距离，逐渐消除师生之间的天然隔阂；另一方面，辅导员还应积极主动成为学生愿意倾诉的“网友式”辅导员。“网友式”辅导员不是对学生放任不管，完全同学生打打闹闹，而是和学生沟通时，具有松弛感、私密性、随时可沟通的便捷性。适当使用网络沟通语态，多用商量建议的口吻，坚持先倾听共情、后引导开导的倾诉原则等，这些方式都有助于学生把辅导员作为可以交心、无压迫感、能守住秘密的倾诉对象，主动向其袒露不会对其他老师、家长讲的心事，在此过程中，辅导员也完成了从管理者到陪伴伙伴的质变。

（四）能力结构从“全能杂家”升级为“数智专长”

一是辅导员要掌握基本数据分析工具，能读懂学生群体画像报告。学生画像是新时代辅导员开展精准育人、隐性育人的重要依据，是告别凭印象、靠经验的重要工作方式，是当下辅导员应该具备的基础核心能力。这就要求辅导员应掌握基础办公数据工具，精通工具的高级功能，熟练运用校园智慧平台工具，会使用可视化数据分析工具等，对其进行综合运用让问题一目了然。二是当下思政育人主阵地已经延伸到网络空间，短视频等成为学生接收信息的主要载体。因此辅导员需要具备视频内容制作能力，让主流价值观脱离刻板说教，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入脑入心。三是要学会用青年人熟悉的网络语言进行沟通与引导。新时代青年大学生思维活跃、话语新颖，对传统说教不感兴趣，因此有必要适时地掌握青年人的话语，主动融入，用学生听得懂、愿意听、乐于接受的网络语言开展引导，拉近师生距离，提升育人实效。

三、以角色转型提升思想引领效能的实践路径

辅导员实现角色转型，核心不在于单纯掌握数字技术、提升技能本领，而在于育人理念的根本性转变。强调数字化育人，绝非用技术替代育人，而是技术赋能育人，以人为本仍是数字思政工作的根本底色。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数字化育人理念

数字化育人的理念核心实践逻辑是让数据前置，将通过大数据筛查分析得出的隐性线索，作为线下与学生面对面沟通、进行思想引领的切入点，打破“盲人摸象”的困境，以数据作为突破口，主动及时解决可能发生的隐患。通过数据精准锁定学生的困惑，针

对性了解其学业、生活、心理等状态，让线下沟通不再泛泛而谈，真正实现“数据找问题，线下解心结”。数字化工具为学生工作提质增效，但技术始终是育人的辅助手段，无法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与思想共鸣，在核心思想引领、心理疏导、价值塑造等方面，还是要坚持面对面谈心谈话。数字技术解决了育人效率问题，但面对面沟通解决的是育人温度问题。

数字化育人，不仅是辅导员运用数字技术服务学生，更包含引导学生驾驭数字工具、规避网络风险的育人责任。新时代学生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但也容易陷入算法推送、信息碎片化、网络舆情乱象的裹挟之中，出现网络沉迷、价值观偏差等问题。因此辅导员需常态化开展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5]，有针对性地开展纠偏教育，引导学生主动甄别网络信息，理性表达网络观点。

（二）主动提升核心数字育人本领

作为高校辅导员，一是要参加数据素养与网络思政工作坊，掌握必备工具技能。主动报名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开设的数据素养、有关网络思政工作的相关培训，系统开展技能学习。熟练掌握思政工作常用的数字化工具、学生管理相关数据平台等，能熟练调取、梳理、分析学生学业成绩、日常考勤、校园活动、心理测评等多维度行为数据，通过数据能精准研判、读懂学生思想动态、成长困惑与需求变化等内容。同时将上述所学及时应用到日常工作中，弥补不会用数字工具的短板，全面提升数字化育人能力。二是通过组建师生共创内容团队，聚力打造贴合学生、引发共鸣的优质网络思政作品。由辅导员主动牵头组建由学生骨干、新媒体爱好者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创作小组，围绕学生关心的就业、理想信念、校园生活等话题，从学生真实经历中挖掘素材，借助校园新媒体进行推送，打造贴近青年、引发情感共鸣的线上育人作品。三是在日常工作中刻意练习用数据说话的能力。坚持用数据说话，在主题班会筹备、思政备课、学生心理排查、评优评先、日常育人谈话等工作中主动调取客观数据，让教育引导有理有据。

（三）建立线上线下衔接的闭环工作模式

一是线上发现问题与初步介入，线下深度辅导与持续追踪。依托校园学工等系统，摸排学生问题，发现异常线索后，先通过私信、线上谈心等柔性方式初步沟通。针对摸排识别出的重点问题、复杂问题等开展一对一谈心、宿舍走访等活动，有针对性地形成协同帮扶。线下工作结束后，要再次在线上建立跟踪台账，将线下谈话等内容同步至数字档案，持续关注学生情况，形成线上发现—线下解决—线上持续追踪的长效循环。二是要注意重要价值议题先在线上预热讨论，再回到线下引导升华。针对热点、核心问题等先在线上让学生充分讨论，收集学生真实疑惑。选择合适的时间，对学生在线上提出的疑惑和问题进行集中答疑，弥补线上交流缺乏情感共鸣的短板，实现“线上广发言、线下深铸魂”。三是结合数字记录与传统观察手段，生成更立体的学生成长评价。结合学生线上、线下活动记录全面客观评判学生的思想动态、心理素质等，为辅导员日常各项工作提供完整、真实的数据，最终形成全过程立体画像。

（四）在技术应用中守住教育本心与底线

一方面，人工智能赋能学生管理会持续生成、沉淀海量与学生有关的数据。辅导员要明确学生数据的使用边界，做到最小必要与透明告知。日常工作中，辅导员需立足育人本职，只采集学生管理、日常服务工作必要的数据，坚决杜绝过度采集信息、过度窥探学生课余私人生活、干涉学生个人隐私的行为；在人工智能进行数据采集之前，明确告知学生数据采集用途等信息，消除学生感到“被监视”的抵触情绪与不安心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非常快速生成各类量化指标，辅导员要理性看待智能数据结果，拒绝单纯依靠数据给学生“贴标签”，不简单粗暴地批评问责。坚持数据为辅、育人为主的原则，主动倾听学生的诉求与困难，用深度沟通弥补人工智能无法捕捉的情绪状态、性格特质、心理变化等内容，有温度地开展育人工作。在复杂的网络舆论中，始终站稳立德树人的根本立场。面对各类舆情风险，辅导员始终要以价值引领为核心，在用好技术的同时守住政治底线、价值底线。

参考文献

[1] 代启蒙 .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深度辅导的实践路径探究 [J]. 北京教育 (德育),2026(05):85-88.

[2] 王冬冬 , 张有武 . 高校辅导员工作数字化转型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5,45(33):31-35.

[3] 孙永欣 , 李南 . 数字赋能思政引领力建设的耦合向度、主要特征与实践指向 [J]. 新疆社科论坛 ,2025(05):103-112.

[4] 丁淑萍 , 李颖 .AI 赋能高校辅导员职业发展的路径重构与角色转型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6,44(02):167-171.

[5] 王劝 , 方小明 . 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网络舆情引导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J]. 公关世界 ,2023(14):31-33.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 :2025 年度新疆党建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专委会党建课题“党建引领南疆高校内地生源毕业生留疆服务与就业创业的路径研究”(GXDJ2025022)。

（作者系新疆科技学院讲师）

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白　雪

摘要：高校就业工作不仅涉及毕业生岗位落实，也包括对大学生就业观念、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泰山文化作为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高校就业育人提供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资源。将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有助于丰富就业指导内容，引导学生理性认识职业选择，增强职业认同感和服务地方发展的意识。本文在梳理区域文化影响大学生就业选择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的依据、价值、作用机制和实践路径，提出从课程教学、实践项目、校地合作、主题教育和评价反馈等方面推进相关工作，以提升高校就业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泰山文化；高校就业；就业育人；区域文化；实践路径

一、引言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随着就业形势日益复杂，就业工作已不只是岗位供给与求职技能之间的匹配，还涉及就业观念、职业价值、心理调适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传统就业指导多侧重政策解读、信息发布、简历制作和面试训练，能够提升学生的求职能力，但在职业价值引导、长期发展意识培养和服务地方责任教育方面仍有不足。因此，推动就业工作由事务性服务向育人引导转变，是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

区域文化是在特定地域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精神传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已有研究指出，大学生毕业发展路径并非完全由个体能力或就业市场决定，成长环境、高校所在地的文化氛围、区域制度环境等因素都会影响其就业、升学、创业等选择[1]。也有研究认为，区域文化会影响学生对职业声望、就业地域和发展机会的判断，并进一步影响其就业心态与职业适应[2]。因此，将区域文化纳入高校就业育人研究，有助于拓展就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

泰山文化是齐鲁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鲜明的地域特征。其所包含的担当意识、进取精神、崇德观念和家国情怀，与高校就业育人中的职业责任、生涯规划、心理调适、服务社会等内容具有较强的关联，对引导高校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增强就业创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3]。区域文化基因研究也表明，地方文化能够作用于大学生道德、技能、协作、学习等素质的养成，并通过体验基地、传播平台等方式提升其就业创业素养[4]。

基于此，本文以泰山文化为切入点，探讨其融入高校就业育人的依据、机制与实施方式。本文认为，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不是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简单宣传，而是将其中的精神价值、实践资源和地方发展场景用于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依托这一思路，高校可以丰富就业教育内容，引导学生理性认识职业选择，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和服务地方发展的意识，从而提升就业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的内在依据

区域文化会影响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和择业行为。不同区域形成的文化传统、经济观念和制度氛围，会影响学生对就业、升学、创业等路径的判断。因此，区域文化不仅是就业工作的外部背景，还是影响就业观念的重要因素，而高校就业育人可以为区域文化资源的利用提供现实空间。

泰山文化作为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融入高校就业育人的基础，其包含的担当意识、进取精神、崇德观念和守正品格，对高校就业育人中的职业责任、生涯规划、心理韧性、职业伦理和社会服务意识等有着较小的影响，也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具有教育意义。同时，泰山文化具有较好的实践转化条件，泰山文化与文化旅游、研学教育、文创开发、地方传播、

乡村振兴等领域联系紧密，这些领域本身也包含适合大学生参与的实践场景和就业空间。区域文化资源能够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精神动力，也能够通过资源整合引导学生参与实践[5]。因此，高校可以将泰山文化转化为就业教育资源，引导学生在文化传播、社会调研、文旅服务和地方实践中提升职业能力。

由此可见，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具有较为充分的依据。区域文化能够影响大学生就业观念，泰山文化又具有精神价值和实践资源，能够在职业责任培育、职业素养提升和地方认同形成中发挥作用。将其纳入高校就业育人体系，有助于推动就业工作从事务性服务转向综合性育人。

三、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的育人价值

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重点不在于介绍地方文化，而在于将其精神资源用于大学生职业发展教育。高校就业育人既要帮助学生进入职场，也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职业价值观、稳定的心理素质和长远发展意识。

泰山文化有助于涵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意识。当前部分学生在择业时较多关注薪资待遇、城市层级和岗位稳定性，对职业所承载的岗位责任、社会责任和组织规范认识不足。就业育人应引导学生认识到，职业选择不仅是个人生计安排，也是进入社会分工、承担社会角色的过程。泰山文化所体现的厚重沉稳品格，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敬业意识、诚信意识和岗位责任意识。泰山文化也有助于培育学生的生涯规划意识。大学生求职中常存在短期化倾向，容易重眼前机会、轻长期发展，重单位平台、轻岗位适配，重外在稳定、轻能力成长。就业育人需要帮助学生把初次就业放入长期职业发展中理解，引导其在认识自我、了解社会和把握区域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理性选择。

此外，泰山文化能够增强学生服务地方发展的意识。地方高校就业育人不仅要引导学生向外寻找机会，也应帮助学生理解地方产业和本地就业空间。泰山文化与文化旅游、研学教育、文化传播、文创产业、乡村振兴等领域联系紧密，能够为学生认识地方发展提供具体入口。党金铭指出，山东作为教育大省，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优势，但也面临人才吸引力不足和人才流失现象[6]。将泰山文化融入就业育人，有助于学生认识山东的发展机会，增强留鲁就业和服务地方的意识。

泰山文化的育人价值主要体现在职业责任、生涯规划和地方认同等方面。将其融入高校就业工作，将有助于推动就业教育从单纯求职指导转向综合育人。

四、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的作用机制

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不能只停留在文化符号展示或精神宣传层面，而应转化为学生就业观念、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的提升。结合高校就业工作的实际需要，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价值引导、文化认同、能力转化和协同育人几个方面。

在价值引导方面，泰山文化可以为就业观教育提供支撑。部分学生在择业时容易受功利化、短期化观念影响，将就业简单理解为获得收入、稳定身份或体面岗位，而忽视岗位责任、个人成长和社会贡献。泰山文化中包含的担当意识、守正品格和尚德观念，有助于引导学生从更长远的角度理解职业选择，把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岗位责任结合起来。

在文化认同方面，泰山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地方就业空间的理解。区域文化对就业选择的影响，往往通过学生对某一区域的熟悉程度、情感归属和发展预期体现出来。地域文化和制度环境会影响高校学生毕业发展路径选择，区域文化氛围会对就业、升学和创业等选择产生潜在影响。对于地方高校而言，泰山文化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山东、理解泰安及相关产业基础，特别是帮助外地生源学生缩短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距离，提升其对本地就业机会和岗位价值的认识。

泰山文化还可以成为就业实践的载体，泰山文化包含文化传播、文旅服务、研学设计、文创开发、社会调研、基层服务等实践内容，能够与学生专业学习和就业能力培养结合起来。地方文化资源不仅能够提供精神动力，还能通过资源整合引导学生参与实践。高校可围绕泰山文化设置项目任务，如文案写作、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研学线路设计、地方企业调研等，使学生在真实任务中提升表达、策划、沟通和岗位适应能力。

在协同育人方面，泰山文化融入就业育人需要高校、地方政府、文化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单靠校内课程和活动，难以充分发挥其育人价值。区域文化作用于大学生就业创业素养的培养，需要通过建设体验基地、传播平台和长效机制等，使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提升综合素养。因此，高校应主动对接泰山景区、博物馆、文化馆、融媒体中心、文旅企业、研学机构和基层单位，通过实习见习、行业导师、项目合作和岗位推荐等方式，把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和就业资源衔接起来。

由此，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的关键，就是把地方文化内容转化为学生可以理解、参与和内化的职业发展资源，从而提升就业育人的针对性和持续性。

五、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的实践路径

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需要落实到课程、实践、平台和评价等具体环节，使文化资源真正服务于学生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意识的提升。

泰山文化需融入就业指导课程。高校可在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等课程中设置相关

内容，将泰山文化中的责任意识、进取精神、诚信观念和地方发展意识转化为教学资源。例如，在生涯规划课程中引导学生树立长远目标，在就业指导课程中讨论岗位责任、职业诚信和职场适应，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结合泰山文旅、研学教育、文化传播等领域分析地方产业和就业机会。高校所在地文化与学生生源地文化差异会影响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接受和转化，高校应结合区域文化特点改进教育内容与方式[7]。因此，泰山文化进入课程，不应只是增加文化知识，而应服务于就业观念、职业能力和地方认同的培养。

高校还可以开发泰山文化主题的就业实践项目。高校可围绕泰山文化传播、文旅服务、研学课程设计、文化创意开发、地方新闻报道、短视频制作、社会调查等方面，组织学生开展项目化实践。对于文学、传媒、旅游管理、教育、设计、管理等专业的学生而言，泰山文化可以成为连接专业学习与职业能力训练的重要载体。学生在完成文案撰写、活动策划、产品设计、调研报告、影像制作等任务的过程中，能够提升信息搜集、语言表达、组织协调和问题解决的能力。

泰山文化既是教育资源，也连接着地方产业和岗位资源，因此建设校、地、企协同平台也是重要方法之一。高校应主动对接泰山景区、博物馆、地方融媒体中心、文旅企业、研学机构、非遗项目单位和乡村振兴等相关单位，建立稳定的实习见习、社会实践和就业合作渠道。合作不能停留在基地挂牌和短期参观层面，而应围绕岗位需求、专业培养和就业服务形成持续机制，由此地方高校可借助泰山文化资源和就业平台建设，引导学生认识山东的发展机会，增强留鲁就业、服务地方的意愿。

最后还应完善评价反馈机制。泰山文化融入就业育人不能只看活动数量和参与人数，还应关注学生在职业认知、就业能力、心理品质和地方认同方面的变化。高校可从职业规划质量、就业观念变化、实践项目成果、实习单位反馈、地方就业意愿、就业质量和岗位适配度等方面进行评价，并通过问卷、访谈、成果展示和毕业生跟踪反馈持续改进。区域文化对学生就业选择既有积极影响，也可能带来追求安稳、职业评价固化、缺乏冒险精神等消极影响。因此，评价过程中也应注意文化资源的积极作用和传统观念的局限，避免简单化理解。

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重点不在于增加文化元素，而在于把泰山文化转化为学生能够理解、参与和运用的职业发展资源，使学生在认识地方文化、参与地方实践和对接地方产业的过程中提升就业能力，形成更理性的就业观。

六、结语

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是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高校人才培养资源的重要尝试。它并不是对泰山文化进行一般性宣传，也不是在就业指导工作中简单增加地方文化内容，而是以泰山文化所蕴含的责任意识、进取精神、道德观念和地方认同感为基础，引导大学生在择业就业过程中形成更加理性、积极和长远的职业发展观。

泰山文化能够通过价值引导、文化认同、心理涵养、能力转化和协同育人等机制，作用于大学生就业观念塑造、职业素养提升和服务地方意识培育。高校应进一步推动泰山文化与就业指导课程、专业实践项目、校地企合作平台、就业主题教育和评价反馈机制相结合，使泰山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学生职业发展和高校就业育人工作。

当然，泰山文化融入高校就业育人仍需避免形式化倾向。高校在推进过程中，应立足学生职业发展需要，注重泰山文化资源与专业建设、岗位需求、地方产业和学生实践之间的有效衔接，使文化资源真正进入课程教学、实践训练和就业引导过程。只有这样，泰山文化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成长成才，也才能为地方高校提升就业育人质量、促进区域人才培养和人才留用提供更为稳定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王颖，李慧清．地域文化、制度环境与发展路径选择——高校学生毕业选择的区域比较 [J]. 当代青年研究，2015(01):101-106.

[2] 陈心迪．区域文化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影响研究 [J]. 人力资源管理，2016(07):17-19.

[3] 刘昕，丁子龙．依托区域文化推进高校就业创业教育工作——以齐鲁地区为例 [J]. 中国高校科技，2016(05):94-96.

[4] 何小青，姚俊．以区域文化基因提升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素养的路径研究 [J]. 职业技术教育，2017,38(02):47-51.

[5] 陈欣婷．以区域文化推动地方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以潮汕文化为例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07):103-104.

[6] 党金铭．山东省区域文化对人才流动的影响——与江苏省对比 [J]. 中国商论，2020(16):149-151.

[7] 陈彤．地域文化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影响机制与对策研究——以广东省民办高校为例 [J]. 科教导刊，2024(11):7-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6 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基于语料库的泰山文化海外传播话语研究与大学生文化认同培育”（26ZQ20024942）。

（作者单位：泰山学院）

社会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网络舆情的辅导员引导优化方案

蔡菲菲　郭真真

摘要：就业形势严峻，网络传播便捷，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方面的网络舆情频发。本文尝试优化辅导员对这类舆情的引导工作，分析舆情现状特征以及引导工作现存困境，从三方面提出优化路径：建立监测体系，搭建疏导平台，完善沟通机制。还辅以保障机制，涵盖制度规范、专业培训和家校社公益合作，此研究为辅导员精准应对这类舆情提供方案，引导大学生正确面对就业与心理压力方面的舆情，引导他们树立理性就业观和社会价值观念，维护校园和谐稳定。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网络舆情；辅导员；引导优化

当下，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大，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国家秉持“稳就业、保民生”政策导向，网络传播具备便捷性、情绪化特点，致使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相关网络舆情在社交平台和校园社群频繁涌现。这类舆情或许会加重学生焦虑情绪，影响就业选择，给校园治理和学生心理健康带来挑战，社会公益力量在就业支持、心理疏导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彰显。辅导员联通高校和学生，承担相关引导职责，立足社会视角探究舆情特征和传播规律，找出辅导员引导困境并非易事。探寻出融合公益资源的科学路径与保障机制，能够增强辅导员专业能力，减轻学生就业心理压力，拓宽学生就业视野，助力校园和谐与学生成长。

一、社会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网络舆情的现状特征

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网络舆情主要发生场景为社交平台和校园社群。这些舆情多为情绪化表达，常见就业焦虑吐槽，反映求职简历无回音、面试受挫等现实困境，还有大量关于心理压力的倾诉，流露出对未来迷茫与自我怀疑，部分舆情表现为对就业政策、行业规则的疑问与探讨，涉及对公益性岗位招聘、基层服务项目、求职补贴申请等问题的咨询与讨论，它们在网络空间传播构成这类舆情的核心情况。这类舆情遵循从个体到群体的扩散链路，单个学生分享易引发群体共鸣形成集中讨论，社会就业形势严峻、经济转型期行业波动、国家就业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因素会促使舆情发酵，使校园圈层话题扩散到公共网络空间，公益就业信息等正向内容易二次传播，焦虑类、质疑类舆情在算法推荐下扩大影响范围[1]。负面舆情影响学生心理状态，加重焦虑、削弱求职动力、引发人际交往问题，在极端情况下，负面舆情扩散影响校园稳定；正向舆情引导学生树立理性就业观、拓宽就业视野、关注社会价值，激励学生应对挑战，增强心理调适、承压能力与社会责任感。

二、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网络舆情辅导员引导工作的现存困境

（一）辅导员网络舆情引导的责任意识与重视程度不足

在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网络舆情引导上，辅导员的责任意识和重视程度不足。多数辅导员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学业管理、日常事务处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就业心理类网络舆情敏感度低，常将舆情引导视作学校宣传或就业指导部门的责任，还忽视与社会公益资源联动的意义。一旦校园社群、社交平台出现学生就业焦虑宣泄、心理压力倾诉、公益政策咨询等舆情信号，辅导员主动介入意识淡薄，大多处于“被动应对”甚至“视而不见”的状况，缺少提前预判、主动干预的积极性。这种重学业轻舆情引导的倾向，常使舆情初期化解的最佳时机被错过。

（二）辅导员应对就业与心理压力舆情的专业能力存在短板

实际上，辅导员在应对就业与心理压力舆情方面

专业能力存在短板，难以契合实际工作要求。在舆情预判上，多数辅导员缺乏对就业相关舆情传播规律的掌控，无法精确识别不同群体的舆情风险点，还漠视公益就业、基层服务等相关舆情；在压力疏导上，不少辅导员未掌握心理健康教育办法，学生因舆情产生焦虑、迷茫等情绪时，难以给予专业帮扶；在政策解读上，辅导员对就业政策、公益性岗位补贴、基层服务项目等内容领会不透彻，不能用易懂方式化解政策质疑类舆情[2]。高校针对辅导员的舆情应对专项培训稀缺，缺乏涵盖“舆情预判 + 心理疏导 + 政策解读 + 公益资源对接”的训练，致使辅导员面对复杂舆情时常常无计可施。

（三）辅导员舆情引导工作与学生实际需求的匹配度较低

辅导员开展的舆情引导工作与学生实际需求匹配度低，精准化解学生核心困惑难度大。当前引导方式单一，多以主题班会、线上通知、集体宣讲等形式开展，缺乏个性化、场景化引导载体，未结合社会公益资源设计活动。引导内容偏向理论化、通用化，着重就业技巧传授和宏观政策宣传，脱离学生求职心理痛点和实际需求，如农村生源对公益性求职补贴存疑，贫困学生需要低成本求职支持，理工科学生关注行业公益性岗位，艺术类学生探索文创公益项目等。“一刀切”引导模式未精准对接不同专业、不同就业阶段、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致使引导工作流于形式，难以缓解学生就业心理压力和舆情焦虑。

三、社会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网络舆情的辅导员引导优化路径

（一）强化辅导员舆情预判能力，构建就业心理舆情监测体系

辅导员牵头建立大学生就业心理舆情监测体系，覆盖核心场景，联动多方力量，重点监测社交平台、校园社群、求职交流群等场景。辅导员联合班级骨干、学生社团成员和公益组织志愿者组建三级监测小组，明确各层级监测职责与信息上报流程，建立日监测台账，对就业焦虑宣泄、政策疑问等各类舆情信号分类记录。结合不同群体就业压力差异细化监测重点，如农村生源关注“公益求职补贴”等关键词，艺术类学生关注“公益文创岗位”等话题，贫困学生关注“低成本求职资源”等相关言论；制定一般、关注、预警、危机四级分级标准，对连续负面言论等情况设定干预阈值[3]。建立学生就业心理动态档案，整合日常观察等信息，跟踪学生求职不同时期的心理变化；通过数据分析识别潜在舆情苗头，提前疏导，遏制负面舆情扩散，为科学引导提供数据支撑。比如，某高校辅导员组建监测小组实现对多起集中性焦虑舆情早期识别与干预，降低舆情发酵风险。

（二）创新辅导员引导方法，搭建线上线下就业心理疏导平台

辅导员打破传统单一引导模式，建立一个融合就业指导、心理疏导与社会公益的线上线下立体平台。线上利用学生常用的新媒体载体，推出就业政策解读、心理调适技巧、公益性岗位信息、基层服务案例等短视频科普内容，结合学生真实求职故事制作正向引导素材。以直播沙龙形式，邀请职场人士、心理专家和公益组织代表，围绕行业动态、压力管理、基层就业价值等主题为学生答疑解惑；针对目前就业环境复杂、学生求职目标偏高、理想与现实差距较大、心理问题产生原因复杂的实际情况，高校辅导员可以根据学生对移动端新媒体依赖性强的特点，充分开发新媒体渠道，全面拓展心理教育途径。例如，在学生的就业过程中，辅导员可以建立不同形式的微信群，分析学生在求职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将自身遇到的问题以不同视角展现出来，从而实现对不同心理问题的深度分析，从更加专业的角度给出意见。这样，不仅能够解决学生个体在心理层面出现的问题，还能够为其他学生提供有益的参考，引导学生提前做好准备，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最终达到高水平就业的目的[4]。

为帮助学生解决就业相关问题，在班级社群开设匿名交流专区，让学生在无压力环境中释放情绪、交流求职心得，还定期分享公益就业机会和补贴申请指南。线下结合不同专业学生就业特点和心理需求，开展场景化引导活动，如联合本地公益就业服务机构举办线下公益求职训练营、邀请职场志愿者分享基层就业经验；为艺术类学生设计公益文创项目实践活动并对接公益平台展示作品，为理工科学生搭建行业公益技术服务平台提供实践与就业对接机会。处理学生就业问题采用普遍性教育和个别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对舆情共性问题开展主题班会集中引导，对严重焦虑或求职受挫学生一对一约谈，联动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与公益心理热线为学生提供专业持续心理支持。实现共性问题集中化解、个性问题精准帮扶，部分院系采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激发学生参与、促进正向信息传播，扩大正向舆情传播、减少焦虑言论扩散，营造积极健康就业交流氛围。

（三）完善辅导员沟通机制，畅通学生就业心理诉求表达渠道

化解舆情矛盾要畅通诉求表达，这要求辅导员建立覆盖全场景、兼顾个性化需求与公益资源对接的常态化沟通机制。辅导员可通过日常谈心谈话、班级座谈会以及线上反馈小程序等，构建包含日常沟通、深度沟通、紧急沟通的交流模式，构建该模式时，要明确各类沟通渠道的回应时限与反馈流程，如学生通过

线上反馈小程序提交诉求后，24 小时内给出初步回应，3 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进展，涉及公益资源对接时及时联动相关组织跟进 [5]。针对不同群体特殊需求，辅导员调整沟通方式：对农村生源学生，主动讲解基层就业公益政策与补贴申请流程，消除求职成本顾虑；对贫困学生，对接公益求职补贴、免费就业培训等资源，提供低成本求职支持；对有基层服务意愿的学生，介绍公益组织合作项目与岗位信息。结合求职不同阶段学生的需求，辅导员调整沟通重点：准备期，收集职业规划诉求，对接公益职业测评资源；高峰期，针对面试受挫压力疏导需求，链接公益心理支持服务；签约期，关注违约风险与适应焦虑问题，邀请公益性岗位从业者分享适应经验。辅导员优化沟通技巧，采用倾听共情、理性引导方式，将学生诉求与就业信息对接、政策解读、心理支持、公益资源联动结合起来，形成“诉求收集—分析研判—精准回应—效果跟踪”闭环机制，确保学生诉求及时回应与有效解决，减少负面舆情产生。通过这些举措，辅导员能更好地满足学生求职需求，营造良好求职环境。

四、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网络舆情辅导员引导优化的保障机制

（一）健全辅导员舆情引导工作的制度规范与考核标准

高校要明确辅导员在就业心理舆情引导中的核心岗位职责，将舆情监测、研判、处置、反馈和公益资源对接等工作纳入日常工作体系。制定全流程工作规范，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把舆情响应速度、引导效果、学生满意度、公益资源联动成效等指标纳入年度考核并赋予合理权重，攻克就业指导量化考核难题。完善激励政策，对引导工作成效佳、学生认可度高的辅导员给予表彰奖励，将公益协同工作成果作为评优评先参考，以制度约束与激励，调动辅导员主动作为的积极性。

（二）加强辅导员就业指导与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培训

为弥补辅导员应对就业心理类舆情能力短板，建立“理论 + 实践 + 案例 + 公益对接”四位一体专项培训体系。在此体系下，定期开展就业政策解读、心理疏导技巧、舆情应对策略、公益资源整合等专题培训，邀请行业专家、资深辅导员、公益组织负责人分享实战经验。不局限于理论知识传授，模拟舆情场景开展实战演练，增强辅导员舆情预判、压力疏导、政策解读、公益项目对接等综合能力，鼓励辅导员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就业指导相关资质认证，提升专业水准。组织辅导员到公益组织参观学习，搭建经验交流平台，促进辅导员分享引导经验与典型案例，增强应对就业心理类舆情专业素养，更好地应对复杂就业心理类舆情状况。

（三）搭建家校社公益协同联动的大学生就业心理舆情应对网络

辅导员牵头构建校、家、社及公益组织联动的应对网络，汇聚舆情引导合力。校内，辅导员协同学生处、就业指导中心等部门，构建信息共享与联合干预机制，处理重大舆情。辅导员强化与家庭的常态化交流，引导家长理性看待学生就业问题，支持学生参与基层公益性岗位，缓解学生心理压力。辅导员主动对接公益心理机构、人力资源公益组织等资源，与他们构建长期合作关系，把公益就业指导、心理督导纳入常态化保障，为学生提供心理疏导、公益性岗位对接等服务，缓和舆情冲击，构建支持体系。

五、结语

社会视域下，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网络舆情引导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课题，此课题影响学生心理状态、就业机会等，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就业发展进程及社会价值实现程度。本文梳理舆情现状特点，剖析辅导员引导难题，构建“监测—疏导—沟通”三位一体优化路径与“制度—培训—协同”三维保障机制，把社会公益力量融入各方面，形成具有实践性与公益属性的引导方案。该方案提出要发挥辅导员在大学生就业与心理压力网络舆情中的引导作用，凸显就业指导、心理疏导和社会公益融合，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兼顾整体治理成效。未来，需关注就业市场、网络环境和政策导向变动，动态优化策略，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公益合力，助力大学生应对就业挑战、健康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1] 马赛，林孜，高雯，等 . 大学生就业焦虑心理干预路径探讨 [J]. 成才与就业 ,2025(S1):61-63,67.

[2] 王华芳，王慧 . 基于辅导员视角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及其心理调适策略研究——以山西工程技术学院学生为例 [J]. 福建轻纺 ,2025(08):57-60.

[3] 靳盼 . 新形势下高校大学生就业心理困境及解决路径探索 [J]. 科技视界 ,2023(07):94-96.

[4] 苏娜 . 高校辅导员开展大学生就业心理引导教育路径研究 [J]. 陕西教育 (高教),2022(06):69-70.

[5] 俞珺洺 . 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的分析及干预 [J]. 就业与保障 ,2021(08):31-33.

（作者：蔡菲菲，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儿童教育与发展学院助教；郭真真，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助教）

“新双高”背景下企业科教工作站驱动的校企协同创新模式研究

田云龙　张　蓓

摘要：针对“新双高”战略背景下当前产教融合面临的合作形式化、供需错位、长效协同机制缺失等困境，本研究聚焦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提出以“企业科教工作站”为载体的校企协同创新模式，在工业母机产业链典型企业建立实体化平台，构建“四维协同”运行架构，“一站式”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从“技术”与“人才”两方面破解产教脱节难题。本文详细阐述了“企业科教工作站”的内涵、功能与运行机制，并分析其推动产教融合从“浅层合作”迈向“共生发展”的逻辑关系，旨在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支柱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新范式。

关键词：新双高；企业科教工作站；校企协同创新；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

一、引言

我国产业结构正面临着快速升级，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对承担人才供给功能的高职院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教育部于2024年提出“新双高”战略，即“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1]，旨在引导职业院校从追求自身发展转向服务社会贡献[2]，从单一主体办学转向多元协同创新，从浅层产教融合转向深度共生发展。

“新双高”要求职业院校紧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支柱产业发展需求，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四链融合[3]。然而，在目前的产教融合实践中，仍普遍存在合作内容虚化、企业参与动力不足、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错位等现象，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协同机制[4]，从而制约了适应现代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

本研究以“新双高”战略为指引，聚焦湖北省“51020”现代产业集群和武汉市“965”产业战略中的高端装备重点领域，在调研区域装备制造业龙头企业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产教融合存在的痛点，创造性地提出以“企业科教工作站”为载体的校企协同创新模式，旨在系统探讨该模式的内涵特征、构建路径与运行机制，论证其在破解产教脱节难题、培养高技能人才、推动产教共生发展方面的价值，为产教融合深度改革提供一种思路和实践参照。

二、“新双高”战略对产教融合的内在要求

“新双高”战略并非对原有“双高计划”的简单否定或替代，其核心内涵体现在“办学能力高水平”与“产教融合高质量”的辩证统一与协同互促上[5]。

首先，“办学能力高水平”是基础。这要求职业院校不仅要在硬件设施、师资队伍、教学管理等传统维度上持续提升，更要在科研服务、技术研发、社会培训等“软实力”方面实现突破，为服务产业发展积蓄内生动力。一所办学能力高水平的院校，能够敏锐洞察产业技术变革趋势，并将其快速转化为教学内容和科研方向。

其次，“产教融合高质量”是核心。这要求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实现从“形式对接”到“内涵融合”的转变。具体而言，合作内容要从简单的顶岗实习、共建基地，向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资源、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共同培养师资团队等纵深领域拓展。融合深度要从“点对点”的项目合作，迈向“全方位、全链条”的共生发展。

最后，“新双高”实现了多重突破：（1）服务导向的突破：从服务院校自身发展的“自我完善”，转向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的“社会贡献”。（2）评价体系的突破：从以论文、课题等内部量化指标为主，转向以毕业生就业质量、企业满意度、技术转化率等社会贡献度为核心。（3）实施路径的突破：从职业院校“单一主体”的主动输出，转向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多元协同”的共建共享。（4）融合深度的突破：从初期的“浅层合作”，迈向资源共享、利益共赢、价值共创的“共生发展”。

三、企业科教工作站：校企协同创新的新范式

（一）企业科教工作站的内涵与特征

“企业科教工作站”是指在产业链典型企业中，以技术研发、工艺管理、工装设计、质量控制等核心业务为建站内容，集实践教学、技术研发、社会培训与成果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由校企双方共同运营的实体化协同创新平台（见图 1）。相较于传统的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企业科教工作站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 空间与内容的“植根性”：工作站以企业现场真实场景作为物理空间，以企业的真实项目、技术难题和典型工作任务为运行内容，教学成果直接服务于企业的真实需求，从源头解决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问题。

2. 功能的“集成性”：工作站是集实践教学、技术研发、社会培训与成果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平台。兼具“实践中心”“研发中心”和“培训中心”三重角色，使得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一体化运行。

3. 资源的“交互性”：工作站是校企资源双向流动的“枢纽”。企业的设备、项目与技术专家进入工作站转化为教学资源，学校的科研力量和青年教师进入工作站转化为企业的创新动能。这种交互使双方的资源被进一步盘活，实现了“1+1>2”的协同效应。

4. 网络的“系统性”：单个工作站是企业中的一个点，当在产业链上下游多家企业布局时，便构成覆盖产业的网络。该网络既可承载学校与单个企业的合作，也有利于促进企业间的技术交流和资源互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图 1 基于企业科教工作站的协同创新模式

（二）企业科教工作站的功能体系

1. 真实场景驱动的能力塑造平台

工作站具备“实践中心”的功能，依赖于工作站的“植根性”使实践内容来源于企业真实任务，保障了人才培养与产业技术同步，工作站的“交互性”使企业技术骨干以“实践导师”身份进入教学环节，学校教师通过参与企业任务更新工程知识储备，形成双向赋能，在两方面形成产出效益。人才层面，培养具备全流程综合能力的高技能人才；师资层面，进站教师实现向“双师型”的深度转化；资源层面，企业任务经教学化改造转化为模块化课程与项目化教材。

2. 需求导向的技术协同创新平台

依赖于工作站的“集成性”与“交互性”，使工作站具备“研发中心”的功能。集成性使研发与生产在同一空间并行，方案可在生产线上即时验证，缩短技术转化周期，交互性使企业投入需求与场景，学校投入智力与方法，学生参与方案验证，形成三方协同效应，破解学校科研与企业需求“两张皮”的困局，以企业一线技术难题为牵引，形成工艺优化方案、企业技术规范、专利等成果，并将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与课程内容，构建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

3. 辐射产业生态的技术推广平台

工作站也具备“培训中心”功能，该功能依赖于工作站的“系统性”与“集成性”。“系统性”使多点布局形成产业链培训网络，“集成性”使培训内容来源于研发成果与教学转化成果，确保与产业技术同步迭代。以工作站技术积累为支撑，面向产业链提供紧贴前沿的技术培训服务，输出技术培训与标准推广，同时扩大学校产业影响力，吸引更多企业加入协同网络。

三大功能彼此支撑、协同共生，通过实践培养的人才为研发注入力量，研发产出的成果为实践更新内容、为培训提供课程，培训推广的成效进一步拓展合作网络，形成自组织的功能生态循环。

四、企业科教工作站的运行模式与协同机制

企业科教工作站通过组织、项目、资源、制度四个维度的协同作用，回应当前产教融合面临的合作形式化、供需错位、资源分散三大困境，使合作关系从“项目化”走向“组织化”，使人才培养从“静态化”走向“动态化”，使资源配置从“分散化”走向“集成化”。

（一）“四维协同”运行架构

企业科教工作站的运行模式可以概括为“四维协同”，即以组织架构为基础、以项目运行为主线、以资源整合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根本，四个维度相互嵌套、协同驱动，共同构成工作站高效运转的系统框架。

1. 组织架构：共建共管的实体化平台

工作站遵循“共建共管、双向赋能”原则，人员实行“固定 + 流动”弹性配置，固定人员包括学校派驻的骨干教师和企业技术专家，流动人员包括在企业深度锻炼的教师、参与项目的学生、临时攻关小组。角色定位上，教师为“双师型”，工程师为“实践导师”，学生为“准员工”。

2. 项目运行：任务驱动的业务链条

企业科教工作站以项目为核心驱动，并行推进人才培养项目与技术创新项目，使二者在同一平台内交叉运行、协同发力。

在人才培养项目中，依托工作站，提供植根于核心业务环节的固定学习场所和持续的真实任务，实现在双导师指导下直接参与产品研发、工艺编制等真实工作，即可随时进入“边做边学”的培养链条，围绕典型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进阶式项目模块，使学生在完整过程中积累解决复杂现场问题的工程经验。解决传统学徒制、现场工程师等项目因缺乏稳定企业教学载体而导致的“工学交替不连贯、岗位学习碎片化”问题。技术创新项目以解决企业一线技术难题为目标，教师、工程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研发方案在生产线上直接验证迭代，形成的工艺优化方案、专利等成果通过知识产权共享机制实现转化，显著缩短从“技术”到“产品”的距离。

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项目深度交织、双向赋能：一方面，学生以技术创新项目为载体进行高阶技能锻炼，在真实研发中提升系统思维与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创新项目的攻关过程、技术规范被系统开发为教学案例、项目化教材和课程标准，持续反哺人才培养内容，使教学与产业技术发展同频共振。由此，技术创新项目成为人才培养的“高阶训练场”和“内容更新源”，人才培养项目则为研发注入力量，共同形成“研育互促”的动态循环。

3. 资源整合：资源流通的共享机制

工作站肩负着校企资源双向流动的枢纽作用。学校教师和企业工程师在工作站实现身份互换，变成“编外工程师”和“兼职教师”，学校科研平台和企业生产设备进行相互共享，校企之间互通有无，企业实际项目转化为教学案例，学校科研成果转化助力企业技术攻关。基于以上资源共享方式，构建起“教育—科技—产业”三角互促的生态系统。

4. 制度保障：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

构建利益分配、绩效考核、动态退出、风险共担四类核心制度，以明确知识产权成果归属与收益比例，将教师进站工作时长纳入职称评审考核体系，将企业工程师指导工作量纳入其绩效考核，并定期对企业、教师进行评估，不达标者予以警告或退出。此外，凭借保险与三方协议规避安全风险，约定共同承担研发失败带来的风险。这套制度体系的核心是“激励相容”，使校企双方的目标趋于一致，推动价值共创。

（二）运行模式对产教融合困境的破解逻辑

依靠实体化组织架构和激励相容制度破解合作形式化的问题。将校企合作关系提升到组织层面，利益分配和风险共担机制提供了稳定的信任基础，使合作从短期行为转向长期战略，使校企合作关系更加牢靠。

依靠项目驱动的动态响应系统，破解供需错位的问题。将企业真场景、真任务转化为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场景中打磨技能，以技术创新项目使学生接触产业前沿，培养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同时，教师通过进站可以优化教学模式和方式，形成教学—实践—研发再回归教学的闭环，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依靠实体平台将学校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场景焊接在一起，破解资源分散的问题。把技术创新项目作为资源整合的引擎，企业投入需求，学校投入能力，学生投入活力，三方围绕项目进行协同创新。企业技术难题得到解决，院校课程资源得到补充，学生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实现了三方受益。

五、结论与展望

企业科教工作站凭借其“植根性”“集成性”“交互性”和“系统性”特征，能够承载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方面的诉求，有效解决产教融合中合作形式化、供需错位和长效机制缺失等困境。通过“四维协同”运行架构，推动校企合作从项目合作到组织共生、从静态培养到动态响应、从各自为政到价值共创的转变。以企业科教工作站为驱动的协同创新模式，为破解产教融合深层矛盾、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共生发展提供了参考范式，以适应“新双高”对产教融合的新要求。

展望未来，在推广企业科教工作站的协同创新模式中，需进一步细化“四维协同”中各项制度的实施细则，并充分调动产教联合体、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形成更加坚固的企业科教工作站系统网络，形成共建共享合力，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对企业科教工作站的运行进行监督评价，持续推动模式进一步优化。

参考文献

[1] 赵昕，高鸿．如何理解与践行“新双高”建设的“新”与“高”[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05):61-69.

[2] 孙辉，廉月芳，朱配辰．面向高水平办学能力高质量产教融合的新“双高”建设转型——2024 年职业教育“双高计划”研究与实践新进展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02):55-62.

[3] 祝鸿平，俞佳飞．教育强国背景下的职业教育人才竞争力 [J]. 教育学展望，2025(06):26-35.

[4] 白逸仙，王华，王珺．我国产教融合改革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 103 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J]. 中国高教研究，2022(09):88-94.

[5] 关琳．从“双高”到“新双高”：建设内涵、发展逻辑与实施路径 [J]. 职业技术，2025,24(05):9-15.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湖北省中华职业教育社 2025 年度课题研究项目“‘新双高’背景下以企业科教工作站为载体的校企协同创新模式研究”（HBZJ2025302）。

（作者：田云龙，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武汉开放大学〉讲师；张蓓，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武汉开放大学〉副教授）

基于立德树人背景下中职学生厌学的消极心理矫正路径

张利轩

摘要：立德树人是中职教育的根本任务，而学生厌学消极心理是制约育人质量、阻碍学生成长成才的突出问题。中职学生厌学并非单纯的行为懈怠，而是认知偏差、情感缺失、意志薄弱、环境影响共同作用的心理问题，既违背立德树人的育人初衷，也影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成效。本文立足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剖析中职学生厌学消极心理的核心成因与典型表现，构建贴合中职教育场景、具备实操价值的心理矫正路径，兼顾心理疏导与德育引领、个体矫正与环境优化，为破解中职厌学难题、培育积极学习心态、落实立德树人使命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立德树人；中职教育；厌学心理；消极情绪；矫正路径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育技术技能人才、传承工匠精神、服务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新时代职教高质量发展，既要狠抓技能培养，更要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育人与育才有机统一。中职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期，心智不成熟、自控力偏弱，叠加中考失利、学业基础薄弱、社会偏见等多重压力，极易滋生厌学消极心理，这类问题并非单纯的行为抵触，而是集认知偏差、情绪低落、行为逃避于一体的综合性心理问题，不仅会引发课堂散漫、旷课逃学等违纪行为，还会加剧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阻碍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甚至增加辍学风险。以往的厌学矫正多局限于心理辅导或纪律管束等，忽视了职教特色优势，割裂了知识教学、技能实训与心理建设的联系，矫正效果短暂且难以根治。立德树人背景下，中职学生厌学心理矫正必须标本兼治，将心理疏导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依托职教实践性强的特点，用实用的教学内容消解学习迷茫，用人文关怀化解负面情绪，实现从厌学向乐学、从自卑向自信的转变。本文立足中职学校育人实际，紧扣职教教学与心理矫正融合思路，探究科学可行的矫正路径，破解厌学难题，夯实育人根基。

一、中职厌学消极心理核心分析

（一）厌学消极心理典型表现

中职学生厌学消极心理并非单一情绪，而是由认知、情感、行为共同构成的负面状态，具有渐进性、隐蔽性、传染性等特点。在认知层面，学生普遍存在学习无用论、自我否定、目标缺失等问题，认为中职学历无价值、学习内容无意义，对自身能力缺乏认可，看不到学业与未来职业发展的关联，缺乏学习动力与长远规划。在情感层面，多表现为焦虑、自卑、抵触、麻木，部分学生因基础教育阶段成绩不佳，长期遭受否定与歧视，进入中职后仍深陷自卑情绪，对学习产生恐惧与厌恶；还有学生因缺乏情感关怀，对课堂、教师、学校产生抵触心理，将学习视为负担。在行为层面，主要体现为课堂走神、睡觉、玩手机，不交作业、抄袭作业，逃避考试、旷课逃学，甚至沉迷网络、结交不良同伴，彻底放弃学业。

（二）厌学消极心理核心成因

中职厌学消极心理的形成，是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多方因素叠加的结果，核心是德育引领缺位、心理关怀不足、育人导向偏差。

个体层面，部分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薄弱、自我调控能力不足，缺乏正确的学习观念与责任意识。部分中职学生文化基础需巩固，面对专业课程与技能训练时可能产生畏难情绪，需要教师引导。同时，部分学生缺乏人生目标，价值观出现偏差，贪图安逸享乐，忽视学习的重要性，缺少主动进取、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违背立德树人所倡导的修身立德要求[1]。

家庭层面，家庭教育缺失或教育方式不当，是诱发厌学心理的重要因素。部分家长对孩子期望值过低，认为孩子进入中职只是混文凭，疏于管教、放任自流；部分家长教育方式粗暴，一味指责打骂，不关注孩子心理状态，加剧孩子自卑与抵触情绪；还有家长忙于工作，缺乏陪伴与沟通，孩子得不到情感支持，内心孤独迷茫，进而逃避学习。家庭德育缺位，未能培养

孩子的责任担当、吃苦耐劳等品质，进一步加重厌学倾向[2]。

学校层面，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融合不足，教学与管理方式存在短板。部分中职学校重技能传授、轻品德培育，重课堂讲授、轻心理疏导，立德树人工作流于形式，未能贴合学生心理特点开展针对性教育。教学内容陈旧枯燥、教学方法单一死板，与学生认知水平、职业需求脱节，难以激发学习兴趣；教师对厌学学生缺乏耐心与关怀，多采用批评惩罚的方式，忽视心理疏导，加剧师生隔阂。此外，校园德育氛围淡薄，缺少励志教育、感恩教育、职业理想教育，无法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3]。

社会层面，不良社会风气与职业教育偏见误导学生价值取向。社会上存在“重普教、轻职教”的偏见，将中职生贴上“差生”的标签，打击学生自信心；部分网络不良信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潮侵蚀学生思想，让学生觉得读书无用，不如尽早打工赚钱。社会德育引导不足，对工匠精神、劳动精神的宣传力度不够，未能营造尊重职业教育、崇尚技能学习的良好氛围[4]。

（三）立德树人与厌学心理矫正的内在关联

立德树人的核心是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旨在培养品德高尚、身心健康、积极进取的合格人才，与厌学消极心理矫正目标高度契合。矫正厌学心理，本质上是帮助学生破除负面心态、重塑健全人格、树立正确三观，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德育引领是矫正厌学心理的根本抓手，通过理想信念教育、责任意识培养、工匠精神培育，能帮助学生明确学习意义，激发内在动力，从根源上消除消极心态；另一方面，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是学生接受德育、主动学习的前提，只有化解自卑、焦虑、抵触等负面情绪，才能让学生主动接纳教育引导，真正做到崇德向善、勤学笃行[5]。

二、立德树人背景下中职学生厌学消极心理的矫正实践路径

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针对厌学消极心理的成因与表现，坚持“德育引领、心理疏导、多方联动、标本兼治”的原则，构建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发力的矫正路径，兼顾心理干预与品德培育，注重实操性与长效性，切实破解厌学难题。

（一）破除认知误区，激活内生动力

摒弃大而空的德育宣讲，把德育内容拆解成微型课堂、日常互动，贴合中职生认知水平与心理特点，直击“读书无用”“自我放弃”等核心错误认知。每周开设 1 节微型德育课，时长控制在 20 分钟以内，不讲空泛理论，聚焦技能成才真实案例、本校优秀毕业生就业创业事迹、一线劳模从业经历，用接地气的故事让学生看清学业与职业发展的直接关联，破除学历偏见与自卑心态。日常教学中，教师结合专业课渗透责任教育，比如实训课强调操作规范、工匠精神，文化课融入诚信、坚持等品质，把德育和学习行为绑定。

开展分层目标引导，放弃统一化要求，帮助厌学学生制定微小、可达成的学习目标，比如一节课记住三个专业术语、完成一道基础习题、认真听讲 15 分钟，完成目标及时给予口头表扬、积分奖励等正向反馈，逐步积累成就感。建立学生闪光点台账，重点记录厌学学生的进步、特长与闪光点，每周在班级内公开表扬，打破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树立自尊自信的心态，从内心接纳学习、主动参与学习。

（二）分层精准辅导，化解消极情绪

建立厌学心理筛查分级机制，开学初通过心理健康量表、班主任日常观察、任课教师反馈，将厌学学生划分为三类，实施差异化干预，杜绝“一刀切”。一类为轻度厌学：表现为课堂走神、偶尔不交作业，无明显抵触情绪，由班主任负责，每周开展 2 次一对一谈心，时长 10—15 分钟，倾听学生烦恼，疏导学习压力，指导制定简单学习计划，全程以鼓励、引导为主，不批评、不指责。二类为中度厌学：表现为频繁逃课、作业长期不交、抵触课堂，存在明显焦虑、自卑情绪，由专职心理教师接手，每周开展 1 次专项心理辅导，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纠正“我学不会”的错误思维，配合放松训练、情绪日记等方式，缓解负面情绪，同时搭配学业补差，补齐基础短板。三类为重度厌学：表现为长期旷课、拒绝入校、有辍学念头，伴随严重心理问题，学校联合家长、校外专业心理机构开展联合干预，制定个性化辅导方案，同步暂缓学业压力，先修复心理状态，再逐步回归课堂。

配齐标准化心理咨询室，保证私密、宽松的辅导环境；设立固定心理咨询时段，推行匿名预约制度，消除学生顾虑。每班设立心理委员，经过专业培训后，实时观察同学的情绪状态，发现有厌学、消极情绪及时上报，做到早发现、早介入。同时，教师全员参与心理辅导，严禁体罚、言语羞辱厌学学生，改用温和沟通的方式，建立信任的师生关系，让学生愿意敞开心扉，主动配合矫正。

（三）降低学习门槛，提升课堂吸引力

针对中职生文化基础薄弱、厌烦纯理论学习的特点，彻底改革课堂模式，推行“低起点、小步子、多实操、勤反馈”的教学方式，根除因听不懂、学不会导致的厌学。理论课精简内容，舍弃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只讲解岗位必需、考试必考的核心内容，每节课理论讲解不超过 20 分钟，剩余时间用于课堂练习、小组讨论、案例拆解。专业课全力推行理实一体化教学，把教室搬进实训车间，多用项目式、任务式教学，比如汽修专业拆解简单零件、护理专业练习基础操作、计算机专业完成简单文档制作，让学生动手实操，在

实践中掌握知识，摆脱枯燥听课的疲惫感。

实施分层教学与弹性作业，针对不同基础学生布置差异化任务：基础薄弱的厌学学生，只布置基础题、简单操作任务，保证能独立完成；中等生完成基础 + 少量提升任务；优等生附加拓展任务。作业量严格控制，杜绝题海战术，文化课作业时长不超过 30 分钟，专业课以实操任务为主。建立课堂实时反馈机制，用提问、小测、实操展示等方式，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对跟不上进度的学生，课下单独补差，不让一名学生因掉队而放弃学习。优化课堂纪律管理，用趣味互动、小组竞赛代替严厉训斥，维持课堂秩序的同时，保护学生学习积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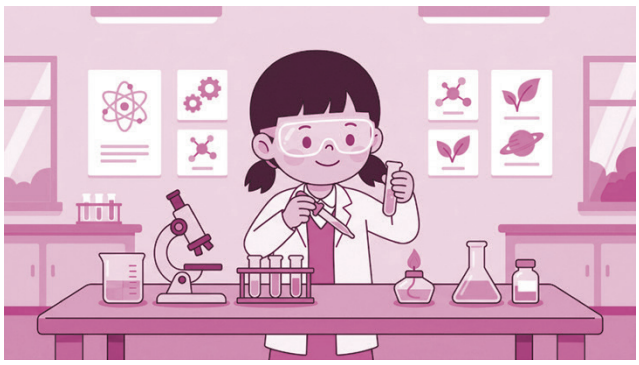
（四）家校协同务实化，筑牢矫正根基

杜绝形式化家长会、空洞的通知，构建务实高效的家校沟通机制，让家庭教育成为矫正厌学心理的有力支撑。每学期开展两次针对性的家长培训会，不讲空泛理论，重点讲解中职生心理特点、厌学信号识别、居家学习辅导方法、亲子沟通技巧，纠正家长“混日子”“放弃管教”的错误观念，引导家长正视孩子的自身价值，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建立一对一沟通台账，班主任每月至少和厌学学生家长沟通两次，如实反馈学生在校表现、进步与问题，不夸大、不偏袒，同时了解学生居家状态、家庭氛围，共同分析厌学根源。

给家长提供可执行的居家辅导细则，要求家长做到：不打骂指责孩子、不频繁拿孩子和他人对比、每天抽出 15 分钟和孩子谈心、督促孩子规律作息、杜绝沉迷手机网络、鼓励孩子点滴进步。对于家庭教育缺失、教育方式不当的家庭，班主任单独上门沟通、一对一指导，帮助改善家庭氛围。针对厌学严重的学生，建立家校每日报备制度，家长反馈孩子居家状态，学校反馈在校表现，实时调整矫正策略，形成校内校外一致的教育节奏，避免校内严管、家中放任的脱节问题。

（五）育人氛围常态化，巩固矫正成效

打造崇德尚学、包容友善的校园氛围，摒弃歧视、排斥厌学学生的风气，用正面环境引导学生转变心态。校园宣传栏、广播站、黑板报定期更新技能成才故事、学生进步事迹、学习方法技巧，少用生硬标语，多用温情励志内容。开展贴合中职生兴趣的校园活动，比如技能小比拼、文体活动、兴趣社团，避开高强度竞争，让厌学学生也能参与其中，获得成就感与归属感，远离手机、网络等不良诱惑。



整治校园周边不良环境，联合家长、社区，引导学生远离不良社会青年、低俗网络信息，开展法治教育与网络素养教育，教会学生辨别是非、抵御诱惑。在班级内营造互帮互助的学习氛围，组建互助小组，安排耐心、成绩稳定的学生帮扶厌学同学，不孤立、不排挤。建立长效监督复盘机制，每月对厌学学生矫正效果进行评估，调整路径方法，对出现反弹的学生，及时加大干预力度，防止消极心理复发，让学生长久保持积极学习状态。

三、结语

中职学生厌学消极心理是制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影响职业教育育人质量的突出问题，其成因复杂、影响深远，必须坚持德育与心理疏导相结合、个体干预与环境优化相结合，才能实现标本兼治。在立德树人背景下，矫正厌学消极心理，核心是回归育人本源，既要化解学生自卑、焦虑、抵触等负面情绪，重建学习信心，也要培育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责任意识与进取精神，实现身心健康与品德提升的统一。通过强化德育引领、精准心理疏导、优化教学管理、深化家校协同、营造良好氛围，能够有效破解中职厌学难题，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帮助学生摆脱消极心态，成长为品德高尚、技能精湛、身心健康的技术技能人才。

未来，中职教育要进一步深化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融合，创新育人模式，补齐心理教育短板，破除各类消极因素的影响，让每一位中职生都能树立积极学习心态，实现全面发展，为社会输送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1] 尹玉辉 . 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分析——基于 2017 年全国中职学校学生发展状况调查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9(22):27-34.

[2] 李秀英 . 中职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疏导与干预策略 [J]. 职业技术教育 ,2010,31(14):93-95.

[3] 石爱珍 .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心理健康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探索 [J]. 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09):170-172.

[4] 郭艳 . 中职生心理健康现状及教育对策 [J]. 发明与创新 (初中生),2018(11):47.

[5] 孟万金 . 构建中国自主的职业院校积极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体系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3(10):5-12.

（作者单位：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的探索

伍　静　胡　琳　孙海荣　吴雯雯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也为高校劳动教育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与战略方向。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其劳动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本文旨在探讨将新质生产力理念融入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通过将劳动教育与学生的能力培养、人文素养及科学精神培育深度融合，可有效提升其认知能力、创新思维与从业本领，从而服务于学生个体成长与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深化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改革、拓展其深度与广度，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劳动教育；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一、引言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度提及“新质生产力”，主张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新质生产力以新技术、新经济和新业态为主要内涵，是推动全面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也就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劳动教育作为实现创新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上大有可为。高校教育是人才培育的关键所在，新时代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2]。高校教育必须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结合，通过加强劳动教育，培养更多适应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高素质劳动者，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二、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与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关系

生产力的主要概念重点在于人们合理运用自然并且能够改造自然以及与自然相处的能力，在这个概念里，除了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以及劳动者等主要要素之外，还有一些类似于科学知识之类的创新要素。生产力有着客观性、历史性、社会性和属人性，这也标志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能力范围，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由落后转为先进，“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3]。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去看劳动教育，能够给高职院校的教育体系带来一定影响，甚至会形成颠覆性改变，让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出现“质变”，而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也积极响应，推动新质生产力更快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价值理念的“质变”

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劳动者起着主观能动作用。劳动者是人，可并非所有人都是劳动者，需是有一定生产经验、知识以及劳动技能的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是主体，能动性最强，还起主导作用。新质生产力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更高形态，所以对于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新质生产力包含着绿色生产力的重要维度，主要着力于经济及生态效益双发展，其重点放在绿色低碳发展，希望能够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也代表着新质劳动者要抛弃“为利益劳动”的想法，要将思维转变为追求绿色发展，成为有生态劳动观念和能力的“生态人”。当下有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这也意味着社会对于高素质新质劳动者的需求日益增长，高职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需要培养更多素质高、能力强、技术硬的新质劳动者。这也促使高职院校要承担更多与之相关的专业教育，其劳动教育也需要考虑到培养新质劳动者的要求，创新劳动教育价值理念，努力培养学生的前瞻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让这些学生能够自觉承担起社会劳动责任，成为能够在绿色可持续社会发展中从事劳动活动的新质劳动者。

（二）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践行方式的“质变”

劳动资料又叫作劳动手段，是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物质资料及物质条件，它的主要核心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中介，也是衡量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标尺。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4] 所以新质生产力最为直接的标识就是劳动资料的“骨骼”和“肌肉”——先进生产工具不停地被发明和运用。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凭着创新的技术重新改造劳动资料，推进劳动资料智能化发展，让生产工具从“弱智能阶段”向“强智能阶段”逐步转变，这种新质劳动资料的变化，也让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的形式随之改变，运用更多的智能技术为学生带来积极的作用，让同学们学习到更多智能技术运用的能力以及创新劳动的能力，丰富了学生对于劳动工具的认知，持续推进新质劳动资料的发明和使用。

（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形式内容的“质变”

劳动对象，指的是人们靠自身劳动去加工的那部分物质资料，加工完需具有使用价值，能满足社会需要。劳动对象的质与量直接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新质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这里面不但有没加工的自然物和加工过的物体，还得有通过新技术探索发现以及复杂加工后出现的新原料，这些种类繁多、虚实皆有的劳动对象，对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生产效率等意义重大，能大幅提高生产效益。

总之，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人类在实践方面不断进步，劳动对象逐渐往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这一定会让劳动形式发生改变，随之影响劳动教育内容的重新组合。所以，为了能适应劳动对象质变的规律，高职院校需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及时更新劳动教育内容。

三、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教育者观念滞后，院校重视程度不够

当前，新质生产力主导下各领域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的飞速发展，对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部分高职教师并未认识到数字、智能、虚拟等新兴劳动形式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不认同相应的劳动形式；还有部分教师只关注专业知识本身，缺乏与劳动教育相关的实践经验，缺乏将劳动教育融入专业课程的知识和技能，也就忽视了劳动教育的价值和实践技能的培养。

新时期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需要积极适应技术变革，以新科技、新理念、新方法为遵循，多学科交叉融合，摸清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劳动教育的新规律。而我国高职院校在发展进程中，办学模式、专业设置、教育模式等方面对普通大学的模仿程度较高，故而对劳动教育缺乏重视，认为其只是单一的技能训练，不需要开发相应资源，进而忽视了劳动教育在培养学生认知、能力、习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劳动教育协同力度不够，人才供需失衡

劳动教育作为高职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强调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劳动教育体系具有鲜明的协同性和系统性，需要明确和夯实各级党委、各行政部门、各二级教学单位、全体教师、教辅人员、专职辅导员和班主任的主体责任，建立和健全行之有效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不断提高全员协同育人的自觉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协同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劳动教育应当统筹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育人资源，充分发挥课程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网络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组织育人等协同运作同行同向发力的独特优势和强大功能，努力形成各种教育资源全要素同行同向作用的合力和协同效应。新质生产力的出现，需要与之匹配的高技能专业人才的供给，这要求高职院校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能力、创造意识和劳动精神的人才。当前，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明确是高职院校劳动教育效果不佳的核心问题，其具体表现在高技能人才的供给和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近年来，高职院校大学生就业陷入“慢就业”“懒就业”甚至“不就业”的怪圈中，此类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在校学习过程中更多的是学习专业知识，缺乏劳动教育的指导和正确就业观的树立。劳动教育对于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应当把握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追求劳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一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适应社会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三）劳动教育资源匮乏，配置效率低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5] 随着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迅猛发展，新质生产资料不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对象的范围也不断扩大，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资源相应得到了不断创新和丰富，为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为高职院校劳动教育体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机遇。但我国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部分学校并未重视，未将其作为核心课程体系的一部分，而仅仅将其作为附加课程之一，并未将实体形态和非实体形态的劳动教育内

容相融合，劳动教育的内容未得到合理拓展。在师资力量、实践场所等方面更是缺乏投入，进而对人才市场的需求也未能精准把控，还在以传统的、片面的思维方式理解劳动教育的培养目标，只注重“物质财富”而忽略了“精神财富”，大大影响了劳动教育效果的达成。

综上，新质生产力为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体系注入了新活力，拓展了教育的维度。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仍采用观念滞后、资源不均、与新质生产力严重脱节的形式开展，严重影响了新质生产力对高校劳动教育的实际效用。因此，高职院校劳动教育迫切需要结合市场新业态调整教育内容，加快引入新产业、新模式、新技术的步伐，建立健全劳动教育和市场联动机制势在必行。

四、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发展路径

（一）树立先进人才培养观念，巩固劳动教育地位

教育与劳动实践相结合，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一直以来国家将劳动教育纳入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更加巩固了劳动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门应加大对高职院校的经费支持，为新技术、新理念、新方法进校牵线搭桥，推动劳动教育的发展，巩固劳动教育的地位。

当前社会功利主义思潮泛滥，躺平、享乐、拜金等消极理念冲击并扭曲着大学生的“三观”，误导着大学生对劳动的认知，使部分学生产生了诸如“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等消极思想。在此境况下，高职院校应迅速建立反应机制，精准把握劳动教育的价值方向，积极关注学生的思想状况，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其以独立正确的认知能力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

（二）发挥高校主导作用，打造劳动教育新体系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科学技术，培养具备高素质、高技能的新质劳动者成了目前高职院校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新质生产力的构建进程之中，其关键要素就是数据以及技术。新质生产力以数字产业、智能行业、技术平台等新的生产模式，将各类智能化、数字化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劳动形态。与此同时，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应该将数字劳动和智能职业、技术平台这些要素进行明确，推进数智化劳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将劳动实践场所优化好，为学生提供能够沉浸式学习实践的智慧学习环境，加强学生智能化劳动知识的学习，让劳动教育更吸引人，进一步提高教育活动的吸引力。

（三）多主体协同创新，凝聚育人新合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劳动教育不仅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课程，更是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灯塔作用的人生必修课。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当与时俱进，整合多方育人资源，着力构建劳动教育课和专业课、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校内和校外教学、家庭和社会教育、线上和线下教学、教学与管理和服务育人同行同向发力的协同机制；另一方面，产教融合体的建设不是口号，应当积极响应市场需求，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加快构建能够适应并服务于现代产业体系的劳动实践教育，引领高职院校学生在了解最新产业发展动态的基础上，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增强自身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自我就业热情。

五、结语

新质生产力催生劳动者的升级和转型，新质生产力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离不开劳动教育新体系。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构建劳动教育的育人体系要以全员“导师制”或“双师制”的创新实践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将劳动教育的实践要求和目标指向、本质性内涵和主体性责任真正落到实处，为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充分而必要的制度保障，为高等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充分而必要的人才保证和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　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 [N]. 人民日报 ,2023-09-10(01).

[2]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N]. 人民日报 ,2019-03-19(01).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7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9:96.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5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9:210.

[5]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01).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涉农高职院校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劳动教育实践路径研究”（2024SJSZ0778）。

（作者单位：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轻量级数智赋能：高校心理工作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探索

马　静

摘要：针对高校心理工作数字化转型中“重建设轻应用”“专业人员不足”“经费有限”等现实困境，本研究旨在通过 Python 技术构建一个切实可用的“轻量级数智赋能”心理预警与干预协同系统。该系统通过轻量化技术实现“现有数据整合→智能预警生成→精准干预跟进→数据反馈优化”的闭环运转，完成从数据采集、风险预警到干预响应的端到端流程。在四川工商学院 200 名学生中开展 3 个月试点运行，结果显示：每日预测完成时间平均值为 23.8 分钟，无故障运行率为 98.7%，召回率为 89.1%，成功识别 2 例高风险个案，避免危机事件发生。研究表明，本次试点的轻量化路径实现了“低成本、快落地、高适配”的转型效果，该技术路径可在低投入条件下实现心理工作模式的系统性重构，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方案。

关键词：高校心理工作；数字化转型；轻量级数智赋能

一、引言

近年来，高校学生的心理问题呈现成因复杂、类型多样、发展迅速的态势。常见心理问题主要分为：

抑郁与焦虑：面临学业压力、就业压力、情感问题等，当代大学生容易陷入焦虑状态，严重的发展成抑郁症或焦虑症。

适应困难：许多学生从高中迈入大学，对管理体制和学习模式都需要一个快速的适应过程，尤其是父母包办过多的家庭，进一步增加适应的难度，延长适应的周期。

社交障碍：个别学生性格突出，内向、冲动或者自我，不知道如何融入集体，化解矛盾，容易自我否定，甚至出现回避型社交。

自我迷茫：在当代多元化的评价下，许多学生无法清晰地认识自己，容易出现“内卷”状态，进而感到自我迷茫，或者因找不到奋斗目标而空虚。

很多学生有了心理困惑，因为怕被贴标签而不敢敞开心扉，寻求帮助，因此加剧心理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强的隐蔽性和越来越高的突发性，让传统心理量表和人工观察的模式难以满足实际需求 [1]。

本研究提出“轻量级数智赋能”理念，通过构建一个专业心理预警与干预协同系统，旨在解决上述难题。所谓“轻量级”，体现在：技术选型开源生态，选用 Python 开发工具，避免了高昂的软件成本与维护费用，单机部署，减少了对基础设施的依赖。

二、轻量级数智赋能的框架与路径

（一）技术框架

本研究的心理预警与干预协同系统不追求构建大而全的管理平台，而是聚焦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分析预警，发现其中的隐藏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干预 [2]。系统通过导入学生的日常行为数据，如考勤、消费、网络使用等，然后清洗处理，接入机器模型预测学生的心理风险等级，最后在可视化 Web 界面上显示。

系统采用分层设计思路，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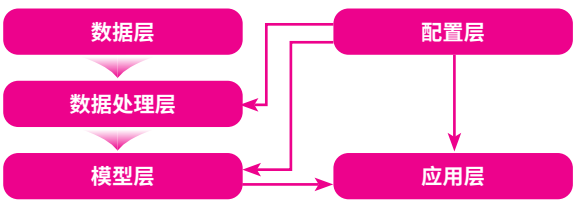


图 1 分层框架

如图 1 所示，整个系统大体分为五个层次：

配置层：统一分配参数，为数据处理层、模型层和应用层提供阈值、规则等，方便修改。

数据层：收集学生的日常行为数据，包括考勤信息、消费行为、图书馆访问记录、网络流量使用情况等，为后续数据处理和模型训练提供基础。

数据处理层：数据的有效性处理，将数据进行分类、清洗、格式化，转化成适合模型输入的数据。

模型层：使用机器模型进行训练，并根据输入数

据对每日行为进行心理预测，并分级预警。

应用层：提供可视化界面，将预测结果利用 Web 界面进行显示。

（二）实施路径

为了适合高校信息部门自主掌握，该心理预警与干预协同系统的实现技术选型紧扣校园场景，注重实用性、小体量、非高并发和易维护特点，设计了实现方案。

数据处理选用 Python + Pandas 的模式进行，语法简洁易懂。由于系统的核心数据是结构化表格数据，选用 Pandas 库可以对数据进行快速清洗，比如缺失值填充、异常值处理、列选择等，还能方便地进行特征构造、特征筛选，让模型更容易捕捉数据规律，与后续的训练模型无缝对接。

机器学习选用随机森林分类器。由于心理风险预警的需求是不仅要预测风险，还要知道为什么是高风险，而随机森林输出的特征重要性恰好就能明确地告诉用户，什么行为对风险预测的影响更大，对比神经网络，随机森林的决策更为透明。心理问题的成因并不是单一存在的，学生的各种行为也会有交叉影响，比如，缺勤率高 + 社交下降就比单一的缺勤率高风险要大，而对比逻辑回归等简单模型，随机森林更能捕捉这些特征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3]。另外，它的训练时间短，非常适合每日的批量预测。

Web 框架选用 Flask，这是一款轻量级的 Python Web 框架，对比 Django，它并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结构，简单几行代码就能启动 Web 服务。占用资源少，不会增加校园服务器的负担。如果我们后续需要增加功能，可以通过插件快速扩展。如果需要展示预警数据，还可以通过传递 Python 变量到 HTML 快速实现。

为了实现简单的可视化看板，选用原生 HTML + Bootstrap 实现。Bootstrap 组件可以直接结合 Flask 模板传递的动态数据，进行快速显示。现成的组件库（卡片、表格、按钮、徽章），根本不需要手写 CSS 样式，也不需要安装 Node.js、Webpack 等复杂工具，部署难度也大大降低。

三、轻量级数智赋能的核心算法流程

核心算法的主要目标是：从学生的行为特征数据（消费记录、考勤情况、图书馆访问等）中，学习“行为特征”与“心理危机状态”的关联规律，然后输出该学生的心理危机概率，并根据阈值划分“低 / 中 / 高”三个风险等级，为干预提供参考依据 [4]。

整个算法分为离线训练和在线预测两大阶段。

如图 2 所示，离线训练是算法的学习阶段。首先读取 CSV 文件中的原始数据，包括学号、年级、消费次数、图书馆访问量、缺勤天数、成绩、是否求助心理服务、是否危机（标签）等；然后进行数据清洗，保留学号、年级等基础信息，去掉无关的冗余字段；接下来进行特征计算，得出消费异常、成绩波动、考勤异常、社交下降、历史求助等信息，进行标签整合，输出包含特征列、标签列、学号的特征数据集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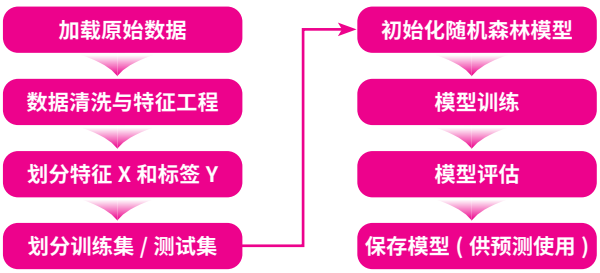


图 2 离线训练流程

配置随机森林的核心参数，初始化随机森林模型，用训练集数据让模型“学习”特征与标签的关联规律，再用测试集验证模型的预测效果，输出分类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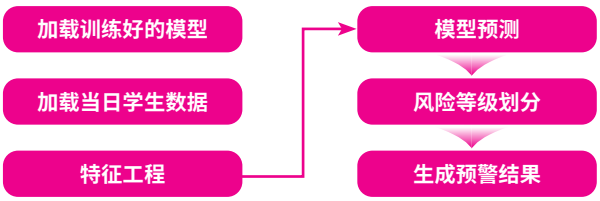


图 3 在线预测流程

如图 3 所示，在线预测是算法的应用阶段。用训练好的模型对学生数据做出预测大致分为六步：

第一，读取模型文件，初始化预测器；第二，读取当日学生数据，包含更新过后的消费、考勤等数据；第三，对新数据执行和训练阶段完全相同的特征工程；第四，用模型对学生进行预测，输出危机概率；第五，根据预先配置的阈值，将危机概率转化为“低 / 中 / 高”三个风险等级；第六，整合学号、风险概率、风险等级、干预建议、预测时间等信息，生成预警报告，并保存文件。

四、试点运行与评估

为了验证该心理预警与干预协同系统的各模块是否正常运行，评估预警模型的准确性，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试点运行。

（一）试点运行

试点对象为四川工商学院 200 名大学生，分别来自 2 个院系，其中一个为工科院系，另一个为艺术类院系。覆盖两个年级、四个班级。试点用户为专职心理老师（1 人）和试点班级辅导员（4 人）。数据源包括课堂出勤率、教务成绩、一卡通消费、门禁出入、心理测评基线数据。

试点运行周期一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完成系统部署、数据对接，用户培训等基础内容，花费了一周时间。

第二阶段：系统正常运行 10 周时间，每日生成预警信息，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学生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第三阶段：收集数据，开展评估工作，花费一周时间进行总结优化。

（二）效能评估

该心理预警与干预协同系统的效能情况从技术性能指标和用户反馈两方面综合得出。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有：

处理时效：每日预测完成时间平均值为 23.8 分钟，小于评估要求 30 分钟。

无故障运行时间：无故障运行率 98.7%，单次故障修复时间平均 28 分钟。

响应速度：接口响应时间 320ms，小于评估要求 500ms。

数据安全性：无数据泄露事件，数据传输、存储均严格管控。

召回率：试点期间累计预警 33 人次，实际危机学生 37 人次（心理老师人工标注），覆盖率 89.1%，高于评估要求的 85%。

响应时效：从预警生成到辅导员查看平均时长 3.6 小时，相比传统周报模式（平均 2.7 天）大幅度缩短。

危机识别：成功识别 2 例高风险个案，均在 24 小时内启动干预，避免危机事件发生。

通过试点运行第 10 周的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67 份，其中辅导员 4 份、学生 63 份）和第 11 周的个人访谈显示：

辅导员认为 Web 预警看板很直观，每日系统自动生成预警清单，不需要手动汇总，减少平时 70% 以上的数据整理工作量。同时，风险等级划分很清晰，还预设了简单的干预建议，对于非心理专业的辅导员来说，指导性特别强，这些干预建议可以直接参考应用，取得的效果相当不错。希望系统能够增加预警跟踪功能，以便对预警学生的干预过程（如约谈时间、干预措施、学生反馈）进行跟踪，为后续干预提供可以查询的依据和资料。另外，当前预警维度仅按风险等级筛选，新增“专业、班级”筛选条件，可以更方便精准地定位本院系重点学生。

学生认为这种心理测评推送方式很便捷，不需要线下填写纸质表格，参与意愿更高。整个预警干预过程隐私性极强，通过权限设置同级用户不可见，包括辅导员约谈地点也是选择独立心理咨询室，未在班级内公开，心理上不会产生压力。系统推送的心理资源（情绪调节文章）实用性很强，确实帮助自己解决了部分情绪困扰。

学生希望增加心理自评入口，这样就可以在自己有需要的时候，主动发起心理状态评估，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收系统推送的测评；还希望能够增加线上咨询预约功能的时间，不只是工作日时间，希望晚间、周末也可以进行预约咨询。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为期 3 个月的试点验证，证明轻量级数智赋能路径在高校心理工作模式上是一次系统性的重构。该路径不仅是一种技术选择，更是一种理念创新——以数字化技术赋能解决传统的心理健康问题。

（一）轻量级路径的核心创新价值

传统的系统建设动辄需要投入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而且部署周期较长，需要专人长期维护，而高校心理工作普遍存在“专业人员不足、经费有限、数据分散”的痛点，本次试点的轻量化路径（基于 Python 轻量技术栈、聚焦核心风险预警场景、复用现有校园数据资源），实现了“低成本、快落地、高适配”的转型效果。

通过轻量化技术实现“现有数据整合 → 智能预警生成 → 精准干预跟进 → 数据反馈优化”的闭环运转，系统自动对接校园消费、考勤数据，生成预警后配套干预建议，再通过干预数据反哺模型优化，让数智赋能形成持续价值。通过规则引擎与消息推送，将技术输出自动转化为一线行动，解决研究与应用“最后一公里”脱节问题。

本地化部署模式保障数据不出校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同时系统有严格的权限设置，在校园内也可以保障用户的数据隐私。学生对隐私保护和便捷化测评方式接受度很高，为全校园推广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后续深化方向

当前试点仅接入有限的结构化数据，覆盖面有限，后续逐步接入宿舍门禁、心理咨询预约等现有校园数据，通过数据关联提升预警准确性，还可以融合社交媒体文本、网络行为日志等非结构化数据，深化数智赋能价值。

目前的特征设计逻辑都围绕“心理状态的外在行为表现”设计，比如：消费异常预示情绪波动；图书馆访问量下降可能是学习动力不足；社交活跃度下降表明社交退缩。可以在这些基础上新增特征，比如“睡眠数据”等身体数据，综合评判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

当前的干预方案匹配基于固定规则，未来可探索引入专家知识图谱实现动态优化。建立校级数据协调机制，明确教务、学工、后勤等部门的数据共享责任，降低数据获取成本。

本研究为破解高校心理工作数字化转型难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对推动全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赵玉芳，左有霞 . 新时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监测体系构建与实践进路 [J]. 中国高等教育 ,2024(23):60-64.

[2] 倪娜，李强，马娟，等 . 青少年心理（下转 267 页）

就业优先战略下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提升实践路径探析

袁瑶瑶　　陈　勇

摘要：就业优先战略的落地，为民办高校就业育人工作厘清了发展方向，使其告别了以往盲目探索的工作困境。但从一线实操来看，就业市场结构性供需错位问题依旧凸显，企业招工难与毕业生就业难的双向矛盾在民办高校育人场景中尤为突出。当前院校主要面临三大核心难题：课程体系迭代滞后于产业升级节奏；就业服务流于形式，缺乏精细化指导；社会层面存在固化的院校偏见。笔者认为，唯有动态革新人才培养体系、搭建政企校协同育人平台、贯穿全周期的职业规划教育，才能切实破解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痛点，提升就业质量。

关键词：就业优先；民办高校；就业质量提升

就业优先战略已常态化落地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是关乎民生发展的核心议题。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民办高校毕业生体量庞大，但其就业发展长期受社会固有认知偏见制约；多数企业存在院校标签刻板印象，致使优质毕业生错失就业机会。从实操层面来看，民办高校还存在资源储备不足、课程迭代流程烦琐、校企合作薄弱等内部短板。其就业难题是内外因素叠加所致，绝非单一改革便可破解，需立足实际精准施策。

一、就业优先战略下提升就业质量的核心理念与目标

（一）提升就业质量的核心理念

就业优先战略落地民办高校育人场景，首要突破点是革新传统办学与就业考核理念。现阶段部分民办高校仍存在形式化就业工作思维，片面追求就业率统计数据，以三方协议签署率作为核心考核标准；忽视学生就业稳定性与长期职业发展质量，造成统计数据与实际就业情况脱节，属于典型的表层化育人模式。民办高校需转变核心思路，摒弃短期数据导向，聚焦学生毕业后数年的行业适配度、岗位稳定性与职业上升空间，以长效就业质量作为育人核心评价标准。相较于公办院校，民办高校具备办学机制灵活、调整效率高的独特优势，无须盲目对标公办院校的学术排名与科研成果；可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对接新兴行业岗位标准，动态调整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深耕实操技能培养，打造差异化人才培养优势。同时，高校需构建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闭环育人体系，打破各部门独立履职的割裂现状，将职业规划指导贯穿学生四年学业全过程。落实全员育人责任，推动教师、院系及管理层协同发力，以扎实的育人成效、市场认可度替代空泛的办学口号，真正实现毕业生就业质量提质升级[1]。

（二）提升就业质量的总体目标

就业优先政策落地阶段，民办高校就业工作的核心目标，是助力毕业生实现长效、优质的职业发展。以往行业普遍以劳动合同、就业协议签署情况作为唯一评判依据，这种单一标准早已滞后于市场变化；当

（上接 266 页）

健康服务“家校社医”协同体系构建与策略研究 [J]. 中国心理学前沿 , 2024,6(07):1117-1124.

[3] 张宁, 朱美丽 .“三全育人”理念下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案例的分析与思考 [J].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2022,4(09):445-453.

[4] 姚斌 . 新时代背景下“医校结合”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9(05):90-94.

[5] 陈又华 .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及解决策略 [J].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2024,37(24):92-94.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5 年四川工商学院科研项目“数智赋能：高校学生心理动态预警与干预协同机制研究”（XJ2025YB010）。

（作者系四川工商学院副教授）

下就业形态愈发多元，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新兴业态从业等均属于正规就业范畴，理应打破唯大企业、唯编制的传统认知。高质量就业并非单纯指代入职起薪高低，人岗适配程度、职业晋升空间、职场发展体验，才是核心衡量维度。不少毕业生短期薪资可观，却因专业错位、环境不适选择离职，这类就业并不具备实际价值。就业指导不能只紧盯热门企业，也要引导学生关注地方支柱产业与基层岗位，弥合信息鸿沟。院校育人的关键，在于锤炼学生专业技能，提升职业竞争力。综合一线工作体会来看，开展就业引导，首要任务便是纠正学生片面的择业观念。

二、就业优先战略为民办高校带来的新机遇

（一）公共政策支持的深度下沉与普惠性增强

结合一线工作体验来看，就业优先政策的持续推进，逐步打破了以往就业领域存在的隐性壁垒。过去，政策性岗位、公共就业资源、优质校企合作项目大多向公办院校倾斜，民办高校毕业生即便参与报考，也常因院校标签被初步筛选淘汰，发展空间受到明显限制。如今就业保障体系趋于均衡，基层服务项目、创业扶持、公共就业服务等资源均面向全体高校毕业生开放。这为民办院校补齐发展短板创造了有利条件。相较于公办院校，我们在品牌影响力上本就不占优势，眼下更要主动把握政策机遇。院校需做好政策解读与渠道引导，打消学生的畏难心态，协助大家对接各类岗位资源。政策已经搭建起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能否切实落地惠民，考验着民办高校就业工作的执行力与行动力[2]。

（二）产业升级与新兴领域对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当前国内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升级，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传统行业持续收缩迭代，形成传统岗位缩减、新兴岗位人才紧缺的结构性矛盾。企业用人标准也随之革新，逐步摒弃唯学历、唯理论的招聘导向，更看重求职者的实操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与跨界综合素养，纯理论型人才已难以适配市场需求。相较于公办高校冗长的专业审批与课程迭代流程，民办高校具备机制灵活、调整高效的天然优势，可精准对接区域新兴产业需求，动态优化育人体系。当下多数院校的产教融合仅停留在挂牌合作的表层阶段，民办高校可深耕深度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依托企业项目、顶岗实训锤炼学生的实操能力。民办高校无须对标公办院校综合实力，深耕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赛道，就是突破就业困境的核心路径。

（三）社会评价体系从单一向多元的价值转向

基于长期走访企业、对接招聘工作的一线观察可知，当下企业的人才招聘评价体系正发生实质性转型。以往用人单位多以院校层级作为核心筛选标准，民办高校毕业生常因院校属性被初步淘汰，个人能力难以发挥。而当前市场化民营企业、新能源及互联网等新经济企业，招聘导向愈发务实；逐步摒弃唯文凭、唯名校的刻板标准，重点考察求职者的实操能力、问题处理能力与职业责任心，优先吸纳具备及时上岗能力的应用型人才。这是民办高校突破发展壁垒的关键窗口期。民办高校无需盲目对标公办院校的科研实力与综合排名，应聚焦核心育人主业，深耕学生实操技能与职业素养培育。院校的行业口碑源于毕业生的职场实际表现，优质的就业输出能够逐步打破社会刻板印象，搭建稳定的校企就业渠道，是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3]。

三、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提升的系统化实践路径

（一）构建需求导向的敏捷化人才培养体系

民办高校育人管理的一线实操来看，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明显逻辑偏差；多数院校依托固有学科、师资设置专业，先确定教学内容再对接就业市场，完全倒置了产业适配的育人逻辑，致使毕业生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相较于公办院校，民办高校决策链条短、办学调整灵活，具备贴合市场动态育人的天然优势。立足岗位适配需求，育人改革需聚焦三大核心举措：深耕行业与企业调研，动态淘汰滞后的夕阳专业、升级传统专业体系；摒弃形式化实训教学，引入企业真实项目与行业技术标准开展实操授课；落实实质性产教融合，推行订单班、定向培养模式，推动企业全程参与人才方案制定、教学实训等环节。院校办学需摒弃形式化成果导向，以企业实际用人需求为核心，保障学生所学技能可直接适配岗位工作[4]。

（二）实施贯通全程的精准化生涯发展教育

当前多数民办高校的职业发展指导工作存在明显滞后性，相关辅导多集中在毕业年级开展，仅以招聘会、简历指导等形式完成任务，属于典型的阶段性补救模式，育人效果十分有限。职业规划教育应当贯穿大学四年全过程，依据年级特点分层推进：大一阶段侧重行业认知与专业启蒙，帮助学生建立初步职业认知；大二阶段着力锤炼沟通协作、职业礼仪等综合素养；大三阶段针对升学、就业、创业不同发展方向开展一对一指导，深化专业实操能力；大四阶段聚焦模拟面试、项目实训等实战训练。校内指导教师普遍缺乏职场从业经验，教学内容脱离实际，需引入企业人力资源人员、行业资深从业者及优秀校友协同授课。借助数字化平台建立学生个人成长档案，推行精准化帮扶，摒弃同质化宣讲模式。全程化、务实化地开展职业教育，才是提升就业质量的根本所在[5]。

（三）打造立体开放的多元化就业市场网络

结合一线就业工作实操来看，多数民办高校就业服务仍存在被动履职的问题：长期依赖大型综合招聘会等待企业入校招聘，缺乏主动拓岗意识，就业渠道拓展十分被动。事实上，大量中小微企业、新兴产业

及本地产业园存在巨大用人缺口，只是缺乏入校招聘的精力，需要就业部门主动对接挖掘。传统大型招聘会场面热闹，适配性极差；学生盲目投递简历，入职转化率极低，还会打击求职信心。聚焦行业、校友企业的小型精准专场招聘，更能实现校企深度对接，有效提升求职成功率。同时，当下多数院校仍沿用传统表格统计就业数据，工作效率低下。引入智慧就业平台，可实现岗位与学生能力智能匹配；建立企业用人反馈闭环，能反向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切实盘活就业服务工作。

（四）完善多方协同的持续性就业支持生态

院校管理层面来看，民办高校就业质量难以提升的核心症结在于育人体系碎片化、资源协同度不足。当前多数院校存在明显的部门割裂问题：招生、教学、就业工作各自独立运行，缺乏联动机制，招生规划不参考就业数据，课程培养不匹配市场需求，形成固化的育人恶性循环。就业工作绝非就业办单一部门的职责，需压实二级学院、任课教师及全体教职工的育人责任，构建全员就业育人格局。同时，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普遍流于表面，多为挂牌签约的形式化合作，院校需主动对接政府政策、行业标准与企业资源，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共建。此外，高校普遍忽视校友资源的价值，长期疏于维护校友渠道。搭建校友导师库，盘活校友企业实习就业资源，是低成本、高效提升毕业生就业质量的重要抓手[6]。

（五）夯实数据驱动的闭环质量评价与改进机制

结合院校管理实操来看，当前多数民办高校的就业评价模式存在明显短板；仅依托毕业签约率、平均起薪两项核心数据评判就业质量，评价维度单一、参考价值有限，极易掩盖真实就业问题。不少学生为顺利毕业临时签约短期岗位，就业稳定性极差，却仍被纳入有效就业数据，造成就业统计虚高的乱象。对此，高校需搭建全周期动态化就业追踪体系；从学生入学阶段的学情、特质记录，到在校实训项目、技能证书储备，再到求职全过程、毕业后长期薪资变动与职业发展情况，实现全链路数据整合。同时，需结合市场对标调研，量化人岗匹配度、企业满意度、学生职业获得感等核心指标，摒弃主观评判模式。此外，就业数据分析不能流于报告形式，需形成完整反馈闭环；反向指导招生规划、专业迭代、课程优化与就业指导精准施策，以数据驱动育人质量持续升级，彻底摆脱盲目办学的发展困境[7]。

（六）构建困难群体就业帮扶与全周期关怀机制

高校就业育人工作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塑造优质就业标杆，而在于做好困难毕业生的兜底帮扶工作，彰显教育初心。在求职过程中，家庭经济困难、学业基础薄弱、沟通表达能力存在短板的学生，天然处于就业弱势地位；这类学生若缺乏院校专项帮扶，极易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院校可依托大数据搭建就业预警体系，精准筛查重点帮扶学生，建立个性化帮扶档案，摒弃同质化的无差别指导。针对学生心理怯懦、技能不足等不同问题，分类开展心理疏导、模拟面试、专项技能集训，精准补齐求职短板。同时，学校需建立毕业生长效跟踪机制，落实“离校不脱管”的服务模式。联动政府、企业、家庭与校友资源，持续推送岗位，提供技能补给，落实政策兜底。就业工作的真实成效，不在于优等生的发展高度，而在于能否稳稳托举每一名弱势学生的职业起点。

四、结语

民办高校就业质量的提升不存在速成路径，属于需要长期深耕、精细打磨的系统性育人工程。院校需自上而下转变办学理念，摒弃口号式的就业优先落实方式；主动对接国家就业政策与市场产业动态，及时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规避封闭固化的办学思维。同时，应摒弃盲目扩张规模、追逐排名的功利导向，聚焦在校生培养质量与职业发展的适配性。扎实落实校企对接、课程改革、就业指导等基础工作，依托毕业生职场口碑构建校企良性循环，是优于商业宣传的长效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 刘立军 . 民办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应然道路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4(36):1-4.

[2] 吴天颀 . 福建省民办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及提升对策 [D]. 福州 : 福建师范大学 ,2024.

[3] 南丁 , 陈瑞霞 . 民办高校大学生如何高质量就业 [C]//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 .2024 年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论文集 (上册). 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 ,2024:13-14.

[4] 王腾 , 李猛 , 刘叶 . 行动者网络理论 : 民办高校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质量提升的新视角 [J].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36(04):29-31.

[5] 梁翠华 , 方荃 , 贾永芳 , 等 . 劳动力市场需求视角下促进民办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路径研究 [J]. 中国就业 ,2023(12):38-40.

[6] 银锋 . 民办本科高校毕业生“慢就业”原因分析及对策——基于 14 所民办本科院校 2019—2021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的分析 [J]. 大学 ,2023(31):165-170.

[7] 邓香玲 . 民办高校电气专业学生高质量就业优势分析——以某民办高校电气专业 2021 届毕业生为例 [J]. 冶金管理 ,2023(07):107-109.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就业优先战略视角下民办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路径研究”（24C0779）。

（作者：袁瑶瑶，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助教、智慧健康学院专任教师；陈勇，湖南都市职业学院讲师、就业指导处副处长）

情感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图景、风险与路径

崔京旭

摘要：情感人工智能的迭代演进，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新的赋能图景，涵盖情感识别的数据化重构、情感陪伴的交互性补偿、情感培育的情境化浸润以及情感引领的价值化规约四个维度。然而，技术应用中潜藏着情感误导、情感物化、情感操控、情感茧房等风险样态。为此，需从强化大学生数字情感素养、完善技术监管体系、加强资本规范管控、引领科技向善发展四个方面构建优化路径，为规范情感人工智能应用、发挥技术育人价值、守护大学生心理健康、推进高校心理育人工作提质增效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关键词：情感人工智能；大学生；心理健康；心理育人

情感人工智能（Affective AI）作为这一领域的核心分支，通过分析语音、文本、面部表情、生理信号等多模态数据，不仅能识别人类情感状态，更能进行情感化的反馈与交互，从而从一种纯粹的辅助性工具，演进为一种能够重构社会关系、文化表达与心理结构的重要力量[1]。当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面临资源短缺与需求激增的结构性矛盾，情感人工智能以其全天候陪伴、低成本响应和拟人化交互等特征，被引入大学生心理预警、日常疏导等环节，呈现出广阔前景。然而，技术滥用、伦理失范等问题易对大学生心理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系统厘清其赋能图景、深度研判风险、科学构建应对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情感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图景

情感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体现在识别、陪伴、培育、引领四个维度的心理育人价值。

（一）情感识别：多模态大数据精准识别大学生心理动态

以情感人工智能为内核的多模态大数据心理识别，是高校心理健康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该方式借助智能算法与情感计算，整合学生课程参与、校园消费、社交动态等日常多维信息，突破传统人工访谈与纸质量表的局限，实现对学生内在情绪起伏的动态感知与研判。多模态识别在信息采集上具有整体性，在监测上体现动态性，能持续跟踪因考试、人际关系、自我认同等产生的情绪波动，捕捉学业焦虑、人际敏感等隐性困扰。该模式落地后，可完善心理工作的前置布局，拓宽摸排覆盖面，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判，助力形成与大学生成长节奏相契合的心理育人新格局。

（二）情感陪伴：为大学生提供全时全域的便捷心理支持

情感陪伴是智能技术融入心理育人体系的重要形态。马克思所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情感陪伴依托情感交互技术与对话机制，贴合大学生因学习重负、生涯迷茫等衍生的心理诉求，突破传统辅导在固定时空的束缚。这种陪伴具有全域性，可嵌入碎片化生活节奏；具有包容性，能创造低心理负担的表达环境；具有适配性，可针对新生适应、考试焦虑等不同阶段问题匹配差异化的疏导内容。全时全域陪伴能有效改善心理服务供给结构，降低主动求助门槛，填补晚间及节假日等服务空白，与线下心理育人形成互补，推动大学生心理支持常态化、生活化、长效化发展。

（三）情感培育：依托情感场景与叙事培育大学生健康心理

情感培育旨在从深层价值层面赋能心理健康。该模式遵循情感认知规律，运用智能技术搭建沉浸式情感场景，塑造正向叙事体系，实现心理健康由被动疏导向主动塑造的转换。它具有体验浸润性，可借助与大学生活相关的情境引发共鸣；具有价值渗透性，能

潜移默化消解消极认知；具有成长适配性，可贴合个性化需求。在实施过程中，需构筑覆盖新生适应、学业挫败等主题的场景，使理想信念涵养与情绪调适贯穿叙事全过程。这种培育能唤醒学生内在积极力量，帮助他们建立稳定平和的心态，增强应对压力与成长阵痛的心理韧性，拓展高校心理育人的载体与维度。

（四）情感引领：在情感生成中引导大学生形成积极的价值观

情感引领是技术与价值塑造融合的高阶实践形态。它从情感生成的内在机理出发，利用智能交互逻辑，介入日常学业选择、人际相处等过程，将心理调适与价值观塑造融为一体。情感引领具有驱动性，能从自然产生的情感体验切入，通过共鸣唤醒价值认同；具有价值耦合性，能实现心理成长与价值养成的一体推进。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坚守立德树人根本导向，将主流价值嵌入交互逻辑，抓住考试受挫等关键节点进行正向疏导。该模式能帮助大学生建立健康心理结构，自觉抵制不良思潮侵蚀，在情感认同基础上完成价值内化，贯通心理健康与价值观培育的内在联系。

二、情感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风险

情感人工智能在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过程中，并非单向度释放正向价值，其技术应用与发展过程中同样潜藏着多重风险，这些风险相互交织可能带来情感误导、情感物化、情感操控、情感茧房等心理隐患。

（一）情感误导：过度拟人化导致真实情感认知混淆

高度拟人化的交互形态，极易模糊人机交互与现实社交的感知边界。对于正处于情感认知塑造关键期的大学生，长期浸润其中会使其对自我情绪感知、人际关系及心理状态的判断发生错位。智能体营造的虚拟共情会逐渐替代现实情感磨合，弱化学生对现实情感逻辑的辨别能力；正向且恒常的虚拟供给，更易让学生习惯被动接受慰藉，脱离应对压力所必需的情绪调适过程。这种认知混淆会重塑个体的心理认知模式，削弱其现实交往的内驱力，导致情绪表达能力退化与心理适应能力衰减，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二）情感物化：资本操控下情感沦为消费主义的商品

在资本逐利逻辑的主导下，情感人工智能极易滋生“情感物化”风险。技术通过商业运作，将本该充满人文关怀的情感体验降维为可交易的商品，将大学生的情感冲动、社交渴求视为流量变现工具。此风险体现为功利导向与认知误导：资本无视学生真实需求，打造付费陪伴、虚拟恋爱等产品，抽空情感的人文内核；商业话术将“情感消费”等同于“情感满足”，引导学生形成“金钱可以购买亲密关系”的错误认知。这种趋势会消解情感关系中的主体性与真诚度，使学生难以在现实中建立健康联结，加剧内心的焦虑与价值迷茫，削弱健康的情感认知。

（三）情感操控：隐私边界失守与算法化情感支配

情感人工智能在大学生心理育人场景中凸显的“情感操控”风险，其源于隐私边界的被动突破与算法对情感的隐性支配。“大模型应用于心理咨询场景，可能引发隐私泄露、用户过度依赖及人工智能妄想障碍等伦理安全风险。”[3] 为实现精准交互，人工智能会无感化采集大学生课程登录、私密倾诉等海量敏感信息。若缺乏规制，这些数据不仅面临泄露风险，更成为算法分析的原料。算法在精准捕捉心理弱点后，通过定制化推送与诱导性交互主导学生情绪走向，构成难以察觉的支配关系。隐私失守与算法操控交织成风险闭环，一旦失控，隐私泄露会引发弥漫性焦虑，破坏心理安全感；长期算法支配会钝化自主情感判断能力，导致认知错位，甚至引发自我认同危机，对心理健康造成深度侵害。

（四）情感茧房：固化偏好情感认知疏离社会交往

算法的推荐机制基于大学生浏览偏好，长期、高频地推送同质化内容，逐步构建封闭的情感体验空间。其特征是情感认知的封闭性与对虚拟体验的深度依赖。算法固化的内容强化了学生固有的偏狭认知，隔绝了接触宿舍生活、校园社交中复杂鲜活的异质性观点。这让学生产生心理依赖，逐渐丧失主动突破圈层、减少与现实交往的意愿。长期来看，固化的情感认知会导致心理视野收窄，加剧心理脆弱性；现实联结的持续弱化，将加深孤单疏离感，诱发情绪低落、自我封闭等问题，加剧心理孤独感。

三、情感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途径

面对情感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风险，需建立系统完备、协同发力的实践路径，实现风险防控与正向赋能的统一，推动情感人工智能育人价值的充分彰显。

（一）强化大学生数字情感素养，提升抵御心理风险的主体能力

数字情感素养是大学生在使用情感人工智能过程中形成的情感认知、判断、调控及隐私保护等复合能力，涵盖对虚拟与现实情感的辨别力、对情感风险的防范意识等。“在新的媒介影响下，用户要具备高效的信息建构能力，要批判性吸收智能机器生成内容”[4]。培育大学生数字情感素养，需立足高校育人主阵地构建体系。高校应将数字情感素养教育融入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课程，系统讲解情感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情感风险类型及应对方法。搭建实践培育平台，通过情境模拟与案例分析等形式，引导大学生在体验式学习中提升情感辨别与风险防范能力。同时加强家校协同，引导家庭关注大学生数字情感生活状态，共同引导其

理性使用情感人工智能，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的情感交往观念与数字生活边界意识。此外，通过增强隐私保护意识与技术理性使用能力，大学生能够主动守护自身心理健康权益，为情感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奠定坚实的主体基础。

（二）完善技术监管体系，规范技术应用，护航心理健康服务

完善技术监管体系，是规范情感人工智能应用、护航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关键路径，也是防范技术风险、发挥技术育人价值的重要保障。“情感互动式交互的典型特征在于用户非结构化情绪表达与 AI 共情响应的动态适配过程”[5]，面向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技术监管体系是对情感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数据使用全流程进行约束的有机整体。组建面向大学生心理服务的技术监管体系，需立足全流程管控，形成多方协同格局。监管部门应加快完善针对大学生群体特点的制度规范，明确情感人工智能在该领域应用的伦理边界与责任划分，出台针对性的监管标准并强化常态化监督。高校应切实履行校园内技术应用的监管主体责任，规范各类智能心理服务的引入与使用，建立技术应用风险监测机制，及时排查针对大学生的数据泄露与算法操控隐患。研发主体应强化责任意识，主动优化算法逻辑，完善数据安全防护机制，自觉接受监管约束，坚守技术育人的初心与底线。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保驾护航，营造安全、有序的应用环境，推动技术与心理健康服务良性融合。

（三）加强资本规范管控，引导资本正向赋能心理健康事业

加强资本规范管控，是引导情感人工智能领域资本正向发力、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事业的重要路径，也是防范资本逐利倾向导致技术异化、守护心理育人初心的关键举措。建立面向该领域的资本管控体系，需坚持正向引导与刚性约束并举。监管部门应完善资本管控相关制度，明确资本进入大学生心理健康领域的准入标准、运作规范与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对越界逐利行为的刚性约束。高校应牢牢坚守育人底线，规范校园内智能心理服务的资本合作模式，优先选择坚守社会价值导向的合作主体，防范资本异化给学生带来的育人风险。行业协会应发挥引导作用，推动行业自律，引导资本主体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主动投身大学生心理健康公益服务，形成正向示范效应。为情感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可持续的资源支撑，筑牢心理育人的资本保障防线。

引领科技向善发展，是以主流价值规范情感人工智能应用、助力大学生心理成长的根本路径，也是实现技术育人价值、坚守心理育人初心的核心引领。推动科技向善落地，需立足主流价值引领塑造全方位引导体系。高校应充分发挥育人主阵地作用，将主流价值融入校园智能心理服务的引入与应用全过程，引导大学生在使用过程中接受正向价值熏陶与思想涵养。研发主体应将主流价值嵌入技术研发底层逻辑，优化算法推荐机制与内容供给方向，打造贴合主流价值导向、回应大学生真实心理需求的情感服务产品，传递积极向上的情感理念与价值取向。同时加强社会面宣传引导，营造科技向善的整体氛围，推动全社会形成重视技术人文价值、关注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环境与共识。使智能服务帮助大学生树立健康价值观，推动技术与心理育人、思想价值引领深度融合，提升心理服务的思想内涵与育人厚度，增强大学生心理韧性，促进健全人格的养成。

四、结语

情感人工智能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结合，揭示出技术赋能与风险生成的内在共生性。当情感识别、陪伴和引领被纳入规范化的制度轨道，技术便能有效弥合心理服务的供需缺口。一旦脱离伦理约束与价值牵引，情感误导、物化与操控便会从潜在可能转化为现实伤害。唯有将数字情感素养培育、技术监管、资本规范与科技向善理念贯通于技术研发与应用全过程，方能在释放技术效能的同时守住育人的伦理底线，使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与心灵秩序的建构。

参考文献

[1] 张耀铭，张路曦 . 人工智能 : 人类命运的天使抑或魔鬼——兼论新技术与青年发展 [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9,38(01):1-23.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1 卷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2009:505.

[3] 郭静，王沛，马胤哲，等 . 基于大模型的智能体在大学生心理咨询中的应用 [J]. 心理科学进展 ,2026,34(06):1072-1083.

[4] 祝黄河，凌学武 . 生成式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样态表征、逻辑理路与治理策略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58(04):67-77.

[5] 任英杰，魏来，李彩宁 . 面向大学生主动心理健康的人智会话交互行为特征研究 [J]. 情报资料工作 ,2026,47(02):104-112.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4 年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网络新媒体时代高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下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现路径研究”（2024W114）；太原师范学院 2025 年度思政教育管理课题“人工智能赋能大学生高质量就业实践路径研究”（SYFDYSZ-2507）。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

新时代高校退役大学生示范作用发挥的路径研究

瞿志杰

摘要：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退役大学生是高校践行国防教育、深化思政育人，以及推进五育融合的特色资源。退役大学生兼具军旅锤炼的优良品格与高校培育的综合素养，该群体拥有自律守纪、责任担当和爱国奉献等优秀品质，是校园文化建设与榜样育人的重要力量。本文梳理退役大学生示范作用发挥的良好发展基础，从顶层设计、培育模式、资源整合和激励机制四个维度构建完善的实施体系。本研究通过搭建特色育人平台、深化示范引领机制、整合多元资源和完善正向激励体系，从多维度构建长效实践路径，推动军旅文化与校园育人深度融合，并为新时代高校“三全育人”体系建设与国防教育常态化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关键词：思政育人；退役大学生；示范作用；国防教育

在新时代，通过军校融合发展的模式，可以有效推进全民国防教育。退役大学生拥有部队积淀的军人素养和校园培育的素质能力，在他们身上承载着纪律意识、奉献精神与家国情怀。高校重视退役大学生群体的发展，不断完善其帮扶培育体系，逐步强化对该群体内在潜力的挖掘与发挥。本文应用“理论构建—现实审视—路径探索”的模式，系统探讨退役大学生示范作用发挥的重要意义和实践基础，并提出针对性优化方案。

一、探索退役大学生示范作用发挥的重要意义

我国征兵政策的持续完善与全民国防教育的深入推进，为有参军意愿的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征兵入伍机会，也有更多的退役大学生回到校园里继续学习深造。本文从理论构建、实践推进与时代呼应三个维度去挖掘退役大学生发挥示范作用的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

高校对于退役大学生发挥示范作用的研究，正逐步从场景化向系统化更替，从片段化向全面化推进，不断融入党建引领与五育融合理念，实现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创新。本文从三方面进行优化：一是高校突破单一场景的模式，退役大学生发挥示范作用可以从学业引领、国防教育和体育达人等多方面体现；二是本研究突出党建引领的政治站位，采用“党建引领 + 示范践行”的理论体系；三是融入五育融合理念，挖掘该群体在德、智、体、美、劳各维度的示范模式，形成“五育 + 示范”融合范式。本研究将志愿服务和第二课堂等新模块纳入体系，推动高校在国防教育、思政育人与五育并举等模块的新变革。

（二）实践意义

本研究依托党建引领打造五育并举的示范标杆，充分发挥退役大学生在思想引领和自律意识上的优势，使其成为五育并举体系中的示范载体，构建“党建引领 + 示范带动 + 五育协同”的良好育人生态[1]。研究借助退役大学生推动国防教育与校园实践深度融合。当前国防教育有提质增效的需求，为丰富国防教育的多样形式，增强国防教育的实效性。将国防教育融入校园日常，实现国防教育从“课程化”向“生活化”和“常态化”的方向转变。高校通过建立退役大学生成长计划与示范机制，为后续新模式的推广奠定坚实基础，为思政育人工作提供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三）时代意义

高校需要探索退役大学生发挥示范作用的机制，该探索是对军地校融合发展战略，国防教育部署及新时代育人方针的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国防教育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为高校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2]。退伍复学的大学生拥有坚定的意志品质，过硬的纪律意识与无私奉献的品质，这些品质是高校育人实践研究的宝贵资源。本研究通过探索退役大学生示范作用能有效推动军地校、

党建与五育并举的协同融合，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实践支撑。

二、高校退役大学生示范作用发挥的发展基础与优化方向

随着国家征兵政策持续完善与全民国防教育深入推进，高校退役大学生群体规模呈稳步增长的趋势，该群体可以成为校园文化建设、思政育人及国防教育工作中的重要骨干力量。该群体拥有军旅素养与专业能力素养，为高校开展特色育人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依托政策支持与院校重视，高校持续完善退役大学生关怀培育体系，围绕学业适应、生活保障和成长发展等方面，逐步构建配套机制，为退役大学生融入校园和发挥示范作用创造了良好环境。

（一）管理运行体系逐步完善，协同育人格局持续推进

现阶段，高校高度重视退役大学生群体发展，将该群体培育纳入“三全育人”整体规划之中，围绕学生成长发展建立常态化管理与服务机制。院校各职能部门协同配合，围绕退役大学生的学籍管理、成长关怀和发展支持等方面，稳步推进退役大学生管理服务工作规范化发展。高校持续完善学生管理工作体系，重视教师队伍专业能力建设，持续优化退役大学生成长服务体系，为该群体发挥示范作用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与管理支撑。依托常态化工作机制，院校逐步完善信息化管理模式，关注退役大学生成长动态。高校以精细化管理助力退役大学生的健康发展，推动该群体示范引领作用的有序发挥[3]。

（二）特色培育模式逐步丰富，优势转化路径不断拓展

高校立足退役大学生群体的特质，积极推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与综合发展，助力退役大学生顺利完成角色转变，融入校园学习生活。院校结合校园育人需求，积极搭建多元化实践平台，鼓励退役大学生参与校园文化建设、国防宣传、志愿服务等各类活动。学校依托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融合模式，不断丰富育人的场景。学校推动退役大学生的优秀特质与校园的育人需求互相结合，持续探索军旅精神与校园文化融合的实践路径，助力个人素养提升与校园育人氛围营造的双向赋能。

（三）育人资源体系逐步完善，特色实践平台稳步构建

在国防教育与育人融合发展的背景下，高校持续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稳步推进国防教育特色平台的建设，不断丰富退役大学生发挥示范作用的载体与阵地。高校重视特色育人品牌的打造，支持退役大学生开展示范引领的活动[4]。同时，高校积极拓展校外协作渠道，联动地方国防单位和社会服务机构等共建实践育人基地，持续完善资源共享机制，不断丰富实践活动内容，为退役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发挥示范辐射作用筑牢资源基础。

（四）激励发展机制不断健全，示范引领活力持续激发

高校持续完善学生综合评价与激励体系，结合特色育人发展需求，不断优化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重视优秀学生榜样力量的挖掘与培育。高校积极完善该群体的激励和成长发展的相关制度，重视优秀退役大学生榜样力量的宣传与示范引领，以正向激励引导该群体主动参与校园建设工作。同时，院校持续关注一线教师育人能力的成长发展，不断完善教师队伍在教学科研和实践指导的保障体系。学校鼓励教师参与退役大学生培育和国防教育建设等特色工作，构建师生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专业教师可以持续激发退役大学生示范引领的内生动力，推动特色育人工作长效稳步发展。

三、高校推动退役大学生发挥示范作用的系统性对策构建

高校对该群体示范引领的研究需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创新，分别为管理赋能、引导深化、平台支撑和激励协同。本研究可以将退役大学生的优势转化为高校创新育人机制，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政教育与人才培养的实效性。

（一）优化顶层设计，构建协同联动的组织管理体系

高校为增强校内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在学校层面建立一体化工作平台。高校层面制定五年专项发展规划，将退役大学生群体的培养计划纳入本校思政育人蓝图。高校党委可以牵头制定退役大学生成长发展与示范引领的专项规划，将“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的理念培养纳入方案；学校对参与该项研究的团队设定示范作用覆盖率、特色品牌项目数和省级工作室数量等量化目标，并科学地将其拆解到本校年度各项考核模块中。由校领导牵头负责，其他各部门共同参与，并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高校对于该研究应该统筹制定规章制度、资源调配方案和评估条例，将创新使用“一体联动”的新模式。

高校对退役大学生建立精准的信息档案与动态数据管理平台，可以授权各职能部门共享信息；研究团队通过对该群体的数据分析进行因材施策，为该群体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与匹配适应岗位提供依据。高校对辅导员队伍开展定期的线上线下培训，以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化水平。教师团队编写《工作实务指南》[5]，为退役大学生的发展提供标准化流程与方法；在辅导员考核中增设相关评价维度与激励条款，将引导成效

作为个人发展的重要依据。

（二）创新引导范式，推动军人特质向综合育人效能转化

教育者需要改变对该群体的育人举措，从简单的“使用”思维转向“培育”与“赋能”的双重举措。研究团队可以围绕学校年度规划创造多样化的教学场景，学校可以推动退伍复学大学生将军事能力迁移到其他综合素质能力。成长导师团可以由高年级退役大学生、专业教师和心理咨询师等成员组成，为刚复学的退役大学生提供陪伴式指导，帮助其实现从“合格军人”到“优秀学生”的平稳过渡。高校可以针对退役大学生的特点创设一些实践岗位，还可以增设一些服务性质的岗位。相关的岗位通过制定职责细则、培训计划与考核条例，从而保障该群体快速适应岗位所需。高校应该鼓励教师在教学设计中融入国防相关的内容，或者增设相关的选修课程，可以进一步培育有入伍意向的学生。

（三）整合资源载体，打造多维支撑的特色育人平台

高校可以收纳校外退役大学生示范引领成功的案例，借助与其他学校交流学习打造适应本校的资源平台。可以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下把退役大学生的相关数据模块和信息同步到线上平台，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数据支撑。学校可申报专属的自媒体平台，通过线上打造红色系列的新媒体课堂，作为开展国防教育“第二课堂”的主阵地，支持各学院制作优质的网络文化作品[6]。学校可以线下设立红枫之家和兵哥哥服务站等社团，为退役大学生提供线下的服务点。

高校可将退役大学生的专项研究基金纳入年度预算中，同时相关部门应对该研究基金制定明确的管理章程。高校可以与优秀的退伍毕业生创建校友会，与地方人武部、社区和军工企业等相关单位签署合作意向书，建立国防教育的实践基地，作为学生社会实践和国防教育的第二课堂。

（四）完善评价激励，形成示范作用发挥的长效保障机制

学校可修订综合素质测评办法，单列或提高“国防贡献与社会服务”的评分权重；相关考核部门设计可观测的评价指标，探索“示范贡献积分制”的考核办法；学校层面需建立个人荣誉与集体发展的链接，在学生考核与评价制度中加入退役大学生贡献的评价依据，对于表现突出的学生给予对应的奖励。教师参与指导退役大学生获得荣誉和相关课题研究所付出的努力，高校应该将这部分业绩纳入该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年度考核与职称评审等制度中[7]。高校依托管理、引导、资源和评价四个维度协同发力，持续优化退役大学生示范作用发挥的实践路径，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育人长效机制。高校借助退役大学生示范作用研究，挖掘该领域的创新育人模式，进一步提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推动育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四、结论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加强国防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退役大学生兼具军旅素养与专业学识，是高校思政育人与国防教育融合的核心力量，其示范引领价值日益凸显。当前，高校已在退役大学生培育管理、模式创新、资源保障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形成良好基础，为其示范作用发挥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本文立足协同育人理念，针对其示范作用优化方向，构建“管理赋能、引导深化、平台支撑、激励协同”四位一体的实践体系。高校通过优化顶层设计、创新培育范式等举措，激活退役大学生示范潜能，推动军人特质向育人效能转化，实现示范引领常态化。该体系可推动军旅精神与育人工作深度融合，为高校特色育人提供可推广范式。未来，高校可围绕退役大学生群体，深化场景化实践研究，推进相关工作的精细化发展，持续优化机制和拓展资源，并释放示范辐射价值，为高校国防教育与思政育人提质增效提供支撑，为社会助力培养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蔡蓉蓉，马长胜，顾兴华.“五进制”退役复学大学生培养模式研究——以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8(06):9-12.

[2] 岑慧.基于朋辈教育视域下退伍复学学生社团建设模式探寻[J].社会与公益,2025(02):111-113.

[3] 梁燕龙.朋辈教育理念下“退伍复学大学生担任军训教官”模式的构建[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1(08):38-41.

[4] 李禄华.退伍复学高职生参与学生管理的实践探索[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旬刊,2018(08):42-43.

[5] 王玺杰.退役复学大学生在高校国防教育中的示范作用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23.

[6] 李灼.新时期“退役复学”大学生在高校中的可持续发展策略[J].吉林化工学院学报,2024,41(10):41-44.

[7] 李灼.高校大学生网络素养提升策略探究[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24(06):73-77.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2023年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校级课题“基于价值观引导视角的退伍复学大学生示范作用发挥路径及其实现研究”（X202306）。

（作者系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现象探析及对策研究

郭　翔

摘要：近年来，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呈现多元化特征，“慢就业”“暂缓就业”、灵活择业等现象逐步凸显，成为职业教育领域亟待关注的现实议题。本文立足当前就业市场新形势，通过系统梳理高职学生就业现状，从就业市场环境、家庭认知、高职院校育人服务、学生个体四个层面剖析就业现状成因。在此基础上构建政府政策赋能、家庭正向引导、院校提质赋能、学生自主提升的四维协同对策，引导高职学生树立科学就业观，破解人岗适配难题，助力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社会技能型人才有效供给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慢就业；就业观；人岗适配；协同育人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当前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总量持续走高，结构性就业矛盾凸显。据统计，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1]。智联招聘《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数据显示，2024届高校毕业生慢就业占比从2023届的18.9%上升至19.1%，选择自由职业占比从13.2%提升至13.7%。待业群体规模扩大，不仅制约毕业生个人职业成长，也为高校就业服务工作带来新挑战，对人力资源配置、经济稳定发展形成潜在影响。高职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厘清高职毕业生暂缓就业、观望择业等现象背后的逻辑，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聚焦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现象，探析暂缓就业的生成诱因，从职业生涯发展视角提出系统性引导策略，助推毕业生树立理性择业观念，积极应对就业市场竞争，实现可持续职业发展。

一、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近年来，高职院校毕业生人数逐渐增加，大量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使得岗位竞争异常激烈。受世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贸易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整体就业市场需求压缩，企业招聘岗位的数量和质量并未同步增长，高职院校毕业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2]。有的毕业生选择持观望态度在家待业，有的毕业生将个人求职目标定为考公、考编，将个人全部精力用在备考上，但合适的岗位又较少，甚至会花费几年的时间去备考。

部分毕业生在经济上没有过重的压力和负担，因此会选择暂不急于就业，而是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明确个人发展方向。目前，在高职院校学生中，越来越多毕业生倾向于在择业过程中进行更充分的考量和准备。这一现象反映出毕业生对自身职业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他们注重个人需求与岗位之间的契合度，希望找到更符合自身兴趣与能力的工作。同时，部分同学在职业认知和定位方面仍在探索阶段，对岗位的薪资条件、工作内容及发展前景有自己的考量标准，对个人职业生涯抱有积极的期待。这种对理想岗位的追求，促使他们在就业过程中更加审慎，倾向于通过观望和比较，寻找更适合自己的职业机会。

长期择业的状态，为高职学生的职业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课题，既关系到个人专业价值的充分实现，也牵涉社会层面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运用。高职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专业实操技能，若长期未进入职场参与专业实践，缺少持续性的技能锻炼与实际操作，可能使专业知识的掌握趋于生疏、实操能力未能持续提升，进而影响职业起步阶段的发展节奏，增加未来融入职场、适应岗位的挑战；同时，在择业期间如缺乏有效的心理关怀和职业规划支持，部分学生可能产生方向感不足的情况，从而影响求职状态的持续积极与职业信心的稳步建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其职业决策的明确度和主动性。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高职院校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若大量学生仍处于择业阶段，将延迟技能型人才价值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化进程，一定

程度上影响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也制约了社会经济发展对一线技能人才需求的及时响应；同时，也可能对就业资源的统筹配置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更多支持以促进就业市场的协调与有序发展。

二、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现象成因分析

（一）就业市场环境层面

国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高职院校招生规模持续扩张、技能人才供给规模持续扩大。与此同时，部分行业受经济环境影响缩减用工需求，企业招聘不断提高学历、实践经验、综合技能门槛，拓宽求职竞争维度，部分毕业生因暂未匹配到契合的岗位要求，面临着岗位适配的阶段性挑战。此外，教育、文史等传统行业受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影响，就业岗位布局有所变化，而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产业虽岗位需求旺盛，但其专业能力要求与高职毕业生的知识技能体系暂未形成充分适配，不少相关专业毕业生难以找到契合自身能力与就业期待的岗位，最终选择暂缓就业，用更多时间做职业规划与求职准备。

（二）家庭观念层面

家长的择业观念与教育方式，同样是影响高职毕业生就业节奏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发展，越来越多家长的教育与择业观念更加开放和多元，不再简单追求“毕业即就业”，而是更注重子女的职业适配性与个人发展节奏，部分家长还会为子女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帮助他们更从容地进行职业规划。与此同时，在家庭支持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引导方式上的新课题——部分毕业生由于缺乏来自家庭的就业方向指引，加上经济压力较小，可能在求职主动性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依赖倾向。此外，部分家长仍持有较为传统的择业观念。一方面，他们相信自身能够为子女对接较好的就业资源，这也使得一些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更多期待家庭的支持，自主求职意愿相对不高。另一方面，部分家长对子女的职业方向抱有较明确的期待，更倾向于他们选择教师、公务员、医务工作者等稳定性较高的职业。这种期待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毕业生在择业时更为审慎，更倾向于等待与家庭期望相符的岗位，从而放慢了就业步伐。

当毕业生的职业观念与家长的期望存在差异时，双方也可能在认知层面形成一定的张力，部分毕业生会在择业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意识，选择暂缓求职以重新思考发展方向，这也进一步延长了部分学生的择业周期。

（三）高校育人服务层面

当前，各高校均已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相关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在校期间树立科学的择业观、夯实就业基础，但课程教学培养过程中仍存在些许待优化之处，部分课程存在教学方法相对单一、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等问题，难以充分实现以教促学、以练赋能的效果，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综合素质与职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同时，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系统性与针对性有待加强，现有就业指导课程多以就业政策解读、通用求职技巧讲解为主，未能结合学生的专业特色、个人职业规划与能力短板开展个性化指导，难以精准匹配学生的实际就业需求，指导效果未能充分发挥。

高职院校的实习安排与就业服务体系也存在一定的完善空间，相关政策落地的适配性有待提升。实习环节中，部分院校存在实习岗位与学生所学专业匹配度不高、实习安排缺乏合理性等问题，学生难以在实习过程中积累与专业相关的实操经验，无法实现从校园学习到职场实践的有效衔接；在就业服务层面，学校提供的就业信息在全面性、及时性上尚有欠缺，针对学生的就业帮扶措施未能形成全流程、多维度的支撑体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求职效率与岗位适配效果。

在政策支持层面，当前促进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的相关教育政策仍存在支持力度不足、落地效果有待强化的问题。一方面，针对高职院校实践教学的专项投入有待增加，面向学生职业技能培训的专项政策支持体系尚未完善，难以充分保障职业技能培养的专业性与实效性。另一方面，在鼓励、引导企业接纳高职院校学生开展实习实训、吸纳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层面，相关政策的激励与引导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吸纳高职毕业生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学生个体层面

部分高职学生自我认知模糊，在校期间缺少系统职业规划，对行业前景、岗位要求了解不足，求职目标摇摆不定。还有学生就业预期与市场现实存在落差，存在眼高手低、期望过高的问题。专业能力方面，部分学生在校期间疏于技能训练，缺少竞赛、项目、实习经历，职业竞争力不足。心理层面，面对求职挫折抗压力较弱，畏惧面试失败，消极逃避求职；同时缺乏主动获取就业信息意识，习惯于被动等待校园招聘，自主开拓就业渠道的能力不足。

三、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现状的对策研究

（一）强化政策供给与市场引导

政府应落实就业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高职院校的招聘力度，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对提供实习岗位和就业机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

社会各界应加强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的支持和关注。行业协会可以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招聘会等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己的平台和就业机会。企业可以加强与高职院校的合作，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提前确定用人需求，提高学生的就业针对性。同时，媒体应加强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的宣传和引导，树立

正确的就业观念，营造良好的就业氛围。

同时，健全毕业生就业工资机制。政府应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所招聘的大学毕业生的最低工资标准、薪酬福利待遇等，保护高校毕业生的合法权益和基本权利，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3-4]。

（二）发挥家庭育人作用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就业观、价值观必不可少。一方面，家长应理性、客观地看待子女就业问题，不能盲目地让孩子追求高薪工作、追求“铁饭碗”，同时也不鼓励孩子偏离实际情况去从事过于新型的职业或风险较高的工作。应对学生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解，帮助孩子结合所学专业与现实情况，对其进行初步的职业规划，鼓励学生根据自身特色寻找合适的职业规划途径，避免因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而造成就业观的偏差。另一方面，家长也可通过对就业市场的关注，拓宽学生获取就业信息的渠道，帮助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筛选合适的就业信息，避免造成学生在就业中上当受骗，为毕业生的求职道路提供有力的支持。父母也应采用正确的方式鼓励子女进行就业，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帮助，面对其出现就业压力和焦虑情况时，积极疏导，分享自身就业经验，帮助学生拥有更好的就业心态。

（三）完善院校就业助推体系

高职院校应加强对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将职业规划课程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过程中。通过开展职业测评、职业咨询等活动，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特长和职业倾向，制定合理的职业规划。同时，加强就业指导的针对性和个性化，根据学生的专业和个人需求，提供就业指导服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提高求职技巧。

高职院校要不断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践课程的比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建立校企合作机制，与企业共同开展人才培养，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5]。

学校应合理安排实习岗位，确保实习岗位与学生所学专业相匹配，让学生在实习中积累有效的工作经验。同时，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拓宽就业信息渠道，及时、准确地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建立就业帮扶机制，对就业困难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帮扶措施，如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帮助他们顺利就业。

（四）激发学生内生动力

对于处于择业观望状态的学生，不能仅依靠外界帮助，更重要的是从自身观念上改变就业的态度，树立积极、正确的择业观和价值观。首先要明确职业定位，制定精准规划。学生在校期间应客观分析自身技能特长与职业兴趣，了解所学专业发展前景及就业导向，避免因认知模糊陷入择业迷茫。可结合职业院校的专业优势，锁定细分领域职业目标，提高自身能力，逐步匹配目标岗位。

其次，强化技能储备，提升就业竞争力。针对职业岗位需求，查漏补缺夯实专业理论基础，利用线上课程、技能手册等资源自主补充核心知识。更要注重实践能力提升，积极参与企业实习、技能竞赛、校企合作项目，将专业技能转化为实操能力，通过积累项目经验、获取职业资格证书等方式，增强简历“含金量”，破解“技能不达标”的就业瓶颈。

最后，优化心理素质，主动对接就业市场。正视就业焦虑情绪，通过参加职业规划比赛、技能比赛培养能力、调整心态，避免因恐惧失败而逃避求职。同时培养抗挫折能力，将求职过程中的拒绝视为成长契机，及时总结面试经验、调整求职策略。主动拓展就业渠道，利用校园招聘、行业招聘会、求职 App 等平台投递岗位，积极与企业 HR 沟通，打破“被动等待”的就业心态，以积极行动破解就业困局。

四、结语

高职院校学生暂缓就业、观望择业现象是市场环境、家庭认知、院校培养、个体心理多重因素交织形成的复合型问题，单一主体难以有效化解，亟须构建多方协同联动机制。政府持续完善就业扶持政策、优化市场环境；高职院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健全全周期就业指导与服务体系；家庭做好理性引导与情绪支撑；学生主动更新就业观念、锤炼专业本领。多方协同发力，持续引导高职毕业生走出择业迷茫，顺利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充分释放技术技能人才价值，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面向未来，还需持续跟踪高职毕业生就业态势，根据产业变革与市场变化动态调整就业支持举措，构建长效化就业促进机制。

参考文献

[1]2025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会议召开 [EB/OL].(2024-11-15)[2026-02-06].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11/content_6987088.htm.

[2] 李黎丹 . 数字经济时代高职院校学生就业现状与问题分析 [J]. 中国电子商情 ,2025,31(09):130-132.

[3] 王泳善 . 职业生涯规划视角下高职院校学生“慢就业”现象及对策 [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24(06):25-27.

[4] 徐颖 .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保护研究 [J]. 中国大学生就业 ,2021(24):40-44.

[5] 吴宝善 . 基于行为科学视角的高职院校学生“慢就业”现象现状及成因探析 [J]. 文教资料 ,2025(09):165-168.

（作者单位：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五项修炼”模型的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路径探析

王婷婷　付　阳

摘要：高校“组织员工作室”是高校加强组织员队伍建设、提升高校党建工作质量的重要平台载体，它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效能，能有效激发组织员工作积极性，提升组织员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但当前高校“组织员工作室”还需在成员参与动力、团队凝聚力、制度保障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和提升。本文以学习型组织理论中的“第五项修炼”模型为理论框架，针对高校“组织员工作室”的建设现状与困境，探索构建适应新时代党建任务要求的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路径，为推动高校“组织员工作室”科学发展和高效运行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组织员工作室”；学习型组织理论；“第五项修炼”模型；建设路径

高校组织员作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组织者、执行者与推动者，在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指示中指出：“要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着力建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2]组织员正是高素质骨干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提升党建工作质量、推动党建工作合力的骨干力量，因此，各高校必须持续推进组织员队伍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视野广、素质好、作用显、服务优的组织员队伍。

高校“组织员工作室”是推动组织员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创新举措，为组织员搭建了一个集理论学习、实践探究、经验交流和科研产出于一体的互助平台。工作室通过开展专题学习、组织案例研讨和结对帮扶交流，不仅有效提升了组织员的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更促进了工作实践经验与创新方法的传承和共享。工作室的建设有助于整合校内外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激发组织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汇聚团队集体智慧，形成以点带面、示范引领党建新格局，推动组织员队伍全面建强，为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注入新动力。

一、高校“组织员工作室”的建设意义

（一）整合学习资源，锤炼组织员专业内功

随着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的要求及标准不断提高，高校对组织员业务水平及专业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组织员工作室”由专家型导师和骨干型组织员组成，集合了专家和骨干力量，为组织员提供了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机会。工作室成员可以围绕基层党建工作中遇到的重难点问题，展开深入交流探讨，分享经验方法；还可以通过专题研讨、经验分享、专家讲座等形式，拓宽组织员党建工作思路和视野，提升组织员业务水平与专业素养。

（二）搭建科研平台，促进实践与理论双向赋能

高校组织员常因忙于日常事务性工作而忽略自身科研能力的提升。“组织员工作室”将具有相同科研兴趣与意愿的组织员汇聚起来开展科学研究，提高了党建工作科研质量，更促进了组织员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的提升，使高校党建工作由“经验借鉴型”向“科学研究型”转变。“组织员工作室”还为组织员科研工作提供了资源支持和保障，通过集体性、团队化的科学研究，帮助组织员更高效、高质量地产出科研成果，实现党建工作实践与理论的“双赋能”。

（三）加强队伍建设，服务高校党建工作大局

高校组织员常因职业发展模糊、工作任务繁重、考核晋升困难等因素出现换岗、离岗的情况，这严重影响组织员队伍的稳定性。“组织员工作室”有针对性地对组织员进行培养和指导，提供资源支持和保障，有助于激发组织员的内生动力，增强组织员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组织员队伍的稳定健康发展。“组织员工作室”所培育的优秀典型案例和研究成果，也能快速转化为基层党建工作的行动指南，帮助提升基

层党建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水平。

二、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现状分析

高校“组织员工作室”是近年来高校加强组织员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质量的重要创新举措[3]。基于文献研究和对高校“组织员工作室”的调研，当前高校“组织员工作室”还需在成员参与动力、团队凝聚力、制度保障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和提升。

（一）成员参与动力还需进一步激发

“组织员工作室”属于非正式、自愿性的组织，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及自发性倾向。工作室成员的自觉性和参与性是工作室运行核心，但组织员日常工作任务繁重，参与工作室建设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导致其难以持续、深入参与工作室建设[4]。此外大部分工作室尚处于“探索试点”阶段，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成熟经验稀缺，探索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不清晰性也会影响成员参与的积极性与对工作室的归属感。组织员缺乏参与的动力和热情，犹如工作室没有启动燃料，严重影响工作室的运转。

（二）团队凝聚力还需进一步增强

团队凝聚力的强弱影响着团队协作能力和战斗力。“组织员工作室”的成员因共同愿景而聚集在一起，但由于成员间原有工作习惯、思维模式和专业背景存在差异，很难快速建立充分信任，这就容易导致成员间默契不足、协作生疏，难以形成相互支持、紧密配合的理想状态，进而影响团队整体合力发挥。另外，“组织员工作室”定期开展深入研讨与交流的频次仍有提升空间，成员间日常互动不足，这也会影响团队凝聚力的提升。因此，还需进一步加强交流互动，增强彼此信任与认同，持续提升整体凝聚力与协作效能。

（三）制度资源保障还需进一步加强

健全的制度与充足的资源是高校“组织员工作室”有效运行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组织员工作室”作为高校党建工作中的新型组织形式，其在工作室管理制度建设、成员激励与考核体制机制等方面还处于探索完善阶段，还需不断探索建立系统、稳定、可复制的制度体系，保障工作室的高效运转。另外，资源保障是工作室正常运行的基础，尤其在活动经费、活动场地、优质导师资源等方面。制度与资源的双重保障，不仅有助于提高工作室日常运转的规范性与高效性，更有利于组织员个体成长发展以及工作室团队整体战斗力提升。

三、“五项修炼”模型与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的契合点

学习型组织理论是一种现代管理学理论，强调组织通过持续学习和系统思考实现创新发展。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通过对数千家企业调研和案例分析，完成了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五项修炼”模型，即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5]7。

“五项修炼”模型强调通过成员及团队的持续学习和系统思考，来实现组织的共同愿景和发展目标，其核心理念与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在建设理念、目标定位和运行机制上高度契合。其中自我超越是个人成长与发展的驱动力，这与组织员要持续学习、不断激发个人潜力、突破个人发展瓶颈的理念一致；改善心智模式指打破团队壁垒和思维定式，与要求组织员间相互学习，通过学习和反思弥补个人心智模式的缺陷要求一致；共同愿景是指组织成员所共同向往和追求的目标，“组织员工作室”通过构建工作室品牌和建设理念，将组织员个人目标与团队目标结合起来，使成员们团结协作朝着共同愿景持续努力；团队学习强调组织成员共同学习、相互影响，而“组织员工作室”是组织员们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工作室通过团队学习凝聚团队智慧，提升组织员队伍竞争力和向心力；系统思考要求用整体的、动态的、关联的眼光看待组织发展，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是一项动态变化、影响因素复杂的工程，需从全局、系统的角度思考，透过现象分析关键问题，不断修正其建设思路[5]141。

“五项修炼”模型为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提供了一套系统性、结构化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将“五项修炼”模型应用到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中，能为摆脱“组织员工作室”建设中的困境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启示，从而使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向持续学习、系统思考、不断自我革新的成长型学习组织演变[6]。

四、基于“五项修炼”模型的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路径

将“五项修炼”模型融入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全过程，通过引导组织员突破个体认知局限、建立共同目标、开展团队学习与反思实践，构建“个人成长—团队协同—系统完善”的良性循环，推动高校“组织员工作室”从松散经验型组织转向高效能、协同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组织模式。

（一）激发自我超越，培养成员内生动力

对于成员参与动力不足的问题，工作室要将对成员的“外部要求”转化为其“内在追求”，激发成员“自我超越”动力。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必须不断提升组织员的自我超越意识，鼓励其走出舒适区，练就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形成积极向上的团队氛围。一要坚守初心使命。帮助组织员反观自身，寻找和坚定其职业初衷和责任使命，找回工作中的内在驱动力与工作价值感，以职业使命感引领自我不断超越。二

要制定个体规划。帮助组织员剖析自我能力和特长，立足工作室共同愿景和高校党建工作需求，制定个体职业生涯规划与能力提升方案，使组织员清晰自身成长发展路径。三要坚持自我变革。鼓励组织员经常进行反思和内省，查找差距和不足，不断寻找个人提高空间和机会，营造敢闯敢试、不断挑战和进步的良好氛围。

（二）改善心智模式，提升思维与认知层次

改善心智模式有利于提升组织成员的思维与认知层次，促进其思维创新和系统思考能力的发展，同时能有效突破团队协同效能弱、思维模式僵化的瓶颈。一要定期开展深度会谈。经常开展以实际工作困境为导向的工作研讨会、分析会，促进“组织员工作室”成员间知识交流与思维启发，形成“比、学、赶、帮、超”的积极氛围。二要构建开放的学习网络。邀请校内外党建专家、党务干部与优秀党务工作者走进工作室，为组织员开展党建相关理论宣讲和工作经验交流，开阔组织员眼界和视野，启迪其思维思路，提升其理论知识。三要建立健全导师制度。开展“老带新”“传帮带”，给每位组织员配备一名理论或实践型专家导师，鼓励不同年龄、不同院（系）组织员结成学习对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组织员知识和视野的互补、升级。

（三）构建共同愿景，凝聚团队奋斗合力

共同愿景是成员个人目标与团队集体意志结合形成的共同目标，能有效激发成员的潜能、凝聚成员的力量，形成步调一致的团队感召力和凝聚力，为团队建设指引前进方向。一要明确共同愿景。通过组织工作室成员共同研讨，确立工作室的建设理念和发展目标，形成工作室成员共同认可并愿意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二要制定团队发展规划。将共同愿景分解为可量化、可操作的长期、中期与短期工作室建设目标，结合组织员个人目标与工作室团队目标，细化、分解目标任务实施步骤，推动工作室共同愿景落地落实。三要以项目为载体强化认同。制定推进共同愿景落地见效的重点任务和攻关项目，鼓励成员参与项目和任务执行，明确各自任务与责任分工，在共同协作实践中增强组织成员对工作室的归属感与成就感，提升团队认同度。

（四）推动团队学习，营造多元学习环境

团队学习能够提升组织员专业素质与创新能力，为团队成员搭建形式多样的学习平台，相互补充学习经验、提升专业技能，破解实际工作中的难题。一要开展结构化学习。运用“世界咖啡”“头脑风暴”等学习工具，组织工作室成员以结构化学习方式，针对党建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联合攻关，相互借鉴学习、取长补短，形成“1+1>2”的学习成效。二要构建多元学习平台。搭建资源共享互助平台，多形式开展学习交流，通过专题培训、专家讲座、交流研讨等活动，帮助组织员开拓思维，学习新知识、新思想，提升组织员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三是鼓励开展科学研究。引导组织员充分总结自身工作实践，将工作实践、学习成果提炼转化为科研文章、资政报告或创新工作法，提升党建工作成果理论化、系统化水平。

（五）强化系统思考，构建协同发展机制

系统思考是五项修炼的核心，要求组织用整体思维分析问题，用全局眼光看待问题。高校“组织员工作室”要从个体、团队、高校三个维度，以系统性思维研究“组织员工作室”建设，实现工作室系统优化和协同发展。在个体层面，树立组织员全局观念。组织员要用整体思维、全局视野，从高校党建乃至高等教育发展大局思考组织工作，培养组织员系统分析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在团队层面，整合内外部资源优势。把“组织员工作室”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工程来建设，强化内外协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发展合力。在高校层面，强化整体系统规划与管理。将“组织员工作室”建设纳入高校党的建设系统工程，加大引导和支持力度，建立健全考核保障机制，制订并不断修正完善工作室管理制度，为工作室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

五、结语

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理论为摆脱“组织员工作室”建设中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与启示。将“五项修炼”模型融入工作室建设全过程，不仅有助于激发组织员内生动力、提升组织员履职能力，也有利于推进高校组织员队伍专业化、专家化发展。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持续优化的过程，要不断探索学习型组织理论在高校“组织员工作室”建设中的应用方式和途径，持续完善工作室运行机制与制度保障，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党的任务和要求。

参考文献

[1] 陈苗，徐海平，曾叶旻虓，等.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组织员专业化发展路径研究 [J]. 社会与公益，2025(07):149-151.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蔡奇、李干杰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B/OL].(2023-06-26)[2025-12-09].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23/0822/c117092-40061631.html.

[3] 吴洋. 新时代高校组织员队伍建设问题与对策 [J]. 就业与保障，2020(08):147-148.

[4] 秦岭. 高校专职组织员队伍胜任力的现状、问题及提升路径 [J]. 北京教育（高教），2025(02):94-96.

[5] 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下转 282 页）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刘瑾明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系统性缺失与能力评价标准模糊等问题，提出建立一套科学、系统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借助文献梳理与实地调研完成维度划分与指标初选，并且采用专家咨询法实施指标优化与权重确定，最后构建起涵盖多层次具体指标的测评工具。把该体系应用于高校学生群体开展实际测评，全面采集了相关数据并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发现，该指标体系不仅能够高效评定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现状与短板，其测评结果还为高校优化创新创业教育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供了实证依据与针对性启示。本研究提出的指标体系具备较高的实践指导价值，未来可以在更广泛的样本中进一步验证与优化。

关键词：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指标体系；评价；教育实践

一、引言

全球知识经济浪潮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成为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竞争力的重要标准。国内高校积极响应相关政策号召，广泛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但实际操作中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教育内容不够完整、培养过程缺乏整体规划，以及能力评价的标准不够明晰，这些问题都让评估教育效果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变得困难。建立一套科学、系统且易于实施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显得尤为重要，这样可以更好地帮助发现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指导教育工作的改进方向，同时提高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针对这个问题，研究团队精心设计并制定了一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希望通过深入分析和实际应用来完善这个体系，能够为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具体的指导意见和有力的支持，帮助解决当前存在的各种难题。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现状与重要性

（一）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普遍做法

国内高校都把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纳入学生培养的整体规划中，具体实施办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关键环节上。在课程安排方面，大多数学校都会开设一些关于创新和创业的基础课程，这些课程覆盖的内容包括如何培养创新思维方式、掌握创业的基本原理，以及如何编写商业计划书等，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初步了解相关知识并形成正确的观念。在组织活动方面，学校会安排很多有关创新和创业的主题讲座，还会举办各种比赛项目，比如“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这样的大型赛事，同时还会开展专门的培训活动，目的就是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实际操作，并且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展现出来。在搭建平台方面，很多学校都会

（上接 281 页）

织的艺术与实践 [M]. 张成林，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

[6] 马景瑶 . 第五项修炼理论视域下的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建设探析 [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2,41(10):106-108.

本文得到以下项目支持：浙江科技大学 2025 年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专项一般项目“高校‘组织员工作室’领航创建的具体模式和实践路径研究”（2025SZ003）；浙江科技大学 2025 年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专项重点项目“从个体分散到协同共生：高校‘组织员工作室’的三维共同体建设机制研究”（2025SZZD002）。

（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大学）

建立专门的创新和创业研究机构或者工作坊，还会提供一些用于创业实践的空间和资源支持，目的是帮助有潜力的学生团队有条件开展工作[1]。

（二）大学生创新创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

大学生在进行创业和创新时会遇到很多难题和阻碍，这些问题和障碍产生的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是大学生自身的实力还不够强，二是外部条件不够完善。从大学生自身来看，他们的能力分布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大学生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但是在把想法变成实际商业计划的实践操作方面做得不够好，主要表现在对市场的了解不够深入，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考虑不够周全，缺少整合各种资源的经验以及组织团队工作的经验。从外部环境来看，学校提供的支持系统还需要改进，比如，跨学科合作项目的指导衔接不畅，资源整合的渠道也不够畅通，专业水平高且能够长期陪伴的导师数量不足，校内的创业孵化基地与外面的企业、投资机构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因此新创立的企业难以顺利启动和发展。考核和奖励的标准过于看重比赛获奖这样的表面成绩，却没有足够重视大学生在创新过程中付出的努力、个人能力的逐步提升等这些不容易量化的内在进步，这样就造成大学生创业能力和实际效果的提高受到限制，同时，成果也难以真正实现转化利用[2]。

三、构建指标体系的过程与步骤

（一）指标初选：基于理论和调研的维度划分

这项研究严格按照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进行，把现有的各种理论和文献内容收集起来加以整理，然后到多所大学进行实地调查工作，这样就完成了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主要方面的初步划分以及相关指标的仔细挑选和合理确定。从理论角度出发，详细地归纳总结了关于创新创业全过程的研究成果、关键能力形成的具体模式以及教育目的的相关探索成果。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针对高校老师、创业人员以及在校学生这三个不同群体，分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谈话交流和问卷调查活动，目的是明晰创新创业活动中各个群体真正需要哪些能力。依靠前面提到的这些准备工作，成功搭建起了一个包括创新创业意识、知识储备、核心技能、实践转化和个人特质这五个主要方面的整体结构，在每一个方面下面都列出了几项比较具体的观测项目，作为这次研究中选择的备选评价标准[3]。

（二）指标优化与确定：专家意见征询与权重计算

为了保证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研究成立了由创新创业教育专家、高校管理者、成功创业者及资深企业人士组成的咨询专家组。借助多轮德尔菲法，向专家们征集针对初选指标的意见、重要性评估以及增删建议。专家意见趋向统一后，使用层次分析法对确认的指标体系开展权重测算。专家对于同层级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经过一致性检验之后，利用软件计算得到各层次指标的权重系数，从而明晰各项指标在整体评价体系中的贡献程度。

（三）最终形成的指标结构与内容

完成全面设计并进行调整完善，最后形成一套包括多个不同层面并且具有完整框架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估标准体系。这个体系包含了五方面的内容，具体有 17 个细分项目，还有对应的一些详细检查项目和具体表现要求。这五方面分别是创新创业精神和意识、交叉学科领域的知识积累、创新思考能力和发现机会的能力、开展创业活动和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以及承受压力的能力。每个细分项目都清楚地说明了能够被观察到并且可以进行评估的具体行为描述或者相关特点，比如市场敏感度和发现机会的能力就属于创新思维和机会识别能力。整个评估标准体系层级划分清晰，各项能力之间的占比分配充分反映出它们在整体创新创业能力中所占据的不同位置和重要程度，这样就为后面开展标准化的数值化评估工作提供了非常牢固的基础保障[4]。

四、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与实际测评

（一）各级指标的含义与评分标准

这项研究建立起来的评价标准包括创业精神、知识水平、操作技巧以及实际应用四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包括很多内容，加起来一共有 17 个具体项目，比如创业精神就包含了发现机会的能力强弱和面对风险时敢不敢尝试两部分。测试的时候全部使用李克特五分制量表来进行打分，分数从最低的 1 分一直到最高的 5 分，分别对应着“完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一般符合”“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这些不同情况。每个项目的具体内容后面都加上了清晰的行为描述或者具体情境说明，比如团队合作能力方面的得分会根据参加模拟项目的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分配任务、进行交流配合以及解决矛盾冲突这些方面的自我评价和真实表现来进行整体评估。这样的打分办法主要目的就是把那些不容易观察到的能力变成能够测量并且能够互相比较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

（二）在高校学生群体中的测评操作过程

测评对象挑选了我国东部某综合性大学参与过创新创业课程或者活动的在校本科生。测评使用了线上匿名问卷和线下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来实施。研究者通过学校教务系统以及相关学生社团发送线上测评问卷，嘱咐学生们在限定的时间内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自主填写。研究团队根据问卷的初步分析结果，按层次随机抽取一部分学生开展半结构化访谈，针对问卷中提到的复杂能力项目展开深入讨论和具体行为事件的回顾，以保证问卷数据的精确性。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多月，保证了测评的全面性和数据的详尽性。

（三）测评数据的收集与初步结果

调查收集到的有效问卷数量超过了 400 份，同时还整理了几十份深入访谈的文字记录材料。初步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在掌握创新创业基础知识方面表现得比较优秀，个人主动性的相关能力评价也表现不错，这说明现在的通识教育体系和对个人动力的培养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资源整合能力、市场分析能力和风险应对韧性几个方面，大学生的平均分数不够理想，显示出在把这些学到的知识真正用到实际操作中，面对外部环境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时，大家普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经过详细的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那些曾经参加过实际项目的大学生，其实践能力的各项指标评分相比仅仅停留在课程学习阶段的大学生要高出不少，这说明实践环节对于提高能力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指标体系的应用价值与后续改进

（一）测评结果对高校教育的启示

实际测试出来的数据，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改进工作提供了参考和启发。测试的结果清楚地显示了学生们在各个能力方面的具体表现情况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比如有些学生拥有很好的创新想法，但是在分析市场趋势、判断风险大小以及整合各种资源这些实际操作能力上显得不够强。这样的情况说明，现在的很多高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时，课程设置往往比较偏向于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或者只是讲解一些基本概念，却没有足够重视如何把学到的东西用到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去，也没有重视不同学科知识的融合运用，更没有关注整个创业流程中的具体管理方法。测试结果表明，高校需要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不再仅仅满足于把知识简单地教给学生，而是要更加注重帮助学生建立起全面的能力框架。课程设计应该根据测试数据中暴露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增加一些与实际操作紧密相关的实践活动，比如模拟商业场景的练习、展示自己作品的活动等。同时，还要组建一支由多个专业背景组成的团队来共同教授与创新创业相关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学生在创新热情和创业本领两方面得到均衡发展 [5]。

（二）指标体系在实践指导中的具体做法

高校可以把这套指标体系作为新生刚入学或者参加某个项目选拔的时候的一个初步检查手段，这样就能很快发现每个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将来可能擅长的方向，从而为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安排专门培养计划以及把学生分成不同小组打下基础。在上课和教学活动期间，老师可以根据这套体系中各个方面的标准来设计可以灵活调整的教学内容和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比如，想要重点考察团队合作能力，就可以专门安排几个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组成一个小团队，一起完成一个工程项目或者商业计划书的制定任务。另外，要想考察发现问题并抓住有利时机的能力，就可以安排学生专门去深入研究某个行业的最新发展情况。这套指标体系还可以用来帮助学生建立起自己的成长记录档案。只要按照课程开始之前、中间一段时间以及结束之后这三个时间节点分别去做一次测试和评估，就能得到一份完整反映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如何提升的详细变化过程图谱，这样学生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目前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未来还需要朝着哪些方面继续努力，教师们也有了更加准确无误的参考依据来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辅导和各种资源的合理调配。

六、结语

本研究构建了一套完备的、分层式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开展了初期的应用检验。该体系不但解决了现阶段创新创业教育中能力评价标准含糊、维度单一的问题，还为更加公正、精确地评估学生能力现状提供了有力工具。实证分析显示，这套体系可以精确辨别学生能力的优势和劣势，揭示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从而为高校调整课程设置、改善教学方法、进行个性化培养提供了实证依据和针对性指引。研究过程中融合使用了文献分析、实地调研和专家咨询等方法，保证了指标的科学性与代表性，权重设计也提升了评价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本研究仍然存在某些不足之处，比如样本范围需要进一步扩展，指标体系在灵活匹配不同高校类型、专业特色方面还需更深入的调整。未来，研究可关注扩展应用范围，实施长期跟踪，整合更多种类的数据和方法，对指标进行持久验证和优化，以提高其普适性与预测性。这一指标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会促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朝着精细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助力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显著提升。

参考文献

[1] 段肖阳 . 论创新创业能力模型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J]. 教育发展研究 ,2022,42(01):60-67.

[2] 江旺龙 . 大学生陶瓷文化传承和创新创业能力指标体系的建构与验证研究 [J]. 景德镇学院学报 ,2022,37(01):127-131.

[3] 张小力 , 杨云峰 , 晏永 . 基于 AHP/QFD/TRIZ 理论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J]. 机械设计与制造工程 ,2023,52(05):127-134.

[4] 沈钦龙 , 吴立婷 . 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与构建 [J]. 福建电脑 ,2022,38(04):20-24.

[5] 宋柏红 , 季秋辰 .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2022,5(22):185-188.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月15日 · 全国生态日

公益广告

社工人
有困难 找社工
社工人数字化平台

有困难 找社工

聚焦急难愁盼
助力基层治理
共享美好生活

ISSN 1674-9758
9 771674 975260 16
邮发代号：82-579　定价：40.00 元

公益广告